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0—192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2

ISBN 7-5013-1347-4

I. 联… II. 中… III. 共产国际-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1920~1925-史料 IV. K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0508 号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

书名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0~1925)

著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出版发行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涿州新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4.8125

字数 620(千字)

版次 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书号 ISBN 7-5013-1347-4/A·2

定价 48.00 元



丛书编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主 编 黄修荣
副主编 马贵凡 王德京

学术指导

李 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廖盖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向 青 (北京大学 教授)

杨云若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刘桂生 (北京大学 教授)

张注洪 (北京大学 教授)

宋洪训 (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 研究员)

A·M·格里戈里耶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教授)

K·B·舍维廖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 I. 1920—1925

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КОЛЛЕГИЯ

ГО ХЭНЬЮЙ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 РАБОТЫ)
М. ЛЕЙТНЕР
Р. ФЕЛЬБЕР

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 РАБОТЫ)
К. М. АНДЕРСОН
В. И. ГЛУНИН
А. М. ГРИГОРЬЕВ

ISBN 5-85603-055-9

Отпечатано в тип. А. О. ВТИ. Зак 1949
127576, Москва, Илимская ул., 7.

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и изуч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АН, 1994

Восточноазиатский семинар
Свобод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Берлина.

丛 书 前 言

联共(布)^①、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在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推动了中共党史等有关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但由于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还比较匮乏等原因,这些研究只是初步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文献档案,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1993年开始实行《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及档案馆库管理的基本法》。随着这一法规的颁布,大量罕见的档案资料首次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最使我国学术界感兴趣的

^① 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

为了把这批从未公布过的重要档案资料介绍给我国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我们根据与俄方签订的协议，组织有经验的学者独家翻译这套档案文件集，并聘请中外专家进行译审、校阅。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历年来在我国各种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的其他重要中文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49）》。这套文献资料选辑将与前述档案文件集组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在我国出版。

毋庸置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它的问世，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更具体地弄清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华使节及顾问在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共识和分歧，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这套档案资料丛书在编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多方帮

助。值此丛书问世之际，谨向关怀、支持过这项工作的有关领导和部门，向为编译、出版这套丛书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有关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黄修荣

1996年10月

于京郊自得园

译者前言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大型系列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二卷的中译本,根据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译出。本文件集收录重要档案文件205份,绝大多数为首次发表,其中包括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契切林、加拉罕、越飞、维经斯基、鲍罗廷、孙中山、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文电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记录。这些文件都是珍贵的史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了及时把这些文件译介绍给我国史学界,我们于1996年上半年向原书编者购买了中文版翻译出版权,并着手组织力量进行翻译。本书列为我们编译的大型文献档案丛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

本书俄文版由前言、绪论、文件正文、书目索引、人名索引五部分组成,根据中国读者的需要,中译本全文译出前三部分,后两部分属附录,从略。为反映文件原貌,

中译本保持了原文件的体例，未作任何删节。在俄文版中注释是文尾注，为便于读者阅读，中译本一律改为脚注。有些注释对中国读者来说实无必要，翻译时作了删节。译者新加的注释在注后标有“译者”字样。

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很大难题，是准确还原中国人的本名，文件中有些中国人使用的是化名或广东语拼音姓名，由于年代较久，又缺乏可参考的中文资料，有些人的名字难以查实，只好音译或估译，这种情况在行文或脚注中作了说明。

文件中有些俄国人的名和父名缩写字母，因不知全称，无法译出相应汉字，为统一起见，在中译本中一律删去不译，只译姓，但对于中国读者不熟悉的人物，第一次出现时尽量用脚注明其姓名全称。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许多知名学者的关心和帮助。著名汉学家、原书俄方编者、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A·M·格里戈里耶夫教授和 K·B·舍维廖夫博士热情地帮助解决语言理解等方面的某些疑难问题；著名汉学家、俄罗斯东方学研究所 Ю·М·加普尚茨教授指出了原书俄文版中的某些错误，帮助澄清了一些史实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刘桂生教授、张注洪教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审读译稿，帮助订正译文中的不准确之处。我们特此向他们表示谢意。

本书的翻译工作由马贵凡同志组织。参加翻译的有：（以姓氏笔划为序）马贵凡（中央党史研究室译审）、王昌滨（中央党校译审）、宋洪训（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李永

昌（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高威（中央党校副教授）、董友忱（中央党校译审）。

全书译稿最后由宋洪训、马贵凡同志校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译文中难免有错漏和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前 言

不久前，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即原苏共中央社会主义理论与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保管的文献资料向社会开放，这些文献资料对科研工作已经关闭了几十年，这次开放为汉学家使用新的第一手资料研究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提供了可能性。

发掘和公布迄今鲜为人知的文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这是在学术和学术政治方面向汉学家提出的一个严重的挑战。柏林洪堡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的汉学家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同行们，在1992年5月着手做这项工作。柏林自由大学和远东研究所的领导从思想上和物质上支持这个计划，签订了合作协议。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这本书，是计划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多卷本文件集的第一卷。本书用俄德两种文字同时出版。这一卷公布的文献的重大学术意义，不仅在于能够证实或推翻以前对国共合作历史的一些说法，而且含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和评价，为更加详细地阐述我们对当时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解提供了可

能性。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文献揭示了内部的“工作”关系，揭示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立场和行为，向读者介绍了莫斯科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以及莫斯科对中国两党内部发展进程的影响。

在不同学派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学者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和富有成效的合作，是参加执行这个计划的所有学者的共同意愿和责任，这种合作加快实现了他们提出的目标——向读者提供能够促使我们去阐述真实历史的文献资料。

编者

目 录

前言	(1)
绪论	(1)
第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寻求盟友	
1. 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1920年6月）	(28)
2. 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1920年8月17日）	(31)
3.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1920年9月1日）	(36)
4.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摘录）（1920年9月1日）	(38)
5. 斯托扬诺维奇给某人的信（1920年9月29日）	(42)
6. 刘江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1920年10月5日）	(44)
7. 波达波夫给契切林的报告（1920年12月12日）	(47)
8. 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摘录）（1920年12月21日）	(49)
9. 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年4月21日）	(58)

10. 共产国际执委会执行局会议记录（摘录）
（1921年8月26日） (64)
11. 契切林给扬松的电报（摘录）
（1921年10月31日） (65)
12. 契切林给列宁的信（1921年11月6日） (66)
13. 列宁给契切林的便函（1921年11月7日） (67)
14. 杜霍夫斯基与舒米亚茨基直接通话记录（摘录）
（1921年12月2日） (68)
15. 契切林给派克斯的电报（1921年12月7日） (69)
16.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讨论远东会议问题会议
记录（1921年12月26日） (70)
17.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9号记录（摘录）
（1922年1月12日） (71)
18.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列宁的信
（1922年3月15日） (72)
19.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列宁的信附录“督军”
（摘录）（1922年3月15日） (77)
20.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拉狄克的信
（1922年4月6日） (80)
21. 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
的报告（摘录）（1922年5月20日） (81)
22. 扬松给加拉罕的电报（1922年7月10日） (97)
23. 派克斯给加拉罕的电报（摘录）
（1922年8月4日） (98)
24. 越飞给吴佩孚将军的信（1922年8月19日） (99)
25. 越飞给孙逸仙的信（1922年8月22日） (103)
26. 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1922年8月25日） (107)
27. 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年8月27日） (109)

-
28. 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 (1922年8月30日) (112)
 29. 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 (1922年8月30日) (113)
 3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4号记录(摘录)
(1922年8月31日) (114)
 31. 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摘录)
(1922年8月31日) (116)
 32. 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的信(1922年8月) (117)
 33. 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摘录)
(1922年9月1日) (120)
 34. 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1922年9月4日) (123)
 35.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5号记录(摘录)
(1922年9月7日) (125)
 36. 越飞给孙逸仙的信(1922年9月15日) (126)
 37. 越飞给马林的信(1922年9月18日) (130)
 38. 越飞给吴佩孚将军的信
(不晚于1922年9月18日) (132)
 39. 马林为格克尔同孙逸仙的谈话所作的记录
(1922年9月26日) (134)
 40. 吴佩孚给越飞的信(1922年10月12日) (138)
 41. 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摘录)
(1922年10月17日) (139)
 42. 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摘录)
(1922年11月1日) (142)
 43. 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年11月2日) (144)
 44. 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摘录)
(1922年11月7和8日) (147)
 45. 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摘录)
(1922年11月9日) (151)

46. 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摘录）
（1922年11月10和13日） (152)
47. 越飞给吴佩孚将军的信（1922年11月18日） (155)
48. 吴佩孚给越飞的信（1922年11月20日） (159)
49.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的
任务》（不晚于1922年12月5日） (161)
50. 孙逸仙给列宁的信（1922年12月6日） (163)
51. 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年12月20日） (165)

第二部分：面向孙逸仙

52.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讨论中国问题会议记录
（摘录）（1922年12月29日） (178)
53.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摘录）
（1922年12月29日） (179)
54. 中国共产党1923年支出预算（1922年12月） ... (184)
55.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2号记录（摘录）
（1923年1月4日） (186)
56. 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速记记录（摘录）
（1923年1月6日） (188)
57. 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
的信（1923年1月13日） (192)
58. 托洛茨基给越飞的信（1923年1月20日） (200)
59. 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
（1923年1月25日） (203)
60. 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
的信（1923年1月26日） (206)
61. 越飞对同孙逸仙合作的前景和可能产生的后果
的看法（1923年1月26日） (218)

-
62. 托洛茨基给加米涅夫的信 (1923年2月6日) … (222)
63. 维经斯基就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局的工作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的报告 (摘录)
(1923年2月22日) …… (223)
64. 俄共 (布) 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3号记录 (摘录)
(1923年3月8日) …… (225)
65. 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的信 (摘录) (1923年3月8日) …… (227)
66. 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 (1923年3月11日) …… (230)
67. 托洛茨基给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的信
(1923年3月13日) …… (232)
68. 维经斯基就中国形势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报告 (摘录) (1923年3月24日) …… (233)
69. 俄共 (布) 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7号记录 (摘录)
(1923年3月26日) …… (236)
70. 维经斯基给萨法罗夫的电报
(1923年3月27日) …… (238)
71. 东方部就1923年第一季度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报告 (摘录) (1923年4月4日) … (239)
72. 萨法罗夫给俄共 (布) 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3年4月4日) …… (242)
73. 维尔德给某人的信 (1923年5月22日) …… (249)
74.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给其出席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的指示草案
(1923年5月23日) …… (251)
75. 布哈林给维经斯基的便函
(不晚于1923年5月24日) …… (253)
76. 布哈林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给中国共产党

- 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草案的修正案
 (不晚于1923年5月24日) (254)
77. 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
 央委员会的信(1923年5月31日) (256)
78. 陈独秀给萨法罗夫的信(1923年7月1日) (261)
79. 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7月26日) (263)
8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1号记录(摘录)
 (1923年8月2日) (265)
81. 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8月25日) ... (266)

第三部分：国民党代表团访问莫斯科

82.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鲁祖塔克
 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7日) (282)
83.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
 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
 (1923年9月10日) (284)
84. 杜霍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情况的札记
 (不晚于1923年9月10日) (288)
85. 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问第144步兵团情况的书
 面报告(1923年9月17日) (290)
86. 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3年10月6日) (293)
87. 国民党代表团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
 书面报告(不晚于1923年10月18日) (297)
88. 维经斯基给张国焘的信(1923年10月24日) ... (303)
89.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问“红罗莎”
 工厂的书面报告(1923年10月27日) (305)
90. 契切林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3年11月1日) ... (307)
91. 托洛茨基给契切林和斯大林的信

- (1923年11月2日) (308)
92.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
(1923年11月13日) (309)
93. 季诺维也夫就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的决议草案给契切林和布哈林的附函 (1923年11月23日) (313)
94. 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 (1923年11月25日)
..... (314)
9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
(1923年11月26日) (329)
96. 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 (1923年11月26日) (330)
97.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访托洛茨基情况的书面报告 (1923年11月27日) (339)
9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
(1923年11月28日) (342)
99.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苏情况的书面报告 (1923年12月5日) (345)
100. 契切林给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3年12月5日) (347)

第四部分：国民党改组及其初步成果

101. 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
(1923年12月10日) (364)
102. 鲍罗廷同瞿秋白的谈话记录
(1923年12月16日) (378)

-
103. 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 (1923年12月27日) (386)
104. 鲍罗廷给维经斯基的信 (1924年1月4日) (394)
10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 (摘录)
(1924年1月15日) (398)
106. 俄共 (布) 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4号记录 (摘录)
(1924年1月24日) (401)
107.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 (1924年1月25日) (402)
108. 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 (1924年2月8日) ... (406)
109. 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 (1924年2月9日) (410)
110. 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 (1924年2月13日) (417)
111. 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 (摘录)
(不早于1924年2月16日) (419)
112. 俄共 (布) 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0号记录 (摘录)
(1924年3月20日) (488)
113. 俄共 (布) 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1号记录 (摘录)
(1924年3月27日) (489)
114.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东方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 (1924年2月25日) (490)
115. 维经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
(1924年4月21日) (492)
116. 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书面报告 (1924年6月2日) ... (495)
117.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0次会议情况通报
(1924年7月3日) (497)
118. 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 (1924年7月12日) (503)
119. 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 (1924年7月13日) ... (506)
120. 中共广东组织就鲍罗廷的报告作出的决议
(1924年7月15日) (508)

-
121. 鲍罗廷给瞿秋白的信（1924年7月18日） ……（509）
122.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号记录（摘录）
（1924年7月24日） ……（513）
123. 就中国农民问题与孙逸仙和廖仲恺的谈话
（1924年8月10日） ……（515）
124.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讨论与共产党人关系问题情况通报
（不早于1924年8月30日） ……（517）
125. 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 ……（528）
126.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2号记录（摘录）
（1924年9月11日） ……（530）
127.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就瞿秋白同志关于广东政治路线的报告作出的决议（不晚于1924年10月8日） ……（532）
128. 中共中央给鲍罗廷的信
（不晚于1924年10月10日） ……（535）
129. 陈独秀给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信
（1924年10月10日） ……（537）

第五部分：冯玉祥政变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新重点

130. 维经斯基给季诺维也夫的电报
（1924年11月底） ……（555）
131. 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1924年12月7日） ……（557）
132. 拉斯科尔尼科夫和穆辛给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4年12月16日） ……（559）
133. 维经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摘录）
（1924年12月19日） ……（560）
134. 鲍罗廷《关于国民党》的书面报告

- (1925年1月24日) (564)
135. 瞿秋白给鲍罗廷的信 (1925年1月26日) (572)
136. 鲍罗廷的书面报告 (1925年2月14日) (574)
137. 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的信
(1925年2月15日) (578)
138.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2号记录(摘录)
(1925年3月13日) (581)
139.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2号记录(摘录)
(1925年3月13日) (582)
140.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书面报告
(1925年3月14日) (584)
14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3号记录(摘录)
(1925年3月19日) (588)
142. 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第2号报告
(1925年3月20日) (589)
14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5号记录(摘录)
(1925年4月2日) (594)
144.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5号记录(摘录)
(1925年4月2日) (595)
145. 鲍罗廷的书面报告《孙逸仙之死与国民党》
(1925年4月6日) (597)
146.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1号
记录(摘录)(1925年4月17日) (602)
147. 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1925年4月22日) ... (605)
148.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2号记录(摘录)
(1925年5月7日) (610)
149. 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摘录)
(1925年5月13日) (612)

-
15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3号记录（摘录）
（1925年5月15日）……………（615）
 151.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
席团的报告（摘录）（1925年5月16日）……（617）
 152.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2号
记录（1925年5月29日）……………（623）
 15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3号
记录（1925年6月5日）……………（628）
 154.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6号记录（摘录）
（1925年6月11日）……………（632）
 155.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7号记录（摘录）
（1925年6月18日）……………（635）
 156.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8号记录（摘录）
（1925年6月25日）……………（636）
 157. 瓦西里耶夫给中共中央的信（1925年7月21日）…（638）
 158.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4号
记录（1925年7月28日）……………（642）
 159. 维经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
（1925年8月4日）……………（645）
 16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5号
记录（1925年8月5—7日）……………（648）
 16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5号记录（摘录）
（1925年8月13日）……………（649）
 162.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5号记录（摘录）
（1925年8月13日）……………（650）
 16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6号
记录（1925年8月18日）……………（651）
 164. 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年8月19日）……………（652）

-
165.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
作的指示草案（早于1925年8月21日）……………（657）
166.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7号
记录（1925年8月21日）……………（664）
167.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6号记录（摘录）
（1925年8月22日）……………（666）
168. 拉斯科尔尼科夫给伏龙芝的信
（1925年8月22日）……………（667）
169. 拉斯科尔尼科夫给伏龙芝的信
（1925年8月24日）……………（668）
17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7号记录（摘录）
（1925年8月27日）……………（669）
17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8号
记录（1925年8月29日）……………（671）
172.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9号
记录（1925年9月5日）……………（672）
17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10
号记录（1925年9月16日）……………（673）
174.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摘录）
（1925年9月17日）……………（675）
175.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摘录）
（1925年9月17日）……………（676）
176. 瓦西里耶夫给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5年9月21日）……………（677）
177.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11
号记录（1925年9月23日）……………（680）
178.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0号记录（摘录）
（1925年9月24日）……………（682）

-
179. 斯莫连采夫给加拉罕的便函
(1925年9月25日) (683)
18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12
号记录(1925年9月28日) (684)
181. 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年9月28日) (687)
182.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
(1925年9月28日) (694)
183. 温施利赫特和博尔特诺夫斯基给斯大林的书面
报告(1925年9月30日) (696)
184. 斯莫连采夫给加拉罕的信
(1925年9月30日) (701)
185. 博尔特诺夫斯基给瓦西里耶夫的信
(1925年10月1日) (702)
186. 瓦西里耶夫给维经斯基的信
(1925年10月2日) (703)
187. 斯莫连采夫对向人民军和广州提供物质支援计
划的说明(1925年10月7日) (707)
188.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调整驻华教
官工作条件专门委员会会议记录
(1925年10月9日) (710)
189. 伏龙芝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中
国军事政治形势的报告
(1925年10月13日) (712)
190. 瓦西里耶夫给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5年10月14日) (713)
19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3号记录(摘录)
(1925年10月15日) (715)
192.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13

- 号记录 (1925年10月19日) (716)
193. 俄共 (布) 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专门委员会
关于在中国开设新领事馆的建议
(不早于1925年10月19日) (722)
194. 俄共 (布) 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4号记录 (摘录)
(1925年10月22日) (724)
195. 俄共 (布) 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14
号记录 (1925年10月26日) (726)
196. 陈独秀给中共莫斯科区委的信
(1925年10月28日) (728)
197. 俄共 (布) 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6号记录 (摘录)
(1925年10月29日) (729)
198. 俄共 (布) 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8号记录 (摘录)
(1925年11月5日) (732)
199. 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 (摘录)
(1925年11月11日) (733)
200. 俄共 (布) 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3号记录 (摘录)
(1925年12月3日) (739)
201. 俄共 (布) 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3号记录 (摘录)
(1925年12月3日) (741)
202. 拉斯科尔尼科夫给维经斯基的信 (摘录)
(1925年12月4日) (743)
203. 拉斯科尔尼科夫给加米涅娃的信
(1925年12月11日) (746)
204. 胡汉民在莫斯科的工作计划
(不晚于1925年12月11日) (747)
205. 拉菲斯同胡汉民的谈话记录
(1925年11月12日, 12月7日和12日) (753)

绪 论

历史与现实始终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在较短的一段时间里尤其如此。这也适用于专论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广义上的）对华政策的本文件集的内容。中国处在苏联领导人注意的中心，不仅是因为可以理解的地缘政治原因，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使它变成了国家间尖锐矛盾的焦点，而且还由于中国日益加剧的内部纷争孕育着对苏维埃政权有潜在好处的大规模革命。在政治上很活跃的中国社会阶层中有一些思想激进的人把俄国革命看作是仿效的榜样，把布尔什维克看作是自己在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天然盟友。这种情况曾促使苏联领导人千方百计推进中国革命，激起他们对中国革命潜力的实际兴趣，也曾为苏联外交人士大加利用。中国两个主要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历史可以作为例证。在苏联的直接参与下，这两个党变成了有活力、有生气的政治力量。同样在苏联的直接参与下，它们两次实行合作，两次大动干戈。迄今为止，这两个党都活跃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并展开竞争：一个统治着大陆中国，另一个统治着中国领土中的一个不大的岛屿。

众所周知，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都是由党的最高领导决定的。苏联外交机制的运行特点是，总的外交战略和策略是按着两个不同职能的渠道实施的：一个是通过对于所有国家来说通常都设立的外交部门，即外交人民委员部，一个是通过共产国际。表面上共产国际被认为是独立的集体的国际共产党人组

织，而实际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财政上都处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严密控制之下。共产国际的所有重大政治举措和干部任命事先都得经政治局讨论批准。政治局还负责协调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这种情况可以从收录在本文件集中的政治局会议记录和其他档案资料中得到证实。文件中还有许多材料说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同苏联驻北京外交机构官员在工作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兼顾”地完成他们的任务，而外交官员为共产国际代表在这个国家的工作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从而保证了在中央和在地方执行力度不同然而统一的外交方针。当然，由于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技术”职能（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不同性质，在它们和它们的工作人员之间有时也发生意见分歧和摩擦，但是这些问题都相当顺利地由党的最高领导消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的实际目标一直互不相容，这是造成苏联外交政策，包括对中国的政策，遭到失败的根源之一。

这种情况已经在苏联和苏联以外发表的联共（布）、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的文献中得到证实。联共（布）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以及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在分析国际形势和苏联对外政策时，都涉及到中国问题，这一点在已发表的关于联共（布）第十二至十五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工作情况的速记记录稿中已有反映^①。

在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1926 年和 1927 年的联席会议上，曾就中国革命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但是这些会议的速记记录现在还没有公布。

斯大林、布哈林和党的另一些领导人出版的著作，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立场作了一定的说明^②，但是应当指出，政治

^{①②} 见 П·Е·斯卡契科夫：《中国图书目录》，莫斯科 1932 年和 1960 年俄文版。

局会议记录和它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实际上至今还没有公诸于世^①，而保存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中的斯大林个人档案也没有对研究者开放。

已经公布的保存在美国的托洛茨基个人档案中的文件，补充说明了联共（布）领导内部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斗争波折，但是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其中只提供了关于苏联对华政策的片断材料^②。

公布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苏中关系的文件时，一开始只强调说明同设在北京的北方政府的联系。至于契切林、加拉罕和其他苏联外交官同国民党首领孙逸仙的书信往来，以及同设在广州的南方政府和设在武汉的国民党政府的接触，基本上是在几十年以后才为公众所了解^③。

在已公布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文件中，外交部门就苏联对华政策问题同最高领导机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往来的书信提供得很少。

中国革命问题是共产国际注意的中心，在共产国际第三至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在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上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都作了一定的探讨，这在共产国际出版的有关速记记录中都有反映^④。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在20年代，由于保密原因和其他原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某些重要

① 只发表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6年4月1日的决议《我国对中国和日本的政策问题》，载由M·费尔施廷斯基主编的《苏联的共产主义反对派（1923—1937）——托洛茨基档案选录》第1卷，本森1988年版第174—181页。

② 见《苏联的共产主义反对派（1923—1937）——托洛茨基档案选录》。

③ 《苏中关系（1917—1957）》，莫斯科1959年版；《苏联外交文件》第1—10卷，莫斯科1957—1965年版；《孙中山选集》，莫斯科1985年第2版（修订增补版）；《孙中山（1866—1986），纪念120周年诞辰》（论文、回忆录和文献资料集），莫斯科1987年版。

④ 详见И·Е·斯卡契科夫：《中国图书目录》；W·斯沃拉科夫斯基：《共产国际及其前线组织》，纽约1965年英文版。

决议在公布时作了删节，或根本就没有公布^①。

共产国际刊物上曾发表过许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中国某一事件发表的告中国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呼吁书，以及支持中国革命的号召书^②，但是没有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许多业务指示公诸于世。

共产国际驻华使节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罗易等人积极利用刊物贯彻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指示，这些文献是已经问世的几本关于共产国际代表在华活动的资料集的主要资料来源^③。

从保存在阿姆斯特丹的马林档案中选编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主要文件的发表，可以再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的各种十分复杂和矛盾的活动的真实情景^④。

至于1929年在苏联出版、后被译成英文和中文的罗易1927年在华活动资料集^⑤，其中鲜为人知的文献资料是认识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政治军事顾问之间在国民革命运动危急时期的戏剧性意见分歧的重要补充。

苏联驻华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的活动，在几本书中已有反映，这几本书是根据1927年4月6日袭击苏联驻北京代表机构时截

①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莫斯科1986年版第67—83、103—105页。

② 详见《国际新闻通讯》和《共产国际》上刊载的文件、论文和重要报告，载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24—1927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帕德博恩1979年德文版第295—313页。

③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1983年中文版；《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1980、1984年中文版；《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1984年中文版。

④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1989年中文版；托尼·塞奇：《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起源——马林的作用》第2卷，莱顿1991年英文版（以下称托尼·塞奇：《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起源》）。

⑤ 罗易：《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论文资料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版。

获的资料编写的^①。另外，在驻华南军事顾问团领导人布留赫尔的文献集和回忆著作中也有所反映^②。

接受和改变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的复杂情况，以及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苏联政治军事顾问和苏联外交官员相互关系的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发表的中共文件中，即中共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决议^③、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驻华代表的往来书信^④、中共领导人在报刊上发表的讲话和文章以及回忆著作^⑤中都有所反映。

至于国民党，它同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以及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文件集^⑥、孙中山全集以及廖仲恺、宋庆龄和国民党其他人士的选集^⑦中都作了相当详细的叙述。

- ① 韦慕庭、夏连荫：《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文件集（1918—1927）》，纽约1956年英文版；《革命使者：苏联顾问和国民党中国（1920—1927）》，伦敦剑桥1989年英文版；夏连荫：《1925—1926年国民军中的苏联顾问：文献研究》，载《中国历史研究》，纽约1985—1986英文版第19卷第1—2期。
- ② А·И·卡尔图诺娃：《布留赫尔在中国（1924—1927）》（文件集），莫斯科1970、1979年版；《苏联志愿者论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回忆录），莫斯科1961年版；《在中国的土地上——苏联志愿者回忆录（1925—1945）》，莫斯科1977年版。此外，在苏联还出版了А·В·布拉戈达多夫、В·В·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С·А·达林、М·И·卡扎宁、Н·И·孔契茨、В·М·普里马科夫和А·И·切列潘诺夫关于他们在华工作情况的回忆录。
- ③ 《“一大”前后》第1—3册，北京1980、1985年中文版；《“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第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北京1985年中文版（以下称《“二大”和“三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1989年中文版。
- ④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集（1922—1926）》，北京1981年中文版；《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集（1927—1933）》，北京1983年版；《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教学参考资料》第1册，北京1985年中文版；《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集（1925—1927）》，北京1985年中文版。
- ⑤ 详见《中共党史学习参考手册》，北京1986年中文版第256—274、279—282页；托尼·塞奇：《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的1949年以前中共党史原始资料》，载《中共研究通讯》，克罗拉多斯普林斯1989—1990年第4期第1—12页。
- ⑥ 《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册（1894—1927），北京1986年中文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北京1985年中文版；《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南京1986年中文版。还见由М·拉菲斯主编的《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莫斯科1928年俄文版。
- ⑦ 《孙中山全集》第5—11卷，北京1985—1986年中文版；《廖仲恺文集》，北京1983年中文版；《宋庆龄选集》，北京1966年中文版。

遗憾的是，在台湾的出版物^①中，涉及国民党同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关系的内容寥寥无几。

总之，应当指出，上面列举的所有出版物使用的史料都是有限的。

现在可以利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共产国际领导机关，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外交官、政治军事顾问和苏联驻华机关工作人员的文件来为扩大史料基础创造良好的前提。

本文件集^②只收录了一个主要文献库——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的文献资料。其他重要档案，如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现代文献保管中心档案、外交部档案、国防部档案、安全部档案等都还没有开放。

在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的馆藏中保存着联共（布）中央机关、共产国际及其有关组织、外国共产党和国民革命党等等的文献。但不是其中的所有文献都已对研究者开放。例如，很重要的一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性决定，即所谓“特别文件”，只是在最近才开始解密。现在我们能够把这些文件，其中包括以前鲜为人知的斯大林的指示，收入本文件集中。至于中国，在50年代我们曾把中国共产党及其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许多原始文件交给北京，未作复制。这些文件多数至今尚未公布。

本文件集的构成是由编者所支配的文件的性质决定的。收录的文件主要是以两个政治领导组织——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材料，其中包括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往中国的指示、共产国际代表发中国的报告、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发展情况的报告、同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往来书信、关于

① 参见《革命文献》第8—21、69、70册，台北（无出版时间）。

② 指《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1920~1925年）和第2卷（1926~1927年）上、下册——译者。

国民党代表团 1923—1926 年间在莫斯科谈判情况的材料、关于冯玉祥访问莫斯科情况的材料等。至于外交文件，只收录了其中为数不多的、发给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它的机构并且后来存入档案的文件。许多文件的作者是俄罗斯通讯社驻北京和广州的记者以及苏俄驻上海的工作人员。

编辑本文件集时，遵循以下原则：1. 只收录以前从未公布过的文件^①；2. 对著名的事件和进程作出新的说明的文件或进一步明确以前的概念的文件，以及从文献上证实以前根据间接材料、回忆录等了解到的情况的文件；3. 编者力求根据文件集容量和文件性质所限定的最大可能性阐明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面，以及中国政治生活中首先是革命运动中的主要事件。这里自然首先偏重于出自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之手以及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人之手的文件。主要的一组文件是共产国际代表和其他苏联驻华工作人员同莫斯科往来的书信（书面报告、私人信件、莫斯科查询等）。在莫斯科与北京、广州、上海、武汉等地往来的电报（更不用说上述外交、军事档案等）尚未开放的情况下，这些材料既是关于莫斯科的政策及其演变、实施情况，又是关于对莫斯科政策的接受情况和在中国取得的实际效果的最宝贵的信息来源。

这些文件在另一个方面也有很大意义。表面上，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休会期间，是这些会议的决议决定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中共的主要政策方向，而实际上，特别是在中国局势急剧变化的时期，如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1926 年 2、3 月间）和第七次（1926 年 11、12 月间）全会之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和中共领导都曾面临棘手的选择：必须遵循共产国际最高领导机关的决定，同时又迫切需要考虑形势

^① 有几个对于揭示内容特别重要的文件属例外，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923 年 11 月 28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第 10 次会议记录等。

的变化。本文件集提供的较“低”层次的文件反映了这个实际矛盾，表明了由统一的但很遥远的中心即莫斯科来领导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行动以及与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有密切联系的国民党力量的策略行动，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在时间跨度上，本文件集涵盖了从共产国际代表于1920年同中国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和孙逸仙的最初接触到对于莫斯科对华政策和中共来说都是很悲惨的1927年春夏事件这一时期。文件严格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编排，使人得以清楚地了解这个时期发生的不同性质和不同方面的矛盾的演变过程、相互关系及其全貌，得以系统地研究一些独立的发展阶段及其关键的发展时刻。总之，事态是按上升线和越来越复杂化的方向发展的，但绝不是平稳渐进的发展，而是断断续续的发展，好像不均匀的跳跃，每次跳跃都为发展进程赋予了某种新质，这些关键的发展时刻，也就是“跳跃”，除内部推动力外，在不小的程度上，有时是决定性的程度上，是由莫斯科、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历史上的其他政治主体作出的重要决议决定的。相应形成的档案文件组即卷宗，也多寡不一。例如，不难发现集中反映1926年情况的材料最为丰富，因为这一年在国民革命进程中出现了质的转变（1926年的“3·20”事件、国民党军队北伐开始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后来的命运。又如，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生命攸关的悲惨的而对于国民党来说是胜利的1927年事件，在开放的档案文件中反映得比较少（国外出版物中也是如此），因而不能排除这种情况，即许多说明苏联领导对华政策严重失误的文件，被有意识地从一般档案库中抽出，转入专门的保管系统，甚至被销毁。例如，至今还没有找到1927年初汪精卫访问莫斯科的任何踪迹。另外，各个时期的文件在数量上之所以有些不成比例，还因为有些文献已经编辑出版。

由于档案卷宗的形成具有上述性质（或者说也可以说专题性质），所以，为便于利用本文件集但又不破坏按时间顺序的排列，

可以将文件集分成若干部分或题目，并加上不长的前言，对其中最重要内容作出评述。

从专题角度看，文件集的组成成份是多方面的。其中提供的材料涉及大量的问题、情节和具体细节。编这部文件集的意图和文件集的名称，决定了优先选用那些揭示苏联领导对华政策的战略目标、策略手段以及实际实施内容的文件、揭示在思想、政治、物质、军事和干部上的保障措施的文件，优先选用那些揭示苏联领导对华政策中通常的外交行动与大规模的革命输出相交织的文件。已公布的档案文件使人们有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1923年上半年发表孙越宣言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向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提供财政及其他援助的决定时起，利用由莫斯科指导和支持的中国国民革命力量来推翻北京合法政府并在中国建立一个有“工农”社会基础的、将发展成为布尔什维克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亲苏政权的方针，很快就成了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在这个目标未实现之前，同北京政府以及一些控制地方政权的军阀仍保持由苏维埃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所决定的外交关系和经济关系。公正地说，资本主义大国在同苏维埃国家的关系中也积极采用了这种“双重标准”。

布尔什维克的对外（对内）政策，是由一整套空想主义的和矛盾的思想决定的，其中居统治地位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在世界革命总的背景下，借助民族解放革命来破坏和摧毁帝国主义殖民地外围地区（“后方”）的思想占有重要地位。共产国际“二大”制订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的总的理论模式。由于共产国际领导人掌握有关殖民地世界各种情况的具体材料太少，这种理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抽象的思辨的性质。尽管部分地承认“东方”的特殊性，但当时共产国际除了把俄国三次革命和内战的经验搬到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之外，没有别的实际决定。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并且后来

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坚持推行的基本理论假设是：实行争取（当地或国际）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方针，将农民起义和农民看作是殖民地革命最广泛的动力，认为“政治上独立的”无产阶级可以同当地资产阶级暂时联合，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冲突相提并论（混为一谈），也就是说赋予民族革命以阶级斗争的性质，承认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共产国际“二大”的这些和其他一些理论假设后来成了“四大”通过的更具体的策略指示。共产国际“二大”和“四大”的理论和策略方针成了共产国际给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制定实际的政治思想指示的基础和轮廓，这些在我们的文件集中都有反映。

应当指出，共产国际“二大”和“四大”的某些重要论点（关于共产党人支持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民族革命运动的论点、对东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等）是十分矛盾的，因此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内部以及中共内部的不同派别作了不同的解释并加以利用。

在中国，贯彻共产国际（也就是苏联领导）的方针，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巨大的有时是不可克服的困难，这些困难首先是因愿望与现实相脱节造成的。因此，共产国际在很多方面只好采用试验和错误的方法进行活动。随着足够的材料和实际经验的积累以及局势的变化，莫斯科的对华政策作出了实质性的有时是很矛盾的修正。但是这并没有超出也不可能超出共产主义教条和布尔什维克思想的框框。莫斯科对华政策的创始者和执行者的这种反常的似乎与健全的思维相背离的行为，在文件集中可以找到大量的证明。政治思想上的教条以及联共（布）领导内部的意见分歧和斗争，限制了广泛运用凭经验或凭直观弄清错综复杂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问题的现实主义方法和奉行这种现实的彻底的路线，因而对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最终结果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共产国际战略与策略的设计在不正常的形势下受到选择具体解决方案的一定

框框的限制，因而也使围绕它的“失算”、“错误”或“罪过”进行的争论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包括政治组织和政党在内的社会组织一旦形成，就只能在由它们的本质所规定的参数中起作用，否则它们就会变成不同质的组织，或者退化、消失。

共产国际如何对待工人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的作用和潜力问题，对于显示俄国经验的决定性意义是很重要的。

看来，实践清楚地表明了它们在中国的特点，即工农运动通常是在当局支持的情况下开展起来的。而且工人们积极投入的首先是在民族口号下的群众性行动，但他们在改善物质状况口号下的行动很快就发展成为左倾平均主义的要求，结果损害了当地的工商业，致使多数小企业倒闭。广州、武汉和1927年春上海的工人队伍和纠察队，一直比较薄弱，只吸收了一小部分产业工人。但是工人发动的某些形式（罢工、游行、纠察等）表面上同俄国形式的相似，使人们产生了这样的希望：在中国，工人运动可以成为中共广泛施加影响即掌握“工人阶级领导权”的基础。

农民也只是在“上面”的支持下采取行动，不过他们本身的要求实际上在各地都没有超出减租减息的范围。

然而，莫斯科及其驻华代表和中共最激进的领导人认为这种情况只不过是运动尚未展开和农民落后的标志。从俄国经验的角度来说，自然而然地认为，在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其制度在共产国际文件中定为“半封建的”），下一步将会像1917—1918年在俄国那样很快爆发农民夺取土地的自发斗争，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庞大的农民军，它们可以作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内“雅各宾派”的影响和权力的基础。

只有一小部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工作人员和中共领导人随着经验的积累开始意识到，在实现他们这些打算的道路上存在着某些障碍，如军队上层和军官（即出身于农村的农民运动“极端分子”）的不满情绪具有危险性，中共缺乏军事领导干部，缺

少武器，没有建立自己军队的时间。但有一个很主要的情况，共产国际实际上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在中国农村的特殊条件下，根本不可能按照“俄国榜样”自发地开展夺取土地的斗争^①。因此，莫斯科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试图保持“左翼”时，作出了坚定的指示：从1927年春天起“通过国民党左派”或“从下面”开始进行土地革命。因此，在试图把这种策略遭到失败的责任推到中共领导身上、推到陈独秀身上时，主要是“指责”他们不善于和拒绝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开展土地革命和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军队的指示。

本文件集中的材料，在某种程度上介绍了共产国际对中国民族革命的几乎全部政治思想方针及其实际实现机制，包括从思想上、政治上、财政上、干部上和其他方面，不仅对共产党，而且尤其对国民党施加影响的方法。后者是完全可以解释清楚的，因为在一定的摇摆和争论之后，正是国民党及其军队被选为实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基本军事政治工具。对国民党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由孙逸仙和共产国际批准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这个党。这种党内合作形式的政治联盟就其本身而言对合作伙伴双方都是有利的。然而，从文件集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这种联盟一开始就是两党之间和国民党内部不断发生紧张关系和冲突的根源。其原因不仅在于最终证明不可能共生的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政治机体根本就是不相容的。主要在于共产国际一直想借助共产党人使民族改良主义政党——国民党变成近似共产党的激进革命的、“人民的”、“工农的”、“雅各宾式的”党。这种愿望像一条红线贯穿在本书的文件之中。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制止了中国共产党人退出国国民党的一切企图。没有共产党人做内部“改革”工作，要排除国民党这块“材料”的抵制是不现实的。从档

^① 详见 A·M·格里戈里耶夫：《中国革命运动（1927—1931）》，莫斯科1980年版第142—148页。

案材料中可以看出，当时经历了组织建立时期的国民党（以及共产党），是在政治思想上很稳固的组织，能够经受住内外因素的破坏性影响。

在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计划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很大的困难，这些困难除其他原因外，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内部，它的驻华代表之间，中共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间经常出现意见分歧造成的。这些意见分歧在本文件集的许多文件中都有反映：如鲍罗廷 1924 年底至 1925 年初的札记，维经斯基的报告和书信，与 1926 年“3·20”事件有关材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调查 1926 年 8—9 月广州情况的小组的记录，1926 年 11 月拉菲斯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便函，纳索诺夫、福京、阿尔布列赫特等苏联驻华工作人员给莫斯科的书信，鲍罗廷、罗易、布留赫尔之间的争论，中共中央文件（其中包括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等。

众所周知，孙逸仙下决心同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只是在他试图得到资本主义大国的支持受挫和在国内政治斗争中遭到一系列失败之后。同时，促使他这样做的不只是想得到苏联的财政、军事援助，从取得胜利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武库那里借鉴某种东西，如他们的革命“工艺”、国家和军队建设的经验等。国民党同共产党实行合作正赶上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这绝不是偶然的。国民党领导人可以把新经济政策解释为布尔什维克放弃其政策中的最激进方面和它的政策同国民党的纲领性方针接近的标志。这样，客观上似乎出现了进行合作的共同立场。以前鲜为人知的有关 1923 年蒋介石代表团在莫斯科进行政治谈判情况的档案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谈判的军事方面内容在卡尔图诺娃的文章中作了阐述）。与此同时，孙逸仙及其战友为同共产党的合作提出了保护国民党同源性的苛刻条件。在这方面很说明问题的是第一次公布的鲍罗廷关于国民党一大筹备和进行情况的札记，以及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八月全会（1924年）的速记记录。此外，国民党人在接收共产党人加入自己队伍的同时，希望把他们溶化在自己的队伍里，吞并共产党。国民党试图取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独立性，关于胡汉民1925年底到1926年初在莫斯科谈判情况的新材料（包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正式声明）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文件与文件集的其他文件都要求更加冷静地对孙逸仙的所谓“新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方针”作出评价。

除上述内容外，收入本文件集的以下材料（虽然很遗憾只是片断材料）肯定会使读者感兴趣：关于共产国际机关所制定的组织中共军事工作的初步计划的材料、关于在苏联军事院校培训中共军事干部的材料、关于在莫斯科创办和完善中山大学的材料、关于莫斯科同其驻华工作人员联络技术的材料、关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财政投入的材料。对上述最后一项内容需要作一些说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资金来源有很多渠道，要得到某种确切的总数恐怕是不现实的。据大致统计，苏联资助中国20年代国民革命运动的总开支有几千万金卢布。至于对中共的资助，文件集中列举的数字要比为国民党支出的少得多。但应该考虑到，“国民党的”部分经费也用到了加入国民党并在其中央机关和地方组织中工作的共产党人身上。此外，除共产国际的直接拨款外，中共实际上还得到了共产国际其他有关组织——青年共产国际（旧译少共国际——译者）、红色工会国际（旧译赤色职工国际——译者）、农民国际等拨给的经费。

文件集未收录马林的资料，因为关于他在华活动的最重要的一些文件，包括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已根据马林的档案在荷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

文件集也未收录有关联共（布）党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和斯大林多数派之间就中国问题进行的论战的文件，因为这些文件在以前发表的文献中已作了很充分的介绍，并且对于

理解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面没有提供什么实质性的新东西，虽然它们可以补充说明斯大林和布哈林顽固维护其许多方针和估计的动机，但他们的动机明显是不现实的，特别是1927年4—6月间，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和武汉国民党中出现那种局面时更是不现实的：当时同反对派的斗争已进入决定性阶段，这里明显有这种斗争“逻辑”的影响。

看来，这个因素以及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斯大林——布哈林领导的原始指导思想，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顽固地不愿接受1927年4—5月形成的事实，即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凯末尔式”结局的主要原因，虽然在那种历史形势下，这种结局是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的。

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文件集中收录了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青年共产国际正式代表和其他苏联驻华工作人员的书信，其中包含着对中国形势、国民党内部状况、中共内部状况和特别是对一些事件发展的转折时期的情况通报和估计。这些书信使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来自中国情况的通报是多么复杂，有时互相矛盾，而莫斯科就是根据这些情况通报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

当然，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斯大林、布哈林的函电或者（根据这些文件上的标注判断）向联共（布）最高领导成员报告的函电，能够引起人们特别的兴趣。其中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有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在1927年4—5月间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和斯大林个人的函电以及以前没有公布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罗易给莫斯科的电报（罗易是中共在20年代国民革命危急时期的所谓“进攻策略”的热情捍卫者），包括罗易对他向汪精卫展示有名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7年6月1日指示的做法的解释、1927年4月罗易同蒋介石往来的书信，以及罗易同汪精卫的谈话记录等。

文件集还收录了反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其他代表（维经斯

基和鲍罗廷)的立场的文件,包括反映他们在1927年事件结束阶段的立场和有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机关对这些事件讨论情况的材料,其中有以前鲜为人知的布哈林的讲话。

文件集编者意识到,奉献给读者的材料虽然极大地丰富了研究20年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史料基础,但远没有完全解决这个多方面的课题和详尽提供与这个课题有关的档案资料。文件集没有收入这样一些已经发现的重要文献,如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上,以及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中国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上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速记记录;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和远东局的许多讨论中国问题会议的材料;红色工会国际、青年共产国际和农民国际的文件。每一组这种材料都可以编成单独的一卷。随着其他档案馆藏的开放,无疑会出现不少关于中国问题的新的宝贵文献资料。在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等待着史学工作者和文件发表者去做。

* * *

本文件集是根据《苏联历史文献出版规定》(莫斯科1990年)编辑出版的。有一些文件不是全文发表,删去了与本文件集题目无关的部分,以及意思不清楚的片断和空白处。文件中使用了现代拼写法和标点符号。中文专有名称用现代拼音,未被确证为同一名称者除外。文件集中保留了广州、香港等城市的传统名称,以及20年代惯用的缩写,如中国政府、国民政府、外交部或外长、国民革命运动等。

参加本文件集编辑工作的有:俄方的历史学博士К·М·安德逊,历史学博士、教授В·И·格卢宁,历史学博士、教授А·М·格里戈里耶夫,历史学副博士И·Н·索特尼科娃,哲学博士М·Л·季塔连克,历史学副博士К·В·舍维廖夫,В·Н·谢契林娜;德方的教授郭恒钰,М·莱特奈尔和Р·费尔伯。

К·В·舍维廖夫编纂了书目索引。

В·В·拉林、И·Н·索特尼科娃、К·В·舍维廖夫、В·Н·谢契林娜编纂了人名索引。准备索引时利用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副博士 Ю·М·加鲁尚茨、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主任研究员 К·К·米罗诺娃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俄国外交政策档案馆盛情提供的材料。

Н·И·梅利尼科娃对文件做了古文献学方面的加工。

Н·С·马多尔斯卡娅和 Р·Д·舒罗娃进行了电脑排版。

参加手稿发排前的技术加工工作的有 В·В·拉林、Н·И·梅利尼科娃、И·Н·索特尼科娃和 Т·В·萨伊科娃。

第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在国民
革命运动中寻求盟友

收入本书这一部分的文件属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在华活动开始时期的文件。这个时期同以后时期的巨大差别在于，苏俄的对外政策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阶段结束和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的情况下形成的。此外，俄共（布）已经成为执政党，它在四年多的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过程中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保住政权上，现在它面临管理巨大国家和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新任务。

在国内战争时期，对外政策是第二位的问题，但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迫切了。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显示出有必要调整在内战时期中断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和协调同邻国的政治经济关系。现实生活要求从指望进行世界革命时期的“革命外交”（按苏联领导人的概念，革命外交应该是在“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范围内用各国革命人民团结一致的关系取代“旧外交”）过渡到国家间的正常关系。

在20年代初，只是刚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世界革命的思想是用在外部直接支持下的革命人民力量来立即推翻统治制度的指导方针来体现的，现在则变成了主张在调整同各国政府的通常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组织和支​​持各国革命运动。

这种指导方针造成了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与旨在发展革命的反政府组织和运动的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政策之间的尖锐矛盾，使解决同西方和东方国家一般的和具体的多边和双边政治经济关系问题大大复杂化了，因为从国际法角度来看，要找到对这种方针的可以接受的解释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个时期，由于一系列尝试的失败和立即在西方国家首先是在欧洲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希望的破灭，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才采取了制订世界革命“东方路线”构想的最初步骤，开始积极在东方国家（包括在中国）寻找伙伴和盟友，组织能够在俄国共产党人的支持并与其联合的情况下参加反帝斗争的力量。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和白卫军在远东遭到失败后，以及随着中国本土事态的发展，出现了

同中国的这类力量进行直接接触的条件。在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中，中国出现了一些知识分子团体和青年学生团体，其中有一部分在寻找振兴国家的思想和经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包括对苏俄的经验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当时国内主要政治军事集团的许多领导人（出于各种动机）都对争取外部的，其中包括来自俄罗斯联邦的政治、军事和物质支援感兴趣。

众所周知，苏俄和共产国际对东方国家政策的总轮廓是在共产国际“二大”的决议中提出的。其中规定：1. 努力在东方国家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即将来能够成为共产国际政策传播者、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者和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组织者的共产党。2. 鉴于在东方国家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很长时间内将是有限的，民族解放革命在目前阶段按其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以在“二大”决议中提出了共产党支持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首先是民族革命运动的任务。民族解放革命被看作是摧毁帝国主义“殖民地后方”的强大手段，是世界革命的“后备力量”，是革命俄罗斯的天然盟友。这是总的指导方针，需要在各国条件下的实际活动中加以具体化。“二大”的决议为实现俄国的东方政策“抓住了”新的机会，这与民族运动的高涨有关。同时，这些决议也反映了对东方国家的情况首先是它们的发展水平了解不够。列宁在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了在大多数东方国家前资本主义关系仍居统治地位。罗易捍卫了在最发展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印度、埃及）实际上资本主义占优势的思想。大会关于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民族革命运动的决议中的一些论点是矛盾的和含糊不清的，因为仍然不清楚哪些力量可以归属于民族革命运动的参加者，不清楚判断参加民族革命运动的革命团体和阶层的标准是什么^①。

^①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6—14页。

同时，由俄国在整个远东、具体在中国的对外政策目标所规定的任务，对实现旨在建立共产党和发展民族革命运动的“革命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俄国新政权所关心的是日本从它所占领的领土上撤走，或者从广义上说，是减轻它的压力，取得北京政府的外交承认，确保远东边界的安全，消除撤退到满洲和外蒙古的白卫军的进犯威胁。在蒙古消灭白卫军和红军部队在1921年进入蒙古，部分地削弱了白卫军的威胁，但是在同北京政府的关系上和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其他军事政治集团的关系上造成了新的问题，因为这些集团拒绝承认在外蒙古建立的独立国家和俄国在那里的地位。

收入本部分的文件提供了一些补充材料，在有些情况下还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说明这个时期俄共（布）、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对中国的这些基本政策方针，是如何实施、相互交织和互相配合的。

有很大一部分文件介绍了中共的成立过程和制订其政治纲领的起始阶段。

在不低估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因素的作用的同时，应当注意到已知的文件和本文件集中第一次发表的文件如何说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代表的积极作用，这些代表把中国社会主义拥护者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愿望引导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工作轨道上，并向他们提供政治上、组织上和财政上的帮助。

在中国国内和境外建立早期共产主义者小组，成立中国共产党和在1920—1922年间制定它的第一批纲领性文件的过程，在众

所周知的许多文献集、概论性和专题性著作^①中已经作了介绍。收入本文件集的文件，使人们有可能进一步弄清中共在这几年的方针的演变原因和性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决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早期驻华代表的行动和建议的那些指导方针和观念的性质有关。这些文件表明，实际上直到召开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1922年1—2月）时，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方针首先是加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指望依靠建立党同工人、士兵和青年学生的联系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取得较快的发展，认为实际上从一开始中共就可以为自己提出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和同非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划清界限的目标（第1、2、3、4、8号文件）。这个情况在中共一大决议中有所反映，如其中确定的党对与其他政治力量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其他党派结盟的消极态度。毫无疑问，这反映了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情况具体了解不够，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潜力期望过高。

在更加详细地了解了中国情况之后，这种期望正如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许多工作人员（如马林）的报告和书信所表明的，变成了十分悲观的估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的方针，而后是中共的方针，在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将共产国际“二大”关于共产党人支持民主运动首先是国民革命运动的决议具体化了）^②之后，以及在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代表与希望得到俄国的援助和支持的其他政治力量和派别进行初步接触的影响下，开始发生特别明显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3—125页；《“一大”前后》上、中、下；《“二大”和“三大”》；加拉切夫：《中共简史》，载《广州》杂志1927年第1期（总第10期）第13—77页；K·B·舍维廖夫：《中共成立史略》，莫斯科1976年版；B·И·格卢宁：《国民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第1册，莫斯科1975年版第6—92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921—1927）》第1册，劳伦斯1971年英文版第96—241页。

② 《第一次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文献资料集）》，彼得格勒1922年版；《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彼得格勒1922年英文版。

的变化（第10、16、17号文件）。在这里同国民党首领孙逸仙的接触起了明显的作用（第13、14、15号文件）。早在1918年，而后又在1921年，孙逸仙就写信给俄罗斯联邦政府领导人，表示对新俄国的某些经验和在当时以秘密形式建立合作关系感兴趣。

马林的文件发表后，马林在制订并在中国实施国共联合政策时的作用有了很详细的阐述^①，在本文件集中公布的文件，也展示了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其他代表和工作人员的作用，以及他们的通报在制定莫斯科对华新政策中的作用。这种新政策后来在书籍中称为统一战线政策。同时，这些文件还表明，鉴于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军事政治集团建立联系的困难，对它们的立场和能力评价的不一致（第5、6、7、9、18、19、20、21、22号文件）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第23号文件），这个过程是很复杂和充满矛盾的。

众所周知，在马林同孙逸仙和国民党其他活动家会谈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922年夏天表示赞同马林关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想法。尽管中共领导人对国民党持消极态度，他们表面上还是服从了共产国际的这一决定。本文件集提供的文件说明，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是如何理解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性质和目的。实质上这里讲的是一种策略手段，旨在通过国民党向与它有联系的工人群众和组织渗透，并从国民党那里夺取这些工人群众和组织，同时在国民党内部建立稳固的共产党集团，实际上也就是分裂国民党，由共产党人夺取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这些思想，中共代表刘仁静在共产国际“四大”（1922年11月）上的有名发言讲的很坦率^②，在会议上并未遭到反对。类似的指导方针还包含在大会的秘密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对东方问题提纲

① 托尼·塞奇：《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起源》两卷集；《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②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报》，莫斯科1922年版第20期第3—5页。

的补充》（第 49 号文件）以及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的信对共产国际政策的解释中（第 32 号文件）。

苏俄在中国的外交目标和活动给中共确定发展道路和寻求它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盟友打上了不小的烙印（第 28 号文件）。

为了保证在远东的国家利益，苏俄代表坚持要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即现存北京政府从法律上承认俄罗斯联邦（第 11、12、24、29、42 号文件）。与此同时，苏俄领导还酝酿了一个计划，打算利用各种相互对抗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的这样或那样的联盟在北京建立另一个对苏俄友好的政府。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吴佩孚集团和孙逸仙集团是最有前途的。公布的文件包含一些关于这种计划和打算的新材料。

在这方面，苏俄驻北京（继优林和派克斯之后）的第三位代表越飞给苏联领导的函电和莫斯科对这些函电作出的反应，以及越飞同孙逸仙的秘密通信和苏联武官格克尔同他的会谈记录是很有代表性的（第 25、27、36、39、43 号文件）。从这些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最初苏俄外交是面向吴佩孚的，把他看作是最强大的和比较“进步的”军事政治领导人。与这个指导思想相适应，也向中共提出了同吴佩孚合作的方针。同时努力争取实现孙逸仙同吴佩孚的合作，这种合作应该导致在北京建立一个新的对苏俄友好的联合政府（第 25、26、36、37、38、39、40、45、47、48、51 号文件）。越飞建议为这个新政府提供一大笔贷款（第 31、33、34 号文件）。但他的这个建议遭到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否决（第 35 号文件）。

最后，吴佩孚和孙逸仙联合的计划遭到这两位政治活动家的拒绝。此外，俄罗斯联邦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不止一次地表示担心，同孙逸仙的接触（即便很谨慎）可能破坏苏俄同北京政府的谈判（第 15 号文件）。有意思的还有，为解决苏中谈判中的主要症结（苏俄在蒙古的驻军、中东铁路），越飞建议在保持苏中共管

铁路的情况下把中东铁路无偿地交给中国（第 200 页注释③）。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另一种立场（第 30 号文件）。

孙逸仙在 1922 年 12 月 6 日写给列宁的信和同越飞的接触中，对后者关于苏军为消灭白卫军有可能进入北满的通报持强烈的否定态度（第 43、46、50 号文件）。同时，他建议把苏军一个师开进新疆，利用当地丰富的矿产资源，借助苏俄和德国的帮助，建设铸钢厂和兵工厂。换句话说，孙逸仙建议在新疆建立自己的军事战略基地，以便以后进军北京（第 41、44 号文件）。从以后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孙逸仙直到 1923 年底一直抱着这种想法。

1922 年底的许多文件，其中包括越飞给莫斯科的书信表明，这个时候苏俄代表越来越倾向于面向孙逸仙。

1

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①

1920年6月于上海^②

敬爱的同志：

您的来信^③收到了。自我寄出第一封信^④后，仅在加强联系和完成我拟定的计划方面，工作有些进展。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虽然他们在汉口、广州、南京等地尚未设代表处，但我们在那里的的工作，可以通过一些朋友即当地的革命者立即得到反映。在这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在汉口，我们有可能吸收一位编外副教授参加我们的工作。此人在中国生活好几年，通晓中文（毕业于东方学院）^⑤，是柏烈伟教授推荐的。目前，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群益书店”可以作为一个核心把这些革命团体团结在它的周围。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陈独秀），现写信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以确定

① 可能是写给1920年4月派遣维经斯基来中国工作的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的信。

② 日期是根据信的内容确定的。

③ 信没有找到。

④ 维经斯基的第一封信没有找到。

⑤ 据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著名汉学家Ю·加鲁尚茨考证，此人是后来的著名汉学家和藏学家Б·И·潘克拉多夫——译者。东方学院始建于1899年，院址在海参崴，1920年改为国立远东大学东方系。

会议的议题以及会议的地点和时间。因此，这次会议可能在7月初举行。我们不仅要参加会议筹备工作（制订日程和决议），而且要参加会议^①。

我们将遵照您的建议，把很大注意力放在报道方面，虽然我们认为是需要做的事情都做了。6月1日《大陆报》^②发表一篇关于缓冲国^③的社论，是根据我提供给他们材料写的。在今天的这期上，他们全文刊登了《告世界劳动人民书》^④。这是美国在上海办的一家大报，我们可以利用它。中国的报刊我们几乎都可以利用。请寄来您想宣传的材料吧。我们自己将把俄国（远东）报纸每周综述一次，如遇特别需要，次数还可以多些。关于苏俄建设情况的报道，暂时我们是通过一名中国新闻记者^⑤以给一个30人的学生团体讲课的方式发表的。这些学生代表着一批中国革命者。我们已开始利用他们到工人当中做宣传、组织工作。

我无法同波达波夫取得联系，因为他去欧洲了，或者回苏俄了^⑥。

关于北南战争问题^⑦，我现在可以讲讲以下情况：

当地的革命者不认为这场战争有多大意义。他们认为南方督军和北方督军一样都是很坏的政客。确实，日本在援助北方，但南方也不会拒绝这种援助。陈独秀认为，如果南方取胜，它会立

-
- ① 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举行了“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见《中国革命问题》第1卷，莫斯科1927年版第228页）。这次会议的文件没有找到。
- ② 美国的一家英文报纸，1911—1951年间在上海出版。
- ③ 指俄罗斯联邦与日本之间的远东共和国，成立于1920年4月6日，首都是上乌丁斯克，从1920年10月起改为赤塔。赶走白卫军和日本侵略者后，远东共和国于1922年11月15日并入俄罗斯联邦。
- ④ 在俄国图书馆藏书中没有1920年夏天的《中国新闻》，因此不能确定《告世界劳动人民书》的作者和维经斯基这封信的确切日期。
- ⑤ 具体指何人不详，可能是杨明斋。
- ⑥ A·C·波达波夫取道欧洲回苏俄（见波达波夫将军《给编辑部的信》，载《上海生活》1920年6月8日版）。
- ⑦ 指1920年7月14—18日直奉两系军阀联合对皖系军阀发动的直皖战争。最后，北方人取胜，控制了北京政府。

即受到日本的影响，因为日本会马上开始援助取胜的南方。一句话，要利用北南之争来进行社会革命的唯一办法，是现在在双方士兵中间开展互不残杀和发动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这是一位享有声望的中国革命者的看法。给您寄去柏烈伟教授在两周前寄给我们的两个报告^①供参考。据当地的革命者说，陈将军^②（在漳州）的革命活动有些夸大。

对朝鲜临时政府的评价是：总的来说，它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府，但一半以上阁员（9人中有5人）是共产党员。部长会议中的共产党党团占据以下职位：

1. 总理
2. 部长会议事务长
3. 军事部副部长（此人被我们派到东京去了）
4. 5. 两名阁员

朝鲜社会党宣言是由担任军事部副部长的这个人于1918年4月30日在哈巴罗夫斯克起草的。朝鲜临时政府同朝鲜的所有革命团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很快就要派人去朝鲜把革命团体联合在一起，制订出总的策略。

我们希望不久得到来自日本的消息，届时再通报。请寄有关工会组织的书籍。

祝万事如意

格里高里

全宗495，目录19，卷宗115，第6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这两个报告没有找到。

^② 指陈炯明。

2

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 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①

1920年8月17日于上海

致伊尔库茨克东方民族处

敬爱的同志们：

你们发给《北京报》^②的电报^③收到了，昨天给你们发了回电^④。

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⑤，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

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几乎从海参崴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译载在报刊上。《共产党宣言》已印好^⑥。现在有15本小册子和一些传单等着付印。顺便说一下：《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士兵须知》（由此间一位中国革命者撰写）等已经印好。

① 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于1920年8月在伊尔库茨克成立。1921年1月在其基础上成立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该处工作到1922年2月。

② 从1910年起在北京出版的一种法文日报。

③ 电报没有找到。

④ 维经斯基的回电没有找到。

⑤ 革命局的人员组成不详，在4名中国革命者当中肯定有陈独秀。

⑥ 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了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单行本。

宣传报道部成立了俄华通讯社，现在该社为中国 31 家报纸提供消息，因为北京成立了分社，我们希望扩大它的活动范围。我们通讯社发出的材料都经一位同志之手^①，主要是从俄国远东报纸以及《每日先驱报》、《曼彻斯特卫报》、《民族》周刊^②、《新共和》周刊^③、《纽约呼声报》^④、《苏俄通讯》^⑤和我们一伙人提供的文章中翻译过来的东西。苏俄日历上的文章，如《十月革命带来了什么？》也被全文刊用了。

组织部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在这方面暂时还没有取得多大成绩，但这里已经有了几个我们着手培养的发起组。

这一周，我们组织部要召开 10 个地方工会和行会各出两名代表的代表会议，成立工会中央局^⑥。中央局将派一名代表参加我们的上海革命局。我用英文给这次会议起草了决议^⑦，已由上海革命局讨论通过。该决议已译成中文，其提纲现在是在工会中进行宣传的材料。

星期日，即 8 月 22 日，我们出版部将出版中文报纸《工人的话》^⑧ 创刊号。它是周报，印刷 2000 份，一分钱一份，由我们出版部印刷厂承印。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在中国各工业城市建立与上海革命局相类似的局，然后借助于局代表会议把工作集中起来。目前还只建

① 指扬明高。

② 美国的一家周刊，从 1865 年起在纽约出版。

③ 美国的一家周刊，从 1914 年起在纽约出版。

④ 美国社会党纽约分部从 1908 至 1923 年间出版的日报。

⑤ 俄罗斯联邦驻美使团通讯，1920 至 1922 年间在纽约出版。

⑥ 从晚些时候（1921 年 7 月）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工会中央局是指工人委员会。参见 A·И·卡尔图诺娃：《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援助（1920—1922）》，载《远东问题》杂志 1973 年第 1 期。

⑦ 维经斯基起草的决议没有找到。

⑧ 这里指的是 1920 年 8 月至 1921 年 1 月在上海出版的《劳动界》。

了一个北京局，该局在按照我的指示与米诺尔同志^①和柏烈伟教授合作。现在我把米诺尔同志从天津派往广州，他要在那里组建一个革命局，下面暂设两个部，即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

同中国上海革命局并行工作的还有朝鲜革命局，印刷厂是共同的。

由我们代表派出的第一个信使^②已从东京来到这里，他带来一个报告，我随信附上。

从信使的口头报告中弄清了以下情况：

1. 日本社会党现在有中央委员会；
2. 它在青年中和在工会中从事地下工作；
3. 它印刷小册子和传单，并在士兵中间散发，它同士兵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

一些日本社会党人出版合法的杂志：

1. 社会党人大杉荣出版《劳动运动》；
2. 社会党人酒井出版《新社会评论》；
3. 社会党人山川均出版《社会主义研究》^③。

我让信使（朝鲜人）带些书籍返回东京。一旦有经费，为了我们的工作我还要派两个人到汉城和满洲去。

* * *

我们对最近工作的展望是：

希望在这个月内把各种革命学生团体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总的社会主义青年团^④。这个社会主义青年团，要派代表参加我们的

① 米诺尔是K·A·斯托扬诺维奇的化名，1920至1927年间任远东通讯社和俄罗斯通讯社驻广州记者。

② 具体是何人不详。

③ 《劳动运动》是1919年10月至1920年6月间在东京出版的月刊；《新社会评论》是1920年2月至8月在东京出版的月刊，1915年9月至1920年1月名为《新社会》，1920年9月至1921年9月名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研究》是1919年4月至1923年3月在东京出版的月刊。

④ 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上海、北京和天津）革命局。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学生运动积极施加影响，并引导他们到工人和士兵中间去做有效的革命工作。

近两周，在我们参加的情况下，在上海、北京和天津举行了一系列学生会议，会上讨论了把所有激进团体联合起来的问题。

今天，北京在举行中国（北京、天津、汉口、南京）几个城市的学生代表会议，目的是彻底解决联合问题。会上主张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潮流，应该是很强大的，因为前几天，我同一些较有影响的会议代表进行了协商，并且我们最终就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

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宣传鼓动工作开始后，我们通过我们的革命局（其成员在上海、天津和北京对学生有影响）指出，革命的学生必须在思想上同资产阶级团体、知识分子团体和商人团体彻底划清界限，因为这些团体是依靠民主美国来反对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的。我们指出，革命的学生应当借助于使劳动群众做好迎接社会革命准备的工作，来进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反对将中国分成若干势力范围的整个外国资本的斗争，因为只有劳动群众鉴于自己的生活条件才关心国家的独立，所以在争取中国解放的斗争中，学生只应依靠劳动群众。

我们还指出，一部分民主派学生的观点具有空想性质，这部分学生认为，可以通过利用外国非侵略性资本（美国资本）发展中国民族资本的方式来拯救国家，这样做的结果似乎应该是国家生产力得到发展，群众生活得到改善（这是中国的一些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学生的观点）。

你们可以从上面提到的决议的提纲中看到，我们为证明这种观点的空想性质提出了什么论据。

在中国目前的内战中，学生站到了吴佩孚将军一边，也就是说，他们支持召开国民会议的想法。我们赞成这个策略，但建议他们不要在争取召开国民会议的斗争过程中溶入现在也为此作斗

争的商人团体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团体，而要在保持独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情况下援助这场运动。

* * *

我要在天津按下述接头地点组织党的工作人员登记：天津，伍德罗威尔逊大街 10b 号，格尔舍维奇先生转利沃夫先生。

* * *

在成立广州局的同时，我们在汉口也成立一个局。

* * *

必须从中央和从西伯利亚给我们寄苏俄报刊。建立定期给我们转寄报刊制度后，你们会为这里的工作做很多事情。关于共产国际“一大”和“二大”的材料以及关于苏俄经济、文化建设情况的专门书籍也是需要的。请按我的电报^①汇款。

我的邮寄报刊（不是汇款）地址是：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格里高里耶夫收，而汇款地址是：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塔拉索夫收。

* * *

《中国社会主义报》^② 出版者李同志^③ 是我们上海革命局成员，他收到了沃兹涅先斯基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要求给莫斯科邮寄他所出版的各期报纸。今天我们就把现有各期寄出。

附录：

1. 报道材料^④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193，第 23—25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电报没有找到。

② 原文如此，中文名称不详。

③ 指李震瀛。

④ 以下删去：2. 东京来信；3. 组建上海中央局的决议；4. 给广州米诺尔的指示信。

3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 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

1920年9月1日于莫斯科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

敬爱的同志们：

现受留在远东工作的同事们的委托，送上《关于东亚书记处工作情况的简要报告》^①，同时我认为有必要提出以下两个对于东亚的工作具有很大实际意义的问题。

一、要承认以下组织结构：

1. 保留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俄共（布）中央）的领导和指导作用。

2. 为在东亚（中国、朝鲜和日本）直接进行实际活动，（在上海）成立组织中心——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下设三个科，即中国科、朝鲜科和日本科（每个科由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选举3到5人组成）。书记处全会选出三人执行局，并有由在东亚工作的俄国共产党员代表会议推举的两名俄国人参加该局工作。

3. 在伊尔库茨克设立中转站，转达莫斯科的指示，转送书报、工作人员和经费。

4. 迄今为远东服务的各机关的工作，由直属共产国际或俄共

^① 见第4号文件。

(布)中央的一个中心机构来协调。

二、要承认有必要继续帮助东亚各国革命人民，但只能通过东亚书记处来进行这种帮助。

为此，需要责成：

1.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报刊发行处^①把“书记处需要的东西”纳入分配计划，并向伊尔库茨克中转站发送报刊。

2. 俄罗斯通讯社^②按所指地址每天为东亚书记处提供不少于1000字的新闻。

3. 各个党组织，主要是西伯利亚局和远东局^③，解除所有掌握东方语言和英语的东方学工作者的工作，并把他们交给东亚书记处任用。

4. 筹集经费（主要是外汇），提供给东亚书记处使用。

受东亚书记处的委托

维连斯基^④

全宗495，目录154，卷宗2，第1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该处存在于1918—1930年间，1930—1991年改名为苏联报刊发行总局。

② 即1918—1925年间的俄罗斯联邦和苏联的中央新闻机构，自1925年改名为塔斯社。

③ 即1918—1924年间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和1920—1925年间的俄共（布）中央远东局。

④ В·Д·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时任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译者。

4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 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 (摘 录)

1920年9月1日于莫斯科

关于在东亚各国人民当中的 工作情况的简要报告

(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

1919年8月，我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个在东亚各国人民当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当即得到政治局的赞同，并成了给我下达的在远东具体实施这个提纲的指示的基础^①。我是以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的身份来到远东的。

给我的指示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 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
2. 我们对待中国、蒙古和朝鲜人民的态度，应当是唤起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摆脱外国资本家压迫的自觉行动。

^① В·Д·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的提纲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没有找到。

3. 实际上，我们应努力支援东亚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还应同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并通过出版铅印刊物、小册子和传单来加强鼓动工作。

4. 必须积极帮助朝鲜人和中国人建立游击队组织。

去西伯利亚后，我从1919年9月到年底，通过组织出版事宜和建立牢固的组织联系，做了上述指示的落实工作。

1920年2月，根据中央的决定，我去海参崴执行中央关于必须防止同日本发生冲突的决定^①。

这个新的指示以及我所担负的类似外交使命，在很大程度上给我完成最初的任务增加了难度。但是，鉴于我们一直需要“组织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我利用自己的“使者地位”在完成其他任务的同时，坚持在东亚各国人民当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的工作。

这项任务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出现下述情况而变得容易了，这就是：从我在海参崴露面时起，中国和朝鲜革命组织的许多代表来到我这里，后来同他们建立了牢固而密切的联系。

今年5月，为领导业已展开的工作，成立了临时的集体中心机构。其驻地设在上海，取名“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

后来，全部工作都通过积极活动的书记处，通过书记处里的中国科、朝鲜科和（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日本科来进行^②。

中国科工作纲要如下：

1. 通过在学生组织中以及在中国沿海工业地区的工人组织中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的工作。
2. 在中国军队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
3. 对中国工会建设施加影响。
4. 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

^① 俄共（布）中央的决定没有找到。

^② 以下删去关于朝鲜科和日本科工作情况的部分。

中国科的工作进行得较顺利。依靠工人和学生组织，该科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为共产主义组织打下了基础。最近要为最终成立中国共产党举行代表大会。

在掌握中国学生运动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学生运动是特别容易见成效的工作对象。整个中国被学生组织网覆盖，共有学生组织 193 个。参加这些组织的，既有高等学校学生，也有 16 岁以上的中等学校学生。领导学生运动的是由 18 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还选出由三人组成的主席团。

现在，由学生组织成员组成许多从事苏维埃和党的宣传工作的训练班和小组。由这些训练班培养出来的部分工作人员已经工作了，主要是在华南的一些团体中。

东亚书记处把很大注意力放到了报刊宣传工作上。

书记处的出版活动表现在以下方面：

出版中心：海参崴、哈尔滨、北京和上海。

海参崴是俄文书报出版基地，出版报纸《红旗》、《农民真理报》，杂志《创作》^①。此外，这里还翻印 50 种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印数从 25000 册到 40000 册不等。出版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画像以及“苏俄”系列明信片。

哈尔滨是英文、中文和日文宣传材料的出版基地，已出版这方面材料约 20 种。

北京，主要是依靠北京学生的力量组织了很大规模的出版活动，现已出版了几部象样的著作，还出版了《新潮》^②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③两种刊物。今年 5 月 1 日的一期《周刊》是国际工

① 《红旗》和《农民真理报》都是日报，均系俄共（布）远东边疆区和滨海州委的机关报，前者于 1917 至 1991 年间在海参崴出版，后者 1922 年 6、7 月间在该市出版。《创作》杂志是社会政治文学性刊物，在海参崴出版，1920 至 1922 年间改在赤塔出版。

② 1919 至 1922 年间在北京出版的一种月刊。

③ 1920 年 1 月 4 日至 5 月 23 日在北京出版。

人运动问题专刊。

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在这里，东亚书记处拥有许多报刊，我们有《上海生活》^①，中文报纸《周报》、《社会日报》，杂志《新青年》（是月刊，由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博士出版）、《新中国》（现已迁址北京）等。

书记处把很大注意力放在出版莫斯科出版的主要书籍的中文、朝文和日文版上。现已出版了《俄国共产党纲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劳动法令》以及许多其他小册子和书籍。

书记处的报道活动。

主要基地同出版基地相同。采取了利用合法通讯社和为中国、日本、朝鲜等国报纸提供服务的报刊社的原则。我们在上海成立了报刊社，在海参崴成立了中国报刊促进会，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报刊社，在哈尔滨成立了北满通讯社。

我是取道中国从远东回来的，原因是中国当局对我很友好，完全正式地允许我进入中国（北京）。再者是直接在华工作的同志的坚决要求，他们想就目前工作中的许多问题同我交换意见。

今年7月4日，我和我的几名助手来到北京，我们上海、天津等地组织的代表被事先打电报召集到这里。从5日至7日举行了在华工作的俄国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会议。我们就以下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我们工作的组织成果。
2. 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3. 出版、报道工作。
4. 在日本的工作。

^① 1919至1922年间在上海出版的一种日报。

会议最后一天专门讨论了当时的中国事态（直系与安福系之争）发展问题。

总结我们的工作，可以明确以下几点：

1. 鉴于总的客观条件和成为远东和东亚各国人民革命样板的俄国革命的巨大影响，共产党人可以指望在东亚出现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

2. 我们已经奠定了组织建设的初步基础，需要利用现有组织已经积累的经验把组织建设工作继续下去。

3. 我们工作的基本原则应当是，通过有计划地吸收当地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参加党的建设工作的方式，尽可能把组织工作转移到这些人身上。

4. 基本口号是“大家都来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

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 维连斯基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第 2—5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5

斯托扬诺维奇给某人的信

1920 年 9 月 29 日于广州

敬爱的同志：

现从广州给您寄信息。眼下我们还只能寄中文信息，不过将来会有英文信息。您一收到这封信，请立即回答以下问题：1. 是

否需要我们给您寄消息？2. 除俄文消息外，您还希望得到什么文字的消息？3. 您是在几号收到这封信的？让您回答这个问题是为了判断信在路上走几天。4. 您有没有给我这里寄报纸？如果没寄，请尽快寄来《前进》^①、《生活新闻》^②和一份黑帮报纸。5. 也要有寄海参崴的报纸。6. 您的通讯地址对吗？7. 一定要寄您的消息。8. 如果您有俄罗斯报纸，一定要寄来，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关于俄罗斯的东西。9. 如果您有书籍、小册子、传单、俄罗斯经典作家著作，请都寄来，都需要。10. 所有信件、通讯都要寄快件，因为到广州距离太远，再者，快件从不丢失。11. 我给您寄去三期通讯和您所需要的广州报纸目录^③。您一寄来需求单我们就立即寄出。12. 我给您寄去了我们的报纸^④，您应该收到了。就这些。寄来的信请编号。敬礼。

斯托扬诺维奇

又及：我的准确通讯地址是：广州，东山，恤孤院路15号斯托扬诺维奇先生收。这是寄书信、报纸等的地址。打电报用挂号：“广州罗斯塔”^⑤，姓名可以不写。

全宗495，目录19，卷宗193，第67页。

打字稿，原件，又及，亲笔签字。

① 1920至1921年间在哈尔滨出版的亲苏俄日报。

② 1914至1929年间在哈尔滨出版的日报。

③ 通讯和广州报纸目录没有找到。

④ 报纸名称不详。

⑤ “罗斯塔”为俄罗斯电讯社的缩写译音。

6

刘江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

1920年10月5日于布拉戈维申斯克

致俄共（布）阿穆尔州委会

中共代表费奥多尔^①关于上海之行结果的报告

1. 我进行的会谈：

到上海后，我首先拜会了中国著名社会主义者孙逸仙。现在他是南方革命运动的首领。我同他进行了会谈，会谈的实际内容和同他达成的协议如下：（1）立即把华南、俄国中部和远东地区的中国革命力量联合起来，以便能够密切配合为反对北方现时的反动政府准备条件；（2）为此必须在远东地区设立一个领导中心，拟把布拉戈维申斯克作为这个中心，将从这里向南方和在苏俄的组织下达指示；（3）拟把新疆省作为驻扎苏俄军队和华南军队的集中地点，把军队集结在谢米巴拉金斯克州和谢米列钦斯克州的边界线上，在中国土耳其斯坦附近，那里现在正在部分地区征召志愿者。从战略上考虑，这是可以自由地向北方调遣军队的一个最好的地方。驻扎在俄罗斯中部的中国军队已同南方首领孙逸仙举行了军队合并的谈判，前者表示完全同意同南方配合行动。

① 原文如此，从最后署名看应为费奥多罗夫——译者。

为了同孙逸仙保持密切联系，孙将向莫斯科派驻两名代表，他们不久就到这里来。他们打算在布拉戈维申斯克^① 呆一些时候，对这里的劳工群众和中国军队开展宣传工作^②；(4) 广泛开展出版事业，为此必须在上海办好印刷厂。

[2. 上海情况:]^③

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 300 多种出版物（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那里时而举行群众大会。出版的书籍、报纸和杂志刊登有苏俄人士，特别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照片，购买踊跃。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南方，容易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在上海的中国学生中心组织^④ 和工人组织都支持社会主义者，而这些人革命的主要支柱，是对北方政府的威胁，他们出版一些极其左倾的报纸、杂志和书籍。

上海的生活费用比和平时期增加百分之几^⑤ 而工资相反却在减少，因此有组织的罢工频繁发生。

3. 中国总的情况：

目前在中国南方省份的运动，可称之为社会主义运动，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南方，共产主义不受追究，而相反受到鼓励，甚至也不受当局反击。例如，革命军参谋长陈炯明是著名活动家之一，他在军队中正在开展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在他的参谋部里设有专门的报道部，出版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报纸和书籍。山西省督军阎锡山也是这样做的。

① 即海兰泡——译者。

② 1920 年底国民党员李章达到过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

③ 原文无小标题 2.，此标题为译者根据报告内容所加。

④ 指 1919 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

⑤ 具体百分之几原文不清。

北方出版的报纸，如天津省^①和吉林省的报纸，也辟出许多版面宣传社会主义。

4. 北京和天津情况：

天津和北京是高等学校的中心。那里有规模较大的学生组织，以回民马骏为首，此人是著名的共产主义信仰者，曾参加过一些民众大会，主张不承认北京政府，为此他多次受到惩处，几次入狱。他将召集全国学生代表会议，会上要讨论以下可能令苏维埃政府感兴趣的问题：完全不承认俄国驻华公使^②，拒绝向他支付义和团起义赔款^③，以及与中东铁路有关的一些问题。

5. 吉林、奉天、黑龙江地区情况：

这些地区完全受日本及其走卒即诸如张作霖之流的帝国主义狂热鼓吹者的控制。因此那里的人民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对这种不正常现象，北京也无能为力。驻扎在黑龙江下游的中国军队同情我们党，常有当地共产党出版的书籍和报纸寄给他们。

呈上本报告请党审阅，我认为，党会理解中国社会主义者想同俄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真诚愿望，并将欢迎他们。

中国共产党代表 费奥多罗夫

全宗 372，目录 2，卷宗 106，第 4—5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原文如此，应为直隶省。

② 1920年9月23日，北京政府宣布不承认原沙皇驻华公使库达舍夫公爵和沙俄的领事。

③ 义和团被镇压下去以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签订了终结议定书，按此议定书规定，中国应在39年间向英、美、德、法、俄、奥匈帝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支付（包括利息在内）总额为98200万两白银的赔款。1918年12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停止追缴应付沙俄的赔款份额（见《苏联外交文件》第6卷，莫斯科1962年版第627页）。

7

波达波夫给契切林的报告

1920年12月12日于莫斯科

关于中华民国原第一任总统孙逸仙博士

我在上海时同孙逸仙博士联系密切，他是一位狂热的反英者，与北京政府和（目前垮台的）广州政府势不两立。

在中国各地他都有追随者，在革命人士中他有一些忠实的朋友。

在人民运动的现时领导人当中，他同陈炯明（福建省督军、反北京政府的粤军总司令）、唐绍仪（原第一共和国总理，现为和谈代表团团长^①）、唐继尧（云南省督军，现南方政府已由广州迁到云南）、李烈钧（南方政府总参谋长）、伍廷芳（南方政府外交部长）、陈独秀（有声望的作家和教授，新大学创始者）、孙洪伊（原第一革命政府内政部长，是在穷苦人当中享有很高声望的活动家）、章炳麟（杰出的现代作家）、林长民（北京政府司法部长）、梁启超（原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代表^②），以及他的一些私人朋友保持着联系。他本人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很高声望，在报刊上常常

① 1912年3至6月，唐绍仪任中华民国总理。1919年率广州政府代表团出席北南和平谈判。

② 梁启超是中国出席巴黎（凡尔赛）和会（1919年1月18日至1920年1月21日）代表团顾问。

被称为国民党首领，但这个党至今未成立^①。

孙逸仙身边的一些人同各个党派和团体（包括大同党）保持着联系。他的秘书和司库都是大同党党员。

孙逸仙博士有资金，许多资本家常常向他提供物质上的支持。孙逸仙在海南、四川、福建等省有很大影响，在他的影响下，在这些省份和在中国其他地区，他可以发动起义并能够得到督军朋友们的支持，督军们兵合一处，为他提供一支颇为可观的武装力量。他把广州作为第一个行动目标，也就是要占领华南，他建议通过组织这次行动与北方（即北京政府）相抗衡。

中国恢复统一后，孙逸仙博士打算通过普选组织议会。

他告诉我，5月底他收到了您的信^②，鉴于我即将返俄，他请求我转达他对列宁的问候。协约国代表对我的搜查，使他有些担心，所以他未发表对苏维埃政府的书面呼吁书。因为他同莫斯科的交往一旦暴露，就会给他在国外租界的逗留和在中国进行的工作造成麻烦。我们同他约定使用我的中英文密码进行联系。除了他的照片，我没有他的任何文件。在各种交谈中，他不止一次地表露出，他不相信我们能成功地在俄国实现共产主义。他以中国人民的经验作为自己的论据。不过我得以说服孙逸仙向我们这里派驻两名代理人。他选择了廖仲恺（广州政府财政部长）和在华南享有声望的朱执信将军。这两个人同我进行了长谈，应在8月取道欧洲前往。

孙逸仙是得到译载我国宪法、土地法令、俄法条约等文件的英文小册子^③的第一人。

-
- ① 国民党创建于1912年，1914年改名为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 ② 可能指的是Г·В·契切林1918年8月1日给孙逸仙的信（见《苏联外交文件》第1卷，莫斯科1957年版第415—416页）。孙逸仙在1921年8月28日给契切林的信中确认，他只收到契切林1920年10月31日的一封信（见《孙逸仙选集》莫斯科1985年第2版第298页）。
- ③ 小册子名称不详。

我将小册子交给了李××^①，他把它译成中文并将它与我弄到手的托洛茨基的文章一起刊登在他的共产主义出版物上。

波达波夫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第 34—35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8

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 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 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 （摘 录）

1920 年 12 月 21 日于伊尔库茨克

关于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 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 执委会的报告

东方民族处诞生经过

东方民族处是从组织上落实远东工作并对其实行集中管理的

^① 原文名字不清，据查可能是李震瀛——译者。

产物，以前这项工作是在俄国远东和东西伯利亚的一些城市（如伊尔库茨克、海参崴、哈尔滨、布拉戈维申斯克等）单独进行的。

最初，由于远东同西伯利亚隔绝，仅在哈尔滨与海参崴之间及部分地在哈尔滨与布拉戈维申斯克之间有固定的工作联系和接触。

在海参崴的工作

这些城市直接靠近东方国家，早在1920年春就同中朝革命组织建立了联系。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下设一个外国处，该处在4月份向中国（上海）派遣了全权代表维经斯基（格里高里耶夫）同志及其两名助手季托夫同志（毕业于东方学院）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三人都是共产党员。这就为我们在远东国家开展有步骤的组织工作奠定了基础。迄今，在中国的工作是由个别俄国侨民做的，如天津大学教授柏烈伟（共产党员），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出版的法文社会主义报纸《北京报》的实际编辑A·A·伊万诺夫同志（来自巴黎，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老社会民主党人A·E·霍多罗夫（海参崴报纸《遥远的边疆》^①的编辑）、A·Φ·奥戈列夫（原海参崴市参议会主席）^②等。

同时，还从哈尔滨向天津派去了懂法语的工人共产党员斯托扬诺维奇（米诺尔）同志。

同时，中国革命者也试图同我们建立联系。这一年5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联合大中小学学生的组织）代表姚作宾同志从上海来到海参崴。同姚同志一起讨论了苏俄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援助问题、通过创办报纸加强我们在中国的影响问题，以及为向往苏俄的中国学生提供帮助问题。留在海参崴的部分外国处人

① 1907—1918年间在海参崴出版的一种日报。

② A·Φ·奥戈列夫即A·Φ·阿加列夫，远东共和国驻华使团成员——译者。

员有阿布拉姆松同志、埃尔杰列夫斯基同志和马马耶夫同志。他们做朝鲜共产党人的组织和联合工作，在海参崴成立了朝鲜共产党远东委员会。不久，阿布拉姆松和马马耶夫同志去哈尔滨组建哈尔滨分处，打算在那里设立日文印刷厂，印刷向驻扎在滨海地区的日本占领军散发的小册子。当时译成日文的小册子有：1. 《布尔什维克的真实情况》（《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2. 《水的故事》（贝拉米^①）；3. 《何为工人党》。

回到海参崴后，为建立联系，阿布拉姆松同志于7月初取道中国去伊尔库茨克。

在伊尔库茨克的工作

与此同时，在伊尔库茨克正在做旅居苏俄和西伯利亚的中朝共产党人的集中和联合工作，这项工作始于早春，到7月召开全俄朝鲜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时结束。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是由朝鲜共产党临时中央局承担的，得到了西伯利亚使团^②、俄共（布）西伯利亚局和远东局，以及为举行这次会议派去的代表布尔特曼和格尔舍维奇同志的协助。

东方民族处的组建

随着工作的开展，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于是组建了这个设在伊尔库茨克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

实际上，该处诞生于今年（1920年）8月，其组成人员有：1. 冈察洛夫（西伯利亚局负责东方工作的全权代表）；2. 布尔特曼（处长）；3. 加蓬（副处长）。9月末，远东局书记、俄共外贝加尔省委主席布龙施坦因同志参加处主席团工作（任主席团书记兼报道部主任）。这些人当中只有两个人即布尔特曼和布龙施坦因同志

① A·贝拉米（1850—1898），美国作家——译者。

② 俄罗斯联邦外交人民委员部驻西伯利亚使团（在伊尔库茨克）。

主持主席团日常工作。冈察洛夫同志作为西伯利亚总司令助理部政委常驻鄂姆斯克，而加蓬同志作为外交人民委员部副全权代表忙于驻西伯利亚使团的日常工作。

科的设置

东方民族处自成立初期就下设几个科，即中国科和朝鲜科，稍晚些时候又设蒙藏科，日本科因没有掌握日文的合适工作人员至今未设。海参崴分部试图同日本建立联系，派去了两名朝鲜人，预计9月返回。上海分部也作过同样的尝试，也向日本（东京）派去两名朝鲜人。上海分部8月17日报告说，派出的信使返回一名，他再次被派出，并携带一些书籍^①。现在随着塔罗同志来到伊尔库茨克，才着手组建日本科和在日本有步骤地开展工作。

至于其余3个科，尽管工作条件很糟糕，障碍重重，它们在东方民族处成立的三四个月间，还是在东方的相应国家以及在旅居俄国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当中相当成功地开展了工作。

中国科的工作

中国科由俄国共产党员阿布拉姆松领导（此人系东方学院学生，熟练掌握中文）。

该科工作由两个自然部分组成：1. 首先和主要是在中国本土的工作，该科有很大部分机构和工作人员在中国；2. 在旅居俄国的中国人当中做联合和共产主义教育工作，旨在培训他们从事中国革命工作。

国外工作

据来自上海的8月17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报告说，

^① 参见第2号文件。

在中国的工作情况是：在上海成立了由 5 人组成的革命局，其成员是维经斯基同志和 4 名中国革命者（其中包括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报纸出版者李同志）。

上海革命局下设三个部：1. 出版部；2. 宣传报道部；3. 组织部。类似的革命局在中国各大工业城市如北京、天津、广州等都要建立（或现已建立）。北京革命局由柏烈伟同志和斯托扬诺维奇同志领导。为了把工作集中管起来，上海革命局打算召开联合代表会议。

现在有 10 多名俄国负责的共产党人在中国工作。

出版部在上海有自己的印刷厂，而在北京是在一些教授的帮助下利用北京大学的印刷厂。

据 8 月报告说，已出版 16 种以上翻译的和原著的小册子和传单，其中有：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2. 米宁的《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3. 《十月革命带来了什么？》；4. 《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5. 《苏俄的教育》；6.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7. 《士兵须知》（作者是一名中国革命者）；8. 《论工会》和一系列其他著作。从 8 月 22 日起定期出版中文《劳动界》周刊（附上上述出版物）。

报道部在上海创办了俄华通讯社，北京设分社，该社为中国 31 家报纸提供消息。

组织部在学生中间开展工作，想方设法引导学生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并把他们组织起来。为使革命学生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该部做了大量组织工作。由于我们在中国各个城市召集了一系列的学生会议，8 月 17 日终于在北京举行了北京、天津、汉口、南京等几个城市的学生代表会议，最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团成立后派代表参加了我们的革命局，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对学生运动直接主动地施加影响，并引导学生到工人和士兵中间做有效的革命工作。我们的上海分部利用这种

影响对学生革命运动实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同时试图使学生运动从思想上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团体和商人团体划清界限，因为这些团体依靠民主美国来抵制日本的经济政治影响。与这种依靠美国的方针相对立，我们提出了面向社会革命、面向劳动群众的方针，与最激进的一部分学生一起，同在美国受过教育的民主学生团体（即所谓的中国学生联合会）作思想斗争，因为这个学生团体认为，可以利用美国非侵略性资本的垄断来拯救国家，似乎美国非侵略性资本主义应当而且也能够保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力发展，并改善群众的经济状况。

我们支持学生同其他团体一起为召开国民会议而进行斗争，同时建议他们不要溶入这些团体，而要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

最近，东方民族处主席团通过上海分部向社会主义青年团提出了加入青年共产国际的问题。至今尚未得到答复。

同中国的联系

8月17日发来了关于国外工作的最后一个报告，此后我们同上海分部的联系被远东共和国驻北京使团团团长优林截断，写给我们的报告未转达到目的地。蒙古事变之前^①，经乌尔嘎（乌兰巴托）保持着电报联系，同时为定期的信使交往奠定了基础。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个信使（懂汉语的中国科书记B·Л·霍赫洛夫金同志）携带了可变卖的贵重物品、书籍和给上海分部的详细指示^②。后来派遣信使的工作停止了，一方面是因为蒙古突然发生事变，另一方面是因为未从西伯利亚局得到应允的外汇，未从共产国际得到英文书籍。

现在打算（一旦共产国际较好地解决东方民族处的改组问题

^① 蒙古事变指1920年10月温格恩男爵的白卫军侵入蒙古，占领其首都乌尔嘎（今乌兰巴托）。

^② 指示没有找到。

和经费问题)派出负责工作人员考察团,到中国工作和了解情况。

同中国来往的路线是:1. 从伊尔库茨克出发,取道蒙古(经恰克图、乌尔嘎)是12至16天的路程;2. 直接路线(伊尔库茨克——满洲里——哈尔滨——北京)是8至10天的路程;3. 伊尔库茨克——哈尔滨——海参崴——上海;4. 伊尔库茨克——赤塔——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尔滨或海参崴。

本地工作

在领导国外工作的同时,中国科在旅居苏俄和西伯利亚的中国人当中做了大量工作,而且还专门在伊尔库茨克的中国营红军战士中做了工作。为中国革命工作培训中国人是这个营的任务。

过去一段时期里,在伊尔库茨克用石印方式出版了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2. 米尔的《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3. 布哈林的《共产党纲领》。从中国弄到的一些革命文献正在译成俄文……①

东方民族处工作中的障碍

东方民族处的工作因遇到以下一些很大的障碍曾停顿过,有时处于完全瘫痪的状态:

1. 同远东局关系不正常。寄给东方民族处的所有邮件、报告、通报、报纸等都被压在上乌丁斯克,或来得很晚,或根本就送不到目的地。不让来往民族处的信使和代表通过。克拉斯诺晓科夫安插的人、朴镇淳的工作人员朝鲜人朴爱②,不断进行反对东方民族处和朝鲜共产主义组织中央的活动,以苏俄如何之可怕吓唬前

① 以下删去朝鲜科和蒙古科工作的部分。

② A·M·克拉斯诺晓科夫,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成员、远东共和国政府主席兼外交部长;朴镇淳,朝鲜社会党组织者之一、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朴爱,朝鲜社会党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译者。

来的朝鲜代表，劝阻他们不要去伊尔库茨克，等等。

2. 缺少经费。至今东方民族处未从中央机关得到一个美元或其他货币，而没有钱就无法在东方工作。为了弄到钱，民族处不得不到黑市上购买罗曼诺夫货币和苏维埃货币。但最近没有任何俄国货币上市，民族处失去了这唯一的经费来源。确实，从西伯利亚局得到一些贵重物品（钻石），已拿到东方去出售，并答应给10万美元。但出售钻石要花很长时间，而答应给的钱至今未兑现。

3. 从事东方工作的各个组织在行动上不一致、不协调和互不通气。

共产国际、中央、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局派出自己的工作人员（这些人不是都胜任其使命的）执行独立的任务，没有总的计划，不了解当地情况。例如，共产国际派代表朴镇淳去中国，他打算在那里召开朝鲜社会党代表大会。由于在上海没有大量朝鲜群众，这次会议无非是朴个人对他本人所熟悉的朝鲜知识分子的挑选。

其实，东方民族处同朝鲜群众和内朝鲜有更牢固的联系，并拥有在各个方面都比朴更为可靠的共产主义工作人员。

再如，共产国际信任刘绍周，派他去中国工作，此人并不具备足够的政治素养，而且就其思想和信仰而言，远不是与社会主义运动休戚与共的人。

其实，东方民族处在伊尔库茨克和在中国有许多可以任用的受过充分训练并具有真正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中国共产党人。

外交人民委员部要求东方民族处提供帮助，但有时从事纯革命的党的工作，不同东方民族处的工作相协调。例如，正当朝鲜真正的共产党组织需要经费时，它绕过民族处拨给朴镇淳（音）400万卢布供朝鲜社会党使用。

蒙古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后，外交人民委员部拨给它大量白银和贵重物品，而且交给林钦个人掌握，因而东方民族处蒙藏科无

法控制尚未办理组织手续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同样，它还绕过民族处为西藏拨出经费和贵重物品。

俄共（布）中央向东方派出旅俄共产华员局，其组成人员表现出党性不强，政治素质差，根本不能在中国人当中组织革命工作。

最后，中央不考虑东方民族处的性质和意义，试图把它划归缓冲国^①，这意味着这个组织及其工作的彻底垮台。

4. 与共产国际没有直接联系。

东方民族处设在俄共西伯利亚局下面，对其开展工作很不利。西伯利亚局是州的一个机构，全神贯注于西伯利亚内部的党政工作，实际上它不可能拿出足够的精力来领导国外工作。这种情况迫使民族处和西伯利亚局都向共产国际提出把民族处改组为共产国际书记处的问题。

通过建立共产国际的一个局来排除所有这些障碍，从根本上解决远东工作中的问题，这就是基本任务。我们在东方的国外工作的存在与发展，取决于对这个任务的迅速顺利解决。

受东方民族处主席团的委托

副 主 席（M·布龙斯泰因）

中国科科长（M·阿布拉姆松）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7，第 39 至 41、43、44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即远东共和国，它成立于 1920 年 4 月 6 日，1922 年 11 月 15 日并入俄罗斯联邦——译者。

9

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 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

1921年4月21日

绝密

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

参与组织广州政府的力量

1. 国民党

国民党，大约成立于15年前，有纲领，与我们的社会革命党有些相似。该党的策略经常改变，受政局左右。它有时革命情绪高涨，有时黯然失色，成为缺乏信心的知识分子党。1911年，国民党担起了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推翻了满清王朝。随即同袁世凯、段祺瑞之类的封建军阀建立了反常的联盟，结果被军阀赶下政治舞台，不光彩地转入地下，偶尔在工作中还采取了恐怖主义。

在这十年间，国民党曾再次试图在南方登上政治舞台，但因重与反动派联合，又不光彩地为自己准备了绝路，而反动派利用国民党作幌子来实现自己的阴谋，再次取得了胜利。

1915年，国民党又转入地下，做工农群众的组织工作，这时它无疑已开始向左转。

孙逸仙博士是该党首领，1919年的一期《密勒氏评论报》上写道：他的党的基本目标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正如所有革命的

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作者附带说明：中国情况特殊，中国需要摆脱封建制度，需要完成工业资本主义革命，然后才开始进行社会革命。然而这些革命相近似，犹如一个链条上的环节，作者并未提供如何分清它们的方法。这就是中国社会党——国民党的策略原则的主要模糊不清和相互矛盾之处。（由谢米切夫编辑出版的上海《太阳》杂志^①的第1期上有这篇文章的译文，我动身去中国前，在东方部^②看到了这期杂志。）

2. 中国共产党

我从上海动身前，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筹备召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要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迄今党的实际领导权还在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手里。这个杂志是由我们资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编是陈独秀教授，当地人称他是“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即天才的政论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员。这个团体参加了同国民党中央关于一旦陈炯明军队打败南方政府后如何组阁的谈判。这次谈判的结果是，陈独秀被列为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未来广州政府成员，将做同国民党的联合工作。

广州政府的诞生及其采取的措施

1920年10月29日，陈炯明军队占领广州。11月14日，以孙逸仙博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由上海南迁广州^③。新政府首先采取的措施是，查封所有赌窝，颁布义务教育法令，最后还出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制定的适用于苏维埃情况的法令。1920年12月19日，陈独秀教授启程去广州^④，出任国民教育部长职务。1920年12月28日，公布了以下政府组成人员：

① 《太阳》杂志没有找到。

② 可能指俄罗斯联邦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部。

③ 1920年11月25日孙逸仙离开上海去广州。

④ 另有材料说，陈独秀动身去广州是在1920年12月17日。

1. 内务部长孙逸仙
2. 交通部长唐继尧（国民党）
3. 司法部长徐谦（国民党）
4. 外交部长伍廷芳（国民党）
5. 国民教育部长陈独秀（共产党）
6. 陆军部长陈炯明（国民党）
7. 参谋部长李烈钧将军（无党派^①）

政府在最初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决定向北京政府提出以下要求：

1. 从政府中清除所有封建军阀；2. 撤销联合令；3. 不签订对外借款协议^②。

孙逸仙博士在一次会议上说，他认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聚集在张作霖将军周围的那些军阀，需要从政治上把这些人消灭掉，因此同他们只有一句话——战争。所以他建议，作为现时政治形势的公式就是准备同北京作战。在这个问题上，一段时间在政府内部意见不一。陈炯明认为，现时任务不是同北京作战，而是在广州巩固政权的内部。

1921年1月12日，格里高里·扎尔欣同志^③从广州回来（他是奉优林之命同柏烈伟一起去那里的）告诉我说，政府中的意见分歧依然存在，在广州可以感觉到对未来缺乏信心。上述三点要求是政府内部联合一致的提法，可以感觉到普遍言犹未尽，互不理解。政府不得不查封一系列黑帮报纸，因为这些报纸进行挑衅性诽谤。例如在12月下半月，在广州就查封了6家挑衅性报纸。现在在广州完全公开出版的报纸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报纸^④、国民

① 原文如此，应为国民党——译者。

② 可能指孙逸仙、唐绍仪和唐继尧1920年12月6日发表的联合声明。

③ 即维经斯基。

④ 指1920年10月至1921年秋在广州出版的《广东群报》。

党的《民国日报》和四五家打着无党派幌子的报纸。

1月份在广州出现了几个与以前在中国截然不同的新式工会，采用了美国工会模式。

为了管理城市，成立了由国民教育部、司法部、社会保障部、社会安全部、警察部等组成的苏维埃。

我同广州政府成员的会见

1921年1月12日，《民国日报》(国民党在上海出版的非官方机关报)编辑戴季陶同志建议我会见来上海逗留几天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广州政府成员李烈钧，会见安排在孙逸仙博士和其他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去广州之前曾住过的一座私宅里。因为白天这座住宅受到严密监视，所以我在编辑部给我派来的一位向导护送下很晚才到那里去。这座住宅位于法租界环龙路44号，我和向导从编辑部所在地湖南路出发，走了很久，直到夜间12点才不知不觉地走到李烈钧处。李特别热情和亲切地接待了我。事先李章达向他讲了我的情况。李烈钧同志主动通报了广州政府的工作情况。

他证实了李章达以前所说的话，即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在国内消灭封建制度。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国内战争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并确信战争的结局必定是摧毁北洋军阀政府。他说，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目标和任务与他们广州人的目标和任务很相似，他们试图同苏俄建立亲密关系，最好通过秘密派遣代表互通情报和签订必要的协议来实现这一点。

广州政府所处的客观环境，使他们在政治行动上不得不特别谨慎，不过他们认为，为了革命的成功，他们可以采取一切手段。例如，广州政府正在同日本银行谈判向广州提供借款的问题，因为他们一文莫名，而发起同北京的春季战役迫切需要一笔钱。他还说，政府查封几家卖身求荣的报纸，因为这些报纸从事日本人的挑衅活动，在公众面前错误地解释政府的行为。为了说明情况，

广州人要向美国派出官方外交使团。李烈钧还说，他到广州后要提出向苏俄派遣使团的问题。之后谈到优林，他说，他们广州人不知道为什么优林至今蔑视广州。李烈钧还告诉我，国民党人数粗略统计约有20万，其中一半也就是约10万在华南，其余侨居国外和在北方。

我问李烈钧，广州人想同苏俄签订什么具体协议。他回答说，他没有签订协议的全权，但是国民党派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李章达同志可能得到了这方面的指示^①。

其实，我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时，于1920年11月结识了国民党党员李章达。他给我写了引见孙逸仙博士、李烈钧等人的信，并告诉我说，他想来莫斯科，要以孙博士的名义向苏俄政府建议签订在华联合行动的协议。

孙逸仙博士想签订的军事协议，是旨在使红军从俄国的土耳其斯坦方面向新疆发动春季攻势，直逼中国西南四川省首府（成都）。据李章达说，四川省约有4万名国民党党员，已做好策应这次行动的准备并会兴高采烈地迎接红军。

广州的政治、军事形势

广州军队在1月份约有6万人，有140门炮。去年12月份的最后几天，军队开始整编，清除了不可靠分子。

目击者在1月份报告说，广州军队太涣散，纪律性差，不是一支象样的军事力量。格里高里·扎尔欣同志在广州同陆军部长陈炯明进行过会晤，陈对他说，政府将竭尽全力整编军队，这是格里高里·扎尔欣同志1月13日从广州回来后告诉我的。

居民对广州政府的态度至今还不明朗。其实在北京和上海的学生当中，流传这样一种看法：“孙逸仙博士的想法可能很好，但

^① 在共产国际三大的材料中未谈到李章达。

是中国实现不了”。

这种看法产生于资产阶级的因循守旧心理，而不是对事态发展的正确估价。为了评估工人对国民党的态度，我去过上海矮小泥泞的贫民窟，那里居住着工人和手工业者，在那里常常见到孙逸仙的画像。工人们非常热爱和信任孙逸仙，这是因为近年来国民党几乎是唯一一个在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工人中间开展工作的充满活力的党，也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另一个更革命的更具有鲜明阶级性和组织性的力量，自然国民党在劳动群众中和在小资产阶级中比任何其他党都赢得了更大的同情。

现在来谈谈广州政府的“进攻”政策。

首先，广州没有钱组织这次进攻，这是广州为什么至今未发动对北京的战役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要考虑到群众的情性，即革命战斗精神“不高”。学生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中国的思想有巨大影响，但他们蓄意消极。在广州本地，对这个问题也没有一致意见，小资产阶级居民反对进攻，他们提出一个口号：“广州为了广州人，广州以外的事与我们不相干”。

有利于组织进攻的事实是经济危机。国家在闹饥荒，据经济学家预测，北方三省到4月份要有1800万人饿死；再者，在上海等城市出现大批失业者，军队中因得不到军饷士兵哗变接连不断。

鉴于存在着一系列可以看得见的原因，以及政府成员在进攻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期望广州很快发动对北京的作战行动是没有根据的。

主要是广州政府可能被我们用作进行东方民族革命的工具，这场革命最终会把中国抛向协约国敌人的阵营。

根据这一主要看法以及该报告中所谈的其他理由和情况，必须作出以下结论：

1. 同广州政府尽快建立联系，这是我们远东政策中的最迫切任务。

2. 建立这种联系的目的是在居民中和在广州政府中物色一些能够在中国发动全民起义来反对日美资本对整个远东的奴役的人物。

康斯坦丁·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①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 第 6—9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10

共产国际执委会执行局会议记录

（摘 录）

1921 年 8 月 26 日于莫斯科

致特利里塞尔和舒米亚茨基同志^②

听取：关于华盛顿会议情况的报告^③。

决定：〔2〕确定 11 月 11 日在伊尔库茨克召开东方各民族代表会议^④，讨论华盛顿会议所讨论的问题，责成特利里塞尔和舒米亚茨基同志召集这次会议。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拉科西

^① K·H·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1919 至 1921 年间在中国从事地下工作，自 1921 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书记——译者。

^② M·A·特利里塞尔，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东方部主任；B·З·舒米亚茨基，共产国际驻远东全权代表——译者。

^③ 由美国倡议召开的讨论限制海上武装问题、太平洋问题和远东问题的华盛顿会议于 1921 年 11 月 12 日至 1922 年 2 月 6 日在华盛顿举行。

^④ 后来会址改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于 1922 年 1 月 21 日至 2 月 2 日举行。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74，第 3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11

契切林给扬松的电报

(摘 录)

1921 年 10 月 31 日于莫斯科

致赤塔扬松^①

为解决向广州派遣代表团的问题，我们决定向您作一次咨询。广州政府单独同许多政府有交往，我们可否同它来往，这会不会造成无法同北京建立联系？北京是民族统一的象征，首先我们应该同北京来往。如果我们打算同时与广州来往，同北京的联系会不会中断？您谈此问题的电报密码错乱了。

关于张作霖购买武器问题，我们无法表态，因为从您的密电中什么也搞不清楚。

契切林

全宗 5，目录 1，卷宗 2105，第 27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Я·Д·扬松，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成员、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译者。

12

契切林给列宁的信

1921年11月6日于莫斯科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送上孙逸仙的信，其中有对您的问候^①。他称您是他的朋友，您本人同他认识吗？您从扬松的密电^②中可以看出，我们在北京设立代表机构后就可以同广州政府进行往来。

在此以前，我们认为不便给孙逸仙写信。去年我们给他写信时^③情况不同，因为当时同北京的谈判尚未开始。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契切林

全宗2，目录1，卷宗24665，第1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指孙逸仙1921年8月28日写给契切林的信。

② 密电没有找到。

③ 指契切林1920年10月31日写给孙逸仙的信。

13

列宁给契切林的便函

1921年11月7日于莫斯科

契切林同志：

我不认识他，我们互相也从未通过信。

我认为，应尽量热情些，要常写信并尽量秘密进行，要派我们的人去广州。

列宁

全宗2，目录1，卷宗24665，第1页。

手稿。

14

杜霍夫斯基与舒米亚茨基直接通话记录 (摘 录)

1921年12月2日于莫斯科—伊尔库茨克

杜：我是杜霍夫斯基^①，请舒米亚茨基接电话。

舒：我就是。

杜：请问，您收到我询问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情况的电报没有？请回答。

舒：您没有收到我的通知，并得出大会已经开幕的看法，使我感到很惊奇。同外交人民委员部已商定，大会将在1月15日以后召开。

南方的全权代表在这里^②，他希望恢复关系，即使不能恢复官方关系，那就恢复半官方合法关系。我还没有答复他。请告契切林就此问题的指示。南方代表是议员。

杜：给南方代表的答复，我们发密电转告。您关于会议的通知没有收到。关于会议已开始的消息也使我们感到很不安。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97，第 60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С·И·杜霍夫斯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司司长——译者。

② 可能是指国民党出席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代表张秋白。

15

契切林给派克斯的电报

1921年12月7日于莫斯科

致满洲里站派克斯^①。

答复您150号电。我们在等候给您的两名精干的工作人员。同广州政府的接触，应基于对中国民主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要谨慎从事，以不致影响我们对北京的政策。您能否不让北京知道将我的信转给孙逸仙？他本人会不会发表这封信？同他秘密进行书信往来会是很有好处的，但一旦为人所知，我担心会不会妨碍我们在北京的工作。

至于我们对铁路的方案^②，赤塔外交人员^③讲混合管理，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讲中国管理，让中国全面管理铁路，条件是在目前的混乱局面下，这种管理能为我们提供必要的保障。所以这里讲的只是在法律上承认中国管理情况下的混合管理。

契切林

全宗5，目录1，卷宗2108，第3页。

打字稿，副本。

① A·K·派克斯，俄罗斯联邦驻华特命全权代表、使团长——译者。
② 指中东铁路。
③ 远东共和国外交部工作人员。

16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讨论 远东会议问题会议记录

1921年12月26日于莫斯科

出席：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库恩、布兰德勒、列梅勒、萨法罗夫、特利里塞尔、霍季姆斯基。

听取：1. 会议决议案起草情况^①。

决定：关于华盛顿会议结果的决议案，责成拉狄克和片山潜同志起草。由拉狄克同志在星期二前准备好初稿，星期三前准备好最后稿。

为了按照日程上的项目起草《远东革命运动的性质和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指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由特利里塞尔、霍季姆斯基、兹纳缅斯基、片山潜、萨法罗夫组成，并且他们有权吸收其他熟悉情况的同志参加。特利里塞尔负责召集，委员会应不晚于星期六提出草案。该委员会还负责解决译员和出版局问题。

听取：2. 远东书记处工作人员辞职声明。

决定：寄给远东书记处一份政治局会议的记录摘录^②，由舒米

^① 指远东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

^② 1921年12月2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就舒米亚茨基、维经斯基等工作人员发表辞职声明，向他们提出警告（见全宗17，目录3，卷宗245，第3页）。1921年12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萨法洛夫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摘录寄给伊尔库茨克的舒米亚茨基（见全宗495，目录154，卷宗83，第24页）。

亚茨基负责会议筹备工作和把代表送到莫斯科。

听取：3. 关于吸收熟悉情况的工作人员参加研究远东问题的
工作。

决定：吸收兹纳缅斯基、沃兹涅先斯基、维连斯基和克拉斯
诺晓科夫。通过远东书记处邀请维经斯基和迈斯基，通过中央组
织局邀请塔什干的日本学家波利瓦诺夫。

听取：4. 关于出版《共产国际》专号问题。

决定：责成萨法罗夫收集材料，如果可能的话，在大会召开
前出版《共产国际》专号。

听取：5. 关于电台播放片山潜讲话的问题。

决定：责成秘书处由电台播放片山潜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
式上的讲话。

书记 萨法罗夫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74，第 7、8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17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89 号记录
（摘 录）

1922 年 1 月 12 日于莫斯科

出席：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
大林、莫洛托夫同志。

31. 听取：远东代表会议问题。

决定：为举行远东代表会议，指定由斯大林、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组成工作委员会。

中央书记 莫洛托夫

核对无误 谢尔林娜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251，第 1、5 页。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

18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列宁的信

1922 年 3 月 15 日于北京

绝密

致列宁。

敬爱的同志：

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国总的情况可以概述如下：

华盛顿会议结果使得中国的统治阶层开始探讨，如何为着自己的利益来利用中国现在必然要面临的新的国际形势。

在我们看来，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1. 统一中国，成立能够得到全国承认的政府；2. 财政和“裁军”问题。

这两个问题的出现，完全是因为中国需要在“四国联盟”^①实

^① “四国联盟”指美英法日四大国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即 1921 年 12 月 13 日签订的太平洋岛屿归属条约。该条约取代了曾是英国远东政策基础的 1902 年英日联盟，标志着美国在地球的这一地区的地位的加强。

施华盛顿会议决议时，组织应有的反击。当然，现时的中国统治者很不愿“裁军”，从而削弱他们纯“个人的”、“集团的”和全国的地位，因为民族因素肯定在每个督军的活动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即便在像张作霖这样臭名昭著的督军的活动中，也会起着很大的作用。

各地督军都很清楚，没有大家都承认的中央政府，就一事无成。由此而产生了目前旷日持久的政府危机。

中国现有的执政党派

作为现在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动的现实力量，可以认为有以下派别：

1. 在北方是以张作霖元帅为首的奉天派。张拥有黑龙江、吉林和奉天三省，即满洲和蒙古的一些地区：热河、察哈尔和（有名无实的）绥远。这一派的政治中心是奉天。

2. 以曹锟和吴佩孚元帅为首的直隶派。这一派统治着直隶、河南、湖北、江西、陕西和甘肃省。这一派的政治中心是曹锟元帅的大本营保定府和吴佩孚元帅的大本营。

3. 安福派。虽然这一派在1920年被打败，离开政权，但在山西、山东、浙江和福建省还有影响，甚至政权。段祺瑞元帅领导和联合了这个派别。

4. 华南。这里的广东、广西、广州^①、云南和四川省实现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联合。孙逸仙博士和陈炯明将军依靠国民党领导这一派，其政治中心是广州。

安徽、江苏和湖南处于什么状态不很明朗，前者面向奉天张作霖，后两者想把自己视为“中立者”，但实际上处在直隶派的“势力范围”之内。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贵州——译者。

如果考虑实际力量对比，并把它换成表明每一派的现有武装力量状况和它所统治的地区的人口数量的数据，那么就可以得出：

1. 奉天派（张作霖）在其所辖省份约有人口 3553.4 万，军事力量约有步兵 15.177 万。

2. 直隶派（吴佩孚和曹錕）在其所辖省份约有人口 13204.6 万，军事力量约有步兵 49.55 万。

3. 安福派（段祺瑞）在其所辖省份约有人口 7708.5 万，军事力量约有步兵 22.812 万。

4. 南方，广州政府（孙逸仙）约有人口 11026.4 万，军事力量约有步兵 27.317 万。

战略形势

只要浏览一下附上的中国示意图，就可以发现，直隶派占有最有利的战略地位，它几乎统治了人口稠密、具有巨大经济意义的整个华中和长江流域。与各竞争派别相比较而言，直隶派是最强大的，而且吴佩孚元帅作为军事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为他进一步扩大影响和加强实力，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局面。

同时，吴佩孚实力的加强，无论对张作霖还是对孙逸仙都是不利的，更不要说对安福派了。这一派在 1920 年曾被张作霖打败，因此它有理由对他怀恨在心。

结果发生了孙逸仙南方政府的“讨伐”行动和北方张作霖部队在天津、山海关地区的重新部署和集结。

政治后果

不言而喻，这带来了政治后果，即出现了奉天、广州和安福派“联合”的可能性。它们联合起来，一是可以给直隶派和吴佩孚设下包围圈；二是可以造成力量的集中，形成 60 万步兵与直隶派 50 万步兵相对抗的态势。

这三派之间的谈判已经开始。孙逸仙博士的外交部长伍朝枢来到奉天，3月8日又由张作霖的全权代表陪同，离开奉天返回广州。

现在的问题，显然不是组成新内阁的问题，而是更换谁也不满意的中国总统即年迈的徐世昌问题。奉天和广州“联合”的实质以及它们之间的谈判，都是围绕着指定孙逸仙博士为中国总统的问题。

在我看来，对直隶派的军事包围过程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其目的—开始是孤立吴佩孚，然后是做出某种妥协。

现在整个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只有中国人才能掀起的政治风潮。

社会舆论

中国督军从经验中学会了珍视社会舆论，因为它有助于他们的联合。因此直隶派试图以主要联合中国大资产阶级的进步党^①为后盾，提出了3月15日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的想法，上海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必然会组织社会舆论支持直隶派。但是这次国民会议看来召开不成，因为无论南方人还是奉天人，以及“中立”省份都在进行抵制^②。

南方孙逸仙博士政府的“讨伐”行动，在我看来，现在同样具有很大的政治鼓动作用，它必然增加他的政治分量，并有助于承认他为中华民国的元首。

美国人和日本人在致力于什么任务

毫无疑问，就北方而言，中国现时政治游戏的主要参加者是

① 1912年成立。

② 1922年3月15日，全国商会和国民教育协会在上海召开国是会议，吁请教育工作者协会、商会、农民协会、工会、银行联合会、律师联合会、新闻记者协会等紧急派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的正式开幕式。

美国人和日本人。

至于美国人，那么可以认为确凿无疑的是，他们希望中国爆发内战，“这会使中国军阀受到人们所期望的削弱，提供中国进行裁军的实际可能性”。这是一个美国在华商人的话。

日本人，看来为了反对美国，并不反对采取“加强中国”的立场。因此有理由认为，恰恰是日本顾问给张作霖出了进行谈判的主意。

我们的参与

既然真有可能提出孙逸仙可能当中华民国元首的问题，那么俄罗斯联邦可以考虑作为一支积极的力量参与中国的政治生活，何况在中国存在为未来的中俄联盟做大量工作的必要前提。

致同志般的敬礼！

维连斯基

附录：

1. 示意图。
2. 督军。

全宗 5，目录 1，卷宗 2143，第 1—5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19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
列宁的信附录“督军”
(摘 录)

1922年3月15日于北京

……①

广东省

广东省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摇篮，是目前设在广州的南方政府的管辖地。省长是陈炯明将军，他是一名革命者，有20多年党龄的国民党党员。陈炯明将军是解放了的年轻的中国的最著名活动家之一。按从政年限、对革命思想的忠诚和组织才干，陈炯明与孙逸仙博士可以相提并论。孙逸仙的私敌反对他的“独裁”倾向，认为陈炯明的治国谋略比孙略胜一筹。陈将军不是职业军阀……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社会工作，一开始他是自由派文化传播者……曾试图以和平手段清除君主专制的满清王朝在300年统治期间所建立起来的“肮脏马厩”。华南资产阶级怕得要命，其自由派人士提出了组建社团的方案，旨在扫除文盲，发展工业，改善中国生存的经济条件，开办图书馆和实现一系列其他文教目标。陈炯明参加了这些团体，越来越热衷于政治斗争，同时不断扩大这

① 删去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新疆、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浙江、福建、湖南和四川省部分。

种斗争的基础。在他的这个发展阶段，他在南方编辑出版一种激进的报纸^①，很受欢迎，拥有读者 4000 名，发行量在当时肯定是很大的。

陈炯明在广州一家法律学校充实自己的学识，准备从事重大政治工作，这项工作的内容应该是反对满族人的专制独裁，反对整个君主制度。陈同其他革命者小组一起，为同中国专制制度作斗争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从 1908 年起，他直接参加了人民起义，即有名的 1910 年“改组军叛乱”和 1911 年在广州进攻都督府的行动。这次行动使许多中国杰出革命者献出了生命。就是在 1911 这一年，当各省起义浪潮汇合成了强大的革命洪流时，陈炯明组建了志愿游击队，同皇家军队作战。1911 年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革命选择江苏南京作为自己的首都，陈当选广东副督都。那是青年人的革命狂热时期，陈满怀革命者激情献身于革命建设。

翌年，即 1912 年，中国反革命势力得到世界帝国主义的支持，日趋猖狂，其顶峰是 1915 年袁世凯发动的君主政变。当时陈炯明是广东都督，他会同中国西南六省都督，宣布袁世凯非法，并同革命军一起北上讨袁……这是同六省的第一次联合，想必也是在承认广州政治优势情况下华南的首次联合尝试。陈炯明及其一伙在军事上遭到失败，而由吴佩孚统帅的袁世凯军队，在中国西南的云南省受到打击。陈被迫侨居香港，而后去日本，又由日本前往法国和英国。

1917 年，“国民党”首领孙逸仙博士在广州组建南方政府，向北方军阀宣战。这时陈炯明又积极投身政治工作。

1917—1922 年间，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重大军事事件迭起，政治斗争激烈，内战加剧，华南的反革命基地被消灭，在拥有一亿人口的地区确立了中国意义上的革命影响。这个时期的重大意

^① 即《海丰自治报》——译者。

义在于作出了把“南方”影响扩大到长江流域的尝试。

这期间，从广西人手中夺回了广州，而广西人得到北方的支持，特别是直隶派的支持。在这场斗争中，陈炯明将军大显身手，表现突出。我们已经指出，陈完成这项任务得到了邻省（福建）督军李厚基的帮助。李向陈供应了武器装备。陈的胜利就是国民党的胜利，而怀着忐忑不安心情等待时机恢复在北京失去的影响的安福派，也从中受到鼓舞，有了希望。

陈将军是民族资产阶级中国最“有声望”的人物，他有明确的政治观点和同情心，行动很谨慎。政治阴谋家试图利用他这后一种“特性”，制造他与孙逸仙博士的不和。

陈在指挥军队。北方政客认为，如果把陈同国民党首领分隔开，孙逸仙就将孤立无援，不能给军阀集团造成任何威胁。搞政治阴谋的“爱好者”和“职业者”都作出了离间的尝试。最近几个月，在这方面吴佩孚将军特别卖力气，他派自己的代表游说陈炯明，答应召开国民会议，制订新宪法，召集新的最合法的议会和遣散军队，条件是同时废除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这些企图至今未果。

尽管条件困难，世界帝国主义对南方政府持明显敌对态度，陈炯明还是在顺利地进行着反对中国反革命势力和反对封建政权残余的斗争。陈作为当选的广东都督，打算实行一些地区性措施，以便把广东省变成“模范省”。

作为南方政府陆军部长，陈在改编军队，使之做好准备，迎接将来同北方军事集团的战斗。陈炯明将军是国民党的一名积极成员。……^①

全宗 5，目录 1，卷宗 2143，第 21—23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以下删去广西、云南、贵州省部分。

20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 给拉狄克的信

1922年4月6日于北京

亲爱的拉狄克同志：

寄给您例行的中国问题通报^①，现在中国的情况错综复杂，而且意味深长。

同时我还想向您谈谈工作情况。前几天，达林^②来到我这里，讨论因北方出现的局面而形成的新形势。我们决定把基地迁到南方广州，那里可以以半合法的形式广泛开展工作。

望您筹措经费，我给达林弄到6000墨西哥元借款，他已携款由我们两名久经考验、忠实可靠的优秀中共党员^③陪同去南方了。

在广州，我们打算召开中国青年代表大会，希望这次会议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提供广阔的基础^④，更何况青年们非常向往我们的组织。

现在我们组织了广泛的反基督教运动，它起因于在中国举行的世界基督教代表大会^⑤，是一种抗议行动，尔后变成了广泛的运

① 通报内容不详。

② C·A·达林，青年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成员——译者。

③ 指陪同达林去南方的中共党员张太雷和瞿秋白。

④ 1922年5月5—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

⑤ 指1922年4月4日由全世界学生基督教徒协会在北京清华园召开的代表大会。

动,现在在号召为国家的统一而联合起来,已在更广阔的基础上进行。

目前要把这场运动纳入政治运动轨道,我们打算建立一个伪装的合法组织。

在中国,现在政治上是一锅粥,毫无疑问,由于耍手腕,斗争各方将会用武力来解决争端。

寄去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牺牲情况的材料^①。

转达在华工作人员的一句话:“让莫斯科记着中国并给以帮助。”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维连斯基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20, 第 7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21

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 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 (摘 录)

1922 年 5 月 20 日 (无地点)

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同志致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

^① 实际上没有材料。可能说的是 1922 年 1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长沙罢工组织者黄爱和庞人铨的遇害情况。

第一部分

上海之行

1921年10月初，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的决定，或更确切地说，根据舒米亚茨基同志的安排，我被派往广州。在我动身的时候，远东书记处主席团成员同志就完全考虑到，我在哈尔滨暴露之后已不能在除南方之外的中国其他地方从事地下工作。

据远东书记处联络部告知，有英国签证才能去广州，否则去不了。为了拿到签证，我只好停留在哈尔滨，等了几乎整整一个月，最终，我拿到了所需的外国护照和签证，继续了我的上海、广州之行。在上海，我应拿到工作经费和得到必要的情报。

但是，在上海得知：1. 尼柯尔斯基同志处没有所需的经费；2. 根据远东书记处的指示，我应在那里等待新的安排。新的安排不久就收到了，其中包括远东书记处的命令，让我在瓦西里同志（即尼柯尔斯基）出席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期间呆在上海。这样一来，我在上海逗留多少时间没有确定。

当地总的情况

远东书记处认为上海是该处在当地全部工作的集合点。这里是朝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集中了同日本的联系。我的工作开始时，伊尔库茨克在筹备代表大会。朝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的很大一部分成员都走了，总的工作速度放慢了。都在等待大会的召开，等待着会议的指示和决议。在大会作出决议之前，各地不宜作出什么基本决议，所以总的情况是在等待。

联 系

作为远东革命工作的中心，上海同日本、朝鲜、伊尔库茨克和我们在中国的地区性组织都有联系（确切地说是都应建立联系）。应该承认，同日本和朝鲜的联系并不令人满意，同中国组织的联系令人满意，同伊尔库茨克的联系不太令人满意。

上海联络站

按照远东书记处的方案，建立联系要集中在一个特别的联络站。但这仅仅是方案，而实际上不是这样，不仅不是这样，而且也不可能是这样，因为远东书记处指派的联络员，由于种种情况根本无法完成这项任务。结果“联络站”的全部工作被简化为把电报译成密码和有时到电报局去发密电。实际上，同俄国的联系是通过维尔德同志^①进行的，同朝鲜和中国的联系是由朝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负责的，而同日本的联系在我逗留期间中断了。应该说，远东书记处预先设想的，把共产国际全权代表履行的指令职能同集中在联络站的交通职能明确划分开来的做法是荒谬的。

部分联系方向的情况介绍^②

中共中央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技术上的困难最少，进行得令人满意。在中央开展的全国性运动中，做到了行动上的完全一致，也就是地方组织必须服从中央的指令。不过应该说，书籍的传送并非始终都一帆风顺，例如，为纪念李卜克内西出版的一批小册子，就在天津被海关没收了。

最后，同俄国的联系，尽管远东书记处联络部付出可观费用，并设有许多联络站，但进行得还不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在远东的

^① C·И·维尔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会计——译者。

^② 同日本和朝鲜的联系情况从略。

联系是不够的，应该承认，其基本原因是远东书记处的整个联络工作所依靠的基本组织前提是错误的。这种组织前提，可以认为是试图建立一些不仅独立于所有苏联驻外机构，而且与它们完全断绝联系的中心联络站。按远东书记处联络部的最初指示，国外联络站应该是毫无例外地脱离所有驻外合法机构，秘密地进行活动。此外，联络站还应与远东书记处的全权代表断绝来往。例如，我们确切地知道，去上海领导联络站的同志^①得到指示，要尽量少见全权代表，而到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出差的维尔德同志，干脆被禁止会见全权代表。

不用说，在最初的实际工作尝试中，远东书记处联络部的指示就落空了。为进行联络，联络站常常不得不利用苏俄的一些驻外合法机构。但是主要错误，即对这些机构利用不够，一直保留到最后。我们在远东的联络工作在组织方面的先天不足，正是应该从这一点上去寻找。另一方面，联络工作和其基本网络的设置，考虑得不是很周到。如天津和北京的联络站完全是多余的，因为无论出于保密考虑还是出于节省经费，都不能在天津和北京为非本地同志提供住宅。

从另一方面来说，联络工作在组织方面的很大缺陷是：1. 部分联络站实际上没有双重隶属关系；2. 强行限制远东书记处联络部开展的联络工作。事情是这样：根据伊尔库茨克的指示，联络站只是信件交往和书籍、人员中转的技术性机构。其实，在对保密没有任何损害的情况下，可以并且应该让同一些同志担负一些其他任务，哪怕是情报资料搜集、当地情况研究等工作。最后，应该考虑到，远东书记处本身同中央（即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联系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上海同俄国的联系，否则就不好解释，象河南街钱款事件^②这样头等重要的问题，为

^① 姓名不详。

^② 此事件详情不明，“河南街”为音译——译者。

什么我询问多次却不作说明。

综上所述，我认为，为了同远东建立真正的联系，今后必须：

1. 最广泛地利用苏俄的所有驻外机构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2. 通过把联络工作同某驻外机构的合法工作结合起来，设立兼任职务。
3. 建立固定的联络站网络及其互相的隶属关系。
4. 让从事联络工作的人员兼做情报搜集、当地工人生活条件研究等工作。
5. 必须只挑选那些精通英语的同志从事联络工作。

拨 款

国外工作的拨款无论在我以前还是我在之时都没有完全明确的计划。当然，预算是有的，但是每项预算只有在具备明确的内容，也就是工作本身有严格明确的方案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上面这一点没有做到，应该预先说明一下，由于秘密工作条件本身的缘故，也不可能有什么完整的工作方案。

我觉得，某些违背预算的情况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只能规定最大限度的开支，而实际的经费分配应由全权代表和中央的有关同志共同来进行。

应当承认，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给国外工作的拨款有两个主要缺点：一是组织方面的开支占了大部分，二是给各中央的预算拨款常常变动不定。例如，朝鲜中央得到的是：9月份6000^①，11月和12月份4000，1月份2000，3月份1000。在中国工作的条件下，这种波动就会造成直接有害的影响，不会为保持稳定，哪怕是出版工作的稳定留有余地，而如果中央给予即使起码的但经常的拨款这是能够做到的……^②

① 原文未注明货币单位，下同——译者。

② 关于秘密工作条件和朝鲜情况部分从略。

第二部分：中国

预先几点说明

共产国际在华工作始于1920年春，从最初几个月起，在这项工作中就形成了我们在华工作的两个基本点，一直保持至今。

依靠最有觉悟的工人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然后它们联合起来组成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对待共产主义小组工作的原则立场。通过党的知识分子团体渗透到工人阶层中去，这是在当地条件下唯一可行的工作策略特点。全部工作的主要支柱，因而是知识分子共产主义小组。它们借助于合法和非法组建的工会，借助于争得青年学生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逐步渗透到工人群众当中。上海被选做工作的中心。

中国的共产主义小组

这种状况保持至今，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共产主义小组，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有组织上的联系，上海小组被认为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小组的名称最准确地表明了这些组织的性质，不仅是因为这些组织的人数微不足道（所有小组成员总数不超过200人），而且是因为现在，即过去两年之后，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些本质特点，这就是：1. 脱离群众；2. 试图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的组织范围之内；3. 推崇小组个别成员在小组全部工作中反映出来的个人威望；4. 积极活动能力较差。

我们的工会

其组成部分是清一色知识分子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通常都是与中国工人群众完全隔绝的。试图借助我们成立的工会来争夺对工人的影响的做法，并未收到什么令人满意的效果。在中国成

立的工人局脱离群众。真正的工人运动是在没有共产主义小组参与下进行的。这种情况在香港大罢工期间显示得很突出，对于这次罢工，我们的小组不仅袖手旁观，而且也未能采取援助措施。据罢工期间正在广州的马林同志证明，当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一直未支持罢工^①。因此，需要指出，现在我们的小组确实与中国工人运动格格不入，与其没有联系。

青年团

与此相反，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在青年学生中间却有很大影响。

在一些学校，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有威信和很大影响的。在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组成成分中，有几个有声望的工会，所以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共产主义小组有这种影响。这种影响在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反基督教的两次运动中部分地得到了证实。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依靠社会主义青年团，能够轻而易举地在激进的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青年学生中间开展大规模的运动。在广州，青年团的影响特别大，在那里，青年团是合法的，有几百名团员。在北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立大学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

共产主义小组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脱离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从另一方面来说，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也没有联系。这是我们共产主义小组的第二个不幸。这里又表现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所特有的小组习气。它们把自己局限在单独的独立小组中，不大能从事实际革命工作，满

^① 马林在1922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与举行罢工的海员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援助罢工，因为它认为它应从事地下工作，而国民党同罢工工人之间联系非常密切，以致在广州、香港和汕头的近12000名海员加入了这个组织。”（见托尼·塞奇：《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起源》第1册第299、318页）

足于像在温室里那样栽培共产主义。中央^①曾几次根据我们的主张作出关于在一些场合必须同国民党合作的决定^②，但都未得到贯彻执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远东书记处的过错，因为从1921年起它就没有在广州设代表。

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

尽管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存在着基本的决定性的弱点，即决定它们一方面脱离工人运动而另一方面脱离国民革命运动的小集团本质，但是应该指出，这些小组过去和现在确实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这就是出版工作和宣传工作，我在那里逗留时，表现为搞一些宣传运动，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所谓反基督教运动。

地方小组

在北京、天津、汉口、长沙和广州存在着与上海中央局有联系的小组。这些地方也有青年团。上海小组具有领导作用，不仅因为它是中心组，而且也因为有陈独秀同志参加。青年团根据共产主义小组的指示做工作，而所有运动都是根据远东书记处总的指示或我的指示共同开展的。

北方地区

由于我们的小组设在北京大学附近，对青年学生有很大影响，所以北方地区具有比较重大的意义。由于北京青年团的努力，我们同京汉、津浦铁路工人建立了联系。不过这个地区的主要意义还是在于对北京学校（国立大学、师范学院、高级女子专科等）青

^① 原文如此。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局。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在利金在华工作期间作出的关于同国民党实行合作的决定没有找到。

年学生的影响。毫无疑问，李守常教授（即北京大学颇孚众望的讲课人）参加我们的小组，起了很大作用。

报告所涉及时期的共产主义组织工作

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在12月至下一年4月间的工作，除出版工作和日常宣传鼓动工作外，可归结为开展四项运动，即1. 卡尔·李卜克内西被害周年纪念；2. 支援香港罢工；3. 上海新年宣传运动；4. 反基督教运动。

1月15日

纪念卡尔·李卜克内西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同青年团一起开展的比较成功的宣传运动。表面上看，这场运动表现为在北京（国立大学）、上海和广州举行群众大会，在广州举行街头游行，中央局专门出版一本小册子^①，以及各地组织印发传单（包括在上海印发朝文传单）。内部运动吸引了青年学生，只有在广州也吸引了工人。报界几乎未注意到这次运动。这次运动的性质证明，无论社会主义教义还是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名字本身，对于广大青年来说都是陌生的。不过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上海的群众大会不带有示威性质，而好象带有严肃报告的学术性质。但从表面上看，由于听众之多（约有800人）和发言者不光是中国人，而且还有朝鲜人、日本人和印度人，会议进行得很成功。

新年宣传运动

1月底，中国农历新年那一天，成千上万中国普通百姓被吸引到上海“新世界”来了。上海小组利用这种情况以及寄贺年卡的

^① 小册子名称不详。

习俗开展了一日宣传运动。他们印发了总共8万份的两种传单：一种是新年贺卡，一面印有老一套的贺词，一面印有告工人书；另一种是唤起民族感情，号召为建立统一的中国而与苏俄携手战斗的呼吁书。为散发传单动员了中国和朝鲜的青年团团员，散发活动进行得很顺利。

支援香港罢工运动

上面我已谈到，香港罢工，不仅其发动而且进行过程都与我们共产主义小组没有联系。我们的共产主义小组也未能充分开展支援运动。

我们的小组同工人没有很紧密的联系，自然也未能掌握上海和另一些华北中心城市工人群众中出现的声援运动。作出过这种尝试，但未收到多大效果。中央局所拟定的即便是局部的一日声援罢工计划，也未能实现。同样，也未能把部分工厂工人所进行的为罢工工人基金募捐的活动有系统地组织起来。结果是：整个声援运动只限于宣传鼓动，出版了专门的传单和呼吁书；中央局派了一名同志去香港同罢工者取得联系；在上海，中央局同工贼行为进行了斗争。

上海警察局同宣传者展开了激烈的搏斗。许多同志被拘留，部分劳工局^①成员被捕，其中包括该局临时领导人李启汉同志。被捕者被提交法庭审判，做了少量罚款处理。

非基督教运动

因此，如果说，想领导支援香港罢工的运动而未取得成功，这再一次证明我们的小组同中国工人群众缺乏联系，它们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微乎其微，那么所谓非基督教运动则无可争辩地证明，这

^① 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1925年5月在广州成立全国总工会后被撤销。

些小组能够把大批的学生和激进的知识分子吸引到广泛的运动中来，如果这场运动的基本方向涉及当代中国最迫切的问题的话。这证明，靠我们在中国的现有力量，现在已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国民革命运动，并使我们的组织处于领导地位。

非基督教运动的普遍性质

从表面上看，非基督教运动是青年学生进行的一场运动，旨在反对4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世界青年基督教同盟代表大会。但这仅仅是从表面上看问题。实际上，这场运动是形成一个整体的几个因素的综合反应。应该认为，非基督教运动的基本因素是对外国人的民族抗议运动，这个因素把最大量的同情者，即政治上不成熟，但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广大青年阶层，吸引到运动中来。第二个因素是与我们更加贴近的一种运动，也就是对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即奴役中国的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的抗议，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抗议。我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和直接附属它的一些团体打出了这些口号。第三，一些无足轻重的阶层，受到对基督教的宗教排斥情感的支配，也可能参加非基督教运动。最后，纯反宗教的知识分子无神论者团体也加入了非基督教运动的总战线。它们试图在运动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刻，把它推上科学的反宗教运动轨道。

总之，非基督教运动形成了广泛的战线，上面所指出的这条战线的各个部分，都是站在一条线上齐头并进，并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互相转化。运动的总指挥部从第一天起就掌握在共产党中央局手中，它通过青年团成功地控制了整个运动。

组织方面

英国人的报纸，一开始想对这场运动保持沉默，而当运动规模之大已使它们不能保持沉默时，便对运动进行了特别恶毒的攻

击。它们断定，整个非基督教运动只不过是一个隐蔽布尔什维克的屏幕，它们的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运动的基本力量确实是我们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非基督教同盟只不过是一个合法的挡箭牌^①，使我们能够公开地和广泛地进行宣传活动。

上海中央局建立了由7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对这场运动进行实际领导，它制定了详细的运动计划，可归纳为以下五点：1. 组建合法的非基督教青年同盟，其中央机构设在上海；2. 制定同盟章程；3. 召开非基督教组织代表大会；4. 通过派我们的同志以基督教代表身份参加会议来从内部破坏基督教代表大会；5. 通过派我们的同志参加基督教同盟地方组织来瓦解基督教同盟^②。

运动的展开

这场运动是从3月初上海非基督教青年同盟发表宣言时开始的^③。宣言措辞激烈，是针对整个基督教的，特别是针对“殖民主义基督教”的。宣言说，传教士及其信徒，以及基督教同盟成员，都是资本家的警犬。宣言号召：1. 工人的所有朋友和（资本家为其带来死亡的）工人自己起来进行斗争；2. 一切有民族头脑并明了外国统治的作用的中国人起来进行斗争。唯有上海一家报纸《民国日报》同意刊登呼吁书，而且是在预先核实确有合法的非基督教同盟之后才同意的。与此同时，还用电报把简短的号召发给全国最大的几个高等学府。

国内反应

预先做了准备的地方共产主义组织，打着非基督教同盟名义，

-
- ① 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倡议于1922年3月在上海成立的。
- ② 除破坏1922年4月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代表大会外，计划的基本条款都实现了。
- ③ 1922年3月9日发表。

号召人们参加在上海爆发的非基督教运动。在上海宣言发表3天后，报纸上就报道了北京成立非基督教同盟的消息。过了一周，在广州、汉口等地也成立了非基督教同盟。整个国家被非基督教同盟网所覆盖。广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立即加入非基督教运动。第一个宣言发表后的3天当中，上海同盟收到20份要求加入同盟的申请书。公布的同盟章程含有涉及盟员资格的三个要点。章程说，凡不仅同意同盟宗旨，而且1. 交纳盟费；2. 参加同盟所有会议；3. 随时随地为同盟做宣传工作，此外还具有盟员证的公民，才能算是盟员。

宣传运动

非基督教同盟所进行的宣传活动，具有完全出人意料的规模。同盟出版的小册子^①及中央和地方委员会发表的宣言，引起了基督教团体的反对。外国报纸不得不划出几乎常设的栏目来报道这场运动。而一些中文报纸，如《晨报》开辟了宗教讨论专栏。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北京大学，举行了群众大会。仅在北京，盟员人数就超过1500人。一句话，不仅基督教代表大会被搞垮了，而且这场运动形成了由我们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局领导的强大社会浪潮。

改变运动方向的尝试

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加入了这场运动，例如北京大学校长^②、某些教授等。北京的这些知识分子团体试图使运动转到科学的反宗教宣传方面，它们揭掉了运动的民族革命面纱，而恰恰是这个面纱使运动变得很猛烈。但是中央局巧妙地掌握住了运动的领导权。

^① 《非基督教运动》上海1922年。

^② 指蔡元培。

结 论

在我看来，非基督教运动的教益在于，这场运动不仅说明我们有可能掌握，而且也证明我们的共产主义小组能够掌握中国社会激进阶层的人民革命运动，而做到这一点，就是实现我们在中国的两大重要任务之一。

中国工作的前景

与朝鲜不同，在中国，我们拥有一些基本的可以依靠的组织，这些组织可以并且也应该被看作是我们今后工作的支柱。上面我所说的中国组织的弱点，就是它们的小组宗派性。然而丝毫不是过高估计它们的作用和它们的分量；必须指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在其存在的两年间确实做了大量组织、宣传和出版方面的工作。仅我在上海逗留期间，就出版了大约 16 种翻译的小册子，还有中国同志自己编写的纪念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反基督教的两本小册子，并就华盛顿会议、纪念李卜克内西、庆贺两个新年、香港罢工和一系列反基督教宣言等事件散发了成千上万张传单。我在这里所说的仅仅是中央局的出版物。

在组织方面，中央局建立和发展了一些青年团组织，这些团组织与国内许多高等院校有联系，在广州，青年团已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合法组织，约有团员 800 名。

在本报告所总结的时期里，中央局开展了两大宣传运动，其中非基督教运动规模最大。

最后，对小组人员组成情况的了解表明，在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组成人员中，有许多同志，如李守常、陈独秀、张太雷、邓中夏、张国焘、李启汉等，不仅是忠诚的革命者，而且也是颇有影响的工作者。

因此，归根到底必须承认，在中国，我们有从事共产主义工

作的支柱，今后的工作应归结为两个基本方面：

1. 必须使这些支柱同中国工人组织联合起来，以便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夺取工人群众。

2. 必须争取使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首领。

这是两个基本目标，决定了应由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提出的总任务。

中央局迁往广州

我确信，中国目前的形势把对我们小组工作的组织改革问题提到了首位。这次改革可归结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广州。这样做有许多理由，最重要的理由是：1. 现在在南方有广泛的合法条件；2. 在广州有最先进的工人运动；3. 最后，广州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

合法条件和广州工人运动的巨大规模，提供了同工人群众建立联系的可能性。这是我们的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应该说，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取得巨大组织成就，正是因为具有这两种情况：合法条件和工人运动的发展速度。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之所以至今未与广州工人运动建立密切的联系，只能用其薄弱来作解释。正因为如此，需要从北方派一些能力强的同志到广州工作。在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局迁到广州和整个工作重心集中在广州的情况下，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最后，南方是国民党的活动舞台，如果我们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局迁到广州，这种情况就有助于把国民革命运动的各种联系集中到中央局手中。在南方，中央局较容易把劳动群众从国民党的影响下吸引过来，使之接受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

实际措施

无论东方部针对本报告作出什么决定，也无论它对我们在朝

鲜和中国所做的工作作出什么评价，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完全有必要立即加强我们在华的工作，不是通过增加中国工作预算，而是通过派一些同志到各地去做组织、指导工作。最近一个时期，共产国际执委会只有一个同志负责整个中国的工作^①，这是很不正常的。在中国没有这样的统一的党，其领导权可以集中在中央局的一位全权代表手中。在中国，有一些正在探索前进的地方共产主义小组，至少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三个共产主义小组中，完全有必要设东方部的全权代表。

另一方面，从当地的条件来看，向中国派遣一些同志，并把他们的工作限定在党、工会和青年团的工作范围之内，这是很不恰当的。从秘密工作和节省开支方面考虑，这三项工作应委托同一些同志去做，以便把共产国际的工作同某种合法的国外工作切实结合起来，从联络方面考虑也应这样做。

利金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0，第 35—40、52—63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指马林。

22

扬松给加拉罕的电报

1922年7月10日^① 于赤塔

绝密

转维连斯基给契切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电报：“中国政治中的主要人物是吴佩孚将军，他掌握着军队、财政、交通以及内政部，南方多数省份现在投靠了吴佩孚，其结果是孙逸仙政府几乎彻底垮台^②，经我们中国朋友长时间做工作^③，6月27日，我受吴佩孚的邀请访问了他的大本营，进行了非常有意思和有益的谈话，最后吴佩孚委托我转交给俄国武装力量领导人托洛茨基一封信^④，信中谈到俄中在远东任务的一致性^⑤。我认为这是中国和苏俄之间签订军事政治协议的出发点。7月9日我去莫斯科亲自报告。7月3日，编号53，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

扬松（无日期）

全宗5，目录1，卷宗2194，第97页。

打字稿，副本。

① 这是莫斯科收到的日期。

② 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政变后，1922年6月15—16日夜间孙逸仙逃到“永丰号”舰上，试图组织对阴谋者的抵抗未成，不得不于1922年8月6日前往上海。

③ 在苏联的外交通信中，“朋友”一词指当地共产党人。

④ 吴佩孚给托洛茨基的信没有找到。

⑤ 见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现代中国：在吴佩孚将军大本营》，载1922年8月12日《消息报》。

23

派克斯给加拉罕的电报 (摘 录)

1922年8月4日于北京

致莫斯科外交人民委员部加拉罕，

吴佩孚履行了排除颜惠庆的承诺。

后者已不担任任何职务^①。吴佩孚认为同苏俄签订协议是他取得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我试图说服他转向国民党，同孙逸仙和解现在还未取得成效：前半部分他接受，后半部分他断然拒绝。昨天内务总长孙丹林（吴佩孚安排的人）来访，让我相信他能防止吴佩孚同孙逸仙发生冲突。……^②

派克斯

全宗5，目录1，卷宗2194，第102页。

打字稿，副本。

① 颜惠庆自1922年6月11日至8月5日担任北京政府首脑。

② 以下删去辨认不清的文字。

24

越飞给吴佩孚将军的信

1922年8月19日于北京

机密

吴佩孚将军亲启

将军先生：

在由莫斯科来这里的途中，我收到一份电报说，您给托洛茨基的信已转达到，并给莫斯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①。

俄国人民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人民为从政治上和组织上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进行的民族斗争。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

目前的工农俄国正在同世界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进行英勇斗争，它感觉到同中国的完全一致并准备全力帮助中国的斗争。

如果能同您本人见面，一是更直接地了解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家，二是同您讨论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感兴趣的问题，那我将感到不胜荣幸。

但遗憾的是，目前也许私下会见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派一个十分可靠的人，即我的军事顾问格克尔先生去拜访您，格克尔在俄国最近一次战争中曾任军队指挥官，后任俄国总参谋部学院院长。请您完全相信他。

^① 吴佩孚给托洛茨基的信没有找到。

同时，我冒昧地在这封信中提出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是被作为俄罗斯联邦特命全权代表派到这里来的。您也许知道，这以前我在西欧从事外交工作，因此对远东的情况不很了解，我希望您多给指教。我之所以当特命全权代表，是因为俄中两国之间尚未恢复正常外交关系，但是正如我在同外交总长顾维钧的第一次会晤中曾向他指出的，我作为俄国代表，不能允许对待我的态度比对待任何别的大国代表的态度差^①。

我认为，我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我们两国之间本来就应有的友好关系。我的政府除让我出任驻华代表职务外，还让我担负了同日本进行谈判的职责。我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在我同日本的谈判开始之前修复同俄国的关系是有重要意义的，所以 I 有意拖延同日本的谈判来到北京。但这里给我造成的印象是，似乎中国政府对同俄罗斯联邦的谈判有某种不信任感，怕是在提防我方有什么诡计。实际上俄国政府根本不打算利用谈判谋求私利，而相反，完全是根据其总的对外政策，准备迎合中国人民的利益，所以 I 有意在这里强调指出，我不会强求中国政府同我们谈判，但在这个问题上 I 给它以主动权。

然而，我本人真诚地相信，同俄国的谈判是非常符合中国的利益的。第一，中俄之间有着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恰恰对于中国比对于俄罗斯联邦更为有利。第二，现在正是时机，错过这个时机，中国就可能处于不利的地位。

I 不能拒绝同日本谈判，因为日本在俄国土地上还有驻军，如果 I 不得不先同日本而不是同中国进行谈判的话，并且谈判时不同中国保持接触，那么不要说在签订俄中条约之前签订俄日条约会给民众造成很坏的印象，而且还要考虑到，由于 I 同中国国务

^① 越飞同顾维钧的第一次会晤在 1922 年 8 月 15 日举行。

活动家没有接触，很可能因为不很了解中国的需要和利益，而在同日本的谈判中作出有损于他们的错事。

我深信，对中国最有利的，是在同一城市，在举行俄日两国会议的同时举行俄中两国会议。如果中国政府向我提出这个建议，我会马上乐意表示同意，那时我只好同时同两个国家进行谈判，我有这方面的足够经验^①。

我个人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但考虑到上面提到的中国现政府对谈判的疑虑，我向顾维钧外长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向我这里派一名十分可靠的专员，在我们同日本谈判时，我可以通过他同中国政府保持联系。因为我是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而谈判将在长春进行（我们曾建议在北京进行，但日本人坚决反对），也就是说，还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所以向我这里派一名中国外交部专员，是无可指责的。按照欧洲人的理解，这倒是必要的礼貌之举。

我提出的这些建议，是为了便于修复两国的睦邻关系，因为在我的使团里没有人能在我不在时取代我，而我担心，一旦同日本的谈判拖上几个月，那么这期间能做的事情也会付之东流，我们两国的整个友好协商工作也会被无限期地推迟下去。然而我们是处在一小时等于一年的时期。

我想提请您注意的第二个问题是蒙古问题。在日本的鼓动宣传影响下，此间，现在人们试图在这个问题上制造反对我们的社会舆论。

您对实际情况了解得很清楚，想必用不着来说服您相信俄国在蒙古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不追求任何帝国主义目的。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俄国不得不向那里派驻军队，并在那里保持部分军队至今，一是因为只要中国还容许白卫匪帮及其首领在其领土上逗

^① 看来，越飞是指1917年12月到1918年3月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举行的有俄罗斯联邦、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代表团参加的会谈。

留，我们的军队从蒙古一撤出，他们就会很容易进驻那里，向远东共和国后方发动新的攻势，若是中国在条约中承担义务，不允许任何敌视俄国和远东共和国的部队在其领土上逗留，并向我们作出相应的保证，那时我们才会感到在这方面是可以放心的。二是因为我们的军队现在从蒙古撤出，就意味着张作霖立即去占领蒙古，这既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至少我听说，您以您所特有的洞察力坚持同样的观点。另一方面，我认为您立即将您的军队调入蒙古也是不恰当的，因为如上所述，蒙古问题只能通过签订条约的途径来解决。

由此可见，在这个问题上，最好是一方面向中国公众说明对我们进行攻击是错误的和不公正的，另一方面还是尽快同俄罗斯联邦签订条约。

最后，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我们之间签订条约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俄中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得以恢复，我收回俄国使馆的管理权，我就可以向全体中国人民非常清楚地展示出新的外交原则，例如可以证明，在中国领土上的欧洲代表机构可以不带自己的军队。

将军先生，以上所述仅供您本人一阅。

再次请求您对我的使者格克尔先生多多关照，他能够补充很多情况，我是永远尊敬您的。

俄罗斯联邦驻华特命全权大使（签字） 越飞

全宗 5，目录 1，卷宗 2144，第 277—280 页。

打字稿，副本，亲笔签字。

25

越飞给孙逸仙的信^①

1922年8月22日于北京

亲爱的博士：

我曾幻想，我个人能有机会结识您，从而见到正在为自己民族的解放而斗争的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

根据您给契切林同志的信^②，我知道，您以您所固有的明晰而清醒的思维出色地理解了我们总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特别是远东政策的基本原则。

因此我不想说服您使您相信，我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修复同中国人民的真正睦邻友好关系，因为我们的同情完全是在中国人民中一些有觉悟的分子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上的解放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一边。

我给您写这封信，不是为了说明您十分了解的这些原则，而是为了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我通过我的信使给您送去这封信，他无权进行谈判，但应通过马林同志将这封信转给您。

我希望您帮助我解决这些问题，请不要不给我出主意，您的主意对我来说是特别宝贵的和十分需要的。

① 故意显得幼稚，为的是得到他对最微妙的问题的答复（越飞注）。
② 见孙逸仙1921年8月28日和1922年6月23日给契切林的信，载《孙中山选集》第298—300页；《孙中山：1866—1986，纪念诞辰120周年，（论文、回忆录、文献资料集）》俄文版第285页。

我在远东政策上是新手，因为这以前我一直在西方工作。鉴于我们在中国和在其他地方都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利益，其他大国的利益完全不该在这里同我国的利益发生冲突。可是看来，这些大国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利益和胃口是如此之大，以致我作为中国独立的拥护者和捍卫者的仅仅一次表态，就足以使我成了此间欧洲人和美国人所憎恶的人，并招来被他们收买的那些报刊的狠毒如蝎的家伙对我的攻击。如果您注意一下这些机关报，您就会看到，他们对我进行了怎样的陷害，对工农政权进行了怎样的造谣诽谤宣传。

可见，我单枪匹马，无法利用我那些更了解中国的外交同行的知识和经验。

唯一令人高兴的是中国社会对我的亲密的接待。但是，要了解这个社会我还缺少材料。

劳驾您为我解释一下我不明白的问题，因为没有人像您这样了解中国和理解它的内部发展条件了。

1. 我不清楚，张作霖及其一派是否也是民族解放派，但比其他派更反动一些，或只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我还不清楚，从社会阶级角度说，张作霖依靠谁，在北京有哪些人支持他。

2. 我不清楚，为什么您不久前同张作霖达成反对吴佩孚的协议^①？这仅仅是想支持一个更强大的敌人来消灭另一个敌人，使您只剩下一个敌人，便于以后消灭它，还是您真的认为张作霖的政策对中国有好处？与此相联系，我想知道您建议我对张作霖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针？

3. 我不清楚您同陈炯明的意见分歧。要知道，仅仅不同意应由北京还是由广州来实现全国统一这一点，还不足以导致流血战争。

^① 1922年2月，孙逸仙同张作霖签订对华中吴佩孚军队共同采取军事行动的协议。

4. 我不清楚，如果说在目前的中国议会中国民党和整个南方在起很大的作用，那么为什么您不承认这个议会？

5. 我不清楚，如果说您现在同吴佩孚达成协议，而您和国民党的影响因此而会更大，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特别是外交部在奉行一种既丝毫不符合国民党的纲领，也丝毫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的政策呢？

最后一点对于所谓的俄国问题特别重要。

我们现在不得不同日本谈判，因为我们自然非常想把日本人赶出我国领土。我的政府责成我进行谈判，我有意拖延为的是能先来中国建立联系。我深信，如果同日本谈判先结束，而后开始同中国谈判，那对中国来说是很有害的。我曾建议顾维钧外长在俄日谈判时也同我们在同一城市进行谈判。我说我可以同时举行两个会议。我建议顾维钧部长，一旦我的第一个建议不能实现，在我同日本谈判时向我这里派一名可靠的代表，我可以就中国感兴趣的问题同他联系，以避免在我对中国利益不了解的情况下无意识地作出有损于中国利益的错事。

然而，看来外交部不准备采纳我的任何建议，至今也未满足我根据我的处境提出的唯一要求，即我不能允许中国政府对待我的态度比对待任何别的大国代表的态度差。

世界帝国主义特别想把中国的唯一一块由于我们的干预而至今尚未处于它的影响之下的领土即蒙古置于它的影响之下，所以在蒙古问题上它败坏我们的声誉，指责我们是“帝国主义”。

中国政府不知为什么上了这个圈套，所有谈判都从我们何时从蒙古撤军这个问题谈起，同时它本身还组织宣传运动要求我们

离开蒙古^①。其实，每个了解国际局势的人都清楚，我们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不打算向蒙古渗透。但是我们若在目前的混乱时刻撤出军队，日本帝国主义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我们现在离开蒙古对中国不利，您同意我的看法吗？

我有一个印象，好象中国政府不相信我们，认为我们建议进行谈判是谋求某种私利。

为了消除这种不信任感，我到处声明，我不再建议进行谈判，在这方面我将等待中方的主动。不过我个人确信，如果谈判进行得太晚，中国会蒙受很多损失，因为我们不能再拖延同日本的谈判。

同时，中国应对同我们的谈判感兴趣，因为在俄中的几百年交往中，无疑积存了很多问题，既然俄中所有旧协议和条约不再有效，这些问题就不能再悬而不决了。同时我认为，所有问题都是紧密联系彼此交织着的，不能提出其中一个来单独讨论。

如果您同意我的看法，或许您可在尽快开始俄中谈判方面行使自己的影响。

很抱歉，我这封信占用您这么多时间，但是中国哲人的意见是很宝贵的，我不能不欣然加以征求。

我希望，以后我们之间能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亲爱的博士，请接受我最深切的敬意。

越飞

① 为了消灭温琴男爵的白卫军，1921年5月俄罗斯联邦红军部队和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进入蒙古领土。6月15日，契切林向中华民国外交部发出照会，说俄罗斯联邦在承认中国权利的基础上同温琴作斗争，一旦任务完成，它的军队就撤出蒙古。1921年9月14日，蒙古政府发表《关于宣布人民蒙古独立告各国书》，其中声明：“现在我们的人民政府没有复仇情绪，也不打算同中国发生冲突，但它声明，不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1921年11月5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和蒙古人民政府签订了建立友好关系的协定，根据这项协定，红军部队在蒙古的逗留时间无限期延长。

全宗 5，目录 1，卷宗 2144，第 249—252 页。
打字稿，副本。

26

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

1922 年 8 月 25 日于北京

绝密

致莫斯科加拉罕

送斯大林。(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他受到最高礼遇，包括军事礼遇。吴佩孚及其政治顾问宣称完全同意我信中的意见^①，都说自己亲俄。吴佩孚给我寄来一张照片，并作了以下声明：

1. 不值得与现时的中国政府打交道，它不中用，将在 7 至 10 天内被他们驱散。顾维钧外长是亲英分子，但鉴于他很老练，是可以接受的。

2. 孙逸仙是中国的思想领袖，吴佩孚是军事领袖，两人联合后将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现在他们在进行谈判，希望他们达成协议，孙将任共和国总统，并亲自兼任军事部长和总司令。

3. 他很关心蒙古问题，昨天蒙古王公拜访了他，请求他派军队进驻蒙古，并说，蒙古人民将供养军队（在中国每个省都供养军队）。他准备组建一个精锐师，指望在 1923 年春能占领蒙古。他

^① 见第 24 号文件。

同意蒙古问题应在同我们的谈判中加以解决。（这里不清楚，他是否同意我们保留军队到1923年）。

4. 他希望在春季前做好消灭张作霖和日本人的准备工作。

5. 他感谢选择长春取代哈尔滨^①，希望向长春即我这里派一名代理人。但同蒙古的谈判在这个地方不太合适。晚上，他喝得略有醉意，让人秘密告诉我，他很了解日本，认为日本是弱小的。在日本，军方同反军国主义分子有很大冲突，前者主要支柱是占领军，因此他们担心，一旦斗争无力，就会出现把占领军撤回日本的要求，并准备把它们撤出大陆。同日本谈判时，需要显示实力。最易受损害的地方是朝鲜，需要拿它来吓唬人。他终于喝醉了，他说，俄中反日同盟是需要的。俄国应在朝鲜准备革命，届时同中国一起从日本手中夺走朝鲜。

我认为，还是要发出外交部建议进行谈判的照会。我坚持在解决蒙古问题时，要采纳我的如下建议：问题只能在共同的会议上解决，而不是单独解决。在条约中，我们保证在中国作出通常的保证情况下撤出自己的军队，实际上是根据同吴佩孚的协议撤军，不要求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参与，基本上不为蒙古说话，声明这是蒙古和中国的内部事务，要规定非帝国主义性质的经济利益。

在同日本的谈判中，要拒绝签订没有一般政治条件也就是没有法律上承认苏俄条件的贸易条约，至少要有以先决条件形式提出的某些一般贸易关系条款，并要指出，在签约之后，双方立即着手就恢复正常政治、外交和领事关系问题，以及解决航行、捕鱼之类个别具体问题签订条约。

日本人没有条约也要撤出自己的军队。我认为，签订像英国条约那样的妥协性条约^②，现在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对这些问题必

① 这里说的是有以越飞为首的俄罗斯联邦代表团、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和日本代表团参加的长春会议（1922年9月4日至26日）。

② 指1921年3月16日签订的英苏贸易协定，此协定曾意味承认苏俄现状。

须立即作出答复，因为在第一次声明中必须说明谈判的精神，谈判要在近日开始。

发电报太贵，最好同丹麦电讯公司签订总的协议^①。

需要有关俄国的消息，契切林是去伦敦了吗？同欧洲的关系怎么样？

越飞

全宗 5，目录 1，卷宗 2194，第 108—109 页。

打字稿，副本。

27

孙逸仙给越飞的信

1922 年 8 月 27 日于上海莫里哀路 29 号寓所

我亲爱的越飞先生：

您本月 22 日寄来的一封很有意思的信已经收到^②。我要感谢贵国政府派您这样一位享有盛誉的国务活动家来我国。

我想直接谈谈您信中提到的问题，在答复您提出的几个特殊问题之前先谈几点看法。

首先，我必须告诉您，北京政府没有任何基础，它软弱无力，因此说现政府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也不过分。从它同苏维埃俄国的关系和交往来看，这种说法是很对的。令人气愤的是，某些列

^① 丹麦公司曾为中俄之间提供电讯服务。

^② 见第 25 号文件。

强不希望在它们能够迫使莫斯科接受经济投降条件之前让中国同俄国达成协议，同时，它们也不欢迎在我们之间出现任何达成协议的前景，因为这种协议可能会使中国摆脱它们的政治经济控制。

只有把中国的切身利益置于各列强利益之上的中国政府，才能够使这两个国家取得正确的相互谅解。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劝您在我未改组北京政府之前等一等。鉴于形势可能出现某种变化，这种情况在不远的将来就可能发生。

至于蒙古，我完全相信贵国政府的诚意。我接受莫斯科无意使这一地区脱离中华民国政治制度的保证。我同意，在北京出现改组后的能同贵国政府进行谈判的政府之前，苏联军队应留在那里。贵国军队立即撤走，只会迎合某些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

我现在来答复您在信中提出的一些特殊问题：

1. 张作霖是中国人，很难设想，他竟会希望见到外国列强来奴役他的国家，或者为此而进行活动。我不认为他是日本人的代理人。至于社会阶级，看来，张作霖不依靠任何阶级，而是完全依靠自己的战士。据我所知，在北京还没有可以说是支持他的人物。但是，正如我已经指出的，现在北京完全可以不予考虑。

2. 我在去年冬天同张作霖达成协议，主要是因为他派遣他的代表来广州见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来桂林，我当时正在那里集结我的军队准备北伐。他的代表建议进行合作，贯彻执行我重新统一国家的政策，并作出明确许诺，必要时，他将站出来反对日本。我可以这样说，前年在类似条件下，我曾同意同段祺瑞合作。除接受同张作霖的合作外，另一种选择就是既与他作战又与吴佩孚作战。张在建议同我合作时可能有诚意，也可能没有诚意，但我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无权怀疑他没有诚意。如果以后他表明没有诚意，那时我再来对付他，但不是在那以前。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重新统一中国，当时我准备，现在我也准备同接受我的条件的任何首领合作。这也说明与吴佩孚有关的事件，现在正在朝着

什么方向发展。

至于您对张作霖的态度，我要劝您，别把他推向日本，而要使他更能接受我的影响。看来，现在张正积极反对美英两国，因为这两个国家好象支持吴佩孚。贵方对他再采取敌视态度，可能会迫使他去寻求日本的外交支持，因为谁也不想完全受到孤立。请注意这一点。

3. 关于这个问题，我附上我签发的一份关于广州局势的声明^①，这份声明是我在上周向列强发出的。陈炯明是个坏人。一个政治追随者，因为在一个基本政策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而与其政治领袖分道扬镳，这可以理解。但是，当这种分裂采取谋杀领袖的形式时，整个政治生命就彻底葬送了。

4. 我已劝告国民党的所有国会议员去北京，这个事实就答复了这个问题。我曾指出，国会本来有权召开会议，但由于遭到北洋军阀的反对至今无法在北京举行。现在这种阻力已被清除，因此，国会会议在北京的重新召开不是对黎元洪政府合法性的承认，而仅仅是为国会会议赋予清除阻力的特权。

5. 如果您以为我现在同中国外交部保持着某种接触，那您就错了。至于我对这个问题的其余部分答复请您参看第1页上的我的第一点意见。

我也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对我说，贵国政府责成您同日本进行谈判。我想知道，为了同日本取得谅解或更准确地说达成协议，贵国政府是否准备牺牲中国的利益。请允许我具体地谈谈这个问题。众所周知，日本想要在北满取代俄国，正如它在日俄战争后在南满取代了你们一样。贵国政府是否会同意。比方说，将中东铁路上的俄国利益转让给日本？我未必需要告诉您，我希望苏维埃俄国阻止日本加强它在北满的地位。

^① 孙逸仙博士1922年8月17日在上海发表的声明刊登在1922年8月19日在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上，第511页。

我欢迎您关于我们之间建立更密切联系的建议。

谨致

最深切的敬意！

您忠实的孙逸仙

全宗 5，目录 1，卷宗 2144，第 253—256 页。

英文打字稿，副本。

28

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

1922 年 8 月 30 日于北京

绝密

致莫斯科加拉罕

送斯大林。这个地方对我们非常有利，同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具有很大的意义和巨大的成功机会。在这里可以感觉到世界政治思潮很强大，例如要比列宁赋予同样意义的中亚强大得多。中国，毫无疑问是国际冲突的焦点和国际帝国主义最薄弱的地方。我认为，正是现在，当帝国主义在欧洲经受着危机，那里的革命即将到来的时候，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地方给它以打击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除了许多其他因素之外，欧洲帝国主义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不排除在奴役俄国无望的情况下，抛弃中国殖民地来拯救自己的可能性。

越飞

全宗 5，目录 1，卷宗 2194，第 112 页。

打字稿，副本。

29

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

1922 年 8 月 30 日于北京

绝密

致莫斯科加拉罕

今天，我的信使回来了，带来了孙逸仙的复信^①。我通过信使把信转给您。现谈几点基本想法。孙上了这个圈套，回答了所有棘手的问题。他说，现时的中国政府没有任何意义，它完全处在列强的控制之下。他同意我的蒙古政策，即必须解决共同谈判问题，立即把我们的军队撤出蒙古对中国不利。他同张作霖磋商不太激烈，不然张会更加投入日本人的怀抱。他谈了他同吴佩孚谈判的情况，他问我们在同日本谈判时，会不会为签订条约准备牺牲中国的利益，比如说，会不会像沙皇在日俄战争后把南满转让给日本人那样，把北满也转让给日本人，包括把中东铁路转让给给他们。我认为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 同现时的中国政府还是要签订条约，如果它提出建议的话。

2. 签署议定书和 5393 号（外交人民委员部密码翻译处编号）密电所谈的总条约^②。

① 见第 27 号文件。

② 文件没有找到。

3. 要附加许多附带条件，分别向吴佩孚、孙逸仙作出说明，作为官方人物，我不能拒绝同中国正式政府进行谈判和签订条约，我乐意接受他们的提醒，并依靠他们。

4. 同日本最好不要完全达成协议，但无论如何不能出卖中国利益。

今天约我去外交部，可能要建议签订议定书，请紧急答复第5393，5394，5392号密电（外交人民委员部密码翻译处编号）。

越飞

全宗5，目录1，卷宗2194，第113页。

打字稿，副本。

3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4号记录 （摘 录）

1922年8月31日

出席：

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李可夫、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加里宁（候补委员）、斯大林同志。

中央委员：古比雪夫同志、拉狄克同志

2. 致越飞同志电

（加拉罕同志）

发给越飞同志如下电报：

“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到1920年的总宣言^①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当时中国对这个宣言并未作出相应的反应。您所提出的问题应作为共同讨论的题目，只能以同中国的总条约形式加以解决。至于蒙古，关于它的国家法律地位问题和从蒙古撤军问题应通过俄中蒙签订协议来解决。解决这个问题时，不允许排除蒙古本身。这与我们承认中国对蒙古的主权并不矛盾。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必须规定一些保证条件和主管部门在给派克斯同志的指示^②中所提出的我们的一些特权，例如，俄国、远东共和国和中国均等地参加中东铁路的管理工作。在租让企业问题上，中央同意放弃治外法权和俄国的受降权^③，但需要作出更准确的表述。所有这些让步都要求以法律上承认的形式作出回报。一旦可以在此基础上同中国政府沟通，中央认为在同日本谈判开始之前，起草一个初步的议定书是可行的也是需要的。关于同日本谈判的问题，中央同意您的建议，即从法律角度据理力争，但不搞最后通牒。”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3，卷宗310，第1、4页。

铅印稿。

① 指1919年7月25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发表的《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和1920年9月27日发表的《告中华民国政府宣言》。越飞在1922年9月27日给加拉罕、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拉狄克的信中说：“我不明白，不能从我们1919年和1920年的宣言中引出具体指示的指示是什么意思……”“当然，要某种‘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说成一纸空文，但我认为，这将是我们的对华政策的破灭，而最终则是我们全面灭亡的开始，因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推动因素，如果我们在对内政策上还交出一些重要经济阵地，那就更是如此。”“作为新经济政策的积极拥护者，我认为，把我们的对外政策用于‘商业目的’，这会造成我们的彻底垮台。”（全宗5，目录1，卷宗2145，第40页。）

② 给派克斯的指示没有找到。

③ 显然是指放弃所谓庚子赔款中的俄国份额。

31

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

（摘 录）

1922年8月31日于北京

绝密

致莫斯科加拉罕

（开始部分没有收到……^①）没有钱，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不会有所作为。鉴于中国出现的对帝国主义有利的混乱局面，外国银团不肯向中国提供资金，即使提供，也要附加一些对我们以及对正在争取民族解放的中国不利的条件。这里谈的是向中国政府提供2000万金美元担保贷款问题。虽然毫无风险，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外国银团还是不肯提供。如果我们自己能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那么，我们在全世界人们的眼里就会是中国的救星，而帝国主义的信誉会一落千丈……^②。在东方，人们对我们更多的是好感，看来，并不认为我们是强大的。这笔贷款无疑会提高我们的声誉，给予被压迫各国人民以希望，就是说，他们在这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仅在思想方面，而且在物质方面都可以依靠俄国。请政治局研究一下我们对中国的总政策问题，其中包括向中国提供贷款问题。如果同意我的观点，需派一位银行家来具体签订贷款协议……^③。中国人已向我提出成立俄中银行的建议，我要求提出具体方案。收到后再寄。

① 以下删去辨认不清的文字。

②③ 文件中为删节号。

越飞

全宗 5，目录 1，卷宗 2194，第 115 页。
打字稿，副本。

32

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的信

1922 年 8 月^① 于莫斯科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上周我们收到了你们的报告^② 和材料。我们很高兴在这里指出，总的说来，你们的工作方针是正确的。不论在宣传鼓动工作中，还是在组织问题上，你们都贴近中国年轻无产阶级的需要，这表明，你们的组织已开始走出马克思主义小组状态，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而站立起来。

在由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我签署的写给你们的前一封信^③ 中，我们曾向你们作出一些具体的和原则性的指示，顺便还建议你们把中央委员会迁至广州，那是更适于广泛合法地开展工作的地方。在吴佩孚战胜张作霖^④ 之后发生的一些最近的事件，看来对广州

① 日期是根据信的内容注明的。

② 可能是指 1922 年 6 月 30 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1921—1925），中文版第 27—33 页〕。

③ 季诺维也夫和维经斯基的信没有找到。

④ 这里指的是 1922 年 4—5 月进行的第一次直奉战争，这场战争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的胜利而告终。

政府的命运产生了影响，而孙逸仙和陈炯明之间的斗争使南方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①。因此，我们的工作中心向南方的转移，应该推迟到南方各种力量的对比更加明朗的时候。

你们发表的宣言^②和告国内民主人士书，我们认为是很成功的，我们认为，你们完全正确地掌握了旨在反对国内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民主统一战线思想。

当前你们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

（1）正确参与政治斗争；（2）巩固和扩大共产主义组织。

你们参与政治斗争，应该体现为，你们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要对国内的一切具有政治意义的事件作出反应。例如，要对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帝国主义者和中国政府代表关于将海关收入存入中国银行还是外国银行的问题的会议^③作出反应。

在这类问题上，你们当然应该通过宣传鼓动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当然要说明，你们这样做是为了同外国帝国主义者作斗争，同时要求民族资产阶级支持你们党，给予你们党，给予工会运动以合法地位和一切民主自由。

现在在中国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两个问题是：（1）消灭督军统治^④；（2）各省实行自决和在联邦制原则基础上的联合，在这两个问题上，你们应该坚持以下方针：不仅要毫无条件地赞成消灭督军统治，在自己的各种机关刊物上坚持不懈地论述这个问题，而且还要揭露政府和那些与督军统治斗争不坚决、看着某些军阀脸色行事的民族资产阶级集团和政党以及知识分子。中国的劳动群众、激进的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应当知道和感觉到，你们

① 参见第22号文件注②。

② 指的是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对于时局的主张》（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1921—1925）中文版，第16页）。

③ 这里指的是1922年3月31日至9月25日在上海召开的重新审定中国海关关税的国际委员会的会议。

④ 督军统治，即军人省长的统治。

才是中国民主制度的真正捍卫者。

对于年轻的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来说，你们的揭露将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在各省实行自决的问题上，你们当然应该支持地方进步资产阶级反对督军的斗争，为此请指示你们的地方组织同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团体一起开展宣传运动。在这个问题上也像在消灭督军统治的问题一样，你们应该揭露资产阶级在争取各省自决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不坚定性和观望态度。

你们还是应该根据条约原则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最大政党——国民党保持紧密联系，以便建立民主统一战线。你们要通过与该党领导人一起开会和直接向出身于劳动群众的该党普通党员发出呼吁的办法，打破该党领导人坚持不与你们达成协议的顽固态度。

当前，你们在工人群众当中的工作应该归结为两项任务，即（1）教育任务，通过出版关于中国现实政治问题、一般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和其他国家阶级斗争问题的小册子、传单和抨击性文章来实现；（2）组织任务，通过把中国无产阶级聚集到工会、工人互助会、医疗储金会、工人俱乐部和学校等组织中来实现。在后一个问题上，主要注意力应该放在切实把无产阶级群众聚集到上述组织中的工作上，然后再放在集中上。

你们想成立五个产业部门的中华全国联合会和三个地方工会联合会（中心），即上海、广州和汉口工会联合会，我们当然是支持的，不过我们想指出，此事可以放在将来再议，而现在要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切实组织各地工人群众上面。

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方面，你们应该坚持我们从一开始就采取的那个方针，即渗透到所有组织中去，并为我们的运动挑选真正具有革命精神的分子。当然，对青年应当给予特别的注意。

我们认为，由于资产阶级正在进行反对某些督军的斗争，对于我们党来说，现在是在军队中开展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最

合适时机。同样，现在也是在农民群众中普及宣传你们在宣言中提出的最低要求的时机。总之，在普及性小册子中应该尽量详细而全面地阐明宣言中所指出的各项要求，并在全国范围内大量散发。

请你们为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①尽量多准备一些有关中国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实际材料。我们希望，在解决你们党的纲领和策略的每一个问题时，你们能够借鉴世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多年斗争经验，同时考虑目前中国的条件。

顺致同志般的敬礼！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主任 维经斯基
与原件核对无误 秘书（拉伊戈罗茨基）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9，第 26—29 页。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

33

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

（摘 录）

1922 年 9 月 1 日于北京

绝密

致莫斯科加拉罕

送斯大林

^① 指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于 1922 年 11 月 5 日在彼得格勒开幕，1922 年 11 月 9 日至 12 月 5 日在莫斯科继续举行。

事态发展极其缓慢。现政府一直处在危机之中，但是还是坚持住了。实际上没有总理：他患了外交病，住在医院里^①。提出了一大批候选人，其中包括杨^②——对我们怀有敌意的前外交部长。吴佩孚不是按向我作出的保证更换整个现内阁，而是在干预围绕总理人选的这场斗争。在排除(?)和支持各种人选，包括支持从前他曾反对过的现任总理。我认为原因就在于，他还不能组建自己的政府，因而宁愿支持软弱的现政府。吴佩孚同孙逸仙的谈判在临近……^③ 我很希望在这之前得到您对贷款问题的答复。我认为，最好能以我自己的名义，作为个人推测，对他们说，也许我们能向孙逸仙—吴佩孚政府提供贷款。张作霖正在长城脚下，即在满洲的边境上集结兵力，看来，他是在准备新的战斗。尽管在这里难以弄清情况，我还不说出自己的意见，但是我认为，张作霖的冒险行为必然会遭到失败，因为他的这种行为纯粹来源于日本，在国内没有基础。目前还不想同张作霖争吵的孙逸仙给我写信说，张作霖所依靠的仅仅是刺刀^④。尽管国内形势很复杂，他还是在用很大精力研究俄国问题。帝国主义者仍在疯狂地进行反对我的运动。相反，我在中国人中间的声誉却在提高。明天我应邀同参众两院主席共进午餐。今天我收到了议会向政府提出的关于立即同我们谈判和承认我们的质询案。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顾维钧提议进行谈判，目的是让我正式发起，写一个与他预先协商好的照会。同他进行三个小时交谈后，我弄清了他的立场。由于他不具备同人民对抗的力量，所以他想谈判，但是他作为外交使团的忠实奴仆，不能违背后者的意愿。因此就提出了他的备忘录草案，在这个草案中我们满足中国的要求和利益，以换取类似凡

① 唐绍仪被任命为政府总理，但是他拒绝担任这个职务，由王宠惠代新总理职务。

② 即颜惠庆。

③ 以下删去辨认不清的文字。

④ 参见第 27 号文件。

尔赛式的良好许诺^①。我认为我们过早地建议就一些问题进行谈判，这是个极大的错误，因此，我严正声明，谈判只能是旨在恢复正常的关系以及解决所有问题……^②

2日我要去长春。日本人声称打算于4日召开会议^③。我期待着您对我的问题的答复。我认为，在从法律上承认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问题上，日本人甚至连口头上的让步也不会作出。我注意到，同日本的谈判将是一个先例（?），而我们的让步将会在东方造成很坏的影响。我认为，我们应该对被压迫的各国人民作出让步，而不是对帝国主义作出让步。在财产问题上要坚持热那亚的立场^④。

越飞

全宗5，目录1，卷宗2194，第116、117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指1919年6月28日的凡尔赛和约。

② 1922年9月2日越飞照会顾维钧，表示俄方同意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于1919年和1920年发表的两次宣言的基础上，就俄罗斯联邦和中国共同感兴趣的所有问题开始举行谈判。（参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5卷，莫斯科1961年版第566—567页。）

③ 见第26号文件注（本书第108页）。

④ 在热那亚财经会议（1922年4月10日至5月19日）上，苏俄代表团表示，在从法律上承认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并提供贷款的条件下，准备讨论为原外国老板补偿被收归国有的财产的形式问题。

34

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

1922年9月4日于北京

绝密

致莫斯科加拉罕

送斯大林

美国原驻中国公使芮恩施，后来转而为中国效劳，现在对自己的政府和这里的帝国主义者持反对态度。他是一位中国通，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他真诚地相信，我们的政策是无私的；他经常来访问我，并试图使我相信，在这里需要有信心和耐心。今天芮恩施向我证明说，由于中国的内乱，现政府没有钱，外国银团只有在更加苛刻的条件下才肯提供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过不长的时间就会破产，到那时张作霖就会以支持政府为借口而向北京进军，并且必然会与吴佩孚发生冲突。在这种时刻，列强诸国就会声明说，中国本身显然(?)不能应付这种局面，需要拯救它。英国会坚持(?)……赋予日本这个最亲近的国家以拯救的权力^①。日本军队将会整顿秩序，处在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将会滞后几年，而现在正如日中天的民族发展趋势将会渐渐消失。孙逸仙与吴佩孚达成协议会导致中国国民政府的成立，孙逸仙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危险性，他直截了当地声明说，在这种财政状况下他不去北京。现在，谁向中国提供资金，又不奴役它，并

^① 原文如此。

使现政府能平静地存在哪怕几个月，谁就拯救了中国。芮恩施说，他认为，能够这样做的唯一力量是我们。他建议我们通过某个银行或专门组成的财团直接与总统而不是与总理签订条约。我们每月提供200万美元，这样就把这笔钱拨给议会，然后再分给这个部多少，那个部多少，等等。这后一种做法，是为了避免将这笔钱花在国内武装斗争的需要上。我们要拨款10个月，所以总共是2000万美元。10个月之后，中国开始每半年支付给我们7—8%的年利率。三年或四年后中国开始偿还我们的本金，为了确保偿还，财政部在收到每一笔贷款后，要给我相应数额的债票。但是，迄今为止的通常做法是：用于非军事目的，并不要求作出可能造成新的依附关系的保证。芮恩施补充说，如果我们自己想得到贷款而害怕公开扮演互相贷款人角色，那么可以不让世人知道谁向银行或财团提供这笔钱。据我判断，我认为芮恩施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此外我还认为，通过这种在我看来应该完全公开的行动，我们不仅在中国人民的眼里仍然是他们的救星，而且还会取消帝国主义的最后立足之地。只是我认为，不应该与现在的总统和总理^①签订这种条约，我认为，如果孙逸仙和吴佩孚一起组成政府或提出上述贷款数额，那就必须告诉孙逸仙。我已经通知，一有可能，我就派格克尔去见孙逸仙。哪怕有一点点可能性，我都恳请给予中国上述贷款，并允许我向孙作出这个许诺。

越飞

全宗5，目录1，卷宗2194，第119、120页。

打字稿，副本。

^① 中华民国总统为黎元洪，王宠惠代行总理职务。

35

俄共、(布) 中共政治局会议第 25 号记录
(摘 录)

1922 年 9 月 7 日于莫斯科

出席：

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李可夫、加里宁（候补委员）同志。

中央委员：拉狄克同志。

4. 关于给中国贷款问题
(加拉罕)

责成加拉罕同志答复越飞同志，中央对越飞同志的建议表示十分惊讶，越飞同志本该了解苏维埃共和国的财政状况。

中央书记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311，第 1、5 页。

铅印稿，无签字。

36

越飞给孙逸仙的信

1922年9月15日于长春

亲爱的博士先生：

我很感谢您的很有意思的信和对我的问题^①作出的明确而全面的回答。

很抱歉，我作为我国人民和政府的正式代表，不能同中国官方政府打交道。

尽管我一直在注意您的劝告：不与现政府打交道并且等待您建立自己的政府，但是当顾维钧部长开始与我讨论关于即将举行的俄中谈判问题时，我是不能拒绝的。

此外，我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认为，鉴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现在的这种情绪——坚决要求自己的政府开始同俄国进行谈判并与之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如果我拒绝就此问题举行谈判，那么，群众就会不理解，并且会造成很坏的印象。

然而，在同顾维钧先生谈判的时候，我清楚地意识到，您对现政府的评价是何等的正确，该政府对外国列强的依赖实际上达到了何等程度。在讨论我们应该就开始谈判问题所要互换的照会时，顾维钧先生竭力回避对可能引起“列强”不满的各种问题的任何暗示，也就是回避涉及到承认苏维埃俄国问题、中国民族解

^① 见第27号文件。

放斗争和我们各民族人民情绪的任何话题。现在这些照会都已发表，您自己可以判断它们是何等的苍白无力。

我坦率地说，由于我认为俄国不能放弃解决所有问题，包括恢复它与中国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问题，所以我担心，与现政府的谈判不会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根据我对中国形势所作的分析，我还觉得，您同吴佩孚联合并一起建立中国中央政府，对中国来说，这是最好的联合。我觉得，为了确保张作霖承认和支持这个政府，应该恢复他的一切称号、官职和官衔。我还觉得，张作霖会同意这样的条件，这样一来，这个政府实际上就统一了全中国。我毫不怀疑，俄国愿意全力促进中国的民族统一和摆脱世界帝国主义的羁绊，它一定会给予这样的中国政府以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我还在想，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俄国在国际间又占据了实际上它应占据的位置，此外，它又是一个把所有为自己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而奋斗的人民和国家联合在其周围的核心，这样的政府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阴谋是不会感到畏惧的，这些列强不仅企图保留由他们套在中国头上的枷锁，而且还想给它套上新的枷锁。

我有幸告诉您，我一弄清俄日谈判的可能性后，就采取了各种措施，要预先同中国协调一致，我正是为此目的提前来到了北京。

我已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在与日本谈判过程中，我打算回避一切可能涉及到中国利益的问题。我还指出，鉴于中国的利益与日本的权利交织在一起以及我对情况了解不够，我可能会无意中犯错误，因此，我请中国政府在俄日谈判期间通过某一位可靠的人士同我保持密切的联系。中国政府派来了列诺克斯·辛博寿先生，我现在与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我国政府从来是坚决反对把中国划分成势力范围的，并且永远不为自己谋求这种势力范围。鉴于某些条件，俄国在中东铁路

及其所谓的隔离地带拥有特殊的利益，我不怀疑，在即将举行的俄中谈判过程中，这些利益将会得到中国的理解并给以满足。

但是，当然谈不上，俄国会承认日本在北满拥有什么特权。沙皇政府由于战败曾不得不对南满作出这种承认。但是，第一，我们不赞成沙皇政府那种靠损害别人利益而达成协议的帝国主义政策，第二，苏维埃俄国并没有输掉任何一场战争，而是打赢了所有战争。

俄国现在不是处于可以向任何人作出它自己都不能接受的让步的境地，更何况是向日本作出让步。在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我们决不会作出哪怕稍微损害俄国及中国利益的任何妥协。

我现在秘密地告诉您，目前我们与日本的谈判正处于如下状态^①。

在交换代表权时弄清了这样一点：日本代表被授权只同远东共和国进行谈判和签订条约，而俄国的参与只是被理解为见证人的角色，只能在日本与远东共和国协议中的那些涉及俄罗斯联邦领土的决定上签字作证。我们在答复（副本附后）中坚决拒绝了这种谈判。

日本代表团在请示自己的政府后又建议，在日本和远东共和国之间举行谈判并签订条约，然后再就签订俄罗斯联邦和日本之间的贸易条约举行谈判。我们也拒绝了 this 建议，并且指出，远东共和国不想同俄罗斯联邦进行任何谈判和签订任何条约。这时日本提出这样一个综合性建议：同俄罗斯联邦及远东共和国一起进行谈判，并以俄罗斯联邦和远东共和国为一方，以日本为另一方签订条约，但是该条约的适用范围只限于远东共和国和日本的领土，在达成这一协议之后，再开始同俄罗斯联邦就涉及其全部领土的问题进行谈判。

^① 越飞通报了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远东共和国和日本代表团在长春谈判的进展情况。

因为在这里日本已经放弃了与远东共和国单独达成协议的念头，这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承认这一建议原则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由于俄罗斯联邦和远东共和国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经济联系，这一建议实际上是难以实现的。目前实质上是在就未来条约的一些条款进行谈判。

最后我还要秘密地告诉您，张作霖还在奉天，为了建立联系他向我这里派来了自己的代理人。遵照您的劝告，我没有拒绝与他们联系，甚至没有拒绝同张作霖本人见面，但是我要强调指出，鉴于我国政府所奉行的旨在支持全中国统一的政策，我不能就满洲问题进行单独谈判，我只能同中国官方政府进行谈判。

我提醒您注意，据我所知，俄国的白卫分子正在从被日本人清洗过的俄国领土上向北满流窜，这种情况当然会导致俄中关系的复杂化。因为俄国不能允许在北满建立新的白卫分子据点，就像以前对蒙古所做的那样。

这封信将由我的军事顾问、前陆军军长和全俄参谋学院院长格克尔先生转交给您^①。

请您对他持完全信任的态度，并十分坦率地同他讨论需要告知我的一切您所感兴趣的问题。

我坚信，我的这封信会密切我们的关系和巩固我们之间的联系，我期待着您的回复，向您深表敬意。

全宗 5，目录 1，卷宗 2144，第 262—267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① А·И·格克尔(1888—1938)，1920至1922年任第11军军长(巴库)和高加索独立军军长(第比利斯)，1922年任工农红军军事学院院长，1922年至1925年任苏联驻华代表处武官——译者。

37

越飞给马林的信

1922年9月18日于长春

亲爱的马林同志：

对您的第一封信^①我未能立即回复，因为没有可能派人去上海；而邮局我又不很信得过。

现在我（按照您的劝告）派格克尔去见孙逸仙，并由他向您转交这封信。

格克尔带有给孙的信^②；给您附上了复制件。因为格克尔可能没有翻译，所以我希望，您为他提供同孙交谈的可能性。

从我给孙的第二封信中您会看到，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孙和吴一起组建政府并与张作霖和解，至少要让张作霖承认和支持孙逸仙—吴佩孚政府。请您支持我的这一政策并向孙作出解释：这样的政府不仅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指望得到整个共产国际的支持。我认为，成立这样的政府是当今中国政治的最重要方面。

格克尔同志离开孙后要去见吴佩孚——也带着我的信^③。详细情况我会告诉您的。

很抱歉，我是不能没有伊万诺夫教授的，我这里没有可配给

① 可能指1922年8月22日马林给越飞的信。

② 见第36号文件。

③ 见第38号文件。

格克尔的别的翻译。在这件事上您应该帮助他。

至于日报问题，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但是，很遗憾，同志们已经收到了2000墨西哥元。应当尽一切可能，不让这笔钱白白花掉。

我这里的钱也很少。但我将尽可能地支持你们的周报^①，以及您对11月7日的整个筹备工作和其他事项。

格克尔同志将把共产国际执委会拨给的3000墨西哥元交给您。请关照一下，让我能收回这笔钱。《上海生活》^②要停办。我想在上海创办一个英文周报^③取代它。我把停刊和创办英文周报之事托付给您、列昂尼多夫和诺维茨基。恳请您不要拒绝这项任务。

极为重要的一点是，让孙给国民党的议员下达一个经常在议会里提出俄国问题的任务。请您向他提出此事。

格克尔可以向您通报您所感兴趣的一切问题。

我打算明年春天去南方一次。对此您有什么想法？如果您能来我这里讨论我们的问题，那太好了。您可以离开上海两周。

祝您成功。我的妻子向您致意，孩子健康。

顺致党的敬礼！

全宗514，目录1，卷宗985，第12—14页。

德文手稿，无签字。

① 指中国共产党的《向导》周报，第1期于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出版，并一直出版至1927年7月18日。

② 《上海生活》为日报，1919至1922年在上海出版。

③ 指《New Russia》（《新俄罗斯》）周报，1922至1923年在上海出版。

38

越飞给吴佩孚将军的信

不晚于1922年9月18日于长春

将军先生：

我又冒昧地派您所认识的格克尔去见您。

我想就您和我都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向您说明我的观点和我的做法。

1. 我曾期待，按照您对格克尔先生所作的声明，在北京将成立新的政府，但是根据报纸上的报道，我得到的印象是，您只是对现内阁的人员组成作了某些变动，而总的说来，您还是保留了原内阁，并没有组建新政府。

在目前的严峻形势下，您还不想采取坚决的措施，从这方面来说，我理解您的这种策略。但是由于我作为俄国的官方代表不能拒绝同中国官方政府打交道，所以我不得不与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顾维钧先生就即将举行的俄中谈判问题进行会谈。

我个人觉得，只有您与孙逸仙先生一起建立的政府，才是唯一能够使中国摆脱严峻局面和建立统一而独立的中国的政府。这个政府完全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全面支持，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俄国竭力促进它的民族统一和使它摆脱帝国主义的桎梏。同时我还深信，最近俄国实际上又占据了它在大国当中应占据的位置，在它的强有力支持下，这样的政府能够实现上述任务。

同时我并不抱有这样的希望：中国现政府在受外国人左右的

情况下能够将同俄国的谈判进行到底并取得理想的结果。

2. 由于这个缘故,我想提请您注意这样一个情况,即所谓蒙古问题现在已经是修复我们友好关系的严重障碍,而且如果继续执行现时的错误政策,还将是谈判时的一大障碍。

我在上一封信^①中已经指出,从蒙古撤出我们的军队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您在这个问题上,同意我的意见,使我感到荣幸。

所有帝国主义者为了替自己在中国所推行的侵略和强暴政策作辩解,都竭力利用蒙古来攻击我们。遗憾的是,中国社会上的某些人士在上帝国主义者和中国人民的敌人所精心设下的圈套,而不去反对外国军队在北京的驻扎,不去反对把中国划分成势力范围的做法和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不能允许的类似行动,却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抗议指向俄国军队在蒙古的驻扎上。

据报纸报道,曹锟元帅向北京发去了这样的抗议书。议会在关于必须同俄国开始谈判的决议中也谈到了从蒙古撤走俄国军队的问题。

所有这一切实际上只对帝国主义有利,因为在当前这个时候把我们军队撤出蒙古,就会导致张作霖去占领它,而通过张作霖外国列强也会去占领它。

因此,我认为,立即停止这种运动完全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

3. 同时我还想向您指出一个将会严重妨碍修复俄中友好关系的情况。

据我所掌握的确切消息,张作霖同季特里赫斯^②有某种协议,并从他那里得到武器,而白卫匪帮正从日本人撤出的地区向满洲

^① 见第24号文件。

^② M·K·季特里赫斯,远东地区反苏维埃运动的组织者之一,1922年底逃亡国外——译者。

流窜。

您当然明白，俄罗斯是不能容忍在这里建立白卫分子据点的，就像当年不能容忍在蒙古这样做一样。

看来，张作霖希望就此事同我进行谈判。即使我不能拒绝与他私下会面，我也绝对不认为，可以抛开其他中国问题，只就满洲问题进行谈判，就像我不认为可以不同中国官方政府进行谈判一样。

因此，满洲问题及其所有枝节问题，必须在即将举行的俄中会议上加以讨论。

这里所提及的问题的详细情况，以及同日本谈判的全面消息，格克尔先生会向您报告。

我再一次表示愿与您保持经常的友好的联系，尊敬的将军先生，我向您深表敬意并祝您很快取得成就！

您的

全宗 5，目录 1，卷宗 2144，第 286—289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39

马林为格克尔同孙逸仙 的谈话所作的记录

1922 年 9 月 26 日于上海

1922 年 9 月 26 日格克尔同志与孙逸仙博士的谈话。在孙的

寓所。

(来自《上海生活报》的)古尔曼当翻译。在场的还有西蒙同志——(马林)。

孙逸仙说,总的来说他同意越飞同志第二封信中的观点^①,对这封信提不出什么问题,随后格克尔同志请孙逸仙谈一谈,孙博士现在想讨论哪些军事问题。

孙回答说,第一,要谈一谈关于俄国准备支持他实现中国统一的原则性问题,第二,关于俄国可以用什么方式来援助他的问题。

格克尔同志表示了这样一种意见,俄国原则上准备帮助中国的统一事业,毫无疑问,俄国认为孙逸仙是能够实现这种统一的人。正如越飞同志已经指出的,最好与吴佩孚联合并尽一切可能防止爆发新的内战,因为内战会导致外国列强的进一步干涉,也可能导致对北京的占领。

孙逸仙说,这种干涉是很有可能的,但是他认为,防止吴佩孚和张作霖之间爆发新的战争是不可能的。他预料,这场战争的胜者将是张作霖。

格克尔同志说,他本人见过吴佩孚的军事组织,他认为,吴佩孚的军队要比张作霖的军队强大得多。当然,他无法判断吴佩孚的经费是否够用。吴佩孚对孙逸仙很有好感并且同意成立在孙逸仙领导之下的政府。他认为吴佩孚是为中国的统一和独立而奋斗的民族主义者。

孙逸仙认为有必要分析一下吴和张这两个对手的特点。吴佩孚是个中国老学究“Scholar”。让他对新思想感兴趣是不容易的。他是个“成品”,而土匪张作霖是个可以进行加工的“原料”。认为他只是日本人的工具是不对的。有实例证明,他在实行自己的

^① 见第35号文件。

政策。他虽然没有文化，但是个聪明人。吴佩孚依附于英国和美国。他不止一次地欺骗过中国人，所以孙逸仙特别怀疑，现在能否认真对待他对俄国作出的友好姿态。毫无疑问，他具有反日情绪，但这时他可能不自觉地充当了英美资本主义的工具。吴佩孚的胜利也就是英美的胜利。

格克尔同志说，他再和吴佩孚交谈一次并明确向他说明，俄国人只有在他完全摆脱英美影响的情况下才能支持他。他试图让吴佩孚相信有必要同孙逸仙合作。吴佩孚已经知道，俄国把孙逸仙看作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张作霖现在只表明，他在同苏维埃俄国的所有敌人进行勾结。满洲是日本的一个省。在那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日本人，往往发现不了张作霖的存在。张作霖虽然现在与季特里赫斯将军没有联系，但是他在同俄国的君主主义者合作。俄国不能静观满洲成为第二个蒙古，不能静观那里新的温格伦人得到支援来进攻俄国。

孙逸仙为改变张作霖的政策已经忙碌了一阵子。他现在又派代表去奉天，要说服张作霖，使他相信，应当把新俄国看作是中国的的朋友。如果不能说服张作霖，那么孙逸仙就要反对张作霖。另一方面，俄国的代表应该向吴佩孚说明，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不可能使中国走向统一。如果能唤起吴佩孚对中国实际状况的正确理解，并向他说明，中国只不过是大的殖民地，那么，这就是不小的成绩。我们希望能做到这一点，那样就能与吴佩孚合作。

中国终究能统一，孙博士确信这一点。但是，只靠自己的力量，他就不得不为此进行长期的斗争。外国列强在阻挠统一。我们需要一个支持统一的朋友。这个朋友只能是俄国。他想要在西北边境地带或土耳其斯坦组建自己的军事力量，并可以从俄国得到武器弹药。那里粮食是有的，只是交通非常不便。无论如何应该组建这支独立的力量。吴佩孚和张作霖之间的战争结束之后，就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即使不发生这样的战争，也必须建立这样

的组织。在南方的广东、江西、广西、贵州、云南和四川等省，孙逸仙还是有军事组织的，但是他们装备很差。俄国是否帮助他在西部（西北部）组建这样的武装力量呢？

格克尔同志举出土耳其的例子。在那里，不同信仰的民族主义者一起反对外国侵略者。他本人去过那里，参加过斗争，他很了解那里的条件，因此他知道，凯末尔现在的胜利^①就是俄国的胜利。常常可以听到贫穷的俄国不能援助别人的说法。土耳其证明，这种说法是多么荒谬。不过首先必须实现民族主义力量的联合，然后才需要在俄国的帮助下组织对资本主义列强的有效反抗。

孙逸仙博士强调必须组建独立而可靠的武装力量。即使达成妥协，因而现时的各种力量能够暂时实行合作，那也应该考虑到，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俄国能为这样一支革命军队提供交通工具、弹药和武器吗？有三条联络路线，最长的但也是最可靠的路线是经过土耳其斯坦。这样的力量就是在南方也能克服联合道路上的障碍。他说明了他的武装力量在南方各省是如何分布的。如果他的观点原则上可以接受，并且越飞同志将这个情况告诉他，他就派自己的一名军事专家去长春和格克尔同志一起为莫斯科制订一个计划。他问，俄国能否援助飞机，俄国是否制造飞机，是否有汽车，有何种火炮，是否有许多机枪，等等。

格克尔同志同意在长春进行更详细讨论的想法，并指出交通运输是很复杂的，他谈到给土耳其的援助、红军现在的实力、在军队中开展宣传工作的必要性。

孙逸仙在地图上指出，为提供援助可以利用哪些路线。

格克尔同志问，是否可以在他和孙逸仙驻洛阳代表之间建立联系。那样他们就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

孙博士说，最好是分别做工作。其实可以遵循同一个计划，不

^① 指1922年8至9月以凯末尔（土耳其之父）为首的土耳其军队打败希腊军队的战争。

必进行讨论。不过他不反对把自己的几页纸交给格克尔同志。他还要给越飞写一封简短的回信^①，但是他请格克尔同志多费心，让越飞同志得到准确的通报。

Г·М·^②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985，第 20—22 页及背面。
德文手稿。

40

吴佩孚给越飞的信

1922 年 10 月 12 日于洛阳

湖北和湖南两省总督吴佩孚的信

越飞代表先生：

您的顾问的到来和您这封来信^③的内容使我非常感动。

虽然我精力充沛并已完全做好准备，但是由于各种干扰和一些内部问题，我无力为实现共同的愿望而确立业已拟定的计划。

实际完成这项工作已不可能，这使我深感痛心。

尽管有许多障碍，但我没有丧失信心，消除障碍的一天总是会到来的。

① 此信没有找到。

② 即马林。

③ 见第 38 号文件。

我相信，只要双方努力履行各自的义务，就能实现他们所追求的目标。

我委托您的顾问^①亲自向您转达我在信中未讲到的事情。
顺致问候并祝康泰！

吴佩孚（印）

全宗 5，目录 1，卷宗 2144，第 290 页。

打字稿，副本。

41

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 （摘 录）

1922 年 10 月 17 日于北京

绝密

致莫斯科契切林
送政治局、斯大林。

我仍然被迫卧床。健康状况很不好，医生们坚持让我进行疗养院治疗，我不能执行医嘱，因为我不在就没有人工作，我虽然生病但仍在同外交部和中东铁路管理局作斗争。顾^②甚至在一些小事情上仍然奉行一种粗暴的敌视方针。10 月 10 日，即中国革命节^③那一天，外交部邀请了所有白卫分子，但没有邀请我。顺便

① 指 A·H·格克尔。

② 即顾维钧。

③ 1911 年 10 月 10 日在武昌爆发了武装起义，奠定了辛亥革命的基础，推翻了满清王朝，宣布成立中华民国。

提一句，11月7日，不必邀请中国代表，并要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样做是因为中方没有邀请我出席中国节日活动。现在仍在利用蒙古问题。外交部针对我的答复发出的备忘录，通过信使寄给您。我还是认为，我能够在最近几天内让顾维钧垮台。只不过任何一个别的中国外交官也不会比他好。因为所有这类中国人都完全处在这些或那些帝国主义列强的影响之下。所有帝国主义列强都在孤注一掷地反对我们。我坚持要求中方任命一位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外交家当外交部长。但这是不能实现的，因为所有民族主义者都拒绝出任这个职务，他们怕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时候为外交政策承担责任。孙逸仙与吴佩孚的斗争，以及他为了加强自身力量同张作霖的调情使局势变得复杂了……。孙逸仙的基本立场是：只能用军事力量来完成中国革命，因此他——孙逸仙需要强大的军队，失去广州后，他必须建立新的基地，从那里出发他就能夺回广州，继续发展。因此，他先在福建省活动，尔后又是在四川省活动。他在福建省取得一些重大成绩，所以他能继续向广州发起攻势。孙逸仙的这种立场也使得我们必须利用中国的一派军阀反对另一派军阀，不让他们当中的任何人特别强大。最后，由于这个原因，孙会继续提出计划，让我们帮助他在东土耳其斯坦或蒙古的某个地方组建一支精良的革命军队。他已向我提出了这个要求……^①我试图使他相信，他的政策是有缺点的。第一，在当前的局势下，他削弱吴佩孚，就是削弱正在进行民族斗争的中国，所以最终也就是削弱他自己。第二，支持张^②，实际上就是支持我们的敌人，给俄中友谊增加困难。第三，总是处于准备革命的状态，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孤立起来，脱离了正在发展的革命形势。我讲的这些理由看来正在起作用。孙逸仙承诺，如果张不与白卫分子决裂，他就与张决裂，并准备与吴佩孚妥协，眼下只是没有对我的下述建

① 以下删去辨认不清的文字。

② 即张作霖。

议作出特别的反应：停止对北京政府的实际抵制并积极参与解决议会和内阁的危机，以期建立一个更亲近孙逸仙的北京政府。我反正还没有收到 C^① 的任何指示。孙逸仙要求帮助他在东土耳其斯坦或蒙古组织革命军队，我需要了解您对他的要求的态度。同时我正在进行大量反对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工作，目的是把该管理局彻底搞臭，使得法国不能为其提供援助。奥斯特罗乌莫夫及该公司的大量舞弊行为已被揭露。法国拟议给予该铁路的贷款，也如同该铁路发行的债券一样，由于这场宣传鼓动而告吹。奥斯特罗乌莫夫已向法国法院控告几家在我的授意下刊登过材料的报纸。该铁路的中国理事会开始向我暗送秋波。由于法国的干涉，俄罗斯亚洲银行惊慌不安起来。一场严肃的斗争正在展开。我需要尽快得到有关中东铁路及俄罗斯亚洲银行历史的全部资料。我们是否拥有中东铁路的股票，或者哪怕是关于中东铁路的书籍，或者最后，是否有活的证人，能够证明俄罗斯亚洲银行对中东铁路的态度一向是虚伪的？请尽快将您能找到的有关中东铁路和俄罗斯亚洲银行的一切材料寄来。当我能从床上爬起来时，我就得开始进行谈判，否则会重演与日本谈判的历史，即完全缺少指示。由于生病我未能写完关于同日本谈判情况的小册子。

越飞

全宗 5，目录 1，卷宗 2194，第 141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可能指斯大林。

42

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

（摘 录）

1922年11月1日于北京

绝密

致莫斯科契切林

送斯大林。复第91号电。

迄今为止我在这里的全部工作是设法利用吴佩孚、张作霖和孙逸仙之间的对抗，我虽然与吴佩孚和孙逸仙有联系，但并没有向他们作出任何保证。不过需要记住的是，中国的所有这些个人联合是不断变化的。重要的是，吴佩孚同孙逸仙的接近是很可能的，而前者的影响几乎又是无限的。现在，由于孙逸仙支持者、安福派分子和张作霖支持者在福建省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吴佩孚的影响被大大减弱了，孙逸仙同安福派和张作霖的接近就更加可能了。这又是为什么认为更为重要的不只是在这些个人联合中寻找支持，而是在广泛的群众性民族运动中寻找支持的一个原因。我恰恰担心，我们对俄中蒙三方会议提出的要求会给群众造成不好印象和使他们疏远我们，即使我们利用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能实现我们的要求。我认为，在蒙古方面，尖锐的问题仅仅是把我们的军队从库伦撤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吴佩孚、孙逸仙和人民群众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在俄中会议上直截了当地用某种表达法确认，我们的军队原则上是要撤出的，但是撤出的期限不能确定，因此，军队要留驻到将来。在即将举行的会议上提

出全部中蒙问题，我认为是不必要的，也是危险的，因为尚不清楚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需要转告的是，正是吴佩孚对我说，他打算在1923年3月派自己的军队去占领外蒙古，并让格克尔参观了正在为此目的作准备的一个久经沙场的师团。我的计划是，如果会议顺利结束，我们的声誉和对我们的信任将会大大提高，我们将不怕帝国主义者**在蒙古问题上搞反对我们的一切煽动宣传**，因为中国大多数人支持我们对涉及我军撤出部分(?)的上述不全面解决办法。在谈判期间及其后，弄清了**中国民族主义者**在整个蒙古问题上的态度。提出这个问题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按照吴佩孚想派自己军队去占据蒙古的愿望，在1923年3月由吴佩孚提出，那时一切条件都好弄清楚，我们当即就可以拟定我们的立场；或者由于中蒙进行谈判而早于1923年3月提出，那时也好弄清楚，我们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对谈判施加影响，至少可以根据情况要求吴佩孚参加这次谈判。我不了解蒙古情况并很怀疑整个蒙古是否会跟我们走。关于谈判情况，中国人对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正如我已报告的那样，我回避同他们谈这样的问题，我只是说，我们没有侵略意图，没有帝国主义的企图，原则上我们准备撤走军队，但是现在不能这样做，也不能说明怎样做。在整个这件事情上，除了中国政府，确切地说除了处在帝国主义者影响下的外交部，所有人都同意我的意见。所有中国报纸都对中蒙谈判作了报道。(待续)^①。

越飞

全宗5，目录1，卷宗2194，第159—160页。

打字稿，副本。

^① 续电没有找到。

43

孙逸仙给越飞的信

1922年11月2日于上海莫里哀路29号

我亲爱的越飞先生：

我应该向您表示祝贺，贵国政府从西伯利亚清除白卫分子和日本军队的努力已收到很大成效，日本人完全撤出海参崴和红军进驻该城值得庆祝。

从我们最近一次交换信函时起，我就同吴佩孚进行了接触，试图弄清在统一中国和建立强大而稳定的政府方面同他合作的可能性。很遗憾，我不得不指出，与他打交道确实很困难。我所掌握的情报使我认定，他现在对我的态度实际上很强硬，原因是，他指望一旦同张作霖发生冲突，能预先得到贵国政府的军事援助。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人之间发生冲突，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俄国都是极为有害的。

显然，如果吴佩孚在他和张作霖发生冲突时得到俄国的帮助，那么，张作霖很可能就会求助于日本。这还不算完，大不列颠、法国和美国肯定都会了解到这些情况，它们有可能受到真正的邀请来进行干预，因为这几个大国对贵国政府及苏维埃制度持明显敌视的态度。其后果对中国来说是不堪设想的，并且完全有可能导致白卫分子在您最困难的情况下恢复反苏维埃行动，如果日本得到其他列强的准许和邀请来援助这种进攻行动，那就更会是这样。

这不是游手好闲的投机生意，只要您停下来注意观察一下资

本主义国家对你们俄国制度敌视的广度和深度，您就会发现这一点。这又是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尽管目前在日本较自由的派别中间确实存在着反对军国主义的倾向，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会马上利用这种有利局势来恢复对人们思想的控制。自由派之所以能够击败日本在西伯利亚推行的军国主义政策，是因为这种侵略政策不可能用迷彩加以伪装。你们如果站在吴佩孚一边对中国进行干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可以把自己的政策伪装起来，并与你们开战。在这场战争中他们会得到列强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而你们会作为侵略者出现在中国，以至我都无法否认这一点。

由于这些原因，我怀着某种恐惧的心情获悉，贵国政府打算向北满派驻军队，似乎是为了保持或维护俄国在中东铁路上的利益，而实际上，正如我所推测的那样，是为了在明年春天帮助吴佩孚向张作霖发动进攻。

我应该指出，为了消灭张作霖，苏联向吴佩孚提供这种帮助，必然含有利用这种援助来反对我的可能性。我难以想象，贵国政府希望或有意把我看作是敌人，或者帮助任何一个能把我看作是敌人的人。

我认为，您对张作霖持否定态度，是因为你怀疑他是日本代理人和他关照白卫分子，或者是他多少倾向于允许白卫分子在满洲土地上搞反对贵国政府的阴谋活动。但是我能够使他作出令人满意的承诺，即今后他将基本上奉行我对贵国政府的政策。实际上我已经采取措施使他毫不含糊地意识到，我与他合作的条件之一就是必须赞同我对俄国的政策。

我丝毫不怀疑，贵国政府如果与我一起行动并通过我采用外交方式，而不是与吴佩孚一起行动并通过吴佩孚使用军事援助和武装力量手段，是能够从张作霖那里取得在理智的范围内为保证苏维埃俄国的安全所需要的一切的。

至于吴佩孚，我很想与他合作。但是，以我同那些仍然忠于

我的统一国家计划的老朋友的决裂为条件的合作，我是不能同意的。吴佩孚想让我抛弃张作霖作为对与他合作的一种酬谢。这样的行动方针我是不能接受的，更何况张作霖准备同意进行有所有领导人参加的全国性协调活动。

最后我应该提请您注意两个事实：

（1）我发现与吴佩孚打交道是困难的，因为他认为，一旦与张作霖和尔后与我发生冲突时，似乎他可以指望得到苏俄的帮助。

（2）只要与我一起行动或者通过我，贵国政府就能从张作霖那里得到管理国家的高超艺术所需要的符合非帝国主义俄国利益的东西。

我请您把这封信转给我们莫斯科的朋友们，特别是列宁、托洛茨基和契切林。我正在就此问题给契切林写一封详细的信，但是在给他们的信寄出之前我很想了解您的意见。如果，正如报道的那样，莫斯科正在讨论派遣苏军去北满问题的话，那么，我是否还可以请您把该信的基本内容^①电告莫斯科？

请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您忠实的 孙逸仙

全宗 5，目录 1，卷宗 2144，第 268—270 页。

英文打字稿，副本。

^① 见第 46 号文件。

44

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

(摘 录)

1922年11月7日和8日^①于北京

绝密

致莫斯科契切林

送斯大林

我已经报告过，孙逸仙的亲密助手张继在这里时，我曾与他多次谈到孙逸仙的策略，并指出其缺点，主要是消极性，不参与全国性事务，单纯准备武装革命，对组织群众工作注意不够。我曾请马林向孙逸仙转达同样的意见。现在马林从上海报告他同孙逸仙的谈话情况^②。孙逸仙怀疑吴佩孚没有诚意，而吴佩孚鉴于孙逸仙与安福系分子和张作霖有来往，对孙逸仙也持同样的怀疑。孙逸仙对福建没有什么要求，但是他认为，吴佩孚应该把这个省让给他……^③现在，当那里的军事胜利在孙逸仙一方时，他想与吴佩孚和解，但后者执意不肯，而在以前恰恰相反。孙逸仙感到很难堪的是，吴佩孚的朋友、内务总长孙丹林曾通知他说要去上海，但根据吴佩孚的命令而未能成行。孙逸仙没有指望与内务总长达成协议，后来根据我的建议，他要亲自去北京积极参政，现在他决定派他的最亲密助手张继来北京同我保持经常联系。我将坚持

① 该电报于1922年11月7日和8日分两次拍发。

② 马林的信没有找到。

③ 以下删去辨认不清的文字。

让他亲自来北京，我要努力使他与吴佩孚和解。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说服孙逸仙进行积极的政治活动，干预北京的事务。第二，关于蒙古问题，孙逸仙说，他根本不反对我们军队在库伦驻扎，但是他坚决反对蒙古代表单独参加俄中会议，反对蒙古独立。孙逸仙声明说：“如果现在支持蒙古自治的思想，那么，自治分子在中国的地位就会大大加强。”目前，当中国统一的问题变得更现实时，这个问题应当暂缓解决。马林自己补充说，决不能因为200万蒙古人而损害同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关系。我正确地预见到了孙逸仙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最近几天来，议会的议员们——都自称是共产党人的我们的支持者，多次来到俄罗斯联邦驻北京使团驻地声明说：由于蒙古代表参加俄中会议，在议会中不会投票赞成蒙古自治。即便认为契切林的通报是对的，在蒙古问题上也忽略了主要的一点，即我们的世界政策。据我所知，事情并非如此，而是像契切林的蒙古特使^①所通报的那样。熟悉情况的人认为，在整个外蒙古，蒙古人很少，中国人占大多数，蒙古人和布里亚特人的关系并不好，而我们是支持蒙古人的名义在支持布里亚特人。即便假设这一切都是不对的，而蒙古所有200万居民都拥护我们，反对中国，那么，契切林的观点即使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在策略上也是不正确的。当然，我们支持小民族反对大民族的暴行，但是，如果蒙古人的斗争不会引起任何反响，而中国人的斗争却会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的话，那么就未必值得为了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作用的200万蒙古人而去损害我们同正在起着如此巨大作用的4亿中国人的关系和整个政策。在俄中会议召开期间，解决中蒙问题的唯一出路，只不过是做个姿态，而解决问题实质上要推迟到中国局势稳定和我们的关系巩固的时候。因此，我再一次请求你们同意我的计划和策略。关于满洲问题，孙逸仙说，他

^① 指1922年5月28日抵达莫斯科的图赛袞达瓦。

希望利用自己对张作霖的影响，切实不让他向白卫分子提供任何帮助。因此，他认为我们的军队进驻满洲为时尚早，并请我们暂时不要这样做。孙认为，不派进^①俄国军队，不给日本提供进行武装干涉的借口（这后一种想法我觉得无关紧要，因为日本现在未必有力量进行干涉），即使张作霖不听他的话，也可以在北方集合革命力量对张施加影响。关于在北方组建孙逸仙的革命军队问题，他现在是这样具体说明自己的计划的：孙逸仙建议，以他的名义，也就是直接指明根据他的请求，我们的一个师占领东土耳其斯坦的新疆省，那里只有4000名中国士兵，不可能进行抵抗。相邻的四川省虽然驻有10万士兵，但是孙逸仙认为，这些士兵都站在他的一边。据孙逸仙称，新疆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他认为，必须在我们军队的占领下，在那里建立俄德中三国联合公司来开发这些矿产资源，建设铸钢厂和兵工厂。孙逸仙补充说，他本人会到新疆去，在那里可以建立任何一种制度，甚至苏维埃制度。显然，他的计划可以概括为，在新疆为他组建军队开辟一块地盘，铸钢工厂和兵工厂可以提供很多物资。孙逸仙认为，缺少交通运输工具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因为新疆是个很平坦的地方。由于孙逸仙要派他的一位将军^②到我这里来秘密商讨这个问题，所以我请求告知您的意见。我认为，从政治角度来看，目前孙逸仙与中国官方立场相距如此遥远……^③在官方场合他只是一个人，我们与他公开签订协议还为时尚早。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宣布与我们断绝外交关系……那样一来我就什么也做不成，而且我们在中国的事务中只好局限于……^④东土耳其斯坦。当孙逸仙在中国政府中占据适当位置时，那就另当别论了，那时，这个问题就应该从军事和经济的角度加以

① 以下电文是1922年11月8日发出的。

② 指蒋介石。

③④ 原文如此，文件中为删节号。

考察。孙逸仙重申自己的建议说，如果俄国同意花钱让一个师进驻满洲，那么，最好还是把这笔钱用在实施他的计划上面。孙逸仙曾在日本居住很长时间，他认为，没有什么比让我们的军队进驻满洲更有利于军国主义分子了。目前的形势对军国主义分子来说是不利的，但是，孙逸仙认为，现在革命者的力量与90年代相比是减弱了一些，那个时候反革命派还是战胜了革命派，以发动日中战争开展了争夺朝鲜的运动^①，让我们的军队进驻满洲就会给日本反动派提供有力的借口。孙逸仙通报说，据他所知，日本最近的大选将会导致内阁垮台，内阁总理的职位将由孙逸仙的朋友床次竹三郎占有，到那时日本必然会与我们亲善。孙逸仙坚持认为，我们对日政策的主要倾向应该是使日本脱离美国和英国，并阻止日本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②毫无疑问，孙逸仙比我们更了解日本的局势。必须认真地对待他的意见。

越飞

全宗5，目录1，卷宗2194，第164、165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原文如此。这里指1894至1895年的中日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中国被迫放弃自己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将台湾岛、澎湖岛割让给日本，支付战争赔款。

② 以下删去辨认不清的文字。

45

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

(摘录)

1922年11月9日于北京

绝密

致莫斯科加拉罕

送斯大林

据来自上海的报告，孙逸仙最终接受了我的建议：转入积极的政治活动，参与中央政府的事务。孙逸仙授权现任总理王^①和原来的一个荷兰人^②代表孙逸仙同吴佩孚就双方感兴趣的所有问题进行谈判。我们的朋友们^③都认为，可以组建孙逸仙—吴佩孚政府。我认为，孙逸仙积极参与中央的政治活动，这是我们取得的一个很大成就。孙逸仙的最亲密战友张继（我同他在这里交谈过）告诉我，他很快就来北京（孙逸仙派他在我这里工作）并且写信说，孙逸仙坚决要求张作霖立即改变对白卫分子友好而对我们敌视的政策，同时威胁说，一旦不执行就与他彻底绝交。张继相信……（结尾错乱）……^④

越飞

全宗5，目录1，卷宗2194，第173页。

打字稿，副本。

- ① 即王宠惠。
- ② 可能是指荷兰人马林。
- ③ 见第22号文件注③。
- ④ 原文如此。

46

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 (摘 录)

1922年11月10和13日^①于北京

绝密

致莫斯科契切林
送斯大林

昨天，孙逸仙担任大总统时期的国会主席、老国民党员、孙逸仙的主要助手张继，带着孙逸仙给我的信^②来到了我这里。孙逸仙请求我把他的这封信转交给列宁、托洛茨基和契切林。要求我立即将我个人对所提出的问题的答复告诉他，为了迅速起见他还要求我将信的内容电告您并请您作出答复，尽快告诉他。我通过信使将这封信寄出。该信的内容如下：让我们的军队进驻满洲，即使以维持中东铁路秩序为借口，也会被人们认为是对吴佩孚即将发动的反对张作霖的战争的支持。我认为，我方的这种行动会迫使张作霖求助于日本。日本军国主义者由于缺乏为实施侵略计划所需要的道义上的掩饰，所以至今未能实行侵略政策^③，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则能得到这样的掩饰，因为他们也会作出反对我们进行侵略的样子，并且会再次征召白卫分子和亲自同我们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列强肯定会支持日本。这一切不仅对中国是有害的，而

① 该电报于1922年11月10日和13日分两次拍发。

② 见第43号文件。

③ 以下电文是1922年11月13日拍发的。

且对我们也是有害的。另一方面，吴佩孚的力量及其不稳定性是建立在他的这样一种信念之上的，即我们会以军事力量支持他反对张作霖，最终也反对孙逸仙。孙逸仙不能想象，对他的敌人的支持会符合我国政府的利益，如果对张作霖的不信任是基于我们这样的推测，即张作霖是日本的傀儡……^①。为实现我们在满洲的利益，我们没有必要往那里派驻自己的军队，因为据说孙逸仙将通过外交途径迫使张作霖满足我们的要求，因为他已经向张作霖声明，如果张作霖不接受他对俄国的政策，他就要与张彻底决裂。最后，孙逸仙准备为统一中国和建立强大而稳固的中央政府与吴佩孚联合，但是此举是很艰难的，这既是因为上面所说的吴佩孚相信我们对他的支持，也是因为吴佩孚提出与孙逸仙联合的条件是孙与支持他的统一政策的老朋友张作霖断绝关系。我长时间地同张继详细交谈过，张继直言不讳地说，统一中国的政策能否成功只是取决于我们，这一历史时刻已经到来。张继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孙逸仙很想与吴佩孚联合，孙逸仙没有与张作霖签订任何书面协定，如果蒙古自治和我军进驻中东铁路是与中国协商的结果的话，那么，不论孙逸仙还是他的党都不会反对。他们只是不能允许我们去帮助吴佩孚反对张作霖。吴佩孚相信，似乎我们会从军事上支持他反对张作霖，那我应该怎样使他相信他的这种信念是不对的，而我又不能直接对他说明这一点？在回答我这个问题时张继说，只要我把这一点告诉孙逸仙，就足够了。

今天张继就要返回中国^②。我交给他一封给孙逸仙的信，该信的俄文稿我通过信使寄去。我对他说，我们一直很清楚，只有孙逸仙是我们在中国的唯一朋友，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去做反对他的事情，同样我们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从来没有想过用军事力量去支持吴佩孚反对张作霖。但是作为官方人士，我必须与中国的中央

^① 以下删去辨认不清的文字。

^② 显然，是返回上海。

政府打交道。该政府反对俄国，履行帝国主义者意志。为了对它施加影响，我必须利用那些出于某种缘故对我们友好的力量。至今孙逸仙仍然实行抵制政策，不干预中国政府的事务，也不对它施加影响，那我就不得不诉诸于吴佩孚。因此我才接触吴佩孚，但是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我们准备用军事力量支持吴佩孚在中国打内战。我们没有这种意图。对于张作霖，的确，我们是不信任的，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实行两面派政策，他向我们军事指挥部派去代表团，声称他不会支持白卫分子，而实际上他在支持我们中东铁路上的敌人，并在满洲为白卫分子提供安身之地和战略基地。如果孙逸仙确实认为，张作霖准备实际地证明他对我们友好，那就让他立即把白卫分子清除出满洲，将他们赶到赤塔，并且对中国政府和中东铁路理事会施加影响，以便撤销现在的奥斯特罗乌莫夫的管理局，并用与我们协商成立的新管理局取而代之。如果张作霖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对他的态度就会改变，因而也会消除孙逸仙的担心，因为吴佩孚十分清楚，在张作霖做出这些行动之后，我们就不会帮助吴佩孚去反对张作霖。我补充说，虽然我是以自己名义谈这些意见，但是我相信莫斯科是会同意的。我认为，在整个事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最强大的政党和最杰出的活动家都公开承认，没有我们他们什么事也做不成。这就证明，我们在中国的威信提高了。我想，孙逸仙有点耍滑头，主要问题是，我们军队向满洲靠近会引起他的担心：我们是否要帮助吴佩孚彻底消灭张作霖，从而在整个中国就留下孙逸仙的一个竞争对手——吴佩孚。孙逸仙无论如何都不会允许消灭他一直可以用来反对吴佩孚的那个张作霖的。我认为如果吴佩孚不参与竞争，因而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对我们感兴趣，那对我们也是不利的。如果列宁、托洛茨基和契切林能把写给孙逸仙的亲笔信转寄给我，并在信中阐述大致与上述观点相类似的东西，我认为这是有益的，不管怎么说，孙逸仙是最亲近我们的，特别是从共产党员也加入他

的党时起就更是如此。我期待着对这封急电的回复，我可以把你们的回电转交给孙逸仙。

贝利^①已顺利抵达，现正在我们这里。

越飞

全宗 5，目录 1，卷宗 2194，第 175、180—182 页。

打字稿，副本。

47

越飞给吴佩孚将军的信

1922 年 11 月 18 日^② 于北京

致吴佩孚将军阁下

亲爱的将军：

我又冒昧地向您求助和求教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就连我这个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内部斗争不甚了了的旁观者也觉得很清楚，北京这里的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某些集团（他们的斗争我觉得特别值得同情）是不利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也就是对于为中国的国家统一而斗争的集团是不利的。在北京这里，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正在发生这样一些事件，这些事件证明某些势力正在急剧增长，并且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中国的中央政府有点儿想摆脱您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处境

^① B·A·贝利，1922 至 1923 年间任苏联驻华使团海军武官——译者。

^② 日期是根据第 48 号文件注明的。

更加严峻地表明您有必要与孙逸仙联合。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也就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和或多或少不是从中国人的角度而是从欧洲人的角度来观察这些事件的人，看到了这样一种荒唐的现象，即中国人民的两位领袖（其实，能否拯救中国将取决于他们），由于个人的怀疑和彼此不信任，怎么也联合不起来。就在您怀疑孙逸仙对张作霖过分亲近，因而拒绝委派孙丹林部长去跟他会谈的时候，孙逸仙也同样怀疑您和陈炯明有联系并且不信任您；然而，无论第一种怀疑还是第二种怀疑都可能是缺乏根据的，至少我确实知道，孙逸仙没有与张作霖签订任何正式协议，说实在的，如果允许我开诚布公地说，孙逸仙对您的怀疑倒是更有根据的，因为在报纸上甚至都登出，现任总理王宠惠提议从广州召回陈炯明，以便派他去对付孙逸仙的支持者，同时还声称，不论您还是曹锟都不反对这样的计划。

我本人并不相信这些报道，根据您过去的声明，我认为，您永远不会与陈炯明联手，第一，因为在目前他只不过是英国的代理人；第二，因为那样做会使您与孙逸仙彻底闹翻，而您不止一次地使我感到荣幸的是，您赞同我的如下观点：您与孙博士联合才是正确的政策。

而恰恰是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样的联合。我还是觉得，孙逸仙想在福建省拥有一个基地也并非很过分，在他满足您的一个最重要的要求，即与“小徐”^①决裂之后，我认为，您可以在他的这个自然而合理的愿望上向他作出让步。否则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您不同意孙逸仙的要求，那么孤立您的政策将会继续下去，您为祖国进行的斗争和工作将会极其困难。

现在我已经发现，我们的共同敌人正在抬头。

您曾经向我指出，如果不能说服顾维钧，那就要起用另一个

^① 即徐树铮。

更合适的部长去替代他。我很清楚，说服他不仅已经不可能，而且恰恰是在这一时刻他更加积极地实行敌视我们的政策。顾维钧考虑到，现在怀有民族感情的群众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所以他就求助于显然被他收买的报刊，并千方百计地企图损害俄国的声誉和破坏俄中中和解的可能性。

我现在仍在生病，但我还是相信不久我就能从床上爬起来，并有可能开始进行谈判。我内心依然像以前那样充满一个信念，同顾先生我们是无论如何也谈不来的。如果俄中会议就中国人民感兴趣的所有问题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而不能就外国帝国主义者感兴趣的那些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最后以破裂而告结束，在这种情况下您设想一下，将会出现什么局面。

谈判中的最严肃问题仍然是蒙古问题。

在这里我们同您取得了一致意见，立即从蒙古撤出我们的军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说服蒙古人承认中国的主权。但是，如果中国代表想在会谈中彻底解决中蒙问题，那么没有外蒙代表的参加，我们是决不能同意的。

第二个可能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中东铁路问题。在这里（正如在所有问题上一样）我们完全放弃沙皇政府的那种罪恶的掠夺性政策，然而，我们却不能放弃我们在这条铁路上的利益。具体地说，就是我们要求掌握铁路的理事会，而直到现在中国还不能向我们做出保证：这条铁路不会被张作霖、日本人或其他外国人那样一些敌视我们的势力占领，在这条铁路上要设有自己的护路队和警备队。

我认为，不论第一点还是第二点，既符合你们的利益，也同样符合我们的利益，因此，您现在也就是在谈判期间要给予我强有力的支持。借此机会感谢您在顾维钧要求把我们的军队撤离蒙古时给予我的帮助，大概是在您的影响下，顾维钧在其照会中收回了这一要求。

然而，由于我还是相信，不论同现政府，还是同任何一个更反动的政府，我们都决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而一旦关系破裂，局面将会急剧恶化，所以我仍然认为，您与孙逸仙和解并建立你们的联合政府是最重要的。

我再重复一遍，我准备竭尽全力促成此事。您非常明白，我们将会给予您巨大的帮助并对中国正在发展的事件施加重大影响。我请您注意这样一点，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我是决不拒绝给予这种帮助的，但同时我也期待着您的协助，因为，正如我不止一次地不得不指出的那样，我们在东方这里与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是谈不来的，而顾维钧执行的不是中国的政策，而正是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所以没有为民族着想和摆脱帝国主义影响的一位中国人的帮助，我们是不会达成任何协议的。

我又委派您所熟悉的格克尔先生去拜见您，因为我还认为，或许您对结识我的海洋事务专家^①不会不感兴趣，所以我也派他去拜见您。我相信，您对认识我的第三位助手、著名的中国通和汉语专家伊万诺夫教授也不会不感兴趣，首先是因为他能和您讲汉语，这样就可以使您不必再用翻译了。

我亲爱的将军，请接受我最深切的敬意和完全准备协助您取得成功。

全宗 5，目录 1，卷宗 2144，第 281—283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名。

① 指 B·A·贝利。

48

吴佩孚给越飞的信

1922年11月20日于洛阳

吴佩孚将军的信

越飞代表先生：

请接受我的敬意。您的顾问格克尔、贝利先生和伊万诺夫的
光临以及您那封善意的来信使我备感荣幸^①。

我很感动，万分感谢您的盛情。

格克尔顾问抵达洛阳两天来，我们开诚布公地讨论了内外政
策问题。

关于内政问题，您出于友情向我提出劝告，我敬佩您的渊博
知识，我要竭尽全力遵循这一思想，即如何拯救国家，以不辜负
我的朋友对我的期望。

至于对外政策问题，我觉得，需要加以讨论，我特意对这些
问题作出简短的说明，我想您会以自己的高屋建瓴的见解给予指
教，这会使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关于从蒙古撤军问题，上一次格克尔顾问到洛阳来时已经达
成协议，即一旦中国能够接收蒙古，俄国军队就立即撤走。

不久前，外交部长顾维钧所作的关于先开始谈判而后再讨论

^① 见第47号文件。

撤军的声明，也是指的这个意思。开始时一次也没有提到关于蒙古代表参加会议的问题。

蒙古属于中国，中国中央政府本身会尊重蒙古人民的意愿，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中国中央政府不承认所谓的蒙古政府，因此中国政府难以承认蒙古政府与俄国政府所缔结的条约是有效的。

因此，外交部长顾维钧称我不能不反对这样的建议。

关于中东铁路问题，上一次格克尔顾问来洛阳时也就其主要实质提出了这个问题^①。

您在给外交部的备忘录中所阐述的意见，看来，与我的意见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问题在于，当中国有能力接收中东铁路的时候，俄国真诚地希望把它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而中国方面也应该保障俄国的有关利益，以表达自己对俄国的友谊，这就是双方都承认的原则。

会议开幕时应该遵循这一原则进行有效的会谈。

在我收到的信件中提及两个问题：1. 关于更换理事会和由俄国政府委派人员取代反革命分子问题；2. 根据以前的条约委派铁路警察和护路队问题。

我认为这是临时性措施，并不违背基本原则。

关于此事还可以向外交部长顾维钧提出问题并一起进行讨论。

会议临近了，即使双方难以解决的问题，只要各自本着互助的精神实际上也会得到公正的解决的，因此俄中友谊一定会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

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它将带给我难以言表的喜悦。

除我请格克尔顾问本人向您转达的之外，我向您致以敬意，祝您身体健康。

^① 原文如此。

吴佩孚

译自汉语 伊万诺夫

全宗5，目录1，卷宗2144，第284—285页。

打字稿，副本。

49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不晚于1922年12月5日^①于莫斯科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对东方问题提纲的补充^②）

远东的发展给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一个巨大的任务^③，这个任务不仅要求它们竭尽全力组织工人群众，而且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它们还没有在斗争中得以巩固和赢得群众的信任之前，历史就给它提出来的复杂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已开始南方和北方发展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参加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但是他们还未能贴近人民群众。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应该首先更明确地认清中国政治事件的意义以及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其中的作用。

①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的日期。

② 由K·拉狄克签署，已在托尼·塞奇：《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起源》一书中发表（第1卷第377—378页）的该文件英译本与原文有些出入。英译本中没有副标题《对东方问题提纲的补充》。

③ 在英译本中讲的不是各中国共产党，而是一个共产党。

虽然在1911年发生一次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中国目前还处在资产阶级革命发展的准备时期。这种发展的中心任务是联合中国人民和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国家。西欧资产阶级在1871年解决的任务，在中国还没有解决。实际上，中国现在是由一系列掌握在督军手里的独立的区域构成的。但是，如果把这些督军的政权仅仅看作是军阀统治，而看不到这些独立的大公是资产阶级发展的中心，从历史角度看，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在通过剥削人民群众，组建军队，为武装自己的军队建设兵工厂，而扮演着18世纪西欧专制君主的角色，他们那种以文明专制制度而著称的政权，乃代表资本主义建立的时期，代表新兴资产阶级还不能掌握政权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屈从于中国资产阶级所建立的这些中心中的任何一个，即使这些中心的领导者具有半民主的或者甚至民粹派的性质。这些集团的所有代表人物，都在为政权而相互争斗，都与某个帝国主义国家政府保持联系，并企图利用它们，实际上，常常屈从于它们的反动影响。如果说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附庸，因此引起中国所有民族革命分子对他的敌视，那么，一刻也不应该忘记，昔日南方民主政府的首脑——孙逸仙过去和现在都在与张作霖联手合作，因此，支持孙逸仙同吴佩孚作斗争，不仅是支持一个反动派张作霖，而且还是支持日本帝国主义。还应该记住，吴佩孚同美国帝国主义也有联系，对他的任何支持也就是对在美国的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要以在民主基础上实现中国统一的倡导者的身份开展活动。中国共产党人要提出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为实行同唯一不追求帝国主义目标的大国——苏维埃俄国结成联盟的独立自主政策而斗争，应该在这些集团的相互角逐中，支持那些给予工人阶级以发展和建立组织的充分自由，并拒绝与内外反革命势力联合的集团。在缺少这种保证的情

况下，共产党人应该坚决反对军阀集团的任何军事主张，以一支能够联合民主主义因素的力量姿态开展活动，而民主主义因素的成长可以保证不是通过一个军阀集团战胜其它军阀集团，而是靠下层人民群众取得革命胜利来实现中国的统一。

为了在这场斗争中能代表一种实际的力量，共产党人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他们应该利用中国知识分子的激情，从中挑选最宝贵的坚定的革命分子，用来组织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4，第 461—464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50

孙逸仙给列宁的信^①

1922 年 12 月 6 日于上海

亲爱的列宁：

我借此机会就一个重要问题给您写这封短信。我得知，苏联的武装力量正在满洲边界集结并准备占领北满。

我担心，这种占领将对今后的俄中关系造成严重后果。对中国人民来说过去俄国占领北满，是沙皇制度一个明显的证明和证据。如果您占领这个地区，那么我相信，我国人民就会把这个步

^① 该信的节录曾刊载在《苏共历史问题》杂志上，莫斯科 1966 年第 10 期第 32 页。

骤说成是旧俄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

我个人并不相信，莫斯科的这种举动是出于帝国主义的动机。

实际上，我确信，您要占领北满是出于对张作霖的不信任。

但是请允许我再一次强调指出，通过我并同我一起行动，您就能迫使张作霖在理智的范围内做到为保证苏维埃俄国的安全所需要的一切。

遵循这种政策，您不仅可以避免危险的反动派在中国对您的攻击，而且还可以帮助我创造一种便于加速俄中共同工作的局面。

您以前对中国所作的声明^①曾激起我国人民极大的希望并促使他们把俄国看作是能保证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奴役而获得民族解放的朋友。

我请您不要采取任何不明智的行动，诸如占领北满^②。我打算在不久的将来派一名全权代表去莫斯科，与您和其他同志一起协商为俄中合法利益而共同采取行动的事宜。

同时我还要再重复一句，与中国现政府的谈判不仅是浪费时间，而且看来也是危险的。北京（政府）现在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仆从和工具，所以，和北京打交道，实际上也就是和列强打交道。这是危险的，因为始终有可能，北京和这些列强耍手腕使我们在中国人民面前处于不利的地位。

再次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顺致兄弟般的敬礼！

孙逸仙

核对无误 布拉科娃

① 看来，这里指的是1920年9月27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告中华民国政府书》（见《苏联外交政策文件》第3卷第213—216页）。

② 在1922年9月15日，越飞给孙逸仙的信（第36号文件）中包含有对事态如此发展的暗示。1922年9月27日，越飞在给苏联领导的第3封信中报告说，他在给孙逸仙的几封信中暗示了苏军为消灭白卫据点进驻北满的可能性（全宗5，目录1，卷宗2145，第43页）。

全宗 5，目录 1，卷宗 1549，第 1 页。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

51

孙逸仙给越飞的信

1922 年 12 月 20 日于上海

亲爱的越飞先生：

您最近的来信收到了^①。

我注意到您对张作霖的评论。我打算在近日就此问题同他取得联系。

至于您对同北京的垂死机构举行谈判一事的看法，我冒昧地向您谈谈我的以下想法：

如果贵国政府的政策是把北京的官府作为中国形式上的管理机构而长久加以保留的话，那么您想同北京政府举行谈判，那当然是正确的。这样一来，您就可以同资本主义列强一起，通过国际上承认等步骤，为它树立威信。但是我必须指出，您同北京举行谈判，实际上是默认资本家的论点，即解决中国问题必须采取人们称之为进化的缓慢渐进变革方法，而不是可以称之为革命的苏联方法或急剧变革方法。资本主义列强认为，剧变会严重破坏对外贸易，因此，我至今所捍卫的革命措施不可能得到它们的支持。它们把我视为中国革命的化身，要采取措施反对、攻击和镇

^① 此信没有找到

压我。当然，它们试图用体面的借口来为它们对待我的态度作辩解，如我在广州时就听说，它们只能同“公认”的中国政府打交道^①。令人奇怪的是，您竟重复同样的资本家论点，有意为那些是你们伟大制度的公开敌人的国家效劳。

但是，您可能要问，怎么办？幸好，总的形势现在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我还可以提出一项建设性政策，即我作为我的受压迫的同胞的代表，同贵国政府实行合作。

从我离开广州时起，我就认识到以广州为根据地有冒险性，因为它是英国势力和其海军的中心。然而，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我不能放弃广州。在过去的几个月间，我已在着手创造条件，以使我能向贵国政府提出进行实际合作的建议。

我现在可以调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希望得到武器、弹药、技术、专家等方面的援助。

贵国政府能否通过库伦支援我？如果能，能支援到什么程度？在哪些方面？

如果这个计划付诸实施，我必须很坦率地说，我的真正敌人肯定将是吴佩孚。英国和其它国家肯定将支持他反对我。甚至现在英国就主张吴佩孚和陈炯明“和解”，在福建“消灭”我的军队。吴佩孚不顾对我友好的保证，也正在这样干。我担心此人靠不住，或者正如我们中国人所说，人心叵测。

如果我的计划能引起贵国政府的注意（这是一个大胆而新鲜的计划，此外也是一个革命的计划），那么就请派一位权威人士来，从近日采取行动的角度对这个计划作进一步的讨论。如果这个计划能在明年实行，那就会有更多的成功机会。拖延则便于资本主义列强帮助反动势力巩固它们在中国的地位。

^① 指驻北京外交使团1921年4月22日就1921年4月7日在广州选举孙逸仙为中华民国总统一事发表的声明。

至于所谓吴佩孚在内阁问题上的失败，这没有现实意义。曹锟现在正在同张作霖调情，旨在迫使吴佩孚同意选曹锟当总统，或诸如此类的事情。另一方面，张作霖正在争取曹锟再次反对吴佩孚。但是，曹锟虽然可能是个傻瓜，他的幕僚却非常聪明，不会不懂得除掉吴佩孚会造成以后动乱时曹锟直接面对张作霖的局面。这完全像下棋，是在中国“缓慢”变革这一局棋中简单地挪步。如果不采取革命措施，清除现存的整个腐朽制度，那就不会发生任何实际变化。

您忠实的（签字）孙逸仙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8，第 5 页及其背面。

英文打字稿，副本。以 Г·巴甫洛娃的 1951 年译稿为基础（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8，第 6—8 页），对照英文稿作了校订。

第二部分

面向孙逸仙

这里公布的包括1923年上半年的文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就中国革命运动的性质和前景、对孙逸仙和国民党的态度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未来国民革命中的作用问题所进行的讨论。

本文件集发表的文件证明，早在1923年上半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俄罗斯联邦驻华全权代表越飞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孙逸仙和国民党的极其重要的决议。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赞同越飞的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第55号文件）。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指示中国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并避免同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发生冲突^①。

作出这些决议是由某些原因促使的，其中包括外交方面的原因，因为苏联驻北京的代表在两年中未能从中国政府方面争取到建立正式关系和解决外蒙古地位问题、苏联军队驻留外蒙古领土以及中东铁路问题。

越飞于1923年1月就与孙逸仙的通信和在上海的会谈向莫斯科提交的报告（第57、60、61号文件）表明，苏联方面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孙逸仙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

在上述会谈过程中，越飞回答了孙逸仙提出的关于俄罗斯联邦的内外政策问题，双方讨论了中国的局势，同时孙逸仙声明，由于中国缺乏相应条件，共产主义制度，甚至苏维埃制度都不能引用于中国。越飞同意孙逸仙的意见，并强调指出，“中国最迫切和最重要的任务是取得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完全的独立”。越飞和孙逸

^①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俄文版第37页。

仙还讨论了苏中关系的现状、蒙古问题和中东铁路问题。会谈的这部分内容反映在1923年1月26日在上海发表的越飞和孙逸仙的联合声明中^①。

此外，孙逸仙以秘密的方式向越飞通报了关于近期在广州对军队和国民党进行改组以及向北京政府发起新的北伐以便统一国家的打算，孙还请求给予财政援助并派顾问以实现上述举措^②。

从这里公布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孙逸仙为单纯军事问题赋予特别重要的意义，请求在中国西部建立军事基地方面给予帮助，并指望红军在满洲进行直接的干预，以应付将来可能发生的对张作霖的作战行动（第51、60、61号文件）。

从越飞给莫斯科的信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在1923年1月得出结论，同吴佩孚合作是不现实的，其结果是：只有孙逸仙才可能是俄罗斯联邦的唯一盟友（第60号文件）。

同时不能不看到，越飞在试图说服莫斯科必须给孙逸仙以财政和军事援助的同时，明显地夸大了孙逸仙在全国政治中的作用，说什么或许在最近时期内，孙逸仙将是“整个中国的实际上的统治者”，也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内部的状况，说什么“孙逸仙的党，即国民党以及孙逸仙本人处在我们的思想影响下”（第57号文件）。

不言而喻，越飞知道国民党活动中的某些缺点，如对鼓动宣传工作、群众工作估计不足。因此，他竭力说服莫斯科，孙逸仙已经考虑到了他的这些意见，并特别指出，孙逸仙打算在广州“直接从思想上接触和影响海关工人和革命军队”（第60号文件）。

越飞试图使莫斯科相信，孙逸仙是“正直的革命者和诚挚的热心者”，他不会像凯末尔一样欺骗苏联领导人（第60号文件）。

① 《苏中关系（1917—1957年）（文件汇编）》第64—65页。

② P·A·米罗维茨卡娅：《国民党战略中的苏联（20—30年代）》，莫斯科1990年版第29页。

他还强调指出，必须保留华南作为国内革命运动的基地（第61号文件）。1923年2月21日，孙逸仙到了广州，并在那里成立了新政府。

其时，莫斯科正在仔细研究越飞所积极支持的孙逸仙的请求。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及其机构和总司令加米涅夫都亲自过问这一问题（第62、67号文件）。

1923年3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认为可以给予孙逸仙以大约200万墨西哥元的资助，并征得孙逸仙的同意给他派去政治和军事顾问小组，以及在“中国西部以完整的军事建制建立革命军队的基础”（第64号文件）。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拒绝了孙逸仙关于红军在满洲作战的建议，认为这一行动蕴含着“日本武装干涉的危险”，并表示担心“孙逸仙过于注重单纯军事行动会损害组织准备工作”（第64号文件）。

此外，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了由托洛茨基、契切林和拉狄克组成的委员会起草就同孙逸仙合作问题给越飞的指示信。遗憾的是，这一指示信的寻找工作没有取得成功，然而，可以根据越飞1923年5月1日给孙逸仙的电报得出关于指示信内容的概念。其中越飞告诉孙逸仙，苏联政府同意给他数目达200万金卢布的资助，以用于筹备中国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并特别指出，国民党必须进行广泛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而革命行动必须建立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并尽可能建立在孙逸仙监督下的集中制机构。

越飞还告诉孙逸仙，苏联方面准备给予帮助，在中国北部或西部建立庞大的军事建制，或利用军事物资和教官方面的援助，建立“各兵种内部的军事学校，而不是野战部队”，以便为中国北部和西部的革命军队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

孙逸仙于1923年5月12日在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副本

给越飞)的复电中写道：“您5月1日来电给了我们很大希望：1. 我们感谢您的慷慨承诺。2. 我们接受您的一切建议。3. 我们将用大部分精力来予以完成。我们将派我们的代表去莫斯科商讨细节。”^①

除了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内占主导地位的积极支持孙逸仙和国民党的倾向以外，1923年上半年还有另一种相当坚定的反对援助孙逸仙和国民党的倾向，即要求摆脱国民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人和职工运动，特别是在中国北部和中部，以及加速在国内建立群众性共产党的方针。

这种倾向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占了上风，当时在马尔林缺席的情况下，不顾以前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决议，通过了由拉狄克起草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秘密决议，决议把孙逸仙和国民党实际上同中国军阀相提并论（第56号文件）。

维经斯基1922年12月29日和1923年1月6日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以及他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局在海参崴的工作的报告都持这种论调（第52、53、56、59、63、65、68、70号文件）。从维经斯基以及积极支持他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所引用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他们过高地估计了1922年至1923年初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涨，甚至对在1923年2月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罢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作了过于乐观的预测（第71号文件）。

当时，在布哈林起草的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中说，“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还很薄弱”，工人阶级“尚未充分分化成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在中国唯一真正从事国民革

^① 《孙逸仙诞辰120周年纪念（1866—1986）》第286页。书中电报的日期误为1923年5月15日。

命的集团是国民党”^①，维经斯基和萨法罗夫相信似乎工人运动是国内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因素，并竭力去改变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组织联系（第 63、65、71、72 号文件）。

维经斯基和萨法罗夫在论证自己的立场时指出了孙逸仙和国民党活动中的重大缺点，即偏重于军事方式，对群众工作和鼓动宣传工作估计不足，与反动军阀张作霖和段祺瑞结成联盟，对帝国主义列强实行妥协，对工人运动持消极态度，等等（第 65、70、71、72 号文件）。

他们把马林当作“替罪羊”，责备他用“天方夜谭”式的精神蒙骗莫斯科：为孙逸仙的立场和国民党的现状涂脂抹粉，并要求把他从中国召回（第 70、72 号文件）。

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萨法罗夫想改变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给予孙逸仙以援助的决定的企图（第 72 号文件）没有得逞。在 1923 年 4 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反对同孙逸仙和国民党合作的人在布哈林的报告中受到了当众批评。在中央向代表大会作出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国民党是不受外国资本主义影响的唯一的国民政党。因此，俄共（布）对它的支持“是我们在中国的工作所必需的”^②。

上面提到的越飞 1923 年 5 月 1 日给孙逸仙的电报以及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于 1923 年 7 月 31 日通过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任命鲍罗廷为孙逸仙顾问的决定（第 80 号文件），也持有同样的精神。

与此同时，来自“左面”的压力也对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的立场，对这些领导人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能力的印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从所公布的关于起草 1923

①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 37 页。

②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3 年 4 月 17—25 日）》，莫斯科 1968 年版第 267、268、775 页。

年5月24日通过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的材料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指示信是由维经斯基起草的，他把上面提到的对国民党的批评意见写进了指示信。然而，在指示信草案中没有关于土地政策和农民问题的条款，这些是由布哈林征得季诺维也夫的同意而补充进去的（第74—76号文件）^①。

这些文献重申了1923年1月12日决议的论点，即中国的中心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国内封建走狗的决议的国民革命。同时，工人阶级和农民被宣布为国民革命的基本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应依靠工人阶级和农民。

指示信对土地革命和农民问题赋予了特殊的地位，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始终把国民党推向土地革命方面”。文献列举了中国土地革命的具体口号，这些口号后来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但对于国民党来说则是不可接受的。

在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信中，第一次提出了争取工人阶级政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的要求。此外，在这个文件中实际上作为合作的条件向国民党提出了无条件支持北方和南方的工人运动的要求。

总之可以认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向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人）发出的指示中提出了明显不切实际的任务。这首先是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和确立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意味着实行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起领导作用的方针。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共产国际政策中的这一矛盾也越来越尖锐。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信原是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① 1923年5月20日由布哈林主编的《真理报》在发表维经斯基的文章《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和工人阶级》时指出：维经斯基“对农民和孙逸仙党的作用估计不足”。

的代表们的，但是它到达中国很晚，自然不可能对代表大会的工作产生影响（第79号文件）。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争论，特别是关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问题的争论，在一些文献汇编和主要以马林的报告为基础的学术研究著作^①中，有着相当详尽的论述。这里发表的文献使人们有可能更加明确和补充早已知道的关于“三大”的工作进程、争论内容和结果的概念。

陈独秀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1923年1月12日决议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在代表大会上仅以5票的优势（21票赞成，16票反对）通过，这反映了党内对这一决议的强烈反对态度。

本书所收录的陈独秀就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总结给共产国际的信（第78号文件），无非是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官方立场表示的一种尊重，并不反映党内和其领导内部同孙逸仙和国民党合作的真实态度。

中共三大以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工作成果表明了对合作的现实态度。从第81、88、94号文件中可以看出，这些成果是微不足道的。

^① 参见《马林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文版第227—229页；B·И·格卢宁：《国民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间的中国共产党（1921—1927）》第1卷第92—127页；托尼·塞奇：《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起源》第2卷第570—644页。

52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讨论中国问题会议记录 (摘 录)

1922年12月29日于莫斯科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记录

执行主席：布哈林同志。

出席：科拉罗夫、苏瓦林、艾伯莱因、库西宁、葛兰西、沙茨金、皮雅特尼茨基、麦克马努斯、施蒂纳、霍拉。

列席：第二项议程：马林同志和维经斯基同志。

听取：2. 中国问题。

决议：2. 马林同志和维经斯基同志的报告已备案待查。

为了仔细研究问题，成立由科拉罗夫、布哈林、马林、维经斯基、麦克马努斯、艾伯莱因、沙茨金和工会国际的一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关于工会国际代表的任命应由科拉罗夫同志向工会国际执委会提出请求。

应邀请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参加委员会会议。

全宗 495，目录 2，卷宗 14a，第 93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53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会议速记记录 (摘 录)

1922年12月29日于莫斯科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 中国问题议程速记记录

中国问题

马林同志：7月底，我带着共产国际执委会为制定在华工作纲领而任命的委员会所拟定的指示去中国。这项指示的基本内容是，我们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加入孙逸仙的国民党，并主动成立单独的工会组织^①。

我带着这项指示来到中国，打算去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中央所在地广州。然而，当时南方的形势是这样，国民党中央和孙逸仙被逐出广州，我们组织的工作条件非常不利。国民党中央在上海，因此共产主义团体的中央也临时设在上海。

我们着手召开我们团体的中央扩大会议，会上讨论了莫斯科委员会的指示^②。

主要问题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组织，这个问题没有遇到

① 见托尼·塞奇《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起源》英文版第1卷第328—329页。

② 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2年8月29至30日在杭州召开的会议。

激烈反对。参加讨论的执委会委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积极参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这个运动的特点是它的领袖们不得不诉诸工人；中国的资产阶级至今还在物质上支持这个运动，它还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其大部分是生活在印度洋群岛的各个殖民地。

因此，我们有可能在国民党组织内进行工作，有可能进行自己的宣传。此外，近年来的经验表明，国民党的领袖们早晚会意识到必须支持罢工运动。

在我们同共产主义组织的中央讨论了进行自己的宣传工作的可能性之后，我们的中央表示赞成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组织。反对意见只是来自我们广州的地方组织，该组织支持陈炯明对孙逸仙的政策，因此该地方组织的领导人被我党开除^①。

在我们党内，关于加入孙逸仙党的决定几乎没有遭到任何反对而被通过。依我看，从那时起不仅我们共产主义团体的工作条件有了改善，而且实践表明，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我们的力量得到最好的发展。

以前我们没有在中国进行过公开的政治宣传，我们只有一个周刊，那里发表的大部分是国际运动方面文章的译文，也就是说，没有对中国形势进行分析，从而失去了只发表共产主义文章译文以前所曾拥有的部分影响^②。

我们已开始出版自己的政治报纸^③，已经出版了12期。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联合共产主义者以及青年的力量，开展组建民族主义运动左翼的工作，以及引导他们实行强有力的、明确的反帝政策。这份报纸在上海印刷、发行5至7千份，确实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引起了人们的很大兴趣。而对国民党某些行动提出

① 指陈公博和谭植棠。

② 指1920至1921年间在上海出版的《共产党》杂志。

③ 指《向导》周报[见第37号文件注（本书第131页）]。

的批评，例如对国民党领袖孙逸仙与满洲的张作霖之间的联系提出的批评，在国民党内得到认可，没有给我党造成任何障碍。由于我们的同志加入国民党组织，特别是前国民党员陈度重（音）的加入^①，建立了同国民党领导的新的友好关系，消除了以前国民党组织者和我党组织者之间在工人组织中存在的竞争所带来的麻烦。

在南方和在……^②的合作对我们来说是成功的。

我认为，同民族主义运动的接近对于开展工会国际工作是完全必要的。迄今为止，任何较大规模的罢工运动都具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不仅是今年年初的海员罢工，而且最近的矿工大罢工都变成了有大学生参加的大规模运动，这次罢工仅仅由于英国军队的干预就具有了民族主义的倾向^③。

我们党今年特别注意各种自发的罢工运动，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些运动表明中心城市工人新精神的觉醒，但是这种新精神还没有强大到使年轻的工人阶级表现出阶级觉悟的程度；罢工以后出现的稳定组织还不多。上海、长江流域、香港、××附近和铁路上的罢工层出不穷并在多数情况下以工人的胜利而告终，通常是工资得到了提高。北方铁路员工的罢工基本上是由我们的人领导的，汉口、湖南和上海的罢工不仅由我们的人领导，而且国民党的工人组织者也参加了领导工作。唯一例外的，可以说有某种明确组织的，是北方的铁路员工和汉口的铁路员工。北方现在有4个或5个由各种人员组成的铁路员工组织。在2月，它们将召开统一的铁路员工会议，目的是成立全国的铁路员工组织。我认为，这个尝试将会取得成功。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稳定的组织，这就是在湖北的、其中心设

① 可能实际上指的是林伯渠。

② 此处删节号是文件中原有的，下同。

③ 指1922年10月开滦煤矿工人的罢工。

在汉口的组织，该组织联合了2.5万工人，主要是五金工人、运输工人、铁路员工。

我认为，最近时期工会国际开展工作的机会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在我看来，其条件是保持同民族主义运动的友好关系。

我还想就我们在国民党组织中的工作再说几句。同志们，从上面的通报^①中，大家可以知道，国民党把自己的全部活动集中在军事方面。它试图争得一些地盘，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借助军事措施实现中华民国的统一。与此同时，它极少注意宣传，包括民族主义的宣传。因此，自从同这个组织发生联系以来，我们坚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也会有我们的人员参加，还会明确安排宣传工作。国民党领袖们接受了这个想法，但至今没有实现。国民党组织让我们党的领袖陈独秀参加国民党改组委员会，我认为，考虑到目前的关系，自然可以利用民族主义运动将之与俄国联系起来的希望，甚至可以借助于我们小团体的帮助下使这个运动相信有必要积极开展反战宣传和活动。我认为，这对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是最重要的，而那些希望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群众性共产党的人，在我看来是完全不顾现实情况的。

民族主义的国民党使我有可能在中央的会议上向党的领导人（大约有10位重要人物）提纲挈领地阐述我们在中国的政策、对那里的民族主义运动活动的看法，并讨论某些具有直接实际意义的策略问题。会上展开了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我发现，过去我只是从第三手材料中得知：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和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决不比在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我认为，这个团体完全有理由说，共产主义团体的活动只有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进行才可能得到发

^① 可能是指维经斯基的发言。

展。

在结束我的初步报告时我还要指出，我们制定了共产国际在中国工作的某些提纲，这些提纲为不远的将来指出了方向，是以共产主义运动（如果这样的运动在那里存在的话）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密切合作为基础的^①。

最近四个月（时间不长）工作的最重要成果是我们支持了大罢工，出版了政治性周报。我还想提一提我们的同志在三个方面进行的活动：

1. 庆祝11月7日的筹备工作。为迎接这个节日我们的同志非常精心地做了准备，特别是在汉口和北京早在10月10日庆祝中华民国成立的游行期间就进行了。我亲自参加了10月10日在北京举行的庆祝活动，我从我们中央委员会的一位最优秀的委员那里得到关于在汉口举行庆祝活动的详细报告。从这次庆祝活动中我得知，不仅在知识分子中，而且在大工业企业的工人那里，庆祝国民纪念日的活动都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应该利用它来进行我们的宣传。

11月7日，在北京和汉口为庆祝俄国革命周年日举行了示威游行。同时在这两个城市里成立了旨在加强中俄两国紧密联系的机构^②。这两个中心城市向全国散发了传单和宣言，以求建立同俄国的正式友好关系，挫败来自中国政府和主要来自外交使团方面的阻挠。

我认为，我已经谈了这四个月来的主要事件。关于我们党同民族主义运动的关系问题，如果说这个问题还需要在这里讨论的话，那么是不可能同最近四个月来取得的大量经验割断的。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必须估计到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况。我们不能把我们在中国的策略建立在我们的一般方针和我们的一般立场上。如

^① 这个文件没有找到。

^② 指主张尽快建立中国和苏俄正式外交关系的中俄协会。

果可以拿英属印度和荷属东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同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相比较的话，那么我认为，对于把我们自己的宣传，即主要目的当然是建立工人组织的宣传，同民族主义运动紧密结合这一点来说，中国具有最有利的和最好的机会。在座诸位，我们大家都知道，将来民族主义运动必然会发生分裂。

我还想报告这样一件事，11月在汉口召开了中华商会会议，会上中国资产阶级制定了自己的、与国民党的纲领没有任何联系的政治纲领。我想，汉口这次会议的结果将建立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那时我们将有可能较为容易地扩大工人阶级和我们的倾向在国民党组织中、在革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影响^①。

全宗 495，目录 2，卷宗 14a，第 131—137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54

中国共产党 1923 年支出预算

1922 年 12 月^② 于莫斯科

绝密

中国共产党 1923 年支出预算

月支出

金卢布

^① 维经斯基的发言在速记记录中没有找到。

^② 日期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注明的。

1. 支持周报 “The Weekly Guide” ^①	210
2. 支持工人报纸（周刊） ^②	40
3. 印刷传单、宣言等	60
4. 组织员和宣传员的费用	
①汉口三人	60 金卢布
②湖南三人	60 金卢布
③北京四人	80 金卢布
④上海三人	60 金卢布
⑤香港一人	40 金卢布
⑥广州一人	40 金卢布
⑦山东二人	30 金卢布
	370
5. 两名中央委员旅差费	100
6. 两名固定宣传演讲员的食宿旅差费	120
7. 意外开支	100
<hr/>	
总计月支出……………	1000 金卢布
总计年支出……………	12000 金卢布

萨法罗夫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2，第 65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指中国共产党的周报《向导》周报，英文名为 “The Guide Weekly”。

② 可能指从 1921 年至 1926 年在北京出版的《工人周刊》。

55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42 号记录 （摘 录）

1923 年 1 月 4 日于莫斯科

出席：

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加里宁、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托姆斯基同志

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瞿鲁巴同志

中央委员：索柯里尼柯夫、安德烈耶夫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索尔茨同志

2. 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问题

〔3〕马林的问题

（1）确认政治局以前关于中东铁路的决议（1922 年 11 月 16 日第 36 号决议）^①。

（2）责成越飞同志发表一般性的宣言，说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中国的政策是建立在反帝斗争的原则基础上的，问题应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在力争召开的

^① 1922 年 11 月 16 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 1922 年 11 月 13 日委员会会议的纪要，纪要中谈到，俄罗斯保留中东铁路的财产，但作为东方各族人民的朋友和帝国主义的敌人，俄罗斯放弃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特权，并准备向中国作出让步：缩小划归铁路的地带，以优惠条件提前赎回铁路，参与铁路的共同管理。文件中说：“近期采取的步骤是以我们的管理委员会取代敌视我们的管理委员会。”

会议上加以解决。宣言中应坚决驳斥被认为是错误的远东局照会^①，并指出必须采取一切措施结束同白卫分子的斗争。

(3) 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赞同越飞同志的政策建议，该政策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4) 指示远东革命委员会^②，它不应干预对外政策。

(5) 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在莫斯科召开预备会议^③。

(6) 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以列宁同志的名义起草给孙逸仙的答复^④。

(7) 同意越飞同志休假，并按通常的程序通过中央委员会拨给治疗所需的费用。

(8) 资助国民党的费用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中支付，因为工作是按共产国际的渠道进行的，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同越飞同志协调后向政治局〔提出〕关于追加拨给必要经费〔的建议〕。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328，第 1、2、4 页。

铅印稿。

-
- ① 看来是指 1922 年 10 月 25 日俄共（布）中央远东局秘密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划归中东铁路地带的策略的指示。特别是，文件中建议着手成立由边境一带居民和老游击队员组成的专门的俄中游击队组织，并派三四名可靠的党员作为可靠的核心参加该组织。计划将游击队派到满洲去同白卫分子进行斗争。一旦人民革命军同白卫分子在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就可以在中国领土上进行追击，直到彻底消灭为止。但目前还没有深入到中国领土和可以快速返回的通道（全宗 372，目录 1，卷宗 171，第 133 页）。
- ② 指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远东边疆区的执行机构——远东革命委员会。
- ③ 鉴于越飞于 1923 年 1 月 25 日去日本治病，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建议中国外交部将苏中两国关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移到莫斯科来，但是 1923 年 2 月 13 日，中国方面拒绝了这项建议。1923 年 3 月 2 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同意中国外交部提出的在北京重新恢复谈判的建议。
- ④ 以列宁的名义给孙逸仙的答复没有找到。

56

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速记记录
(摘 录)

1923年1月6日于莫斯科

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速记记录

〔……〕5. 中国问题。报告人马林同志。

马林：在上次执委会会议^①上，我已经根据当时拟定的提纲^②就〔1922年〕7月以来这段时间在中国开展工作的情况发表了几点简短的意见，那个提纲的主要之点是决定共产党员加入革命的民族主义政党国民党。在执委会会议上，同维经斯基进行了争论。

现在我想指出的是，中国总的形势，工人运动的状况，无足轻重的阶级分化，依我看是制定当时那个指示的主要原因，从那时以来，没有出现要求必须修改这一指示的事实。

四个月的工作表明，首先，我们避免了在工会国际工作中出现大的困难，〔但是〕由于同国民党民族主义运动领袖们的友好关系，我们在工人组织中引起了日益增长的矛盾。

其次，我们党在民族主义团体内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在7月

① 指1922年12月29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见第52、53号文件）。

② 见1922年8月通过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南代表的指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5—26页；托尼·塞奇：《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起源》英文版第328—329页。）

以后的时期里，我们出版了发行量达 7000 份的周报^①，该周报在民族主义人士当中广泛流传，并经常批评国民党，而且这种批评为民族主义人士所乐于接受。

我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表明有必要继续实行以往的策略。可以谈革命的机会主义，但在调整我们同亚洲各国民族主义运动关系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把革命民族主义作为原则，并承认它。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全部问题只在于如何调整同民族主义政党的关系。

在上次执委会会议上成立了中国问题委员会^②，但委员会没有召开会议。然而，从那时以来，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有许多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制定了关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几点提纲，提纲强调，我们要留在国民党组织内，经常不断地发展工人组织，在同国民党采取联合行动时，例如，10月10日在汉口和北京庆祝中华民国成立周年纪念日时，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口号，表明自己的政治性质，这样在中国阶级分化的危险时刻，我们有可能在国民党大会上表明自己的观点，并在将来建立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党。

我以为，在我们的会议上，应该宣读一下布哈林制定的提纲。（宣读提纲。见附件）^③。如果这个提纲被通过，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中国党在 8 月的党代会上通过的新指示^④继续像以往那样开展工作。

布哈林：谁想发言。东方部的维经斯基同志发言。

维经斯基：（用英语）（没有记录）。

① 指《向导周报》。

② 参加委员会的有：科拉罗夫、布哈林、马林、维经斯基、麦克马努斯、艾伯莱因、沙茨金。

③ 提纲没有找到。

④ 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 1922 年 8 月 29 至 30 日在杭州西湖召开的会议，会上在马林同志的压力下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

许勒尔：我认为，维经斯基同志的修正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第一点，即共产党不仅应该有自己的组织，而且她也应该是真正中央的^①和共产主义的组织，在听到关于我们党的中国式宣传鼓动方式之后，我觉得这个意见不是多余的。应该消除这种误解，即认为党应该只是国民党组织的一个支部，应该明确，她实际上应该成为中央的组织^②。

我认为第二点补充意见更为重要；我指的是关于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的问题。我感到惊讶的是，在草案中没有顾及到这一点。工会运动对于中国的工人运动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那里我们已经有50万工会会员。（马林：不切实际的数字！维经斯基：25万。）是啊，毕竟有25万，这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今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表明，那里的工人群众在工会方面也开始觉醒起来。

第三点意见，即共产党应该利用各种国民团体之间的矛盾，这也不是不正确的。

当然，策略应该非常灵活，而提纲中写到的，应该同革命的民族主义政党合作，留在那里，这在原则上也是正确的，但与此同时，应该经常注意到自己原有的共产党，因此应该善于利用各种资产阶级团体之间的矛盾。

总之，我认为，应该采纳吸收维经斯基修改意见的草案。

布哈林：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留在国民党内；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基本的组织问题。我赞成留下，任何一位同志都不会对这种必要性提出异议。这就是说，我们应该采取像我们建议英国党对工党采取的那种策略^③——当然要根据现时的特殊条件采

① 原文如此。

② 在1923年1月12日通过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中谈到，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见《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37页）。

③ 1920年共产国际指示英国共产党人参加工党，条件是保持共产主义工作的充分自由和独立性。

取不同的作法。

我们应该明确，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民族革命。各种对外政策问题也是与此相联系的。我想对同志们说，虽然这从哪方面说都不会提出异议，但我还是把决议中包含的关于对苏俄的政策的话加进决议之中，因为中国的形势迫切要求这样做，要知道国民党在悲观失望的形势下会试图同资产阶级国家结成联盟，因为它需要一个盟友。我们不能不谈谈这些问题。我把关于苏俄的话加进决议之中不是从苏俄的立场出发的，而是从中国总的形势出发的，正因为如此，我把这些话写进了决议。

至于说到一些争论的问题，在我看来，维经斯基的意见总的说来是可以接受的。

至于我们的任务，我只想对维经斯基同志的修改意见作点补充，对于我们党来说，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任务（要知道最重要的任务是中国的民族革命）是成立工人政党。（马林：那就应该勾掉第二个词“重要的”。）不，**特殊**重要的，主要是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在我看来，借助“**特殊**”这个词，我们才能解决问题。

至于说到组织工会，维经斯基的意见是可以接受的，马林也不会反对。在决议中只谈对国民党的态度。

至于最后一句话，维经斯基说，我们不应该解散国民革命战线，这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利用资产阶级的力量，实际上真正的自由资产阶级还不广泛存在。你们知道，中国的人口几乎有5亿，是地球上人口的三分之一，而无产阶级只有500万。因此，形势是辩证矛盾的。一方面，总的任务是民族革命，因此所有民族革命的、民主的人士，包括无产阶级在内，要结成统一战线来解决这个任务。另一方面，却没有无产阶级的独立运动；我们给自己提出的特殊任务是创立这个运动。这种矛盾的形势产生了矛盾的组织形式。

我认为，我们应该采纳我的决议案作为基础，让马林和维经

斯基去商量修改意见。如果他们取得一致意见，那么决议就算是确认了（提议被采纳^①）。

马林：我可以提个问题吗？您在这里^②说：“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组织内是适宜的。”我要说：“他们应该”，要知道，同中国同志说话应该用明确的语言。

布哈林：这样的问题要由任命的两人委员会来解决。

全宗 495，目录 1，卷宗 76，第 3、58—63、66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57

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 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

1923 年 1 月 13 日于北京

绝密

第七封信

外交人民委员部——契切林

政治局——斯大林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

^① 决议的最后文本于 1923 年 1 月 12 日由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见《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 37—38 页）。

^② 指布哈林的决议草案。

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加米涅夫

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

俄共中央委员——拉狄克

敬爱的同志们：

在这封信里，我尽量向你们分析在我上一封信发出后所发生的事件。

中国总的政治形势

曹锟集团为了遴选中华民国总统而发动的政变眼下总的看来可以认为已经失败。诚然，吴佩孚目前处于孤立状态。他在中国中心省的地位已被曹锟及其同伙取代。同时，吴佩孚先前的政府已不再存在，但曹锟至今不但没有当上总统，也没有完全建立自己的政府。正因为曹锟及其同伙在中国社会上没有扎实的根基，因此总的说来他几乎不能依靠任何人；正因为如此，曹锟的所谓政府，从总理张将军^①到最后一个部长，实际上都是一些没有政治作用因而得以当选部长的平庸之辈，由于他们的平庸，因此他们既没有强有力的反对者，也没有强有力的拥护者。尽管现时的总理已被国会批准，多数部长也已向国会推荐并得到国会的认可，但也不会改变这一事实，看来整个内阁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有名无实的议会内阁。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首先，国会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因为大部分议员是受曹锟集团贿赂的；其次，正因为国会可以完全批准现时的内阁，这个内阁也就完全有名无实。但是，曹锟集团由于自己的这一弱点，不会去冒险采取坚决的步骤，这首先是指建立比较固定的自己的政府，其次是指将曹锟当选总统后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诚然，在后面这个问题上正在加紧进

^① 即张绍曾。

行鼓动宣传，但未必会有成功的希望。

直系与奉系，即曹锟与张作霖的谈判，有一种说法是已经破裂，另一种说法是表面上还在进行，但无论如何不会给曹锟带来任何荣誉，也不会使他取得巨大的成功，这首先是因为张作霖本人目前接近孙逸仙比接近中国其他任何政治活动家更甚，并公开扬言，曹锟当选总统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其次是因为双方都缺乏谈判的诚意。曹锟决不会同吴佩孚彻底决裂，也不会同张作霖完全达成协议，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在张作霖面前变得软弱无力，而实际上的独裁者将是张作霖，而不是曹锟。如果说曹锟本人竟愚蠢到连这一点都不懂，那么他的拥护者是非常明白这一点的。另一方面，张作霖也不会同曹锟这样一个不受欢迎和毫无用处的人结成真诚的和完全的联盟。

吴佩孚

从上述这些事实中可以得出两点结论：首先，吴佩孚并不认为自己已经被彻底摧毁，他也有权这样认为。他非常清楚，他还没有最终输掉自己的党，因为那个曹锟没有同他彻底决裂，也不会决裂，因此他指望有朝一日，还会喜庆临门的。吴佩孚的情况很复杂，客观上会把他推向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最不利的冒险行为。

从我上述报告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任何一个中国军阀如果没有地盘，就像是一个没有马匹的骑手。每个军阀都需要地盘以便在那里生息、巩固、壮大。吴佩孚目前实际上只有一个河南省，如果他不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就没有任何前途，因为只在河南一个省，他不仅不能指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无力养活仍忠于他的师团。不要忘记，吴佩孚过去或许也没有大块地盘，但他能利用自己对中央政府的影响，实际上从铁路上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几乎全部收入（他每月从这些收入中可以发给自己的部队大

约 60 万中国元的军饷)。如果现在政府不掌握在他手里,那么这些收入就落空了,而这也是促使吴佩孚要去夺取更多地盘的一个原因。吴佩孚不可能向北方进军,这首先是因为正像曹锟不可能同吴佩孚彻底决裂一样,吴佩孚也不可能同曹锟彻底决裂。吴佩孚不可能对曹锟发起公开的军事进攻,无论在道义上,也无无论在武力上都不可能,因为在北京地区,正如我曾经指出的,部署着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将军的两万精锐部队,不管对他作何评价,他无论如何不是吴佩孚的拥护者(顺便说一下,关于这位信奉基督教的将军,我预言他将很快会为自己谋取私利,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据报纸报道,他要求在现时内阁中为自己谋取两个部长的职位)。由此看来,吴佩孚如果不想彻底毁掉自己,那么他除了向南方挺进以外别无出路。在南方,他必然会同孙逸仙发生冲突,但是因为孙逸仙的势力不是所有地方都是他直接控制的,而完全是通过收留孙逸仙的其他督军或者通过与他志同道合的其他派别间接控制的,因此对于吴佩孚来说,向南方进军要比向北方进军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他永远可以说,他不是反对孙逸仙本人,而只是反对某个“叛乱的”将军。

报纸上确实时常出现关于吴佩孚打算进军四川的报道。我认为这是十分可能的,更何况四川是个富饶的省份,占据四川使吴佩孚不仅可以维持生计,而且可以发展壮大。

无论如何,依我看,中国事变的后果首先是非常有可能吴佩孚同孙逸仙发生冲突,这些冲突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这无关紧要。当然,这种情况势必在我们同吴佩孚的关系上也有所反映。

不久前,正如我已经向你们报告的,吴佩孚的一位顾问薛^①,通过我们的伊万诺夫教授送来一封信,信中这位明显受吴佩孚本人唆使的人企图(据我对这封信的理解),首先向我们证明吴佩孚

^① 看来是指薛汉岳(音)。

的角色还没有演完；其次警告我们不要同现政府谈判。这封信连同我的复信附上^①。今天，显然是由于没有收到我的复信（我有意拖延一下，昨天才发出）而感到失望，吴佩孚或者是他的人向报界示意，公开宣布我们有人在吴佩孚那里（上面提到的薛确实是由我们派的，是霍多罗夫派到那里去的，尽管在我看来他根本不是我们的人）并试图让人们知道，似乎吴佩孚本人在蒙古问题上并不讨好我们。

我想用三言两语简单地谈一下蒙古问题，应当说近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某种活跃气氛：首先，日本人草率地在长春搞了一次蒙古代表大会，大会自然反对我们在蒙古的影响；其次，臭名昭彰的王太子那彦图沽名钓誉并完全卖身投靠中国人，接连不断地发表各种通电和信件，目的还是反对我们在蒙古。

不管怎样，业已改变的局势和吴佩孚的实际状况使他对俄国的态度有所恶化。我本人将利用自己的一切影响，使吴佩孚和我们的关系不致破裂，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得不在吴佩孚与孙逸仙之间作出抉择的话，那么无疑我们要选择后者。

孙逸仙

与上述事变发生的同时，孙逸仙的声望大大提高了。他不仅在福建省站住了脚，前已报告，他早已占据福建省，而且他的将军们也如我早就预见的，不久前已向广州进军。进军迅速取得巨大成功，因为首先，孙逸仙的主要敌人陈炯明客观上在南方由于同英国人的交往而早已声名狼藉，其次，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当地的工作更使他的影响遭到破坏。孙逸仙向陈炯明一发起进攻，陈炯明就无可依靠。有一种说法是他已逃跑，另一说法是还在勉强支持。但是谁也不会怀疑，他的戏已经唱完。这样看来，孙逸仙

^① 薛的信和越飞的复信没有找到。

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迟早会恢复在南方的全部影响。加之他利用最近几个月时间还在扩大影响，所以实际上整个南方，包括土耳其斯坦在内，将掌握在孙逸仙手里。考虑到张作霖目前正与孙逸仙联手，孙逸仙很可能在近期内实际上成为除吴佩孚还在支撑并可能支撑得住的一个省份和北京周围一小块所谓中国正式中央政府基地之外的整个中国的统治者。

此外，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谁是中国真正的政府，我们应该跟谁打交道？

当我在土耳其斯坦第一次接触到中国事务时，我曾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只跟中国中央政府交往，我们是否做得对，当时所谓的华南政府在思想上更接近我们，历史地说也更有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希望。

但是在那个时期，我们没有可能同南方政府，即同孙逸仙进行直接的接触。如果说现在，事态将按可以预见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同孙逸仙的直接联系将通过蒙古和中国的土耳其斯坦确立下来，那时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仍像过去那样客气地对待毫无用处的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中国中央政府，还是像孙逸仙在最近给我的一封信（附上该信，并请加以认真注意）^①中所要求的那样去做更好些呢，也就是说转而采取真正革命的政策，承认孙逸仙的革命政府是中国合法的政府，并只同他打交道。

还应该注意到，孙逸仙的党，即国民党以及孙逸仙本人，在我们的思想影响下，近几个月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本质：国民党确实正在成为中国群众性的政党；这个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公布了自己的纲领^②，此纲领也随信附上。孙逸仙本人明白了，

^① 见第 51 号文件。

^② 国民党纲领，1923 年 1 月 1 日。亦见国民党 1923 年 1 月 1 日宣言，那里引用了党纲（《中国国民党历史教训参考资料》第 1 卷（1894—1927）第 398—399 页）。

显然也承认了我曾多次劝说他的东西，即必须采取更积极的泛中国的政策，光靠军事手段不可能实现中国的变革，即实现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统一。至少，目前孙逸仙甚至向中国现政府派来了自己的代表，并从昨天起在这里开始谈判，由此证明，他希望通过政治的、外交的途径影响中国的政策，而不是单纯地使用军事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南方之行是完全必要的和十分有益的。首先，我要在那里进一步弄清情况；其次，我要在那里不仅对孙逸仙本人，而且对整个广泛的运动竭力施加影响。我将在南方更广泛地开展协调我们同中国社会各界相互关系的工作，就像迄今为止我在北方所做的那样。如果我不生病的话，我一定要找个借口，为达到这些目的去一趟南方；因此（附带说说）我诚恳地请求不要把我的南方之行看作是休假。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以后还想要休假，而只是为了使这次旅行的全部费用不记入我治病的账下，因为说实在的，我应该去南方进行巨大而繁重的工作，我之去南方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不是为了治病。我上面已经说过，即使我不去那里治病，现在我也需要去一趟。

我认为，中国在其整个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于真正的民族统一。但从另一方面说，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面临着如此之多的困难：首先是由于中国内部的混乱和分裂，尽管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混乱和分裂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像我上面指出的那样或许更加扩大；其次是因为中国独立的一贯敌人，即世界帝国主义。

依我看，正当孙逸仙取得极大成功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最有希望取得胜利的时候，法、英、美、日四个大国向中国发出照会，质问中国想以何种方式和从哪个来源支付自己的外债。尽管照会的口气还比较客气，但照会的作者们自然清楚地知道，中国无以支付，他们也知道首先是因为他们本身使中国没有能力支付。

众所周知，由于中国内部混乱，从盐业垄断组织得到的收入不纳入中央金库，中国政府的唯一收入来源是关税，而在这方面，中国的帝国主义“友邦”没有满足中国政府提出的允许它提高中国进口的外国商品的关税。经过多次和漫长的谈判，中国政府好不容易得到外国人的同意提高5%关税（与此同时，中国进口的外国商品的定价还是战前的定价），但外国人不同意更多地提高，这样一来，他们要求中国支付外债，实际上他们自己又使中国没有可能支付。计谋是十分清楚的。日本的报纸，甚至自由派的报纸，都在公开鼓吹中国必须实行国际共管。一部分英国报纸也在鼓吹这一点，另一部分自由派色彩较浓，对中国比较友好的报纸明确谈到必须对中国的中央财政和国营铁路实行国际监督，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正当中国最有可能实现全国统一的时候，帝国主义提出某种“Memento mori”^①，并预先警告，它是不会允许这种民族统一和民族解放的。

现在回过头来再来谈一下关于我们在中国的政策的老的争论问题，我只想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在中国革命发展的时刻，向中国提出我们的财政要求，从而同国际帝国主义一起站在中国革命的对立面。

详细情况到南方后再报告你们。就此搁笔。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越飞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6，第 1—8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拉丁文，意为“别忘死亡”。

58

托洛茨基给越飞的信

1923年1月20日于莫斯科

秘密

亲爱的阿道夫·阿勃拉莫维奇：

感谢您寄来的（第3封）详细的信^①。可能有些情况我没有估计到，但我总的印象还是您错误地估计了政治局在中国问题上的政策。政治局同意您的总的提纲^②。政治局特别强调，不管中国出现任何政府组合都必须继续在支持孙逸仙的民主组织和配合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方面进行系统的工作，并决定征询您的意见，为加强内部的系统的宣传工作可能需要多少款子。由此可见，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根本谈不上对您表示不同意您的意见。

看来还有一个单独的确实很尖锐的中东铁路问题^③。不管您怎样认为，但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放弃帝国主义要以放弃我们的财产权为先决条件。既然中东铁路是我们在中国领土上的国家财产，无疑它是帝国主义的工具。铁路既然转交给中国，它也

① 这封信没有找到。根据托洛茨基当天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信中援引的越飞这封信的摘录和给越飞复信的副本判断，信是寄给托洛茨基本人的。托洛茨基在上述给政治局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信中写到，越飞“抱怨政治局对他不信任，束缚他的手脚，没有看他的报告……信的基本内容如此。”托洛茨基在这封信中认为越飞不满的原因是外交人民委员部领导人契切林和李维诺夫本人对越飞的否定态度（全宗5，目录1，卷宗2145，第79—80页）。

② 见第55号文件。

③ 托洛茨基这里和以下指的是越飞关于“无偿地”向中国转交中东铁路财产权的建议，越飞于1922年11月25日在给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第4封信中提出了这样解决的理由（全宗5，目录1，卷宗2145，第79—80页）。

是巨大的经济文化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农民必须靠俄国农民来拥有铁路。您说，中国反正不能支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旦中国国家政权稳定，它可以比苏维埃共和国更快地得到贷款。我们可能也应当帮助孙逸仙在中国稳定内部制度。为什么孙逸仙或者别的什么人不能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地和逐步地给我们偿还中国人民将使用的这条中东铁路的费用呢？为什么说这是帝国主义？

您反复说中国贫穷。但我想起了一件事，您曾经间接地向苏俄建议给中国不知是4000万卢布还是4000万美元的贷款，当然您还非常慎重地说明，“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能力提供这笔贷款。”^①亲爱的阿道夫·阿勃拉莫维奇，请允许我提醒您，俄国也很贫穷，根本没有能力来资助它周围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国人民。不言而喻，向中国放弃中东铁路的财产，也就是说赠送8亿卢布，另外再加上提供4000万卢布贷款（显然也没有偿还的希望），这是非常诱人的举措。中国人得到了铁路，4000万卢布很快就花光，然后又要求继续贷款，而如果得不到这些东西，他们就面向美国，把自己的好感转向那里，这一点我们通过土耳其的例子已经多少看到。物质恩施所取得的那点好感是非常不稳固的，因为我们的敌人可以提供更多得多的恩施。我们取得的好感，按本质来说是由于我们实行解放的国际政策所取得的，是同被压迫各族人民的民族民主愿望相一致的，要更稳固和更牢固，尽管取得的比较缓慢。而恰恰在上述这方面，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您的政策。

您抱怨说，您的权力进而您的主动精神太受形式上对中央依赖的束缚，并说德国代表鲍耶享受着更大得多的独立性。我不知

^① 指的是越飞建议“给中国提供4000—5000万金卢布贷款”一事，建议是在他于1922年9月12日给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第2封信中提出的（全宗5，目录1，卷宗2145，第21—22页）。

道现在德国人在这方面有哪些规章，鲍耶做得是否正确。但无论如何，德国的政策，特别是在中国的政策，现在具有相当虚无缥缈的性质。不管鲍耶的权力如何，在钱财上大概接近于零。很可能，资产阶级代表们的权力形式上仍保留着战前所确定的范围。但是在战前，政治路线要明确得多。一切国际关系都比较稳定，每个使节也都在一定的条约、关系和传统的轨道内工作。这也可以说，外交具有稳扎稳打的性质。目前，整个局势（这一点您不比我不知道得差）已根本改变。外交具有很大灵活性，在伦敦采取一种手腕，在北京或东京则采取另一种手腕。正因为这样，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要有在世界决策的最重要方面具有广阔视野的有洞察力的政治家，同时要有协调外交战线各据点的策略的坚定的中央。当然，这是受某些技术上的不便所限制的。但是我以为，这些不便在我们集中灵活的外交政策优势面前会远远退居次要地位。我毫不怀疑，在中央我们犯有不少错误，这是由于对局势的某些特点不够了解所致，特别是在东方。但总的来说，采取另一种政策未必可能。我再重复一遍，问题根本不在于政治局委员的“官方”程序，您认为中央委员会对您“不信任”（或者说不够信任）的揣测，在我看来是毫无根据的。只是由于您大部分时间是在莫斯科以外、在俄国以外的地方度过的，才形成了您的这种观念。

全宗 325，目录 1，卷宗 410，第 54—56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59

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

1923年1月25日于赤塔^①

共产国际东方部，副本。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拉狄克同志、布哈林同志

敬爱的同志们：

我是在赤塔写这封信的，我在这里已有一个星期，明天将沿黑龙江去海参崴。莫斯科到赤塔路上共7天，而赤塔到海参崴共6天。

我在赤塔想了解我们这个遥远边区的政治状况。在当地党的人士当中，对目前同我们邻国即日本和中国的相互关系有两种看法。在同远东革命委员会主席、远东局书记和集团军军长^②的一次会晤中，科博泽夫（远东革命委员会主席）提出这样一种观点：日本准备在今春对我们发起新的进攻，证据是：日本的破冰船正在接近我国海岸（海参崴港附近），张作霖的部队在日本教官的率领下正在北满集结，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帮助俄国白卫分子在日本、朝鲜和中国重新组织起来，最后，在萨宗诺夫（社会革命党人）和哥萨克首领谢苗诺夫的领导下在东京成立所谓的“西伯利亚政府”。

集团军军长提出了另一种观点，日本最近不打算进犯我们，它

① 日期是根据维经斯基1923年3月8日给萨法罗夫的信注明的（见第65号文件）。

② 分别指 П·А·科博泽夫、Н·А·库比雅克、И·П·乌博烈维奇。

非常希望同我们进行经济上的交往，证据是日本企业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中国军队在中东铁路沿线的集结，只是为了一旦我们打算用武力夺取这条铁路时好保卫它。中国军队不是一股了不起的力量，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对付他们。

这里对张作霖存在一致的坚定不移的看法，他是日本的走狗，奉行的是日本的政策，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从苏俄方面说，同他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给他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即使是间接的帮助，都意味着加强敌人的力量。

他们认为孙逸仙对张作霖的态度，不仅表现在前者对后者在道义上的支持，还表现在组织上的联系，他们认为这都是事实，因此，他们对越飞采取的主要面向孙逸仙的策略采取否定的态度。

不言而喻，地方上的党和苏维埃机构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不可能成为我们远东局工作的指导方针，但无疑对它必须加以考虑，因为我们是在中东铁路和俄国远东地区的中国居民中进行工作。例如，当地的领导机构认为，必须寻求一种斗争方式来对抗中国商人团体的影响，因为他们是张作霖或曹锟的拥护者，而曹锟又是满洲和华北的实际权力的代表，同时，我们的同志还认为，国民党的各级委员会不能与这些团体相抗衡，因为在我们这块领土上的大多数中国居民（小商人和工人）都反对张作霖，而张作霖同孙逸仙的联系引起了当地中国居民对国民党的反感。

关于北满两万中国游击队员（红胡子）的问题也同样如此，他们开始自称是革命队伍，有时甚至自称是共产党的队伍，因此必须向他们提出一些口号。假如可以向这些具有一定反张作霖倾向的队伍提出国民党的口号，那么可能会使这些队伍变成中国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但是孙逸仙同张作霖的联系又使我们不能这样做。

由于今春张作霖和吴佩孚之间将进行一场争斗，我党面临着如何对待这场争斗的策略问题。同张作霖有联系、实际上害怕吴

佩孚的孙逸仙无疑会在道义上（或许还不仅仅在道义上）支持张作霖。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实际上支持张作霖。在我们远东地区的中国居民自然不会同情张作霖，而会反对他。结果就会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华中和华北支持张作霖，而我们这里将不得不或者是对迫切要求我们作出反应的事件根本不作反应，或者是采取与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路线完全相反的行动，因为在这里根本不可能开展争取张作霖胜利的运动。相反，这里的形势是，人们从这样一种角度来看待张作霖同吴佩孚的争斗，认为这将削弱日本对我们的压力和缓和在中东铁路和北满的反革命气氛。这也就是说要促使张作霖失败。即使向吴佩孚进攻的不是张作霖，而是孙逸仙（孙逸仙在南方取得胜利后这是很可能的），而张作霖只是帮助孙逸仙的一个因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这里也不可能采取反张作霖之外的别的政策。

我认为，考虑到当地的情况同时又不丧失中国国民运动的总的前景，我们在这里采取以下的行动将是正确的：（1）开展反对孙逸仙和吴佩孚争斗的运动，相反，以联合孙逸仙和吴佩孚力量的形式具体提出统一中国的思想；（2）对张作霖集团和重新接近他的曹锟实行对抗的路线，激烈批评这些反动势力。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害怕，反对张作霖的行动和斗争会多少削弱中国民族力量对帝国主义的反抗。相反，这样的斗争会削弱日本方面对中国民族力量的压力和增强在张作霖世袭领地满洲和中东铁路沿线居民的革命精神。

这一次只简短地报告这些，到海参崴后再就中国问题、朝鲜问题，特别是日本问题作详尽的报告。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维经斯基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1，第 1—2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60

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 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

1923年1月26日于上海

绝密

第八封信

外交人民委员部——契切林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
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
中央政治局——斯大林
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加米涅夫
俄共中央委员——拉狄克

敬爱的同志们：

本月27日我将去日本，临行前我想详细地报告一下中国情况。

一、中国情况

总的形势

在我写上一封信以后，中国的形势发生了以下变化：（1）北京中央政府已取得国会的信任表决，更确切些说，名义上已经国会批准行使自己的职责；（2）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的冲突更趋尖锐化；

(3) 孙逸仙在南方的成功大大加强了，目前他不仅占领了广州，而且实际上控制了整个南方，不仅在思想上，而且也在军事上。我不认为头一件事情具有什么意义。国会只是在玩弄把戏，自己安慰自己似乎它的作用十分重大，实际上它在日渐衰落。衰败的国会通过信任表决自然不可能巩固尚未立足的内阁，而实际上内阁依然形同虚设。因此，国会选出平庸而无个性的部长们既不能丝毫加强部长们的地位，也不能丝毫巩固国会的地位。无怪乎对取胜的（曹锟）集团持友好态度的报纸惊恐不安地指出现时内阁不稳固，并对它的地位表示怀疑。

具有更重要意义的是第二个事情。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的冲突，我在上一封信中曾从纯理论上作了预言，现在得到了实际的证实。

在上海这里，斯达尔克终于卖掉了5艘小舰艇^①，3艘是由中国一位将军齐洪万（音）^②买走的。受我的委托在北京的达夫强同志曾就此事向上海总督和外交委员（据说他们都暗地参与这个勾当）正式提出抗议。两艘是偿付某公司的船只修理费。我现在确切地弄清，中国将军向斯达尔克购买舰艇和武器是受吴佩孚的委托的，目的是在福州反对孙逸仙。这是第一个实际事例，证明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的冲突正在酝酿。

另一方面，吴佩孚对蒙古问题采取新的态度也具有这种证明的性质。

蒙古问题不知为什么又重新被提到政治上关注的中心。臭名

① 在1922年11月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部队解放海参崴期间，原太平洋舰队司令斯达尔克从海参崴劫走太平洋舰队和志愿船队的27艘舰艇。1922年12月6日，拥有16艘舰艇的太平洋舰队到了上海附近的吴淞口。1922年12月8、9和12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代表处，向中国外交部发出照会，要求立即将被劫走的舰艇交还给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但中国当局没有满足这些要求，并让斯达尔克卖掉了几艘舰艇（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俄文版第6卷第601—602页）。

② 可能是齐燮元。

昭著的蒙古王太子那彦图就蒙古问题发布了旨在坚决反对我们的通告。这件事引起了一片喧鬧。曹錕这方面发表了通告，要求蒙古尽快回到中华民国的怀抱，并指出应该尽快派军队到外蒙用武力将俄国人从那盟赶走。曹錕派的许多将军也这样要求。北京现政府（其总理不久前还是蒙古委员会主席，名义上他仍留在这个职位上）声明，它很重视这个问题，并将成立专门委员会来解决这个问题（蒙古问题）。

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个问题突然受到如此重视。虽然现总理张绍曾将军是所谓蒙古委员会的主席，但光是这一点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围绕蒙古问题又重新掀起这种喧鬧。因此我认为，报纸上关于不久前在长春召开了蒙古王太子会议（哪些王太子的会议和整个问题何在，谁也不确切地知道）的报道比较清楚地说明了这种喧鬧的原因。日本在蒙古的利害关系是早就众所周知的，而曹錕的政变客观上和在很大程度上是亲日本的，这一点我已经多次指出。但是日本近来如此卖力地巴结我们，同时又力所能及地玷污我们，这是毫不奇怪或者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日本内部的混乱和杂乱无章，即所谓“狗咬狗”的情况下，日本政策的矛盾是完全合乎规律的。

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某种很具体的矛盾。我从北京出发前，一家在蒙古边境某地为蒙古出版的中国报纸的编辑^①来找我。这家报纸是在安福派统治时期创办的，领导这家报纸的至今仍是安福分子，至今还试图鼓吹安福派（即日本）在蒙古的影响。现在这家报纸的编辑特别向我表示，他完全同意我们在蒙古的政策，并愿意在任何方面尽力效劳，特别是在内蒙和外蒙传播我们的信息方面。有趣的是，这位编辑常年住在北京，甚至还是中国记者协会主席团的成员，但这期间他从未访问过我，虽然未必还能找得

^① 不能确定是哪个编辑。

出第二个不会来访问我的中国名记者。现在他带着愿意效劳的建议到我这里来，这恰恰是在日本的压力下在蒙古问题上特别加紧诽谤我们的时候，而从另一方面说，也是孙逸仙在华南取得胜利的时候。这真是异乎寻常的事，但可以理解。孙逸仙胜利了，孙逸仙是俄国的朋友；安福分子希望成为孙逸仙的朋友，那就是说，需要同越飞和好。而明智的政治家总是派适当的人来同我谈判。然而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能实行合理政策、只企图更多攫取，他们继续执行侵略的和反俄的政策。在日本的政策中，这两种倾向经常在各个方面的交叉表现出来。

但是，在蒙古问题的整个喧闹中，最重要的是，吴佩孚也在俄国所有敌人的大合唱中提高了自己的嗓门，并发出一份令人极难理解的通电，其内在涵义只能解释为，吴佩孚试图证明，他在蒙古问题上决不讨好俄国〔但与此同时，他实际上答应一定支持我们的政策，即在一定时期里不可能让我们的军队撤出外蒙古。因此，我们在给吴佩孚的最近一封信中（副本你们一定已经收到^①）〕，特别强调吴佩孚在蒙古问题上说过的话和对我作过的许诺。

这一事实最有力地证实了我的信念：**使吴佩孚成为孙逸仙敌人的客观形势也在迫使他改变对俄国的方针。**

吴佩孚一方面面临着绝对需要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问题，另一方面正如我在上一封信中指出的，又没有向北面扩张的可能，因此他必然要考虑不仅向南面扩张（这使他与孙逸仙发生冲突），而且向蒙古方面扩张（这使他与我们发生冲突）的途径，更何况，作为反对张作霖的迂回运动的蒙古途径早已是吴佩孚的宿愿，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早在长春时期^②我就指出了吴佩孚向蒙古方面的某些战略上的重新部署，这在当时吓坏了张作霖并破坏了他同我

^① 见第47号文件。

^② 指1922年9月长春会议时期。

的关系；如果你们也还记得的话，吴佩孚本人曾一直说，我们对蒙古的占领只保持到1923年春为止，即到制定向张作霖发动进攻的计划时为止。

总之，由于上述这一切的后果和我所指出的第三个事实，即孙逸仙在整个南方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关系的尖锐化立即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我早已提出的问题：一旦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发生公开冲突，我们应该选择谁。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我对这个问题早就坚定不移地回答：如果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的话，我们决不能支持吴佩孚去反对孙逸仙。

当我在这里认识了孙逸仙，亲眼目睹了他所领导的运动的规模和意义时，我更加深信不能这样做。因此，我完全不想掩饰我同孙逸仙的联系和我对他的亲近，相反，我竭力去达成如纲领性文件^①中所表述的那种协议，这个协议被大家理解为俄国和孙逸仙之间的协议。

我不想浪费时间来评述孙逸仙；只想说一点，他无疑是一位正直的革命家和诚挚的热心者。或许这后一点使得他的一些在本质上革命的而在革命谋略上大胆的计划 and 打算变成了纯粹的虚构妄想，需要有一位更加现实的政治家把它们落到实处。

我也竭力在这样做，也还需要给他以公道，当你给他指出错误时，他很快就同意，并愿意作必要的修改。

我经常强调指出的他的主要缺点是：对群众和宣传鼓动问题注意不够，现在他正在充分地加以弥补；他不仅在不久前发表了党的纲领^②，而且想在近日内发表告全中国人民的宣言；他立即同意发表关于我同他会谈情况的正式报道；他把许多报纸掌握在自己手里，本周末他将去广州，以便直接从思想上接触和影响海

^① 指1923年1月26日越飞和孙逸仙的联合宣言（见《苏中关系文件汇编（1917—1957）》俄文版第64—65页）。

^② 见第57号文件注（本书第197页）。

关工人和革命军队。

更有甚者，他知道我曾一直维护孙吴协议，以便成立他们的联合政府的政策，而现在，当他的全部计划都是反对吴佩孚时，他还对我说，他不是个学理主义者，准备抛弃一切计划，并同吴佩孚携手合作，如果吴佩孚真诚同意的话，或者比方说我能说服吴佩孚同意孙逸仙的意见的话。对此，我不得不回答他说，目前我看不出有这种可能性，相反，我认为，吴佩孚的客观状况迫使他不仅反对孙，而且也反对我们。我只是补充说，孙对吴的讨伐应当在思想上做好准备，并进行这样的解释，使所有人都清楚责任在吴佩孚身上。

在我离开北京以前，我同海关上的孙逸仙拥护者和我们的人^①商定，由他们组织自己的电讯社。现在，孙逸仙可以向该电讯社提供适当的材料，这样一来，鼓动宣传工作就可以从南北两端开展起来。

说实在的，在中国事务上现在除孙逸仙的计划外想不出任何别的办法，孙的计划有两套，一套是立即行动的计划，另一套是在第一套计划失败后采取的。

孙逸仙的第一套计划

根据这套计划，孙逸仙首先打算彻底消灭陈炯明。

陈炯明从广州被迫出逃后，躲在广东和广西两省交界的一个叫做梧州的地方。据说，他有为数约一万人的部队。孙逸仙打算派自己的军队从两面向他进攻，这样包围他并捉住他。但他认为，如果陈炯明得以逃脱则更好，因为那时吴佩孚的军队会去搭救他，这样孙逸仙的军队和吴佩孚的军队必然会发生冲突，这就更容易被人理解。我认为，孙逸仙还忽视了一种可能性，即陈炯明未能冲出包围，而孙也不能把他捉住，因为逃到海上的陈将得到自己

^① 即共产党人。

的朋友和盟友英国人的救援；孙逸仙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这是可能的，但他认为这并不危险，因为他不会允许陈炯明恢复自己在广州的影响。

不管怎样，在战胜陈炯明之后或者在进一步追击他的情况下，孙逸仙认为同吴佩孚的冲突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并打算派自己的军队从两个方面，即从效忠于孙的湖南省和从孙拥有自己10万军队的四川省向后者进攻，也就是向吴佩孚得以支撑的河南城市洛阳和汉口^①进攻。

与此同时，张作霖必然会进攻北京并占领它。孙逸仙认为，驻扎在北京地区的“基督教将军”冯玉祥不是跟他很敌对的。曹锟一伙本身无力进行激烈的抵抗。

在这套计划的下一步发展中，张作霖应把北京交给孙逸仙，孙逸仙打跨了吴佩孚之后就会作为**统一中国的代表**进驻北京，因为那时各省都在孙的统治下。

我曾问孙逸仙，为什么不通过和平方式进驻北京，因为我认为，在北京政府目前混乱的形势下和在北方遭到完全破坏的情况下，由于孙逸仙在全国的名望和声誉日益提高，孙足可以作为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以便以全中国（民选）代表的身份进驻北京，但孙逸仙回答我说，这样做或许是对的，但是按照中国的习俗，毫无疑问的是，假如他不用军事力量战胜自己的敌人就进驻北京，那么即使他被选为总统，也丝毫不能使他免于一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北京会被暗中谋杀。

在顺利情况下的计划就是这样。根据孙逸仙本人的意见，这套计划的致命弱点是：第一，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孙逸仙不可能投入必要数量的军队去进攻吴佩孚，因此也就不可能将他彻底打败。

^① 原文如此，汉口在湖北省。

为了消除这种危险性，孙逸仙需要最多约 200 万墨西哥元（相当于几乎同样数目的金卢布）的资助，而孙逸仙坚定不移地希望我们给他提供这笔款项。第二个危险是，张作霖占领北京后，由于吴佩孚这时把注意力放在同孙逸仙作战上，张就会改变主意，不愿把北京交给孙。在这种情况下，孙逸仙也坚定不移地指望得到我们的帮助，即指望我们佯攻满洲以便把张作霖的力量从被他占领的北京引向那里。

我回答孙逸仙说，关于我们在上述两方面的援助问题，我立即征询本国政府的意见，但我本人对我们资助的可能性持完全悲观的态度，我认为，我们在军事上援助，即根据同孙逸仙的协议向满洲进攻，要更现实和更可能得多。

不过我当时就补充说，无论孙还是我们都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在我们向满洲进攻时，日本可能会在那里向我们进攻。

孙逸仙的第二套计划

如果孙的第一套计划由于没有上面所说的我们的援助，或者某种其他不可预测的原因而不能成功的话，孙逸仙以其固有的毅力和对失败的一贯态度，已经制定了第二套长期的计划，这套计划完全建筑在我们的基础上。

看来，孙逸仙是从这样一个考虑出发的，认为他迄今为止的一切失败其原因就在于，他始终只以南方为基地，因此完全依赖帝国主义列强。

大概有鉴于此，他希望把自己的纲领建立在完全不依赖帝国主义列强而单纯指靠我们的基础上，尽管他也说，坚决与他敌对的只有英国，美国支持他，日本对他与其说敌对，不如说同情（无论如何，安福分子拥护他），而法国则持中立态度。

更有甚者，孙逸仙以南方为基地则始终必须注意到，“列强们”可能随时会割断沿海地区，迫使孙逸仙按照它们的笛声跳舞。因此，孙逸仙认为如果把自己的基地转移到国内腹地，更靠近我

们，那么在同我们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列强在太平洋沿岸的各种破坏行为是绝对不可怕的。

目前在这里，可以谈穆斯林中国，即东土耳其斯坦及其毗邻的省份，都处在孙逸仙的强大影响之下。这种影响势必日益加强，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同我们的紧密和直接的联系。

然后从四川，通过不触及军阀势力范围的途径，即通过广西、山西等省，将孙逸仙在那里拥有的10万军队转移到蒙古边境地区，并在富产粮食和富裕的省份，在经过东土耳其斯坦和经过库伦与我们直接可以接触的地方驻扎下来。

这支军队由我们来装备起来（孙逸仙希望不要我们提供军用装备和服装等等，但一定数量的我们的军事教官是必要的）。一旦这支军队进入充分的战斗状态（孙认为，这需要一年到两年时间），那么就着手进行最后的“北伐”，无疑这次会是成功的。在这种情况下，列强的任何干涉都将不是危险的，因为它们即使切断沿海地区也不可能损害这一计划的实现，而它们决不会冒险从沿海地区向内地进军。只有日本可能从满洲进犯，但这也并不可怕，因为现有的10万军队是一支足以在某些边境地区遏止日本的力量。

根据孙逸仙的意见，在这套计划中，我们不应同北京政府签订条约，或许我们还不得不将我的使团所在地迁到我可以同孙进行联系的海参崴。孙逸仙的第二套计划就是这样。

我已用书面形式阐述了我对这套计划的意见（意见书随信附上）。孙逸仙同意我的所有政治上的修改意见，只指出我对蒙古问题上的意见不正确，因为他不考虑把军队驻扎在蒙古本土，而只驻扎在蒙古边境地区。

由此可见，孙逸仙现在打算按照我所建议的政治—外交—军事一体化的方式行动。

但孙逸仙的这一套从头到脚完整彻底的计划完全指望于我们

的帮助和支持。

一旦没有我们的帮助和支持，孙逸仙就不得不同帝国主义者妥协，进而同受帝国主义者奴役的北京政府妥协，这样中国的国民革命就将长久地拖延下去。

因此，中国发生的事件向我们严厉地提出了以下问题：

(1) 我们是否准备向孙逸仙立即提供 200 万金卢布或者另外一种数额（多少？）（如若同意，钱款一定要由信使带给我）。

(2) 我们是否准备在必要时向张作霖发动进攻，把他从北京吸引过来？

(3) 我们是否准备在一两年内给孙逸仙的 10 万军队供应武器（也提供一定数量的教官），当然，这毕竟不应是欧洲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军团。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我们在何种规模上和什么时期内可以给孙逸仙提供武器帮助？

我提出这些问题，我本人对所有这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尽管我曾接到过中央对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建议的批驳^①。

我在写这封信时，我也知道我们的所谓政治“兴趣”，因此我非常担心，现在在洛桑会议^②期间，在法国占领鲁尔地区以及巴尔干开始出现政治纠葛的时期，甚至没有人会来看我的信。

但是，倘若有人来看的话，我想提请他注意，不管欧洲发生什么事件，远东毕竟是帝国主义的致命弱点。不管现在在近东和欧洲发生什么事件，将来解决世界历史问题终究在这里，在太平洋，在中国。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对近东和欧洲的事务表现出最大的关注和积极性，但是我们决不应因此而忽视远东的事务。

目前，中国正处在历史上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

^① 见第 35 号文件。

^② 指为讨论土耳其在反对英国和希腊武装干涉（1919 至 1922 年间）取得胜利后的近东问题而召开的洛桑会议（1922 年 11 月 20 日至 1923 年 7 月 24 日）。苏联代表参加了关于海峡公约草案的讨论。

行将灭亡的帝国主义不得不在这里接受北美合众国的构想，即目前暂时只需要经济上的成果，而不是政治上的成果，因此它会对中国作出政治上的让步，甚至将已经占据的领土归还给它。

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运动还从来没有这样强烈，也从来没有这样临近胜利。如果中国的国民革命现在只是由于我们的帮助而取得胜利，那么这正意味着，是我们把世界帝国主义摔倒而使其双肩着地的，我们在全世界将是民族解放斗争和民族殖民地革命的卫士。如果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只是因为我们拒绝帮助而不能取得，那么这将意味着，帝国主义要比我们强大得多，是它战胜我们，而不是我们战胜它。因此民族殖民地革命将不能指望任何人。

我不认为，这种情况会提高我们的世界威望，会减轻我们在近东和欧洲的斗争。

要知道，假如我们有集中的真正统一的对外政策，那么我们在这一取得的外交胜利就能够在洛桑、在伦敦大大加以利用^①。

我的东京之行和同孙逸仙的协议就像两枚炸弹在英国人的身上爆炸，痛得他们号啕大哭。如果我们善于成为外交家，我们就应当在洛桑和伦敦利用这一点。向我们的英国对手作出微妙的暗示，英国在近东和欧洲事务方面的行为迫使我们在远东进行报复，并指出在一定情况下，在他们采取行动时，我们会在东方走得更远。

不管我们的红军多么出色和多么强大，不管它是我们多么坚强的支柱，我们的主要力量毕竟在于，我们是世界革命的先锋队，如果没有革命或者离开革命，我们就会像没有头发的软弱婴儿一样，失去自己的全部力量。

过去有个时候，我们不那么节俭从事，因而更具有远大目光，

^① 看来是指苏联外交在同英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方面的努力。

我们能理解这一点，我们曾实实在在地帮助过凯末尔，而那时完全不清楚，凯末尔运动的结果会如何，也不知道在最重要的时刻他是否会背叛我们。我们帮助他只是因为凯末尔运动是民族运动，也就是说是反帝的运动。当时我们不那么节俭从事，这给我们现在带来什么好处呢？

但是，孙逸仙远不是凯末尔，他在更大程度上是我们的人，是革命家。如果我们现在同他一起携手并进，他决不会背叛我们。而中国在世界上的分量无论如何不亚于土耳其。

难道所有这一切不值得我们花那 200 万卢布吗？

我再重复一遍，远东的事态正在急剧地复杂化，目前正处在最危急的时期。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越飞

附：

- (1) 我对孙逸仙两套计划的意见^①。
- (2) 供报纸发表的我和孙逸仙的公报^②。
- (3) 孙逸仙的宣言^③。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6，第 19—31、35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见第 61 号文件。

② 指 1923 年 1 月 26 日的孙越联合声明。

③ 实际上没有。可能是指 1923 年 1 月 26 日发表的孙逸仙关于和平统一国家的必要性的声明（见《孙逸仙选集》俄文版第 307—311 页）。

61

越飞对同孙逸仙合作 的前景和可能产生的后果的看法

1923年1月26日于上海

绝密

第八次报告^①的附件

对孙逸仙博士现有计划 的几点看法

鉴于最大可能地实现孙逸仙博士计划的一切条件已经具备，即俄国能够在最大限度的范围内履行它所承担的任务，因而孙逸仙博士有可能彻底而毫不妥协地实现自己的计划，——但毕竟还需要估计到以下后果：

一、因为彻底实现这一计划需要至少一至两年，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可能发生和应该预计到各种可能性，首先是中国内部的重新组合。

1. 从现时中国正在争斗的各派系（主要是军事集团）中，如果认为运动重心甚至向西北方向转移的情况下，张作霖仍然是孙逸仙博士的拥护者的话，则必须预见到，吴佩孚决不可能不是一个障碍，首先是因为吴本人正处在从南向西北进军的途中，其次

^① 指第八封信（第60号文件）。

是因为吴不可能满足于自己目前的状况，相反，他必然要恢复目前失去的作用和势力，必然要或者向南方，即向与孙逸仙博士正相反的方向扩张，或者向蒙古方向，即向孙逸仙博士所要进军的方向扩张。因此，在两种情况下，后果必然是同孙逸仙发生冲突。

2. 在西北建立根据地的情况下，自然不应忽视南方，相反，整个计划只有当南方完全控制在孙逸仙博士手里的时候才是现实的和慎重的，然而很难设想，在这一两年的间隙中，南方会不发生任何变化，会不产生哪怕实行政变的图谋，例如，从陈炯明方面来说，他可能独立地，或许在英国人的协助下，竭力来恢复自己的地位。

完全偶然的、但不大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如这里某个新将军的行动，并未考虑在内，但必须估计到，上述可以预见到的中国国内生活中的两种情况，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大大阻挠孙逸仙博士的计划付诸实现。

二、至于在实现这一国际性计划中的复杂情况和困难，那么：

1. 恰恰最近，国际帝国主义对华北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例如，最近一年来，在满洲的英国企业的数目（诚然数目还不很大）增加了59倍。北美合众国，特别是日本对满洲和蒙古的兴趣是众所周知的。

在这种情况下，孙逸仙博士向北方的任何行动都会吓坏帝国主义者，并使他们采取某些戒备措施。

2. 世界帝国主义始终企图利用一切有利时机来更加残酷地奴役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近来甚嚣尘上的关于使中国“国际化”和“对中国财政进行国际监督”的议论不可能是完全偶然的，而由于在孙逸仙博士的计划彻底贯彻执行之前确实不可能在国内出现安宁，上面所述世界帝国主义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更加残酷奴役的企图，如果说由于某些列强之间不能达成协议而不会导致世界帝国主义的坚决行动的话，那么毕竟也会给中国造成经常性的

威胁，使孙逸仙博士的运动在广大民众中失去在没有外国帝国主义的经常威胁的情况下所具有的那种吸引力。

3. 外国干涉的这种威胁，随着孙逸仙博士接近俄国，无论是在直接意义上还是在间接意义上的接近，也就是无论在友好交往意义上还是在领土近邻意义上的接近，都将如果不是在事实上，也将在口头上变得越来越严峻。

对于运动的思想领袖来说，这些威胁并不那么可怕，但它毕竟会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造成某种不利的气氛。

三、孙逸仙博士的“最高纲领”对俄国来说必然造成以下后果：

1. 由于俄中谈判，即俄国大使越飞同官方中央政府即北京政府的谈判为国内众人所期待，并在形式上只能推迟到越飞治病结束后，即到3月初，因此谈判的进一步推迟会造成不良印象，特别是考虑到俄国敌人的大规模鼓动宣传工作，会被说成是“苏联政府改变了政策”、“回到沙皇时代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上”、“准备占领满洲”等等，等等。

2. 此外，在上述鼓动宣传的影响下，进一步推迟谈判甚至会导致北京政府向莫斯科提出召回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使团的要求。

3. 而莫斯科同北京的公开分裂必然引起相互召回所有使节，会引起关于“战争”、“俄国对中国使用暴力”等等的议论，并给渴望奴役中国的列强，特别是日本提供口实，以“拯救”中国免受苏联侵略为由进行干涉。

4. 最后，过久地推迟谈判对于俄国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感兴趣的两个问题上，即在蒙古问题和中东铁路问题上，俄国不能再推迟解决。

上述一切使得有必要对孙逸仙博士的现有计划提出下列具体细节：

1. 整个计划应保守秘密，在尽可能长的时期内不让任何人知道。

2. 计划应当不仅以军事手段，而且以开展国内最广泛的鼓动宣传方式来实现，以有利于全中国在孙逸仙博士领导下统一和中国同俄国最大限度的接近。

3. 运动不应像上次那样，在广州成立独立的中国政府，抵制和不承认北京政府^①。

4. 相反，虽然有可能所有承认孙逸仙博士的省都要被一个由孙逸仙博士领导下的统一的政府联合起来，但该政府应竭力争取做到在军事上占领整个北方及北京以前就取得与它在中国的政治威望相适应的对北京政府的影响，并竭力争取比方说使俄国驻北京的使团代表公开派驻孙逸仙博士的政府，并在中俄谈判时相应地有孙逸仙博士政府的代表参加。

上述一切是在假定俄国能够在孙逸仙博士实施其计划时充分满足其要求的前提下作出的考虑，因为这实际上还不得而知，越飞只能通过书信方式（因为即使用密码电报也是很冒险的）征询本国政府，俄国实际上能在多大的规模上和在多长的时期内提供所需要的帮助。

另一方面，最好能在越飞离开前同孙逸仙博士就一些具体问题达成协议。

1. 在蒙古〔问题〕上，协议是清楚的，但在开始实现孙逸仙博士的计划时，必须立即以他所代表的中国各省的名义（非常重要的一项是争取张作霖也同意这一点）公开宣布，俄国军队不能从蒙古撤离（例如用这样的表达方式：“在孙逸仙博士同越飞就俄中两国问题的会谈中，两位政治家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俄国军队立即从蒙古撤离是完全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由于孙逸仙

^① 指 1921 年 4 月在广州成立的以孙逸仙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该政府于 1922 年 6 月 16 日陈炯明一伙发动政变后不再存在。

博士的威望，这样的声明可以制止对俄国在蒙古问题上的诽谤。

2. 在中东铁路问题上也同样如此。这里张作霖参与事先的解决更为必要。

鉴于这条铁路把俄国的滨海边区同其余地区连接起来，目前的状况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必须和平地达成协议，将来在中东铁路问题彻底解决以前，中东铁路理事会作为名义上的理事会要撤销，而铁路管理局要由中国政府和俄国政府共同委任。

只要公开宣布孙逸仙博士和越飞在上述两个问题上原则上同意这些观点，这就非常重要，并会为今后在上述方面的进一步合作提供可能性。

全宗 5，目录 1，卷宗 2147，第 48—53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62

托洛茨基给加米涅夫的信

1923 年 2 月 6 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总司令加米涅夫同志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

寄上越飞的密信^①。最好在地图上标出正在争斗的中国将军们的位置和实力，并考虑一下我们能向孙逸仙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① 作为附件寄给加米涅夫的越飞的信没有找到。看来，这里说的是越飞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那里叙述了孙逸仙的军事计划和关于军事援助的意见。

我担心，我们在这方面的情报非常缺乏，更有甚者，在中国本土都很难搜集到。如果在共产国际书记处不能得到补充材料，那就应当向格克尔或直接向越飞同志提出相应的问题。但最好现在就提出初步意见，不要等更详细的情报。请将越飞同志的信随同您的初步意见退还给我。

全宗 325，目录 1，卷宗 411，第 21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63

维经斯基就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 远东局的工作给 共产国际书记处的报告 (摘 录)

1923 年 2 月 22 日于海参崴

绝密

致共产国际书记处

[……]① 从这里所附的我在《红旗》上发表的文章中②，你们可以了解到中国近来罢工的实际情况。这些情况是从可靠的来源得到的。

中国的工人运动，随着它的形成，必将成为中国民族解放运

① 前面删去关于日本形势的部分。

② 实际上没有附去。

动的基本因素。近来的罢工表明，作为1919年民族运动精英的那些人——激进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现在也对工人运动作出反应，把它看作是中国反帝斗争中最现实的因素。请看，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胡适对中国的工人运动是怎么说的：“工会的力量是我们现时希望之所在。我国的工人运动正在迅速成长，而国民生产的增长则相对缓慢。在西方，资本家在工人觉醒并开始组织起来以前就有了百年的经验，但在中国，现在就已成立强大的工会，超越了民族资产阶级。”

《日本新闻》^①的特派记者在2月1日的文章中说，上述这种看法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占了上风。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当激进的知识分子对最近在汉口和北京枪杀工人的事件^②表示抗议而举行群众性示威游行，许多大学生因此被逮捕，而一名大学生被处决时，国民革命的政党国民党及其领袖孙逸仙却至今尚未对枪杀工人一事表示任何态度。在这里回想一下1919年时的情况也不是多余的，那时全中国掀起了抵制日本的浪潮，根据当时的条件来说，这无疑革命的因素，国民党和孙逸仙却没有参加这一运动。

{……}

海参崴工会委员会拍电报给中国罢工的铁路员工，并决定从工会拨款300金卢布给死难同志的家属。这笔款项数目很小，但当地的工会很不富裕。我们在滨海地区的中国工人当中，结合最近的罢工进行了宣传鼓动工作。

{……}

3月底，中国要召开党代会，我打算去那里^③。

① 《日本新闻》是一家英文周刊。1897—1942年在神户市出版。1897—1901年以《神户新闻》为名出版。

② 指军阀吴佩孚于1923年2月7日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事件。

③ 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于1923年6月12至20日在广州举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

下次报告时将寄去关于中国和日本的通讯，那里有更详细和更系统的材料〔……〕^①。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维经斯基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1，第 19、20、22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64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53 号记录 （摘 录）

1923 年 3 月 8 日于莫斯科

出席：

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斯大林、托姆斯基、莫洛托夫（候补委员）同志。

中央委员：索柯里尼柯夫、拉狄克同志。

人民委员会会议副主席：瞿鲁巴同志。

3. ——关于中国。

（越飞同志的建议）^②

（契切林、加拉罕、李维诺夫同志出席）

① 此处删去关于朝鲜形势的部分。

② 见第 60、61 号文件。

（1）否决计划中一切可能引起日本干涉危险的部分。

（2）认为最好在中国西部以完整的军事建立的形式建立革命军队的基础。

（3）认为可以给孙逸仙约 200 万墨西哥元的资助。

（4）认为必须经孙逸仙同意后向孙逸仙派去政治和军事顾问小组。

（5）认为最好让越飞同志来莫斯科商谈，并跟越飞同志商定来莫时间。

（6）向越飞同志指出，政治局非常担心孙逸仙过于注重纯军事行动会损害组织准备工作。

（7）责成由契切林、拉狄克和托洛茨基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在政治局下次会议前在业已通过的指示的基础上制定给越飞同志的指示草案，并务必将草案分发给政治局全体委员。

委员会由托洛茨基同志召集^①。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339，第 1、2、5 页。

铅印稿。

^① 指示没有找到。

65

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 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的信 (摘 录)

1923年3月8日于海参崴

敬爱的同志：〔……〕^①

〔……〕我收到马林从中国发来的电报^②，他现在在上海，打算到广州去见孙逸仙。从我附上的关于近来工人罢工情况的报告^③中，您可以判断出目前中国工人运动的规模和意义。确实，党积极参加了罢工^④，并在最重要的地方领导了罢工。由于罢工而开始对工会组织的破坏，以及对工人和革命学生的镇压，未能驱散罢工的气氛。从中国最近（3月初）的报纸中可以看出，正在酝酿一场可能遍及华中和华北的新的的大罢工。我觉得，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迁往广州的决定^⑤现在恰恰是不妥当的。在诸如汉口、上海、北京这样一些作为罢工运动主要据点的城市里，必须有最大数量的中央委员。总之，应该使自己永远明白，华中和华北是中国当代工人运动的主要基地。同业和行业的联合组织是强大的，主要在南方，不算英国港口香港。

① 此处删去关于日本和朝鲜情况的部分。

② 电报没有找到。

③ 维经斯基的报告没有找到。

④ 指1923年2月被吴佩孚军队镇压的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

⑤ 中共中央关于迁往广州的决定没有找到。

如果说中央委员会是在香港还是在上海和北京，这在去年还可能怀疑的话，那么现在，在经过最近一些罢工以后，依我看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有两种意见了。

我不能想象，中央将如何从广州领导运动，广州与上海、汉口和北京没有铁路交通，而通过海路到上海大约需要走5天时间。建立书面联系也是相当困难的。但这不仅仅是中央在地理位置上脱离华中和华北的工人运动。依我看，离国民党的中心很近也同样会对中央产生有害的影响；在广州可能造成我们党对孙逸仙党的过多依赖性，而最令人担心的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中央将深深陷入军阀的派系斗争之中，而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国民党政府由于它给我党的“好处”，让我们在它的地盘上合法存在而要求我们党给予无条件的支持。然而，不应忘记，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有了可以丢掉一些东西的条件了，他的声望在工人群众的眼里是完全清白的。当然，应当利用在南方合法工作的机会，但不应把整个中央委员会搬到那里，把全部工作的重心转移到那里去。为了使党能够利用真正的批评自由，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决议（诚然是非常妥协的）^①，中央委员会不应在广州孙逸仙的鼻子底下，而至少应在上海的某个地方。

关于这一点我还没有给党写信。我认为现在写这一点不合适，因为搬迁是马林倡议的，早在去年他就打算把中央迁到广州，他当时提出的理由是，党在华中和华北没有适当的基地，因为中国根本没有真正像样的工人运动，因此党应该把自己的活动重心转移到南方，那里有民族革命运动的土壤^②。

在结束这封信的时候，我想再一次谈谈今年春天以孙逸仙、段

① 指1923年1月12日通过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同意马林的建议后于1922年7月18日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关于迁往广州的指示（见托尼·塞奇，《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起源》英文版第1卷第327页）。

祺瑞（安福派首领）和张作霖为一方，以吴佩孚为另一方即将展开的争斗。我在从赤塔写的第1份报告（1月25日）中，已经指出今春中国军阀间即将展开的争斗^①。

当然，我党的策略将取决于我们是否认为有可能通过中国军阀之间的争斗真正统一中国，或者形势还像近11年来那样，军阀派系的背后是帝国主义者，而中国的统一在每次武装斗争以后变得比以前更加不可能。迄今为止国民党还没有成为全国性的政党，而继续在以军阀派系之一的身份活动。它甚至没有利用最近的工人罢工、对工人的枪杀和对学生的镇压来开展政治宣传，吸引广大劳动人民阶层、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反对北方军阀（吴佩孚集团）的斗争。看来，国民党首领们继续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同著名的军阀派系结盟并借助同样著名的军国主义国家的帮助^②来取得军事上的成功。我们党能否无条件地支持孙逸仙的联盟呢？我断言，不能。孙逸仙可以得到我们党的支持，如果他声明，第一，他的政治纲领以共产党在去年夏天提出的原则（见《新东方》第2期）^③为基础，第二，他与他现在的同盟者张作霖和段祺瑞划清界限。必须在中国建立民族革命政党，这是对的。但必须让这个党明确说明，它希望什么，它跟谁一起走。当群众知道孙逸仙是张作霖和段祺瑞的同盟者时，任何漂亮的言辞都无济于事。必须尽快作出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指示。对于党来说时机是非常重要的。许多事情都将取决于党如何对待中国当前这场斗争问题。或者请您将党的指示发电报给我，或者（也通过电报）委托我来做这件事。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① 见第59号文件。

② 暗指张作霖派系和日本。

③ 指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关于目前时局的声明》（见：《先驱》，上海1922年6月20日第9期第1—3页）。该文件的俄译文有遗漏和歪曲，曾发表在《新东方》杂志上（莫斯科1922年第2期第606—612页）。

维经斯基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1，第 32—34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66

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

1923 年 3 月 11 日于上海

亲爱的同志：

您通过格罗莫夫同志带来的信都已收到，我立即转交给了指定的收件人^①。鉴于同您联系很困难和电报价格昂贵（每个字 55 分），所以我尽量详细地向您报告我们的情况。

有关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党内生活的情况，马林同志已向您作了极其详细的报告^②。我只谈谈其他的事情：

（1）同您的联系。我认为利用志愿船队的轮船^③是最方便的。他们在上海的代理人艾列杰尔同志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是个很忠实和值得信赖的人。志愿船队的办事处设在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公寓的一间屋子里。鉴于信件可能在波戈金同

① 信的内容不详。Д·М·格罗莫夫，原远东共和国驻华使团秘书——译者。
② 1923 年 1 月在海参崴成立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局，其成员有：维经斯基、马林和片山潜。马林向海参崴发去了关于中国和远东其他国家状况的报告。
③ 志愿船队是俄国的一家轮船公司。从 1922 年起由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管辖。

志^① 办公室里耽搁很久，所以通过北京联系不方便。

(2) 接头处。请告诉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前来同志的接头地点是：九江路 14 号五楼。

(3) 我用密码同日本共产党保持联系，根据您的请求密码的复印本附在马林的信中。在紧急情况下，我会从日本召来专门的信使（来领取经费）。

(4) 我通过马林同志（如果他在上海）或陈独秀同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当他们两人都不在时，则通过他们在上海专门指定的代表，很少通过苏联驻北京使团或者斯列帕克同志^②。

(5) 我同苏联驻北京使团有联系密码，仿佛我是他们在上海的非正式代表。所有地方上的问题他们都只跟我联系。

(6) 我还同在日本的越飞同志有联系密码，并且是他同莫斯科和北京的中转站。

(7) 北京—上海之间的信使联络安排得很好。

(8) 我从您寄给日本共产党的 7500 金卢布或 7445 墨西哥元中，通过越飞同志（由从北京来的专门外交信使）转给了日本共产党 5500 金卢布。根据马林同志的坚决要求，鉴于中国共产党急需资金以及发生罢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马林将详细地写信给您），其余的款项我留下了。请您确认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是正确的，并对今后的做法作相应的指示。前来领取这笔经费的日本同志牟利（音）不能出具证明材料，保证这笔款子送交指定的收款人，因此我们决定通过越飞同志寄去。

(9) 您寄来的 15 金卢布已收到，并已为您订购了您所指定的书刊。

(10) 您通过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州管理局寄给中国共产党的 3 月份预算开支和电报费用 1300 墨西哥元已收到。

① В·Л·波戈金，原远东共和国驻华使团长——译者。

② С·И·斯列帕克，俄罗斯通讯社驻华记者——译者。

（11）由于密码传送的错误，我无法将您电报中关于青年的部分译出。请再拍一份来。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维尔德^①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4，第 6—7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67

托洛茨基给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的信

1923 年 3 月 13 日于莫斯科

致斯克良斯基同志、加米涅夫同志（副本）

我曾请求编撰一份关于中国军事状况的资料。据拉狄克同志说，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部有非常多的材料。无论如何，这件事是很紧迫的。特别是我们应当讨论一下，我们能否在孙逸仙建立某个规模巨大的军事建制（师、军团）方面给他以帮助，在哪些方面给予帮助？

托洛茨基

全宗 325，目录 1，卷宗 412，第 67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C·J·维尔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共联社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会计——译者。

68

维经斯基就中国形势给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报告 (摘录)

1923年3月24日于海参崴

绝密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同志
敬爱的同志：〔……〕^①

中国问题

日前收到马林从上海寄来的一封详细的信^②，最近他打算去广州。同时也收到越飞从东京发来的电报^③，他在电报里坚持让马林留在中国，并请求我给马林寄去应给中共的经费。我不知道发来这封电报是出于什么原因，因为我从来没有给马林写信，也没有给越飞写信谈起马林离开中国的事，而且根本没有给马林作过任何指示或建议，今后也不打算做。我认为，这只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职权范围内的事。

实际上，马林和中国共产党最近关于中国情况的通报并没有

① 此处删去关于日本情况的部分。
② 马林给维经斯基的信没有找到。
③ 越飞给维经斯基的电报没有找到。

使您得到比我上封信^①中告知的更多的东西。新的东西也许只是：听马林说，在汉口罢工遭到破坏后^②，我们的人^③情绪非常沮丧，对今后工作的前景看得过分悲观。这是中央在几星期内作出关于中央所在地和党的力量分布问题的自相矛盾的决定^④的部分原因。而中央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决定在当前是有重大意义的。顺便说一句，依我看，过分惊慌失措的结果是工人运动的中心脱离了我们的积极分子和张国焘不知为什么被派往莫斯科去报告罢工情况。在他往返莫斯科的这两个月里，他本来最好应该呆在汉口和北京，组织工会的剩余力量。向莫斯科报告罢工的情况本来可以用书面形式，或者甚至可以从海参崴发电报，这要比张去莫斯科花费的钱少得多，而且不会使党和工会的一位领导人在这样重要的时刻离开工作岗位。

中国共产党打算在5月份召开工会和党的代表大会。依我看，工会代表大会应该这样来进行：鉴于已有历次代表大会的总纲领，目前代表大会可以分别在广州和北方召开，因为在广州召开一个规模较大的全国性代表大会是做不到的^⑤。既在南方又在北方召开代表大会的政治意义将是巨大的。这种召开代表大会的方式所需要的经费比在广州召开全国性代表大会要少。

早在收到勃利克的电报^⑥以前很久，我曾写信给您谈到我反对将中央迁往广州，正如我去年反对这一点一样，现在也反对在广州召开党代会^⑦。我认为，尽管存在一定的困难，党代会应该在北方召开，或者至少在上海召开，而且不要与工会代表大会同时

① 见第65号文件。

② 指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遭到破坏。

③ 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④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没有找到。

⑤ 第二次中华全国工会代表大会于1925年5月1日至7日在广州才得以召开。

⑥ 勃利克的电报没有找到。C·K·勃利克自1921年至20年代中期先后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宣传局局长、东方部副主任——译者。

⑦ 见第65号文件。

召开，而要早些时候召开，这样使得党在工会代表大会上有在中国工会运动的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上的坚定方针。同样，青年代表大会也应该在党代会以后召开，比方说在5月中旬^①。

马林在信中要我参加4月份的党代会。请萨法罗夫同志在接到这份报告后以东方部的名义正式给我发去中国参加党代会的电报指示。我之所以请求电报指示是因为，我认为有必要去中国，至少在党代会召开的几周前去中国，以便能和中央一起认真地准备材料和报告，同时也有可能直接考察党的日常工作。我也想利用这次出差机会了解一下日本和朝鲜的情况。

附上关于中国3月中旬前总的政治形势的简要报告^②。孙逸仙在南方的处境还可能出现各种意外，因为他那个先联合西南各省然后再以最短的路线经湖北或绕道四川准备北伐的计划，现在进行得不顺利。在孙逸仙鼻子底下又出现了小规模军事阴谋和倾轧事件，尽管看来他十分渴望联合，并在南方得到疲于中国“不断革命”的居民的支持。与此同时，很遗憾，迄今为止还看不出，国民党和孙逸仙试图在国内建立政治运动，并以此使广大群众了解他们的军事行动的意义。而没有这种政治运动，孙逸仙的军事讨伐将会引起中部和北部各省广大城乡居民的怀疑，并为北方的军阀们提供口实，说孙从南方入侵，必须加以防卫。

随信附上致中国大学生的呼吁书^③，其中阐述了我们对当前中国革命学生斗争策略的看法〔……〕^④。

在结束这封信时，我认为有必要补充以下一点：如果继续在这里工作，那就应该加强远东局的机构，补充一名精通英语的同志。这对我们的出版工作很有必要。我们可以在这里用所有三种

①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3年6月12至20日在广州举行，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3年8月20至25日在南京举行。

② 附件没有找到。

③ 呼吁书没有找到。

④ 此处删去关于朝鲜情况的部分。

东方语言印刷材料并散发到相关的国家去。

还有必要在满洲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主要是在中东铁路沿线。

鉴于目前在这里除我以外没有任何别的远东局成员（马林看来不会来这里，片山潜也不会来），所以这里应该有这样一位同志，一旦我离开去各地或莫斯科时可以替代我。我认为法因贝尔格就是这样一位同志。因此请求您派他到海参崴来，他的薪金可从远东局的经费中支付。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维经斯基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1，第 78—80、83、84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69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57 号记录 （摘 录）

1923 年 3 月 26 日于莫斯科

出席：

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托姆斯基、李可夫同志。

候补委员：莫洛托夫、布哈林同志。

中央委员：鲁祖塔克、捷尔任斯基、古比雪夫、斯米尔诺夫同志。

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瞿鲁巴同志。

1. ——关于中国问题。

(契切林、加拉罕同志)

(1) 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弄清楚越飞同志对张作霖建议^①的看法，并通过达夫谦同志将此建议告知孙逸仙，征询他的意见。

(2) 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征询达夫谦同志的意见，该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可用来作为越飞同志的指示^②。

(3) 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进行工作时不要使张作霖得出他的建议遭到拒绝的印象。

(4) 指示外交人民委员部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废除达夫谦同志签订的关于中东铁路的协议^③，并对达夫谦同志违背中央的指示提出警告。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今后不要再把重要的事务委托给达夫谦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343，第 1、4 页。

铅印稿。

① 曾接替越飞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的 Я·Х·达夫谦在 1923 年 2 月 16 日给加拉罕、契切林、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的信中，援引了马林 1923 年 2 月 13 日在沈阳与张作霖会晤的报告，并说张作霖表示愿意同苏联驻北京代表处建立联系，愿意有一名苏联代表在他那里，同时还说准备对满洲的白卫分了采取坚决措施（全宗 5，目录 1，卷宗 2148，第 20 页）。亦见马林给加拉罕、越飞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关于奉天之行以及同张作霖谈判情况的书（托尼·塞奇：《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起源》英文版第 1 卷第 405—409 页）。

② 指示没有找到。

③ 文件没有找到。

70

维经斯基给萨法罗夫的电报

1923年3月27日于海参崴

建议在党代会和工会代表大会^①结束前让马林留在中国，指示他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而要向孙逸仙提出条件：第一，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与督军建立军事联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国性的政党上；第二，支持工人和学生运动；第三，断绝同张作霖、段祺瑞的联系。

维经斯基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05，第 34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

71

东方部就 1923 年第一季度工作 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报告 (摘 录)

1923 年 4 月 4 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东方部关于 1923 年第一季度工作的报告 (1—3 月)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许多委员会和东方国家党的代表团制定了这些党在本次大会年度内的详细行动纲领。已经过去的三个月使我们完全有理由指出，我们对大多数东方国家的形势所作的估计是正确的，各种指示符合政治日程的直接需要。但是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在着手制定日历行动纲领时，我们不得不对许多意向进行猜测和模模糊糊地进行摸索；目前，才有可能对某些问题看得比较清楚、比较明确。遵照去年 12 月底向主席团提交的 1923 年工作计划（见附件）^①，兹将在我们感兴趣的国家里所取得的成绩和近期的展望陈述如下：[……]^②

[……] 中国

① 附件没有找到。

② 此处删去关于日本情况部分。

在中国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工人运动的革命浪潮正在迅速高涨和发展。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一年前还是个**知识分子的宣传团体**，目前已经同中国工人大群紧密而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了。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中国的工会运动具有鲜明的阶级形式。去年10月15日和11月7日的罢工以及最近京汉铁路的罢工，明显表明**中国无产阶级处于最高发展阶段**。已经不是个别的经济要求，而是广泛的阶级性口号（结社和言论等的自由）、政治性口号（反对督军、反对外国和本国的军阀）甚至国际性口号吸引着广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投入斗争。在短暂的京汉铁路罢工期间，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的迅速提高。在不远的将来可望我们共产党的人数和威望迅速提高。

与此同时，中国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族意识没有摆脱乡土气息的狭隘框框。督军们的激烈争斗各有胜负。所有这些军阀的力量大致相当。我们习惯把孙逸仙看作是思想上的民族革命的代表，他试图依靠个别督军来实现军事上的计谋。国民党不是居领导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联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市井”小资产阶级，在主张自治的广州小资产阶级中间有着现实的基础。后者支持孙逸仙是因为他客观上保证了南方的独立地位，并且以许诺进行金融改革来向广州资产阶级讨好。孙逸仙没有独立的武装力量，指望跟最反动的北方军阀——张作霖和段祺瑞结盟。国民党由于这一结盟使自己在**中国各界自由派人士的眼里威信扫地**。至于说“三方联盟”（孙—张—段）的军事前景，那么其结果对于中国的民族统一来说则更加令人怀疑。

这一联盟的完全胜利（而这是有可能的）将把优势地位和**在华北和华中的实际权力不是给予软弱无力的孙逸仙，而是给予北方的军阀张作霖和段祺瑞，也就是日本**。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民族革命的胜利将不是某个督军的成果。在他们中间无须再寻找中国的俾斯麦。

认清这一点，就必须指出以下的现实危险：**对于居领导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上海的、香港的、汉口的）来说，内部瓦解的因素（督军、匪团活动和孙逸仙的政策）是比外国帝国主义更大的威胁。中国资产阶级同外国资本主义结成联盟来反对本国封建主，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军事集团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应该一如既往采取公开反对的立场，并号召中国无产阶级和激进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来开展世界性行动，抵制军国主义的阴谋勾当，**不管这些勾当是在什么口号下进行的。**

必须要求国民党与军事集团彻底决裂，并转向联合中国的自由派社会人士。

国民党在尚未将民族资产阶级的有威望的团体团结在自己周围之前（即在获得现实基础之前），不应卷入军事联盟，在这之前，国民党应是积极的反对派政党。

鉴于以上所述种种情况，就产生了一个关于今后把我党限制在国民党范围内是否适宜的问题。今后必须坚持采取**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工人运动的方针。**

这就是我们最近一个时期里形成的总的原则性结论。希望尽快实行与修改原则性论点有关的组织措施。这里还包括：撤销对马林同志的委任，在广州创办我们的报纸，等等。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一段时期里建立的联系和取得的阵地必须加以巩固和扩大。最近时期应当进行大量的与扩大出版和宣传鼓动活动紧密联系的业务工作。

在不久前华中工人运动遭到破坏之后，必须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物质支援。[……]①

萨法罗夫

① 此处删去关于朝鲜和印度情况的部分。

勃利克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196，第 2、5—8、17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72

萨法罗夫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3 年 4 月 4 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俄共中央政治局

敬爱的同志们：

鉴于政治局业已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①，我认为有必要提请你们注意对评估当前中国政治形势有着头等重要意义的许多情况。我认为在讨论问题时不了解这些情况，结果通过的决定可能不符合客观情况。

下面援引的材料是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报告、日前从中国抵达的中共中央代表张同志^②的通报和目前的情报为基础的。

军事形势

目前相互争斗的督军（军事总督）和军阀分为三派：

第一个派系，即由于共同反对孙逸仙和张作霖而联合起来的、

① 见第 64 号文件。

② 即张国焘。

提出所谓直隶派首脑**曹錕**为总统候选人的派系，由以下人员组成：

(1) **曹錕**。他的大本营在直隶——保定府（北京省）。没有固定的常备军。在山东、直隶、甘肃省和陕西省以及绥远省和蒙古的军阀中有其拥护者。

与其说他是军事首领，不如说是（旧的）政治派别集团的头目。

(2) **吴佩孚**。他的中央在河南省洛阳，京汉铁路在他的统治范围内，那里不久前发生了众所周知的枪杀罢工工人的事件。归他管辖的有河南省、湖北省、江西省、四川省的一部分，山东和广东的一些地区（沈鸿英将军）。他的常备军有：3个师——3万人。

(3) 北京的“基督教将军”**冯玉祥**。有两个师的常备军——2万人。被称为中国武装力量的督察员将军。

(4) 江苏省和安徽省的**齐燮元**。有6万组织涣散的士兵。在吴佩孚和曹錕之间起着联络作用。支持北京内阁。

第二个派系——半中立的派系。

(1) **卢永祥**——在上海省，在南北战争中“倾向于中立”。有4万士兵，但正规力量只有1.5万人。过去拥护目前加入孙逸仙和张作霖派的**段祺瑞**。

(2) **杜锡珪**。南京海军总长（江苏省）。倾向于曹錕一边。在广州也有一些舰艇。大的舰艇达4千吨位，有一两艘船钉达12英寸长的舰艇（在长江上）。

第三个派系。孙逸仙、张作霖和段祺瑞联盟。

(1) **张作霖**——在满洲。有20万非正规军。最近，在国民党、海外归来的大学生和日本军事教官的协助下正在加速训练和改组军队。

(2) **段祺瑞**。曾是安福俱乐部（亲日的）领袖，现正在利用老俱乐部的影响。势力范围——山西、江西、浙江、福建（在中

国东南部)。

(3) 孙逸仙。现在广州。有一万名从北伐归来的福建士兵。

有好几千人是从早先占领广州后被打败的陈炯明部队中逃过来的。

(4) 自治派。是支持孙逸仙反对北方的一个人数不多的军事派别。孙本身在广州的地位极不稳固。在河的西部和北部有吴佩孚任命的军事总督沈^①的部队。在河的东部有现被李炳荣将军收编的原陈炯明的部队。沈鸿英和李炳荣可能会把孙从广州撵出去。

第一个派系和第三个派系之间的军事活动场所应在四川省。孙想从四川突破与张作霖联合，以便从那里走“蒙古人的历史之路”去北京。如果说这是一个总的计划，那么这就有点像比方说从东布哈拉到彼得格勒徒步行军一样。只要看一下地图，就会相信这一点。他在北方没有自己的军队，而要把与他相好的督军的部队（认为国民党有自己的军队是极其幼稚的）开往北方未必能做到。

吴佩孚企图进攻四川，以便取得打开南方诸省——广西和广东、云南和贵州的钥匙。孙的拥护者督军刘臣勋在成都。

石青阳（师长）是孙在长江流域靠近成都北部的拥护者。

吴佩孚的拥护者老督军刘纯侯正从北边向成都进发，反对夺取他“爵位”的刘臣勋，而被吴佩孚派去强渡长江的杨森将军正沿着长江向重庆进发，力图首先占领万县（也在长江岸边）。在长江的宜昌停泊着外国的舰艇（英国的）（见地图）^②。

中国山峦起伏的地形使得战斗只能沿着河流两岸进行，因此吴佩孚的计划是从长江夺取重庆。

吴佩孚的拥护者刘纯侯和杨森有6万军队。孙的拥护者大致也有这么多军队，不过吴佩孚派去的几个师（3个师——3万人）

① 指沈鸿英。

② 地图没有找到。

在质量上超过孙的拥护者的军队。

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孙这方面没有决定性的军事优势，而仅从这一点看未必可以认为，在孙身上我们拥有通过军事手段实现中国全国统一的力量。孙与张作霖结成联盟，为的是在孙抵达北京后把他“甩掉”。

这是建立在沙堆上的计划，因为张作霖在北方拥有孙所没有的军事力量。

经济形势

经济条件对于回答孙逸仙现在是否能够起到中国俾斯麦作用的问题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先从广州谈起。广州的商业资产阶级——中等的和小的——曾反对赶走孙逸仙的陈炯明，这首先是出自微小的利益。在孙逸仙时期，一元广州纸币换 80 分，而在纸币充斥市场的陈炯明时期，它的兑换率下降到 50—15 分。目前，期待孙的是“稳定”广州的货币。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急于同香港的英国银行进行谈判，以便从那里得到 400 万英镑，这笔贷款还是陈炯明签订的。

毫无疑问，孙打算从这笔款项中拿出一点用来打仗，因为他曾以保证能得到大量资金来鼓舞他的将军们。

其实，这里说的是两笔贷款：

1. 用于“稳定”和 2. 用于广州的市政需要。两笔贷款各为 200 万英镑。

第一笔贷款的条件是：(1) 年息 6%，先付 50 万英镑，其余的在一年内付清。(2) 英国人获得对广州和省的政府发行银行的监督参与权。(3) 英国人还获得通过设立转换站的办法将两条铁路（从香港到广州、从广州到北方）联结起来的权利。这样，广州就失去作为过境站的意义，因为到目前为止，由于没有转换站，从香港运往北方和广州的货物不得不超载。

广州政府银行有1000万中国元(80cts^①)的储备。陈炯明从那里取走了400万。以后又一次一次地劫掠,目前广州政府银行只有3000万元广州纸币,其中1000万已在英国人手中。

至于说市政贷款,那也是6%年息,英国人获得开支监督权,以政府收入作为担保。

如果孙逸仙希望通过money^②来博得商人的同情,那么无论对于孙还是对于这些商人来说,英国的钱(美国的钱也一样)是相当昂贵的。

上海的中国资产阶级给整个长江流域的商人确定政治基调。它们同英美资本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并通过中国银行联合会(工业派)、钱庄联合会(高利贷)和商会联合在一起。

中国的工业资产阶级首先与纺织工业相联系,然而纺织生产现时正在缩减,因为军阀集团的连绵战争完全摧毁了国内市场。

上海的资产阶级曾向北京政府贷款1亿元,现在正在重新审查(趋向提高)关税税则——上海人要求以此抵偿他们的贷款,而北京则希望全部用来收买督军。

不难理解,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上海的大亨们要求解除所有督军的武装,要求全国统一和有一部“好的宪法”。他们既不拥护吴佩孚,也不拥护孙逸仙。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迄今为止大量资助军阀的外国资本家现在对四川的争斗不大感兴趣,他们企图通过积极参与组织商会等等的活动来巩固自己,来加强自己在中国资产阶级队伍中的影响。例如,为了组织商会,从上海商会中派了一名美国人到天津来。英美资本家完全正确地估计到中国资产阶级情绪中的基调,即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来说,军阀争斗是比任何外国势力更大的民族危险。

在天津,督军和军事冒险分子与银行高利贷和商业结合得非

① 英语:80分,等于一元广州市。

② 英语:钱。

常密切，以致在那里像在整个北方一样，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声音”。

如果以为张作霖在某种程度上依靠满洲的中国资产阶级，那就错了。在满洲只有中国的小商人，他们对中国本身的命运漠不关心，但他们对把银行业、工业和大商业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日本人却极端仇视。

政治形势

目前，中国全国的统一不可能通过形形色色督军的力量来进行。督军制度（不管由谁来行使，也不管他有多么美好的愿望），遭到了普遍的、理应遭到的仇恨。它是靠旧社会的腐败分子和“帝国主义的”恩施而生存的。

督军们掠夺资产阶级，掠夺农民，分裂国家，想在封建割据时期的这些英雄们中间寻找俾斯麦乃是最冒险的事情。国民党迄今为止一直靠广州和南方商人的分立主义而生存，这些商人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更倾向于香港，而不是上海和华中。

国民党在大学生和小的“市井”的集市资产阶级中受到一定的同情，但是孙逸仙越是在军事方面受宠，他越是在政治上失去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的作用。

军阀争斗阻碍着工人运动，特别是在最近的一系列事件中，工人运动显示出要在全中国范围内把中国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坚定意向。我们对这一点估计不足，或者更确切些说，在阶级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时候，我们还让国民党去经受训练。在张作霖和其他人（也包括孙在内）的军队中建立共产党支部是绝对不可思议的。

督军的部队是一些流氓无产阶级分子、红胡子流浪汉和雇佣分子。不管中国的工人阶级多么软弱和落后，它面临要比把红胡子改造成共产党人更迫切和更富有成效的任务。

在湖北，中国农民利用山区地势，手持原始武器同一切轮番

前来掠夺他们的督军进行斗争。而这一点很能说明农民群众的情绪。

孙逸仙认为必须进行政治工作的信念是建立在明显误解的基础上的；目前他借助张作霖、段祺瑞和刘巨勋的力量来解决中国的全国统一问题，这对他来说将是空谈。

用“天方夜谭”式的精神报道国民党的马林同志如今发现，张作霖不是亲日分子，“因为这是德国领事告诉他的”^①。

把这类情报报告给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斥责。德国人向日本人送秋波和张作霖玩弄“日本敌人”的游戏——是极不体面的事实。

现归纳如下：

1. 苏维埃俄国支持孙—张—段(说的就是这个联盟!)是一种误会，它对我们在中国的政策可能具有致命的后果。曾经具有更多优点的吉梁事件应成为我们的警戒^②。

(2) 对中国的口号：反对督军制度(也反对孙的督军制度)，因为孙逸仙(打仗靠督军，而且只靠督军)也主张组织社会力量来实现中国的全国统一。

(3) 在同学生和国民党实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同时，支持独立的工人运动，因为这里说的是政治发动和斗争，而不是督军的结盟。

综上所述，我请求政治局重新审查所作的决定，如有必要可召我来作解释。

致同志般的敬礼！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主任

① 指马林关于1923年2月13日同张作霖进行谈判的报告(见托尼·塞奇：《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起源》英文版第1卷第402、403、406页)。

② 指伊朗共产党人同库切克汗实行统一战线的波折和1921年伊朗北部吉梁省革命运动的失败。

萨法罗夫

我作出此声明过晚是因为日前我才知道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0，第 28—35 页。

打字稿，副本，亲笔签字。

73

维尔德给某人的信

1923 年 5 月 22 日于上海

亲爱的同志：

匆匆写这封信，因为离开船只有半小时了。

您寄往日本的全部邮件，包括书籍在内，明天通过专门的信使送去。

张国焘同志已从莫斯科抵达这里，明天他将去广州。

为什么没有格里高里^①的任何消息？他什么时候去参加党代会^②？

昨天收到远东银行 9600^③，我不知道是谁汇来的和作什么用的。盼告。

工作重心移到了广州，这里几乎一个中国工作人员也没有留

① 即维经斯基。

② 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③ 没有说明什么货币。

下。

我还收到从莫斯科寄给中国共产党的 278 英镑和 3500 美元，并附有详细分配数额的指示。

随信附上从广州寄给您的邮件。

随志愿船队的每次航班给您寄通报。您每次都收到吗？

我通过“基希涅夫号”和“辛菲罗波尔号”轮船寄去的邮件都收到了吗？我寄给您的朝鲜印刷品是否顺利到达了？

请来信详细说明。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维尔德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8，第 14—16 页。

亲笔信。

74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 给其出席中共第三次 代表大会的代表的指示草案

1923年5月23日于莫斯科

维经斯基的草案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代表

敬爱的同志：

在即将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①，您应该严格遵循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大会后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和决定。^②

鉴于中国近半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新的事件，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认为有必要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之前向您作如下的政治指示：

1.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仍然是积聚力量，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和恢复工会并把它们集中起来，以便扩大革命运动的基地和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

① 原文如此。此处应为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是1922年7月16至23日在上海举行的。

② 指第49号文件以及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

2. 最近四五个月来发生的铁路工人、烟草工人、弹棉工人等的罢工运动的性质明显表明，中国工人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促进阶级形成和阶级分化的一个因素，而且也在于它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重大因素。

3. 因此，要坚持我们早先采取的立场，即“中国的中心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国内封建走狗的民族革命”^①，同时对民族民主政党国民党的基本要求应该是**无条件地支持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工人运动**。

4. 在孙逸仙和北方军阀的内战问题上，我们支持孙逸仙，但要求国民党通过坚持不懈的宣传鼓动工作，使人们领会孙逸仙军事行动的意义并吸引中国最广大的民主派人士在国家独立、统一和民主的纲领基础上参加反对北方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以此来建立广泛的政治民族运动。

5.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千方百计地在国民党内部，反对孙逸仙同以**英美和日本资本为靠山的军阀们的军事结盟**，因为这种结盟有可能使国民党的运动蜕化为一个军阀集团反对另一个军阀集团的运动，这必然不仅导致民族阵线的惨重瓦解，而且也会使工人组织和共产党威信扫地，因为目前他们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而与国民党有着密切的联系。

6. 为了防止国民党（尤其是孙逸仙）的类似倾向，中国共产党应该要求尽快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问题应是建立广泛的民族民主运动。

7. 目前，由于中国民主派要求废除众所周知的 21 条^② 而在中国再次掀起了抵制日本运动，我党应尽一切可能加以利用。我党应竭力使这一运动扩大为中国民主派共同的反帝运动，不仅要

① 见《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俄文版第 37 页。

② 21 条是 1915 年 1 月日本向中国提出的，目的是达到对中国的统治。1915 年 5 月许多要求（除总的政治性条款以外）为中国政府所接受。

求废除日本，而且要求废除英美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中国的条约和义务（治外法权、义和团赔款、关税等等）。

8. 中国共产党应该把抵制日本运动也看作是在反对为讨好外国帝国主义而残酷镇压工人和学生运动的北方军阀政府的民主统一战线的一个因素。

9. 我党应当竭力寻求相应的形式，以便在这一反帝运动中把中国的广大民主阶层联合起来（行动委员会或国民委员会，等等）。首先应该把国民党和革命学生组织吸引到这个运动中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 拉狄克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主任 维经斯基

全宗¹514，目录1，卷宗38，第15、16页。

打字稿，副本。

75

布哈林给维经斯基的便函

不晚于1923年5月24日^①于莫斯科

维经斯基同志：

寄上修改稿。

季诺维也夫也完全同意这些修改。请全部重抄一遍，原件存

^① 日期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最后文本的日期注明的。

档。

别搞鬼，当心！

您的布哈林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8，第 16 页。

打字稿，副本。

76

布哈林对共产国际执委会 东方部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的指示草案的修正案

不晚于 1923 年 5 月 24 日于莫斯科^①

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 (给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指示)

1. 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2. 因此，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无论出于何种考虑而回避这一基本点，都意味着不理解这个社会经济基础的重

^① 日期是根据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最后稿的日期确定的。

大意义，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顺利地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彻底消灭中国封建制度的斗争。

3. 所以，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宣传工作和真正实现下述土地革命口号，才能达到此目的：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庙土地并将其无偿分给农民；欠收年不收地租；废除现行征税制度；取消各省间的包税和税卡；废除包税制度；铲除旧官僚统治；建立农民自治机构，并由此机构负责分配没收的土地，等等。

4. 必须根据这些基本要求，并利用关税收入、盐业垄断以及部分财政操于外国资本之手等事实，使全体贫苦农民懂得同外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只有给反帝战线的口号找出土地问题的根据，我们才能有希望取得真正的胜利。

5. 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最近的工人运动事件（大规模罢工）清楚地表明了工人阶级的极大意义。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

下面是维经斯基决议案中的第三、四点。

下面是加进部分。

8. 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在孙逸仙军队的占领地区，必须实行有利于贫苦农民的没收土地政策，并采取一系列其他革命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孙逸仙的革命军队取得胜利，才能保证得到农民的支持，并扩大反帝革命的基础。

下面是经过修改的维经斯基决议案中的第五点。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8，第 14 页。

打字稿，副本。

77

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给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信

1923年5月31日于莫斯科

致中国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青年共产国际^①执行委员会感到遗憾的是，只是由于一系列技术原因未能派出专门的代表去参加你们的代表大会^②，因此不得不仅给你们发去此信，并认为它可以作为代表大会讨论问题的基础。

无论是去年还是今年，我们青年团的基本政治路线是在中国进行反帝民族民主革命。这一点决定了我们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和我们在给贵团的许多信件中所阐述的一系列问题。

1923年使孙逸仙完全置于他在1922年初所处的境地。为了防止国民党在南方再度衰落，自然需要考虑1922年时期所犯的错误，那时的基本缺点是未能使农民完全参加到国民革命中来，工人的问题实际上政府也未能解决，总之，国民党没有社会基础，不得不沿着只同军阀结盟的道路走去。

中国是个小农国家，一部分小农受到极其沉重的租赁形式的奴役，一部分小农受到少地的摧残，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资本

① 旧译少共国际——译者。

② 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是瞿秋白。

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造成了农民群众的贫穷和破产，与此同时，在同一个中国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土地占有制，在某些地方甚至有大地主。他们同政府一起利用外国垄断组织的沉重赋税制度等方式使农民贫困到极点。因此，农民对推翻军阀政权十分关心，而由于军阀的背后有外国资本家，所以在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同时，他们追求的目标是要得到土地，消灭赋税重负和得到未来民主政府帮助改善农业技术状况。所有这一切都在使农民成为革命的因素，而由于农民在国内占大多数，所以在中国，任何一个旨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争取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如果没有农民参加都是不可思议的。

诸如农民的分散性，他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落后性等等一系列原因，都不能使农民成为中国革命的首倡者。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可能成为这种首倡者，尽管它的一部分在客观上是革命的。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与农民结成紧密联盟并在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下，才能在中国完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

这一无可争议的原理说明了国民党之所以不稳定的原因、它在近期内的任务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共产主义先锋队的任务。

我们应该竭力要求国民党明确阐述它的土地纲领，其精神就是没收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将土地无偿交给少地和无地的农民，消灭赋税的重负等等，国民党应该在其占领的地区加以贯彻执行。

在这样使农民感到有好处之后，必须吸引农民积极参加捍卫这些成果的斗争，也就是说存在建立国民革命军的问题，这支军队自然主要由农民组成，而没有上述条件，农民是永远不会为国民党去斗争的。

同样，应该迫使国民党按照我们提出的要求的精神去解决工人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迫使国民党放弃同那些充当苏俄的敌人因而也是外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反动军事头目结成军阀联

盟。总的政治形势就是这样，我们希望你们能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中从中得出具体的结论。

当前的政治问题是抵制问题。我们并不把抵制看作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方式，而只看作是在中国动摇帝国主义和利用这一运动来吸引广大群众不仅参加同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参加同它的代理人中国军阀斗争的一种手段。1923年的抵制应与1919年的抵制^①有所区别，它不仅应当向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方面扩大，而且主要应当向同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的斗争方面扩大。只有当我们把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在我们的领导下吸引到这个斗争中来，我们才能把抵制扩大到这种程度。必须把他们吸引过来，在这里我们有很大的活动场所。

扩大到这方面来的抵制运动也应当成为一种手段，以便再一次使青年基督教联盟的名誉扫地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应当提出^②青年基督教联盟暴露自己对抵制的态度。它未必同意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的斗争，会声称它是“超越政治”的，等等。我们应当向广大青年群众指出，在这样的问题上“超越政治”，就意味着具有某种政治，具有充当外国帝国主义走狗的政治，反对中国人民的政治。

现在我们来谈谈代表大会的基本问题——青年问题。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你们的代表大会应当在向青年工作实行根本转变的口号下进行，而这项工作主要在青年工人中进行。这个问题早就有过争论，甚至在贵团第一次代表大会^③上就争论过。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无论是代表大会的决议，还是我们就这个问题所写的信件都还没有变成实际的措施。

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迫切需要着手在维护青年工人的

① 指1919年5月4日爱国运动时期对日货的抵制。

② 原文如此。看来，“提出”应为“迫使”。

③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5月5—10日在广州举行。

经济利益方面进行有计划的工作。我们在这方面的基本要求已在贵团的纲领中和贵团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专门决议中^① 阐明。

只有当我们把青年工人吸收到我们青年团中来并相应地把他们组织起来时，我们才能顺利地进行斗争。现在我们来谈谈支部问题。我们认为，在所有大企业和所有工人组织的青年团组中都必须建立支部。这样，支部和团组就将成为进一步吸收青年工人加入我们青年团的工具，并与工会相协调自己的工作，从而成为维护青年工人利益的工具。

至于支部的一般活动、支部同我们青年团其他组织系统的联系，这个问题已在寄给贵团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② 的决议中阐明。我们希望你们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并在代表大会上全面提出这个问题。

由于青年工人应是我们青年团的基本核心，因此也必须吸收他们参加青年团的领导机构，具体地说，最好选出哪怕两名青年工人——青年团团员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新班子。

在做这项工作同时，也应当着手做青年农民工作，在本信中已阐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所以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是完全清楚的。做这项工作应当很慎重。我们不能预先决定这项工作的具体形式，但我们始终认为，在这项工作中开始时应当使其具有文化启蒙性质，并带有我们农民纲领的政治色彩。

代表大会还应讨论在学生中的工作问题。学生运动的新高涨将在国内起到自己的革命作用。京汉铁路事件^③ 实际上已把我们青年团摆到学生运动的领导地位上来，这一事实向我们提出了在这些群众中巩固我们的影响问题，以便在更大程度上吸引他们参

① 见《先驱》上海，1922年5月15日第8期。

② 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

③ 1923年2月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罢工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中国学生声援工人为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的运动。

加总的革命运动。与此相联系，也提出了我们参与建立常设的、全国集中的大学生组织的问题。尽管上海的学生代表大会被驱散^①，我们应该提出召开新的代表大会的问题，以便使运动集中起来。我们青年团的任务是在每一个学生组织中建立我们的团组，并在学生会的一切机构中占据领导地位。

鉴于我们青年团的新任务，彻底改组我们的刊物是目前紧迫的、非常重要的任务。应当使我们的刊物具有青年的性质，而主要是使它成为阐明当前形势和我们运动中的当前问题的战斗刊物。为此应当通过新闻记者的设置把我们的刊物同青年工人和青年学生联系起来。

此外，应当在组织方面加强我们的青年团。也还存在着纪律问题、按时交纳团费问题、统计我们组织在全国的成员问题，最后还有建立由各省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省委员会问题，省委员会的任务是领导全省的工作。

最后，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相信，你们将认真仔细地讨论所有这些问题，而主要是你们将十分重视青年问题。我们希望代表大会顺利地完成任务，并成为取得进一步成就和进一步胜利的道路上的新阶段。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

R. Schiller（许勒尔）

S. Dalin^②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75，第 19—24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理事会会议于 1923 年 3 月 24 日在上海法租界召开，然而根据法国领事的命令，会议被迫停止。

② 即达林。

78

陈独秀给萨法罗夫的信

1923年7月1日于广州

敬爱的萨法罗夫同志：

民族革命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革命都是必要的。根据经济条件和中国的文明程度只能进行国民革命。中国7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农民的发展水平很低。把农民吸引到国民革命运动中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开始懂得开展国民运动的必要。

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强烈反对中国军阀的统治，在这个资产阶级中存在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倾向。大部分工人还是老式手工业作坊中的手工业者。他们的思想还完全是宗法式的，对政治持否定态度。他们不问政治。现代化工人的数量很少，尽管在这些工人中政治觉悟开始发展，但他们的要求充其量只是直接改善他们的状况和本组织的自由。如果我们想要同他们谈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就会害怕而离开我们。只有极少数人加入我们的党，即便这样也是通过友好关系。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党的人则更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建立革命力量，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但这只能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进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我们只能使工人离开我们，站到敌人的一边。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只会是非常严肃的、强有力的小团体。我们不能允许国民革

命运动与帝国主义敌人妥协并向右转。

中国国民党当然还不是一个很好的党，因为在这个党里还存在着许多旧思想，但这个党已有多年历史；其中有许多革命人士。在当今的中国，只有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我们应该把开展国民革命运动看作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因此我们应该扩大和改组国民党。如果该党领导执行错误的政策，我们就来纠正错误。如果我们不加干预，不与他们合作，国民党人就会犯更多的错误。在许多城市，恰恰是我们能够组织国民党的地方团体并把它们掌握在我们手里。目前，国民党虽还不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但我们应该将群众吸收到国民党里来，因为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我们应该利用这个党并且还要改善这个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开展国民革命运动，而国民革命也就不能迅速实现。

只有在国民革命取得胜利后，在阶级分化明朗后，我们共产党才能取得基本的发展。

既然共产党第三次会议^①表示赞同这一主张，我希望您也同意这一点。

我们将利用这一策略，对国民革命施加巨大的影响。

依我看，可以无条件地接受所有人——军阀、资本家——对京汉铁路罢工运动受难者的帮助。没有这种帮助，我们对受难者就无所作为。这样，我们就从张作霖那里得到1万元的帮助。我们认为，这种办法对于工人没有什么不好，而对恢复组织只有好处。

由于我党还很年轻，我们希望经常得到您的来信。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陈独秀

^① 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40, 第 1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79

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

1923 年 7 月 26 日于上海

亲爱的同志:

由于志愿船队的轮船从海参崴到上海的航班停航, 我只好通过北京给您寄信, 虽然我也知道您至少一个月后才能收到这封信。您 6 月 18 日寄给陈独秀名下^① 的附有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指示的信, 我于 7 月 18 日, 即在代表大会闭幕后才收到的。我不明白是在哪里又是谁耽误了我们的邮件。

从附上的马林同志的报告中, 您可以了解到代表大会的一切细节^②。他认为这次代表大会与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是最成功的一次。挑选新的中央委员会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完全是新的事情, 有真正的工人, 其中毛同志^③ 和王同志^④ 无疑是优秀的工作者。

马林同志于星期六 4 时 8 分抵达上海, 而陈独秀比他晚到 10 天。其他的大会代表已在这里。马林打算在上海呆一周, 然后去

① 信没有找到。

② 看来指的是马林 1923 年 6 月 20 日给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的信, 陈独秀向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瞿秋白就中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给季诺维也夫的信。

③ 指毛泽东, 他不是工人。

④ 指王荷波。

莫斯科。考虑到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已委任他领导近期将在上海召开的青年团代表大会，我认为他去莫斯科是不适宜的，何况近半年来青年工作开展得非常差，或者更确切些说，根本就没有开展。现在必须花很大精力和注意力，以便使这项工作具有正确的方向。无论如何，必须有一位俄国同志前来领导代表大会^①。

昨天我收到沙茨金同志的电报，要张太雷立即去莫斯科^②。我把这个问题交给马林同志来解决。

日前，日本代表安土同志途经这里去莫斯科参加工会国际代表大会。他向我出示了相应的委任状，我给了他 300 墨西哥元作为旅途的费用。

5 月底，我收到从莫斯科经北京寄来的 3500 美元和 278 英镑，其中用于工会国际工作 278 英镑，帮助因铁路罢工而受难的中国工人 1000 美元，按 4、5、6 月的给中国共产党预算 1500 美元，用于召开代表大会 1000 美元。全部款项都已按指定用途转交和花掉。根据我收到的陈独秀的来信^③称，现在极需 7、8、9 三个月的预算经费。需要利用中国的局势加强宣传工作。关于这一点，日前我已发电报给您。陈独秀同志请求您在这方面采取坚决措施。请您也给我寄来电报费用，这方面我已大大超支。

您寄来的给日本共产党的 9626.20 日元，我已按指定用途及时转交了。我只扣下 1000 日元作为支付购买印厂的费用，因为您在信中没有说明，这家印厂是为谁买的，是为您还是为日本。我曾就此事打电报询问过您，但没有收到您的答复。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我的意见，必须从远东局派人来领导青年团代表大会，哪怕来很短一段时间也可以，何况这无论从物质

① 由于马林去苏联，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是瞿秋白。

② 电报没有找到。

③ 信没有找到。

上还是从时间上来说都不是很麻烦的。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维尔德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4，第 38—39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8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21 号记录 （摘 录）

1923 年 8 月 2 日于莫斯科

出席：

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斯大林和李可夫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鲁祖塔克同志。

俄共中央委员：安德烈耶夫、索柯里尼柯夫、拉狄克、皮达可夫、奥尔忠尼启泽和克维林等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古比雪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1923 年 7 月 31 日通过电话征询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斯大林同志建议任命鲍罗廷同志为孙逸仙的政治顾问。

(1) 任命鲍罗廷同志为孙逸仙的政治顾问，建议他星期四与加拉汉同志一起赴任。

（2）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

（3）责成鲍罗廷同志与苏联驻北京的全权代表协调自己的工作，并通过后者同莫斯科进行书信往来。

（4）责成鲍罗廷同志定期向莫斯科送交工作报告（尽可能每月一次）。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369，第 1、6 页。

铅印稿。

81

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

1923 年 8 月 25 日于北京

亲爱的格里沙：

我想骂你不是因为要防止你骂我，而实际上是因为你现在根本不给我写信了。我真不知道，你是否收到了我的综合报告，还是丢到哪个地方的纸篓里去了。

昨天，鲍罗廷同志来我这里。他或许是一名优秀的工作者，但给我的印象是个非常漫不经心的人。总的说来似乎不适合担任这一角色。或许我是错误的。但是，初步印象就是这样。关于马林我什么也不知道，依我看，他已在回俄罗斯的途中，而鲍罗廷说，他那里有指示，在他尚未熟悉情况以前让马林暂时留在这里。奇

怪的是，你写信给我说，马林已被免职，但他说的却是另一回事。

现在谈谈这里的工作。应当说，最近一个时期，党的工作这里进行得很少。本来它的规模就不大，而近来由于这个倒霉的国民党奸党，工作几乎完全停止了。大家都被套在孙逸仙的马车上；对其他的一切都不屑一顾。近来在党内由此发生了重大的争吵。情况确实变得难以忍受。许多同志对我说，马林在党代会^①上建议完全与国民党合并，因此后来他被迫问得直推托。不管怎样，总的情况就是这样。不管莫斯科作出什么决议，党只是表面上执行，而实际上常常是反对这些决议（在对待国民党的态度上）。这种情况使莫斯科的威望变得很不稳固，党的路线变得摇摆不定、曲曲折折，因此工作也就没有成效。应当彻底消除党是为外交人民委员部服务的观点。当霍多罗夫或者马林认为吴佩孚是个非常好的人，俄罗斯应当面向他等等时，他们就把党拉向这方面，并竭尽全力努力使党纳入这一轨道，大家也都作了努力。后来，当实际生活抛弃了对吴佩孚的这些幻想时，党又采取了另一条路线。人们开始把党拴在孙逸仙的马车上，要把孙从他“可爱的”拥护者所设置的冒险泥潭中拖出来。

明天如果有人喜欢张作霖，并认为必须面向他，那么又是：伙计们，到那里去吧！必须结束这种状况。让党还是一个党，全面开展自己的工作吧，但愿任何贯彻越飞的观点或外交人民委员部其他代表的观点的马林们，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外交人民委员部需要这样，但不要把党牵连到这种事情里去。即使国民党目前确实是所有党派中最优秀的，更接近于国民革命运动，但也决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做它的尾巴，同它一起经受种种冒险、病痛、阴谋、欺诈等等。让伙计们协调自己的行动，相互帮助，仅此而已。事情

^① 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到了这种地步：孙逸仙想把陈开除出党，原因是后者在《向导》上批评了国民党的行为。

我已经抑制不住，给《真理报》写了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当然在文章中我不能说得像我给你写的这样^①。

亲爱的格里沙，要知道，我不是随便说说的，我知道人们的情绪，我知道很多你在那里不知道的事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我请求你按照我所说的去做，否则情况会变得进退维谷。应该结束这种僵局，不要做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尾巴。

说实在的，我应该写一个关于这方面情况的详细报告，但哪里找得出空闲的时间呀。但我还是要尽力把它搞出来并寄给你。

向玛露霞^②问好，芳尼亚^③向你问好。问考夫曼^④好，听说他好象已结婚，或许已经有几个孩子了。

你的谢姆^⑤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2，第 19—21 页。

亲笔手稿。

① 文章没有发表。

② М·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的妻子。

③ Ф·斯列帕克——С·И·斯列帕克的妻子。

④ Л·Г·考夫曼，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工作人员——译者。

⑤ 即斯·伊·斯列帕克。

第三部分

国民党代表团访问莫斯科

1923年下半年，在发展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同广州孙逸仙政府及其国民党的关系和合作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反映这种进程的最重大行动是实施1923年7月在莫斯科和广州作出的决定。

7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以特别决议形式采纳了“斯大林同志关于任命鲍罗廷同志为孙逸仙政治顾问的建议”，8月2日政治局批准了这一建议（第80号文件）。决定建议鲍罗廷“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要与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协调自己的工作，并通过该代表同莫斯科进行书信往来”（第80号文件）。8月2日，鲍罗廷与前往北京同北京政府商谈承认苏联事宜的苏联新任全权代表加拉罕一起离开莫斯科前往中国。

加拉罕使团于9月初到达北京。9月同北京政府开始谈判后，加拉罕就同孙逸仙建立了联系并开始交换信件^①。鲍罗廷在满洲里停留（以便会见张作霖）后，又在北京和上海作了停留（以便了解情况，会见苏联工作人员和中国共产党人），10月6日他才带着加拉罕给孙逸仙的介绍信抵达广州，此信称鲍罗廷是苏联政府代表，同时又是加拉罕的私人代表。^②

几乎也在1923年7月，孙逸仙派遣由他的军队参谋长蒋介石将军率领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7月中，蒋介石从广州前往上海，在同当地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人的会晤中，讨论了代表团最后的人员组成。蒋介石在上海会见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此人后来（经欧洲）返回莫斯科，但有关他们谈话内容的材料没有保存下来。8月16日从上海出发的代表团成员有：国民党员蒋介石、

① 关于加拉罕1923年底1924年初的活动，见A·S·惠廷：《苏联在中国的政策（1917—1924）》，纽约1957年英文版；C·M·韦慕庭的《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英文版；梁绍丰：《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檀香山，1976年英文版；A·M·海费茨：《苏联外交与东方民族（1921—1927）》，莫斯科，1968年版。

② 信件文本见A·S·惠廷：《苏联在中国的政策（1917—1924）》纽约1957年英文版，第244页。

王登云、沈定一以及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的张太雷。孙逸仙驻欧洲的非正式代表邵元冲在莫斯科加入了代表团。

代表团于1923年9月2日抵达莫斯科，11月29日回到中国。有关代表团在苏联工作的“运行表”的材料（第90号文件）谈到，代表团同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举行过两次会晤，同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人会晤三次，其中包括同该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以及同俄共（布）中央书记鲁祖塔克、苏联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的会晤，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特别会议。此外，代表团在莫斯科参观了一些工厂、访问了军队，在彼得格勒和喀琅施塔得了解了军事学校和海军舰队的情况。据悉，代表团成员还会见了维经斯基和马林^①，接见了在莫斯科的国民党员和中国留学生。

关于孙逸仙的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的某些资料——代表团同鲁祖塔克谈话的简要记录、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两次谈话的简要记录以及同托洛茨基谈话的记录片断，部分已经发表，部分在俄罗斯历史学家发表的文章中做了叙述^②。作为对上述文件全文的补充，本书首次公布了加拉罕给鲍罗廷的几封反映他对孙逸仙军事计划持批评态度的信（第86、103、104号文件）；托洛茨基给契切林和斯大林的一封说明当时莫斯科对于给孙逸仙以广泛军事援助的主张持十分审慎态度的信（第91号文件）；契切林就中国形势和对孙逸仙代表团的態度给俄共（布）领导人的一封信；同托洛茨基谈话的全部记录；代表团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国民党的报告，以及有代表团参加的共

① 见托尼·塞奇：《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起源》，英文版，第2卷第702—704页。

② 见А·И·卡尔图诺娃：《孙逸仙与俄国顾问》，载《孙逸仙（1866—1966）：纪念100周年诞辰，论文、回忆录和资料汇编》，莫斯科1966年版第175—180页；В·博罗金：《托洛茨基与蒋介石》，载《远东问题》1990年第2期第148—156页。

产国际执委会会议的记录和速记记录。

遗憾的是，代表团同契切林、加里宁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谈话记录以及代表团交给苏联领导人的关于中国军事行动的详细书面计划至今没有找到，尽管后者的主要内容在代表团同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人的谈话记录中已有反映。

已经公布的涉及代表团在莫斯科逗留期间的文件以及鲍罗廷1923年12月16日同瞿秋白的谈话记录（第102号文件），其中从代表团一名成员的谈话中可以得知关于代表团内部情况和蒋介石同廖仲恺所谈的这次出访的新鲜印象，提供了代表团的观点，包括蒋介石的观点的全面情况，这比后来的回忆性材料和著作中对这个代表团的描述和估计更全面^①。

代表团的主要目的在孙逸仙1923年9月17日给加拉罕的信中已经指出，信中说：“几周前，我给列宁、契切林和托洛茨基同志发出了同样内容的信件，向他们介绍了我的参谋长和我委派的代表蒋介石将军。我派他去莫斯科是为了讨论我们在那里的朋友们能够用来帮助我在我们国内的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其中包括蒋介石将军要同你们的政府和军事专家讨论关于我的部队在北京的西北及其以外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② 根据这一使命，代表团尽量了解了红军军政工作的组织情况，此外还同俄共（布）和共产国际进行了接触。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最初几次会晤也表明了它的这些目的。

蒋介石在同俄共（布）中央书记鲁祖塔克会晤时表示要了解俄共（布）及其中央的活动情况（第82号文件）。在回答鲁祖塔克关于“国民党按其精神与俄罗斯共产党很接近”的看法时，蒋

^① 见毛思成：《民国15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37年中文版；蒋介石：《苏俄在中国（70年总结）》，纽约1957年英文版；和C·M·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根据俄国作者的著作和文章对这次使命的说明，第151—153页。

^② 见A·S·惠廷：《苏联在中国的政策（1917—1924年）》第243页。

介石说，“国民党一向认为，苏联共产党是自己的姐妹党”。鲁祖塔克在讲述俄共（布）的政策及其在红军组织中的作用之后，建议由共产国际和代表团的代表组成专门委员会来讨论俄共（布）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并表示希望国民党在莫斯科有常驻代表，对此蒋介石表示同意。

9月9日，代表团在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会晤时把自己这次出访的主要问题提出来加以讨论（第83号文件），并表示希望：第一，革命军事委员会能够派遣更多的专家到中国南方，以便按照红军的榜样来训练中国军队；第二，有机会了解红军的情况；第三，共同讨论代表团提出的中国军事行动计划，在这方面代表团拥有“代表孙逸仙的很大权力”。

在这次会晤中达成了关于在苏联和中国为国民党军队培训指挥干部的原则性协议，具体细节（人数、资金、培训地点）将同外交人民委员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讨论。第二个请求没有引起什么问题。至于蒋介石用两小时介绍的军事行动计划，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建议代表团以书面形式说明这项计划，详细分析行动细节、军队部署和设想中的军事行动地点。

没有必要转述蒋介石所叙述、包含在第83号文件中的计划的主要内容。我们只指出，计划的中心点是按照红军的榜样（在苏联帮助下）在蒙古南部地区组建孙逸仙的新军，预计从那里出发，配合其他部队对直隶集团和北京发动进攻。这是计划的最“热”点：即使这方面的象征性步骤也可能激烈加剧俄国同西方大国和日本的紧张关系，使北京政府在谈判承认苏联时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

10月3日在激烈辩论之后（第102号文件），代表团向契切林、托洛茨基和斯克良斯基递交了书面计划草案。该计划不仅送给了军事领导人，而且也送给了外交人民委员，这证明计划起草人意识到，计划的实施给俄国提出的不仅是物质和军事性质的问

题，而且是政治外交性质的问题。

10月中，向共产国际代表提交了代表团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国民党的报告（第87号文件）。该报告包括对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估计、主要军事政治势力的分布情况和本着当时孙逸仙基本方针的精神对国民党纲领所作的说明。报告的结尾部分是“国民党与俄罗斯共产党合作的必要性”，这种合作的理由是苏俄和中国在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俄国远东和中国的侵略威胁的斗争中利益的一致性。因此报告中谈到，孙逸仙博士近年来主张俄中合作；这种合作会促进中国国民革命以及未来的世界革命。蒋介石在莫斯科的各种会晤中都重复了报告的主要论点。

莫斯科对孙逸仙代表团的建议和计划的反应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时间上（对9月提出的主要问题的答复，直到11月同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举行最重要的最后会晤后才作出）是由几种情况决定的。

第一、正是代表团在苏联逗留期间，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的注意力被发展德国革命的计划所吸引。共产国际的许多领导人，包括以前研究过中国问题的布哈林和拉狄克都直接参与了这一活动。对德国革命——西方爆发革命的“最后希望”——的物质支援，也许还有军事支援的任务，对作出有可能大规模卷入东方军事政治冲突的决议产生了影响。

第二、来自中国的消息，首先是关于南部广东的复杂军事形势、关于孙逸仙政府的地位不稳、关于他迷恋于纯军事行动和计谋、关于国民党本身的状况，尤其是关于在7—9月间停止执行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和与中共摩擦加剧的消息也产生了影响。所有这些缘由在托洛茨基给契切林的信中明显反映了出来。托洛茨基在信中写道，必须向孙逸仙及其代表“灌输”这样一种思想：“他们面临着一个很长的准备时期；军事计划以及向我们提出的纯军事要求，要推迟到欧洲局势明朗和中国完成某些政治准备工作之

后”（第91号文件）。11月初，契切林在给共产国际和俄共（布）领导人的信中援引了加拉罕的信写道：“国民党已彻底涣散”（第90号文件）。托洛茨基11月底在同代表团会晤时说，“根据最新消息，孙逸仙在广州的军事处境很危急”（第97号文件）。

这种消息加剧了在共产国际中和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俄共（布）驻华工作人员中存在的关于指望国民党彻底改组、孙逸仙离开大本营、而主要是采取军事行动是否现实的问题在理论上和策略上的分歧和争论，也加剧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会对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前途的后果的辩论（见第84和94号文件）。

为了答复孙逸仙代表团的主要问题，即对军事计划持什么态度，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代表团未能同苏联最高领导人会晤，这引起了蒋介石的严重不安和不满（第90号文件）。11月的最后几次会晤之前，蒋介石情绪有某种转变，据一位代表团成员说（第102号文件），是由于他在10月下旬收到了孙逸仙的电报。电报对俄国领导人派遣鲍罗廷到广州表示感谢，并说：“现在已十分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还指出，同越飞签署的协议已开始执行（第102号文件）。^①

11月11日，代表团同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举行了专门讨论军事计划的最后一次会晤。斯克良斯基发表意见，认为目前孙逸仙和国民党应当集中力量于政治工作，否则，“任何军事行动都必将失败”，都将是“冒险”。换句话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莫斯科对所提出的计划，包括在蒙古南部建立新军的主张作了否定的评价，并拒绝给予支持。

同时，正如从斯克良斯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的，苏联领导人认为可以进行“军事训练”，其主要内容应当是为中国军队培训精

^① 见C·M·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英文版第157、344页。

心挑选的指挥干部和政工干部。

斯克良斯基阐述了关于可能在苏联和中国培训的中国军人数量的建议（第 92 号文件）。蒋介石援引孙逸仙的代表在北京同加拉罕就在广州开办军事学校进行谈判的消息，建议增加派遣去这些学校学习的人数（同上文件）。这种意见交换可能被认为是“接受了中国革命者学习军事的计划”（第 99 号文件）。

代表团于 1923 年 11 月 27 日在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会晤中也讨论了政治军事工作相互关系的问题（第 97 号文件）。同托洛茨基的简短谈话记录是令人感兴趣的，它集中反映了俄共（布）当时的一位最高领导人对代表团的军事计划和国民党当时的工作任务的态度。托洛茨基说：“我们并不拒绝给予军事援助，但在现时军事力量战略对比情况下，不可能向孙的军队提供这种援助。我们将代之以为中国革命者学习军事敞开我们的学校。”

托洛茨基还提到（虽然是顺便地）不能接受所提出的计划的另一个原因，指出：国民党准备好政治条件后可以在自己国内，而不是像计划中所说的那样从蒙古开始军事行动（第 97 号文件）。正如一位代表团成员所说的（第 102 号文件），暗示蒙古独立的这个论点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契切林认为有必要在 1923 年 12 月 4 日给孙逸仙的信中就莫斯科对于军事计划和在蒙古组建军队的主张所持的否定态度向孙本人作出同样的解释^①。托洛茨基说：“在目前条件下，一个严肃的政治纲领要比一个不好的军团具有更大的意义。”据谈话记录显示，蒋介石在同托洛茨基告别时说，他赞同托氏的建议，国民党将努力贯彻俄国同志的意见（第 97 号文件）。

此前，11 月 26 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主持下

^① 见 A·S·惠廷：《苏联在中国的政策（1917—1924）》，英文版第 245—246 页。

召开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议程是“关于国民党对共产国际的态度”。现在保留下来的有未经修订的简短的德文记录和较为详细的英文速记记录。

这次会晤表明世界革命司令部的最高层对孙逸仙代表团和国民党的重视，在一定意义上也被认为是国民党同共产国际建立直接联系的开始：代表团将《关于国民运动和国民党》的报告（第87号文件）提交给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蒋介石在执委会会议上结束讲话时请求讨论这个报告，请求“就中国革命问题给我们以答复”，而在会议结束时他表示希望，“共产国际向中国派一些有影响的同志”并来“领导我们”（第96号文件）。

同时，共产国际领导人曾决定利用代表团在莫斯科逗留的机会向孙逸仙提出修改国民党纲领的建议，他们把这次会晤看作是实现这个决定的重要步骤，而且这次提出的建议是预先同他的全权代表讨论过的。

当然，在广州参与筹备改组国民党的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人也在这方面起了作用。但无论是鲍罗廷还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1. 统一的，2. 涉及国民党纲领各个方面的立场。此外，正如莫斯科所认为的，以共产国际执委会最高机关决议的形式提出的建议将具有不同的份量。维经斯基起草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由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会议前几天交给了契切林和布哈林（第93号文件）。

因此，国民党行动纲领问题成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第一个发言的蒋介石简要地复述了报告中涉及国民党纲领和三民主义内容的论点。在报告中和蒋介石的发言中被说成“民生主义”的第三个主义被认为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蒋介石强调指出，在现阶段革命中，党的政治口号不应当是共产主义的。他说，只有在国民革命第一阶段顺利结束之后（在首先得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这将需要三年或五年时间），“我们就开始

第二阶段，即在共产主义口号下进行宣传工作”（第96号文件）。

蒋介石特别谈到了国民党的“世界革命构想”。他在指出“世界革命的主要基地在俄国”之后，阐述了报告中所包含的关于为了苏联本身的利益必须支持中国革命的论点。蒋介石承认支持德国革命的重要性，并表示希望共产国际要对远东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给予特殊的重视。他说，国民党建议，在德中两国革命成功之后，俄、德、中组成三大国联盟，以联盟的力量“我们就能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第96号文件）。在代表团的报告中还谈到，不消灭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中国的真正独立就没有希望，因此中国革命不只是反对军阀，而且也反对帝国主义（第87号文件）。

还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地方无论是在代表团提交的报告中还是在蒋介石的讲话中都只字未提中国共产党。也许正因为如此，季诺维也夫在自己的讲话中谈到了这个问题和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摩擦问题。他强调指出，虽然共产党人还不是中国的“强大因素”，但共产主义运动已成为世界上的重大力量。看来他是以此暗示，对国民党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在季诺维也夫的讲话中，占据中心地位的部分是阐述正在起草的关于国民党纲领的决议的基本内容，即关于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建议，按照他的说法，“应当使三民主义变得更具体、更明确”。实际上，三民主义的“具体化”即使在季诺维也夫的简短说明中也意味着要对国民党的一系列基本方针，包括在民族问题上，在对待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态度问题上的基本方针作出重大的修改。蒋介石表示：“我们原则上同意季诺维也夫的讲话”（第96号文件）。最后决定成立由布哈林、科拉罗夫、阿姆特和维经斯基组成的委员会同代表团一起起草详细的决议（第95号文件）。遗憾的是，有关委员会工作的材料眼下还没有找到。

1923年11月28日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第98号文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指出，由国民党领导该国的解放运动，并指出“以孙逸仙博士为首的国民党革命分子”“已认识到必须通过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接近劳动群众从而巩固和扩大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表示相信，国民党一定会采纳决议中提出的对其三民主义纲领的新的解释（同上文件）。

决议对三民主义每一条所作的解释意味着几乎在所有各点上都对国民党行动纲领做了十分重大的修正，大大加强了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使其工农政策更加激进，使党采取支持工人运动的方针。

实际上，向国民党推荐的纲领与中共的最低纲领几乎没有区别。这些坚持不懈的推荐意见表明，共产国际竭力想把国民党变成“中国的雅各宾”党。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犹豫不定地试图实现这项正如生活所表明的在1924—1927年间并不现实的计划。

共产国际委托蒋介石将决议转交给国民党领导。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毛思成所证实的，蒋在了解决议的内容后对代表团成员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建议说明它不了解“友好党”的立场^①。决议也送给了加拉罕、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他们在开始改组国民党和为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纲领性文件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这个决议为依据的。

蒋介石向孙逸仙提交了书面报告（迄今未发表），并于1924年1月中旬国民党一大开幕前夕就这次使命的结果向他作了口头汇报^②。正如事态发展进程所表明的，尽管莫斯科拒绝支持孙的军事计划，但这次出访的总的结果加强了他实行“联俄”政策的决心。莫斯科对代表团的最高级别接待、培训军事干部的协议以及关于

① 见毛思成：《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节第70页。

② 《蒋总统秘录》，第5卷，台北1975年版第213页。

俄国政权和军队的强大巩固、关于红军的军事政治组织经验和培训经验对国民党的重要性、关于党和共青团的集中组织对组建有效的国家政治结构的意义等等的通报和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孙逸仙（和蒋介石）的决心，要把利用苏联这些方面的经验作为合作的一个主要方针，并在党、国家和军队的建设问题上以苏联的经验为依据。

82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 拜会鲁祖塔克情况的书面报告

1923年9月7日于莫斯科

关于中国孙逸仙博士代表团 拜会鲁祖塔克同志情况的书面报告^①

今天，9月2日^②，俄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同志接见了孙逸仙的代表团，代表团团长蒋介石发表下述声明：

“我们是被派到莫斯科来的国民党代表，来这里的目的是主要是要了解以中央委员会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听取对我们在中国南方的工作的一些建议并互相通报情况。”

鲁祖塔克同志回答说，他受俄共中央委托欢迎代表团来访，因为他认为，国民党按其精神与俄共（布）非常接近。此外，还有另一些重要情况在使中国的劳动群众同苏联接近。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俄国，两国人民都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苏联的领土有几千俄里与中国的边界毗连，因此苏联人民同中国劳动人民发生联系是很自然的。遗憾的是，中苏两国劳动人民之间没有任何接触，这有碍于加强这种自然的联系。代表团的到来是向这个方向迈出的

① 文件中有批注：送加拉罕阅。24日，月份不清。杜霍夫斯基。
② 原文如此，实际上会见是在9月7日进行的（见第80号文件）。

第一步。

蒋介石同意鲁祖塔克同志的看法，他补充说，国民党一向认为，苏联共产党是自己的姐妹党。今天，代表团希望听到对俄国革命的一些最重要阶段、对革命时期所犯的错误以及对共产党在革命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的简单介绍。因为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可能对国民党在中国的工作很有教益。

鲁祖塔克同志作了持续两个小时的详细报告，主要谈到俄国革命的最重要方面，说明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发展工业和组建红军的措施等。

在回答了一系列问题之后，鲁祖塔克同志提议把一些细节问题和协调国民党同俄共中央的行动问题交给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去讨论。此外，鲁祖塔克同志还指出，为了双方的利益，最好有一名国民党代表常驻莫斯科。

蒋介石以代表团名义感谢鲁祖塔克同志盛情的同志式接待，以及在交谈中得到的重要通报。代表团不反对成立委员会和国民党代表常驻莫斯科，同时对鲁祖塔克同志的建议表示感谢。谈话到此结束。

中国问题代顾问 巴拉诺夫斯基^①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9，第 3 页及其背面。

打字稿，副本。

^① М·И·巴拉诺夫斯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司翻译——译者。

83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 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 情况的书面报告

1923年9月10日于莫斯科

关于孙逸仙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基同志 和总司令加米涅夫同志情况的书面报告

昨天，9月9日，孙逸仙军事代表团于下午3时在革命军事委员会驻地受到斯克良斯基同志和总司令加米涅夫同志的接见。孙逸仙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代表团团长蒋介石将军，第二位代表沈定一，第三位代表王^①和第四位代表张太雷，张是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

斯克良斯基同志就孙逸仙博士的军队占领大城市长沙向代表团表示祝贺。他说，我们为国民党而高兴，因为我们把它视为战友。在双方互致问候几分钟之后，代表团向斯克良斯基同志提出了以下要求：

（1）代表团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尽量向中国南方多派人，去按红军的模式训练中国军队。

^① 即王登云。

(2) 代表团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孙逸仙的代表提供了解红军的机会。

(3) 代表团请求共同讨论中国的军事作战计划。

对第一个问题斯克良斯基同志回答说：

已向中国南方派去一些人，需要等一等，看南方军队怎样使用已经抵达的同志。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没有多少了解中国并懂得汉语的干部，因此尽管有这种愿望，苏联也不可能向中国南方派出大量军事指挥员。斯克良斯基同志认为，鉴于苏联人学习汉语困难，最好是为中国人成立专门的军事学校。要做到这一点较容易，因为有一些中国人在苏联的学校里学习，如东方民族共产主义大学（那里约有 30 名中国学员）以及其他学校。

通过交换意见双方提出以下具体看法：

(1) 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孙逸仙军事代表团认为在俄国境内为中国人成立军事学校是可取的，这个问题首先应同外交人民委员部协商。

应该成立两所军事学校：一所高级军校，为懂些俄语的指挥人员（不低于营级）而设，这种学校能培训 30 人左右，校址设在彼得格勒或莫斯科。另一所是中级军校，可建在靠近中国的地方，在海参崴或在伊尔库茨克，招收约 500 名未受过多少军事训练的中国学员。在往上述学校选送学员时，地方当局必须考察被选人员的政治信仰，严格把关，以便给学校选送忠实可靠的人。中国学员在上述学校学习期间，应开展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因为据代表团说，在军队中，甚至在高级指挥人员当中，还有完全不识字的人。

最后，斯克良斯基同志指出，这些情况，有关部门将向他们作出通报。学员数量问题将取决于革命军事委员会为此能拿出多少资金。

(2) 关于代表团了解红军的问题，斯克良斯基同志认为是完

全可以接受的，同时他指出，苏联军事学校管理总部主任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将向来宾们介绍他们感兴趣的红军的各方面生活。

(3) 代表团说，他们拥有孙逸仙授予的全权，奉命就中国作战计划问题同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谈判。斯克良斯基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提出一些问题，得知孙逸仙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工业。在广州有华南唯一的一个可以进行生产的兵工厂。火药厂在去年陈炯明将军叛乱时被炸毁。因此火药和其它爆炸物不得不从国外进口。但是由于在距广州40里的地方有英国的要塞香港，英国人阻止向广州运输军事物资。这是南方军队长时期装备不足的原因。至于孙逸仙军队的士气和构成也非常低下。据代表团成员说，士兵完全没有革命精神，因此总司令部对士兵能否被敌人收买没有把握。即便孙逸仙的现代化军队占领北京，因士兵不可靠和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敌对行动，也不得不退出来。强大的英国要塞香港的存在对孙逸仙军队的后方——广州始终是个威胁。所以，一旦南方军队开始向北方胜利挺进，英国人就会立即通过被收买的附近几个省的督军在后方策划暴动，就像去年陈炯明将军那样。此外，外国人在长江还拥有大型内河舰队，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妨碍孙逸仙军队从长江流域一带向北方推进。南方军队一开始接近这个地区，英国和美国的炮艇就会立刻开始阻止过江。这样一来，控制着香港和连着长江的上海这两大基地，并拥有大量资金可用来行贿的外国人决不会让南方军队有机会彻底打败得到大多数外国帝国主义者支持的吴佩孚。

鉴于上述考虑，南方军队总参谋部和国民党在代表团动身来莫斯科前夕决定，把战场转移到中国另一个地区，即西北地区。为此目的才派出了本代表团。在其任务中也有同革命军事委员会协商新的作战计划问题，代表团请求革命军事委员会就此问题提出建议。

在持续两个小时的会见中，孙逸仙的总司令蒋介石将军向斯

克良斯基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讲述了这个计划，其要点如下：

实际上目前属于孙逸仙的只有一个广东省。但其影响已扩大到邻近的几个省，即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和四川。在这些省孙逸仙博士有很多拥护者，他们服从广州的指挥。孙逸仙的军队有6万人。

吴佩孚的大本营设在洛阳，他实际上只控制着中国很小的地区，即湖北、河南和安徽省，而他的同盟者曹锟则控制着直隶和山东省。曹锟和吴佩孚拥有8万士兵，张作霖也有同样数目的军队，他控制着东北三个省。新的作战任务是：

去年在陕西省被吴佩孚击溃的游击队，现在可以加以整顿，并从南方调一部分军队去加强它，在陕西成立对付吴佩孚的兵团。

在庫伦以南邻近蒙中边界地区建立一支孙逸仙的新军。由招募来的居住在蒙古、满洲和中国交界地区的中国人，以及从满洲西部招募来的一部分中国人组成。在这里按照红军的模式和样子组建军队。从这里，也就是从蒙古南部发起第二纵队的进攻。中国中部地区现有的所谓“土匪”（即不久前在津浦线上扣留外国人火车的那些人^①），可以用来进行反对吴佩孚和曹锟的游击活动：炸毁铁路路基、桥梁、列车等等。在吴佩孚军队中和在工人、农民中间开展宣传工作。

这就是孙逸仙制订的新计划的主要方面。其特点是在新的地区开展军事行动，并按照我们的方式重新组建中国军队。

斯克良斯基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听完代表团的说明后，建议在研究了战役的一切细节、目前的军队部署、未来作战地区的政治状况等等之后，用书面形式阐明这项计划。

^① 1923年5月5日夜間，在（山东省）临城车站附近，当地匪徒袭击了由天津开往浦口的“蓝色特快列车”，把300名旅客，其中有26名外国人，带到山中。1923年5月7日外交使团要求中国政府解救外国人质并赔偿旅客遭受的损失，还要求由外国人对铁路和中国警察实行监督。

这次谈话于晚 7 时结束。

中国问题顾问 巴拉诺夫斯基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9，第 4—8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84

杜霍夫斯基关于国民党 代表团情况的札记

不晚于 1923 年 9 月 10 日于莫斯科^①

机密

对 9 月 2 日抵达莫斯科的孙逸仙代表团的评述

1. 代表团团长——蒋介石，参谋长，曾在日本接受军事教育。属于国民党左翼，是最老的党员之一，深受孙逸仙的信任。同我们很亲近。目前他已脱离中国南方的军事工作。他支持我们在中国北方的作战方案^②。在中国，以最有教养的人之一著称。他对我们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以及红军的装备很感兴趣。

2. 沈玄庐，浙江省议会议员，从国民党建党时起即是党员。曾有一年（1921—1922 年）是中共党员，后脱党。据他说，原因是中共对农民的状况不够重视，曾与浙江的农民运动有联系（1922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中的标记注明的，个人档案，10/9，签字不清。

^② 苏联在中国北方的作战方案不详。

年)，属于国民党左翼。他特别关心农民运动问题。打算同我们谈这个问题。

3. 王^①——新闻记者，曾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是代表团中的次要人物。选中他是因为他懂英语，而上面提到的两位代表团成员任何一种欧洲语言都不懂。

东方部主任（杜霍夫斯基）

全宗 17，目录 84，卷宗 592，第 242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即王登云。

85

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问 第 144 步兵团情况的书面报告

1923 年 9 月 17 日^① 于莫斯科

绝密

卢果夫斯基给外交人民委员部 远东部主任的书面报告

书面报告

昨天，9 月 16 日，我陪同中国代表团成员访问了驻扎在斯巴斯军营的第 144 步兵团。

关于这次访问问题我事先已同穆拉洛夫同志^②和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全权代表达什凯维奇同志说好，达什凯维奇又按商定的预先通知了该团政委和团长，说有中国共青团团员来访。上级指示，不举行欢迎仪式，访问尽量秘密进行。

蒋介石将军本来打算穿他现在穿的全套军装去访问该团。根据我的建议他换上了便装。

该团没有举行欢迎仪式。我们找到政委和团长以后，就到团部去了，在那里把代表团成员向副团长、总务主任和负责的支部

^① 日期是根据内容注明的。

^② Н·И·穆拉洛夫，莫斯科军区司令——译者。

书记作了介绍。该团不久前刚刚演习归来，所以营房还在修缮，生活尚未进入正轨。不过这个团还是进行了整理。按照我的计划参观了一切。任务是介绍该团的生活起居和组织情况，简略说明纪律和同志关系、学习情况、同工农的亲密关系，以及那些形成红军战斗力的因素。代表团成员未参观武器库，我也没有介绍特别秘密的资料。

代表团参观了连队、营房、红角、号令、修理部、医务室、俱乐部、图书室、机枪小队、什物仓库（军服）、厨房、面包房、俄共支部。代表团成员品尝了红军战士的食品，了解了每周的食谱，并对丰盛可口的食物以及各种各样的菜肴表示赞赏。

蒋介石将军主要关心军事组织、行政管理机构和技术装备方面的情况。代表团的第二负责人则关心政治工作、日常生活和纪律问题。其余人表现得有些漠不关心，但对团里的朴素生活、坚强的组织和相互关系也说了许多夸奖和感到惊讶的话。

由于蒋介石将军的一再要求，在访问结束时根据我的安排举行了士兵大会，有一两个营的红军战士约400人出席。大会是在该团的演出厅举行的，以乐队和全体与会者演讲“国际歌”开始。蒋介石将军第一个讲话，代表团一成员把汉语译成英语，我又从英语译成俄语。当然，翻译时作了某些修改，使之变成了共产国际或青年共产国际成员的比较正式的讲话，因为蒋介石将军的讲话具有某种坦诚直率的特点。

原讲话内容大致如下：

“还在远东的时候，我们就听说，红军是世界上的一支最勇敢、最强大的军队。远东所有被压迫民族都这样说。今天我有幸访问你们，访问光荣的红军的一个光荣的团，并亲眼看到了你们的强大和这种强大的秘密，这就是与人民的团结一致。从西伯利亚来这里时，我就在各处看到了这种团结，看到了你们的强大，现在对我来说已经很清楚了。

“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们！你们战胜了你们国内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但你们还没有消灭世界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你们要准备同他们决战，因为你们要在其它民族的帮助下完成这一事业。请记住，每一个战士的义务就是牺牲。要时刻准备为你们的事业去牺牲，这就是胜利的保证。

“我们是革命者，是革命的国民党党员，我们是军人，我们是战士。我们也准备在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牺牲。

“我们来这里学习并与你们联合起来。当我们回到中国人民那里时，要激发他们的战斗力，战胜中国北方的军事势力，之后我们将向你们，红军战士们，伸出我们友好的同盟者之手，以便共同战斗。我再次表达我的喜悦之情，因为我看到了你们，看到了你们的生活。我深深地感谢你们友好的欢迎和接待，感谢你们向我们介绍了一切。我想再次到你们这里来。请允许我向你们所代表的红军致敬。”

蒋介石的讲话不时被经久不息的掌声、（乐队）演奏的“国际歌”乐声打断。讲话结束时，全体与会者兴奋地高呼“乌拉”。蒋介石将军讲话时情绪很高、也很激动，看来，他讲话时充满着强烈而诚挚的感情。他在结束讲话时几乎是在吼，他的双手在颤抖。

战士们对他作出了热烈的答谢，但政委和团长却有点一本正经，这之后会议闭幕，全体与会者高唱“国际歌”，最后以高呼“乌拉”结束。代表团成员离开时，战士们把他们抬起来，轻轻地摇摆，一直抬到汽车前。

红军战士的情绪很高，表现出真诚与热情。当时的场面激动人心，令人兴奋。代表团成员在离开时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接待。据我观察，代表团成员，特别是蒋介石，非常激动和兴奋。他们非常活跃，整个回来的路上都在谈论红军的“精神”、它的“热情”，（据他们说）这是他们在其它任何一支军队中都没有见到过的。蒋介石请翻译告诉我，他的印象非常好，他为红军的“精神”所感

染。他说，他们所有人——指挥员和红军战士——并不是首长与部下，而像是农民兄弟（farmers^①）。访问该团时，代表团成员将自己的名片给了团长和政委。这些名片存在团政委处。根据蒋介石将军的要求，他在一张纸上用中文写下了自己访问的印象。这张纸没有翻译，存在政委处。蒋介石坦率，彬彬有礼，有些客气，但很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和印象，他喜欢作总结。代表团的另一个成员……^② 沉默不语，很有洞察力，笔记本不离手，他提出的问题总是最重要的和需要郑重回答的。那位翻译……肤浅，只关心表面现象。代表团成员，特别是蒋介石，在军人当中有点直言不讳，也不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他们遵循的习惯和提出的问题说明他们是军人。

军事院校管理总局秘书 卢果夫斯基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9，第 9—12 页。

打字稿，核对无误的副本。

86

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

1923 年 10 月 6 日于北京

敬爱的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

① 原文为英文，即农民。

② 此处和以下的删节号是文件中原有的。

您从上海寄来的信收到了^①，很高兴您同上海人一起制订的计划同我们北京的想法完全一致。我将期待着得到您关于这一计划实施情况的进一步消息。您或许在中国的短暂逗留期间，已经掌握了一个简单的真理，即中国人非常乐于讨论和制订各种计划，但是，实行这些计划却极其缓慢。因此必须经常地监督每一个步骤，使他们保持高度紧张状态，而不要指望他们自己去理解和去完成所有应该做的事情。所有这些都很简单，但我一天比一天越来越相信有必要经常把他们掌握在手中，否则什么事情都会被束之高阁。

关于通讯社

国民党人早就说要成立通讯社。达夫谦告诉我，他答应每月给他们300元的经费，但眼下未再谈此事^②。其实在拟定的所有机构和工作的计划中，通讯社应当占有突出的地位。因为办报纸而没有自己的信息机构向这些报纸提供消息，这意味着事情只做了一半。此外，这样的通讯社也是我们自己所需要的。您知道，我们给北京的报刊提供材料很容易，而且我们的所有材料几乎不作任何删节地被各种倾向的报纸刊用。如果我们有可能把我们的消息分发给各省的报刊，那么这将意味着我们不仅影响北京的社会舆论，而且也影响中国其它地方的社会舆论。我们始终需要记住：北京只是一个小岛，北京还不是中国。所以，我请求您密切注意成立通讯社的事，首先要推动他们成立通讯社，而且在北京，当然他们可以指望得到我们的帮助，在这里我们将对他们实行经常的监督并使之处于我们的领导之下。

^①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没有找到。

^② Я·Х·达夫谦给加拉罕的信没有找到。

关于孙的信

孙9月17日的信我已收到^①。您拆开了这封信并了解了它的内容，做得很好。至于信的第一部分，他谈到我同北京的谈判，以及我在这里可能遇到的困难。关于这些我没有什么要对您说的，因为我已经在北京同您相当详细地谈了这方面的情况。您向张继和陈独秀指出，必须迫使民族主义分子公开地、有组织地，我要说经常地，本着陈独秀同您谈的精神表明态度，这是完全正确的。

至于孙逸仙关于在广东进行谈判的建议，我希望您能找到一种相当委婉的方式，向他说明提出这个问题“为时尚早”。但同时您要“严肃地”同他谈一谈，他想如何防止出现“利用北京使苏维埃俄国遭受新的外交失败”（我逐字引用他信中的话）^②的可能性。

至于他的信的第二部分，谈到他的代表的莫斯科之行，我认为，您应当请他向您详细介绍一下他的计划，并委婉地指出，在莫斯科没有我参加未必能作出什么决定，或许莫斯科想让我在北京解决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莫斯科肯定会很认真地关切地听取他的代表的意见，但未必能作出什么最后决定。从以前的通信中您可以了解到孙的从北方进军的空想计划。

所以，如果他再次重提这个计划，您要向他说明，这个计划不可能立即实施。另一方面，您要经常强调，在决定实施任何一项重大计划之前，我们应当竭力巩固自己在中国的地位，特别是巩固自己在满洲的地位，要解决中东铁路问题。我不再多谈这个

① 苏联公布了孙逸仙1923年9月17日给加拉罕的信的第一部分（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俄文版第6卷第436页。《孙逸仙选集》第749—750页）。信的第二部分由美国汉学家A. 惠廷公布（见A. S. 惠廷：《苏联在华政策（1917—1924年）》，英文版第243页）。

② 在孙逸仙给加拉罕信的俄译本中说：“资本主义列强将企图通过北京和利用北京使苏维埃俄国遭受新的外交失败。”（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俄文版第6卷，第436页；《孙逸仙选集》第750页）。

问题，因为你很清楚应该谈什么和怎么谈。

在北京的谈判

在这里，事情有些复杂化了，因为王博士^①不知是出于他本人意志还是迫于外交使团的压力，已开始摇摆并在日前居心不良地试图挑动我召开正式会议^②。他骗我未成，但是现在在他要尽欺骗勾当之后，我开始更加怀疑他的建议，这些建议您是知道的。此外，还发现那份通过第三者向我提出的原则性协议草案，他不准备向我正式提出。他为我起草了一个十分厚颜无耻的提案，这个提案我甚至都不能讨论。可见，已经不是我们所预期的那种诚实的游戏，而是要出了一种最无诚意的把戏。我现在还未决定，是否公开向他和向北京（政府）发动攻势，因为在这些日子里或许中间人还要奔波一阵，力求“协调一下”他们所说的误会。但无论如何，我都会把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通报给您。

如果来得及，我将给孙逸仙写封短信。如果您未收到要转交的信，那就请您向他解释一下，我来不及给他写信，对此我非常抱歉，下一次信使去他会收到复信。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全宗 627，目录 1，卷宗 4，第 1—3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① 即王正廷。

^② 看来是指 1923 年 9 月 18 日王正廷同加拉罕的会见，在会见过程中，苏联代表坚持毫不拖延地建立两国间的正式外交关系，而中国代表提出召开会议预先讨论所有争议问题。

87

国民党代表团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

不晚于1923年10月18日^①于莫斯科

机密

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国民党的报告

1911年的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所谓的“中华民国”，但是实际上这并未导致国内政治和经济的任何变化。在共和国存在的近12年来，政权一直控制在背信弃义的军阀手中，而外国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经济剥削的影响在日益增长。这说明，1911年的革命是少数学生和军人的共同事业，而群众只是赞同推翻满清王朝，并未参加革命。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学生和军人，由于没有受到群众的监督并接受了外国列强的影响，因此未能顶住旧的反动势力而最终向他们投降了。

为什么群众未参加革命？因为他们不理解革命的必要性，没有政治觉悟。这也说明国民党的优秀分子从革命时起就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但始终未能彻底推翻它并建立一个能够抵御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独立的中国。

为什么人民没有政治觉悟？自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国民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中的签字注明的：1923年10月18日收，维经斯基，1923年10月18日。

党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但是实际上，在现有的经济结构和政治条件下要启发他们的觉悟是非常困难的。

2. 中国的经济结构^①

旧的经济结构已开始发生变化，但是这个过程尚处在初始阶段。目前中国的现代工业还处于萌芽状态，所以大企业有组织的工人仅是中国人口中微不足道的少数。中国现代工业的萌芽状态也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处于萌芽状态。尽管在中国有中国资本家投资的现代工业，但是绝大部分大工业企业都属于外国人或中外合资公司。中国的几家大银行也控制在外国人手里。

同时在外人急剧加强在中国的经济剥削时，充当外国剥削中间人的中国商人也相应地在中国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这个阶级能否参加纯粹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是很令人怀疑的。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总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即大约70%，是农民。他们当中很多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因为一小块租来的或者自己所有的土地的收成不足以养活日益增多的家庭人口，同时由于农村经济制度的变化，家庭手工业也在破产。因此，农民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不得不到附近的工业中心去寻找工作或者到军队中去服役，或者当土匪。

中国不存在大土地占有制（每个省约有10个地主占有一万多亩土地）。在构成农业人口总数的4300万个家庭中，有2300万是小农。因此在中国很少发生大土地占有者与农民之间的冲突。此外，农民没有遭受国家苛捐重税之苦。所以要找到有助于我们处理农民阶级问题的相应政治口号是相当困难的。虽然农民深受土匪的袭击和连绵不断的内战之害，但是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剥削并没有使他们感到不安。

^① 原文如此，文件中没有第1部分。

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感受到外国的经济压力，总的说来表现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倾向，但是很多从美国回来的学生却相信借助于美国资本主义可以复兴中国。美国的教育制度毒害了中国青年的思想。因此我们不能期望在反帝运动中同中国知识分子建立统一战线。

3. 中国国内的政治关系

自民国初期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夺取了政权，迄今为止他们一直控制着中央政府。他们一直设法镇压民主力量，这导致了连绵不断的内战和人民的灾难。中国军阀之所以横行霸道，主要是有外国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列强在物质上和财政上的支持。依靠外国的帮助，军阀们可以保持自己的地位，而外国列强则利用中国军阀制造混乱局面，以便加强它们在中国的影响。由此可见，中国的政治就是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的政治。

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列强是日本、英国和美国。日本在满洲和中国北方拥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影响。英国的影响扩展到中国中部和南部，这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美国虽然在中国没有领地，但是通过其基督教传教士和借助于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宣传，他们十分有效地剥削着中国。这些列强不仅在中国拥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影响，而且在中国的许多战略据点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堡垒。从军事角度来看，一旦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他们有能力控制整个局势。自华盛顿会议和英、法、美、日的太平洋公约^①以来，外国在中国的影响更加增大了。就在不久以前，他们利用土匪袭击临城车站的事件要求对中国的铁路实行国际监督^②，从而打算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殖民地。

外国帝国主义列强非常仇视国民党，始终支持同国民党作斗

^① 见第 18 号文件注①（本书第 72 页）。

^② 见第 83 号文件注①（本书第 287 页）。

争的军阀，企图阻止中国的统一。以曹锟和吴佩孚为首的北洋军阀常常依靠外国的帮助来同国民党作斗争，使国民党不止一次地遭到了失败，但是仰赖自己不可战胜的精神，国民党依然能够坚持反对中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

中国目前局势的特点是，国民党和直系军阀这两个互相角逐的势力之间的斗争连续不断。此外，中国还有被吴佩孚从北洋军阀集团中排挤出去的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和安福系军阀。这两个军阀派系在反对直系军阀的运动中暂时同国民党实行合作。不久前在北京举行违宪选举^①之后，所有反直势力的同盟变得更加强大了，所以在最近的将来有可能爆发战争。即便考虑到现在国民党力量还薄弱，行将到来的战争的结局也会是反直同盟的胜利。但是从革命的观点来看，这未必对我们的国家有利。

4. 中国国民革命的特点

过去国民革命由于三方面原因遭到了失败。首先是因为革命党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其次是因为在现有经济结构下在人民中间进行宣传很困难。第三是因为有外国列强的干涉。

然而，当前外国列强的经济剥削，中国军阀背信弃义的行为，中国工业由于同外国商品的激烈竞争而不能生存，工人的苦难和贫困，世界革命的高涨，土匪的袭击和内战的不断，都是激发中国人民革命倾向的因素。不久前，上海商界抗议对中国铁路实行国际监督。中国学生组织几次发表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声明。工人大罢工在很大程度上吓坏了军阀，吓坏了外国帝国主义者。广东省的农民民兵帮助国民党军队同北方军队作斗争。由此可见，中国民众的国民运动已经开始。这场运动使民众中的各个阶级，如无产阶级、农民、资产阶级和学生，都投入到同世界帝国主义和

^① 指选举曹锟为中华民国总统。

中国军阀的斗争中。近 10 年的经验和华盛顿会议的结果使我们明白了，我们的国民革命不能带有妥协性质。我们的目标就是同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中国军阀作斗争。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不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就不能指望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由此得出，我们的任务就是推翻世界资本主义。所以我们的国民革命将具有国际性质。

5. 国民党的纲领

早在 1911 年以前，国民党就通过了作为自己纲领的“三民主义”。这些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是由孙逸仙博士提出来的。民族主义意味着所有民族一律平等，一方面，我们应该为捍卫我们的独立而同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帮助弱小民族发展他们的经济和文化。民权主义是指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权利，而这些权利不能因其能力大小而有所区别。所以每个人都有言论、结社、集会、出版等的自由，而政府必须来自于人民，取得人民的帮助并为了人民。第三个主义正确地译成西方语言就是国家社会主义^①。所有的大工业企业和所有土地都应属于国家并由国家管理，以便避免私人资本主义制度的危害。由于现时的经济条件在中国立即实行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民生主义对当前中国来说是最能被接受的经济制度，也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纲领中的指导原则。

6. 国民党的改组计划

过去国民党犯了许多策略性错误。为了适应中国新的形势和领导新的革命力量，国民党必须进行改组。1911 年以前国民党是一个很小的秘密革命组织，推翻满清王朝以后，它成了一个大党。

^① “民生主义”后来又被译成“人民福利主义”或者“人民安康主义”。

袁世凯把它解散以后，它又变成了革命者的秘密团体^①。只是不久前它才占领了中国南方的领土。目前国民党打算采取合法的和非法的行动，把自己的组织扩展到东北各省，并改组现有的总部和（地方）分部。

至于宣传工作，国民党有扩大和增加自己的宣传机构和出版物的强烈愿望。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为我们的宣传工作寻找政治口号。

7. 国民党和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之间合作的必要性

不言而喻，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国民党的改组会促进中国国民运动的发展。这场运动的目标不仅是要同中国军阀，而且是要同世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斗争。帝国主义列强把中国看成是供自己剥削的最富饶的土地，它们尽一切可能防止中国国民革命取得胜利。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者（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很难靠自己的力量达到目的，他们必须在反帝运动中同苏维埃俄国合作。

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四个资本主义大国公开宣布其共同的意图是剥削中国和俄国的远东。虽然俄国成功地摆脱了外国影响，资本主义列强还是在蓄意破坏俄国工农政府的存在。因此，苏维埃俄国即便是出于自身的利益，也应该同国民党合作。这就是为什么孙逸仙博士在最近几年主张俄国和中国进行密切合作，他的意见得到了苏维埃俄国的赞赏。这种合作会给中国的国民革命者提供重要援助，也会给未来的世界革命带来巨大的好处。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77，第 121—130 页。

^① 指 1914 年 7 月孙逸仙在东京所建立的秘密进行活动的中华革命党。

英文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88

维经斯基给张国焘的信

1923年10月24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张国焘同志：

今天我收到了您9月28日为陈启修教授作介绍的便函^①。当然，我会尽一切可能帮助他完成他所肩负的使命。我认为，现在是他访问的最合适的时候，因为除了其它信息外，他还能从这里发出有关德国情况的真实信息。

可惜，您很少谈论中国的政治问题和工人运动问题。我恳切地请求您给我本人谈谈您对国内一些重要政治事件的看法。

我有一种印象，现在您不像从前那样和本来应该的那样积极地从事党的事务。作为私人朋友，我想给您指出，不管党内对某些策略问题存在什么不同意见，党都面临着一个最重要的压倒任何其它问题的任务，这就是：**如何开展争取独立的民族运动，如何根据国内各种不同集团的社会基础向它们说明这场运动，以便为这场运动制订一个总的行动纲领。**

我听说，您又特别关注日益高涨的中国工人运动。我知道，您坚持这样一种意见：好像中国工人运动是争取国家独立，反对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的世界帝国主义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在这方面，

^① 张国焘的便函没有找到。

您是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新的因素，也就是年轻的有潜力的工人运动的杰出代表。从心理学上说，我很理解您的看法，但是我担心您没有很客观地分析形势，您把现有的因素同应该有的因素混淆在一起了。

在中国现时状况下，工人运动还不是能够率领整个民族反帝运动的重大因素。

对于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来说，为工人运动寻求它能在民族运动中占有的正确地位，是非常困难的，但同时又是特别重要的。您应该正确地理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说在中国或在任何地方这两种运动能汇合到一起，以便消除一切阶级差别。当然不是！问题在于应该使这些运动联合起来并加强国内反帝运动的高涨。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犯策略性错误，夸大现时工人运动的实际力量，那么我们就不能切实利用我们所拥有的客观因素。

现在我不想就此问题进行冗长的争论。我只想让您详细地告诉我您的看法，然后我再答复您。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弄清中共策略中的某些基本方面。

最后，我想特别秘密地告诉朋友，您应该始终不渝地主张年轻的但还弱小的中国共产党的统一，尽管党内有一些应该加以纠正的意见分歧，您应该仍像从前，甚至比从前更加积极地从事党的工作。

希望您能注意我所谈的几个方面，并立即给予答复。

您的兄弟般的维^①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2，第 24、25 页。

英文打字稿，副本，亲笔签字。

^① 即维经斯基。

89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 访问“红罗莎”工厂的书面报告

1923年10月27日于莫斯科

关于孙逸仙代表团访问“红罗莎” 工厂（原日罗工厂）^①情况的书面报告

昨天，10月26日，下午3时孙逸仙代表团一行3人——第2位代表沈^②、王^③和张太雷访问了“红罗莎”丝织厂，代表团抵达时，厂长出来迎接，并同副厂长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代表一起作了介绍。代表团参观了丝织品生产和所有厂房以后，还给中国同志们看了幼儿园、工人俱乐部、剧场等。大约晚上8时参观工厂结束，陪同代表团的工人建议中国同志在“红罗莎”工人大会上发表讲话。代表团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大会主席宣布刚刚参观了工厂的中国工人代表讲话。大会非常热烈地欢迎中国客人。全场热烈鼓掌。之后沈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持续约5分钟，由我译成俄语，其内容如下：

“亲爱的俄国同志们！刚才我们有幸参观了你们的工厂，并对

① “红罗莎”工厂指以罗莎·卢森堡命名的工厂，“日罗”为原厂主的姓——译者。
② 即沈定一。
③ 即王登云。

苏维埃俄国无产阶级在很短的时间内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确信不疑。在来莫斯科以前，我们就听说你们在进行巨大的创造性工作。但我们从未料到你们在重建国家的事业中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通过你们工厂的例子，我们可以判断苏维埃俄国工业的全面进步。我们希望中国工人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够以俄国工人为榜样夺得工厂。在俄国所看到的一切，更加鼓舞了我们为中国革命而斗争的力量。我们希望这次革命很快就实现。

沈的讲话和大会主席高呼“中国革命万岁！”受到工人们的热情欢迎，然后大家齐声高唱“国际歌”。半小时之后，代表团离开了工厂。

从谈话中得知，此行给代表团留下非常良好的印象。中国人一直称赞工厂的清洁、工人的纪律性和幼儿园的完美布置，等等。

星期一，即 29 日，预定参观原钦德尔工厂，电灯泡厂，特廖赫戈尔普罗霍罗夫工厂。

巴拉诺夫斯基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9，第 13—14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90

契切林给季诺维也夫的信^①

1923年11月1日于莫斯科

致季诺维也夫同志。

抄送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同志。

敬爱的同志：

从加拉罕同志最近的信中您可以得知，国民党已彻底涣散^②。许多卖身求荣的显贵们都自称是国民党党员。现在都是徒有虚名。实际上孙逸仙依靠的是忠实于他本人的个人和团体。因此加拉罕同志指出，必须改组整个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好象当时成立了一个有拉狄克同志参加的委员会，以便作出这方面的各种指示。能否让一个同志，比如对东方问题有点儿研究的布哈林同志，取代拉狄克同志进入这个委员会？也需要让维经斯基同志加入这个委员会。您认为库西宁同志也适合吗？如果片山潜同志在这里，则要利用他。

据加拉罕同志说，孙逸仙的拥护者对我们同北京政府的谈判极为不安，认为我们让他们听天由命。加拉罕说，在这里对孙逸仙的参谋长^③应该表示出亲热，但结果却相反。除了我之外，同他见面的只有斯克良斯基同志。如果恢复上面提到的委员会，它

① 信中有季诺维也夫的批示：11月2日，送皮亚特尼茨基同志。让我们恢复委员会，让它同中国人对话。格·季。

② 加拉罕的信没有找到。

③ 指蒋介石。

就能安排几次有孙逸仙参谋长及其随行人员参加的会议。参谋长神经过敏到极点，他认为我们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契切林）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362，第 121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91

托洛茨基给契切林和斯大林的信

1923 年 11 月 2 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契切林同志。

抄送斯大林同志。

从加拉罕同志的信中可以看出，中国的事情在继续恶化。资金都用在纯偶然性的军事举措上。没有任何党，没有任何认真的宣传工作。其实，在中国政治生活不明朗的情况下，稍加组织和集中的国民党具有决定意义。

另一方面，加拉罕同志坚持派两名优秀的飞行员和五名参加过国内战争的总参谋部军官。我认为，我们现在不能让任何一个严肃的军人脱离实际，况且在中国没有政治组织的情况下，我们的一些军人会显得无能为力。

我认为，应该极其果断地和坚决地向孙逸仙和他的代表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现在他们面临着一个很长的准备的时期；军

事计划以及向我们提出的纯军事要求，要推迟到欧洲局势明朗和中国完成某些政治准备工作之后。

我赞成契切林同志关于在莫斯科成立中国委员会^①的想法，以便使这个委员会真正地，也就是说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确保中国国内工作发生急剧转变，即把99%的注意力从大的联合行动上转移到在现有军队中从政治上组织居民的工作上。

全宗 325，目录 1，卷宗 415，第 3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92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 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

1923 年 11 月 13 日于莫斯科

关于孙逸仙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基同志 和总司令加米涅夫同志的书面报告

昨天，星期日，下午 3 时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同志和总司令加米涅夫同志接见了孙逸仙代表团。

孙逸仙代表团方面出席的有：团长蒋介石、王^②、张太雷和不

^① 见第 90 号文件。

^② 即王登云。

久前从伦敦来到这里的孙逸仙驻英国非正式代表团^①。

首先斯克良斯基同志感谢代表团转达的孙的追随者们向十月革命六周年的祝贺^②。然后在进行了一般的问候之后，斯克良斯基同志转入具体地讨论孙的追随者提出的作战计划^③。他的谈话内容如下：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收到来自中国的全面通报之后，详细地讨论了所提的方案并得出以下结论：目前，孙逸仙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在中国做好政治工作，因为不然的话，在现有条件下的一切军事行动都将注定要失败。斯克良斯基同志举出俄国革命的例子。俄国革命的完成不仅是十月起义的结果，而且是通过俄国共产党长期坚持不懈的工作做了准备的。国民党在中国首先也应该做同样的工作。所以党应该首先全力搞宣传工作，办报纸、杂志，搞选举运动，等等。政治准备问题现在对中国来说是最重要的。当然，也不应该忘记军事工作，但是只有在完成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准备好那些将大大减轻军事工作负担的内部因素以后，才能够着手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斯克良斯基同志举出俄国国内战争的例子。当时共产党不仅把自己的力量派往前线，而且派到敌后，在那里通过顽强的和危险的工作来削弱敌人。当红军占领某个城市时，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有时人民已经武装起来并准备加入红军队伍。国民党也同样应该在中国无产阶级中间做准备工作。

蒋介石在致答辞时指出，国民党的政治工作遇到了来自外国帝国主义者方面的巨大阻力，他们千方百计反对中国人的革命活动。宣传工作主要应该在大工业中心进行，但在这里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警察捣毁所有革命组织，残酷地镇压革命者。在这种

① 即邵元冲。

② 代表团的祝辞没有找到。

③ 作战计划没有找到。

情况下做工作特别困难。

蒋介石还说，孙逸仙同越飞同志会见后，国民党加强了自己的政治活动，但党认为同时也有必要开展军事活动。蒋介石指出在俄国和中国进行革命运动的条件不同。据他说，在俄国，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这就是沙皇政府，而在中国，情况则不同，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帝国主义者都反对中国的革命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所以在那里采取军事行动是必要的。

斯克良斯基同志在回答蒋介石时，再一次分析了俄国革命的过程，他强调指出了对群众的政治工作在革命运动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因此，国民党首先应该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用在对工农的工作上。他说，帝国主义者的反对是很自然的。俄国革命者在十月革命前同沙皇制度作斗争时，也处在同样的条件之下。尽管条件艰苦，国民党也应该在群众中做革命工作。否则它的任何一项任务都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接近群众，同群众在一起，这就是中国革命党的口号。所以，斯克良斯基同志认为，有必要在近几年只做政治工作。军事行动的时机只有当内部条件很有利的时候才可能出现。发起你们方案中所说的军事行动，就是事先注定要失败的冒险。在做政治工作的同时，也可以进行军事准备。为此，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可以派中国同志到苏联军事学校学习。总参谋部学院可以接收3—7人，军事学校可以接收30—50人。在选拔派往俄国的同志时，必须遵循以下条件：首先必须是那些完全忠于党、经过仔细挑选的人。斯克良斯基同志特别注意这一点。已有军龄、不低于团级或营级的指挥员，可以派到学院学习。派往军事学校学习的也需要有一定的军事素养。不要追求派出人员的数量，而要注意他们的质量，主要是对革命和对工人阶级的忠诚。最好少派一些，但要派真正的革命者，而不是胆小鬼或叛徒。

蒋介石建议依靠孙逸仙的代表在北京同加拉罕谈判之后要在

广州开办的学校增加派出人员数量。

斯克良斯基同志指出，开始需要进行一次试验。如果成立所设想的50人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那么革命军事委员会不反对增加派出人员。随后，斯克良斯基同志向代表团提出一个问题，问他们对红军的印象如何。孙的追随者感谢革命军事委员会允许他们参观军队，并且指出，红军战士们的纪律性和文化水平使他们感到惊讶。用他们的话说，我们的军队是世界上现有军队中最强大的，因为苏联军队依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

斯克良斯基同志表示同意他们的看法，并说军队与人民的这种团结应当是国民党在组建自己的革命军队时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最后，孙的追随者告诉斯克良斯基同志，他们打算11月22日离开莫斯科，希望再一次会见加米涅夫同志和斯克良斯基同志。此外，他们还转交了给托洛茨基同志的信^①。斯克良斯基同志答应，托洛茨基同志痊愈后将立即接见代表团。5时30分会见结束。

在回什塔特^②的路上，我问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张太雷，第二次拜访革命军事委员会给他和代表团留下了什么印象。张太雷回答说，他事先预料到了斯克良斯基同志作出的答复。据他说，代表团对俄国的访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对本党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正如提出的方案中所说，提出新的军事行动的军事集团的影响将大大削弱。在学习了苏联的经验之后，本代表团应该同意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的意见。俄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大量政治工作，无意中使他们不得不相信，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应该进行大量的政治准备。在这方面，代表团对俄国的访问不是没有收获的。

张太雷所作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即使从外部表情上判断，代

^① 代表团给托洛茨基的信没有找到。

^② 从1921年起改称克鲁泡特金胡同。

代表团也没有对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答复感到吃惊。他们从提交计划到同斯克良斯基同志的第二次会见时所处的那种神经紧张状态很快就消失了。还在星期六，即11月10日，由于神经紧张、过度劳累等原因蒋介石一再要求送他去疗养院休养两周。可是有趣的是，蒋介石一走出斯克良斯基的办公室，就对我说，不要张罗疗养院、医生等事了，因为他自我感觉好多了。由此可见，中国人对同斯克良斯基同志的会见是满意的。

巴拉诺夫斯基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9，第 17—20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93

季诺维也夫就共产国际执委会 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的 决议草案给契切林和布哈林的附函

1923年11月23日于莫斯科

急件

- 送：1. 契切林同志
2. 布哈林同志

送上决议草案（由维经斯基同志起草）^①，并请你们把意见于

^① 维经斯基的草案（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6，第 43—45 页）列入最后决议案（第 1—7 条）（见第 98 号文件）。

星期六前（明天），即接见中国人和听取他们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报告之前送给我。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季诺维也夫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0，第 87 页。

手稿。

94

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

1923 年 11 月 25 日于北京

亲爱的格里沙：

1. 来了一位外国显贵，在这儿呆了几天，这期间我介绍他认识了当地的一些中国同志，然后他就离开了。钱和所有其它东西我已收到，从这封信所附的收据中^① 你可以看出，钱和所有其它东西已随后转交了。M^② 同志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只可惜他身体不太好，难以承受他的工作会给他带来的种种困难。我本人得到一点儿有关我以前很少考虑的事情的知识，虽然就自己的工作性质而言，我当然掌握一些有关岛上情况的材料。应该说，那里的工作早就需要物色一些领导者、倡导者和鼓舞者。基础非常

^① 收据没有找到。

^② T·马拉卡（1897—1949），印尼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共产国际四大代表，1923 至 1924 年间曾任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驻华代表。

好，当然不是指所有岛屿，但是无论如何，有几个岛屿可以成为很好的工作中心。要是他能打入菲律宾就好了。大概你从报纸上可以知道，在棉兰老岛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菲律宾的岛屿，从中心棉兰老岛开始，已为革命骚动所席卷。在美国军队和当地居民之间发生了真正的战斗。应该说，当地居民近来通过做走私军火生意的德国商人弄到了相当多的武器。下面这种情况可以说明这个运动的特点、它的规模和它同群众的联系：美国殖民者大批撤退，另一些人逃入山中；好像最和善的菲律宾市民也都变成了杰出的战士。菲律宾民族运动的代表在议会里公开抨击美国的文明，抨击它试图把菲律宾人变成美国帝国主义的奴隶的行为。需要补充一句，当然，美国的军舰在必要时也能够对付棉兰老岛，但问题是那里有数不清的很多小岛，通常起义者可撤退到那里，而美国军舰却去不了。

看来，这次运动是如此声势浩大，以致有人炮制了（美国殖民地）“人民”关于必须为美国彻底保住菲律宾的决议。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如果我们能渗入到那里并发展运动，那么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结出即便不是红色的，也是玫瑰色的果实。格里沙，你还谈到让辛普森给一个外国人发放记者证的事。也许你给我写最近这封信时还没有收到我的信，否则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当然，我在这里不能对这个家伙作出全面的评价，因为这要占去太多的篇幅和时间。难道能转述那些合起来可以说明一个人的特征的所有琐事吗，并且这些琐事只有当你靠近我的工作地点的时候才能明显地感觉到。所以我认为压根就不向他提出这种要求更好，因为你永远不会相信，该做这件事的人过5分钟就会忘得一干二净。我从《晨报》（中国一家大报）那里给他弄来一张名片，要弄到这张名片在技术上必须通过李^①。李奉召匆忙去上海，我不能确切地

^① 即李大钊。

告诉你，李是否把这张名片给他带到上海去了。据最近的消息，小伙子随后去了南方，当地 Chief^① 给他写了去那里的介绍信。

2. 我已为你建立了联系。希望现在你能比较准时地收到他们的信，当然如果他们写信的话。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将做我所能做的一切。我认为，最近你开始按期得到消息了。例如，依我看你同张^② 已经定期通讯。

3. 说到共产党，首先应该强调一下它的财政困难情况。你知道吗，格里沙，遗憾的是，这对中国共产党起着巨大的作用。其实这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也许对其它许多共产党都是如此。简言之，在10月、11月、12月都没有从共产国际执委会那里得到钱，而有整整6个月没有从红色工会国际那里得到钱了。你应该考虑一下这件事，并要尽快采取措施把这些钱立即汇出来。

由于没有钱，定期出版物的出版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停止，一些刊物的出版已缩减。例如，《Labour Weekly》^③ 的出版，中央一点钱也没寄来，可怜的张不得不脱身而去。我下面还将提到他。《前锋》^④ 的情况同样不好。从瞿秋白离开后已经有半年多了，我还没有见到一期《前锋》，虽然听说，那以后出了一期。

（谈到钱的问题，我想最后指出，维尔德电报费超支大约200中国元，他要求赶快销帐，把下一笔预付款寄来用于此项需要）。

说到整个党的工作，应该说，实际上做得很少。当然，你知道最近一次党代会的决议，据说，是与国民党有关的^⑤。从那以后绝对没有做什么。例如，现在广州决定于1月15日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今天已经是11月25日了，为此目的是否进行了什么组

① 英文，意为首长、领导人。

② 即张国燾。

③ 《劳动周刊》。

④ 《前锋》是中国共产党的刊物，1923年7月—1924年2月在上海出版。

⑤ 指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

织工作？什么工作也没有做。现在我不想就这个计划的实质发表意见（现在这已经是鲍罗廷的新举措，每个新来的人都要想出某种新点子）。下面我将谈到国民党，其实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告诉你了，我还在综合报告和一些文章中谈到过这一点（虽然《真理报》表示了歉意，但还是未能刊用这些文章）^①。

你知道，张离开了中央^②。依我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里有荷兰人^③的蛊惑宣传。我有理由更相信张，而不是后者。即使有大批积极工作的干部，也不能让张离开中央，何况当时这些积极的同志屈指可数。曾经有很短一段时间，张完全处于失宠状态，当时甚至没有给他安排任何工作。他们无缘无故地把小伙子撵走，他落得个没有工作，没有经费。后来可能改变了主意，派他去北京，他呆在那里，面对不幸的《工人周刊》，苟延残喘。要知道，在北京这里，在工人运动方面你做不了很多的事，这是很清楚的。北京是一个政治泥潭，封建军阀制度的最后余孽在这里腐烂。当然，这些余孽在其它省也有很多，但是在北京，他们达到了鼎盛。在这里肆无忌惮地营私舞弊、行贿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既然谈到那些现在与广大群众，哪怕是同少数的工人群众都没有联系的同志们，既然这项工作全都是那些闭门造车的知识分子在做，那么这副毒药也就会毒化我们的工作气氛。不久前，有人发动了一场卑鄙的运动，反对我们做学生工作的那些同志，说他们（他们中的一些人）从其它集团那里得到了多少多少钱。我非常了解其中的一个高同志^④，他曾去过莫斯科，（你）也从一位青年人那里得知，他曾和张一起在我那里。我知道这是胡说八道，我也知道，这符合谁的需要；但最糟糕的是，某些同志竟相信这件事，

① C·H·斯列帕克给《真理报》写的文章没有找到。

② 张国焘在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未被选入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

③ 指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马林。

④ 即高君宇。

而且在对这个问题开始调查之前就发动了反对自己同志的运动。当然，相信这件事的那些同志并不比别人更好或更坏；这只不过说明了我们的同志们必须在其中工作的那种气氛。以前我就说过，在湖南有些同志指责其他一些同志，说什么他们从莫斯科拿了钱而且生活得不错，但不关心别人，等等。这些事的发生是由于参加党的工作的一些同志，即使是一般地参加，脱离了群众，就像侨居国外的人士脱离了自己的根一样，正在变成一帮市侩，他们需要发泄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烦恼，并从这种表现方式中为此找到了出路。

最近一次代表大会^①使同志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混乱，这次大会竭力用自己关于国民党优先地位的决议（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排除那些附带加进去（即使不是那样完全加入）的东西，我指的是党、工会和其它方面的工作。当然，我不想因此就说，这样一种看法是绝对不正确的：什么中国的社会革命已经临近等等。我只想说明，在工人运动有可能兴起或已经风行起来的地方，没有必要无缘无故地披上国民党的外衣并充当国民党的预言家。应该考虑到，只有在南方，某种程度上在西南以及东南的某些特殊地区才谈得上国民党。但在北方和甚至在长江流域的中部地区则完全可以在工人中开展工会工作、文化教育和少量的党的工作。然而，在这些地区，从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以来做的工作非常少。张呆在北京这里主管铁路局（工人部）^②。他的工作将会变成什么样？将会变成想办法怎么能不让《工人周刊》陷入绝境。以前，工会成立的时候，多少还按时收取一些工会会费。京汉铁路罢工以后，由于一位“好军阀”的效力，差不多所有工会都被摧毁，这项收入就很不常有，即使有，数目也不多。

现在不是去重新召集这些工会，去重新组织工人，他们曾一

^① 指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② 张国焘曾在中华全国铁路工人联合会工作。

度组织得很好（主要是指京汉铁路工人），并且证明，他们是值得我们去工作的，现在沉湎于一种新思想，要使所有人都成为国民党人。这种激情还将支配这些从政者的思想多长时间，这很难说。但无论如何，这种思想的第二个青春期已经来临。我说第二个青春期，是因为一度曾试图这样做过，但毫无结果。现在会产生什么结果，我不知道。格里沙，我要再一次强调指出，我不想用这一点来说明，不应该使国民党复兴，但我要重复的是，我已经通过穆辛^①对你说过，目前不应该把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混为一谈；必须顽强地和坚定不移地进行我们的工作，而不要管我们现在认为谁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思想家。必须使我们现有的为数不多的同志，至少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去担负党和工会的工作，如果需要的话，可让少数同志去帮助国民党。遗憾的是，当我把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来谈论时，我觉得可笑。实际上可能除了在全中国可以数得出来的无愧于国民党员这个称号的7—10个人之外，这样的党并不存在。其余的则是一些由于友谊和关系而同孙逸仙联系在一起的人。孙逸仙一个人在领导着运动，如果说这种运动存在的话。在国民党的大人物中，除孙以外能叫出名字的还有张继、汪精卫，可能还有胡汉民，就这些。至于孙的儿子孙科，我很难确切地说什么。但无论如何他远不是自己革命的父亲当之无愧的（作为革命者的）儿子。

当国民党受到威胁的时候，国民党员之间还有某种团结。而一旦形势好转，就又重新开始扯皮——出现新的纷争、新的倾轧。你可以想象，在既没有党的纪律，实际上也没有党的组织的情况下，这样一些国民党人混进工会，各行其是，自然会把他们的纠纷和争吵带进去。只有我们的同志替他们作掩饰、竭力加以辩护甚至夸奖他们时，才会出现令人愉快的场面。当然从理论上好说，

^① И·М·穆辛，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政治顾问兼书记——译者。

但实际上除了带来不良后果之外，没有任何好处，而我们在其中很有影响的工会，也将会瓦解和丧失。我不知道，在南方怎么样，可是在北方，当有人提到国民党的魅力时，他就会认为你在许多场合是个狂热分子。因为不存在这样的组织，它在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今天夺取广州，明天将它交回去，后天再夺回来，而后再交出去，等等。一句话，反复重复关于小白牛的童话。这对谁有利呢？对各种各样的将军有利，他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大发横财。所以很多人看不出国民党组织和其他军阀集团之间的区别。应该说，如果孙由于某种原因不在人世，那么现在这个样子的国民党，很可能也将不复存在。现在一切都靠孙在维持着。当然，我们知道，应该有中国的国民革命党，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在觉醒，而国民党是这个党的萌芽，所以我们应该帮助它，也就是说尽快让孙站稳脚跟并成长起来。这是对的。但是现在是一个混杂的群体，在很多方面和其它一些同样不良的、也许是更坏的混杂群体毫无区别。不应该使人们脱离现实的事业和靠渴望实现的海市蜃楼来维持他们的生活。

现在国民党的代表大会正在筹备。当然，不清楚结果会怎样，因为孙的处境相当艰难，主要是财政方面，因而也是军事方面。但我们假定，孙的地位得到巩固，代表大会也成功地召开。结果会怎样呢？每个省要派出6名代表，好像其中3名由孙亲自指定，而另外3名由选举产生。我认为，聚集起来的又将是那些现在自称是国民党党员的将军们，这不会给国民党增加一点儿好处，他们将谈论民主、自由和其它一些美妙的东西，但收效甚微。为了使代表大会顺利进行，必须事先做组织工作，开展这方面工作，造成汲取力量的源泉，那时或许代表大会能获得成功。也许我在这方面太悲观，也许作为起步，需要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它会带来某些结果。也许吧。但我们需要同时做自己的工作，甚至首先做自己的工作。当然应该帮助国民党，同它保持充分的联系，等等，

但在可能的地方，也要独立地开展自己的工作。

要知道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国民革命工作的性质本身造就了许多冒险家。对于许多甚至身居中国这里的人来说，也不能对这样或那样一些人物作出准确的分析，这完全不是因为中国是个很“特殊的”国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逻辑对它不适用，也完全不是因为把一些人和事纳入到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的一个可以理解的思想公式中有种种困难，而这些困难产生于下述变化，即中国（在城市中）的实际状况已不再“独特”，中国城市的实际状况是传统、风俗、不成文的法律等等的几千年的积淀，但是，这种积淀已经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了。不过这个一成不变的积淀的厚层，已被世界帝国主义的粗暴双手和当地资产阶级的同样双手搅动，而且在大部分厚层中，已经不能把一层同另一层明显区分开，不能准确地说出，封建主义以及它的所有属性在哪里结束，资本主义经济在哪里开始。中国的大人物也是这样，他们的思想是带有一点欧洲的光泽，略通一点儿欧洲的文明，既有点像商人，像封建主，又有点像在“北京饭店”或“瓦公里”^①（音）中的现代资产者，相当多的是完全呆在家里的封建主，大部分是呆在自己的小铺里、作坊里甚至工厂里。你到过中国，当然你像我一样知道这些情况，如果不是知道更多的话。不过我想说这些情况是要证实自己的论点。

把中国的现实强行纳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模式，带来的后果是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的分化，更不要说官僚阶层了，以及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对他们的毒害，正是这种强制做法所造成的特殊环境给国民革命运动中形形色色冒险主义的盛行造成了极好的机会。

顺便说一下，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在中国有许多重要人物，

^① “北京饭店”和“瓦公里”都是北京的大饭店。

他们可能对国民革命运动是有用的，但由于他们不信任任何帝国主义者，因此也常常不信任任何外国人，所以我们常常很难把他们了解清楚，因为他们把自己束缚在不信任的圈子里，对我们来说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依然是一本没有翻开的书。在这种情况下，把愿望当作好的东西，而实际上，好的东西却有可能从我们的寻觅中滑掉，所以犯一些错误是很容易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中国已不再是一个“特殊的”国家。但也不应由此得出，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运动同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产生的各种冒险行为联系起来。粗糙的材料，即需要加工的材料，完全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我们用不着把它加以分解，可是当我们一字不差地遵从最近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时，我们则要分解这些由我们用几年时间加工的材料，对此我毫不怀疑。

现在我简单地谈谈国民党，我只是或者更正确些说是一般地谈谈这样一个国民革命党。

我个人认为，如果孙现在遭到失败，那么这对整个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福音。迄今为止孙醉心于军事冒险，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孙就是一切。其它的一切都服从于这样一个主导的思想，即通过招募“好”的将军和士兵去夺取各省。现在就是在资产阶级群众中也没有深厚的基础，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和强有力的分支机构，这项工作就变成了孙不得不向一些将军和军官们寻求军事帮助，而对于他们来说，当时出于任何考虑，和孙一起同吴佩孚、曹锟等人作斗争都是有利的。当还有钱的时候，一切都比较好，但只要军官和士兵在一段时间内领不到薪水，整个军队就会变成一群土匪，为了勒索钱财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当然，在各个革命运动时期这是军队中常有的事。但是当有了明确的原则，明确的思想，而这些原则和思想又得到这支军队可以依靠的为数不多的但却很积极的群众的赞同时，以及当这支军队能够用这些为数不多的群众所理解的革命必要性为自己的行动作辩

解时，这种事就有意义了。但在当时却没有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上面说，对于许多人来说，国民党与中国其它军阀集团没有区别，或者在最好情况下没有多大区别。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国民党因此应该抛弃同军阀进行武装斗争的思想，那将是一个大的错误。但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国民党没有积极性，它只能由于无休止的军人闹剧而吃大亏。孙的军队驻扎在陈炯明的根据地惠州附近约有半年时间而未能拿下惠州，难道这在军事上还不可笑吗？（据最新消息惠州曾被孙的军队占领，但孙的军队必须紧急增援广州附近的石龙，因为陈炯明的军队已经逼近那里，因此，孙的军队未能巩固自己的胜利）。去年我曾相信并认为同陈炯明作斗争是正确的，而现在我坚定不移地认为，所有这些军事争斗，消耗了大量的钱财，导致广州资产阶级，以致在很大程度上沿海资产阶级，失去了对孙的好感（即使根据内部披露的看法，这种情况也是很重要的了），这也是个大的错误。实际上，许许多多的其他国民党人哪一点比陈好？区别仅仅在于：陈具有强烈的个性，有组织才干（因此他不可能同另一个具有强烈个性的人——孙和陆相处），而孙的那些投机者连这一点都不具备。当然可以说，在思想上陈和孙格格不入，但是很抱歉我决不相信这一点。我认为，陈有点督军主义，幻想建立一个“model province”^①。这是对的，但我仍然认为，这种分歧还不足以证明把他逐出国民革命党的队伍是对的。或许陈已经不适合今天这种格局的国民党，不过我说的是它实际上应该成为的那种国民革命党。我在这里不对陈和孙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一点你自己知道，而且亲自写了文章。但我仍然认为，孙和陈的联合是明智的联合，是革命热情和求实现性的联合。

我个人认为，如果陈能重新夺取广州，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吴

^① 英文，意为“模范省”。

佩孚得到了广州，当然，客观上陈的作法正中吴佩孚及整个北方佞臣的下怀，甚至会得到吴的援助（即使不是他本人的直接援助，那也是通过他的一些将军的援助），但不知为什么我有这样一种印象，陈当时反正不会服从直系军阀。也许我是错的。

国民党必须开展党的工作，把自己的分支机构扩展到全中国，使国民党的主义能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只有那时才能谈得上真正的武装发动，小打小闹的军事游戏才会停止。国民党的军事组织在各省都有，这很好。要让它们成为军事革命工作的中心，而国民党的群众组织应该同时和这些中心一起做工作。不应该性急，而要预计到国民革命工作需要长达10年、15年，也许更多的年头。客观的世界形势在朝着好的方向变化，越加快这种运动越好；但是现在必须制订不少于10年、15年的计划。如果国民党的每一个负责人都能把这一点装进自己的脑袋里，那就会有结果。

就拿北京来说吧。客观形势是这样，它对组织民族解放力量十分有利。官僚机构和它的所有弊端全都一目了然，它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也是大家直接感觉得到的。公立学校已经8、9个月没有领到薪水了，警察、宪兵和士兵的处境也一样。冬天每天都有4、5个人死在街头，这也是众所周知的。所谓的外交使团毫不客气地无视中国民族利益的现象也是有目共睹的。还有大量其它情况为顺利开展国民革命工作提供了充分的可能。然而在北京，肯定有一些革命分子跑来跑去，找不到落脚之处。他们不能投靠现有的集团，因此他们从几千里距离之外向国民党这个唯一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情况之外还是个潜在的中国国民革命政党的党发出了呼吁。但是所有这些呼吁只不过是沙漠中得不到回应的呼声。我相信，如果孙放弃自己的军事幻想，承担起上面提到的工作，我们就会很快在中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国内不满分子就会集中在这个核心的周围。

4. 要回答这里是否有关于俄国和欧洲革命运动的足够消息

的问题是困难的。要确切地说出前一部分即俄国的情况尤为困难。要知道在这里有俄罗斯通讯社，而它的记者认为，俄国提供了关于自己的足够消息。说正经的，为什么你不往这里寄关于俄国的任何书籍呢？我在莫斯科时，国际联络部图书分部还往这里寄一些小册子，现在却收不到任何东西。格里沙，你是知道的，不能影响我本人定期收到这类书籍，何况常有人向我提出这类要求，大学^①一直在报怨，未从你那里得到任何东西。请你下令往这里寄这类书籍吧！你也清楚，既然现在主要考虑知识分子问题，我们需要使他们和我们联系起来，而用这种办法我们就能够做到，更何况，有一个活人在这里，他要利用现有关系把所有这一切都联系起来。

至于欧洲，应当说，他们收到的书也相当少。他们能收到《国际新闻通讯》^②，我也不时向他们提供各种激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刊物，但这毕竟还很少。我不能确切地告诉你，他们收到了什么和他们需要什么。因为你提的问题很具体，我也需要作具体的了解，了解后再告诉你。

你还提到德国革命问题。好像那里的事情进行得很困难。我认为，我们太乐观了。也许在这里不能不这样想，因为除了资产阶级的垃圾外，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资料。我请你谈谈自己的看法和事情的真相。你是知道的，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

至于陈启修教授，我好像认识他。很难记住他们的姓名。但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我很了解他。有一天，他同另一些教授曾宴请过我。你问他，认识不认识我，如果认识，那就是那个人。李^③现在不在，他还上海，所以我无法问他。无论如何我更加确信，此人就是我上面提到的那个教授。他是个相当不错的人，可以与

① 指国立北京大学。

② 《国际新闻通讯》是共产国际的新闻简报，用英文、德文、法文等文字出版。

③ 即李大钊。

他共事。

5. 李汉俊不在北京，他现在在武昌教书。我很了解他，曾几次同他谈过话，他常到我这里来。我同样认为，他被排挤出党，应该感到遗憾，尽管最近他好像又重新向党靠近了。关于李汉俊的传闻很多，由于他不同意党的策略，他本人愿意退党。遗憾的是，我本人未来得及就这件事详细采访他。我同他谈话时，还很好，只是后来听一些同志说：李似乎认为在整个中国不可能发生工人革命，所以必须放弃在工人中的工作，并着手做知识分子的工作，他说，知识分子是革命的主要推动力。我不能保证我转告的话完全属实，怎么买来的就怎么卖嘛。还有一件不愉快的事。他曾在北京这里担任政府公职，我记不清在哪个部了，既没有通知党也没有得到党的认可。显然这是不能允许的。当中央建议他离开这个部时，他说，他有家，有孩子，等等。我认为应该和李同志谈谈心。他是一个宝贵的工作人员，我们不能失去他。但是我有一种印象，他身上有一些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萌芽，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往后会发展得相当严重，那时我们当然就会失去他。这里也有自尊心受到伤害，对中央有抱怨等等问题。我认为，关于他的问题你应该同张^①好好商量一下。我毕竟无法了解只有中国同志才能知道的那些细节。所以，我不想说那些我认为我自己都不十分清楚的东西，我建议你直接同张谈他的事。我也同张谈谈。我把他的地址告诉你：中国，湖北，武昌，师范学院，李汉俊教授收，以备万一用得着。不要惊奇，他有教授的头衔，这在中国是常有的。当然这个地址是公开的。

6. 有7名学生如果现在还没走的话，不久将要去莫斯科。看来是一些好小伙子。至于3名中国姑娘，她们现在由于没有路费耽搁了。当然，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广泛开展这方面工作，因为

^① 即张国焘。

这里人手很少，但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加强干部培训工作。还必须在这里加紧筛选，这项工作现在正在进行。顺便说一下，当那个已经毕业的班离开莫斯科时，你让他们同我取得联系，当然，只能是这个班里最正派的人，否则他们会在这里败坏我的名声。前不久一个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好像是叫鲍普的，在《晨报》上写了一篇关于苏联帝国主义、关于苏联当局虚伪等反对我们的文章，指责那些对我们友好的学生，说他们亲俄，是从这个词旧的贬意上说的。当然，丑儿家家都有，但必须更仔细地对他们进行挑选。

7. 鲍罗廷到这里后，我向他介绍了当地的一些同志，召开了党的会议；我向他介绍了整个中国的局势，并向他谈了我自己的看法。关于他的问题我在上封信中已经谈到，我认为无需再谈了。现在他在南方，想到这里来向加拉罕同志报告，但由于孙的军事失败而耽误了。不久他会到这里来。在他报告之后我将详细地告诉你那里的情况。看来，他完全是在为自己机关^①的利益工作，自然，他也在使党的工作适应这项工作。实际上至今他一直在这样做。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再罗嗦了。大概从这封不可原谅的冗长的信中你会明白我的观点。

8. 现在谈点私事。我还是认为，如果放我走的话，我需要在春天之前回莫斯科。加拉罕同志一向反对我离开中国。他建议我请三个月假，然后返回。我不知道，这一切会是什么结果。我本人终归不会反对再次到这里来。但我必须稍作休息。而且只呆在北京一个地方终究是毫无意思的。应该安排几次国内旅行，那样当然会有更大的好处。你对此有何看法？我让黄^②给你带去一封

① 指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

② 即黄平（1901—1981）。他于1923至1924年间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起义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委宣传部长，1932年叛变革命——译者。

信，想必你已经收到。

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请你打听一下，我的那位共青团员怎么样，你记得吗，他在柳克斯曾住在我那里。如果他还在学习的话，他现在在波克罗夫斯基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我同他怎么也联系不上，这件事为我办一下。我想给他点儿帮助，但不知道怎么帮助。我认为，小伙子在遭受痛苦。他叫伊兹赖尔，姓达格曼。

玛露霞^①好吗？代我和芳尼亚^②向她致以衷心的问候。芳尼亚也让我问候你。让玛露霞给我写信。如果我能给她点儿物质上的帮助，我是很高兴的。告诉我，不要客气。

祝一切顺利，请立即回信，问候大家。

你的塞姆^③

又及：请原谅，信写得这样冗长而且有点拉杂。如果你愿意，就自己把信弄简炼些。

塞姆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2，第 46—54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M·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的妻子。
② Ф·斯列帕克，即 C·H·斯列帕克的妻子。
③ 即 C·H·斯列帕克。

9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①

1923年11月26日于莫斯科

主持人：季诺维也夫。

出席：蔡特金、皮亚特尼茨基、阿姆特尔、库列拉、科拉罗夫、库西宁、斯图阿尔特、施蒂纳。

迟到：莱茵施坦、温格尔、维经斯基，来自中国的国民党五人代表团。

听取：1. 国民党对共产国际的态度。

决定：成立由布哈林、科拉罗夫、库西宁、阿姆特尔和维经斯基组成的委员会与国民党代表团共同起草详细决议。起草好的决议分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所有成员。

总书记

全宗 495，目录 1，卷宗 88，第 1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① 文件的标题。

96

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

1923年11月26日于莫斯科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

蒋先生^①（王先生翻译^②）：

国民党代表团是奉国民党领袖孙逸仙之命派出的，目的是在这里，在莫斯科这个世界革命的中心，同共产国际的同志们进行坦诚的讨论。

今天，国民党肩负着在中国进行革命工作的责任，这是进行世界革命工作的一部分。中国的革命政党，即国民党是世界的革命因素之一。共产国际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它也有领导革命运动的责任，特别是领导那些遭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责任。中国受外国列强即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利益的沉重压迫，共产国际应该特别注意中国的革命，并向中国的革命政党提出坦率的建议。

至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我们通过维经斯基同志已就此问题提出一份（书面）报告^③。我相信，你们都已经看了，所以今

① 即蒋介石。
② 即王登云。
③ 见第87号文件。

天我们不讨论报告的内容，而只讨论未写进报告的问题。

三民主义，即孙逸仙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应当成为中国革命的政治口号。报告中已对这些主义作了解释，你们可以自己看。所以在这里没有必要对它们进行详细审议。我们认为，第三个主义即民生主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我们认为，对于中国革命来说，目前最好的政策是，作为第一步，使用“（争取）独立的中国”、“人民政府”、“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之类政治口号。作为第二步，我们将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做一些事情。

有两个原因使我们在目前不能开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一是大多数中国人民不识字，所以在人民中开展宣传工作异常困难。何况如果我们在共产主义口号下开展宣传工作，那么在目前，我们还不能合法地从事这些工作，而不得不秘密地进行。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很难完成这项工作。第二个原因是，大多数中国人民属于小农阶级、小资产阶级。

如果今天我们使用共产主义口号，就会造成小土地所有者和小资产者对这些口号的错误理解。这种利益冲突会使他们加入反对派阵营，他们可能跟随中国军阀反对我们，这就会使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目前我们的纲领是旨在联合中国人民的所有人士，以便借助于统一战线来取得革命的巨大成功。

所以今天中国革命工作的政治口号不应该是共产主义口号，而应该是“（建立）独立的中国”和“人民政府”口号，一旦我们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我们就可以进行合法的宣传共产主义原则的工作。

如果我们使用“（建立）独立的中国”和“人民政府”之类政治性口号，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口号，那么中国革命的成功将会容易得多。

其第一个原因是 30 年前开始革命时，孙逸仙博士就使用三民

主义作为革命的口号。因此，大部分中国人民在很大程度上都了解三民主义，如果我们继续使用这些口号，我们就较容易取得成功。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长期使用三民主义口号，中国军阀不特别注意这类宣传工作。他们对三民主义不像对共产主义口号下的宣传工作那样给予很多的注意。还有一个原因是小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会在革命运动中反对我们，我们可以把他们作为我们革命力量中的因素。

现在我们来谈谈我们党的世界革命构想问题。我们认为，世界革命的主要基地在俄国。至于俄国本身，当然它有许多敌人，但它在几年中已取得了革命的成功。然而，在俄国的西部战线，仍然有诸如德国和波兰这样一些处于资本主义控制之下的国家。如果德国革命不取得胜利，那么俄国的西部战线不会安全。我们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列强在这条战线上的干涉行动，必须让俄国同志帮助德国革命取得成功。

在俄国的东部战线有中国，它还处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之下。自然，如果中国革命不能取得成功，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就会在中国取得胜利，进而他们就会进犯俄国的远东，即西伯利亚。如果他们在那里进犯，那么这对俄国来说是有危险的。

华盛顿会议期间，四个资本主义大国，即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宣称它们愿意开发远东。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必然利用中国的军阀作为其在中国夺取强有力地位的工具，以便进行有效的剥削。国民党建议，俄国、德国（当然是在德国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和中国（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之后）组成三大国联盟来同世界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借助于德国人民的科学知识、中国革命的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该国的农产品，我们将能轻而易举地取得世界革命的成功，我们将能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认为，共产国际的同志们应该帮助德国的革命，以使它尽可能提前取得巨大的胜利。同时我们也希望，共产国际对远东，特

别是对中国革命予以特别的注意。

可能外国同志认为，中国革命很难取得成功，而实际上，如果我们根据三民主义口号开展革命工作，那么在中国取得成功是很容易的。我们认为，在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也就是中国民族主义革命进行三、五年之后，我们就能取得成功，而一旦取得成功，我们就开始进行第二阶段，即在共产主义口号下开展宣传工作。我们认为，那时中国人民将更容易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报告到此结束，请共产国际的同志们对其进行非常认真的讨论，并就中国革命的问题给我们提出建议。

问 题

科拉罗夫同志：既然报告中很少提到中国的资产阶级，那么是哪个阶级剥削小土地所有者和小资产阶级，再有在这些小私有者中产生不满情绪的原因是什么？

蒋先生：小土地所有者和小资产阶级对当兵的人不满，这些人纪律性很差，掠夺小资产阶级，结果在中国内战频仍。

再就是土匪，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当兵的人。此外，还有同外国资本家的激烈竞争，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无法与他们竞争，所以它也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

蔡特金同志^①：

蒋先生：至于第一个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家族不享有特权。至于第二个问题，小私有者害怕压迫，主要是来自官僚机构和官员们的压迫。

科拉罗夫同志：人们对现行的土地占有制度是否有什么不满？例如，这些小土地所有者对通过中间人征税是否不满？因为这些中间人强迫小土地所有者为他们由此而得到的收入支付各种费

^① 记录稿中没有这段发言。

用。

蒋先生：在中国土地税并不很重，而且也没有增加。虽然可能引起一些不满，但是并不大。

斯图尔特同志：向谁租赁土地？谁是地主？如果税不高，那么地租高吗？

蒋先生：地租问题是另一回事。最高的地租达土地总产量的80%。这就是说，租地的人有时必须把80%缴纳给地主。

斯图尔特同志：第一，他们说，没有大土地所有者，但是有地主，这些地主能够规定地租为80%，如果没有大土地所有者，那么能规定地租为80%的土地所有者是些什么人？

蒋先生：小土地所有者向佃户收取地租，最高达80%，最低50%。佃户不纳税，而地主纳税。地主纳税额是所收地租的1/12。

阿姆特尔同志：您对国民党党员数量是怎样估计的，工人和农民在其中占多大成分？

蒋先生：党员总数为60万，其中约1/3是工人和农民。

阿姆特尔同志：您是根据什么计算的，您根据什么说国民党党员有60万，而其中1/3是工人和农民？

蒋先生：在我们的上海总部有党员名册。

斯图尔特同志：如果在60万党员中有1/3是工人和农民，那么其余2/3是什么人，他们在哪里？

蒋先生：另2/3包括知识分子、商人、士兵以及华侨。

罗季诺斯同志：中国有多少个资产阶级政党，每个党的党员人数是多少？

蒋先生：目前在中国没有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但是现在我们准备建立一个。其他的不能称为政党，而是派别。这些派别由一些卖身求荣的旧官吏和官僚组成。

斯图尔特同志：您在书面报告中说国民党支持中国的罢工，您给了汉口罢工以什么样的实际支持？这种支持的性质是什么？

蒋先生：我们给了财政上的，以及组织上的帮助。工会在江汉铁路罢工中起了积极作用，而汉口的一些工会的会员是国民党员。

季诺维也夫同志(莱茵施坦同志翻译):现在我们结束提问题,研究这个问题的委员会应该继续开会,同国民党代表团共同进行讨论,以便作出明确的决议。决议草案已经准备好^①,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同(国民党)代表团讨论问题的委员会应该就此问题拿出决议的最后文本。

至于共产国际,它确实对中国的解放运动和解放斗争有极大的兴趣并特别关注。国民党领袖孙逸仙的名字在世界各国,特别是俄国的革命工人当中相当熟悉,很有声望。共产国际已经花了许多时间探讨诸如民族独立、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等这些重要问题,对于殖民地问题也花了不少时间。三年前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共产国际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更加详细地研究了这两个民族解放问题和一些民族问题。

共产国际曾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成为国民党的一部分并同他们一起工作。但是出现一些困难,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希望国民党做工作,把共产党成员和国民党另一部分成员之间可能发生的困难和误解减少到最低限度。例如,在无产阶级发动的时候,在中国工人罢工的时候,国民党应该始终站在工人一边,应该始终积极支持工人的斗争,这样,摩擦和误解就会减少到最低限度,以致消除。但是支持应该真正是认真的和积极的。

我不知道,我得到的消息是否确实,有人对我说,好象在今晚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次罢工时期,即汉口罢工时期,国民党的支持不是应有的那样强而有力。国民党方面的冷淡态度使人感到

^① 见第93号文件注①。

很失望。自然这引起了一些摩擦。我希望，国民党注意这一点，以便在工人的所有冲突和发动中，党的支持真正是坚决有力的，不至于给埋怨和摩擦带来口实。

不错，中国的无产阶级运动还很年轻。同时这个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值得国民党给予应有的同情和支持，而我们根据其它国家的经验知道，工人阶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级，我们可以怀着坚定的信心注视它未来的发展和成长。

至于国民党的三个口号，我们知道，这些口号不是共产主义的口号。然而我们也承认，这些口号反映了处于开始阶段的争取国家解放的运动，但这些口号应当更具体、更明确。例如，民族主义口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它怎样理解，民族主义意味着什么。人们已经把它理解为争取中国独立的强大的运动，但同时它又应该这样来实行，不为新的资本家阶级、新的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兴起提供可能。它不应用中国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去取代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另一方面，正确地运用民族主义也不应该为在中国那一部分占主导地位的居民争取独立开展运动和压迫中国国内其它民族。民族主义不应该导致建立中国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的霸权地位。它无论如何不应该导致对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压迫。

至于民权主义，我认为，同志们都知道，民权主义在欧洲已经成了反动的口号，民权主义不赞成革命。与此同时，共产国际知道，中国的运动还不够发展，在中国民权主义也许还是一个进步的口号。然而，它能否成为这样一个进步的口号，主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居民中的劳动群众有可能捍卫自己的权利，并把自己的事业推向前进。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运动中的民权主义才真正是一个进步的因素，而不像在欧洲国家那样成为一个反动的因素。

至于民生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未必有必要进行详细的讨论。如

果把它理解为致力于把劳动群众，如耕种土地的庄稼人从赋税重负和其它这类引起抱怨和不满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那么对它也不可能有反对意见。当然这完全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如果它被这样来运用的话，那么它有可能导致真正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发展。

最后我想说，我们清楚地知道，孙逸仙领导的党的胜利将是世界上的重大事件。它将对各国工人的斗争产生影响，而在这方面也将对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全世界革命工人阶级的斗争产生影响。这个组织是为争取中国的自由、解放和独立而斗争的人民的天然朋友和盟友。因此，联合起来的力量必将大大推进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

蒋先生：我们原则上同意季诺维也夫的讲话，但是我们想强调一点。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这就是我们的立场。目前我们希望，小资产阶级（和我们）建立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但是我们并不为它的利益而斗争。

至于继续开会，很遗憾，我们已经决定下个星期四回国，而如果你们有时间，我们当然愿意在星期四以前参加一些会议。如果这不可能，那么我们可以组织另一个代表团到这里来，同你们就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下一次详细讨论。我们相信，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密切。

季诺维也夫同志：当然，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资本主义的政党。否则我们就不会同这样的党打任何交道。我们认为，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国民党也是革命的政党。在中国，共产党人（现在还不是）^①一个强有力的因素，然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是一个很强大的因素，各国的革命工人正以极大的兴趣和同情关注

^① 这句话是按意思加进去的，因为第21页右下角被撕掉了。

着国民党，因为他们把这个党看作是人民群众争取摆脱资本主义实现自己独立的力量的体现。如果我们不得不提到某些问题，例如国民党应当更积极和更坚决地给予工人斗争以支持，那么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国民党避免将来发生误解和摩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些问题，我们希望它将按照这些愿望去做。

至于取得什么实际的成果，如果同志们能够呆到星期四，我们将有足够的时间来结束我们的工作，因为这里已经有决议草案。甚至明天或星期四以前的任何时候都能结束这项工作，我建议由布哈林、科拉罗夫、库西宁、阿姆特尔和维经斯基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来着手进行工作，也许明天他们就能结束。

蒋先生：我们希望，共产国际将派一些有影响的同志来中国，仔细研究中国的局势，他们也将领导我们并就中国革命的问题给我们提出建议。

季诺维也夫同志：共产国际将尽可能按照这一建议去做，并向中国派一位负责的代表。现在我们请代表团回国后转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党，特别是孙逸仙同志的热烈的兄弟般的问候。

全宗 495，目录 1，卷宗 88，第 12—22 页。

英文打字稿，未经校对的速记记录。

97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 拜访托洛茨基情况的书面报告

1923年11月27日于莫斯科

孙逸仙代表团拜访 托洛茨基同志情况的书面报告

今天，11月27日，下午3时托洛茨基同志接见了由蒋介石、沈^①、张太雷、王^②和邵^③（孙驻欧洲的非正式代表）组成的孙逸仙代表团。

在通常的致欢迎辞之后，托洛茨基同志说，他早就想会见代表团，但由于生病，以前未能这样做^④。现在他很高兴，健康状况使他有可能同苏联的朋友——孙逸仙的代表们交谈。

孙的代表们说，他们来到托洛茨基同志这里，是为了听取他对国民党在中国的工作的建议。

托洛茨基同志指出，他难以给代表团提出什么建议，但是他可以就中国的局势和国民党在解放运动中应起的作用谈谈自己真

① 即沈定一。

② 即王登云。

③ 即邵元冲。

④ 托洛茨基当时确实生病，起先不打算会见代表团。他在1923年11月3日给契切林的回信中写道：“我认为会见已同斯克良斯基同志和总司令见过面的中国将军是不合适的。如果有实际问题，可以再组织一次中国代表团和斯克良斯基同志的会见”。（全宗325，目录1，卷宗415，第9页）。

诚的看法。在持续 45 分钟的谈话中，托洛茨基同志分析了中国的局势，他提出的最主要论点如下：

只要孙逸仙只从事军事行动，他在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眼里，就会同北方的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别无二致。众所周知，北方的军阀得到外国人的支持。所以，如果我们给予孙逸仙以军事援助，那么中国的社会舆论就会这样来评价形势：张作霖是日本的代理人，吴佩孚是美国和英国的代理人，而孙逸仙是苏俄的代理人。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运动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解放运动需要有另外一些方式。首先，需要有广大人民群众的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政治准备，这就是说，国民党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应当放到宣传工作上。托洛茨基同志说，一份好的报纸，胜于一个不好的师团。在目前条件下，一个严肃的政治纲领比一个不好的军团具有更大的意义。我们并不拒绝给予军事援助，但在目前的军事力量战略对比的情况下，不可能向孙的军队提供这种援助。而代之以我们将为中国革命者学习军事敞开我们的学校，在这方面，我们将履行不久前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的那些承诺。

托洛茨基同志归纳自己的谈话说：

国民党应当立即坚决地、急剧地改变自己的政治方向盘。目前，它应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你们的军事工作不应当超过政治活动的 $1/20$ ，无论如何不要超过 $1/10$ 。

根据最新消息，孙逸仙在广州的军事处境很危急。如果孙被迫放弃广州，在我们看来这根本不意味着他遭到了失败。这只是证明我们关于需要有另外一些争取中国人民民族解放的斗争方式的观点是正确的。只有当孙逸仙把军事活动置于一旁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最后，托洛茨基同志说，在现时的条件下，对国民党来说，与其保留自己组织得不好的军队，不如在敌人的队伍中拥有支持者。

托洛茨基同志的所有指示归结到一点，是让孙逸仙和国民党尽快放弃军事冒险，把全部注意力转到中国的政治工作上。他以并非一下子成为斗争的胜利者的俄国共产党为例指出：在25年间，俄共不得不经受长期的磨炼。国民党必须抛弃速胜的幻想。需要做耐心细致的、坚持不懈的、有条不紊的工作。如果党履行了所有这些条件，毫无疑问，辉煌的未来将属于国民党。在这一斗争中，中国的国民革命党可以指望得到苏联的援助。国民党和孙逸仙应该转向北方，因为在那里有对共同采取行动更有利的条件。在从政治上使广大群众做好对解放运动的准备的同时，正如在提交给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备忘录中所指出的那样^①，国民党可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蒙古发起军事行动。

代表团团长蒋介石将军简要地答复了托洛茨基同志。他指出了政治活动的困难，因为各国帝国主义者残暴地压制一切革命宣传。托洛茨基同志说，在目前的条件下，政治宣传必须适合于具体情况，也就是说在报刊上只能发表那些根据新闻检查条件可以发表的东西，但又不能忘记利用告示和传单宣传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说应该有合法的工作和地下的工作。

蒋介石在同托洛茨基告别时说，他赞同托洛茨基所说的意见，还说党将努力贯彻俄国同志的意见。他表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解放了的中国将成为俄罗斯和德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员^②。

下午四时，孙的代表团离开了革命军事委员会。

巴拉诺夫斯基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9，第 23—26 页。

① 备忘录没有找到。

② 原文如此。

打字稿，副本，亲笔签字。

9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

1923年11月28日于莫斯科

1. 民族政党国民党所领导的中国解放运动，目前已经历着建立组织和集聚力量的阶段。国民党曾酝酿和发动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但未能把这个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党没有吸收城乡广大劳动群众参加斗争，而把自己的计划寄托在能在军事上战胜那些已成为世界帝国主义工具的国内反动势力上。

2. 共产国际主席团满意地指出，以孙逸仙博士为首的国民党革命派已认识到必须接近劳动群众，必须通过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同他们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从而巩固和扩大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同时相信，从国民党建党起就奉为该党基础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将通过下述解释，表明国民党是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

3. **民族主义**，就是国民党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对于上述每一个阶层来说，民族主义的含义是，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

如果对于工商业资产阶级来说，民族主义意味着更好地发展国家的生产，那么，对于国内各劳动阶层来说，民族主义就不能

不意味着消灭封建专制的压迫，就不能不意味着，不仅要消灭外国资本的残酷剥削，而且也要消灭本国资本的残酷剥削。

对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在民族主义口号下进行斗争的全部含义是，既要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不致遭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

国民党应当实际上表明，在那些由于进行民族斗争而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地方，群众能够立即顺利地发展和巩固自己的组织，以便进一步进行斗争。国民党只有通过增强、支持和组织国内各个劳动人民阶层来放手发动全国的力量，才可以向群众表明，这个民族主义体现的是健康的反帝运动的概念。只要国民党能深入地联系中国群众，就能保证取得国家的真正民族独立。

这个主义的另一方面应当是，**中国民族运动同受中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的革命运动进行合作**。国民党在宣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时应当记住，由于中国官方的多年压迫，这些少数民族甚至对国民党的宣言也持怀疑态度。因此，国民党不要忙于同这些少数民族建立某种组织上的合作形式，而应暂时只限于进行宣传鼓动工作，随着中国国内革命运动的顺利发展，再建立组织上的联系。国民党应公开提出国内各民族自决的原则，以便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军阀制度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这个原则能体现在由以前的中华帝国各民族组成的自由的中华联邦共和国上。

4. 国民党的第二个主义——**民权主义**，不能当作一般“天赋人权”看待，必须看作是当前中国实行的一条革命原则。

这里必须考虑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民权主义可能蜕变为压迫劳动群众的制度和工具。因此，国民党在向群众灌输民权主义的原则和解释其含义时，应使其有利于中国劳动群众，即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而决不使那些在中国帮助外国帝国主义者或其走狗

（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

5. 民生主义，如果解释为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那它才会对群众具有革命化的意义，才能在群众中得到广泛的反响。

至于中国的民族工业，国有化原则在现在也可适用于它，因为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国家的生产力。民生主义也不能解释为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化。必须向渴望土地的广大农民群众说明，应当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因为他们一部分人经营商业，一部分人担任国家官吏，他们以现金地租和实物税来盘剥农民。国家还应当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应当大力帮助农民解决灌溉，由人口稠密地区向人口稀少地区移民，开发荒地等问题。

6. 当前，中国工人阶级是全国各地区（北起满洲，南至南方各省和帝国主义者盘踞的港埠）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利益一致的唯一的阶级，因而必然会在统一国家和争取中国独立的反帝运动中，起到自己的一份重大作用。

共产国际相信，革命政党国民党将更多地考虑中国工人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为了加强全国的解放运动，将放手发动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力支持它的经济组织及其阶级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

7. 就自己方面而论，共产国际曾经而且还将指示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必须全力支持国民党，因为它所进行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斗争，将有助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成长和壮大，因为它将在使用土地和管理国家方面，把农民从封建专制的条件下解放出来。

8. 国民党应当把全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基础上，尽力利用在华的帝国主义者的内部矛盾，使之有利于

争取独立的斗争，同时还应当理解，必须同工农国家苏联建立统一战线，以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华势力，必须使中国的解放运动同日本的工农革命运动和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发生接触和建立联系。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科拉罗夫

载苏联《共产党人》1969年第4期第12—14页。

99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 代表团访苏情况的书面报告

1923年12月5日于莫斯科

关于孙逸仙代表团访俄情况的书面报告

日期 9月

2日 代表团抵达莫斯科。

5日 拜访契切林同志。

7日 同俄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同志谈话。

9日 第一次拜访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同志，孙的代表提议在蒙古建立军事基地并详细讨论这个方案。

14—17日 了解红军，访问第144步兵团、军事院校和空军。

20—30日 访问彼得格勒和琅琅施塔得，参观海军和军事院

校。

10月

1日 从彼得格勒返回莫斯科。

3日 向契切林、托洛茨基和斯克良斯基同志递交中国军事行动草案^①。

23日 代表团团长蒋介石致函契切林同志^②，对给予的物质援助和对中蒙关系的说明表示感谢。

25—28日、30日 访问莫斯科的工厂

11月

11日 会见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同志，革命军事委员会答复，通过为中国革命者学习军事成立学校的方案^③。

16日 拜访加里宁同志。

23日 会见卢那察尔斯基同志。

26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同孙的代表团举行会议。

27日 会见托洛茨基同志。最后一次拜访契切林同志。

28日 外交人民委员部宴会。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④。

29日 代表团离开莫斯科。

巴拉诺夫斯基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9，第 1—2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② 信件没有找到。

④ 见第 98 号文件。

100

契切林给季诺维也夫的信^①

1923年12月5日于莫斯科

机密

致季诺维也夫同志。

送斯大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维经斯基诸同志以及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成员。

敬爱的同志：

我曾同维经斯基同志谈过几次，并给您写过信，说明有必要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下面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观察与国民党的关系^②，而且可以理解，没有人反对成立这个委员会。最后，它应该开始运作，因为将会出现一些实际问题。一旦作出这个决定这些问题就应由这个委员会来加以讨论。11月30日加拉罕同志给我们发来密码电报，要求就孙逸仙请求提供10000支步枪、10挺机枪、10门轻型火炮和弹药以及装备两个师的电话器材等问题紧急给予答复。加拉罕同志建议减少数量，但不超过二分之一，特别是步枪和机枪。根据加拉罕同志的意见，应该给予孙逸仙一点支持，以使他能够坚持下去。

政治局始终坚持认为，涉及我们对孙逸仙的态度的问题，不应该单独研究，而应该全面地同中国总的前景联系起来研究。这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就让我们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吧。1923年12月6日，格·季诺维也夫”。文件末尾还有未署名的签署意见：“尽快同维经斯基谈一谈”。

② 见第90号文件。

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如果存在拟议中的委员会，把加拉罕同志的建议交由它来讨论，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但是，必须注意到加拉罕同志要求紧急给予答复。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契切林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362，第 139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第四部分

国民党改组及其初步成果

1924年，中国在苏联对外政策中的地位不断提高。1923年确定的莫斯科在中国问题上的战略路线，其基本方向总的说来没有改变，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其中也作了一些个别的、有时甚至是相当重大的修改。无论在苏联领导内部，还是在中国贯彻莫斯科路线的那些实际工作人员中间，仍然保持着以前在解决中国问题时的那些差别。在后一类人物中主要是加拉罕大使，国民党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和首席军事顾问布留赫尔，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非常驻代表维经斯基。莫斯科对于孙逸仙及其政党可靠性的怀疑，特别表现在向广州提供物质援助的规模和期限问题上（第103号文件）。1923年5月1日越飞在电报中许诺的苏联援助孙逸仙的资金和武器（见第二部分），只是在一年之后才开始兑现：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4年1月24日、3月20日和27日作出决定，向加拉罕首次拨款50万卢布用来援助孙逸仙。苏联所许诺的200万卢布援助中的其余数额将在以后再确定拨款日期（第112、113号文件）。第一批武器于1924年10月8日从海参崴运抵广州。这种拖延也与下列情况有关，即苏联已进入为西方大国所承认的时期，它不希望因援助中国革命者而引起世人瞩目。

在外交方面，为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所进行的多年努力，也以1924年5月31日签署著名的苏中协定^①而告结束（有关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对该协定的反应，可参见第122号文件）。根据1924年9月1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第126号文件），苏联于1924年9月20日同满洲行政当局签定了关于中东铁路、船舶航行、边界、关税、贸易等协定^②。这是苏联在外交上取得的不容置疑的成就，这一成就大大提高了苏联在处理中国事务中的作用，当然处理中国事务也使苏联外交官们常常感到头疼，特别

① 见《苏联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莫斯科1993年版第331—346页；《中国年鉴》1924年天津英文版第1192—1200页。

② 《苏联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459—465页。

是在处理同张作霖的关系时更是如此。

解决与莫斯科中国政策的革命方面相联系的诸多问题，即改组国民党和稳定广东革命根据地以及与发展中共相联系的问题，也是很复杂和很困难的。

国民党的改组是在非常复杂的形势下进行的，1923年初成立的孙逸仙新政府不得不在这种形势下开展活动：缺乏资金，被雇用的将军们不听从指挥、独断专行，营私舞弊盛行，到处一片混乱。1923年11月中旬，正值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紧张时期，陈炯明的军队逼近广州，好不容易才击退他们的进攻。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组建基层党组织的工作继续进行，聘请苏联教官任教的黄埔军校开始运作，国民党第一批“党军”部队组建了起来。在社会领域内也采取了一些初步的措施：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农民协会已经合法化，工会争得了一些补充的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也开始有了相当广泛的自由。这一切按照当时中国的标准已是进步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都带有上层的性质，根本没有触及到国民党管辖地区现存的社会结构，主要的是，没有超出孙逸仙社会纲领原则的框框，而孙逸仙的纲领否认阶级斗争并企图从上面来调节社会冲突，要求各社会组织和行业组织的活动服从国民党及其政府的监督（第123号文件）。

总之，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广州政府的形势依然是十分严峻和不稳定的：在东面和北面存在着陈炯明和吴佩孚的军事威胁，香港也向广州政府施加军事政治压力，广州商人叛变，同孙逸仙“结盟”的军阀为所欲为，各阶层居民对本省的严重经济状况表示不满。孙逸仙不得不时刻随机应变，进行妥协，以便维持自己的政权。同时他也没有放弃以前傲慢自负的北伐计划。国

民党自身的状况以及共产党人同它（有时甚至带有危机的性质^①）的关系也是严重的问题。鲍罗廷顾问不得不参与这场复杂的政治斗争。

众所周知，在1920—1923年间孙逸仙不止一次地企图改组自己的党。但是他的这些努力无论对于党自身的状况还是对它的政策及实际活动都未能导致任何实质性的变化，造成这种状况是有一系列原因的，其中包括在国民党的领导人中以及在根据共产国际建议于1922年下半年开始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中间都存在着意见分歧。只是在1923年秋天苏联外交使团新的领导人加拉罕和被孙逸仙任命为国民党首席政治顾问的鲍罗廷（其正式身份仍属于苏联驻北京的外交使团，见第103号文件）抵达北京之后，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进程才出现了转机。1923年10月初，鲍罗廷抵达广州后，在孙逸仙及其亲信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参与下，为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立即开展了生气蓬勃而又卓有成效的活动，这次代表大会应该为国民党彻底改组奠定政治和组织基础，以便把该党变成一个有能力的、团结的、能够夺取全国政权的现代革命政党。加拉罕和鲍罗廷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所遵循的总的思想政治原则在本文件集的第三部分中作了阐述。遗憾的是，我们不清楚，他们在离开莫斯科之前是否得到较为具体的指示。某些“想法”是在他们到达北京之后才明确的。这些“想法”是同鲍罗廷前往广州途中经过上海时与国民党和中共活动家（其中包括张继和陈独秀）一起制定的某个“计划”相吻合的（第86号文件），但是该计划的具体内容目前尚不清楚。鲍罗廷本人曾指出，他从一开始就似乎是本着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23年11月28日决议精神（他直到1923年12月30日才在上海收到该决议）进行

^① 详见《孙中山选集》，第628—698页；《中国现代史（1917—1927）》，莫斯科1983年版第156—184页；C. M. 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英文版第194—264页。

工作的，但是他“并没有立即把握这个调子”(第104号文件)。

论述国民党的改组，包括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和召开的文献是很多的，有关该题目的主要文件^①已经发表。然而有关这个题目的许多方面，特别是涉及到莫斯科、加拉罕、鲍罗廷、孙逸仙和国民党其他领导人的立场的那些方面，仍然不是很清楚或者论述得不够全面。

收入本文件集的有以前鲜为人知或者只是根据个别引文和提示才部分地知道的属于该论题的一些文件。这些文件从总体上提供了许多新的信息，其中包括关于莫斯科对广州国民党政府是否具有生命力和向它提供具体物资援助(武器)是否适宜的疑虑，关于提供援助的途径，关于鲍罗廷在中国的官方身份及加拉罕的全权，他们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召开期间和大会之后所采取的策略，关于代表大会召开的过程、各派人员的构成及其立场，关于孙逸仙的政治立场及其变化，以及关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党籍和工农问题，关于就国民政府和围绕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大会宣言所引起的激烈斗争。最有意思的是这次不加任何删改、第一次全文发表的鲍罗廷就热点问题于1923年12月28日(第101号文件)和1924年2月下半月(第111号文件)所写的报告及其详细附件。

鉴于鲍罗廷于1924—1927年间在国民党的活动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他的报告及其附件中以及他与加拉罕、维经斯基的来往书信(第86、103、104、107、110号文件)中所包含的对国民

① 我们只想从已发表的材料中指出下列几种：《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卷第3—104页；《孙中山选集》第319—627页；H·Л·马马耶娃：《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国民党(1923—1927)》，莫斯科1991年版第30—60页；H·Б·扎涅金娜：《1924年的国民党党章(国家与社会)》文集，莫斯科1977年版第176—191页；С·М·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英文版第166—208页；J·多梅斯：《延缓了的革命——国民党在中国的政策(1927—1937)》，柏林1969年德文版第89—96页；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中共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1924—1927)》，德文版第58—60页。

党及其领导人的潜力以及党的活动方式的评价、他所制定的对全党及其不同派别（右派、左派、共产党人）的行动策略，就显得特别珍贵。鲍罗廷在报告中实际上对他在中国最初四个月的紧张工作作了总结，并把苏联领导人在他离开莫斯科之前给他的指示以及后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1923 年 11 月 28 日的决议中提出的基本方针加以具体化了。

鲍罗廷对国民党及其最进步的领导人（其中包括孙逸仙）过去和当时的状况所作的评价，构成了他关于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召开过程及其结果的报告的基本前提。鲍罗廷把该党的未来同对它过去和现在的评价直接联系起来。在这里没有必要引用他的报告及其附件中大量出现的这些评价。指出下列一点就足够了：鲍罗廷的评价并非具有单一性质，居主导地位的是激烈的批评，但也有肯定的方面，即他对国民党沿着莫斯科指出的方向发展的美好前景寄予希望。对孙逸仙也是如此。

1923 年底和 1924 年初鲍罗廷寄往莫斯科的材料不可能全部收入本文件集，因为数量太大。在选编材料过程中主要侧重于那些带有评价性的和反映鲍罗廷总的工作方针的材料。此外还考虑到，相当大的一部分材料已经在切列潘诺夫将军的回忆录^①中发表。然而应该注意到，回忆录的作者是有选择地使用文献资料的，而其中的一些引文在许多情况下被随意修改了，包括一些不加说明的删减。例如，从鲍罗廷关于 1924 年 1 月 23 日国民党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的危急时刻的札记中摘录的长篇引文就是如此^②。作者在回忆录中对一些原则性问题，例如同孙逸仙讨论他在西北和蒙古的军事政治计划问题，都采取了沉默回避的态度。作者一般只从文件中选择那些可以表现孙逸仙最佳形象的评价。

① А·И·切列潘诺夫《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莫斯科 1976 年俄文第二版第 33—102 页。

② 同上，第 85—90 页。

根据对国共两党内部状况的评价，鲍罗廷制定了自己的工作计划，即孙逸仙的三项任务：

1. “继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业已在广州开始的国民党的改组工作……2. 坚持把广东作为向全中国发展和推进国民革命运动的根据地。”为此要颁布土地法令和社会劳工法令，以便为国民党政府建立牢固的“社会基础”。3. 改组军队并使它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第101号文件）。苏联可以从海参崴向孙逸仙提供各种援助，帮助孙逸仙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国民党改组的总体计划就是如此。鲍罗廷同加拉罕商议，以他所特有的充沛精力开始实施这一计划。该计划中关键性的和首要的工作就是筹备和召开孙逸仙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为此莫斯科已拨给他必要的经费，他从1923年12月25日开始收到这笔经费（第104号文件）。

在鲍罗廷看来，国民党以前政治上之所以软弱，其主要原因就是党内“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是一片混乱”。在最短时间内从根本上改组党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克服这种“混乱”，首先是克服思想混乱。鲍罗廷认为，国民党的主要思想政治弊端首先就是它对帝国主义者奉行妥协政策，缺乏同帝国主义进行“无情斗争”的纲领（根据1923年11月28日的决议）。其次是完全缺乏同工农群众的联系。从这个观点出发，在鲍罗廷看来，国民党内“没有一个领袖”（包括孙逸仙在内）。鲍罗廷认为孙逸仙的所有理论都是有害的“乌托邦”，而他的实践活动是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真正的（即共产国际的）目标相抵触的。同时，鲍罗廷又承认，“我不能设想国民党的改组可以没有孙”。从这一事实出发得出了鲍罗廷对孙逸仙的工作方针：“需要利用他的左倾，利用他的威信，利用他建党的愿望”，为了国民革命运动而“拯救”孙逸仙，为了“加强国民党内的左派成分”而“加强他自身的左派倾向”（第111号文件）。但即使在后来鲍罗廷也没有放弃对孙逸仙未来行为的怀疑态

度。

鲍罗廷认为，左派是未来“党的核心”，“需要把它集合起来，搞清楚它，帮助它”。鲍罗廷认为，左派与右派长期共处是不可能的，因此，“分裂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第111号文件）。鲍罗廷后来一直坚持旨在“分裂国民党，清除它的右翼腐败分子”的方针。

1924年1月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人的一次联席会议上，鲍罗廷把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场斗争中的作用概括为：“警惕”右派，同他们作斗争并将他们清除出国民党，目的是“加强左派”并且不断地巩固中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以便“在国民党内处处都有自己的同志”。中共完全可以把这种表述理解为旨在领导国民党的方针，而通过它去领导整个国民革命运动。至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这次代表大会上将采取的行动，1924年1月18日由鲍罗廷召开的一次共产党党团会议决定，不坚持国民党人明显不能接受的那些建议（例如关于土地问题的建议），以便保证通过主要文件——大会宣言，因为该文件“或多或少”是以共产国际的提纲为基础的（第111号文件）。然而，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并没有从尔后的国民党日程上撤消关于土地问题的议案。加拉罕也赋予该问题以特殊的意义，但是他建议鲍罗廷要“非常审慎地”对待这个问题（第103号文件）。

根据鲍罗廷的评价，在制定代表大会宣言的过程中，经过由于激烈争论和相互妥协，终于“取得了一个相当好的，我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国民革命政党文件”。同时，鲍罗廷承认，写入宣言的最低纲领“是这样的，除了国民党员、共产党人，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激进分子，在国内任何人都不会赞成根据它去建立国民政府，但是为了鼓动和宣传，它将具有重大的意义”（第111号文件）。换句话说，由于鲍罗廷和帮助他的共产党人的努力，代

表大会的宣言可以成为未来新的激进的国民革命政党（确切些说是“工农政党”）的思想政治纲领，而不是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阵线的实际行动纲领。在通过宣言过程中有一个新的有趣的细节，即1924年1月27日鲍罗廷向孙逸仙转交了加拉罕的补充修改意见（第111号文件）。尚不清楚，加拉罕的这些修改意见，纯属他个人的主动精神呢，还是来自莫斯科的某种补充指示。

在鲍罗廷的报告及其附件中并没有谈到孙逸仙对代表大会最重要的组织问题的态度，即通过以各国共产党章程为样本而起草的新党章的态度。至于中央和地方党的领导班子的组成——则是另外一回事。然而在一些组织问题上，即由谁来主宰全党命运和对党进行实际改组的问题上，孙逸仙支持右派和中派，尽管也有几个左派参加中央委员会。孙还不明白，通过一部好的纲领是一回事，委任国民党的腐败分子去执行这个纲领则是另一回事。鲍罗廷表示希望，“党内有足够的左派分子”，他们有可能对付右派业已开始的进攻。在广州他们的第一次进攻“遭到了失败”，因为孙保护了左派。“但是很难预料在孙逸仙不在的省份会怎么样。那里的右派未必会轻易地交出自已的地盘”。在广州以外的地方，“他们将会同左派进行斗争。这是毫无疑问的”。鲍罗廷警告说，不应该低估右派的力量（第111号文件）。

加拉罕1924年2月13日写给鲍罗廷的信（第110号文件），特别是1924年2月9日写给契切林的信（第109号文件），是对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结果作出的直接评论中最为有趣的。加拉罕写道，代表大会“不仅是党的历史上，而且也是国民革命运动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信的作者以鲍罗廷的报告和张国焘的见证论述了自己对代表大会作出较好评价的理由，张国焘“欢欣鼓舞地讲述了国民党内发生的事情”。加拉罕坚决批驳“关于孙逸仙向右转的传闻”并责备莫斯科一些持怀疑态度的同志，“竭力企图把我们对孙逸仙的援助和支持化为乌有”，这位苏联驻北京的全权

代表认为莫斯科一些同志的怀疑“是毫无道理的，是建立在不充分的通报或者不怀好意的通报上的”。在加拉罕看来，那些在莫斯科对孙逸仙和国民党持怀疑态度的人不明白，中国现在的形势根本不同于比方说土耳其的形势。在任何别的国家现在都没有像国民党那样有影响的国民革命党，这个党“处在我们的影响之下”，并且“如此顺从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因此，加拉罕坚持认为，“应该最坚决地放弃对国民党的一切批判，因为这种批判会妨碍我们早已决定给予和我们应该给予的援助”（第109号文件）。

从加拉罕的信的结尾部分可以看出，他非常清楚，莫斯科怀疑孙逸仙和国民党的主要原因之一，决不是来自中国的过时的、非善意的或者“不怀好意的”通报。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担心，在中国会重蹈对共产党人来说可悲的“凯末尔式的”复辙。作为预防这类不利事态发展的措施，曾经打算与孙逸仙签订一项正式政治协议：“您说，必须同孙逸仙签订一个政治协议，否则他会进行欺骗”，在这种协议中最好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向你提供援助，因此，让我们签订一个条约吧”。加拉罕对这种思想表示了激烈反对的态度：“看来，我们被土耳其的牛奶烫过以后，在中国见到凉水也要吹一吹。越飞当时完全正确地指出这一点”。然而，中国与土耳其相比是有“极大差别的，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当孙逸仙到北京的时候，（为了不让孙逸仙进行欺骗）我们应当采取不同于我们对待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态度”（第109号文件）来对待应该同广州签订的那种政治协议。中国革命“凯末尔式”结局的幽灵在以后年代里也一直萦绕着苏联领导人，这在不小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国民党和中共的策略。

以前对国民党不怀好感的斯列帕克在1924年2月8日给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中，对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给予了十分肯定的评价。他和加拉罕一样，也援引了自己的老熟人和志同道合者张

国煮的“欢欣鼓舞的”反应（第108号文件）。对国民党改组过程持不同意见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非常驻中国代表维经斯基。在他亲自了解了当地的事件之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反映了他的怀疑观点^①。发表在共产国际正式机关刊物上的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加拉罕在给契切林的信中所提到的莫斯科那种“怀疑”的标志。

正如上面指出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是为党的改组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这一改组拖延了好几年。换句话说，代表大会后国民党处于向代表大会文件所规定的方向成长发展的过程之中。中国共产党也处在类似的状态，她在1924—1925年继续经历着从分散的、彼此很少联系的共产主义支部向群众性的集中的政党过渡的阶段。但是，即使在1926—1927年党的集中化也没有完成。

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鲍罗廷在总结这次大会时所阐述的许多担心和怀疑开始应验了。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有：加拉罕1924年7月12日给鲍罗廷的信（第118号文件）、鲍罗廷1924年7月18日给瞿秋白的信（第121号文件）和关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八月全会的报道（第124号文件）。1924年夏天，在中派分子纵容下向共产党人发动猛烈进攻的国民党右派，给鲍罗廷带来了极大的不愉快^②。与右派斗争的波折如此激烈，而国民党内的局势又如此不容乐观，以致使鲍罗廷有时得出最“悲观的结论”，提出对国民党内形势的“灾难性预测”，并预言“经过几个月”他会“不可避免地灭亡”。鲍罗廷的这种悲观主义给加拉罕留下了“有点惊慌失措的印象”。加拉罕在1924年7月12日给鲍罗廷的信中同意了鲍罗廷以及维经斯基的观点，国民党右派在指挥岗位的大大加强“无疑是危险的”，但是他又认为，可以使用维经斯基

① 维经斯基：《中国南方的局势和孙逸仙政府》，载《共产国际》1924年第7期第187—206页。

②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卷，台北1966年版第324—332页。

提出的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将右派驱逐出国民党的策略（第118号文件）。国民党关于苏中协定的宣言引起鲍罗廷的极大愤怒，尽管他承认，由于他与宣言起草者不断的争论以及孙逸仙的干预^①，这个宣言“向左迈出了一步”。因此，鲍罗廷敦促瞿秋白在上海尽快出版“我们的报纸，以便有可能给他们以迎头痛击”，以及让它成为打入右派和左派之间的一个楔子（第121号文件）。

然而，鲍罗廷根据莫斯科的方针仍然认为，在国民党内组织“左派运动”是必要的，因此现在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他非常了解国民党领导人的策略手腕并尽一切可能制止或抵制那些对共产党人不利的决定（第117号文件）。

共产国际和鲍罗廷对中共内部的状况，特别是对待国民党的整个政治路线这个关键性问题也很关心。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许多关于中共内部情况的报告，其中也包括鲍罗廷所作的报告。为了整顿党内的秩序，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于5月召开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全会并确定了全会的具体日程，其中提到首位的是与贯彻国民党代表大会决议有关的问题（第105、114号文件）。被委托召开这次全会的维经斯基于1924年4月21日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中建议，采取一种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选择的支持国民党的策略。最主要的是中共应该把坚持党自身的利益作为最符合国民革命运动的利益（第115号文件）。根据这个方针，维经斯基于1924年5月10—15日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全会。据从上海来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联络员维尔德证实，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有关在国民党内工作的问题争论尤为激烈（第116号文件）。由于维经斯基的努力，全会采纳了旨在国民党内自由开展批评和大力加强其左翼的方针，首先通过加强中共本身和在独立于国民党之外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基础上扩大中共的群众基

^① 宣言的文本，见《孙中山选集》第753—756页。

础，以及把在国民党内工作的重心从组织工作转向宣传工作等途径来实现这一方针。这样就保持了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但是作了重要修改，强调了中共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社会上的独立性^①。

五月全会的决议只是在形式上消除了中共内部存在的反国民党的情绪，早在1922—1923年共产国际似乎觉得这种情绪已经得到克服，但在筹备和召开这次全会期间又重新出现。实际上，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委会在1924年就反对共产国际对待国民党的方针，也就是说，实质上是从极左立场上反对共产国际的开展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策略。这个方针的基本点是：（1）鉴于国民党内右派反动分子明显占优势，因而要把它看作是已经丧失革命作用的政党；（2）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3）要求中止对国民党军事措施的任何支持和消灭国民党政权及其在广东的根据地。取而代之的是建议只依靠中共的力量按照下列“经典的”模式开展中国的革命工作：宣传鼓动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武装起义。这个方针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上作了广泛的宣传，并且伴随着对国民党的尖锐批评。在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秘密通信中，把同共产国际方针的分歧说成是同鲍罗廷“极其有害的”政策的冲突。关于这一点在本文件集中有足够的有说服力的文件。维经斯基返回莫斯科后不久，陈独秀就开始接连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为中国制定“新的政策”。同时还根据“新的政策”精神通过了一系列党内决议（第119、125、127、128、129号文件）。

上述一切在瞿秋白1924年10月24日给鲍罗廷的信中也得到了证实，他在这封信中叙述了中共中央执委会和国民党顾问之间存在的“原则性分歧”；在军事上不给孙逸仙“任何援助”，“立

^① 中共中央五月全会文件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29—281页。

即放弃广州”，并开始逐步准备“工农兵全面起义”^①，蔡和森在这些问题上特别坚持了毫不妥协的立场^②。

不仅瞿秋白不赞成中共中央执委会的反国民党的路线，而且全广州的党支部都反对这条路线。支部大会就鲍罗廷1924年7月15日报告作出的决议肯定了鲍罗廷政策的“正确性”，谴责了党的领导人旨在准备“可能退出国民党”的路线，并强调指出，坚守广州，把它作为国民革命运动的根据地，这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第120号文件）。

共产国际执委会委托于1924年11月再次去中国的维经斯基纠正中共中央执委会的路线并调解他们与鲍罗廷的冲突。由于冯玉祥发动政变和此后孙逸仙在国民党上层官员和鲍罗廷的陪同下北上，中国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维经斯基的任务也因此变得轻松了。

① 详见B·И·格卢宁《在国民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间的中国共产党》第1卷第161—168页。
② 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514，目录1，卷宗82，第19—21页。

101

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

1923年12月10日于北京^①

前 言

为了避免在香港逗留，我于1923年9月29日从上海启程乘坐一艘小轮船直驶广州，但在途中遇到台风，要是我们不是在台湾的岩岛上得救的话，那么笔者就会遭受与我们船上送命的那200只绵羊同样的命运。

我于10月6日才到达广州。因此，孙逸仙的代表魏秘书和喻育之将军接连3天来迎接我，毫不怀疑我乘小轮船从上海到广州走了这么多天，这并不奇怪。我对他们解释说，我不愿意向英国人申请签证，所以没有乘大轮船去香港。

与他们一起吃完早饭后，我详细询问了广州的情况，我把加拉罕给孙逸仙的介绍信^②交给了他们，几个小时之后，我已在孙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发出的日期注明的（见全宗627，目录1，卷宗4，第4页）。
^② 1923年9月23日，加拉罕向孙逸仙推荐鲍罗廷时写道：“鲍罗廷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党员，参加俄国革命运动多年。请您把鲍罗廷同志不仅看作是政府的代表，而且也是我个人的代表，您可以像同我那样同他进行朋友式的交谈。”（见《著名的苏联共产党人——中国革命的参加者》莫斯科1970年俄文版第24页）。

的大本营里^① 被介绍给孙本人。

孙逸仙在我看来同片山潜惊人地相像，只是年轻些，更有精神、精力更充沛。

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让我在他身边坐下，默默地打量了我几秒钟。

我向他转达了莫斯科和全权代表加拉罕同志的问候，并表达了加拉罕同志在合适的时机同他会见的愿望，之后我扼要地向他说明我来广州的目的，并向他提出了几个与国内局势有关的问题，特别是与广东局势有关的问题。然后他向我询问了俄国的情况，他主要关心我们的军事和工业情况。我回答了他的问题，有意为在我所希望的话题上的进一步交谈打下基础。例如，我向他讲了我们的军队情况，主要是让他注意我们的政治工作，那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当我详细地向他描述这方面的工作时，他立即说：“这项工作我们没有，我们应该有。”

这时他的私人秘书陈友仁（见评语）^② 走了进来，他几天之前被任命为航空工业负责人。孙把陈介绍给我，他很快就积极地加入了谈话。

首先他抱怨缺乏必要的航空装备，特别是在弄到发动机方面遇到困难。他把这些困难归咎于孙所管理的地区实际上受到了外国列强的封锁。谈到履行中国同这些列强签订的条约问题，列强则认为孙也有这个责任，但与此同时，鉴于他们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事实上都不承认孙的政府，所以也根本不找他算账。陈友仁说：“他们认定我们负有各种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外国人征收

① 孙逸仙的大本营是一个戒备森严的小克里姆林宫。陪同我的秘书和将军，在大门入口处“戴上了”自己的通行证，类似于五角星青铜奖章。每个角象征五权中的一种基本权力：立法、行政和司法，还有两个是孙从中国历史上借用来的，即考试和监察（根据前者，所有政府官员从最低级到最高级，包括总统在内都必须经过考试才能从事本职工作，后者是一种监督他们行为的制度）。警卫在所有入口和出口处站岗，每当有人通过，都敬礼（鲍罗廷注）。

② 评语没有找到。

捐税，用来抵偿中国政府过去承担的债务，多余的部分交给北京独裁者。这种税收在广州每年达 1200 万元左右。但孙的政府不能从中得到分文，当孙有一天想把海关控制在自己手里时，英国人则把海关迁到沙面（外国租界），在那里它可以在炮舰的保护下更平安地行使自己的职能。此外，他们还把外国列强互相承担的义务（向中国输入军火）用到孙的政府头上，并且不得不采取走私的办法。”这时孙逸仙好像是为自己作辩解似地指出，暂时他还要待在广州，他身后有英国殖民地（香港），他根本无法同帝国主义进行任何斗争，因为帝国主义已把他的手脚束缚起来了。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如果他能够在中国中部或蒙古建立根据地，那么他就能够很自由地对帝国主义采取行动。

至于中国中部，一切都取决于他的军队能在多大程度上顺利地向北挺进。他还期待着他的代表在莫斯科谈判的结果^①。显然，他对这次谈判寄予厚望，而蒙古根据地对他更具有吸引力。

他说：“蒙古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这首先是因为我在北方比在南方有更多的信徒。”在北方，他没有敌人，而在南方，敌人很多。他认为，只能这样。在南方，他是在一方面有外国封锁，而另一方面有无数条战线的情况下领导着政府工作，他不得不采取一些不仅可能引起人民的仇视而且也可能引起某些朋友的仇视的措施。

相反，在蒙古，身后有友好的俄国，他可以实行“更公开和更坚定的政策”。

现在他认为必须把广东控制在自己手中，就这需要扩大和巩固军队。为此他需要援助，他估计，这种援助可以通过海参崴向他提供。可以利用不经香港的海参崴—广州航线。但利用海参崴—广州航线还需要某种表面上的理由，这很容易做到，因为广州

^① 指正在莫斯科逗留的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代表团。

需要建筑材料、鱼、大豆、鹿角等。所有这些都可以运到这里来交换中国产品。这条航线可以立即建立他所急需的同俄国的直接联系。有的装备，绝对不能没有，而由于封锁又无法弄到，但可以从海参崴提供。例如他指出，他那里有飞机制造厂，但是没有发动机。他还说，只要他留在广州，同俄国的直接联系是绝对需要的。志愿船队的轮船在海参崴和广州之间哪怕每月航行一次，就可以为他建立这种必要的联系。

在以后的相当长时间的谈话中，这个问题基本上再没有涉及。他焦急地等待着答复。

我在广州碰到了什么

广州的情况我认为是这样：孙逸仙同最忠于他的国民党人都在忙于前线上事情。在广州有以邓泽如为首的国民党分部。邓是一位年事已高的保守的新加坡商人，但他本人忠于孙。据他自己称，党在广州分部有党员3万，其中缴纳党费者达6000。国民党改组时，党员重新进行了登记，从登记结果看，这些数字不符合实际。登记者共计约有3000，看来，完全代表了广州的国民党。从这次重新登记中还发现，党同党员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在他们当中散发书刊，没有举行会议，没有说明孙在各个战线上的斗争目标，特别是同陈炯明的斗争目标。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

广东人民对孙的政府持强烈反对态度。广州的工人加上手工业者共有35万人。孙从上海回来时，他们曾热烈欢迎他，现在他们对他的政府的命运漠不关心，对其胜败根本不感兴趣。城市小资产阶级，因前线时胜时败和敌军经常进犯而深受无政府状态之苦，一听到令人胆颤心惊的消息，要么关闭自己的店铺，要么藏身于外国列强的旗子之下。苦力们一批批被抓走，送往前线，强

制劳动，因此城市里的交通工具明显不足。这种现象又损害了商业。滥征捐税引起了更多的误解和仇视，而没有给国库增加收入。至于农民，他们把孙同陈的斗争看作是只降临到他们头上的一种不幸。他们不再纳税，不再把粮食卖给军队，最终拿起武器在某个地方从后面袭击部队。

对所有这一切孙都未予注意。他甚至也不关心要在报界对一些事件作出某种说明。报纸上每天都刊登相互矛盾的前线捷报，而对失败只字不提，要么很突然地压到人民头上。仔细阅读这些报纸就会发现，好像敌人在本着使广州本来就混乱的气氛更添混乱的思想指导着报界。孙甚至从来都没有看过这些报纸，更不要说对中国其它地方或国外发生的事情的关心了。他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同无数个将军的谈话上，这些将军各自为战，没有总指挥部。

如果所有这一切再加上陈炯明也是作为国民党的一员出现的，那么就会清楚，在人民的头脑中对同一个党的两个成员之间的战争，该会产生什么样的混乱。

广州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状况也不好。前者大约有 50 人，其中 9 人在孙逸仙大本营的宣传委员会工作，而其余的人分散在各工会组织、学校，等等。社会主义青年团有 150 人，主要是青年学生。这两个组织已萎靡不振，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性的工人运动，而工人已成立了联合 10 万多会员的 200 多个工会组织。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谭平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有头脑和最积极的领袖之一，他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孙的宣传委员会工作中，但是这项工作与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的共同之处很少。主要是编写和出版某种理论题材的小册子，虽然这些小册子的名称具有宣传鼓动性，例如《农民和革命》、《工人和革命》、《士兵和革命》，等等。至于共产党的整个组织，那么它只是阅读这些小册子并尽可能地在群众中散发。但就是这些小册子也很少送给农民，也根本到不了军队中。

如果不算在孙的宣传委员会中的9名共产党员的工作，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组织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实际联系。共产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①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决议，在广州没有遇到任何反对。此外，几乎所有共产党员都像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样，都乐意在国民党中工作，如果实际上有这种可能的话。他们意识到在参加国民党之前，应该改组它和重建它。他们与前来这里的同志，例如同马林等人曾不止一次地试图争取国民党人，主要是孙本人同意进行改组，但都没有结果。国民党人由于本报告所说的原因而没有听他们的。因此，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上述决议还是一纸空文。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许多同志那里，包括在前来这里的同志，以致某些俄国同志那里，形成了一种信念，即只要孙留在广州，只要他完全醉心于军事“冒险”（这些军事“冒险”，由于有无数敌对将军的参与——这些将军无论如何也猜不出是为了什么样的美好理想在进行斗争——他们听起来有点某种史诗的味道），总之，只要孙和优秀的国民党人不放弃广州，不迁往上海，那就不能想象会有什么真正的国民党工作，这是毫不奇怪的。这里同志们忘记了，尽管孙曾不止一次地去过上海，但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没有取得一点进展。

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

这就是我到广州时面临的形势。还在北京和上海时，就从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交谈中弄清楚，如果国民党不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就不会是什么现实的东西，但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国民党又不能担起这个运动的领导工作。为了起到这个作

^① 指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用，它必须进行改组。现在它既没有纲领，也没有章程，没有任何组织机构。它偶尔发布由孙签署的诸如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等一般性题目的宣言，根本不涉及当前的事件，不对它们作出解释，也不利用这些事件来发展和巩固党。这些宣言作为趣闻被刊登在几家报纸上，然后国民党又沉睡一年又一年。国民党的这种状况一方面导致许多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员为其自私的目的利用“国民党”这个曾受欢迎的名称，另一方面导致忠诚的国民革命分子完全失去了信心，而南方最优秀的国民党人对群众组织失去信心后，完全投身于军事工作，而在军事工作中，事物发展逻辑本身使他们变得更像所谓的军阀，在人民群众看来，不知道这些军阀在为什么打仗。

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发**现**，在改组国民党这件事上正是上述两种人在起主要作用。原来，问题根本不在于他们对国民革命运动的群众性组织感到失望，而在于他们对改组**还没有认识，还没有达到理解有组织的国民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高度**。这些人的领袖，即孙逸仙本人在兜售与某种党性精神相抵触的思想，根据他的理论，人民应该知道，他孙逸仙是在为**全国的幸福而斗争**，所以应该追随他。诚然，反动军阀妨碍人民追随自己的伟大导师，但他根本不认为反动军阀是独特的中国封建制度的武装残余。不过这是一种可以用武力加以克服的阻力。他指望自己的学生们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他。这里不仅有我们欧洲意义上的英雄和群众的理论，这里还有某种开明的古波斯的总督遗风。当然，实际上从所有这一切中只能得出，伟大导师仍然求诸于那些即使不是大部分时间也是经常地与他共事的军阀的帮助，而这些将军与他共事是因为可以从前线这样或那样一些胜利中捞到好处。正像有一天在一次谈话中我对他所说，孙博士不是从广东随便哪个山头上宣传自己的思想的，任何一个真正的宣传者都是会这样做的。他呆在广州，在他的周围，一方面有真正听从他的学生，另一方面

又有一些大骗子和投机钻营者，以及沽名钓誉的贪婪的将军。城市状况令可敬的英国和美国的资产者以及传教士感到羞愧，因为在任何地方，“恶习”都没有像在广州这样公开泛滥。妓院和赌场完全公开地出现在所有街道上，以致在无数条河流和水道上及外国租界沙面岛上。向妓院和赌场征税要比向商人征税容易得多。实际上斗争的全部重负都落在最贫困的居民身上。富人把自己的巨额资金存在外国银行里，而贫民却被洗劫一空，还要被抓去，进行强制性劳动。

孙清楚地了解这一切，他根本无意把这一切归罪于自己的理论，而是归因于在他看来这样一个可悲的事实，即在中国还没有足够的追随他并帮助他实现全国幸福的好学生，虽然如上面所指出的，有时，他本人也希望摆脱这种环境，迁到蒙古某个地方，在那里他可以依靠俄国作为后方，在还没有为自己树敌之前，一切重新做起。

不管怎么说，孙和上面所指出的国民党人，虽然都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的种种毛病，但在目前和很长时期内他们还是能够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唯一代表，对此不应有任何怀疑。我正是从这种观点来观察问题的。我两个月来的全部工作就在于使他们相信，迄今为止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是无益的，必须加以根本改变。当然，这一切我是谨慎行事的，是力所能及地、有分寸地进行的。我具体地向他们建议，根据确切阐明的纲领和党章来着手改组国民党。此外，我还向他们建议开始改组整个军队，为此成立军官学校和造就一些政工干部。为了吸引群众支持国民党，我建议他们首先在广东本地进行一定的改革，在劳动立法方面进行改革，调整土地关系和改善小资产阶级状况（见报告第×页）^①。

^① 此处页码未注明。

早在孙和府成员为我在广州而举行的一些宴会上，我就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些宴会通常都变成了真正的会议，不是互致一些客气的话，而是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发表长篇讲话。在这里什么都讲：关于俄国革命的历史，关于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关于我们的军队，关于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关于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大家在这里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既有关于俄国经验的，也有关于中国经验的。用餐本身不再起什么作用，主要的是，人们聚集起来听听前来这里的人的讲话，交流一下自己的经验。我要说，正是在这些宴会上为国民党改组的工作奠定了基础。诚然，孙只是亲自参加了第一次宴会，但是我同他在一周中要个别交谈几次，向他阐明同样的思想。开始时他试图将谈话转到军事问题上，竭力使我相信，最好他在这条战线上有这样的军队，而在另一条战线上有那样的军队。有时他还提出要根据某些战役的结局来改组国民党的问题，他设想在这些战役之后组织一次向北京的远征。有一次他邀请我同他一起去视察，保卫着通往广州的要道的炮台，这次视察进行了两天。我们住在他的快艇上，常常坐在甲板上长谈。他平静地听我说话，有时突然望着某座山头或谷地说：“我将在这儿建一座军火库，而在那儿建一些甚至英国军舰也不敢接近的防御工事。”他还阐述了广州周围的一些防御工事计划，为了实现这些计划将不仅需要中国的所有资金，而且还需要全世界的资金。这种状况丝毫也没有使他感到难为情。视察炮台以后，我们又顺流而下视察了他所看中的那个谷地，他设想在那里建造一座大型军火库，但我们还没有靠近这个地方就遭到了土匪的袭击。快艇上的一名水手被一枪打死，我们自己为躲避子弹不得不钻入一个底舱隐藏起来。我多少有点喜欢发生这种情况，这是我曾对他说过的必须在农民中做工作的最好例证，因为发生的袭击来自农民，他们手执武器在保卫自己的稻田。在回来的路上，他没有再说那些倾注了个人心血的计划。几天之后他

任命我为改组国民党的顾问和指导员^①。

制订党纲和党章工作开始了。最显要的国民党人开始经常开会，讨论与改组有关的所有问题，最积极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广东省省长廖仲恺，孙博士的儿子广州市市长孙科，广东省公共安全委员吴^②，后者在工作中表现出特别的热情。

孙本人也积极参加工作。他只是提出了国民党改组临时执委会成员名单，并任命我为组织教练员，同时责成我们大家着手工作。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我为吸引孙积极工作而准备采取的进一步措施。在这里我要指出，再过几周，由于对改组工作和与此有关的实际工作进行了讨论，他将不得不把战线联合在一起，让一位优秀的将军^③统一指挥，而由于改组在各个方面开始显露出好处，孙也乐意接受积极参加党务工作的建议，主持会议、审查纲领、章程，等等。

现在广州所有 12 个区的区委会都在行使职能，出版党的周报^④，1 月中旬打算召开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⑤，孙任主席的临时执行委员会配合国民党在全国范围的改组工作得很有劲头。为了贯彻与改组党有关的决议，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由最著名的国民党员组成的委员会，廖仲恺甚至同意把省长职务交给自己的助手，以便亲自（当然是在孙的同意下）去上海推行广东的经验。

从谭平山同志提出的报告^⑥中可以看出，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使广州的共产党员人心振奋，为他们提供了他们早就向往的工作。应该为他们说句公道话，广州的共产党员为改组国民党做了大量

① 孙逸仙于 1923 年 10 月 18 日签署命令，任命鲍罗廷为改组国民党的顾问和指导员（应为组织教练员——译者）。

② 即吴铁城。

③ 1923 年 11 月 14 日孙逸仙任命杨希闵为云南、广西联军总司令。

④ 指 1923—1924 年在广州出版的《国民党周刊》（从 1924 年 2 月 24 日第 9 期开始改称《中国国民党周刊》）。

⑤ 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 1924 年 1 月 20 至 30 日在广州举行。

⑥ 报告没有公布。

的工作。

12月1日我回到上海。我将与廖一起在这里组织工作。顺便说一句，廖还带来了孙给上海国民党人的信^①，孙在信中谈到苏联给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帮助，并要求国民党人服从我的指示和领导。我们决定不让国民党人看这封信，而仅向三四位最可靠的国民党人宣读。

现在，在广州呆了两个月之后，首先我确信，让广东控制在孙逸仙手中，从实现我们力求在中国推行的那些计划的角度来看和首先从改组国民党的角度来看，都是极端重要的。

从最近两个月来已经做的工作中可以看出，广东不论在改组国民党方面，还是在一般地发展国民革命运动方面，都能够成为我们整个工作的中心。任何一个省都不可能像广东那样成为国民党的领导和发展中心。在一些省，国民党的活动是不合法的，例如在直隶，而在另一些省，人们之所以容忍国民党，是因为它不经常显露自己。只有在广东和特别是在广州，可以建立这样的中心，因为国民党在这里是执政党。各种政党、派别和团体都在利用治外法权建立自己工作的基地。如果不算国民党几位显要大人物，就像孙在上海时唯一不能在这些租界为自己找到栖身之地的党就是国民党，孙在上海就发生了这种情况。但是只要国民党发展壮大并以一支团结的力量出现，这种局面就会结束。从这个角度来看，广东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失去它就意味着失去唯一的工作基地。如果这样，那么支持孙现在正在为控制广东而进行的斗争的问题就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就必须与国民党改组问题和整个国民革命运动问题同时解决。这个问题能否像孙逸仙建议的那样解决，必须立即加以研究和决定。这里所说的不是西北计划问题，也不是蒙古问题，而是经过海参崴提供援助

^① 孙逸仙的信没有找到。

的问题。

在我离开广州前夕，收到加拉罕同志的一份电报^①，要求弄清孙一旦在广东站稳脚跟时所需援助的规模。我已经同孙和我们的军事专家一起进行了这项工作，我理解电报的意思是，问题已经得到积极的解决。

应该指出，这封电报恰好是在孙已经积极投入国民党改组工作之后收到的，它给孙造成的印象是：我们将不限于仅仅提供文化帮助，即表现为提出应该怎样组织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建议的帮助。同时，我们也将不限于为这项工作提供资金帮助。这封电报似乎强调，我们的着眼点是组织国民革命运动，成立军事学校，为军队提供政治工作干部等项工作，而如果为了这些工作，还需要巩固前线，那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在这方面也不会拒绝。

孙的任务

目前摆在孙面前的任务是什么呢？

(1) 继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在广州业已开始的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为此他必须立即在中国的各大中心城市创办报纸。党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在广州创刊，刊载有纲领、章程和改组宣言的第一期已经问世，并附在本报告之后^②。第二份报纸应在上海创刊。在这方面已经预先采取了具体步骤，第一期可望在最近两周内出版。上海组织是为在中国中部地区开展工作而设立的临时执委会的分部。这个分部已经由临时执委会任命并得到孙的批准。为了组建这个分部和安排它近期的工作，执委会经孙同意派廖仲恺去上海。为此目的中共中央委员、国民党改组临时执委会三位书记之一的

^① 加拉罕给鲍罗廷的电报没有找到。

^② 附件没有找到。

谭平山同志也来到上海。我曾亲自同上海分部的两位成员，也就是张继和汪精卫谈过话，分部由于某些成员不在尚未开会，这些人应在近日来上海。顺便说一句，他们当中应该来的还有戴^①，他是一位老资格的国民党员，中国出色的新闻记者。上海分部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在中国中部筹备出席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这次代表大会应于1月中旬在广州召开。在上海成立中央新闻社，以便为所有的中国报纸提供新闻和具有国民党精神的文章。宣言已经制订，它可以作为所有敌对党派临时协议的基础。这是从宣传目的出发预先采取的措施。宣言分析了中国当前的局势和从自己方面即以国民党名义提出的摆脱当前无政府状态的某种出路的现有方案，提出了一项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所接受的行动纲领。这个宣言旨在向中国群众证明，相互争斗的集团即使以最起码的哪怕只能使中国的悲惨境况有所缓解的行动纲领为基础，也都不能联合起来。这个宣言应该成为正在改组的国民党的一种鼓动和宣传手段，从而使它有可能把中国民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2）坚守广东并不是为了像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是要在某些战线上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始终幻想组织一次对北京的远征，而是为了使广东作为向全中国发展和推进国民革命运动的根据地。为此，首先必须根据政府在社会劳工法、调整土地关系等方面的具体措施，做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宣传说服工作，同时要缓解无地、少地和村社农民的处境等等。换句话说，要在广东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基础，它能证明孙的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并使它能够提出全民族的任务。

（3）改组现在共有5万到10万人的军队，使它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为此孙必须创立几所军事学校，同时重视培养政治工

^① 即戴季陶。

作人员。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11月25日，孙主持下的国民党临时执委会最终接受了这里提出的在广州创建第一所军事学校的方案^①。建校的原则是以营为单位。这所学校区别于同类学校的地方是它名副其实地设立了政治部。蒋将军^②被任命为校长，他是孙在莫斯科的代表，现正在回广州途中。任命广东省省长廖仲恺为政治委员。校址已经选定，最近将一切准备就绪，学校将开始运转。学校开支预计每月1.5—2.5万元，这取决于是否接受我们关于每个营设3个连的提议，还是孙本人提议的6个连。

正像在另一个地方已经指出的那样，孙逸仙的军队现在是在杨希闵将军的统一指挥之下。尽管这位将军是国民党员，但这里附上的有关他的鉴定^③表明，未必可以把他看作是特别可靠的。但是注意到孙和国民党临时执委会在积极着手在广东群众中做党的工作，政府在制订旨在改善工人、农民和中间阶层的处境的措施，以及孙过去和现在都准备把政治工作人员派往军队，所有这些将会消除杨希闵将军的危险，更牢固地保持住军队同孙的联系。由此看来，我们能够通过海参崴给予孙提供的一切援助都将有助于他加强自己对军队的控制。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0，第 34—35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① 在广州成立军校的方案没有找到。

② 即蒋介石。

③ 杨希闵的鉴定没有找到。

102

鲍罗廷同瞿秋白的谈话记录

1923年12月16日于上海

同瞿秋白同志的谈话

鲍罗廷：改组情况怎样？

瞿秋白：改组工作是星期天开始的。我们举行了党中央、团中央和两个地方委员会组织的四委员会联席会议。谭平山出席了会议，并作了关于在广州改组国民党的报告，然后，指定了在共产党内部同青年团一起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常设委员会，由党中央代表、地方党组织代表、青年团代表和上海地方青年团组织代表共4人组成。此外，还有6个地区各出1人，也就是说总计10人。

鲍罗廷：至今他们做了什么工作？

瞿秋白：他们调查了我们组织还有多少成员未加入国民党，并发出了现在就加入的指示。暂时他们再没有做别的什么工作。

鲍罗廷：你们得到了国民党的宣言、纲领和章程吗？

瞿秋白：是的。

鲍罗廷：在委员会里把这些文件搞清楚了？

瞿秋白：没有。

鲍罗廷：在地区组织中呢？

瞿秋白：也没有。

鲍罗廷：这就是说，那儿也没有讨论，为什么？

霍秋白：因为我们只有一份。打算明天或后天召开我们党的地方会议来讨论章程、纲领，等等。此外，我们明天将讨论如何推举出席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问题。

鲍罗廷：中央谁参加了委员会？

霍秋白：好像是陈独秀，团中央是卜士奇。

鲍罗廷：怎么不是刘仁静？

霍秋白：不知道。

鲍罗廷：我不在时出版了党的什么期刊了吗？

霍秋白：昨天出版了第48期周报^①。那里既有国民党的纲领，又有国民党的宣言。还有社论，只是我还没有看。

鲍罗廷：不管怎么说，有关于改组的社论吧？

霍秋白：我只看了标题。

鲍罗廷：您不知道社论的内容吗？

霍秋白：不知道，不过现在可以去买一张报纸。

鲍罗廷：你们的报纸在这里公开出售吗？

霍秋白：是的，半公开。

鲍罗廷：关于国民党改组问题，中央向上海以外各党组织发出了什么指示，或什么通知、通告没有？在北京，什么也没有收到，甚至连宣言和纲领他们都没有。应该提出这个问题。对于国民党的改组，党在做什么工作，省里什么都不知道。国民党在改组，这个情况知道，但党在做什么工作，他们不知道。关于国民党改组问题，需要起草一个通告，散发给各级组织。

现在请谈谈国民党在上海在干什么。

霍秋白：他们也想着手改组上海的地方组织，但好像还没有开始。这几天我们的一些同志加入了国民党，他们得到的印象是，国民党内没有中心。一些人说，要按老章程接受新党员，另一些

^① 《向导》周报。

人则主张按新章程接收。^①

鲍罗廷：可以说，他们的中心还没有起作用，只是在组建过程中。

瞿秋白：我只听说，他们在国民党俱乐部开了会，会议结果现在还不清楚。

鲍罗廷：23日准备开大会是真的吗？

瞿秋白：我昨天听一些国民党人说，好像是在后天。但我想不会这么快。

鲍罗廷：政治局明天才正式开会，而23日他们好像打算正式开始做党的改组工作。关于改组问题，在国民党人当中和在城市中有什么传闻？

瞿秋白：传闻总的来说都是很好的。反对派也销声匿迹了。

鲍罗廷：您不知道戴季陶为什么离开这里吗？

瞿秋白：不知道，可能因为私事。

鲍罗廷：他们认为，在出版周报问题上，不得不同意让戴季陶和胡汉民来做编辑工作。为什么这两个人喜欢编辑周报^②而不是当地的上海日报？我还未来得及了解清楚。

瞿秋白：他们不敢大步前进，他们想慢慢来。

鲍罗廷：这个日报的名称是什么？

瞿秋白：《民国日报》，报道的内容还可以，都是消息，新闻很少，也不准确。

鲍罗廷：那里关于国民党说了些什么？

瞿秋白：转载了宣言，纲领还没有转载，章程也还没有转载。我听说，他们将出版单行本。

鲍罗廷：您不知道浙江情况吗？

瞿秋白：我昨天听沈定一说，好像向那里派去一个人，要在

^① 指国民党1919年和1923年的章程。

^② 指1923至1924年间在广州出版的《国民党周刊》。

浙江建立新的国民党组织。此人是在不久前加入国民党的，是我们的同志。据说，老国民党人不想把他放在眼里，因为他太年轻。因此我们建议沈定一和戴季陶在这个省再工作一段时间。如果他们本人不便露面，他们应在幕后为这个组织做工作。

鲍罗廷：我认为浙江的卢永祥会完全同意让国民党开展自己的工作。

霍秋白：我听沈定一说，卢永祥同意，但那里有被吴佩孚收买的警察局长，黑社会专门保护这个人，因此卢永祥不敢触动他。

鲍罗廷：我看福建和卢永祥之间有某种误解，他们之间有可能爆发战争。

霍秋白：不久前在上海，警察局长被杀。在浙江，这也是个警察局长，他是直隶党的代理人。

鲍罗廷：卢永祥怎么能容忍他呢？

霍秋白：在他身后，除了吴佩孚，还有纯粹的中国黑社会分子。

鲍罗廷：我看，既然这取决于卢永祥，那么那里在提出国民党工作的意义上就不会产生什么误解。

霍秋白：沈定一昨天对我说，如果我们真的要发动国民运动，那么一开始我们必然会同警察局长发生冲突，因为我们不能通过卢永祥迫使他听话。

鲍罗廷：禁止建立组织，引起更激进分子对自己的反感，未必对他有利。哼，走着瞧吧！

现在请告诉我，中国其他报纸上谈到了国民党改组问题吗？

霍秋白：没有，什么也没有谈。

鲍罗廷：总的说来，报界方面的情况相当糟糕。

霍秋白：有些政客建议我们对北京议会通过的宪法投赞成票。但也有许多人反对这样做，说如果我们投票，这就意味着我们承认曹锟的议会。现在报界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鲍罗廷：中国电讯社，或在上海这里叫作世界电讯社的这个新闻社是什么机构？

霍秋白：我听说过这个名称，但不知道它是个什么机构。

维尔德^①：您了解去莫斯科的王登云吗？

霍秋白：这是个无赖，我以前想建议不放他出去。他曾长期留学美国。

鲍罗廷：蒋介石什么时候回来的？

霍秋白：昨天早晨。但我未见到他，陈独秀也未见到他。我只见到了沈玄庐，他是共产党员，是我们的组织者。

鲍罗廷：沈是正面人物吗？对他可以完全信赖吗？中央信任他吗？

霍秋白：是的。但我昨天第一次见到他。他对苏联很满意，他第一次去那里。现在，按他的话说，代表团内形成了两派：他和张太雷是一派，蒋介石和王登云是一派。他们抵达莫斯科后，先想见契切林，契切林就中国政治问题同他们谈得很坦率也很诚恳。他们对契切林说，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中国人民已经了解他们的纲领。尔后他们想见托洛茨基，但托洛茨基在南方，过了一段时间才见到他。而在他回来之前，他们见了他的副手斯克良斯基和总司令加米涅夫。当然，苏联同志询问他们有什么计划，如何帮助他们，等等，并建议他们提出书面计划，而且还询问了宣传情况。沈玄庐拟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并附有说明和注释。但蒋介石只听王登云的，并说，计划中有很多批评，不能用贬的口气来说国民党。因此他们把计划放到抽屉里没有交出来。而苏联同志一直要求同马林一起拟定一个计划，然后送给军事委员部和外交委员部。这恰恰是在德国事态扩大的时候。看来，所有苏联同志都在忙于德国事件，长时间未作答复，因此他们生气了，说这

^① 维尔德，全苏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会计——译者。

说明苏联人不想答复。他们会见托洛茨基时，托洛茨基对他们说，现在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政治上和宣传上，并着手做党的组织工作。即便我们给很多钱，给予军事支援，“你们还是会一事无成”。谈到蒙古问题时，托洛茨基说，蒙古希望独立。如果你们想同它建立统一战线，你们应该把它视为兄弟，并说你们不想主宰它。

这次谈话后，蒋介石很生气，说托洛茨基在骗他们。如果蒙古想独立，那需要我们承认，需要我们给予它独立，而不是它自己承认自己。这些话他们是在代表团内部讲的。沈也生气了，他们发生了口角，差一点打起来。外交人民委员部里有人说，中国代表团内部在打仗。好像这是发生在收到孙逸仙的电报之前。孙在电报中说，唯一的朋友是苏联。它现在履行了我们同越飞谈到的许诺。这以后蒋介石缓和了一些，好像改变了态度。沈说，虽然蒋还不很满意，但他对苏联似乎没有不好的看法。

鲍罗廷：沈玄庐同蒋介石将军的关系如何？

瞿秋白：他们是老朋友，不过他说，蒋是个普通军人，没有任何政治知识。

鲍罗廷：怎么，蒋访苏后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和对中国工作的看法。

瞿秋白：不知道。

鲍罗廷：这就是说，在代表团内部，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中间出现了两派？

瞿秋白：沈玄庐不完全是共产党人，他脱离了党的工作。以前他认为，在中国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而现在访苏后，他只相信国民运动。他说，现在在这里不需要任何共产主义运动。国民党和孙逸仙的党能够不断进步，也可能建立社会主义政府。但这不重要，需要把全部力量集中在国民运动上。

鲍罗廷：我同廖仲凯谈过话，从他的话中得出的印象是，将

军回来时对我们很同情，并满怀激情。他在一些会议上发表了演讲，人们把他抬了起来，音乐打断了他的讲话，人们向他说明了与政治工作有关的各种情况，甚至向他讲了党内在中国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他对廖说，这一切给他留下了很诚恳的印象，与沈所说的恰恰相反，蒋说，苏联有给予支援的真诚愿望，问题在于，国民党人是否充分理解自己的任务。

霍秋白：关于代表团的内部生活，当然他们不讲，也不想讲。

鲍罗廷：您认为廖或上海局不了解代表团的这些内部意见分歧吗？

霍秋白：我是这样认为的。这里有王登云的影响。他对苏联过去就不满意，是带着成见去的。他很傲慢。沈给我讲了这样的情况：如果就餐时服务员往桌子上放餐具较响，他就生气。他是一副贵族派头。在苏联列车上，他只吃面包心，把皮扔到地上。有一次服务员对张太雷说：“在你们中国不会发生任何革命，因为你们那里面包太多了。”王勃然大怒。沈本人现在去浙江了。他心情很好，几乎爱上了苏联。

鲍罗廷：王从事什么工作？

霍秋白：他以前在上海一所大学当系主任，……^①。沈说，他们不讲情面地对骂起来。他对蒋介石说：“孙逸仙那里有民族主义。而在你们这里，如果想把蒙古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那有什么民族主义？你们是不是国民党人？到中国去向孙逸仙学习民族主义吧！不能这样解决民族问题，使中国做蒙古的主人。”据沈说，托洛茨基说蒙古怕中国，而蒋介石不喜欢这种说法，他说，蒙古不该怕中国，因为中国是主人。后来他们无法平静下来是因为那里驻有红军。

鲍罗廷：这就是说，蒋介石将军支持王，这可靠吗？真是这

^① 删节号是文件中原有的。

样吗？

霍秋白：是的。

鲍罗廷：直到现在还支持吗？

霍秋白：是的。

鲍罗廷：他们是朋友？

霍秋白：不是，只不过如沈所说，蒋是个普通军人，没有特别的知识，而王是个受过教育的人。

维尔德：代表团离开这里时，马林担心将军会受到王的影响，但不能阻止他起程。他是国民党员。

鲍罗廷：应该告诉孙，王是个什么东西，那时孙本人就会不让他去。

维尔德：马林甚至不想同王谈话，他两次未接见他。

鲍罗廷：应该相反，接见他两次，但一次也不让他去苏联。

现在有必要让沈和张太雷给孙写个自己的报告。如果沈能正确说明王和蒋介石将军一派的性质，那就不能只让他们向孙报告赴苏使命，一定要有第二个报告。

霍秋白：我将向陈独秀同志说这件事。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44，第 136—144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103

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

1923年12月27日于北京

绝密

致广州鲍罗廷同志

敬爱的同志：

我的关于孙逸仙讲话^①的“粗暴的”电报是有很重要根据的。当我收到孙逸仙的讲话和你准备通过新闻检查的指示^②以后，为了防备万一我发了一封电报，以便把引用您的那些话都删掉^③，可是当我从您那里得知，他们已把您的这些话全部发表在自己的机关报^④上以后，我就决定要对漫不经心的中国人认真地施加点影响，而且我作出的关于讨论从广州召回您的问题的指示，不仅是一种威胁，而且也是在某种情况下会发生的一种可能性。您同我们的使团有正式关系，您在广州的逗留本来就会引起怀疑，但还不至于有人在北京、伦敦或者华盛顿指责我们搞“宣传”。可是当孙逸仙权威地证实他不仅在利用俄罗斯的经验 and 您的建议，而且您还是国民党的教导员和组织者，这比一般的“搞宣传”指责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广东的局势是无可指责的。实际上，孙逸仙还没有作出什么令帝国主义列强十分担心和开始对他进行攻

① 看来是指孙逸仙1923年12月1日“要靠党员成功，不专靠军队成功”的讲话（见《孙逸仙选集》俄文版第321—330页）。

②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没有找到。

③ 加拉罕给鲍罗廷的电报没有找到。

④ 看来是指《国民党周刊》。

击的事情。甚至在关税问题上它们也表现得很克制。看来，有节制地施加影响的一个列强是英国，或许是出于您对我谈过的那些考虑。但是既然孙逸仙要在广东和在全中国创立并巩固自己的政党，而这个政党又将积极进行活动并将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那么毫无疑问，列强必将重新考虑对他的态度。但这还不够。如果他实行土地法和其它旨在满足工农要求的法令，那么这就会给他造成不良后果。一个土地法不算什么！但要知道它在一定意义上将是广东地区的一场革命。也不排除它有可能导致国内战争。而如果不发生外部干涉，国民党将会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这就是说，农民将取得争取土地斗争的胜利，而这类革命性改革的胜利，无疑不只是在与广东相邻的中国各省造成农民起义的威胁，而且还可能传染给印度支那，或许在孙逸仙势力范围扩大的情况下，还可能传染给英国的领地。资产阶级国家对这类事情往往很有预见性，它们最愿意把威胁他们统治的全部危险消灭在萌芽之中。如果他们得知，是鲍罗廷在改组国民党，这就意味着，鲍罗廷本人在起草所有这些法令并在领导广东政府的这个整个“布尔什维克化”进程。那时我们将不仅面临各大国扼杀孙逸仙的威胁，而且我们也将面临不仅来自英国，也可能来自美国和法国的新的凯尔逊式的照会^①的威胁。当然，许多事情将取决于国际形势，但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我不想说，从中国内部关系的角度来看，这种公开的秘密无疑会在近期使孙逸仙本人受到打击。如果孙逸仙的运动迄今为止只是民族运动，并且谁都不能指责他是在按照其他大国的计划和指令行事，那么现在则有受到这种指责的危险，他在国内，在其他省的声望因此而不会提高。既然孙逸仙的每次诸如关于关税问题的讲话，都提高了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声望，

^① 指凯尔逊通牒，即英国政府致苏联政府的照会（1923年5月），该照会由外交大臣乔治·凯尔逊起草。照会上包括从伊朗和阿富汗召回外交代表和苏联当局为对英国公民的迫害行动支付赔款等项要求。

那么对与我们打交道的指责和按照我们的指使采取的行动，毫无疑问会降低这种声望。我认为，您本人也能估计到这些情况并能简单明了地向孙逸仙和他的亲密同志们作出解释。我有些担心，主要是因为现在我们进入了某种转折时期，也许这种转折并不完全靠得住，但不管怎么说，在美国、在英国和在日本，我们都处于谈判的前夕。也许在一个国家早一些，在另一个国家晚一些，但是从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所有表现中都可以看出，我们一如既往地号召其他国家进行革命，这无疑会危害这些国家并使之警惕起来。足以说明问题的是，尤兹提出来的反对同我们恢复关系的唯一理由是指责我们根据伪造的文件进行宣传^①。从您身上他们将得到的不是伪造的文件，而是一个完全活生生的和真实的论据。如果说我们能用另一个人替换你，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您十分清楚地知道，如果出现了您不得不离开这项工作的局面，那么我们没有谁能像您这样担当此任。这个想法也使我特别担心。我请求您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您所固有的隐蔽性，并教会广州人这样做。至于改名换姓的事，当然，这里有诸多不便。人们已经知道您是鲍罗廷，一个新的姓氏只能缓和一下情况。无论如何您要三思，这也许能有所帮助。要知道我们需要的是正式的理由。如果您现在成了尼基福罗夫，我们必须能够声明，没有什么鲍罗廷，而如果有人对我们说，尼基福罗夫也就是人们对我们所说的那个鲍罗廷。那时我们就只能说：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有什么尼基福罗夫，他与我们使团没有关系。最不利之处是鲍罗廷正式属于我们北京使团，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也许从一开始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错误，但是当时没有别的办法。

^① 看来是指美国国务秘书尤兹 1923 年 12 月 18 日对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 1923 年 12 月 16 日就恢复苏美外交关系问题给美国总统柯立芝的信的答复。

我的旅行

由于上述担心，我外出的机会有所减少，但我还没有放弃。

雅布丹增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雅布丹增准备动身，虽然他来不及按时拿到委任状，但是您可以根据我的电报开一个证明，上面说明这个丹增确实是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主席，并要说明他没有委任状是因为他取道张家口前来北京时就没有任何证件，是半合法的，他没有携带任何委任状和材料，还要说明，关于他的委任状问题，有人从库伦给我发来一份电报，其中谈到他作为代表被派到广州互通情况的。一旦翻译问题解决，丹增就去上海。我用电话向您打听过白云梯的情况。这是一个来自哈尔滨的蒙古人，他好像不久前在广州，还参加了广州的国民党会议。他在这里讲述了改组工作情况，说他准备在1月15日前返回广州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云云。遗憾的是李^①还没有回来，所以我不能在北京对他进行审查。但如果他所说的都是真的，那么他是丹增再好不过的陪同和译员了。请您注意：丹增没有被授权签署任何协议或作出任何具体的保证和许诺。他的任务是一般地通报情况。他有权通报蒙古的情况、党的工作和现状，在谈判时也许他会说蒙古人希望蒙古独立。我建议您向孙逸仙说明，他们有独立的要求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现状是：如果他们加入中国的版图，既不能为实现他们的民族愿望提供保证，也不能为他们提供秩序与安宁的保证。所以现在他们坚持独立的立场，但是您可以设想，如果说中国有一个民主的、廉洁的国民政府，也许蒙古人会同意在某种自治的基础上加入共和国的版图。也许孙还会向丹增询问在蒙古境内或

^① 看来是李大钊。

在库伦组织国民党军队向北京远征的可能性。我在这里已告诫丹增，对这个问题他不要作任何回答。除了对国民党和对孙逸仙这位中国唯一的革命领袖一般地表示同情外，他不应对孙的问题作任何具体的回答。特别是对这个问题，他应该说，他无法回答，这是蒙古政府的事，应该同蒙古政府去谈这个问题。

冯玉祥

我所得到的有关冯玉祥的进一步情报说，似乎他不准备参加任何反对北京的军事行动。但是如果孙逸仙从蒙古或者从别的地区进攻北京，冯玉祥不会采取防御措施而会保持中立，以便在胜利后与孙逸仙联合。冯玉祥不可能放弃这样的想法：在孙逸仙没有取得胜利之前，他不想和孙逸仙建立联系。但是我总是怀疑，我所得到的情报准确到什么程度，以及冯玉祥和那些以他的名义讲话的人在何等程度上不是在刺探我们的意图和心情。有人告诉我，好像上海的国民党人徐臣（徐继龙）派东京基督教青年会书记、孙的老朋友马培援去找冯玉祥，好像马试探冯，他是否准备去蒙古，从苏联得到武器和援助，然后来反对吴佩孚。无论是徐臣还是马，我都不认识。如果您能核实一下并告诉我这两个人的真实情况以及马在那里是否接受了国民党的委托，那是再好不过的了。说不定这是两个志愿人员。

舒尔曼在云南

如果能弄清舒尔曼为什么去云南，这是非常有益的。恐怕不能认为他只不过是像视察美国驻哈尔滨领事馆一样去视察美国驻云南领事馆。我不认为美国大使作这样的长途旅行仅仅是为了消磨时间。这里有没有什么政治目的？舒尔曼是北京直隶政府的一个教父，如果说他认为可以通过直系来统一中国，那是很自然的。

一个具有这种思想的人去云南劝说云南督军^①与直隶联合，那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云南是孙的力量的一个来源。如果云南承认北京政府，那么孙逸仙的处境会大大恶化，哪怕从云南军队在孙的部队中起着巨大作用这一点来说，也是这样，而对于直隶来说，这一点具有巨大的心理作用，因为中国最南边的一个省也会处于直隶的管辖之下。我不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因为我不知道云南督军的信念是否坚定，同样我也不知道舒尔曼掌握了什么论据来说服这位督军。但是我以为不应排除舒尔曼会作出这种尝试。请您在广州注意这个动向。

关于从海参崴提供物资

我收到了莫斯科就这个问题提出的询问，这完全出乎意料，其中说，要转告孙，我们准备提供援助，但让他答复我们：他能坚持多久，怎样向他提供物资，他能否同陈炯明开始谈判，哪怕是旨在拖延时间，并说，政府在收到他的答复后将讨论他的要求。我立即作了答复，指出了提供物资的路线，同时还指出您提出了陈炯明的问题，现在已经被否定，但是我们现在在试探陈炯明本人，我们还要在广州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局势还不是那样灾难性的，还不至于为了拖延时间就需立即同陈炯明谈判。至于他能坚持多久的问题，我说这样的问题只能通过您向他提出来，还说您还不会很快去广州，不过在他们询问之前我已问过这个问题，我得到的答复是，总的说坚持下去的希望是有的，但是孙不能确定期限。我从自己这方面说，我认为，由于没有固定不变的兵力对比，所以某种偶然的情况，诸如某位将军的背叛，从北面和西面同时进攻，吴佩孚立即把大量兵力调往南方等，在任何时候发生都可能是致命的。同时，我主张毫不拖延地解决问题，既然原则上已决定提

^① 指唐继尧。

供援助。在这以后我又一次请求加速解决问题。看来，那里对于广州的局势没有很正确的认识，所以我希望在收到您的通报和我的最近一些信件后，将更容易同莫斯科达到“相互了解”。

土地问题

我把刊登在上海共产党机关报《前锋》上的一篇文章（齐方：《广东一年》）^①中的一节译文寄给您。这篇文章很新奇，因为它完全证实了土地改革是可能的，是必要的，并能对国民党起到巨大的作用。您可以看到，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存在着某种小土地所有者组织，虽然只是在惠州一个县。同时这篇文章还说，广东地区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这迫使我们非常审慎地对待土地法令。我恳请您尽可能经常地给我寄一些详细的材料和土地改革的方案，以便我了解这项工作的进程。必须提请他们注意，对改革要作很周密的考虑，这样，实际实行时就不会遇到严重的困难，而且不言而喻，还必须考虑到，实行改革时必将发生某种无政府主义和混乱的因素。我非常想知道，在广州，人们是如何想象的，他们打算做什么，因为在所有的法令中，土地法也许是国民党手中最强有力的和最重要的杠杆。

海关问题

海关问题的处理，采取了比较令人满意的方式。看来，孙并不准备用武力夺取海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一种威胁。我只是根据报纸在进行评论。无论如何，他关于海关问题的讲话在政治上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无疑引起了中国其它地区对他的同情。遗憾的是，这一事实，即他的这个讲话没有大张旗鼓地加以利用，原因是缺少某种党的组织，没有自己的报纸。应当给他们指出这

^① 该文刊登在《前锋》杂志1923年12月1日第2期上。

一点并强调说明，如果在全中国都有国民党的委员会，都有报纸，那么，他的这个讲话就会造成一次有利于孙逸仙的全国性运动，而这会是一次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举动。

张作霖

我焦急地等待着您关于叶恭绰奉天之行^①结果的报告，而且非常希望得到您关于张作霖的通报。最近他表现得越来越厚颜无耻。为了让这些话能传到张作霖的耳朵里，应该这样说明，这种行径现在也许不会受到惩罚，但是在某个时候，当他想得到友谊时，也许就得不到并因此而送命。

吴佩孚现在还没有反应。看来，要来洛阳的海参崴代表还没有到达。

蒋介石

结果蒋介石同托洛茨基、同季诺维也夫都见了面，还出席了共产国际的会议，所以不可能有特别抱怨的理由。诚然，他以书面形式提出的庞大计划（我把副本寄给您）被否定，全部问题归结为关于必须做政治工作和到军事学校进行学习的建议，但我认为，他不应该过于悲观失望，特别是在他的上司孙承认必须把政治工作提到最重要的位置以后。我也给您寄去一份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②。其实，这个决议没有说出任何新的东西和任何可以作为我们中国政策依据的东西。我认为，决议中所说的一切，您已经及时地报告孙逸仙了，孙基本上已经在实施这项决议。对于那些在莫斯科起草了这个决议而不了解广东情况的人来说，我认为这个决议是很令人满意的，何况它涉及最普

① 1923年底孙逸仙派叶恭绰去北方同段祺瑞和张作霖就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进攻直隶集团问题进行谈判。

② 见第98号文件。

通的原则性理论。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米哈伊洛夫^①

全宗 627，目录 1，卷宗 4，第 6—15 页。

打字稿，副本。

104

鲍罗廷给维经斯基的信

1924 年 1 月 4 日于上海

敬爱的维经斯基同志：

上次我从北京给您寄去一些材料，用来说明我在中国南方的工作情况。我甚至未来得及给您附上一封信，因为我刚到北京，信使就要离开那里。我仍然希望，这些材料能使您对我们这里的工作有所了解。

在这封信中我也附了一些材料以进一步说明我们的工作情况。12 月 30 日，给我往上海寄来了共产国际在孙的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期间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看来，我的全部工作都符合这些提纲的精神。也许我并没有立即掌握这个调子，但我会逐渐领会它。

重要的是要开始对国民党进行改组。而现在，工作在渐渐走

^① 即加拉罕。

上正轨,并且在一些著名国民党人的头脑中已发生一定的转变,这可以从孙的讲话^①中看出,现在可以促使他们坚持提纲的精神,特别是在对待他们自己的“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态度上,以及在对待工人阶级的政党和经济组织的态度上要坚持提纲的精神。至于后者,我过去和现在都致力于从内部施加压力的政策。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地方组织中发挥作用越大,取得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这种态度也就越快,否则相反。通过他们之间的协议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今天早晨,上海国民党的一个区委会告诉我,有两名共产党员选进了这个委员会。这个区有250名国民党员。不能说,我对此感到庆幸,因为我还没有把握,共产党人取得两个席位是因为他们工作积极而被推荐给国民党人的结果,还是属于一次偶然的计谋。但是毕竟不能否认他们可能也具有某种影响。而正是这种影响决定了我们能够多么迅速地实现提纲中所谈到的那种相互关系。我相信,这对您来说是一个浅显的道理。可以这么说:提纲中涉及国民党和共产党相互关系的条款能否实现,决定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地方组织中的工作积极程度和其影响加强的程度。迄今为止我正是这样做的。

这样做对吗?

从我在孙逸仙宴会上发表的讲话^②(上次寄给了您)中您可以看到,在民主的定义上,我给中国人提出了适用于中国国情的“自决”权概念,而不是在同国民党人第一次会见时向他们提出的我们的民主概念。我“慢条斯理地、羞羞答答而拐弯抹角地”使他们正确地理解了这个蠢词。中国的客观实际可以作证。

1月底将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每个省派6名代表。有

① 可能是指孙逸仙1923年12月1日的讲话“要靠党员成功,不专靠军队成功”。见《孙逸仙选集》俄文版第321—330页。

② 看来是指鲍罗廷1923年10月9日的讲话。至于自我批评问题的讲话摘录,见A·H·切列潘诺夫:《一位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俄文版第50页。

来自西藏和蒙古的 Fraternal delegates^①。党的纲领和章程已经准备好，日程和报告人也已确定。地方上的筹备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某些地方的代表已经选出。例如，上海的代表是在群众大会上选举的，大会还为上海国民党的改组打下了基础。顺便说一句，上海大学变成了国民党的党校。这里有由张继、汪精卫、胡汉民、叶（楚伦）、邵（元冲）、张秋白、谢（持）组成的异党活跃的国民党中央局在工作。他们都是由中央任命并经孙批准的。

在广州，由于海关冲突，现在工作很活跃。示威、集会和其它活动，都是在共产党员和青年的积极参与下由国民党组织的。

到年底国民党将在广州、上海、杭州和浙江积极开展活动。此外，在其它地方现在正在准备在代表大会后立即开始进行改组。

广州在出版一种名为《国民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已经出了第3期。在上海春节前夕将出版一种在中央局领导之下的有16版的大型日报的创刊号，这份报纸将取代现在的《民国日报》，后者的所有资产、机构等都将转给这家新的报社。

编辑委员会由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伦）、邵（元冲）和瞿秋白组成，主编由胡汉民出任，副主编是叶（楚伦），秘书是瞿秋白。

请您帮助这家报纸。现在需要通讯记者，特别是土耳其和俄罗斯方面的。在伦敦和巴黎也要安排此事。在各地把这件事安排好之后，可以在莫斯科把来自所有这些地方的通讯报道编好并寄到上海这里来。此外，还必须寄来适合上海国民党日报使用的一切其它材料。请您通过北京使团电告，能否负责安排此事并亲自撰文。日报需要大量的材料。要使它应具有应有的水平，这将取决于我们的帮助。恳请您关照一下。

由于国民党进行改组共产党异常活跃。我本人现在什么也没

① 英文，意为“兄弟代表”。

有做，事先未同党中央商量。我们工作得很和谐。眼下什么 troubles^① 也没有。理论争论让位于实际工作。希望是有的。

您要求我谈谈对用“我们的”经费给工人组织提供财政援助一事的意见。第一，这笔经费现在还没有，本月25日以前^②我是在没有经费情况下工作的。国民党自己支付自己的费用。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拨给一些经费。第二，我们是在预算的范围内工作。我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在编制下一个预算时，我要加上我和中共中央都认为需要给工人组织提供的经费。莫斯科能否批准，我不知道。为此您应该和加拉罕同志函商。您说契^③同意这样做，那么请您也向列夫·米哈伊洛维奇^④说一下。

恳请您为我提供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关于帝国主义的材料，以及所有其它可能对工作有帮助的材料。

我打算同费因贝格^⑤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本着这个思想给他写了信，尚未收到回信。

工作必须有人，一个人是无法应付的。要是把马林派到这儿来就好了。我甚至坚持这个意见。

我还请求派来二三名优秀的、完全懂俄语的中国人，以便帮助做翻译工作和所有其它事务性工作。这也是非常需要的。没有他们，国民党的报纸就玩不转。要知道，在俄文材料中有很多东西对这份报纸是有用的。

希望今后同您保持更经常的联系。信使将更经常地从这里去北京。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① 英文，意为“麻烦”。

② 看来是指1923年12月25日。

③ 可能是指契切林。

④ 即加拉罕。

⑤ 原文如此，看来是指И·И·法因贝格：此人系英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19至1923年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出版部工作，1923至1924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驻海参崴代表，1924至1925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顾问。

鲍罗廷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1，第 1—4 页。

打字稿，亲笔签字。

10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给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 (摘 录)

1924 年 1 月 15 日^① 于莫斯科

机密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报告

自从 1923 年 6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以来，几乎东方所有的国家都发生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这些事件要求那些处于我们直接领导和影响之下的共产党组织和民族革命组织采取相应的方针（……）^②。

……中国。在过去的半年中，中国政治生活中发生的最重要事件是中国民族运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形成。国民党在其存在的 12、13 年中第一次被看作是真正的国民革命党。它最近在中国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的英译本注明的（见托尼·塞奇：《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起源》英文版第 861—877 页）。

② 此处删去报告中关于日本情况部分。

南方海关收入问题上对帝国主义采取的行动^①、它发表的反帝声明和转向世界无产阶级的行动^②，表明它走上了真正同帝国主义进行民族革命斗争的道路，不再执行其从前依靠一个帝国主义集团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的斗争策略。这种思想上的进步表现为国民党开始更多地依靠中国广大群众，并着手进行政治宣传。国民党策略的转变要求党具有新的相应的组织形式。现在国民党在中国的整个南方和中部、北部的部分省份成立了自己的委员会。最后，今年1月中旬将在广州召开首届党的代表会议^③。

目前，国民党在广东省是执政党，它能否控制住全省将取决于军事上的成败，但无论如何，中国的民族运动从现在起具有了真正的反帝性质。

促使中国国民党进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最近半年来发生的一些事件，这期间在中国中部和北部，美国的影响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表面上都开始超过日本。

曹锟（中国的现任总统）在美国支持下的掌权不仅意味着美国影响的扩大，而且意味着中国最大的军阀党——直系为加强。

上面这个情况促使国民党更迅速地确定了方向，最终更公开更真诚地转向了苏俄。

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建设国民党的整个工作中，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那些加入国民党的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当中许多人被推选出席国民党的代表会议，并参加了代表会议召集委员会的工作。最近几个月，党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了。或许，因此最近我们没有收得关于党内工作情况以及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的工作情况的通报。但是，我们发现某些征兆，说

① 指孙逸仙在1923年底向西方列强提出的恢复向广州政府支付在中国南方征收的部分海关税收的要求。作为回答，列强在广州附近举行了陆海军的示威。

② 大概是指1923年秋国民党代表团在共产国际的谈判。

③ 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明党内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

第一，在此之前，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更确切地说，工业城市无产阶级和青年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是党内意见分歧的焦点。一些来信都谈到了这一点，从中可以看出，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而去组织中国工人，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工人群众，这个问题是党内最大的争论问题。组织青年的问题也是这样的争论问题。我们认为，国民党代表会议结束后，代表们从广州返回时，应该在上海召开一次中国中央委员会成员（现在在上海的）和负责人以及青年的代表会议^①。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应该是：（1）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向国民党代表团提出的提纲^②阐明中国国民运动的性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2）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运动；（3）组织问题和党内工作，以及（4）宣传和鼓动工作。

我们认为，现在举行这样的会议确实是必要的，对党的工作也将是一个很好的激励，并将有利于党在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③之前的团结。

至于如何组织中国工人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向党指出，当前的问题不是在什么样的政治旗帜下去组织他们，而是把他们聚集到阶级的经济组织中去，并尽快摆脱工人组织分散的状态。这种状态是过去一年中国无产阶级在同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力量悬殊的斗争中屡遭失败造成的^④。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21，第 1、4—7、22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指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全会（1924年5月10至15日在上海举行）。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23年11月28日的决议（见第98号文件）。
 ③ 指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在莫斯科举行）。
 ④ 以下删去报告中关于朝鲜、爪哇岛、印度等地状况的部分，关于太平洋运输工人代表会议的部分以及关于土耳其、埃及和巴勒斯坦状况的部分。

106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64 号记录
（摘 录）

1924 年 1 月 24 日

出席：

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布哈林、加里宁、莫洛托夫、鲁祖塔克同志。

中央委员：伏罗希洛夫、捷尔任斯基，克维林、库比雅克、米高扬、彼得罗夫斯基、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苏利莫夫、斯克雷布尼克^①、哈里托诺夫、丘巴尔同志；候补中央委员斯克雷布尼克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比雪夫、索尔茨、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4——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问题：

(1) 关于孙逸仙(1923 年 12 月 29 日政治局会议第 58 号记录 3. (3))，(契切林、维经斯基同志)。

^① 原文如此。实际上他是候补中央委员。

(1) 拨款 50 万金卢布用于购买……^①

(2) 为解决采购地点问题……任命由克拉辛、契切林、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和安德烈耶夫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由契切林同志召集。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412，第 1—2、8 页。

铅印稿，原件，亲笔签字。

107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

1924 年 1 月 25 日于广州

机密

致米哈伊洛夫同志^②

札 记

(1) 代表大会头两次会议的电影片拍得相当认真。冲洗出来后看了会很有意思。我们当中是否有热心的观众？

(2) 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搞得不好，因为很难找到中国的速记员。

(3) 国民党代表大会开幕之日举行了群众性游行。在代表大

^① 此处及下面删节号是文件中原有的。

^② 即加拉罕。

会礼堂前的广场上举行了群众大会，一些代表在会上讲了话。

(4) 关于杨希闵强迫士兵集体报名加入国民党的消息是捏造的。

(5) 关于土地基金的纲领条文没有通过，这件事不会影响孙在陈炯明进攻时答应颁布的土地法令。

(6) 关税冲突现在处于这样的状态：广州政府等待着舒尔曼同北京〔外交〕使团谈判的结果。我已经向您说了，舒尔曼答应转交多余的部分以用来改善广州的航道。

(7) 同一位云南将军真的发生了一些误解，但看来没有多大关系，因为这件事较容易解决。

(8) 孙夫人不但没有逃走，而且准备在中国新年前夕来广州。

(9) 我已经向您谈了国民政府问题。孙现在不打算走这一步。我们已说服他，不能利用代表大会来达到这个目的。“不能把党的系统和政府系统混为一谈”。当然，也有其它一些想法，我已发电报作了说明。无论张作霖，还是安福系分子在这方面都不支持他。

(10) 您谈到国民党的纲领，并说它没有生气，这是很对的。问题在于，您看到的那个纲领草案，是过去为党的机关报创刊号写的，供讨论用。根本没有提交代表大会。一直在谈论的纲领是由委员会制订的，您可以看得出来，除了关于土地基金和被压迫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方针这两点外，这个纲领给人的印象是，它阐明了党的立场，是一份确实起草得不错的党的文件。您可以看得出来，它分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国民党的过去，以及其它党派的建设，受到了激烈的批评；在第二部分中，对国民党的原则作出了解释，旨在使未来的中央委员会根据这些原则制订出我们可以称之为最高纲领的纲领；第三部分，好像是当前的纲领，打算把中国所有的单独个人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为建立全国的党打下基础，然后党将开展充分的宣传鼓动工作。

(11) 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我将写一份详细的报告，不

过我借丹增去上海的机会，捎去几句话。寄去的简报介绍了会上的某些情况。从我这方面可以补充的是，总的说来，代表大会给人的印象是务实的。会议通过的决议，事先都进行过讨论并由委员会认真做准备。代表大会大致分成三派：右派，30—40人；极左派，人数也这么多；两派都争夺的中派占大多数。孙的立场起初由于希望无论如何也要保持统一，与中派的立场别无二致。但是逐渐地，随着代表大会本身工作的进展，以及由于外部事态的发展和始终抱有的对自由国家的幻想（关于这一点他在答复您给代表大会的电报时已经谈到^①，他像傅立叶盼望财主降临等了20年一样，期待着某个自由国家有朝一日会突然闯入他的大本营赐福于人民，就像舒尔曼那样来拯救中国），他本人越来越向左转。这从他在代表大会上的所有发言中，从他向代表们作出的公开演讲中，特别是从他就代表大会通过纲领要点发表的讲话中都可以看出来^②。

这次代表大会之所以开得好，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国民党的状况：甚至最优秀的一些国民党人思想上也很混乱；一些人希望弄清中国面临的问题，准备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虔诚地工作；一些人企图攫取党内的肥缺，他们违背自己的信仰和利益留在党内，只是因为已同孙共事20年。所有这一切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都有表现。通过任何其他办法都不可能获得国民党内部情况。从这个角度来说，代表大会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因为它使准备领导中国国民革命斗争的真正的国民党能够这样组织起来，把异己分子化为无害，或者完全清除。另一方面，由于开这次会议，才得以一劳永逸地弄清楚它过去失败的原因，弄清楚在中国它实际上应该主张什么和现在准备做什么。会上围绕这三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对

① 见《孙逸仙选集》俄文版第371页。

② 指1923年1月23日孙逸仙的讲话（见《孙逸仙选集》俄文版第369—370页）。

这三个问题有了很清楚的了解。这种讨论在地方范围内不可能进行。只有像现在这样的全国代表大会才能做到。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人，特别是以孙为首的最优秀分子把代表大会看作是一个历史性事件。这一点孙向代表大会公开谈到过。

(12)列宁的逝世在孙周围的人中和在代表大会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件事促使他们想到自己的党，在持续三天的悼念活动中，许多人在讲话中提到，只有列宁创立的这样的党才有能力代替领袖。这也适用于孙。今天在市内政府大楼、轮船、包括孙的大本营上面都降了半旗。没有降半旗的只有外国租界沙面。那里正好相反，升起了旗帜，装饰了房屋。原来是日本摄政王结婚，这个外国租界地的小岛为他举行庆贺仪式。在孙的大本营所在的最大建筑物上空，在河边也降了半旗，到处都降半旗和外国租界升旗之间形成了多大的反差呀！

所有其它情况，以及关于代表大会的详细报告，我将通过特别信使告诉您。我只让丹增捎去这些片断的札记和印象，还有一份简报和纲领。我已经说过，23日，纲领将由委员会提出并由代表大会通过。寄给您的是一份草案，我在页边注明了“没有通过”字样。这个纲领被通过或被否定后我将作出报告。

鲍（罗廷）

全宗 627，目录 1，卷宗 4，第 16—19 页。

打字稿，副本。

108

斯列帕克给维斯基的信

1924年2月8日于北京

亲爱的格里沙^①：

看来，我还是得去日本。明天早晨我去日本大使馆取签证，日本大使馆已经收到东京发放签证的批准，显然是迫于莫斯科的压力。我不知道怎样确定自己对这次新的旅行的态度。一方面，我当然是希望去日本，无疑那是一个现在比中国更有意思的国家，但另一方面，简直很难克服自己的惰性，看来这是在一个地方呆较长时间的人常有的事，再加上芳尼娅·莫依谢耶夫娜^②——妻子、孩子等人的情况，我在以前的信中已经对你说过。

格里沙，我希望我在东京也像在北京一样经常与你保持联系，虽然这种频繁程度对我比对你更大得多。我已经有几个邮件都没有收到你一个字了。我至今不知道，我将走哪条路线，或者取道朝鲜，或者取道海参崴。如果走后一条路线，那么我也许能同海关的同志交谈各种问题，也许在那里能为你建立同东京的联系。暂时这还只是一些设想。

现在北京在举行铁路工人代表会议^③。中国的九条铁路中有六条派出代表。明天还将有一条或二条铁路的代表来到。没有派

① 维斯基。

② 列帕克的妻子。

③ 指1924年2月7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铁路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

代表的只有广州铁路、沈山铁路和中东铁路。迄今在中东铁路上，在组织铁路工人工会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少。在张作霖统治下这方面情况总是很糟糕的，同志们忍受着警察当局的许多袭扰。当然，这并不妨碍张作霖装扮成铁路工人的朋友，甚至当事情涉及到吴佩孚的统治的时候还会帮助他们。顺便说一句，吴佩孚正在狡猾地玩弄把戏，悄悄地走近总统的宝座，以便以后成为实际上的而不是口头上的独裁者。在评估中国当前的局势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有些时候解放了的社会舆论也会尝到他独裁的苦头。我还认为，在对苏联的态度上，情况会更坏，因为吴佩孚这个沙文主义军阀，是一个典型的军人，他总觉得会有一个在专制制度下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中国。顺便说一句，这是真的。也许你自己已经了解中国的政治局势以及我对事态的看法。

再来谈谈铁路工人代表会议。主要问题是组织问题和与红色搬运工人联合问题^①。代表会议准备就列宁同志的逝世致电莫斯科。当然，领导会议工作的是张^②。他的工作很出色。不久前他从广州回来，他在那里出席了国民党代表大会^③的两次会议。张不但钦佩孙逸仙本人，而且非常赞赏那里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说，现在同志们中间已经不存在是否必须同国民党一道工作的问题。现在都非常乐意做工作并且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这再一次证明我在以前的信中对你说过的话：党代会的决议^④不可能具有实际意义，同志们也不可能同海市蜃楼，同一个不是党或者不想成为党的党一道工作。现在国民党不仅想成为党，而且它以自己的行动证明，它确实想成为党。孙逸仙实现了这个有意义的演变。当你考虑这个问题时，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得出结论，孙逸仙对于国

① 看来是指同红色工会国际相应的部门建立联系。

② 即张国焘。

③ 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④ 指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集，第146—148页）。

民党来说，就像伊里奇对于俄国共产党一样。孙在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必须向俄国共产党人学习。起初在会上还有反对派。还收到一些老国民党员从国外拍来的电报，质问国民党不再是国民党，而成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党，这对吗？孙巧妙地回答说，并非国民党成了共产主义的组织，而是共产党人向国民党的纲领靠近了。他们同意这种回答。就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将来会征服党，还有人认为，从前他们知道他们有领袖，这就是孙逸仙。他们完全信任他，绝对服从他。可是现在，有了一个中央委员会，他们的上帝孙已退到第二位。某些人暗示，这次改组根本没有必要，也许是“从外面”强加给它的。张指出，孙用自己出色的演说作了回答，他把情况解释得如此清楚，以致所有的反对派都同意他的意见：一致同意必须根据新的原则改组党，通过了宣言，其中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各条都作了应有的解释。当然，我不能在这里细谈所做的全部工作。遗憾的是，我现在只能在下面谈谈日本的局势。不过我认为，你能收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和俄罗斯通讯社的材料，我已向俄罗斯通讯社发了一部分国民党代表大会的材料。

但是，应该说，在这方面完成了一项巨大的工作，如果国民党始终这样走下去，在不远的将来它就能成为中国国民革命的政党，在共产党内，在要不要同国民党一道工作以及怎样工作的问题上，应该说，现在不会再有任何分歧意见，现在共产党人会同国民党一道工作，并且能在那里领导这项工作。

我认为，这就是在中国当前形势下所能指出的最主要的东西。其余的都是老调重弹：除了督军还是督军，今天是这个，明天是另一个。今天是一派，明天是另一派。如果维连斯基同志^①认为，从现在曹锟登上宝座时起，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就开始了，那么

^① В·Д·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这时从事新闻记者工作——译者。

他就还会犯错误，就像他在吹捧吴佩孚是“一个好军阀”^①时犯了错误一样。这里普遍的看法是：曹锞的政治生涯和他的寿命已经屈指可数，正如我在上面已经指出的，这是吴佩孚登上权力高峰的一个无声无息的阶段。而当他好不容易取得实际权力的时候，那时维连斯基就能确信，他代表什么人。我认为我没有错。

格里沙，在我动身去日本之前还能告诉你点什么呢？告诉你伊里奇逝世时我的心情，这没有必要。你自己当然会理解这一点。但是尽管这样，我还不得不强忍着组织当地公众作出反应。我希望你能把现在共产党内和莫斯科的总的情绪告诉我。你这个不讲交情的人，你同我从未交换过自己的看法。像党内争论^②这样重大的问题你竟完全没有提到。我想知道，你站在哪一边。我本人强烈反对反对派，尽管在地方会议上我注意到“机关工作人员”的兴奋情绪。我认为，你也不站在反对派一边。还有，你也没有给我寄过一本书，没有寄拉狄克的讲演稿，例如他在军事学院讲德国事件的讲演稿^③，无论是最近一次党代表会议^④的材料，还是政党方面以及其它方面的新书都没有寄来过。其实你自己也在国外呆过，知道这有多么珍贵。也许你现在已经后悔，你一定会给我寄来的，并同我保持实际的而不是泛泛的联系。

玛露霞^⑤近来怎样？替我和芳尼娅转达对她的衷心问候。芳尼娅也问你好！

祝一切顺利！请祝福我在新的工作中取得成功。

你的塞姆^⑥

-
- ① 指В·Д·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其中有些美化直系军阀首领特别是吴佩孚的成份（В·Д·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吴佩孚（中国的军阀统治）》，莫斯科，1925年俄文版）。
- ② 指1923年11月到1924年1月俄共（布）党内关于党内生活问题的争论。
- ③ 拉狄克的讲演稿没有找到。
- ④ 指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该代表会议于1924年1月16—18日在莫斯科举行。
- ⑤ 即М·Ф·库兹涅佐娃，维连斯基的妻子。
- ⑥ 即С·И·斯列帕克。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1，第 13—15 页。
亲笔签字。

109

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①

1924 年 2 月 9 日于北京

致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

亲爱的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

虽然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代表大会已经闭幕，但我现在只收到有关代表大会工作的简报，而且只有前六次会议的。这个消息是从寄给俄罗斯通讯社的一份邮件中得知的，所以未能提供代表大会工作的全部情况，但无疑也提供了某些情况。我把党的宣言、它的纲领、关于党章的决议随同会议的简报一起寄给您。所有这些文件还没有被代表大会最后通过，但是，看来稍作修改就会通过。关于代表大会本身，应该说，正像您已经知道的，这是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过去党从来没有召开过代表大会，孙本人就是党的权力的唯一源泉、党的唯一的权威、党的纲领和策略的唯一来源。所以，正像我已经说过的，这个第一次代表大会不仅是党的历史上而且也是国民革命运动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为国民革命组织，为它的战斗核心奠定了基石。孙本人在代表

① 信上用铅笔注明：送维经斯基。

大会上提到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特殊意义，认为它是一次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应当指出，这次代表大会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引起了各界的关注，把它看作是孙逸仙斗争中的某种新的东西，某种新的方法、某种新的方式。

报界现在也以短评和广州来电的方式关注着这次会议，至于各种团体和知识界、民族团体和学生界，代表大会引起了他们巨大的兴趣、希望和期待。这次代表大会不仅对南方孙直接领导的广州国民革命运动，而且对中国其它所有地方的国民革命运动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对此现在还很难作出估计。国民党的代表从中国的四面八方第一次聚集在一起，没有一个省没有向那里派去自己的代表；会上不仅有中国各个省的代表，而且有来自一些殖民地的华人，即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菲律宾、新加坡、暹罗和安南的代表。

代表大会由 160 位代表组成，按其思想倾向可以分为三个派别：右派大约由 30—40 人组成，左派，也有 30—40 人，以及中派 80—100 人。我是根据最初的报道提出这个大致的数字的，因为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很难完全准确地分清派别，因为还有大批不能确定其面貌的动摇不定的分子，等等。右派主要是由殖民地的代表组成。这是一些中国商人，他们是给孙逸仙财政支持的源泉，主要来自中国南方。他们与孙之间与其说是“党的”关系不如说是私人关系。在他们看来，孙逸仙就是无可争议的权威，而如果说他们站在南方运动一边，那只是因为他们拥护孙。左派主要是共产党员和工人。居中间的是孙逸仙本人和他那些最亲密的朋友以及来自各省的大多数代表团。还很难说右派的反对立场会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但是根据简报可以看出，他们最害怕的是由于党的创立以及与之相关的纲领、章程和中央委员会的出现而有可能降低孙的威信，因为他们的全部联系和对国民党的好感都是建立在孙逸仙个人身上的，所以他们提出了一系列赋予孙在

党内拥有非常权力的修正案。他们的另一个担心是害怕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特别是他们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孙逸仙在代表大会的第二次会议上对他们进行了应有的驳斥^①。您将在有关的报告中看到他的讲话。孙逸仙感到自己更接近左派，尽管他采取中派立场，但是他的主要攻击矛头和主要反对意见都是针对右派的，因为共产党人在代表大会上的表现是十分出色的，他们有高度的纪律性，没有用任何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言论给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整个组织工作和给党纲、党章的制定制造麻烦。我寄给您党的宣言、纲领和章程很有意思，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对以前工作的批评和对中国相互争斗的军阀集团的批评；第二部分是最重要的，这是以最概括的形式提出的国民党的原则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关于民族主义一条非常有意思，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②的精神解释的，而且还发挥了关于民族斗争的两个方面的思想，即一方面是同压制中国民族独立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是通过赋予中国境内各民族以自决权的办法实现各民族的解放；而这一条还发挥了去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的有关部分。民权主义也以共产国际的同一项决议为自己的根据。

至于民生主义，它也是以共产国际决议为依据的，但是根据本地情况加以改头换面，以便使它能够为党的右派所接受。孙逸仙本人准备完全接受它，但他不希望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当党还没有最终形成，还没有巩固的时候，他对决议本身作了这些无关紧要的、更多的是文字上的让步。至于党章，它与我们党即共产党的章程接近。在这方面，关于党的纪律的决议是很有意思的，我把这个决议附在这封信后面。您所担心的，也是某些同志所担心的，是孙逸仙想放弃颁布土地法，这是完全没

^① 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9—101页。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23年11月28日的决议（见第98号文件）。

有根据的。正如我在上一封信^①中所说的，问题仅仅是把它推迟，而如果说在代表大会的纲领和决议中没有直接指出必须颁布这项法令，那么我可以告知，根据鲍罗廷的报告，孙依然主张颁布法令和进行必要的准备，而且准备工作正在全速进行之中。我在以前的信中曾请求指出，关于孙逸仙向右转、说孙和国民党是两回事的传闻来自什么地方；那些希望尽快废除国民党的整个现存形式的人的主导思想是什么；如果现在这种形式具有党的代表大会所确定的性质，那么持怀疑态度的同志对改组工作、对党的纲领和章程还有什么反对意见呢，看来，他们是根据从前那些可能属于马林在广州时期的过时消息，竭力把我们对孙逸仙的援助和支持化为乌有。我认为，这些同志的疑虑是毫无道理的，是建立在不充分的通报，或者不怀好意的通报上的，必须予以抛弃。我说“不怀好意”，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也曾有这样一些反对同国民党合作的左派。也许这个左派的代表现在在莫斯科就有，也许他们正在本着敌视国民党的精神，向共产国际人士或其它人士通报情况。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想在这里指出，正是这些左派分子有上海作为自己的中心，处于国民党的某种反对派的地位，反对我们迫使他们加入国民党的路线。应该说，现在这些左派分子正由于有国民党的工作而欣喜若狂并且放弃了自己的批判立场。他们看到已经完成了的、生机勃勃的实际工作并以极大的干劲投入到这种工作中去。一位左派同志张^②不久前曾找过我，他刚从广州来，欢欣鼓舞地讲述了国民党内发生的事情，并说国民党内的活跃也为他们提供了积极做工作的可能性。国民党工作的活跃对共产党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那些在莫斯科对孙逸仙和国民党持怀疑态度的人应该好好了解一下中国这里共产党人的心情，而且应该仔细研究一下我从这里寄去的那些材料。

① 信没有找到。

② 即张国焘。

国民党正在变成一个真正生气勃勃的、积极的、组织良好的国民革命党，这是我们在任何其它国家都没有的。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土耳其、波斯，都没有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国民革命党，我现在要强调的是，正是国民党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正是国民党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尊敬和崇拜，正是这个党，它如此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我在前一封信中对您说过，如果有人批评国民党并认为有必要改变它的路线或者它的组织形式，那么就让他提出具体的积极的建议，如果这个建议的基点是考虑到了中国的情况和国民党作为一个运动，虽然是国民革命的运动，但毕竟是小资产阶级的运动的能力，那么就让这个建议由最权威的领导机关来批准。我们将在这里努力把它实现，但是应该最坚决地放弃对国民党的一切批评，因为这种批评会妨碍实施我们早已决定向它提供的援助。如果我们不根本改变对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态度，我们应该提供这种援助，看来，我们没有这样做。

关于政治协议

您说必须同孙逸仙签订一项政治协议，否则他会骗人。我不反对签订政治协议，就此我已经给您发了电报。再过10天我准备去上海和广州，在那里我将努力实现您的指示，但是我只提醒您注意一个情况，即不能这样提出政治协议问题：我们向你提供援助，因此，让我们签订一个条约吧。第一，是因为我们提供的援助是微不足道的，您记得土耳其人同英国人作斗争时，我们向他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援助吗？那是几万支步枪、大量的火炮、机枪和一千多万金币^①。当时我们同土耳其人签订的政治协议仅仅是这样一个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土耳其人不向我们提供任何东西，而我们却向他们提供很多东西。

^① 原文如此，可能是金卢布——译者。

我不想说我们当时犯了错误，我们做得完全正确，考虑到从欧洲和近东总的形势角度来看土耳其人民同欧洲帝国主义者的斗争具有极大的意义，我们不能不这样做。诚然，我们可以利用土耳其人走投无路的处境使这个条约更有利于我们，但是限于当时的一系列条件未能这样做。看来，我们被土耳其的牛奶烫过以后，在中国见到凉水也要吹一吹。

然而，国民党在中国的运动根本不同于土耳其。越飞当时非常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土耳其的民族革命运动把共产党人投入监狱，或者干脆将他们暗杀，它宣布共产党非法，还指责我们支持共产党人，因此我们的关系十分冷淡。我们同国民党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在这里我们的顾问^①参加这个国民革命运动党的中央，我们在这里享有极大的威信，而我们的指示和建议对于党具有特殊的意义，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它在广东境内，在国民党执政的地区完全合法地开展自己的活动等等，等等。差别是不寻常的，所以当孙逸仙到北京时，为防止他欺骗，需要同广州签订政治协议，但是，我们对待这个政治协议，如果可能的话，应当采取不同于我们对待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态度。与我们签订条约的主动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孙逸仙手里。我到北京时，他给我写了第一封信，建议我一旦在北京工作受控或不管受控与否都来广州，以便在这里签订中俄友好条约^②。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我有礼貌地和谨慎地回避了这个建议，因为我认为同孙逸仙的条约不可能取代同北京政府的条约，因为它只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一纸空文。我对这个政治协议是怎么看的呢。首先这个协议的实际意义将是微不足道的。我将签署这个协议与其说是因为我由衷地相信它的必要性，不如说是因为我有您的指示，因为这样做

① 即鲍罗廷。

② 指孙逸仙1923年9月17日给加拉罕的信（见《孙逸仙选集》俄文版第749—750页）。

可以使那些怀疑孙逸仙的同志放心，不再成为以后支持和帮助孙的障碍。我之所以不认为这个政治协议具有重大意义是因为，只有孙逸仙到北京时才能实现它，同时我想，您在莫斯科也相信这样一点，即我们所面临的蒙古、中东铁路以及一系列其它的实际问题，毫无疑问应该在孙逸仙出现在北京之前得到解决。至于这项协议的内容本身，不可能含有比我们现在向北京政府提供的条件更坏的或对中国更不利的条件。我们向孙逸仙作出的让步和提供的优惠不可能比向北京政府作出的或提供的更少。即便孙逸仙同意签订一个能向我们提供比我们准备从北京政府得到的东西稍多一点的协议，那么在他执政的那一天，我们也不能根据这个协议要求他履行那些会恶化中国对苏态度的义务，因为这将意味着在政治上葬送他，这将意味着向全体中国人民宣布，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北京政府比孙逸仙的国民革命党从我们这里得到了更多的好处，意味着孙逸仙出卖了中国，因为他必须向我们作出比北京政府更多的让步。我将本着这些指示的精神来考虑政治协议，并将本着中央的决议和我所收到的关于各种问题的指示确定的精神来解决问题。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加拉罕）

又及：现在刚刚收到广州寄来的新材料。所有会议的简报，代表大会最终通过的宣言、纲领。一并附上。（列·卡）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0，第 19—25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和附言都是亲笔签字。

110

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

1924年2月13日于北京

致鲍罗廷同志

广州

亲爱的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

如果对K同志^①没有什么妨碍的话，那么他将按预定时间出发以便赶上23日从上海开出的轮船。但是近几天来在中国政府人士当中的某种水路交通问题让我替他的行程担心。继英国和意大利承认以后，这里可以看到一片振奋的情绪，而且据某些消息说他们已决定作出一些让步，使协议成为可能。可以说，现在这一切都有表现，所以他认为现在他的行程是定了的。不管怎样，我将通过电话确切地告诉您。他将乘去香港的轮船。我们在这里的英国使团处搞清楚了，苏联公民途经香港的条件并得到了答复说，在承认（苏联）以后，所有与英国有正常关系的国家公民所拥有的一切权利也全都自动地适用于苏俄公民。这就是说，我们的公民，特别是我们的官方代表当然也可以不需任何签证来香港。因此，K同志有可能来香港，上岸后即赴广州，或乘轮船或走铁路。从广州和您的角度来看哪条路线最方便和最好，您预先告诉上海，以便让他知道怎么办。

^① 指加拉罕，出于保密考虑用字母代称。

您 2 月 2 日的信^①

您的准确性和责任心这次又得到了证明。恰巧在信使要离开的那天我收到了您的信和最后一部分材料，所以我赶得上把这些东西寄往莫斯科。我认为，代表会议的成果是很可观的，您完成了一件出色的工作，唯一令人不满的是孙逸仙对自己党内的“地主”派所做的让步。我认为，对于这一点还是应该像以前那样给以谴责，以便使孙以最激进的方式贯彻执行土地法令。至于民族纲领、同帝国主义的斗争等，我认为，这一条是很令人满意的，虽然在自决的问题上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已经取得的成就是极其巨大的，因为国民党和孙逸仙本人第一次站到了这个立场上。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在这方面促进他们，既然这个问题不具有最紧迫的实际意义，我认为，可以容忍到下次代表大会。

至于同孙逸仙的共同战线和他对民主自由国家的幻想，我认为，我们的任务是劝说他改变主意，并耐心地向他解释这种民主自由国家的真实意义和性质，但是不应该促使他同它们决裂，不应该促使他去采取某种必定会引起这些列强反对他的行动。您的看法完全正确，如果我们能够承认孙的政府，如果我们能够给孙以很大的援助和支持，那么这种决裂将会具有很大的意义。然而实现这种决裂和促使他对列强采取某种激烈的行动，在我们同这些列强恢复关系并且他们又承认我们的时候，这会是非常不合适的政策，主要是它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和其它意义。应该始终向孙说明他们极度困难的处境和在每一步行动上都必须表现得很谨慎。要求他谨慎和有节制，而不是实行相反的政策，这会给孙和他周围的人留下很好的印象。但是我不再就这些题目罗嗦了，因为我希望同您会面。

^① 信件没有找到。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米哈伊洛夫^①

全宗 627，目录 1，卷宗 4，第 20—21 页。

打字稿，副本。

111

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②

(摘 录)

不 早 于 1924 年 2 月 16 日^③ 于 广 州

代 前 言

1924 年 1 月 20—30 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辟了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新纪元。国民党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要了解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就必须对这个独特的党的历史作出某种回顾，否则就不能正确地评价在广州代表大会上所发生的这一切。这是国民党自成立多年以来，第

① 即加拉罕。

② 文件没有标题和收件人。文件中用铅笔注明：米·鲍罗廷，由于报告的附件篇幅很大，文件集只收入那些与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及过程有直接关系的部分。

③ 日期是根据文件内容注明的。

一次大约有 200 名代表聚集在一起^①，他们不仅来自中国几乎所有的省，而且来自美国、英国、荷兰的殖民地，因为那里集中了大量在帝国主义的空前压迫下生活和劳动的中国人。

过去有人指责国民党说，这个党没有一个明确的、以劳动群众为基础的纲领，没有一个建立在党的纪律之上的固定的章程，等等。毫无疑问，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本身还不能全面说明国民党的实际情况。遗憾的是，与改组和代表大会有关的实际工作并没有为研究国民党的过去提供可能性。但与它的领袖们和不论是来自各省，还是来自殖民地的其他许多国民党人的密切接触，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对这个党的过去作出评价的可能性。如果再加上对孙的著作、言论、纲领、宣言草案等等的了解，以及不限于孙的著述，还有对与他关系密切的其他国民党人的著述的了解，那么就不仅能对党的过去的思想和活动有所认识，而且也能对它未来的活动形成某种概念。

国民党从来不以某个阶级，更不以劳动群众为基础，它认为整个民族都是它的基础。它力求使整个民族摆脱半封建的地位，或者如同这里所说摆脱军阀的统治，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为此就必须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因为它对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负有责任。可是国民党人并不懂得这一点。如果说，国民党在其言论、纲领和宣言中有时也谈到帝国主义问题的话，那么这是因为现实生活本身迫使它涉及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而实际上，国民党始终要么竭力完全回避问题，要么设法寻求同帝国主义的妥协。从主观上说，国民党不是反帝的。即使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处于直接的和很明显的对抗时，国民党也避免就这种对抗作出某种具体的表示，更不用说为了国民革命运动而组织和利用这种对抗了。

在这方面，不久前广州爆发的海关冲突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

^① 在大部分原始文件和研究材料中都指出有 165 名代表。

子，说明国民党实际上避免同帝国主义发生直接冲突。孙逸仙威胁说，如果控制海关的外国人，不把扣除广东所负担的那部分外国债务之后多余的部分关税退还给他，他就把海关掌握在自己手里。迄今为止这些关税余额都给了北京。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当他们把自己的炮口对准广州，并在这些大炮的掩护下要求在城市上岸，以便阻止孙实现其意图的时候，就一下子在中国面前暴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随之而来的自发的反帝示威开始具有很大的规模，甚至开始出现抵制美国的运动。国民党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是怎样的呢？它为了国民革命运动而利用了这种反帝情绪，同时又使它深入和发展了吗？恰恰相反，国民党站在一边，或者躲在这时刚刚初出茅庐、起了一个不明确的、谁都莫名其妙的名字“援助政府外交协会”的组织背后，设法使它平息下去。它是有意这样做的，是为了不在外国人眼里败坏国民党的名声。

希望在外国人眼里以一个与义和团运动^①毫无共同之处的、有声望的民主主义政党的姿态出现，害怕在他们面前损坏自己的名誉，甚至在一些最先进最革命的国民党人那里，贯穿他们的全部活动、他们的所有“著作”的一条红线，就是完全向外国人奴颜婢膝、讨好巴结，要不然就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庸俗行为。在代表大会的筹备期间，而主要是在讨论须提交代表大会的纲领或者宣言时，我就清楚地了解了这种追求声望欲和恐惧感。要想知道孙是多么善于忘却他针对帝国主义所说过的一切，只要读一下孙逸仙同美国大使舒尔曼不久前（1923年12月）的一次谈话^②就足够了。

如果说这种恐惧来自国外殖民地的国民党领袖们，那么这是

① 指在秘密团体“义和团”（1899至1901年间）领导下的自发的人民起义，在外国报纸上该组织称为“拳术”运动（社团成员教人们学习一种特殊的拳击方式）。起义遭帝国主义列强军队镇压。

② 大概是指孙逸仙同乔·舒尔曼于1924年1月6日的谈话。

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能够以一点点的反帝宣传活动为由不客气地把他们投入监狱，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得把他们从殖民地驱逐出去。可是在中国本土，这种恐惧感就不能用国民党人希望保持在英国、美国和法国租界躲避的可能性来加以解释。为什么国民党人实际上避免触动外国租界这个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主要标志呢？这里有另外的更深的原因。毫无疑问，对于许多国民党人来说，能在政治上困难的时刻，逃离敌人进入租界，这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里争论租界问题时，许多人就表示：“如果没有租界，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往哪儿跑呢？”无怪乎孙在代表大会上发表对取消在中国的外国租界的条款的意见时，为了安抚自己的追随者还说，可以进行反对租界的宣传，同时还可以住在那里，就像他本人曾不止一次做过的那样。

我再再说一遍，国民党并不是完全反对帝国主义的。它并不认为帝国主义有很大的危害，相反，那些本该被视为民族眼中钉的租界，实际上在许多国民党人看来，是一些应该仿效的模范城镇，就像一个农夫应该仿效一个模范农场一样。那里秩序井然、干净整洁、有可靠的储蓄银行，因内战而出现混乱时可以得到庇护，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呼唤着国民党人，不能不引起他们对外国人的崇敬，往好里说是引起一种羡慕，认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等等那里好，而我们这里不好。但认为这种依附心里是对外国人的憎恨，那是完全错误的。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学校里学习，与中国学校相比，这些学校也只能引起这些人的羡慕。在每年派往国外，主要是派往美国的几千名中国学生当中，有许多人回来时成了美国等地的出色宣传员。在国外当苦力的中国工人回到祖国以后，根本没有加以利用来进行国民革命运动。因此孙^①向美国大使说，中国人不害怕美国人，相反，他们

^① 孙也是英国教育的产物，他曾在香港的英国中学学习——鲍罗廷注。

乐意让美国人干预中国事务，对这种声明能感到惊奇吗！能够证明国民党缺乏反帝精神的事实很多，完全可以作出这种可能显得不体面的声明。

过去国民党的不幸不仅在于它的纲领没有建立在劳动群众基础之上，或者说它没有一个建立在党的纪律之上的章程（能要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成为一个好的、团结一致、有纪律的组织吗？），而且在于它缺乏足够的民族主义色彩，缺乏彻底的反帝精神。国民党不是任何一个阶级利益的代表，更不是劳动群众利益的代表，它不代表中国的真正民族利益，而这种民族利益要求同帝国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因为帝国主义是造成中国目前的混乱局面的唯一罪魁祸首，是中国摆脱半封建的军阀专制统治的唯一阻力。因此，国民党就逐渐失去了在反对专制统治斗争时期曾经有过的那种意义，而不能不成为一座空中楼阁。

当然，不能把党的民族任务同它面向人民群众的方针割裂开来。不能离开与人民群众利益的联系来谈论民族主义。对于劳动人民来说，民族主义具有非常具体的内容：把国家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同时也把自己从本地的剥削中解放出来。所有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只要国民党不明白这一点，它就永远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政党（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意义正在于它破天荒第一次试图弄明白这一点）。如果说我在这里讲国民党不仅不是以人民群众为基础，而且甚至没有为自己提出足够明确的民族任务，那么我是想用这一点来说明，国民党不仅不是一个国民革命的政党（为此就应该以群众为基础），而且即便从资产阶级的角度来看，它甚至也不是一个捍卫中国利益的民族主义的政党。

* * *

国民党存在期间没有召开过一次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在许多年中以国民党的名义发表的各种声明实际上都出自孙逸仙本人

之手，或者通过由他指定的党的代理人。这类声明发表得非常多，而且常常互相矛盾。它们的共同之处只是全都提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但对这些“主义”的解释或者由此而提出的具体要求却各不相同。所有的声明都极为混乱，这说明国民党人，甚至是那些作为政治侨民居住在国外的最进步的国民党人，对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任务和实现这些任务的方法的认识都是很模糊的。他们在外国获得了一些有关社会主义，主要是空想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片断知识（他们完全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献）。这些人来自主要从事农业的国家，自然寻找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并且从亨利·乔治^①那里找到了。

孙逸仙把亨利·乔治的思想搬到了中国，为之进行宣传，好像这些思想是他的发明一样。（孙从来没有宣布过自己是什么人的学生，相反，被他借用某种思想的人都是他的学生，因为他“早就已经在宣传这种思想了”。）

他认为亨利·乔治的“单一税”^②是自己的骄傲，在国民党的所有声明中都必然要提到，似乎这样做同声明的整个内容并不矛盾。孙就是这样解决土地问题的。无需谈论什么土地国有化或社会化。孙反对剥夺地主（土地）（他主张生产国有化，尽管在中国生产发展水平很低）。他打算在保持古老的土地关系的同时，借助于税收和赎买来消除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中的不公正现象。让土地所有者自己报土地的价格。政府将根据土地所有者自己的报价进行征税。可是这样一来，土地所有者为了少纳税而不报土地的真实价格。对此孙回答说，那样政府就将按照这个价格购买土地。反之，这种情况会使土地所有者说出自己土地的真实价格，甚至高于真实价格，以便高价出售，这样一来缴纳的土地税也会更多。

用这种方法解决土地问题时，国民党关于使用土地平等的说

① 亨利·乔治，美国经济学家——译者。

② 译自英文，原文为 Single tax。

法当然只是一句空话。

国民党的三个“主义”也是一样。国民党人认为，民族主义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包括所有少数民族自治省在内的大国。正像已经指出的那样，国民党非常模糊地认为，为了实现中国的独立，必须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而同帝国主义斗争需要最广泛地吸引群众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但是要这样做就必须明确地向群众指出，他们战胜帝国主义后能够指望得到什么。工人和农民在他们的国民运动中根本没有起过任何作用。

国民党人的民权主义原则取自美国人，在三种权力，即立法、司法和行政权上又加上了取自中国历史的两种权力。这样一来，取自“先进国家”、经过修改的宪法，也作为孙的发明被提了出来，开始在国民党人的所有纲领、宣言和讲话中出现。

国民党人在美国、英国等等国家生活时不能不发现实际情况和成文宪法之间的矛盾，但是他们不是用社会不平等而是用宪法中的缺陷来解释这种矛盾。只要在“先进民主”国家的宪法中加上考试和监察权，“社会的弊病就消失了”。包括孙在内的国民党人，从来没有好好考虑一下帝国主义国家现代社会运行的机制。他们根本不理解在社会上占优势的力量彼此间的社会经济关系，相反，却很喜欢“先进民主国家”，并且认为这些国家的制度和宪法可以搬到中国来。

国民党的民生主义被他们完全叫错了。它的实质就是通常的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我们已经看到，国民党如何解决土地问题——通过税收实现平等利用土地。至于工人，那么国民党提出的改良，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立法。诚然，在国民党过去的纲领中，可以找到有关大生产国有化的条文，但是国民党想象的这种民生主义不包含外国大生产的国有化。国民党人不希望将外国人的巨额私有财产国有化，甚至害怕谈论这一点。因此，国民党纲领中的民生主义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

孙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

迄今为止国民党还没有推举出这样一位领袖，这位领袖不仅试图在人民群众中寻找牢固的社会基础，而且哪怕是明确地向国家提出它的民族任务。至今国民党的领袖，特别是孙都没有从同帝国主义进行无情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民族任务。相反，国民党人在解决这些任务时，试图向帝国主义说明它能够从恢复中国的主权中得到好处。在党存在的许多年中，国民党的领袖们寻求的不是同帝国主义作斗争，而是同它妥协。这种妥协政策在孙的一部关于中国国际发展的名著中^①作了最好的说明。引自他著作中的几段文字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

（1）“世界上有三大问题，即国际战争、商业战争与阶级战争（文中“战争”一词为单数——鲍罗廷注）是也。在此国际发展实业计划中，吾敢为此世界三大问题贡一实行之解决。即如后达尔文而起之哲学家所发明人类进化之主动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战争，如其它的动物者焉，故斗争之性，乃动物性根之遗传于人类者。此种兽性，当以早除之为妙了。”^②

先把战争划分为国际、商业和阶级，以及达尔文以后哲学家们的新发现放在一边，让我们来看看国民党的领袖们是准备怎样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三大世界问题的。

孙说：“中国拥有 428900 平方哩之土地和 4 亿人口以及世界上最丰富的自然资源，现在这个国家成了军阀统治和资本主义列强的牺牲品，成了比巴尔干半岛更受残暴蹂躏的对象。只有在

① 指孙逸仙 1920 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国的国际发展》一书，该书于 1922 年在纽约和伦敦再版，脚注说明是 1922 年版（译者注：即《孙中山选集》中文版）中的《建国方略》。

② 同上书第 231 页（译者注：参见《孙中山选集》中文版第 334 页）。

国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情况下，另一次比过去更可怕的世界战争才能避免。为了解决这个^①问题，我建议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着整个全世界的利益和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利益对中国极其富饶的资源进行国际开发。我希望，因此现在的势力范围能得以取消，国际商业战争能被避免，内部的资本主义竞争将会结束，而最终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战争也将被防止。这样一来，由于这一切取决于中国，战争也就永远不会发生。”^②

如果抛开根本不符合孙提出的中国国际发展的整个下一步计划的中国社会主义开放方式不谈，那么就只剩下邀请世界资本家来开发中国的自然资源了。当然，实际上这必然还会导致对中国的再一次瓜分，也就是说，必然会导致新的战争。实际上就是请帝国主义来掠夺中国，这从孙向帝国主义提出的下述具体建议中可以看出：

“所幸者，当吾计划弁首之部寄到各国和世界会议（在凡尔赛），巴黎遂有新银行团成立，思欲协助中国发展天然物产，组织该银行团之首创是美国政府。因之，不用担心实现我计划资本之无着。在列强之行动，如系真实协力为共同之利益计，而彼之主张为物质利益而在中国进行武装斗争者也会预为防止，因为互助而获之利益当比竞争而获之利益大得多。”

接着又说：

“当然，如果它能遵循所拟计划中所说的原则去做，我们中国人民希望为了和平利益发展中国，将衷心为银行团而高兴。故为万国互助者当能实现，为个人或一民族之私利者之武装斗争将永远停止。”^③

① 原文为“中国的”。

② 孙逸仙：《中国的国际发展》，第5页（译者注：此后三处引文与《孙中山选集》中文版有出入，这里按外文译出）。

③ 孙逸仙：《中国的国际发展》，第233页。

在孙看来，列强在开发中国自然资源方面的合作不仅应当结束战争，而且应当结束阶级斗争。

在中国的实际条件下，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利用外国资本来开发自然资源的情况下，不管说了多少社会主义开发方式的空话，像孙所说的那种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合作，都不能不导致对国家更为凶恶和残暴的剥削。当然，结果是彻底的政治奴役。孙所说的社会主义原则和消除官员受贿的主张（他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在华合作的必要条件），由于缺乏有组织的全国力量^①，当然不可能有任何意义。如果孙能够仿照美国人在巴黎成立银行团的方式也建立一个财团，那么实际上一切都仍然会变成把中国划分成势力范围。但是孙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以中国人民的名义邀请列强开发中国的资源。孙在他书中的另一处还说：

“中国因工业进步之迟缓，这是一种潜在的福祉，中国尚未进入阶级战争之中。我国之所谓工人者，通称为苦力，日复一日地生活着。因此特别欢迎任何资本家哪怕开设一个‘血汗工场’来剥削它。在中国资本家特别少有；而且仅仅出现在通商口岸。”^②

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时，孙从来没有放弃寻求同帝国主义列强的妥协。这可以从上面提到的他同美国大使舒尔曼的谈话中得到证明。在谈话中他明确地邀请美国人干预中国事务，并同中国人民一起解决民族问题。从本文件所附的材料中可以找到足够的根据证明，国民党迄今为止始终没有想不通过同那些把中国保持在半殖民地地位的列强的合作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在国民党以往的所有思想和活动中，找不到一个必须同帝国主义进行无情

^① 在苏联有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这种有组织的力量，即使这样我们还非常担心帝国主义开发我们的自然资源，我们还说要三思而后行。中国没有这样的力量，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不可避免地要变成比现在还大得多的掠夺（鲍罗廷注）。

^② 孙逸仙，《中国的国际发展》，第234页。

斗争的认真表示，找不到一个能够证明国民党真正希望把这种斗争进行到底的举动。

孙和实际生活中的帝国主义

尽管孙总是不去寻求同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是寻求同帝国主义的妥协，但帝国主义还是没有去迎合他，也不可能去迎合他。这是因为，首先帝国主义不相信他。美国人对孙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与日本人调情。特别是他与他在德国的代表的通信^①（见附件×）^②于1922年公布以后，他们更加确信这一点。从这些信件中可以清楚看出，他正在为促成日本、俄国和德国的同盟而工作。但日本人不相信他，因为他同美国人调情，这一点从他同美国大使舒尔曼的谈话中（见附件×）^③特别能看出来。

而英国人关心的只是把他控制在广州，但不扩大他的势力：广州越弱，香港就越强大。广州不明朗和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可以使经济重心转移到香港。广州现在连自己的货币都没有。财政实际上已转移到上海——香港银行团之手。英国在中国沿海的利益是巨大的。几百艘英国轮船在从事沿海贸易（而美国的轮船却在香港港湾里锈蚀）。所有沿海贸易都经过香港，香港渐渐使广州丧失了作为广东和相邻各省分配中心和金融中心的作用，而成了最大的中心。

另一方面，香港有20万中国工人，如果组织得很好，他们就能够使这个中心的活动陷于瘫痪。在香港的英国人还担心孙对这些工人的影响（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孙未必能够在他们当中发动罢工或抗议行动。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

^① 指同孙逸仙驻德国的代表朱和中将军的通信。1922年6月陈炯明政变时，部分信件被缴获并在香港报纸上公布。

^{②③} 号码缺，附件没有找到。

对英国人来说没有比在广州有一个像孙这样的“幻想家”政权更有利的了。英国人只要从香港给陈炯明的军队几门大炮和一些机关枪就能够在一周之内把它彻底摧毁。但是陈炯明对他们是不利的，因为他是一个有头脑的政治家，他既没有提出广泛的全国性的计划，也没有打算采取任何反对曹锟的“北伐”行动，他很可能要把自己朝思暮想的理想付诸实现，这个理想就是使广东成为一个模范省，加强它的经济，巩固它的财政并使之重新成为南方各省的经济中心，进而与香港竞争。无论是孙，还是他的亲信都没有认识到英国人的真实目的，而认为是对他的“友好感情”在支配着他们。

无论如何，谈论美国人、日本人或英国人迎合孙的任何实际步骤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相反，尽管孙过去曾保证说他准备祈求美国的民主、英国的友谊，尽管他的某个“朋友”可能进入日本内阁，但是等待着他的仍然是失望（见孙给日本大臣的信）^①。

然而也不能忽视这样一点，列强不去迎合孙不仅是因为它们当中谁都没有把他当作自己的人，而且还因为所有国家，现在，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以后，都不能不把他视为自己在中国的统治的可能威胁。孙在中国较激进人士中的威信开始明显增强。此外，拥护他的还有从前曾发动反对专制统治起义的革命者。如果说在这些人士当中有很多人仍然认为他是一个“幻想家”，那么他们还应该承认，他正在成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正在用更多的精力组织自己的党，而不是策划虚幻的军事讨伐或全面联合行动。孙可能成为国内最强大的国民革命力量，他对帝国主义的客观威胁也就在于此。现在，他们害怕他正是基于这种看法，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即使不去也不能去迎合他，但也不会同他彻底决裂。

* * *

^① 看来是指孙逸仙1923年11月16日给他流亡时的老相识日本政治家犬养毅的信（见《孙逸仙选集》俄文版第312—318页）。

2月初,孙从他(在上海)的代表叶楚伦那里得到关于张作霖、段祺瑞和卢永祥在吴佩孚可能给予支持的情况下为了夺取北京政权要组成一个日本式同盟的消息(据孙的情报,段在北京当政时欠日本人的债2.8万^①)。在这之前,满洲督军和安福派的同盟也包括孙在内。可是现在看来日本已把他作为转向俄国和革命方面的“叛徒”而开除了。毫无疑问,导致这一结果也有孙同舒尔曼的谈话的原因,对这次谈话,日本人当然不会喜欢。要知道孙邀请美国人,而不是日本人来干预中国事务。这样一来孙押在日本身上的赌注就输了,其实孙恰恰是面向日本的,他支持日本、俄国和德国组成同盟。

由于孙得到了关于在中国要组成新的日本式同盟的消息,他同我谈了我们从法律上承认他的政府的问题。我问他,那时日本会如何对待他,是否会唆使上述同盟反对他,是否会在广州彻底镇压他。他这样回答说,无庸置疑,他对日本的指望是完全相反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使他非常失望(看来,他确实期待日本对他的是另一种态度)。日本把孙从新的同盟中开除了出去,它对孙的这种态度使孙如此不安,以致他吼道:“我要去日本,在那里我会搞清楚,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现在孙比任何时候都明白,他本人已经陷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之中;由于他实行忽而讨好这个列强,忽而讨好另一个列强的政策,他只能成为他们手中的工具。他帮助了日本人,没有让抵制运动波及南方的中心——广东省,但他没有换得任何实际的东西;为了掩饰美国人的武装干涉阴谋,他把自己的威信交给了他们,换得的是设法把关税的余额交给他用于“改善内河航道”的空洞许诺;为了英国人的“友谊”,他把广东等省的整个经济生活都奉献给了他们,而作为这种“友谊”的体现是他们能在

^① 单位不详。

广州把他杀掉，但他们不这样做（上面已经指出，他们究竟为什么不这样做）。

孙和俄国^①

孙同意为国民党制订的革命纲领，迎合了我们，但是不同意公开说将同我们建立统一战线。为此他对我们还不完全信任。如果在得到英国承认我们的消息^②时提出统一战线的问题，他可能不会反对这一点。他不相信承认来得这样快。从他对我们的态度角度来说，他在这里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如果说在张作霖看来我们在中国的政策只不过是希望收回中东铁路和保持住蒙古，那么孙对我们在中国的目的就不很清楚。在最好的情况下他能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而且他能谈论与我们的友谊，但同时又同美国或日本调情，或者唆使一个去反对另一个——为什么我们也不这样干呢？顺便提一句，从他就英国承认苏联一事向我提出的问题中可以看出，他正是这样考虑的。他很想知道，这种承认将会对我们的政策发生什么影响。无疑，他认为自英国承认我们之时起，似乎我们的所有目的都达到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就这件事作出任何高兴表示，相反他却感到遗憾。也许他觉得，由于苏联被承认他失去了一个患难兄弟而更感到自己孤独了。

所有这些都证明，孙对我们东方的真实目的的认识还很模糊。当我注意到他的思维方式，对他说，列宁关于如何对待被压迫民族的遗训对我们来说无论如何都不能违背时，我对他说了一些他还不完全理解的东西，恐怕在一些事实，一些明显的事实证实我们的话是正确的之前，他未必能够理解。

① 原文如此，此时应称为苏联——译者。

② 大概是指英国1924年2月1日从法律上正式承认苏联。

* * *

为了对孙作出评价还必须指出，在他身上，就像在一滴水上一样，反映了国民党——从共产主义者到新加坡商人的斑斓色彩。孙是个共产主义者，是国民党左派，是国民党中央派，又是国民党右派。有时他的言辞极端革命，比我们共产党人还革命；有时他又忘记了所有革命词藻而成了小资产阶级的庸人。他忽而激烈抨击帝国主义者，忽而又对美国大使舒尔曼说，美国人应当干预中国事务，从而背叛了自己国家的真正民族利益。只要举出一件事就足以说明问题：有个人为了使他完全忘记帝国主义给他造成的种种实际教训，曾经开玩笑地表示同意他的主义，这个人在进入帝国主义国家的某届内阁以后，开始给孙写信说明这位大臣的国家在中国的伟大使命，于是孙就把自己的整个计划建立在这个虚构的使命基础之上（见孙给一位日本大臣的信）^①。

他忽而致电俄罗斯，指出代表大会是在列宁学说的影响下召开的，忽而他又向麦克唐纳作出这种献媚的保证：协约国应当像他们恢复土耳其（！）的主权一样恢复中国的主权。他忽而向蒙古人（例如向蒙古党主席丹增）声明，国民党将纠正满洲人干出的各种不公正的事情，也就是说，国民党将赋予少数民族以自决权，忽而又向同一个麦克唐纳夸耀中国的历史是东方的导师和征服者的历史。他忽而完全同意国民党同工农群众建立联系，在纲领中保证支持他们的经济组织，忽而又反对就野蛮杀害稻米生产工人领袖的问题作出决议。广东省公安局长对我说，在这次凶杀事件前一两天，鉴于稻米工人的罢工可能导致米价暴涨，曾下达逮捕这位被害人的命令^②。

在孙的身上充满了对中国国民运动最有害的矛盾，要摆脱这

^① 指孙逸仙1923年11月16日给日本政治家犬养毅的信。

^② 孙在广州重新执政时，这位被害的工人正在监狱里，被判处20年徒刑，孙赦免了他——鲍罗廷注。

些矛盾对他来说极为困难。在这方面，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中国所充满的那些矛盾的反映。

如果有人问，这样一个人怎么能成为党的领袖呢？党，不存在。国民党，存在。迄今为止他能够成为国民党的领袖，正是因为他对国民党人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没有任何要求。正是因为他把这个简单的公式——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用到这个最色彩斑斓、最五花八门的国民党身上，让他们每个人随便去加以理解。

由此似乎应该得出，现在还不可能存在一个由我所碰到的、并且还在了解的同一个人孙领导的真正革命的、团结的和有纪律的国民党。但与此同时，我不能设想国民党的改组可以没有孙。需要利用他的左倾，利用他的威信，利用他建党的愿望，以便号召国内现有的真正革命分子投入实际生活，把他们无条件地团结在国民党左派的周围，那时孙就必须同以前组织上的混乱和思想上的涣散一刀两断，并完全投入真正的国民革命运动，或者他销声匿迹。

迄今为止，我对孙的态度正是从加强国民党左派的角度和为了国民革命运动而拯救孙的角度出发的，同时也为了加强国民党自身的左派倾向。为此我在各种场合强调指出了他过去那些相互矛盾的和完全不恰当的斗争方法的破产，同时又向他说明了新的斗争方法、新的方针的前途。

到现在为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义革命者孙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中拯救出来还很难说。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

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根本不需要谈代表大会的什么筹备工作，因为没有做筹备工作，也不可能做。如果我们不知道^①同什么党打交道，这个党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它的组成情况、它在各地的实际工作表现是什么，这时才能做准备工作。当然，在召开代表大会之前，可以在地方做些调查研究，但为此则需要至少花费两年时间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在辽阔的中国领土上奔波。只局限在几个城市是很不够的，因为在国民党的活动方面没有那样典型的一个或几个中心，根据这些中心可以判断它在全国的工作情况。我去过沈阳、北京和广州之后就确信了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地方上未做扎实的筹备工作，召开代表大会也是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改组国民党的唯一方法。

但是不能说，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没有做任何筹备工作。这种工作做了，并且毫无疑问具有很大意义。在广州和上海这两个大城市，主要是在国民党领导人当中，改组工作早在代表大会之前两个月就开始了；对代表大会的任务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争论。在另外几个城市除了散发一些书籍之外还派去代表，负责解释改组的必要性和代表大会的任务。在这方面，共产党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它向各地发了与改组和代表大会有关的指示。但是，我再说一遍，所做的这一切，不能认为是各地的令人满意的筹备工作。

(1) 国民党能否真正成为一个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政党？

(2) 它能否通过能使它成为这样一个党的纲领和章程？

(3) 换句话说，国民党能否经受住根据以劳动群众为基础的明确纲领和建立在党的纪律之上的章程所进行的彻底改组？

^① 原文如此，按意思应是：只有在我们知道……。

（4）能否在国民党内找到使它走上群众性国民革命运动道路的领导人？

这就是代表大会应该回答的一些问题，它的主要意义也应在于此。

（I）国民党的派别、思想及其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①

国民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是一片混乱，因此它不可能给帝国主义和军阀以任何反击。它在代表大会上的代表可以分为右派、左派以及一些小的中间派别，下面我们来谈一下：

右派首先是一些来自侨民组织的代表。

他们同真正的国民革命运动毫无共同之处，不但没有帮助它，反而把它越来越拖入无底深渊。这个派别主要是以这样一部分中国人为基础，这些人实际上断绝了同自己祖国的联系，定居在另外一些国家，那里的商业活动安定，同自己在本国内的情况相比他们有可能被看作是资本家。他们关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多半是着眼于这一运动对他们在古巴、旧金山、新加坡、暹罗、印度等地的安定生活有什么影响。他们不仅不帮助这个运动，而且是它的公开敌人。

其实，不只是从对中国本土运动的财政支援角度来看，更主要的是从聚集了大量中国人的殖民地对帝国主义的削弱角度来看，侨居国外的国民党人都具有很大的作用。在这些殖民地，中国人处在非人的生活条件之下，因此他们准备接受同帝国主义进行实际斗争的口号。因此谁也不会更多地和更好地去同情他们自己的国家与同一帝国主义的斗争。

上面指出的从国外前来参加代表大会的反动代表中，也来了一少部分人，他们代表的正是这些群众。他们同右派代表之间已

^① 见鲍罗廷同志在1月18日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报告——鲍罗廷注。

经在行动纲领的一些基本条款上，特别是在关于租界（治外法权）的条款上和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其它标志上出现了分歧。前者准备接受一个同帝国主义进行不妥协斗争的纲领，后者则表示反对，理由是他们的组织会被宣布为布尔什维克式的，对他们的迫害会接踵而至，不然就把他们完全驱逐出殖民地。

另一个派别除了少数人外都可以列入右派，对这个派别大致可以作这样的评述。曾有一批年轻的中国人，他们或居国外，或住国内，充满某种革命愿望，参加过1911年的革命运动，并加入了国民党。但是，他们没有留在这个运动中并把它进行到底，他们对它感到失望而转向敌人方面，同时他们在口头上仍然同运动在一起，而在实际上恰恰是在做有悖于国民革命运动的目的和任务的工作。

这部分人主要是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知识分子的这个阶层反映了中国的经济状况。在这个国家，由于缺少工业，因而缺少能够向这些知识分子提供工作的本地资产阶级，所以没有大量利用知识分子的劳动。他们常常不得不为那些在中国取代了当地资产阶级的英国人或美国人效劳。

他们不得不采用各种办法去谋求生计，甚至为此不得不时而讨好国民革命运动，时而讨好帝国主义。这些知识分子要比那些曾脱离革命，但当革命变得多少顺利、政权机构已经稳固的时候又回过头来向它认罪的俄国知识分子狡猾得多。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俄国的知识分子相反，他们不脱离革命，而是留在革命之中，他们在革命和帝国主义之间摇摆不定，进而葬送革命，所以现在仍然是国民革命运动复兴的绊脚石。这些人仍打着国民党的幌子进行活动，当这样做有利的时候，他们就利用国民党的名义，当然是为着自己的私利，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不是一个拥有某种组织机构能够把他们清除出去的党。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利用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有深厚根基的党的好名声去进行讹诈。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国民党左派。

帝国主义不仅束缚了中国国内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而且也毒化了最真诚、最著名和最忠实于民族事业的人的心灵。

这些人正在重复威尔逊民主政治的所有胡言乱语，他们提出的那些似乎是新的、而实际上是在欧洲和美洲早已过时了的和被人遗忘了的观点不知是哪里来的。这个派别与日本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是，他们只是从欧洲人和美国人那里借用一些掩盖帝国主义掠夺性目的的空泛词藻。日本人抛弃了这些空话，把它们作为对自己无用的破烂丢掉，仅取有助于他们打击同一些欧洲人和美国人的东西。

中国的知识分子脚登孔德和康德的旧靴子，身穿威尔逊主义的破衣衫回到了祖国，代表大会前不久，一位从巴黎回来的国民党要人，不知为什么还随身带来了罗伯斯庇尔的美学、美神和其它一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把它们当作拯救中国的最后手段。而这是在一个连马匹都没有，不得不用人背着到各地去周游的国家！

这个派别对中国国民运动的态度毫无疑问是真诚的，然而在思想上也是十分混乱的。在这个派别中有这样一些民族主义者，只要他们了解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了解所谓民主的真正内涵，了解帝国主义的含义，那么由于革命运动的发展，由于国民党的改组，他们就能够充满新的革命热情。这个派别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社会政治理论基础之上的，只要能为这种理论的表述加上更明确、更具体的意思，对国民革命运动来说，它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顺便说一句，这也就是将要向本次代表大会提交宣言的那个起草委员会的主要工作。

再谈谈一个由某些保守人物和一些年事已高的老人组成的派别。整个成分是纯粹的中国现象，它由中国意义上的学究组成，这些学究承认年长者有威信。简言之，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老的好，新的不好。

这些人物至今还保留在国民党内，因为除了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的漂亮话外，国民党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东西。

在国民党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初期，委员会面临一个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的问题，这就是孙提出来的全国政府或建设性政府的问题。据廖^①说，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英国外交使团在发生海关冲突时，强烈要求只同作为地方性的、而不是全国性的广州政府建立某种直接接触引起的。把孙的政府称作“地方性的”，这件事令他勃然大怒，从那以后他就决定把自己的政府改组为全国政府，甚至不顾没有张作霖和安福系^②的支持。这时正赶上召开代表大会，于是孙决定通过代表大会履行宣布改组为全国政府的程序。

自然，孙的这种作法会断送召开代表大会的宗旨。代表大会的召开根本不是为了使孙成为中国的总统，而是为了通过国民党的行动纲领，为了改组党。无论如何需要防止采取这一可能导致党毁灭的步骤。

为了避免这一危险，鲍罗廷同志决定在委员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并争取它同意不宣布广州政府为什么政府而只同意提出党要为之进行宣传的口号。只有作出这种抉择，才能够改变孙原先的决定。鲍罗廷同志不能在委员会上公开说，如果委员会不接受这个口号，那么孙就会宣布广州政府为全国政府；也不能公开说，为了取消孙的决定需要这个口号。如果传到孙那里，就会前功尽弃。这就是鲍罗廷同志在委员会里的口号之争^③。

委员会清楚地意识到，党还没有那么巩固，还不具有那种客观的形势以致能提出自己为全国政府，委员会的成员们很长时间

① 即廖仲恺。

② 阻止孙走这一步的原因之一，即便不是主要的原因，恰恰是他完全失去了张作霖和安福系的支持，而不是党内的意见——鲍罗廷注。

③ 见资料：《关于建设性（全国性）政府问题的讨论》——鲍罗廷注。

不能理解提出口号与实际宣布为什么政府之间的区别。他们认为，既然他们提出了口号，那么接下来就应该是成立政府，而不是只把它当作宣传手段。最后，在经过一系列冗长的论证和解释之后，鲍罗廷同志才使委员会相信有必要抛弃全国政府的口号。第二天，廖和汪精卫来找鲍罗廷同志，请他亲自试试，劝孙不要宣布自己的政府为全国政府，因为孙没有听信他们提出的理由。

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鲍罗廷同志就此问题同孙进行了一次很严肃的长时间的谈话，最后孙同意取消自己的决定，只限于由代表大会表示赞成有必要成立全国政府，并指示党在群众中进行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支持全国政府的口号。

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主要困难是让委员会成员相信有必要就议事日程上的每个问题作出决议。中文里连决议这个词都没有。他们根本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个人就某个问题提出报告，代表大会满意，这就意味着全体同意了。何必还要写成什么决议呢？国民党从未开过代表大会。国民党人有时在广州聚会，特别是当他们从国外回祖国作客的时候。他们集聚在公园里，边喝矿泉水、茶水，边听讲演。

经过长时间的解释，他们总算明白了并同意作出决议。于是开始着手制订议事日程。

这里还需要鲍罗廷同志作出许多努力来向委员会说明宣言和纲领之间的区别，因为委员会坚持认为，既然有宣言，为什么还要有党纲。

鲍罗廷同志对他们说，今天的宣言是这个样子，过了一年，也许就需要作某些修改。而纲领要用相当长的时间，要考虑到党的最终目的。他向他们提议，不是现在就制订纲领，而是要委托中央委员会为下一次代表大会制订。

委员会的许多委员说，大家对我们党的纲领都很清楚，还有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说什么可以通过一个宣言，然后附上老的

纲领，也就是说他们提议通过一个只有一些标题的纲领。

最后决定，对时局发表一个宣言，而纲领问题交给中央即将成立的委员会。

在现时的工作程序中也有必要说明，什么是代表大会的主席团，它有什么用，因为在中国人的会议上从未设过这种主席团。最后主席团也被接受了。

中央委员会确定中央委员人数为 25 人，候补委员为 16 人。按城市作如下分配：广州：委员 9 人，候补委员 5 人；北京：委员 3 人，候补委员 3 人；上海：委员 5 人，候补委员 3 人；汉口：委员 3 人，候补委员 1 人；哈尔滨：委员 1 人，候补委员 1 人；四川：委员 4 人，候补委员 3 人。中央委员会设在广州，在其它 5 个城市设局。

资格审查委员会的问题也提出来了，该委员会也像其它许多问题一样，委员们长时间不能理解，即使理解了也不能付诸实施，在代表大会上就未设资格审查委员会。

宣言的起草工作将在专门一章《为宣言而斗争》中作出分析。

（Ⅱ）共产党在国民党改组中的作用^①

1924 年 1 月 1 日在上海举行的共产党和青年团联席会议上鲍罗廷同志作了报告，他指出：

“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使国民党的工作面向群众，面向人民，使国民党把国民革命运动真正建立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事实是，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国民党已开始改组，在举行会议，发行报纸，等等。

至于我们对国民党的总的态度，可以从共产国际关于支援民

^① 见 1924 年 1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联席会议；鲍罗廷同志与谭平山的谈话；鲍罗廷同志 1924 年 1 月 18 日在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报告——鲍罗廷注。

族革命运动的决议中，特别是从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的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相一致的提纲^①中很清楚地看出。我想我的作用是：“帮助共产党和青年团实施它们自己在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这些决议是同共产国际总的决议相一致的。广州的经验百分之百地证明，这些决议完全可以付诸实施，可以组织国民革命运动，使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有自己的同志，他们同自己相应的机构保持联系并在当地国民党组织中贯彻它们的决议，从而不仅不会削弱自己的党，而且会使它变得越来越强大。”

鲍罗廷同志接着在报告中指出，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缺乏密切的联系，这当然是不应该的。

陈独秀同志在报告中说，虽然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帮助国民党的发展，以及整个国民运动的发展，但是，几个月来党在这方面无所作为，这是因为：

- (1) 中国共产党内对此有分歧；
- (2) 国民党本身没有任何前进的动力。

过了一些时候，党内的分歧消除了，到11月底，当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②召开时，决定根据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行动，并通过了关于具体参加运动和参加国民党改组的决议。此外还决定：

- (1) 尚未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应该立即加入；
- (2) 只要有可能全体党员就要在各地帮助国民党的发展；
- (3) 会议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认为共产党是它内部的一个不合法的支部；
- (4) 会议指出，全体同志尽管应该在国民党内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取领导权，但必须通过合情合理的途径，不得暴露自己的意图。

^① 指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见第98号文件）。

^② 指1924年11月24—25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全会（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83—208页）。

会议还决定，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仅要帮助国民党的发展，而且还要帮助全国的各种社会组织。做这些工作的目的是为国民运动，为扩大国民党的影响寻找一个共同的基础。

陈独秀同志说，配合国民党的改组，中央向地方组织发出了呼吁书，建议全体同志协助国民党改组，在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要派我们的同志去建立支部。在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我们的同志应该成立联合委员会，联合委员会成立后，他们应该在国民党内有组织地进行工作。这个呼吁书还建议我们的同志参加选举的筹备工作，说共产党人应当同国民党人一道工作，但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老的国民党员身上，因为他们是党的官僚，是他们把一些有组织能力和各种政客派往各地。必须同他们作斗争。

会议结束前鲍罗廷同志建议就谈到的问题作出几项决议。

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 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联席会议在听取了鲍罗廷同志和陈独秀同志关于国民党改组工作的报告后，认为工作进行得正确；

(2) 共产党员在加入国民党以后应该反对老国民党人对国民革命运动的错误理解；

(3) 共产党员不应该在各种委员会中谋求职位；

(4) 关于宣言问题，全体共产党员代表应当捍卫它的所有条款。在组织问题上，不应用章程来束缚代表。在各省，必须选举左派作为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

* * *

共产党人在广州的工作情况可以从鲍罗廷同志与谭平山同志1924年1月10日的谈话中看出。

谭平山同志指出：“至于我们的工作，随着国民党分支机构的增加，我们的影响也在增大。但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

(1) 分支机构已经有60多个，但是我们的同志却没有增加。

(2) 原有的宣传委员会已经撤消，因此许多从前拿薪水的同志现在无事可干，如果需要他们做党的工作，就必须在物质上帮助他们，否则他们将无法养活自己。(3) 由于建立了这么多的分支机构，现在我们的同志就在各委员会中工作；我们做群众工作的人越来越少。我们同工人群众失去了某种直接的联系，因为忙于委员会工作的同志不可能腾出时间去做群众工作。”

现在共产党员在5个区委会和13个分支机构中有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在每5个人中就有两个共产党员和两个老国民党员，而第5个人既不属于共产党也不属于国民党；好像是他们之间的一种平衡力量。做工作的共产党员总计有30人，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胜任工作。所以他们不可能向如此分散的所有分支机构派去自己的人，并开始在自己之外打基础。他们首先同学生联合会接近并开始从他们当中选拔干部，预期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有500名会员，因为该联合会是以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核心，所以共产党人指望联合会发展后将完全从属于他们。

然后共产党人组织了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协会，只选拔年轻的工人并在他们中进行宣传，要把他们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从他们中间锻炼干部。

后来共产党人给自己提出一项任务，要在地方上先为国民党奠定基础后成立国民党。为此他们在广州组织一些当地的同志，这些人又吸引自己的同乡参加，然后组成一些小组，把它们派往各地。

对于在国民党内的的工作，共产党员是积极的，也是满意的。当前的工作教育了他们，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一些老国民党员还像旧议员那样行事，在选举时，他们抓住偶然落入他们手中的人，让他们来选自己，共产党员则拒绝当候选人，大家都选孙为代表，他们在选票上只写“孙逸仙”，别的什么都不写。尽管他们很容易做到了让所有的工人和与他们有关的

组织立即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的人数增加到1万多，但是共产党员还是果断地决定在对待席位的问题上执行自己的方针，以便不给如此热衷于保护每个席位的国民党右派提供说闲话的任何借口。

1月18日共产党党团会议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国民党代表大会和在该党中的工作的方针。在这次会议上，鲍罗廷同志在报告中描述了国民党中的各个派别，说明了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任务。鲍罗廷同志说，首先我们应该争取把国民党造就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政党，成为国民运动的代表。必须警惕右派，必须同他们进行斗争，不过要进行最终我们能够取得胜利的斗争。同他们必须进行这样的斗争，使之最后不致发生女人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的那种事情。同这个派别的斗争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你们能够加强左派，是因为你们在加强左派的同时能够巩固国民革命党并使之具有战斗力，能够领导国民运动并达到目的。同右派的斗争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我们从而可以使国民党摆脱那些把它拖入深渊而不是推动它走上革命斗争道路的人。

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应该是旨在巩固左派，尽可能使它更明朗，用自己的榜样推动它始终向前进。我们应当在组织上把国民党扶植起来，帮助它制订党的纪律。随着同反动派斗争的胜利（加强左派的结果），国民党也将越来越巩固。至于孙，眼下他还没有感觉到在强大的左派中有基础，迄今还不能指望他同右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代表大会以后的孙逸仙和国民党

孙现在倾向于左派，因为他很清楚，党内老的右翼分子未必能给国民党这具僵尸带来新生，但同时他又不能断绝同右派已有20年之久的联系。到现在为止这些人从来没有反对过他，相反，在

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把他视为自己的领袖。这是因为孙在其整个革命生涯中，从来没有赋予他被认为是其发明人的那些主义以明确的意义。他也从来没有试图从这些主义中得出任何现实的结论。在他的纲领和讲演中，他只抽象地谈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像是谈论未来人类社会中的平等王国一样。一个人可以被认为是国民党员，是孙的信徒，而同时又可以在新加坡、旧金山或古巴作生意，可以向海外的中国国民党群众募集小钱，而不致引起他们居住国帝国主义当局的任何追究或非难。他们也可以住在中国，拥有一块好地，经营生意或在国民党机构中拥有一个职位，而没有丝毫义务为与孙的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的思想原则做工作。所以没有任何理由会使右派和孙之间产生什么分歧或误会。

右派在代表大会上也没有给孙提供任何借口去反对他们。他们只是在自己的私下聚会上才敢于反对左派，但同时他们的举止又要表现出对孙的忠诚。

虽然孙知道没有左派国民党的改组是不可能的，但他还不打算同右派断绝关系。国民党的行动纲领作出了把国民党的主义具体化的第一次尝试，在纲领问题上（除了关于没收土地和与苏联建立统一战线的两条外），孙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只是由于孙才得以实行一个相当不错的国民革命行动纲领。

在组织问题上，即在关于由谁来主宰全党的命运和对它进行实际改组的问题上，孙虽然吸收几个左派进入中央，但他支持右派和中派。我们认为，不能在纲领和组织问题上划分党员的立场。但在国民党中这却是可能的，因为无论是孙还是其他领袖，甚至是左派领袖，都没有认识到，每一个作为中央委员还是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国民党右派在被责成执行党的路线时都会使党的路线化为乌有。孙还没有认识到，一派通过一个不错的行动纲领，而另一派授权国民党老朽去实施这个纲领。好在党内有足够的左派，他

们能够把这个行动纲领当作一个基础，并根据它来建设未来的国民党。但是这些左派不能长期与右派共事，分裂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

斗争已经开始，是由右派挑起的。代表大会之后，他们第一次进攻遭到了失败。但是不应忘记，他们只是在广州遭到了失败，那里有中央委员会和孙把左派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很难预料在孙逸仙不在的省将会怎么样。那里的右派未必会轻易地交出自己的地盘，特别是在国外，那里连当局也在为他们效劳，因为他们正在同国民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作斗争。

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失败的情况值得作出更详细的说明，从评述国民党内情况的角度来看，这是极其重要的。

2月16日有4位老国民党党员被送交中央委员会裁决，他们被指控企图在党内组织小集团同左的倾向，主要是同共产党人作斗争。作为辩解，他们需要证明自己与这件事无关。他们是怎样证明自己的“无关”呢？一个说，他非常偶然地参加了小团体的成立会议，随随便便就进去了，对那里发生的事也没有提出怀疑。另一个说，他们打算向孙报告会议的结果。一个表示不理解这种情况：共产党人甚至可以有自己的党，“而我们这些忠于孙的老国民党党员，连开会都不行”，等等。另一个站在孙面前，就像一个战士站在军事法庭面前一样，张着嘴，什么也说不出来。话卡在嗓子眼里，脸在抽搐，脸色发青。

他们都否认自己有在国民党内组织什么“破坏性”小集团的想法。但右派终究不能否认企图组织起来的事实。诚然，在孙面前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足够的勇气说他们根本不同意国民党的新政策。可是那些广州以外的国民党人却不是这样的胆小鬼。他们将会同左派进行斗争。这是毫无疑问的。

现在不断有关于组织新国民党的传闻，如果这是真的，右派一旦发现对自己有利，肯定会参加。在新党中会出现陈炯明、云

南省督军唐继尧等名字。从国民党清除老朽的角度来看，组织一个新党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它不仅将在国民党内部推行更加明确的路线，而且将推动孙向左转，并迫使他更加果断地去致力于自己党的改组工作。

鲍罗廷在有孙参加的委员会上所作的声明

中央委员会提出的行动纲领^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1911年革命失败的原因和这次失败以后直至目前的中国局势，并对来自各个党派和团体关于如何摆脱这种局面的建议作出了应有的评述。

第二部分对国民党的主义作出了解释，必须依据这些主义来制订党的纲领。但在制订出党的纲领并提交下次代表大会之前，行动纲领的第二部分简略地说明了中国的各个阶级，以及各少数民族可以期待从国民党的胜利中得到什么。第二部分并不完全符合我们对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理解，但是正如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向您说的那样，应该考虑实际情况。国民党对这些主义的理解还不能达到我们的水平。因此尽管我在委员会上说出了对这些主义的看法，但我仍力求达成一致意见，当然始终在争取尽可能多的一致。第二部分是经长时间热烈讨论之后取得一致意见的结果。但是有四条不能说我们取得了一致意见，需要中央对这四条作出某种决定。

1. 关于少数民族问题

委员会就国民党根据其关于中华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实行自决的声明争取同这些少数民族实现友好互谅的问题达成了共识。但在关于国民党是否应该立即同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组织上的联

^① 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

系，或者随着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进展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再建立这种联系的问题上，开始出现分歧。

我完全同意该行动纲领中就少数民族有理由对国民党的声明暂时持怀疑态度的问题所作的声明。迄今为止，蒙古人民革命党对国民党的著作、声明，而主要是对其活动，不能完全信任。我想，我可以完全开诚布公地向你们说说这个问题，而不怕唤起你们某些人中还存在的陈腐的帝国主义情绪，更不怕伤害你们党的爱国主义情感，因为在我看来，我在中国逗留期间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已经表明了我对国民党的忠诚。应该说真话。难道所有国民党人的活动能够让蒙古人或者西藏人相信，他们的命运问题会由这些国民党人作出公正的解决吗？至于党的整个活动，你们已经公开地进行了批评，现在你们正竭尽全力改组党，以便将来消除组织上和思想上的一切混乱和分歧，而这种混乱和分歧不仅会使党失去少数民族的信任，而且也会失去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信任。

现在你们以党的名义发表了历史性声明，明确指出国民党坚持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少数民族在统一的中华民国境内实行自决的观点。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也可能是最决定性的一步。但是仅仅一个声明是不够的，还要等着瞧国民党在实际上如何表现，它怎样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在同少数民族实现友好互谅方面它将采取什么立场。

如果根据该行动纲领成立一个得到广大人民群众信赖的全国政府，当然那完全是另一回事，那时可以谈同少数民族的组织联系问题，甚至也可以谈合作问题。蒙古人也会同这样的政府商谈互相配合问题。当然，我是根据我所掌握的有关蒙古革命运动的材料讲这个话的。如果成立这样一个全国政府，它就可以准确地弄清这个问题。但是现在谈的是国民党的问题，我建议初期只限于我在这个行动纲领中作出的表述。

相反，汪精卫同志对这一条的表述虽然带有点外交辞令，但鉴于他完全掩盖了问题，对于党的行动纲领来说是很不合适的。汪精卫同志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任何一种观点，这是他的权力。但我需要的是明确的表述。他则说：“或许某些少数民族表示不信任……”

不能这样写党的历史文件。我们必须知道，少数民族到底对我们信任还是不信任？你们必须确定这一点。如果你们还不准备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们自己还不知道少数民族对你们的态度怎样，因而还不能表达这样或那样的意见的话，那么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等到把问题彻底查清的时候再说。

“某些”的表达也是一样，是很不明确的。你们认为究竟有哪些少数民族相信国民党的声明呢？相反，从行动纲领关于少数民族的这一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这就是少数民族只能看到老帝国主义的复活，这更使他们有理由怀疑一些党派的声明。因为这些党派实际上没有说明自己不同意这种复活的帝国主义。我有充分根据证明，这种不信任确实存在，应该加以克服。

汪精卫同志建议立即同少数民族合作，但是这种合作只有在人们相互了解、彼此协调时才有可能，否则任何合作都谈不上。

由此可见，起初，党还没有站稳脚跟，还没有组织好，并且没有能力迫使每个党员根据其声明精神行事，应该只限于寻求同少数民族的友好互谅。行动纲领也是本着这个精神作了明确的说明。

2. 关于土地问题

至于为无地农民和佃农分配土地的问题，委员会完全同意让必胜的国民党所组织的政府把土地分给这些农民。你们因此要对中国人民中的这些阶级承担义务。在承担这种义务的基础上，你们可以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寻求他们的支持。人民中的这些阶级是

否有理由向你们提出下述问题：你们到哪里拿来土地分给农民？

在行动纲领中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尽可能明确的回答，在他们看来，要么是无意的疏忽，要么就是故意掩盖问题。一个具有严肃意向的革命党不能允许出现这类疏忽或者玩弄外交手腕。我建议在行动纲领中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国民党取得胜利后成立的政府，为给无地农民和佃农分配土地，将建立土地储备，由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例如广西反动分子的土地）以及那些不干农活，部分经商，部分担任国家公职，并向农民收取货币地租和实物地租的有产者的土地构成。国家应该在灌溉、从人口稠密地区向人口稀少地区迁徙，以及开垦荒地等等问题上为农民提供帮助。”

这样说，我们就可以给关于我们将为无地农民和佃户分配土地的声明赋予某种意义。这样表述这一条，我们的行动纲领也许不是所有党员都喜欢，但它会被国民党最优秀的分子所乐于接受，并成为我们在群众中广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的基础，也会成为对党员进行某种正确教育的手段。

3. 关于民权主义的来源问题

汪精卫同志在文中说，民权主义是国民党从所谓“先进民主国家”那里学来的，只是你们对它作了补充。例如，对于三权分立原则——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你们又增加了监察和考试。

我认为，孙博士的民权主义同所谓的民主制国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不应该把宪法看作是一种专利，或加以某些改进就成为一项新的专利。孙博士宪法的精神与所谓民主宪法的精神是不同的，就像白昼和黑夜一样。我无需对你们说，任何一部宪法都反映那个社会的经济关系。如果你们想把这些“先进”国家的经济关系移植到中国来，那么你们自然也要把他们的宪法移植到这里来。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有什么样的宪法。

但是凡研究过孙博士的著作和演说的人，都不能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国民党根本不想在中国再现所谓先进民主国家现存的经

济关系。（鲍罗廷宣读选自孙博士著作：《中国的国际发展》中的引文，即前言 1 和 2，第 4 页 1 和 2，第 8 页 1，第 236 页 1，第 237 页 1、2、3）。

因此，我们面临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所谓先进民主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有很大不同。这种制度是以生产国有化为基础，也就是说是以国家社会主义为基础，而另一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因此，孙博士的宪法必然有别于这些国家的宪法，其区别不只是作了某些补充，而是最根本性的。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说，国民党的民权主义原则是我们从所谓先进民主国家那里学来的。我们应该说，这些原则来源于孙博士的整个社会经济理论。我们在行动纲领中也要这么说。

我建议用“国民党的民权主义原则来源于孙博士的社会经济理论”的话来代替“从先进的民主国家那里学来的”这句话。

4. 关于中国工人的勤劳问题

按照汪精卫同志的方案可以得出，因为中国工人以勤劳著称于世，那么作为奖赏就应该改善他们的处境。

对待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革命力量之一的这种态度，不用说是对其的极大侮辱，也是完全错误的，并且暴露出对中国的整个经济背景根本不了解。汪精卫同志从世界和国内剥削者的观点出发，把中国经济的落后看作是一种美德。遗憾的是，他引自孙博士书中第 236 页关于中国工人的声明内容仍然没有被完全理解。孙博士说，中国工人喜欢资本家开设《Sweat Shops》^①来剥削他们，其原因是中国经济落后，根本不是他们天生热爱劳动。

事实是，在中国凡有工业生产的地方，就有工人的集中，对中国工人来说阶级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你们可以想起香港工人的罢工、安源和唐山煤矿的罢工，最后想起粤汉铁路工人的两次

^① 英文，意为“血汗工场”。

大罢工，以及广州和其它城市经常发生的罢工。所有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完全没有必要说中国工人天生热爱劳动。

我建议从文中完全删掉所谓中国工人以勤劳著称于世的提法。

我的所有建议除了关于土地储备的一条外都被采纳了。

共产党党团会议

(1924年)1月18日

出席代表大会的共产党党团全体20人出席。

毛^①：报告了昨天关于分成几个小组，而不是集中在一起出席全体会议的決定。

鲍罗廷：为什么？

毛：因为过去我们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每次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团体在另一个组织中开会的时候，我们的团体都会引起其它团体有组织的反对。因此不应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在讨论每个问题时有特殊的组织形式。

鲍罗廷：我不知道过去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怎样，过去遇到过什么困难，妨碍我们的同志在他们认为需要的时候举行集会。我认为，推测我们的会议会受到国民党领袖们的敌视不见得有什么根据。我不认为，我们需要掩盖国民党中存在着各种派别的事实。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会议：湖北人在开会，湖南人、在国外工作的国民党人在开会——一句话，所有大大小小的团体都开会，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为什么我们不能开会。会有各种其它的代表团到这儿来，例如，我在等待着明天湖南人代表团的到来，我很想结识所有的代表，以便能够看出这次代表大会是个什么样的大

^① 即毛泽东，当时他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会。

至于同志们建议不要经常开会的问题，我只能用纯技术性的情况来加以说明。在代表大会期间，不见得每天都能举行会议，必须学会用委员会的方式进行工作。如果能够召开全体会议，那很好。如果不能，那就要预先商量好由什么样的委员会来领导代表们的工作，同时要强调指出，这样做纯属技术性的原因。我不认为，国民党的领导人，特别是孙博士会不同意某个团体开会并阐明自己对事物的看法。我认为，他甚至会非常高兴这样做。在国民党内从事秘密工作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什么时候禁止，那是另一回事，但眼下还没有禁止。

怎么样，同志们同意成立一个代表所有代表团的委员会，以便更容易和更迅速地贯彻决议吗？

李^①：我建议除了委员会之外，还组织委员会同各独立代表团代表的联席会议。

鲍罗廷：这里有几个独立代表团？

毛：5个

鲍罗廷：我认为，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对此有什么反对意见吗？

瞿秋白：有位代表认为，今天应该讨论共同性问题，随后有几位同志主张，除了党的3名中央委员外，还应邀请团中央的一名委员参加委员会。

鲍罗廷：完全正确。委员会成员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谭平山、毛、李都表示同意。

于^②：不需要召开专门的代表联席会议，但我们要指定委员会的每位委员为一个团体的代表。

瞿秋白：有些同志说，联席会议是技术性的更合适些，因为

① 可能是李大钊，当时他是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

② 可能是于树德。

委员会本身就是各个代表团的联合会。另一些人说，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很忙，不可能跟在每一位代表后面通报其所需要的消息。所以除了这些会议之外，还可以组织专门的联席会议，然后由这些代表向自己的同志通报情况。

鲍罗廷：我支持除了委员会之外还要组织各代表团代表的联席会议的建议。现有5个代表团，就是说有5位代表和一个由3—4人组成的委员会。

要分组，共分4个小组。

鲍罗廷的报告

国民党的代表大会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召开的呢？

无庸置疑，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无论到中国的什么地方，到处我们都可以看到同样一种情景。我不谈是什么使国家陷入这种状态，你们大家都清楚地了解这一点。造成中国目前状况的原因，在宣言的第一部分中已经作了说明，该宣言将由国民党中央提交本次代表大会审议。

帝国主义正在利用由它一手造成的这种无政府状态加紧把经济、政治的桎梏加到中国人民头上。这些桎梏紧紧地束缚着中国的民族经济，并对工商业阶级，小资产阶级，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几乎全国的工人和农民组织要么是完全非法的，要么是由于它们什么事情也不做而容忍它们存在。应该承认，存在工人经济组织，甚至取得发展的唯一地方是广州。

对于把中国的手脚束缚得越来越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奴仆可进行怎样的反抗呢？

国家的实际力量控制在所谓的军阀手中，他们不反抗也不可能反抗帝国主义，原因很简单，他们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的傀儡。这一点你们知道得很清楚。至于国民运动，其中在思想上和组织上

是一片混乱，因此也不可能作出任何反抗。

如果抛开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来分析一下国民运动，那么我们就在其中发现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混乱。不考虑这种情况，没有处理这种混乱的办法，对我们在国民运动面前的任务没有明确的认识，这就意味着我们还继续过着即使不是可悲的，至少也是无益的生活。

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具体地发现了什么，有哪些方面需要指出呢？

首先我们在运动中发现了这样一个派别，他们同真正的国民革命运动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不但没有帮助这个运动，反而像一条在它脚上的镣铐，把它越来越拖入无底深渊。我要说，这个派别主要是以这样一部分中国人为基础，这些人实际上断绝了同自己祖国的联系，定居在另一个国家，那里的商业活动有条不紊，与他们在自己国内的情况相比，他们有可能被看作是资本家。我指的是那些侨居国外的“国民革命家”。我要说，他们关注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多半是着眼于这一运动对他们在古巴、旧金山、新加坡、暹罗、印度等地的安定生活有什么影响。他们不仅不帮助这个运动，而且是它的公开敌人。这就是需要首先指出的一个派别，为了同它作斗争必须制订相应的办法。

其实，不只是从对中国本土运动的财政支援角度来看，更主要的是从聚集了大量中国人的殖民地对帝国主义的削弱角度来看，侨居国外的国民党人都具有很大的作用，你们都知道在这些殖民地，中国人处于非人的生活条件之下，因此他们准备接受同帝国主义进行实际斗争的口号。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在国外的、特别是在殖民地的国民党派别完全是无益的，或者甚至是有害的，那么这仅仅是指资产阶级化了的国民党人或国民党官僚，而无论如何不是指在苦力的经济和法律地位中生活的广大华人群众。谁都不会比他们更理解帝国主

义的真正含义，因此谁也不会更多地和更好地去同情他们自己的国家与同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

今后正是需要在这部分群众中成立“海外”国民党。从下述事实中可以看出这是可能的：在从国外前来参加代表大会的反动代表中，看来有一些人正是代表了这部分群众。他们同右派代表之间已经在行动纲领的一些基本条款上，特别是在租界（治外法权），以及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其他标志上出现了分歧。前者准备接受一个同帝国主义进行不妥协斗争的纲领，后者则表示反对，理由是，他们的组织会被宣布为布尔什维克式的，对他们的迫害会接踵而至，甚至会被完全驱逐出殖民地。在殖民地的国民党群众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并不认为这种迫害以及有可能被驱逐是自己工作的阻力。正是这种情况使我有可能会给孙作出答复，他曾对我抱怨说党在国内的改组给国外的国民党人造成了困难的处境。我对他说，没有什么用的国民党领袖在国外不会受到触动；至于真正的群众领袖，他们会克服各种阻力，而一旦他们真的遭驱逐，那么在中国这里是很需要他们的，并且会受到热烈的欢迎。

因此，在同国外的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时，还需要给左派以极大的注意。

对另一个派别大致可以作出这样评述。曾有一批年轻的中国人，他们或居国外或住国内，充满某种革命的愿望，参加过1911年的革命运动并加入了国民党。但他们没有留在这个运动中并把它进行到底，他们对它感到失望，许多人转到了敌人方面。他们同时又善于像山羊那样保持平衡，口头上留在运动中，实际上恰恰是在做有悖于国民革命运动的目的和任务的工作。

这部分人主要是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我们对他们很了解，我们知道，今天他们玩弄社会主义，而明天就玩弄法西斯主义，今天伪装革命，而明天就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仅用这种做法就可以帮助资产阶级来镇压真正的革命运动。知识分子的这个

阶层反映了中国的经济状况。在这个国家，由于缺少工业，因而就缺少能够向这些知识分子提供工作的本地资产阶级，所以没有大量利用知识分子的劳动。他们常常不得不为那些在中国取代当地资产阶级的英国人或美国人效劳。他们不得不采用各种办法去谋求生计，甚至为此不得不时而讨好国民革命运动，时而讨好帝国主义。这就是我在制订行动纲领委员会里曾提到的那种知识分子，他们比我们那里类似的知识分子要狡猾得多。我们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已经脱离了革命。当革命变得多少顺利、政权机关已经牢固地掌握在我们手里的时候，这部分知识分子就负罪地回到了我们这一边。

中国的知识分子则相反，他们不脱离革命，而是留在革命中，他们在革命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动摇不定，进而葬送革命，所以现在仍然是国民革命运动复兴的绊脚石。

这些人仍打着国民党的幌子进行活动，当这样做有利的时候，他们就利用国民党的名义当然是为着自己的私利，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不是一个拥有某种组织机构能够把他们清洗出去的党。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利用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有深厚根基的党的好名声去进行讹诈。

可以预期，随着党的改组，这部分人或者自行消失，或者找到足够的勇气同帝国主义彻底决裂，重新回到国民革命运动这一边来。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这类腐败分子发生这种变化也完全是可能的。客观地说，不能想象他们会真诚地和自觉地转向帝国主义方面，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缺乏一个有组织的能使他们对胜利充满希望和信心的国民革命运动党。我说，这是完全可能的，但并不意味着在党改组时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指望这些人。这里需要非常的小心和审慎。

我们来看一看值得我们给以特别注意的一个主要派别。从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形势的分析中我们知道，这里不可能不具备国民

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条件。这些客观条件推出了一个派别，这个派别不论从现在开展革命运动的角度，还是从这个运动的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都是极其重要的。让我们看一看它是怎样一个派别。

帝国主义不仅束缚了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而且也毒化了最真诚、最著名和最忠实于民族事业的人的心灵。当我在听取他们的意见时，我问自己，他们提出的那些似乎是新的而实际上是在欧洲和美国早已过时的和被人遗忘了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不止一次地重复着威尔逊民主的所有废话。这个派别的人与日本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是，他们只是从欧洲人和美国人那里抄袭了掩盖帝国主义掠夺性目的的空泛词藻。日本人抛弃了这些空话，把它们作为对自己无用的破烂丢掉，仅取有助于他们打败同一些欧洲人和美国人的东西。中国的知识分子脚登孔德和康德的旧靴子，身穿威尔逊主义的破衣衫回到了祖国，一位不久前从巴黎回来的国民党要人，不知为什么还随身带来了罗伯斯庇尔的美学、美神和其它一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把它们当作拯救中国的最后手段。而这是在一个连马匹都没有，不得不用人背着到各地去周游的国家！

这个派别对中国国民运动的态度毫无疑问是真诚的，然而在思想上也是十分混乱的。这个派别中有这样一些民族主义者，只要我们能够从他们的头脑中清除混乱，只要他们了解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了解所谓民主的真正内涵，了解帝国主义的含义，那么由于国民党改组以后革命运动的发展，他们就会充满新的革命热情，那么我们就有一些我们能与之齐心协力工作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派别对我们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能够从他们当中找到我们真正的同盟者并共同建立国民党的真正核心。我认为这个派别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不觉悟的知识分子的散漫性的反映。需要把这个派别集合起来，搞清楚它，帮助它。

由此可以明确我们的任务，首先要尽可能搞清楚这个派别，尽

可能使这个派别明了自身的任务及其实现方法。这个派别是以这样一种社会政治理论为基础的，只要在这种理论的表述中加进更明确、更具体的内容，那么对于国民革命运动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顺便说一句，宣言起草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任务就在于此，它要向本次代表大会提交宣言草稿。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体上上述派别可以分为两个阵营，即国民革命运动的右派阵营和左派阵营。虽然我们不应当局限于这两个基本的划分，而应该分别考察各个派别并发现其中的中间阶层，但是即使从这两个基本的划分中也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的任务。

我们对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总任务你们是知道的。这些任务一方面来自共产国际，另一方面作为对共产国际决议的更详尽的分析，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我们应当努力发展和加强国民革命运动。我们现在需要贯彻执行这些决议。

至于国民党，正如你们大家都知道的，我们正在努力使国民党真正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领袖，使运动得到真正的发展，向它提供斗争的内容和口号，推动它彻底摆脱各种束缚，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体现，它应该执掌政权。为此首先就必须使国民党成为一个战斗的党，但我们看到，它是我在上面所谈到的那种具有五花八门、纷繁复杂的派别的国民运动的反映。正像在中国的国民运动中有各种倾向、派别等等一样，在国民党中也有这些倾向和派别及其种种缺点和优点。

在国民党中你们有我谈到的所有派别，在这里它们也分为两个主要的部分，即左派和右派。必须警惕右派，必须同他们进行斗争，不过要进行最终我们能够取得胜利的斗争。同他们必须进行这样的斗争，使之最后不致发生女人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的那种事情。同这个派别的斗争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你们能够加强左派，是因为你们在加强左派的同时能够巩固国民革命党，

并使之具有战斗力，能够领导国民运动并达到目的。同右派的斗争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我们从而可以使国民党摆脱我一开始就指出的那些把它拖入深渊而不是推动它走上革命斗争道路的枷锁。

不论是哪些右派，就其本身而言都没有什么用，对此我们不感兴趣。我们有比揭露一个在加拿大拥有一万亩土地或许多店铺的国民党员更重要得多的工作。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一种日常工作，完全没有必要到广州这里的代表大会上来追究他们。在这里的代表大会上，同右派的斗争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我们这样做可以稳定所有真正诚实的、忠诚的、即便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思想涣散的分子，同时给他们指出，如果他们不去同妨碍他们的右派进行斗争，他们就永远不会成为真正战斗的党。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我们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旨在加强左派，使这个派别更清醒并以自己的榜样、自己的工作来推动它始终向前进。

这就是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面临的任务。我从经验中得知，在左派中，如果细心加以观察，你们就会发现一些可以作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基础的分子。我们的任务就是使他们的思想更清醒，作出斗争的榜样，表现出更大的干劲，等等。我们的同志在广州正是这样做的：他们用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工作和干劲表明实际上可以做到什么，同时，他们也可以使国民党左派的混乱头脑更加清醒。

我们的总任务就是从组织上扶植国民党，帮助它制订党的纪律，以便使它真正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党。同时，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忘记，只要左派在其中不占上风，国民党就不可能制订真正的党的纪律，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革命的政党。为了战胜右派，就必须使孙逸仙能感觉到有一个强大的左派作基础。只要这个左派还没有团结起来，并且不在实践中大显身手，那就不能指望孙同右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对此我们不要抱很大的幻想。

随着同保守思想、同反动派斗争的胜利和由于左派的加强，国民党也会越来越巩固，同时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占有与他自身相适应的地位。

现在我们来谈谈那个应向本次代表大会提交宣言的宣言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我已经说过，国民党，甚至它的左派，在思想上都是很涣散的，也是五花八门的，我要说还充满着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每当我们想在国民党内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你们到底拥护什么，你们到底为什么而斗争——我们就会碰到自利库尔格^①时代起就有的公式化的纲领，而且非常强烈地使我想起从前印度自治派人士所作的回答。“我们拥护自治”，但拒绝明确回答这个“自治”是什么东西，国民党人恰恰也回答：“我们拥护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并且还扯上有五条尾巴的宪法，甚至补充说，这是他们向“先进国家”学来的等等。

因此，为了让他们对自己的话提出明确的含义，解释清楚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无论如何首先必须逼得他们无法回避才行。还在上海时我曾同我们中共中央的同志一起决定建议国民党提出一个完整的行动纲领，说明它拥护什么。有这样的行动纲领，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就可以做到：

(1) 对过去作出比较明确和正确的估计，并揭示革命失败的原因，例如：没有党，没有一个有群众基础的明确的纲领，没有党的纪律，等等。一句话，估计到过去的经验并指出1911年革命失败至今的后果。

(2) 评论那些关于如何摆脱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毫无用途的、也没有任何意义的建议，这些建议是鉴于国内的这种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由某些团体和党派，以至一些有影响的人士提出来的，例

^① 利库尔格（公元前9世纪到8世纪），传奇式的立法人物，人们认为他创造了斯巴达国家制度——译者。

如立宪派、联邦派的建议，以及成立在外国人保护下的务实政府的建议，等等。对所有这些建议都必须进行分析和评论。

(3) 指出如果现有的建议都不适用，那么国民党要提供什么出路。作为一个争取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党，它必须明确说明它准备根据哪些原则建立未来的政权。换句话说，它必须有一些作为其纲领基础的原则。如果现在还不能起草纲领，因为这不是机械性的工作，而是党的思想和党的工作整个过程的成果，那么，比方说也可以提交给下次大会。

如果现在不能提出纲领，那么至少应向本次代表大会明确地提出国民党的主义，即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在阐明应该据以确立国民党最终目标的主义之后，出现一个问题：国民党是否有什么最低纲领或者行动纲领，并且它准备根据这个纲领同国内现有赞同这个纲领，也就是当前的最低纲领的任何派别和团体共同采取行动。

这就是代表大会大致应该回答的问题。

制订可以回答上述问题的行动纲领的过程是这样的：在上海曾召开中央上海局第一次会议，并向中央提交了第一个草案。讨论这个草案整整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而且廖仲恺、张秋白、汪精卫和胡汉民都热情地参加了讨论。此后这个草案由瞿秋白译成中文交给了汪精卫，汪进行了加工、改写并用中文提交上来。当这个草案被重新译成俄文时，我们立即发现就连我们那些著名的国民党人的思想极其混乱。

在同这种思想混乱进行斗争时，在广州这里，由4人即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和我组成的委员会，在瞿秋白的参加下至少花费了15个小时。应该说，在这次讨论中至少应该指出两个主要方面：(1) 一方面就连国民党左派对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也全然不了解，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真诚地希望了解；(2) 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小资产阶级态度。

为了说明第一个方面我举出下面的例子。他们说，他们的宪法是向“先进的民主制”学来的，只是补充了某些自己的东西。随后国民党在自己的斗争中，除了已经列举的那些国内著名的同盟者之外，还在国外寻求同盟者。有人问，国民党的同盟者到底是谁？“同我们一起前进的其它国家和民族……”等等。不管他们多么不明白他们所说的话，但他们真诚地希望弄明白。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我问他们，“你们希望同哪些国家和民族携手前进？以英国为例，你们希望同谁一道前进，是同凯尔逊勋爵还是同洛德·乔治，同麦克唐纳^①还是同共产党人，他们都是民族的代表。他们当中谁是真正民主制度的体现者呢？在法国、美国等等国家也是一样。”当我具体地为他们指出他们的建议的含义时，他们立即明白了其荒谬之处，而且立即来了个从地狱向天堂的飞跃，同意与他们目标一致的其它被压迫国家的革命运动和世界革命运动共同前进。

另一方面是有意识地用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去观察事物。每当我们在草案中谈到农民群众，谈到工人群众时，汪精卫总是力图用一种含糊不清的、混乱的术语——群众、人民等等来代替这个术语。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态度还表现在，我们突然发现这样的说法：“中国工人以其勤劳著称于世……”，所以作为奖赏我们应该改善他们的处境。这是对待工人阶级的一种纯粹小资产阶级的甚至是庸俗的态度。

最后，我们就整个行动纲领大体上达成了协议，现在看起来这个行动纲领像是任何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行动纲领。总之制订了一个对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来说大体上可以接受的基础性文件。应当指出，共产国际关于应该怎样看待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提纲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个文件奠定了基础。当然，对我

^① 凯尔逊，英国外交大臣（1919—1924）；洛德·乔治，英国首相（1916—1922）；麦克唐纳，英国首相（1924，1929—1931）——译者。

们来说行动纲领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但至少把陈腐的毫无内容的空话抛掉了一半。其中对革命失败的原因作了比较充分的阐述，并说明了一些原则，这些原则表明该党正在努力成为国民革命党，还为民族主义赋予了社会政治内涵，明确指出，民族主义对人民的所有阶级来说就是同帝国主义作斗争，但它终究对一个阶级是一个意思，而对另一个阶级又是另一个意思。比如说对资产阶级，它意味着发展民族经济，而对工人则意味着不仅是发展民族经济，而且还意味着摆脱国内资本家的压迫。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民族主义意味着建立中华民国，在它的范围内少数民族拥有自决权。在这个文件中，民权主义不是从人权和公民权的角度去分析的，而是把它视为一个革命的原则。权力只赋予那些坚持革命政权观点的人。对于革命政权的所有敌人，对于帝国主义的所有走卒来说，不存在民权主义，不赋予他们任何权力。当然，这里还要加上国民党的五条尾巴的宪法，否则是绝对不行的，孙也不会同意。

但是在这个行动纲领中我们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阐明了农民和工人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在这个行动纲领中明确谈到，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以及工人的利益，从满洲到最南方，从国家的一端到另一端都是一样的，因此他们是基本的革命力量，国民党以他们为基础，并答应给这些阶级的经济组织以支持，同时期待着他们的支持。国民党赋予农民和工人作为革命基本力量的作用就是巨大的成就。当然，委员会成员之一汪精卫，极力用一种忠顺的不积极的同盟者的作用来取代农民和工人在革命中的作用，为此又奖励他们一碗饭，也就是答应在国民党掌权以后因他们忠顺要给他们一些好东西，对此我指出，“至于最后的奖赏，我们以后再说——我恭顺地感谢这种奖赏——最好让我们来商定，你们赋予工人阶级和农民在国民革命中以什么样的作用。这样或那样的最后奖赏都将取决于这种作用。”

至于民生主义，行动纲领则很像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社会主义

者所追求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所有行动纲领——为此做准备的生产部门的国有化、土地改革、劳动立法等等。换句话说，行动纲领表明国民党力求在国民革命以后实现国家社会主义。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委员会（当然，除了我）最终达成了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在国民党目前的状况下，我不可能争取到我们希望得到的东西，而只能争取到我们能够得到的东西，我同意与准备领导争取中国独立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实行妥协。当然，每当他们，特别是汪精卫想掩饰某种非同一般的小资产阶级庸俗思想时，我就加以揭露，说你们把它称作什么都行，只是不能称作社会主义。

除了4点分歧以外，行动纲领已由委员会起草好，并有了中文本，瞿秋白同志把它从中文译成俄文和从俄文译成中文做了很多工作。如果在中央委员会开会之前，今天将就4点分歧达成协议，那么我们每个人将在中央委员会面前捍卫自己的观点。看来廖支持我。

第一点分歧如下：我们都同意在自由的中华民国境内赋予少数民族以自决权。“统一的”或者“自由的”中华民国的提法不完全符合共产国际关于联邦制原则的提纲。既然国民党同意少数民族自决，那么现在我不再坚持我们的提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自己会明白这里有矛盾，不能说在统一的或自由的中华民国范围内的自决。共产党人应该揭示这个矛盾，争取在国民党的下一次代表大会上采用另一个提法。

分歧在于，他们坚持现在有必要同少数民族建立组织上的联系和实行合作的观点。而我们则坚持认为，同少数民族建立组织联系和合作现在不可能，因为即便是国民党的声明，这些少数民族也不可能把它当作某种真正保障他们自决权的东西加以接受。由于至今国民党内存在着涣散和混乱，他们对国民党的声明也不信任。我们在怀着满意的心情欢迎这个关于自决权的历史性声明

的同时，仍要劝说国民党，现在不要着手建立组织上的联系，而只限于同这些少数民族实现友好互谅，随着宣传和鼓动工作的开展，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再着手同他们实行合作和建立组织联系。这就是共产国际的观点。

因此，所有这些可归结为，是否现在需要争取建立合作和组织联系，抑或首先表明国民党的真正愿望，而随着这种愿望在宣传、鼓动和国民革命运动中的表达，再着手建立组织联系。

我们现在需要决定的问题是，是否继续坚持我们的提法？

第二点分歧如下：行动纲领宣布，国民党执政后组织的政府，应该向无地农民和佃农提供土地等等，但只字未提国家从什么地方弄到这些土地。他们完全不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剥夺问题的提纲。

因此我提出以下建议：建立由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以及那些所有者不耕种的土地组成的土地储备，因为这些所有者一方面是担任公职的官僚阶级，另一方面是剥削农民收取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的商人。当时并未说明这个政府是否向大土地所有者和另一些不耕种自己土地的所有者付款，或者用剥夺土地的办法无偿占有。那里并没有“剥夺”这个词。我想，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会进行反对赎买的宣传（这一点我是在我们人中说的）。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决定一个问题，是应该坚持由国家建立由这类土地构成的土地储备，而不管用不用赎买的办法，还是不坚持这一点？

至于第三点和第四点，我想或许没有任何分歧，我认为，他们会同意干脆把这两点删掉。他们在民权主义条款里加进了自己的宪法，说这个宪法是向“先进的民主国家”学来的。我说，鉴于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的领导人所主张的是完全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所以不能说，宪法是向这些国家学来的，因为国民党宪法的社会经济背景是完全不同的。

第四点，这就是他们关于中国工人以其勤劳著称于世的声明。

我建议把这个说法删去，因为这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这表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在工人集中的地方，我们经常看到罢工，例如在香港、在粤汉铁路上等等，这证明中国工人有能力进行阶级斗争，美国落后的工人正在利用有关中国工人勤劳的宣传，要把他们从美国排挤出去。

这就结束我的发言：我本人始终力求说服国民党人，实际上他们是怎么样的就怎么样，不要用各种美妙的空话来掩饰自己，而要坦率地说出他们是什么。在做了这样的工作之后才有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我甚至要说，是彻底的国民革命党文件。到下一次代表大会时有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功，而现在我觉得，为取得最大限度的明确、最大限度的彻底和对国民革命运动的实际利益，已经竭尽全力。

鉴于博士^①准备提出全国政府的口号，委员会同意在最低纲领的结尾，由代表大会通过必须根据最低纲领成立全国政府的口号。我已经说过，最低纲领的结果会是这样的：在国内除了国民党人、共产党人、也许还有其他一些激进分子之外，反正谁都不会同意根据这个纲领建立全国政府。但是对于宣传和鼓动工作来说，它将具有很大的意义。

李：我发现，从北京到广州，存在这样一种气氛：我们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却不打算支持它，而只想利用它。所以有你们所说的那个行动纲领就足够了，可以不去争取更多的东西。

关于4点分歧意见，有可能后两点被采纳，而对前两点仍保留自己意见。今天早晨，我曾同几位代表一起去孙那里。孙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我们，并展示了他自己制订的政府行动纲领^②。他

^① 即孙逸仙。

^② 这里说的是孙亲自为全国政府制订的另一个行动纲领，这个全国政府是他准备在代表大会上宣布的，我成功地使他放弃了这个念头。他的行动纲领是纯粹的乌托邦，没有提出来，我把要点附在后面——鲍罗廷注。

说：“我想宣布成立全国政府，因为我们从海关冲突的经验中看出，只要我们没有一个正式的全国政府，就很难进行反对同盟者的斗争。一旦我们不得不向他们宣战，就算我们遭到失败，但不是作为一小撮匪徒，而是作为全国政府。所以必须根据这样一个行动纲领来建立这个政府。”

关于民族问题，他的行动纲领说，在中国内部所有民族都拥有自决权。这是其中明确指出的，而我们反对列强争取完全独立。

所以我认为，对第一点的修改可以不必过于坚持，按照三民主义进行的土地改革是孙的骄傲，他认为这是他的发明。

关于土地储备问题也可以不坚持，因为如果我们反对赎买的人太少，那么我们现在公开反对土地所有者合适吗？我们谈到大土地所有者问题，但这在我们的定义中是指很大的土地所有者，但在中国总的说来这样的土地所有者不多。当然可以坚持这一点，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样的土地所有者往往是不大的。我们可以坚持让农民得到土地，而不指出其来源。

谭平山：关于谈土地储备问题的第二点，我同意李的意见，而对第一点还要考虑一下。

毛：关于第一点，需要对少数民族问题作出更明确的表述。现在当地的资本家，或者美国，或者某些其它国家想占领蒙古和其它一些地方。因此需要明确，国民党赋予它们哪些权力，而不是把它们置于这些民族属于中国的这样一个老的概念之中。我不怀疑问题的总的提法，但我对某些细节表示怀疑。关于国民党^①和中国的土耳其斯坦，现在我们当然相信他们应该获得自决权，因为我们同苏联有共同战线。至于西藏，“自决”的口号则会成为英国人手中的工具，因为我们现在还不可能在西藏有影响。

关于第二点，我认为，现在我们的组织还不那么强有力，我

^① 原文如此，显然这里讲的是蒙古。

们的影响实际上还没有达到群众那里，特别是还没有达到农村。我们能否确定，现在就可以反对土地所有者和那些拥有土地、但自己不耕种的人。而我们的提纲现在还不能被农村那些真正干活的人看到，这就是说，如果提出这个口号，我们就会立即遭到这些公职人员或商人的反对，而这个口号实际上又不能吸引农民群众。

鲍罗廷：这就是说，关于第二点，看来你们大家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不需要坚持建立土地储备？

毛：我们凭经验知道，当我们还不能组织无地的农民去反对大土地所有者时，我们必然要遭到失败。例如，在湖南省长沙、浙江省杭州、湖南省衡山，广东省惠州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在这些地方我们起先组织不识字的农民，然后领导他们同较富裕的、较大的土地所有者进行斗争。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的组织立刻遭到破坏，被查封，而所有这些农民不仅未认识到我们是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甚至还仇视我们，他们说：如果不把我们组织起来，就不会发生任何灾难，任何不幸。

所以，只要我们还不确信我们在农村拥有强有力的基层组织，只要我们在很长时期内没有进行宣传，我们就不能下决心采取激进的步骤反对较富裕的土地所有者。一般地说在中国社会分化还没有达到能够进行这种斗争的程度。

沈^①：左派能否变成黄色的甚至法西斯主义的？那时我们如何进行斗争，如何对待他们？

鲍罗廷：我说左派是就总体而言。毫无疑问，在左派中间，也可以找到这样一些人，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他们越来越靠近我们，或者越来越远离我们，直至投靠法西斯主义。至于整个左派，如果它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反映的话，那么你们的担心只有在国民革命运动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可以不通过同帝国主义进行

^① 可能是沈定一。

最无情的斗争而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现在帝国主义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必将向前进，并支持和创建这样的派别。有人可能离开，但也有人可能占据他的位置。如果有朝一日帝国主义不复存在，中国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所有的殖民地大体上都成为自由的国家，那时必然会发生这种情况，当然是许多人都会发生这种情况：他们不同那些将继续进行下去的人们一道前进，直至把劳动群众从剥削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进行真正的社会革命。现在还很难说，谁会走得这样远。

宣言的危急时刻^①

1月23日，白天，当委员会最终应将宣言提交代表大会时，博士派人要我去代表大会找他。他坐在秘书处等着我的到来。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是否最好完全取消宣言，代之提出他本人为全国政府起草的纲领。正如上面所说，他打算在代表大会上宣布成立全国政府。这些恰恰是我所担心的。还在动身去他那里时我就确信，他正是要提出这个建议。不仅从保持代表大会完全一致的角度来看，而且从消除任何摩擦的角度来看，他最好是取消委员会提交的宣言，提出他本人的纲领，从而保持一切不变。右派不会有任何理由反对他的纲领，相反，他们还会表示欢迎，把它视为摆脱宣言所提出的那些该死问题的最好办法。

孙的纲领根本没有触及中国目前的局势，也没有指出摆脱这种局面的任何出路，而是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空想。按照这个纲领的设想，是要满足人民吃、穿、住、行这四个主要要求。由于在纲领中没有一句话谈到所指的是什么样的人民，能用什么办

^① 鲍罗廷的这篇札记几乎在 A·И·切列潘诺夫的《一位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一书中（第 85—90 页）被全文转载，但作了一些删节和意思上的修改。

法来实现这一切，应在中国创造什么样的条件来实现他的乌托邦，所以在中国，本土的和特别是在国外的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人自然都乐于接受这个纲领，在国外，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国民党人现在正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担心党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有可能招致对他们的驱逐。

试问，他们为什么不干脆退党，哪怕为了不妨碍国民党在中国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可是他们不能，他们怎么能退出已经加入20年的党呢？有人说，这是不“尊敬前辈”。实际上“尊敬前辈”这句话暗含着很实际的内容。问题在于，形形色色的骗子用国民党的名字作掩护，掠夺旅居国外的不幸的中国人，似乎是为了争取中国的独立。仅在加拿大，就有一万中国人，主要是工人，支持国民党。实际上只有很少的钱用到中国的实际斗争，所有收入都落入这些骗子的腰包。只要不冒任何风险就能够搜刮旅居国外的中国民众的钱财，也就是说只要国民党还陶醉于对帝国主义者不构成任何威胁的各种空想，而帝国主义者不会对国民党的名字有任何反感，这些骗子们就很满意。但是，自从国民党在自己的行动纲领中明确说它要为实现中国的独立而进行无情的斗争以后，在国外的国民党头头们轻而易举发横财的路子必然被堵死。

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国外的国民党人，不是群众，而是他们的领导人前来参加代表大会，为什么加入了国民党的商人、半地主、官吏死抱住孙的纲领不放，因为这最终会把他们从有损于他们声誉的左派行动纲领（宣言）中拯救出来。为了说服孙放弃宣言并提出自己的纲领，他们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他们每天晚上开会，奔走于孙的后院，竭力用通过宣言的灾难性后果来吓唬他。他们作了这样的安排，从国外给孙拍电报，表示担心国民党会落入布尔什维克之手等等。他们甚至在某些害怕分裂的左派队伍中制造混乱。这种混乱已经迫使我们删去了行动纲领中关于建立由大土地所有者等的土地构成的土地储备的一条。这是软弱

的左派为了一致而作出的让步。现在，为自己在土地问题上取得的胜利而感到心满意足的右派在马不停蹄地工作，要把宣言一笔勾销，用孙的那个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的纲领来取代它。

我最担心的是，孙在遵循老的极为有害的“尊敬前辈”的政策，即对那些入党20年、并每次集会都向他的肖像鞠躬的那些人表示友好的政策。孙想避免同他们发生任何摩擦，同意取消宣言，并提出自己个人的纲领。

这是真正危急的时刻。取消宣言就意味着召开代表大会毫无用处，就意味着国民党的那些毫无意义的空话依然存在。

毕竟孙在事先召见我进行商量之前，没有下决心这样做。

对孙向我提出的问题，我自然作了否定的答复。一般说来，要说服孙相信什么是很难的，更何况所谈的是，用他的话说，他为之工作了20年的那些主义。要使他相信他的纲领不适用，就意味着要同他重温整个乌托邦历史，并使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人，根本不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应该怎样来争取和实现革命，等等。此人完全忽视了现在国民革命运动应当做什么，而不是过100年后它将做什么。他是个健忘的人，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他的整个思维方式。所以这一次我只指出，他的纲领需要加工和完善，应该把它印出来，但无论如何不能把它同宣言混为一谈，宣言第一次较明确地谈了党的迫切任务和党如何理解自己的主义。我把事情想象成这样，如果说孙的纲领暂时不会带来什么好处，那么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什么害处，何况不能用任何力量强迫他取消这个纲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自己会明白，用乌托邦是不能解决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所面临的问题的，并且他自己会取消这个纲领；他自己会明白，如果代表大会通过阐明国民党整个立场的宣言，那么正是宣言，而不是孙的纲领，将成为以真正革命的国民党为首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基础。孙的乌托邦纲领反正很快会被人遗忘，就像他迄今所说和所写的一切

被忘却一样，而宣言作为对中国迫切问题的反应和回答，将成为运动的指导性和决定性文件。国民党内所有精明能干和相当出色的人们，恰恰会集合在这个宣言的周围。

我再说一遍，当孙向我提出是否最好取消宣言的问题时，我作了否定的回答，这时出现了维系着国民党当前命运的危急时刻。这个关头，孙应该决定，是坚持自己的纲领，从而转向右派，还是接受宣言，同左派一起前进。

在长时间的交谈中，我不得不使用各种各样的论据，这以后孙为了把他的纲领也印出来，作出了对宣言有利的决定。

还有一个重要情况促使孙作出了决定，这个情况也成了我们的话题。问题是，在报刊上登载了孙和美国大使舒尔曼的谈话。舒尔曼在同孙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中，只谈对于干涉中国事务有利的东西，而隐瞒其余一切。孙博士对他说，他将用武力夺取海关，即使他不得不同所有列强作战，他清楚地知道，同列强的斗争，他也许连半天也坚持不了。舒尔曼答应，如果广州政府把关税结余只用于改善广州河流航道，而不用于军事需要的话，他协助友好解决关税结余问题。孙表示同意。但从他的声明看，他指责舒尔曼以及所有列强的作法不公正，他们同他进行斗争，拒绝给他应属于他的东西，而且他们支持督军，而不是根据华盛顿会议的决定通过自己的干预解除他们的武装。他对舒尔曼说，他准备参加罗伯特·霍登先生发起召开的会议（圆桌会议），条件是大家都放下武器，只保留警察维持秩序。他还对舒尔曼说了许多有关威尔逊^①不公正对待德国等的其他情况。舒尔曼从所有这些谈话中，只引用了能使人产生印象的内容，即似乎孙表示赞成外国人干涉中国事务以便解除督军的武装，等等。

孙问我：“您怎么认为，以我的名义发表的这个声明会造成怎

^① 威尔逊，美国第28任总统——译者。

样的印象？为纠正这种印象，应该做什么工作？”对此我回答他说，现在他沉默就意味着以他的名义发表的关于外国人进行干涉的声明等是属实的，因而任何一个中国爱国者都不会宽恕他这一点。即便讲的是由帝国主义者、中国的敌人解除督军的武装，这也是对人民的背叛。如果说这个声明是对他同舒尔曼全部谈话内容的断章取义和曲解，而我认为，它就是这样^①，那就应该立即予以驳斥。驳斥的方式之一可以是在代表大会上作一个关于宣言的发言，其中要明确谈到同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任何干涉的斗争、同他们的一切特权和权利的斗争，废除一切强加的条约，等等。在这里他会得到一个极好的机会来消除对他同外国人搞妥协并支持他们干涉中国的种种怀疑。他的这个发言可以在全世界发表，那时舒尔曼为帝国主义觊觎中国而利用孙的企图就会遭到可耻的失败。

我问他，他对有可能从美国、英国或日本得到某种援助的幻想还能持续多久，对于这种援助是否等得太久了，是否到了对充满幻想和失败的去作出总结，并走上新的道路的时候了。我说，您面临着一种选择：是同帝国主义营垒中的 2.5 亿人前进，还是同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 12.5 亿人前进。您应该作出决定，您是做以被压迫的中国及其它被压迫国家为一方和以帝国主义世界为另一方之间的妥协者，还是当争取被压迫国家权利的冠军。如果我在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之前同您这样谈了，那么您也许把争取被压迫国家的权力斗争想象成一个呆在国外某个地方幻想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理想主义者小组的斗争。而现在谈的是大规模的斗争。苏联 1.5 亿人支持您，同样陷入半殖民地状态的德国人民也支持您，土耳其刚刚取得独立，但一旦帝国主义彻底战胜整个其余世界，还不能保证不被摧垮，因而土耳其觉得您是为被压迫民族事业而奋斗的斗士。在波斯、印度等地也是这样。总而言之，您需

^① 后来我得知，所有这些都对舒尔曼说过，还得知舒尔曼正确地传达了谈话——鲍罗廷注。

要决定的问题是，您是同全世界的民族革命运动一道前进，还是继续说服舒尔曼使他相信对中国的态度是不公正的，甚至期待他或与他的国家相类似的其他国家的代表来干涉中国的事务。

整个谈话期间，孙不图寻常地频繁点头并作出其它赞同的表示，谈话结束时，他握住我的手走下楼来，坐到主席的位置上，很高明地提请通过委员会就宣言所作的报告和进行由它引起^①的辩论。在行动纲领通过时，他本人第一个投票赞成，然后孙作了下面简短的讲话，证明我们的谈话没有白白进行^②。

就修改宣言问题向孙作出的声明

1月27日早晨，我向孙逸仙宣读了下述陈述书：

现在，当宣言即将准备就绪，修改和补充也近尾声的时候，我想提请您注意到对它进行全面整理的必要性，并建议您审订从其内容中必然产生的几个新的问题。

首先很重要是给它确定一个最后的名称。您在1月23日的讲话中把它称作宣言。好吧，那就明确说定，这是宣言。

这个宣言分为三部分：

(1) 前言或者评论部分；(2) 对国民党主义的解释和 (3) 国民党在中国目前情况下的行动纲领，或者国民党呼吁成立全国政府所依据的行动纲领。

这三部分就是这样。我以为，第二和第三部分之间的区别许多人是不十分清楚的。某些人认为，第三部分只是第二部分的具体化，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如果允许这个错误存在，这会导致

① 但我相信，那个舒尔曼的友好的信又使他重新改变了自己的方针。美国主义对他影响太深，以致不能如此轻而易举使这个老头忘却——鲍罗廷注。

② 指1924年1月23日的讲话《国民党宣言的意义》（见《孙逸仙选集》第369—370页）。

将来产生更大的误解。

第二部分实际上只是对您的主义的解释，这些主义应该成为尚未制订的而且在这次即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也未必能制订的纲领的基础。制订党的具体纲领需要在党内做大量的准备工作，特别需要党的最高机构认真加以审订。需要正是这样来做这件事并让所有人都了解。

第三部分是什么呢？毫无疑问，这是党在当前时期的具体行动纲领，但这不是您的最终目标的所有具体条款。我再说一遍，这只是国民党在中国目前情况下提出的行动纲领，国民党相信宣传工作和争取实现这个行动纲领的斗争，真的能导致争取实现党的真正的行动纲领的斗争，这个真正的行动纲领将以宣言第二部分的原则为基础，也就是党还应制订的纲领。

第三部分或行动纲领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是一旦形势允许你们打算宣布成立的全国政府的基础。党说，我们有一些主义，从中可以得出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将为实现这些目标斗争到底。当我们准备就绪时，我们将根据这些主义制订一个全面的纲领。但我们想提出一个临时的行动纲领，所有诚实的、不自私自利的人们能够团结在它周围，并帮助成立全国政府。党知道，这些人不会接受国民党的主义，但是如果他们真正愿意为国家的利益而斗争，他们无疑应该接受行动纲领或者宣言的第三部分。

简言之，这意味着我们有了一个宣言，它由三部分组成——评论、最终目标和为建立一个不仅得到国民党支持的全国政府的真正的行动纲领。

更简单地说：宣言就是国民党的过去、未来和现在。

此外，我现在建议第二部分补充有关军队的一条，第三部分补充几个新的条款。

第二部分补充的是：

“作为主要是农业国的中国，其军队主要是从农民中招募的。

然而，这支军队不是保护人民的利益、帮助人民去争取使国家摆脱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军阀的统治，而是充当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对付人民的工具。

国民党认为这种现象是一个历史性的矛盾，它只能用国家的极端落后和农民群众的极端贫穷来解释，农民群众为了可怜的生活而不得不要受雇于任何军阀，虽然这只能造成国家的更加穷困和土匪的猖獗。

为了消除农民军队的真正利益和他们实际上为之奋斗的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国民党将在士兵和下层指挥员之间进行广泛的鼓动和宣传，旨在向他们说明他们本身的利益，并使他们变成为人民利益而战斗的革命军队。

革命军队将帮助国民党同其敌人和人民的压迫者进行斗争，将帮助它建立和捍卫革命政府，因此应当成为国家特别关心和照顾的对象。在革命胜利完成以后希望回到农村去的所有革命士兵，都应该得到足够养家糊口的土地。”

第三部分补充的是：

在第四条“外交政策”的后面加上：

“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其它国家的公民应当服从中华民国的法律。”

紧接着在第七条“国内政策”后面，关于军队问题加上下述内容：

“为了争取中国的完全独立，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并使人民不受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军阀的奴役，军队应当训练有素。”

在第八条“国内政策”中加上：

“由于外国租界转到中国人民手中，政府所得收入能够成为实现此目的的经费来源之一。

附注：这里所说的租界是指处于外国司法管辖下的制度，是指国中之国。至于居住在这些租界中的外国人，他们的权利将由

中国政府根据中国和这些外国人作为其公民的列强签订的新条约来规定。”

在第十四条“国内政策”中加上：

“庚子赔款应该用于教育。”

孙没有听取我特别重要的论据就同意了所有的修改意见。因此我又向他讲述这些论据，让他给委员会下达相应的指示以便把这些修改意见作为单独的决议纳入宣言之中，因为宣言的全文已在23日由代表大会通过。表面上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因为在修正案和提议中没有任何与宣言相抵触的地方。

我之所以在整个宣言通过之后才提出修改意见，是因为加拉罕同志来信建议要把这些修改意见加进宣言，而我收到他的信是在委员会通过宣言之后，因此不可能及时把这些修改意见加进去。

上面已经说过，孙接受了全部修改意见，并将这些意见及相应的指示交给了委员会。而同意接受所有修改意见的委员会，特别是戴季陶（左派），还是只向代表大会提出一个有关军队的修正案，对其余的修改意见采取抵制态度。了解到这一情况以后（已是晚上），我跑遍全市寻找委员会成员。我找到了廖^①并对他说，我对委员会搞的儿戏已经开始厌烦了。前一天委员会全体成员刚刚都同意接受修改意见，但到第二天上午在代表大会面前却都忘记了自己的决定，只提出一条修改意见而对所有其余的修改意见缄默不语。看来，廖把这次谈话转告了委员会成员和孙，孙第二天亲自出席会议并做了所有修改。

① 即廖仲恺。

对建设性（全国）政府问题的讨论

前 言

关于全国政府或建设性政府的问题是孙提出来的。在一个月间他把所有人都召集到了他那里，向他们宣读了自己的全国政府纲领，事先征得了所有自己人的“同意”，甚至没有顾及自己的“同盟者”段祺瑞、张作霖等人。当代表们开始集中到一起时，孙决定利用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全国政府并选举自己为总统。

这时曾有葬送代表大会的危险。为了避免这个危险，我决定在委员会中提出问题，争取它同意不宣布成立政府，而只同意提出党为实现全国政府而进行宣传的口号。正是作出这样的选择，才能争取改变孙最初的决定。我不能在委员会公开地说，如果我们连那个口号也不接受，那么孙就会宣布成立全国政府，也不能说为取消孙的决定需要提出这个口号。要是这些话传到孙那里，那就会前功尽弃。这一点说明了我在委员会里为了口号所进行的斗争。

* * *

鲍罗廷：还有一个问题，我同博士谈过。他建议成立建设性的（全国）政府。我认为，要是这个提议来自代表大会就好了。可以作关于国内局势的报告，并由此得出结论——成立建设性的政府，这样一来，博士的思想就会在作报告之后由代表大会提出来。

瞿秋白：起初他们想就这个问题同孙谈一谈。

鲍罗廷：博士曾同我谈过这个问题，并且问道：“这个提议是否最好由代表大会提出？”我认为，就此可以谈一谈代表大会的这个提议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并向博士详细报告该委员会的意见。

廖：您的意见怎样，现在是否到了宣布成立这种政府的时候？

要知道今天连广州^①省也还没有统一。

汪精卫：至于安福系的支持，孙逸仙已派出叶楚伦，正是为了同安福系联合并组成政府。暂时还没有得到最后答复，或许现在还不能宣布成立这样的政府。

鲍罗廷：不，当然不是现在。建议本次代表大会提出这个建议并不意味着立即在明天就应宣布成立这样的政府。代表大会仅为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成立这种政府担负宣传鼓动工作。必须让党在代表大会上作出这样的决定：成立这样的政府需要党在各地开展宣传活动。当党看到，事情正在进行中，为成立这样的政府而进行的宣传活动已经具有很大的规模，而且社会舆论对此也有所准备，那时也许才能宣布成立这样的政府。

全体与会者都同意这样提出问题。

汪精卫：日程上的这一项叫什么？我提议叫“成立全国政府的必要性”。博士现在正制订成立这个政府的计划和该政府应该做什么工作。

鲍罗廷：需要有一个好的报告人，他应该说明国家处在怎样的局势中，指出对北京政府缺乏任何信任，以及在中国无政府状态背景下唯一的光点就在这里。光应该由此传向全中国。国民党正在这里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代表大会之后，这个口号应该响彻全国。报告人应该无情地批评现在的做法，并且为一种出路要建议准备成立这样的政府。

胡汉民：瞿秋白或者谭平山应该是报告人，他们与现在的政府没有关系，否则有人会认为我们的领袖们想当部长，在欧洲和美国总是领袖们做这种事，而在中国则完全是另一种社会心态。此外，我们说，有广州政府作为基础，我们希望在全国建立这样的制度，可是实际上我们的制度也不是很好的。

^① 指广东省。

鲍罗廷：好像胡汉民也不是政府成员？

胡汉民：这无关紧要，在公众眼中我是政府人士。

鲍罗廷：但是我们观察事物要更客观一些，问题在于，中国的形势是否已经很成熟，党的准备是否很充分，以致可以提出成立建设性政府的问题。如果我们一致认为，这样做的形势已经成熟，那么谁作报告都是一样的。朋友们都会理解，而敌人不管怎样都会说，这出自孙博士的大本营。但我们不应该顾及这一点。党应该说出自己有分量的话，宣布关于成立全国政府的口号的时机是否已经来到。所有其余的考虑都没有意义。

胡汉民：我认为，这样做的条件尚未成熟。我们不说敌人，因为他们反正都永远反对我们，我们也不应顾及他们。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到同情者的情绪。我们可以看到支持还不够有力，以致不能使这件事胜利结束。一般说来，无论是张作霖还是卢永祥都可以看作是同情者，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宣布成立这样的政府，他们还没有打算支持我们。我们的党还没有严明的纪律和足够的力量以致能迈出这样重大的一步。因此我认为，这样做的时机尚未来到。

鲍罗廷：胡汉民同志是否把口号和实际宣布成立政府区别开了？一个是提出关于有必要成立政府的口号，另一个是宣布政府成立。如果问题是这样，即今天就要宣布成立全国政府，那么他是正确的。为此，除了客观条件之外，还需要做一定的准备工作。问题还是这样摆着：党要提出成立建设性政府的口号并根据这一口号进行鼓动和宣传，它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策略问题。我们在这里碰到了像在上海处理各种社会组织为寻求使中国从奴役她的债务形式中解放出来的办法而要举行代表会议时碰到的同样论据一样。我们在那里致力于什么目的呢？给党提出一个进行鼓动和宣传的口号。在这里也是一样。

我请大家区分这两个问题：一是使群众对成立这样政府的思

想有所准备，以便时机到来时他们已有准备，二是立即宣布成立政府。

胡汉民：我认为，在中国现时条件下还很难下决心走这一步，因为在中国，人们总是这样认为，谁做得多说得少，谁就是好样的。而谁实际上说得多，能实现的却很少，在经过一些失败的尝试后已经没有任何信任可言了。只有孙博士一个人是个例外，他像欧洲政治家那样发表演讲，说“我应该做这件事，这是我们的义务，我们做这件事根本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利益，而是因为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在其他中国人眼里，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这里如果你想当总统，就必须拒绝几次。这个口号已经提出了几次，如果现在在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又提出来，那么在以后这会给我们党的任何其它宣传造成困难。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那最好别说。当我们有某种成功的机会，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时，我们才应该说。

据我的理解，党所经历的过程就是我们进行政治斗争的历史过程。当然，你们指的是，我们的口号，可能成为改变社会心态的一种尝试或者推动力，而这已经是对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准备。但我有一个问题：成立政府的这个口号到底是不是一种动力？我理解，为了造成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可以提出口号，做工作准备和社会心理准备，但是在当前情况下，我不认为这个口号是适合当前形势的，因为成立全国政府的口号已经是一个旧的口号，孙已经几次宣布过了。我认为，如果再一次宣布这个口号，结果会是同样的，未必有所不同。

鲍罗廷：过去的情况与现在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现在在广州有60个分支机构能够宣传这个口号。在上海也有几个分支机构。每一个都将为这个口号进行鼓动。同时在其它省份也要组建分支机构，并在那里做同样的事。离开党的组织和党的改组，这个口号只能是一句空话。离开每个已有的和新成立的分支机构的

具体工作，这个口号就一文不值。只能同党的改组联系起来考虑这个口号。从前我们没有报纸，而现在我们将在上海拥有一家大的报纸并有优秀编辑人员。我们将在广州、北京和华中办几种日报，将有一个在中央领导之下的统一的刊物，它将反复宣传这个口号。以前什么也没有。没有报界的强有力工作，宣传这个口号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在压制你们的帝国主义者那里发生了极大的混乱。当前的国际形势很好。比如说，过半年以后，我们做些准备，宣布成立建设性政府的时机就可能到来。

廖：在准备采取某种步骤时，宣传工作具有一定的作用，确实也需要对口号的现实性作出实际的证明，需要认真地做准备工作。我们的口号是完全合适的，而且我们能够证明它是正确的。常有另一种情况，我们有很好的口号，但不能用现成的事实来证明它们是好的，证明我们能够实现它。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我们总是得到一些相反的证据，往往陷入很不利的境地。我们在广州省^①差不多工作了一年，不仅没有向人民证明我们的主义是好的，而且相反，整个税收政策，所有财政措施，所有军事行动和军官们的专横作法等等，不仅没有巩固我们的威信，反而从根本上彻底地损害了人民对我们的信任。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再一次提出某种口号，例如我们想成立有某种行动纲领和某些政治措施的政府，而实际上我们在广州每天去做那些与我们的言论相背离的事情，那么这要比我们不说话更坏。

鲍罗廷：在省的范围内不可能做很多事情。在全国范围内才可能有摆脱现状的出路。因此孙竭力要成立全国政府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个地方政府都没有能力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正是廖所指出的，所有这些困难迫使孙去致力于成立全国政府，因为

^① 原文如此，应为广东省。——译者

不这样他想象不出如何摆脱这种局面。

当然，与广州的改组相联系，首先必须颁布土地法，颁布劳工法等等。所有这些措施都应该采取。同时，还要进行争取成立全国政府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广州保持一切一成不变当然是不行的。可是当我们颁布土地法和劳工法时，你们认为会怎么样呢？

廖：反正人民会说，正是在我们统治的广州，我们不实现这些法令，而只是纸上谈兵。

鲍罗廷：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讨论的够多的了，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汪精卫：我们只能作出关于有必要成立这个全国政府的决议，但不是我们突然成立某个政府并把它叫做全国政府的建议。在采取这个步骤时，我们可以事先指出，这对党将是有害的。我们同孙谈一谈，现在只能提出这样一个宣传的口号，以便使全体党员意识到在各个居民阶层中进行这种宣传的必要性，使他们明白需要成立这样的政府，只有它能救中国。但是在我们尚未准备好宣布成立这个政府的时候，就不能采取实际步骤，因为这只能断送我们。

鲍罗廷：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吗？

胡汉民：我们同孙说，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只指出成立建设性政府的必要性，这是不够的。

您也要同他谈一谈，因为虽然外部条件允许我们这样做，但是内部条件还不具备，而主要是我们党自身还没有准备好，我们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能在这方面采取实际步骤的程度。在代表大会上我们应该只讲必要性，只讲党承担对这个口号的宣传工作。

鲍罗廷：我们大家都认为，实际上现在不能宣布成立全国政府。问题只是在于，这个口号对于开展党的活动和对于把党团结在这个口号的周围而言是不是好的口号。我们已经制订了最低纲领。或许为了实现这个纲领，国民党可以提出成立全国政府的口

号。

全体与会者都认为这很好。

鲍罗廷：如果博士同意我们的意见，那就必须推荐一个报告人并准备决议。

全体同意。

*

*

*

第二天，廖和汪精卫来到我这里要求我同孙谈谈他还想宣布自己的政府为全国政府的问题。尽管他们援引了反对孙采取这样的步骤的种种理由，但是孙没有让步。他们说：“我们与他共事已经 20 年，我们知道，任何理由都不能使孙改变他作出的决定。”^①他们补充说：“在我们党内有如此巨大意志力的领袖，这当然很好，但也常有这种情况，当我们感到他在沿着斜坡向下滑时，我们却无能为力。”

就此我回答他们说，我同孙共事也已经有 3 个月了，我知道，能够从他那里争取到什么和不能争取到什么。如果委员会能去他那里说服他现在不宣布成立全国政府，而像委员会已经决定的那样，只限于提出有必要成立这样的政府的口号，以使代表大会为党作出宣传这一口号的决议，那么我也参与此事，并尽我所能争取孙同意这样做。

但是他们认为去找他是完全没有用的，并说只有我一个人能对他施加影响。

就在这个时候，廖向我讲了孙的这个立即宣布成立全国政府的固执想法究竟来自何处。发生海关冲突时，孙的私人秘书喻育之和航空工业负责人去香港同到那里去的北京外交使团团团长^②德

① 甚至他最亲密的朋友也没有注意到，没有人像孙这样常常不改变自己就一些重大问题作出的决定。只是在一些小问题上他很坚定——鲍注。（原文如此，从上下文看似有误，应为“常常改变……”——译者）

② 即首席使节。

·弗列塔斯^①谈判。弗列塔斯答应喻育之，他同北京外交使团联系，以便友好地解决海关问题并本着这种精神请外交使团同广州政府联系。过了一些时候，广州的英国领事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信中说，不能同广州的**地方政府**有任何直接联系，还说德·弗列塔斯不能同喻育之直接对话。

这种情况，也就是在这封信中把孙的政府称作地方政府，使他勃然大怒，从那时起他决定把自己的政府改成全国政府，甚至不顾没有得到张作霖和安福系的支持^②。这时正赶上代表大会，于是他决定通过代表大会履行宣布成立全国政府的程序。

显然，孙的这种作法将会葬送召开代表大会的目的。召开代表大会完全不是为了使孙成为中国的总统，它的召开是为了通过国民党的行动纲领和为了改组党。无论如何都必须避免采取对党是致命的这一步骤。

在代表大会前夕，我就这个问题同孙进行了一次非常认真的长谈。结果是孙同意取消自己的决定，只限于由代表大会表示赞成有必要成立全国政府，并向党发出指示，在群众中为全国政府口号进行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03，第 4—92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① 1923 至 1931 年间驻华外交使团首席使节是荷兰公使 B. 欧登泰克。

^② 使孙放弃采取这一步骤的原因之一，即便不是主要原因，恰恰是他完全失去了张作霖和安福系的支持，而不是党的意见——鲍罗廷注。

112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80 号记录 （摘 录）

1924 年 3 月 20 日于莫斯科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80 号（特字第×号）^① 记录

听取：1. —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

[5] 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

（报告人：契切林同志、季诺维也夫同志）

决定：1. — [5] (1) 通过加拉罕同志提出的政治工作计划^②，
决定委托伏龙芝同志亲自负责发放 50 万卢布、1 万支步枪和一定
数量的火炮。

(2) 将早先决定的 200 万卢布^③ 的发放日期推迟至接到加拉
罕的文件后执行。

抄送：

伏龙芝同志— (1)；

契切林同志—全部；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全部；

① 原文如此，没有标明号码。

② 加拉罕的计划没有找到。

③ 见第 64 号文件。

布留汉诺夫同志^①。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1，第 40 页。

打字稿，记录原件，斯大林签字为真迹复制。

11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81 号记录 （摘 录）

1924 年 3 月 27 日于莫斯科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81 号（特字第×号）^② 记录

听取：3. — [3]：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4 年 3 月 20 日会议第 80 号记录，决定：1 [5]）。（契切林同志、伏龙芝同志）。

决定：3. — [3]（1）重申政治局 1924 年 3 月 20 日关于向孙逸仙提供资助方面的决定^③（第 80 号记录，决定：1. — [5]）。

（2）重申政治局关于提供武器方面的决定，改变政治局 1924 年 3 月 20 日作出的向孙逸仙提供越飞在 1923 年 5 月 1 日给孙逸

① H·П·布留汉诺夫时任苏联粮食人民委员——译者。

② 没有标明号码。

③ 见第 112 号文件。

仙的电报中所允诺的武器数量的决定^①（第 80 号记录，决定：1. — [5]）。

抄送：

契切林同志，
伏龙芝同志，
布留汉诺夫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1，第 47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114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东方委员会 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②

1924 年 2 月 25 日于莫斯科

委员会听取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后决定：建议中国共产党在今年 5 月召开党中央委员会扩大全会^③，讨论下列问题：

- ① 最多提供 8000 支日式步枪，15 挺机关枪，4 门“奥利萨卡”大炮和两辆装甲车（参见托尼·塞奇：《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起源》英文版第 2 卷第 526 页）。
- ② 在卷宗中有该文件的一份含有许多不确切史实的俄文文本（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78，第 9 页）和两份完全相同的英文文本（第 12 页和第 13 页），该俄文文件是根据上述英文文本重新翻译的。
- ③ 1924 年 5 月 10 至 15 日举行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会议。

1. 讨论国民党今年1月在广州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宣言和纲领，以及把该党普通党员群众争取到左翼一边的措施。

2. 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在国民党出版机构中的党员的工作的监督。

3. 加强工会工作，立即着手恢复京汉铁路职工工会的工作^①。

4. 加强在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中的宣传工作。

5. 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扩大，国民党面临的具体任务是：通过开展较激进的土地改革，武装农民，在靠近前线地带建立自卫队等途径，把农民阶级吸引到解放运动中来。

6. 详细讨论在农民中进行广泛宣传的办法，如既用口头，又用标语、电影等形式进行宣传。

7. 在今后3个月内要开展一次扩大党员数量的运动，主要吸收25岁以上工人出身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②。

全宗514，目录1，卷宗78，第13页。

打字稿，原件，译自英文。

^① 指1923年2月被吴佩孚军队破坏的铁路职工工会。

^② 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15

维经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

1924年4月21日于北京

秘密

亲爱的彼得罗夫^①同志：

我从海参崴给您写了那里的情况。此后我经中东铁路去北京，并在哈尔滨逗留近一昼夜。迄今为止我们在中东铁路上几乎还没有做工作。

原因是我们没有经费，而中国中央^②没有我们的物质援助无法把工作扩展到北京以外的地方。现在我们每月能从我国政府铁路委员会得到500到600卢布用来在中东铁路上开展工作，因此我建议中国中央立即向哈尔滨派遣三名坚定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人应是有实际经验的工会干部。

整个工作将在中国中央领导下进行并由它负责，由设在哈尔滨的苏联省委协助并同其保持联系。我认为经过一段时间，我们能够扩展到满洲。在返回路上，我将在各地检查整个这项工作。

现在谈谈北京机构及其委员会的工作情况。首先，应该说委员会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其工作人员认真、能干。自我离开中国后的三年间，无论在工作人员的构成上还是在机构的政治、组织成熟程度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分散在民族运动中，而（共产主义）青年代表着基本的共产主义干

^① 即Ф·Ф·拉斯科尔尼科夫，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

^② 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部，这种看法是很荒谬的，没有任何根据。唯一可以说的是，对于比较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现在所面临的任務确实太复杂了，所以有些任务它不能很顺利地完成。

结果是，一个组织（也可能是全党）有时完全忙于完成一项任务，而忽视了另一项任务，然后集中完成第二项任务，又忽视了第一项任务。

北京对国民党的工作就是这种情况。有很多时间，我要说，太多的时间，用来建立国民党的组织。现在国民党在北京有1300名党员。但这里必须马上指出，在我们的同志那里还看不到在思想上同国民党人“停战”的迹象，相反，他们越是同民族主义分子打交道，越是感觉到在思想上同这些分子格格不入。我们的同志完成对国民党的工作，象是履行必要的和很重要的义务。但是他们对这种义务的理解是很片面的。他们认为，既然他们需要在国民党内做工作，那么第一，他们就必须成功地把国民党的形形色色分子联合起来，而且主要是通过对各国民党集团领导人的规劝和开导来达到此目的，有时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和收效甚微的任务。同志们几乎把这种实现联合的方式的失败视为违反了党的纪律……^①。看来，鲍同志^②向他们作过这样的“解释”：建立国民党组织，并且是群众性的，而且非建不可，这是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现在我们的同志必须谨慎从事，但终归要十分明确地说明，在国民党内做工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所以我们能够同他们共事，并且将同他们共事，在从国民革命运动的角度看确实合适的地点和时间为他们做工作。

例如，在中国北方，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向工人群众渗透，主要是向铁路工人和矿工渗透。昨天我们刚刚在中国铁路职工联合

① 文件中为删节号。

② 即鲍罗廷。

会主席团会议上听了张同志^①的报告，他刚从三个省的四条铁路线上巡访归来，他在那里同合法工会组织建立了联系，并为路矿的地下工会基层组织奠定了基础。详细的报告我下次给您寄去。

眼下我只能说，在铁路工人和矿工中间做工作，现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我相信在最近的将来从结果上看也将是一项特别易见成效的任务。

现在，这里的同志面临着以下一些原则性的组织问题：

1. 关于把工人联合到工会和其他组织中的方式问题，最好通过这些组织对工人施加影响和开展活动。

2. 关于在我们影响下的北方现有工会组织如何对待北方国民党中央局工人部的问题。

3. 关于在同党建立相应的组织关系之前，如何确定青年在总的政治工作中的任务和职责问题。

4. 关于在军阀军队中的工作方式问题。

5. 关于在农民中的工作方式问题。

6. 组织委员会的正确宣传鼓动工作问题^②。

在北京，我们当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要提出来，以便在上海会议^③之前，地方的同志们对这些问题作出认真的研究。而且我还建议北京委员会就这些问题准备自己的提纲，中央当然要有自己的提纲。

还有许多有意思的事情要通报，但我推迟到下一封信再说。

您的格里高里^④

必须尽快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派 10 至 15 名学生来这

① 即张国焘。

② 原文如此，可能指组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鼓动工作部。

③ 指 1924 年 5 月 10 至 15 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

④ 即维经斯基。

里工作，现在确实很需要。

向您那里派去 4 名工人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请采取相应措施为他们作出安排。

格^①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1，第 31—33 页。

打字稿，副本，亲笔签字。

116

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书面报告

1924 年 6 月 2 日于莫斯科

送：季诺维也夫同志
契切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
布哈林同志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科拉罗夫同志
库西宁同志
施米特同志

敬爱的同志：

^① 即维经斯基。

维尔德同志^① 昨日由上海抵达这里。他报告说：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② 上，关于在国民党内工作的问题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论。许多工人对共产党实际上被溶化在国民党内表示反对，甚至有人主张与国民党决裂。

有一些人持相反意见，要求让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争论的结果是通过了关于在巩固和加强党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同时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决议。中央全会是在维经斯基同志直接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彼得罗夫^③

又及：全会进行了 5 天，25 位同志出席，其中 50% 是工人。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8，第 58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维尔德，此时任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译者。

② 指 1924 年 5 月 10 至 15 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在全会通过的决议中还有《关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工作问题的决议》，该决议使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 230—233 页）。

③ 即 Ф·Ф·拉斯科尔尼科夫。

117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40次会议情况通报^①

1924年7月3日于广州

国民党内共产党员与反共分子之间的争论

关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4年7月3日会议情况的通报。

自1924年1月国民党代表大会以来，反共分子开始聚集在国民党元老，如：邓泽如、冯自由、刘成禺、蔡元培等人的周围，准备进行反对共产党人的斗争。他们举行了几次群众大会并煽动侨居国外和殖民地的国民党员的“过激情绪”，让他们起来反对共产党人。但是孙逸仙召集中央委员会会议，训斥了他们，孙逸仙的严厉斥责暂时制止了他们的行为。

以后，他们隐蔽在全国各地，要同自己的人串联在一起，如北京的石瑛，汉口的刘成禺、谭理鸣和张秋白，上海的谢持、茅祖权、叶楚伦和张继，广东的邓泽如、冯自由、蔡元培、孙科、方瑞麟、吴铁城、蒋翊武和马超俊。他们联合在以孙科为首的集团

^① 此文件为一位不知姓名者的记录稿，此人可能是1924年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参加者，对记录稿还有简要的评论。根据记录稿和评论的内容判断，是由某个讲广东方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记录的。这里发表的文件保留了俄文原作的风格。

中，准备向共产党人发动总攻击。他们派出自己的追随者和亲信跟踪共产党人，搜集反对他们的材料。

最近几个月谢持一伙窃取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个小册子的抄本，他们在其中找到了几句使国民党感到不快的话^①。不知为什么，他们竟认为这些话是用来反对共产党人的最好材料。

右派把搜集的所有材料提交给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会上张继、谢持与廖仲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张继、谢持和孙科立即拜访了鲍罗廷代表^②，就此问题进行了交谈，但还是毫无结果^③。1924年7月3日他们又将此案提交给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出席会议共10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邵元冲、林森、张继、林祖涵、邹鲁、柏文蔚、谭平山和张知本。争论的起因是孙逸仙提出邀请鲍罗廷担任政治局组织顾问，而张继反对这一提议。张继首先谈了他与鲍罗廷的谈话情况，并坚持认为，鲍罗廷无论如何不能当我们党的顾问，因为他说国民党已经死亡。张继作了长篇发言。谭平山表示反对。两人进行了辩论：

张继：“鲍罗廷的行为并不高尚。”

谭平山：“张继所说的高尚是庸人的高尚，而不是革命者的高尚。鲍罗廷是革命者，他的行为符合革命党关于高尚的概念。需要选择一种方法把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恢复自由，使所有的民族都独立，解放中华民族。所有能使革命达到此目的的方法，就是革命者的高尚。鲍罗廷实际上在帮助中国，帮助革命。我们怎么能够说鲍罗廷不对呢？”

① 指小册子《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上海，1923年）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通讯《团刊》（1924年第7号），其中含有关于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国民党中如何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② 原文如此，应为：顾问。

③ 1924年6月25日举行的会谈（参见《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1—15页）。

张继：“俄国在革命之后就妄想获取指挥和控制东方革命的力量。”

谭平山：“确实是这样。俄国在革命以后知道革命在东方的重要性，知道所有半殖民地应该联合起来进行革命。这就是为什么第三国际致力于把所有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原因。我们应该知道，革命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东方的问题，因为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已经联合起来组成共同战线，向他们的东方殖民地发动共同的进攻。只要中国革命不与东方其它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它就无论如何不能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剥削，因此，能够帮助进行革命的第三国际，根本不是贪图权力。国民党本应感谢第三国际，我不明白为什么张继先生怀疑第三国际的好处。”

张继：“国民党不可能与共产党人联合，这有例证：土耳其与共产党人有过联系，但现在有几十名共产党人被土耳其共和党枪杀了，由此可以得出：与共产党人合作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宣传而已。”

谭平山：“我们还不知道是否真的共产党人被土耳其共和党枪杀了，如果确有其事，那么这只能证明为革命的自由而献身的土耳其共产党人的勇敢。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共产党人，土耳其才成为共和国。如果共和党人枪杀了共产党人，那么他们就应该为自己的罪行负责。同时这也证明了共产党人的勇敢和对自己的事业和原则的忠诚。可见，他们无所畏惧，无往不前。这样的伟大事业，不只是土耳其共产党人在完成，而且中国共产党人在当前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也在完成，中国共产党立即决定从言论转向行动，同国民党合作，不考虑自己的后果。如果国民党突然不满意，比如把我抓起来，枪毙我，我也不会后悔，因为我知道，我的同志们会按照我们的政策，继续完成工作。”

张继：“苏联与中国北方政府签订了协定，这就是一种不光彩

的行为，因为它同时又与革命政府签订条约并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

谭平山：“张继同志现在所谈的是一个被误解了的外交举动。我认为，国民党反对中苏协议没有任何好处，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正在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斗争，而协议具有同样目的。如果国民党反对这个协议，那么全中国人民就会认为，我们是由于不同政党之间的纠纷而完全忘记了人民的利益，但这是谎话，因为我们党是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的。这样做，人民又怎么能相信我们呢！此外，这也会成为我们敌人手中的好材料。我们应该明白，一个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权力并废除损害中国主权的条约的国家，是对我们最友好的国家。在中苏协议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联放弃了所有不平等条约，因此我们和我们的党应该认为苏联是对我们最好的国家。而张继同志不把苏联看作这样的国家，甚至毫无根据地攻击它，这是与我们党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以上四点只是理论上的论据，谭平山发言之后，张继对上述论据没有再作出答复。以下四点表明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

张继：“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会控制国民党的事业和行动。”

谭平山：“如果张继同志认为共产党员在加入国民党以后所发挥的积极性是不可接受的，那么这个问题倒是应该加以解决。解决的办法只能是这样的：1. 解散整个中国共产党，2. 遣散所有在国民党中登记的共产党员。然而，因为中国共产党加入了共产国际，所以没有共产国际的认可，这个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国民党可能从共产国际那里得到这个认可，但我并不认为它会这样做。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想说几句。还在我们加入国民党之前，它的主席^①曾允许我们保留原来的组织，后来他经常对我们全体成员讲这一点。我们在国民党中应该具有积极性，但是共产党员的

^① 即孙逸仙。

这种积极性不属于我们党的积极性。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工作是否有利。我敢说，在最近几个月内我们的活动给国民党带来了好处，如果我们有什么过错的话，可依照章程处罚我们。”

张继：“自共产党员加入我党以来，他们只给我们带来了麻烦。”

谭平山：“国民党内发生的麻烦事并不是因为共产党员加入的缘故，而是因为缺乏组织性。一个由各阶级组成的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麻烦事。至于混乱，我认为恰恰相反，正是共产党员与国民党的合并给党带来了许多好处，而不是麻烦。事实胜于雄辩。我请张继先生拿出事实来证明共产党员给国民党造成了许多麻烦。”

谭平山停顿片刻，但张继没有回答。

谭平山：“如果您没有证据，您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我可以举出许多事实证明我所讲的话。自国民党改组以来，它进步了，对此共产党员作了许多促进工作。每个有共产党员工作的区党部，很快成立了委员会，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和正确无误。另一方面，在没有共产党员的地方，工作进行得不顺利，什么任务都没有完成：如在湖南、浙江、吉林、安徽、山东等地，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而在广西、福建、安徽、河南、山西、四川等省，没有共产党员，是你们的党员在那里工作！你们给他们提供了资金和其它帮助，但至今委员会还没有成立起来，我们不知道委员会是否能成立？我没有看到共产党员给国民党制造任何混乱。如果张继先生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那么他可能认为下列情况是混乱，即我们与你们党合并之后，军阀曹锟、吴佩孚停止了进攻，帝国主义者压迫不那么残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国民党最好不要宣布革命，因为有朝一日革命开始，我们必然要经受许多混乱。”

张继：“在我们国民党内没有右派和左派，但是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存在着反对派。”

谭平山：“国民党内有两种人，即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但外部我们有两个党，即国民党与有着自己独立组织的共产党。”

张继：“鲍罗廷说过，再过一百年后才能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如果是这样，那么现在就不需要它。”

谭平山：“现在在中国需要有共产党，因为它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党。虽然在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少，但终究是有，因此应该有共产党。还有几个不很重要的论据，我现在不谈了。”

张谭之间的辩论持续约两个小时，张不再回答。然后汪精卫说，张继说了许多多余的话。鲍罗廷同志对于中国革命来说确实很宝贵，他在援助工作中是忠于革命的。张继所讲的话对他是很不公正的。鲍罗廷受总统邀请担任各项事务的教练员，这比当政治局顾问管的事更多，这就是为什么张继认为他在当时连顾问也不能当的原因所在。顾问是总统任命的，对此我们无可非议。至于两党之间的争论，我们应该找到把它们联合起来和加强工作的办法。廖仲恺说，“国民党”这个词已死亡，这是真的。如果党员不努力工作，不服从党规，就意味着这个党已死亡。至今还有许多组织不赞同党章。

张继气愤地站起来，胡汉民主席制止了他，他说，廖仲恺所讲的是另一个问题，需要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会议来研究这个问题。林森也为共产党讲了话，他说，如果共产党遵守国民党的宣言和原则，那么国民党就不应该搞分裂。柏文蔚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为它带来的好处：加强了国民党政权和它与共产国际的真正联系。邵元冲建议召开专门会议并请总统直接征求第三国际意见。会议决定公布宣言，说明党的全部工作并在8月10

日^①召开专门会议。

全宗514，目录1，卷宗1，第181—187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118

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

1924年7月12日于北京

致鲍罗廷同志

广州

亲爱的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

您7月6日发来的第520号^②电报使我感到很突然。我有您7月2日关于您坚决攻击国民党的报告^③，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预料到，只过了四天您就会作出如此灾难性的判断。您认为让左派去打击右派是困难的，这样做国民党必然灭亡。不仅如此，您甚至还确定灭亡期限为几个月。由于我不知道这种悲观主义结论的根据是什么，所以使我有些惶恐不安。我恳请您让我知道拉狄克是怎么说的，要“具体”内容，不然很难作出判断，更难及时向莫斯科作出通报，因为如果真的发生某种不幸，而莫斯科不能及时得到通报，我想这样是令人不快的丑事，因为莫斯科应该了解

① 指1924年8月15日至9月1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② 电报没有找到。

③ 报告没有找到。

情况，因为终究他们要为中国的工作负责。然而，不仅莫斯科，甚至连我也不知详情。维经斯基对我讲过一些情况，看来你同他对形势的估计没有特别不一致的地方。此外，他还对我说，您同国民党没有达成谅解，在与他们的会谈中您讲的也是这些看法。这给他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右派的问题，看来，最近一段时间右派力量大大加强了，在党内外占据了大部分领导职位，这种形势无疑是危险的。维经斯基向我描述了逐步打击右派的计划。他对我说，无论如何要逐步达到这一目的。他特别指出，应在近几个月内召开的中央全会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他还指出，在会议的议事日程上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似乎是一种策略手段，但这一问题的提出必须在非常现实的基础上（当然，不是指南方政府的行动，而是指鼓动宣传）。在这个问题上，右派最容易被打败，因为他们不愿意认真地进行反帝斗争，而在此基础上较容易组织左派发动攻势，当然，在这一点上他们将会得到共产党人的全力支持。同右派的这种斗争方式无疑是适当的，我想这可适用于一定的时期。我觉得需要逐步地引导左派认识这种必要性。我说“逐步”，是因为我不了解情况，或许形势要求采取某种果断的行动。我征求您的意见，并急切地等待着您的答复。

我再次请您无论如何给我寄一份详细的报告。如果需要的话，您可不惜人力，派一专人把详细说明你们谈话情况和你们的建议等的书面材料送来。

我已给您回电，我认为，在他们接受我们所提出的措施之前，拒绝提供帮助是不适宜的。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应该在作周密考虑和与我商量之后再采取。

我很高兴，在您的调解下他们同意与陈炯明讲和。如果您有他们的很明确的协议，那就一天也不要耽误，而要立即着手做这件事。

关于北京的外交事务没有什么可等的。这里只发生一些小冲突。大使馆的楼房我们还没有得到，您从报纸上可以知道一些有关的情况。国书仍然没有递交，顾维钧迫于外交使团的压力在拖延，为的是让别人在我们之前递交国书。我们与奉天的关系依然与您那时一样拖着，最近一周情况将会明朗，或吵翻，或有某种结果。我现在想对他们作出的唯一让步就是20年^①。情况非常复杂，因为他们坚持的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方案，他们还借口说这一方案是您提出的，并且您接受了。但是我想终究可以打掉他们的傲气。

我将写给孙逸仙的几封信的副本寄给您。在一封比较长的信中我主要谈了帝国主义问题。您要装作不知此信的内容^②。如果孙逸仙想给您看，让他亲自自信给您，您就用这种方式了解信的内容。这很有意思，因为您必须坚持与过去同样的路线，使他觉得您甚至不知道这封信，可能还在坚持原来的观点。

为了让他们看到，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鼓动宣传方面的工作做得太少，我建议您让他了解北京的报纸。我每天给您寄英文和中文报纸上的消息。请您注意中文报纸，特别是《晨报》^③。我相信国民党的报纸是写不出这种风格的，也不会像这家终归是无党派的、资产阶级的报纸那样尖锐地攻击外国列强。要让他们为此而感到羞愧就好了。

明天，这里在中央公园举行群众大会，鉴于广州领事团长致信廖仲恺^④，我建议他们作出决议并向孙逸仙和廖仲恺发贺电。这就向孙逸仙表明，我们在北京这里在努力做对他有利的工作，可

① 看来是指与张作霖谈判中东铁路问题。

② 可能指加拉罕1924年7月11日给孙逸仙的信（参见M.C. 贾丕才：《苏中关系》莫斯科1958年俄文版第138—139页）。

③ 《晨报》是日报，1918至1937年间在北京间断地出版。

④ 指广州领事团就越南恐怖分子企图在6月19日广州沙面岛法租界谋杀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梅尔伦一事向广东省长廖仲恺递交了照会，其中要求广州政府制止谋杀和反对外国政府的行动。

以同北方这里的民族力量建立联系。如果孙逸仙能用某种书信方式对此电作出反应，那是最好不过的了，该书信就可以用来做宣传鼓动工作。

领事团给省长的信应该广泛加以利用。关于这一点我正要写信给孙逸仙^①。我想把这封信寄到与您有着良好关系的廖仲恺处，您容易对他施加影响并让他写一封较有激情的信。当然，不能引起冲突，答复不能带挑衅性，以免领事团召来舰队，但即使在最克制的答复中也可以有一点儿不中听的话，这样就能大大提高中国南方政府的声誉。我想您自己明白如何利用这种情况。

致礼

（米哈伊洛夫）^②

全宗 627，目录 1，卷宗 4，第 45—48 页。

打字稿，副本。

119

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

1924 年 7 月 13 日于上海

秘密

亲爱的维经斯基同志：

您从北京写来的信和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收悉。鉴于急需给北京、哈尔滨、天津和汉口派遣工作人员，所以我们同意召回的

^① 信件没有找到。

^② 即加拉罕。

同志务必尽快返回中国，特别是张太雷^①。我们也在期待教授^②返回。

8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在广州举行会议。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州分部的声明，这次会议将讨论和决定所谓的共产党问题。据说，孙中山虽不会马上抛弃我们，但根本无意制止反动派对我们的攻击。为了明确“如何在国民党中工作”，我们给各区委各地委和各独立组发出以下通告^③。您的意见如何？我们急切地期待着您的建议。

至于国民党目前的状况，我们在那里只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说那里有一定数量的左派，那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孙中山和另外几个领导人是中派，而不是左派（即便戴季陶也不过是左翼理论家），所以现在支持国民党，就只会是支持国民党右派，因为他们掌握着党的所有机构。在他们的对内政策中表现出反工人倾向，而在对外政策中表现出反苏倾向。如果以后还以这种精神（援助反动派）给以支持，那么这就会对远东的革命产生很大影响。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严重问题。您需要紧急给鲍罗廷同志发一份电报，请他提供实际情况报告。我们期待你们将根据他的报告制订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我们认为，对国民党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我们应该有选择地采取行动。这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

陈独秀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79，第 7 页。

① 张太雷率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团参加于 1924 年 7 月 15 至 25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② 可能指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李大钊教授。
③ 可能指 1924 年 7 月 21 日由陈独秀和毛泽东签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15 号通告（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 282—284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120

中共广东组织就 鲍罗廷的报告作出的决议

1924年7月15日于广州

机密

1924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
全体会议就鲍罗廷的报告^①作出的决议。

出席会议的有……^②同志。

听取了鲍罗廷的报告后支部认为，鲍罗廷对中国南方政治局势的估计和他拟定的路线是正确的。

会议还确认鲍罗廷同志就我们中国党在国民党队伍中的工作问题作出的实际结论是正确的。会议认为，迄今为止国民党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还没有完全放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现在还可以利用合法的方式在广大劳动群众中进行工作，以便深化国民革命运动，加强工农潮流，因此共产党人不应该退出国民党。会议认为，在准备可能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上，我党实际上走上了一条不正确的道路，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现时条件下应起的作用。

① 鲍罗廷的报告没有找到。

② 删节号是文件中原有的。

会议认为，坚持把广州作为国民革命运动的基地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支部书记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4，第 2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121

鲍罗廷给瞿秋白的信

1924 年 7 月 18 日于广州

敬爱的瞿秋白同志：

您的两封来信收悉^①。关于办报的准备工作^②，我立即发了电报，想必您已经收到所需要的东西。请告知，准备工作进行得怎样？什么时候做好着手出版报纸的准备？在广州我这里，同志们开了会，决定立即着手组建（新闻）社，将从广州为你们的报纸提供各种材料。我们商定，若是上海的报纸能为广州的材料开辟专栏，比方说，视材料多少提供半版或整版版面，那么我们就根据这种情况来收集材料。这就是说，全部材料将汇总到（新闻）社，在那里进行分类、修改，然后把改好的稿子寄给您。

至于戴季陶访俄一事，我的意见是，应暂缓进行。我看不出

① 可能指瞿秋白 1924 年 6 月 20 日信和他的一封未注明日期的信，估计是在 1924 年 7 月上半月写的（《瞿秋白选集：政治理论编》第 2 卷，北京 1988 年版，第 602—605、607—608 页）。

② 这里说的是中共准备在上海出版的报纸。

现在进行访问有什么目的。为什么他要去那里？他将在那里干什么？如果戴季陶确实有什么必要去那里，那么他的访问应事先做好准备，否则他不会从这次访问中得到什么好处。而如果他仅仅是一个失望的萎靡不振的知识分子，在寻求某种新的奇遇，那就根本没有必要派他出访。不管怎么说，我建议暂缓这次访问，即便是孙派他去，我也是这个意见。您说，您猜到了他离开广州的原因，您真的猜到了吗？您是否认为，他反对提出共产党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为什么不继续捍卫自己的观点，而是简单地一走了之，抛弃我们这些反对这样提问题的人，让我们孤军作战？他要离开广州是否只是因为他厌倦了这里的工作和他本来就喜欢自由？

广州的情况简述如下：成立了由所谓“左派”组成的政治局^①，谭平山拒绝参加，借口是他没有时间。上海中央是否认为采取这样的步骤是正确的？是不是他还是参加为好？而不是做对那里的什么事情都沉默不语的见证人，以便对每个问题都发表意见和提出自己的决议案。如果您认为谭平山不便参加政治局，那么或许应该指派另一个人。在广州，看来没有另一个人可选，我们打算让您去参加，哪怕是在暑假期间，学期开始前您可返回上海^②，留下某个人当副手。

政治局通过了以下决定：1. 减少地租 25%，出租者减一半，政府减一半。2. 为贯彻这个法令，在专门的学校培训 200 名工作人员到农民中间做三个月工作^③。根据政治局决定，他们到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同匪患作斗争，贯彻减租法令。3. 政治局决定派遣现在在北京以外的所有国民党议员返回北京议会，以便在那里建立国民党党团。派到那里去的议员，必须按党的章程规定预先作出

① 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成立于 1924 年 7 月 11 日——译者。

② 当时瞿秋白在上海大学执教。

③ 指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声明：一旦他们的行为违背中央指示就辞去议员职务。4. 政治局发表了关于中俄协定的宣言^①。宣言的有些部分是不错的，但谈到帝国主义，它像国民党的整个政策一样显得苍白无力。改好这部分的种种尝试均未取得成功。应该说，在政治局里坐着伍朝枢，他要把宣言修改成帝国主义所喜欢的。国民党人的市侩习气和奴颜婢膝没有限度。在这方面，现在在所谓的“右派”和所谓的“左派”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但毕竟这个宣言向左迈出了一步。关于庚子赔款的第二个宣言^②是蛮不讲理的。他们发表这个宣言未告诉我，甚至没有给我看。看来，他们怕我像对关于中俄协定的宣言那样同他们争吵。我认为，对这个宣言必须给以全面抨击，特别是对帝国主义放弃庚子赔款表示奴才式的谢恩部分。最好尽快在上海办一份我们的报纸，以便有可能给他们以迎头痛击，尤其是现在很有这个必要，因为政治局将就所有政治问题发表宣言和决议。可以想象，那里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混乱和保守思想！

我还希望能组织国民党的左派运动。确实，在这方面我们遇到了很大困难，但必须这样做。我认为，我们的整个方针应该是召集和组织国民党左派。我再说一遍，必须尽快办报纸，它应当成为一个中心，国民党的所有左派力量将聚集在它的周围。但这不是全部工作。我们的同志现在对可能退出国民党的问题考虑太多，因此很少从事在右派和左派之间加楔子的工作。在广州，我们的同志几乎没有在国民党中央提出任何政治提案和决议案。自然，没有实际考验左派的机会。我们的同志应当很明确地就所有地方、全国和国际性问题提出提案和决议案，不要怕在国民党中央产生冲突和磨擦。

① 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发表的宣言。此《协定》根据孙逸仙的指示于1924年7月14日公诸于世（见《孙中山选集》中文版，第753—756页）。

② 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4年7月21日就国民党对外国人的态度问题发表的宣言。

给您寄去第 160 期《通讯》^①。在编者注中您可以发现对我们广州同志的一条小的批评意见。我认为，提出这条批评意见是完全应该的，将有助于我们更积极地对待自己在国民党中担负的职责，对于往右派和左派之间加楔子也有很大好处。我给您寄这期《通讯》有两个条件：1. 不要从中央手里传出去；2. 您要参与《通讯》工作。请每周给我寄可能对这个《通讯》有用的各种材料。当我们的上海报纸开办时，我们可以使用这个《通讯》中的一切合适的材料。以后《通讯》每周出一期，我们将定期寄给您。但请您记住，我需要上海的材料和其他各种材料。请寄俄文稿。请陈独秀为《通讯》撰写简短的社论，谈国民党问题或他对政治事件的评价。

有去汉口的一位同志到您那里去^②。请为他提供可靠的关系，他本人将告诉您，他们需要他做什么。

您认为，对天津妇女日报该怎么办^③？值不值得给以支持和给以多大支持？北京、汉口等地在干什么？请为我们《通讯》写写各种情况。请注意，它只印几份，仅给几位亲密的同志。因此，您什么情况都可以写。不要等信使，通过邮局寄到 M. 布劳恩名下，广州，东山，恤孤院路 55 号。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2，第 4—7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① 指鲍罗廷处编印的新闻通讯。

② 此人不详。

③ 指 1924 年 1 月 1 日至 10 月 1 日在天津出版的《妇女日报》。

122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12号记录
（摘 录）**

1924年7月24日于莫斯科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会议第12号记录**

出席：

政治局委员：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鲁祖塔克、捷尔任斯基、索柯里尼柯夫、伏龙芝同志。

中央委员：库克林、克拉辛、安季波夫、安德烈耶夫、曼努伊尔斯基、彼得罗夫斯基、苏里莫夫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雅罗斯拉夫斯基、扬松、索尔茨同志。

听取：13. 关于批准与中国的协定问题^①（报告人：罗特施泰因、科普同志）。

决定：13. — [1] 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将同中国的条约按苏维埃程序报批。

^① 指1924年5月31日签订的中苏协定（参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7卷第331—346页）。

[2] 指示外交人民委员部，不得将外国政府已批准并有明显不能接受的提法的条约提交政治局讨论。

[3] 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通过今后与中国的谈判，包括会议^①，在对中东铁路条款作解释时，要力图不使苏联政府为向中东银行^②的持股人及其国籍选择支付补偿承担任何责任。执行这个指示是有条件的，也就是不能破坏我们与中国的关系。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452，第 1、2、6 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1924 年 5 月 31 日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 2 款规定了为使协议具体化而举行苏中会谈的办法。1925 年 8 月—1926 年 6 月举行了会谈，但无结果。

② 指《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第 9 款第 4 点，根据这一点苏联政府同意对 1917 年 2 月革命之前持有中东铁路股票、债券的人及贷款人负责赔偿。在政治局的记录中谈到的中东银行，显然是指在 1910 年改组的华俄道胜银行，在 1917 年 12 月由苏联政府收归国有。

123

就中国农民问题与孙逸仙 和廖仲恺的谈话^①

1924年8月10日于广州

就中国农民问题与孙逸仙博士的谈话

孙逸仙博士就农民问题与弗^②同志交谈时说：“我的中国革命观始终认为，中国强大的国民运动和争取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应该由广大民众来进行，而首先由农民来进行。迄今为止我和国民党还没有与农民接触。在国民运动中出现这一大的疏忽主要是由我的拥护者们的社会成份造成的。”他笑着说，“我本人是资产阶级出身，我的大部分拥护者属于大学生阶层、城市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商界。因此，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在那里扎根。农民运动讲习所^③第一期结业之前，我很想亲自给学员们讲几次课。通过这个讲习所和将来其他学校的毕业生，我们将能够有组织地把农民联合到劳动农民协会中。那时国民党在广东将拥有近300名受过训练的农村鼓动员。

“我在农民问题上的政治路线是：我决心将所有现在掌握在地主（出租土地的人）手里的土地转交给农民掌握和所有。但由于

① 根据1924年8月10日的第161号电讯稿发表。

② 可能指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农民部顾问弗兰克。

③ 指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一些地区的地主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很强大并有很大影响，因此我认为下面这个唯一的途径是合适的。您为广东的农民协会组织制定了计划和章程，我还听说在一些地方已转入建立实际的农民协会机构。我们应该在整个广东建立农民协会，从而建立反对地主的强大工具。只有我们建立这些协会并把农民武装起来，才能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至于目标，我同意您的意见。但我认为，在当前组织农民协会的形势下，进行任何反对地主的宣传都是策略性的错误，因为那样做会使地主在农民之前先组织起来。”

无论弗同志如何激烈地反对这种策略，但孙博士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且得到了廖仲恺省长的热情支持。作为反对在农村宣布阶级斗争的很有力的论据，廖仲恺引用了这样一个事件：在广宁地区我们已基本准备就绪的农民协会组织引起了武装冲突，在这次冲突中豪绅们把一部分农民吸引到了自己一边。区长（国民党员）也站在地主和豪绅一边，因此，政府不得不派遣一个多师的兵力到广宁镇压地主暴动，至今尚未平息。政府没有更多的军队可以派往广宁。如果在其他地区也发生类似的暴乱，这将威胁政府的生存。

孙博士不太积极参加这一部分谈话，但他是支持廖仲恺省长的看法的。廖省长在回答弗同志的反对意见时解释说，中国农村的情况很特殊，宗族关系还没有打破，地主、豪绅和农民往往是同一家族的成员，有同一个姓氏。由于农村是比封建结构还落后的宗法结构，阶级矛盾比较缓和，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更像叔侄关系，而不像两个敌人之间的关系。

尽管弗同志全力反对这些看法，但孙与廖仍然确信，在组织农民协会时期不应进行任何公开反对地主的宣传。

孙当时就说，他的故乡是发动农民运动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因为它属于在中国少有的大地主地区，那里的土地集中在少数有

钱的地主手中，大地主掌握着七分之六的土地，有40万成年男子居住在这里，有2万支枪掌握在农民手中。

当弗同志问，根据孙逸仙的意见什么时候能在香山^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时，孙回答说在充分做好组织准备工作的情况下，用半年时间进行土地改革就够了。

全宗514，目录1，卷宗94，第377—380页。

打字稿，副本。

124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二次全会讨论与共产党 人关系问题情况通报^②

不早于1924年8月30日^③于广州

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党内共 产派问题”（1924年8月15—30日）^④

早在全会之前围绕共产党员的问题就已议论纷纷。右派出版了反对共产党员的专刊，举行了一些会议。他们视共产党员为敌

① 香山是孙逸仙出生的县。

② 作者不详，但根据文字风格像是鲍罗廷的报告。

③ 日期是根据文件内容确定的。

④ 根据档案材料，全会于1924年9月1日闭幕。

人，要求将共产党员开除出国民党。甚至还出现了右派与共产党员进行“理论”论战的文章，就以下问题进行了辩论：是搞阶级斗争还是在工人运动中搞改良主义？作为革命的方法，是搞军事行动还是搞大规模的宣传？在这些辩论文章中，右派不止一次地提出这样的看法：似乎国民党主义就是妥协和“劳资调和”；国民党先用武力消灭“北方的篡权者”，然后，只从事“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准备工作。至于国民党现在进行的反帝斗争，这是出自于共产党员的“计谋”，他们想以此来破坏国民党与这些强国的“友谊”，等等。

中派则采取了这样的政策，他们说，我们与共产党员完全一致，那么为什么共产党员还要保守自己的“秘密”，如果这些秘密确实有利于国民党，不妨把它们公布于众，这样右派就没有任何理由攻击共产党员了。他们甚至认为共产党员与第三国际联系是企图“垄断中国革命”，为此才需要“保密”。在这一点上中派与右派是一致的。

国民党右派的思想蜕化可能影响这个问题，这是由于现在的国民党与过去的国民党还有联系，那时国民党体现着华侨对革命的支持，他们在某个时期，如第一次革命时期^①，在各方面都起着买办的作用。由于今天的中国革命已是劳动民众和部分民族工业资本家的革命，因此极右派的思想已经开始在国民党中削弱，因为客观条件促使国民党与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而如果在人民面前公开表示与某一帝国主义国家合作，就意味着断送自己的前程。假如中派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切，那么他们仍然会感到困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认为，最好是既能控制民众，又能安抚帝国主义者。为此他们既需要共产党员，又需要右派，只是要共产党员服从他们。

^① 指 1911 至 1913 年的辛亥革命。

因此，中派还谈不上要开除共产党员。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即如何使共产党服从自己的领导，因为共产党员在其独立的党的领导下在国民党内“作为支部”进行活动，所以国民党人认为，这就意味着不是国民党在领导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全体党员，而是共产党员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决定，以及第三国际的决定，在领导国民党。因此，必须提出解散共产党或将共产党员开除出国民党的问题。但是中派现在不可能也不希望这样提出问题，于是他们只好想出一个既能探听到共产党员“支部的秘密”，又能瞒住右派的方法。他们说，假如共产党员（共产党）让他们知道其有关国民党问题的决定和共产国际对这些问题的指示，那么整个争论就可以得到解决。但在全会召开之前，工农群众也将自己的决议和表示“祝贺”和“希望”的信寄给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他们希望全会发展反帝路线，奉行面向工农的方针，而不是相反，与共产党决裂。

中派对右派隐瞒了什么呢？中派建议成立一个直属中央政治局的国际联络委员会，它应得到第三国际的所有指示，这样就可以切断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然而，共产党员告诉他们，这个委员会可以首先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弄清楚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然后再看一看，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除此之外，共产党员还坚持要求所有国民党员，其中也包括共产党员，都要遵守国民党的章程和纲领，无论是谁，如果不服从章程和纲领，即不进行或不愿意进行积极的反帝斗争等，都应当受到党纪的惩处。至于共产党作为独立于国民党之外的党的行动，这与国民党毫无关系。最后中派同意了共产党员的意见，希望全会暂时在表面上“平安无事”。所有这些都是由政治局来完成的，而中派应该以政治局的名义向全会提交以上述精神制定的决议案。

全会开幕了。在前几次会议上所有时间都在谈论全会的各项议程。第一个问题是，全会是否应该讨论共产党员问题以外的其

它问题。右派不想谈任何其它的问题。但是当左派（共产党员）指出，现在由于同“老虎队”（商团）发生的武装冲突^①，革命政府正处在危机之中时，右派和中派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立场。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央候补委员的表决权问题（中央大部分候补委员为共产党员）。右派当然不想让共产党员有表决权，而中派在全会一开始想表明自己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反共分子，他们千方百计在程序上做文章以反对左派。

当谈到会议的主题时，右派以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客气而委婉地发了言，他们长时间地、枯燥无味地、含糊其词地讲了自己的报告，只是到最后才要求“共产党员友好地退出国民党”。右派显然已经知道中派提交决议案之事，他们在会议上对所有的理论问题都作了让步，只字不提在全会前和全会外所持的立场。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后，共产党员首先发言反对这样提出问题，指出，所谓“共产党员友好地退出国民党”意味着不是别的，而是开除共产党员，这只有在国民党改变政治路线，也就是国民党在这次全会上决定不再进行反帝斗争，不再支持劳动大众的革命运动，就像迄今为止右派在实践中和在理论上所做的那样时才会发生。到那时党只有分裂，这正是帝国主义所需要的。

至于所谓的“国民党内共产党员支部的行动”，共产党员声明，如果国民党是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党，即革命的、反帝的党，那么共产党员无需在党内建立支部；如果现在国民党中确有那么一些不愿意进行革命和反帝斗争的分子（共产党员在全会一系列会议上列举了许多事实证明这一点），那么这种使国民党全党革命化的共产党员支部的存在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况且，即使从形式方面看，“共产主义支部”也不存在任何问题，因为孙逸仙在接受共产党员加入自己的党时就同意保持共产党存在的独立

^① 指商团的轮船将其在香港购买的大批枪械于8月6日秘密运往广州。8月10日孙逸仙下令将船截获，所运枪械全部封存于黄埔军校。

性。共产党独立存在本身就意味着，虽然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但他们依然像过去一样要遵循共产党的决定，因为他们仍然在共产党内。这样，共产党员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或者是国民党改变自己的政治行动纲领，而孙逸仙违背自己同意共产党独立存在的诺言，那就意味着开除共产党员；或者是根据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和章程，对自己的党员，无论是共产党员或其它人，都绳之以纪律，这实际上意味着开除右派。

此时中派已被迫改变了立场，并开始准备“摊牌”。他们开始替共产党员辩解，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任何支部，因为共产主义和国民党主义在现时的历史时期是一样的，共产党员的过错只是在其党的决议中，即中央监察委员会（右派）所找到的决议中，用了粗俗的、不礼貌的语言评论国民党员。中派又说，但这是小事，重要的是让国民党有一个特殊的组织，它能知道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能经常得到莫斯科的指示，甚至不用探听共产党的“秘密”，国民党就可以知道共产国际对自己的态度，否则就会怀疑有支部存在，尽管实际上并不存在支部。还有，这样的组织也可以同共产国际进行谈判以彻底解决问题。

政治局制定的决议案提交给中央委员会全会讨论。这些决议案以 9 票（即全票）通过。人们从附在本文后面的决议案中可以看到，所谓的国际联络委员会的任务只限于弄清楚所谓“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而不是中派所期望的一个经常从莫斯科得到指示并凌驾于两党（国民党和共产党）之上的组织。决议案一通过，中派显然感到陷入了自欺欺人的境地，于是向全会提出还应该发布关于这一问题的训令以“教育党员”。中派拟定的训令初稿与刚刚通过的决议相抵触，因此中派与左派（共产党员）之间又发生一场顽强的斗争。最后共产党员争取到，训令以决议为基础。决议说，国民党没有任何必要干涉独立的共产党的事务，它确定了国际联络委员会的任务是，应与共产国际一起进

一步弄清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中派不得不同意这一点，是因为当时正好发生了商人罢市反对政府的事件，并且来自工人方面的压力也相当大，工人们要求解除商团的武装。

这一事件发展了。在英国炮火的威胁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依靠工人群众，至少是为了维持自己的中派立场。因此，在全会快结束时孙逸仙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突然”向左转是不奇怪的，附上的全会最后一次会议的记录证明了这一点。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举行这次会议的那天，正是英国驻广州领事致函孙逸仙（最后通牒）而孙逸仙签发反帝宣言的那一天^①。

* * *

附录一：

关于在国民党内之 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

1. 现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之下，各阶级中自有力求解放中国，要求独立，脱离帝国主义压迫之共同倾向，中国国民党即为代表此等阶级之共同倾向，从事于国民革命运动之三民主义政党。故凡属一切真正的革命分子，不问其阶级的属性为何，吾党皆应集中而包括之。

2. 本党章程规定：“凡志愿接受本党党纲，实行本党议决，加入本党所辖之党部，依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故凡党员之行动，并未违反此章程之规定者，本党殊无干涉之必要。至

^① 见《孙中山选集》中文版，第689—691页。

于行动违反党纲章程，不愿积极从事于三民主义之革命运动，既不反对军阀及帝国主义，又不赞助劳动平民者，则不问其思想上属何派别，概当以本党纪律绳之。

3. 中国共产党并非出于何等个人之空想，亦非勉强造作以人力移植于中国者，中国共产党乃中国正在发展之工业无产阶级自然的阶级斗争所涌现之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之组织既系如此，则自不能不为国际无产阶级政治组织之一部。即使吾人能以人力解散现存之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必不能随之消灭，彼等必将另行组织。故中国国民党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问其行动是否合于国民党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至于本党之外存在之中国共产党，作为非共产主义政党之国民党，对其存在及其党员之行动，殊无监督之必要。因本党只应就本党纲领与章程以管理一切党员。共产主义者之接受本党党纲，而加入本党，即当视为本党党员以管理之。

4. 因本党之外存在着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内之共产主义者有从事“支部活动”之嫌，故中央政治局下设国际联络委员会，其任务之一，是尽力弄清共产党对国民党之态度，以达到相互了解，消除误会之目的。

* * *

附录二：

关于国民党与国际革命运 动之联络问题的决议案 [……]①

① 决议全文发表在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卷第327—328页。因此本文文件集没有收入此决议。

*

*

*

附录三：

孙逸仙在国民党中央全会 最后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24年8月30日）

8月30日下午2时，全体中央委员聚集在广州大学大礼堂。会议在孙逸仙主持下宣布开幕。

程潜（全会秘书长）报告了前几次会议上“对问题的解决情况”。这一问题的“解决”表现为三个文件：

1. 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
2. 关于国民党与国际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的决议案。
3. 关于同志们就双重党籍党员（即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争论问题的训令。此外，秘书长宣布，那些提交全会而来不及讨论的问题将移交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孙逸仙致闭幕词。首先孙博士问与会者：“你们能否确信，在全会通过决议后同共产党员就不会再有摩擦和争论了呢？”

李烈钧（将军）和程潜（右派）回答说：“如果从这时起全体同志同心同德地积极地进行国民革命工作，我们认为不会再有摩擦。”但张继回答说，这要看“今后的事实”。

孙博士说：“我认为这种冲突不是这么容易消除的。我的看法是，关于国民党内共产党员问题的争论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原则问题。在重审全部文件时，我明白了，问题不在于似乎一些人

(共产党员)有错误行为或写了反对我们政策的文章,另一些人因此而与共产党员斗争,绝对不是这样。那些反对共产党员的人根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主义。我们从事革命工作已30多年,革命尚未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同志们不了解自己党的主义。俄国革命之所以完成得那么快,那么彻底,就是因为革命党党员的自觉性和训练有素,他们了解自己党的主义。因此,俄国组织的方法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典范。因而我请鲍罗廷同志担任我们的顾问,任命他为我党教练员。在党改组之前我们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召开代表大会。现在代表大会已开过,党已进行了改组。起初,当党作出决定:党要进行改组时,冯自由同志并不反对,两个月内他从未讲过任何反对改组的话,当时他是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但是,当中央委员会刚选出,他因未能入选,就向我们的敌人(香港《大公报》)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关于改组和党的全部情况。冯自由因为未被选为中央委员而煽动一伙人反对共产党。我相信冯自由一个人不可能煽动很多人,但他入党已20多年,在同志们中有一定影响,有些同志不自觉地附和他。现在我以党主席的名义宣布开除冯自由出党。

“同志们说我的民生主义不是共产主义。他们不了解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原则上不存在任何差别,差别只在于其实现目的的方法不同。

“起初共产党员是反对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但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告诉他们,俄国革命所从事的大部分工作是民族主义的工作。因此,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承认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并决定加入我党。另一方面,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基本上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决定接受共产党员加入我党。现在如果有人说我民生主义不是共产主义,那么这位同志的‘民生主义’可能与我的民生主义不同。如果在全会以后还有同志说不了解我的主义,再无端挑起是非,我们就将采取对冯自由一样的方法来对

待他们。”

孙逸仙博士停顿片刻，环视所有与会者。张继突然说：“开除冯自由您有这个权力，但是不了解民权主义的党员大有人在，而且国外华侨都不了解。此外，我与冯自由持有同样的立场，因此我也请求处罚我。”

孙逸仙博士继续说：“您（张继）只是不了解和不明白，您的立场与冯自由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至于谈到华侨，他们大多数人在美国、英国，他们在那里被帝国主义的宣传所欺骗，认为俄国革命是危害人类的洪水猛兽。他们已习惯看到英国的、美国的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况且，他们曾给予第一次中国革命以帮助，然而他们既没有得到政权，也没有得到财富，因此华侨反对革命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我们党不需要那些参加革命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党员。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只是手段，而民生主义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如果我们抛弃了这个目的，那么我们还要革命干什么呢？假如这样，我也就抛弃革命了。”

接着孙博士着重讲了第一次革命的历史，指出黄克强和宋教仁的妥协，他们当时的不坚定性和无纪律性阻碍了革命的胜利。

张继这时打断了孙的讲话，他说：“过去主席您宣传的思想是先统一中国，在此之后才开始实现三民主义，现在我们反对民生主义正是基于这个思想。”

博士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甚至连党都统一不起来，就更谈不上国家了！党员应绝对服从自己的领袖和他的领导，因此我们在过去组织了中华革命党。那时每一个党员都宣誓，但后来表明，宣誓归宣誓，党员根本不尊重我的指示。我们的同志，还有我们的军队只有当命令对他们有利时才服从，反之往往拒绝服从。如果所有的国民党员都这样，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

张继打断孙博士的话说：如果主席将成为共产党员，那么我

们大家也都是共产党员了。“至于开除冯自由出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可以下令执行。”

孙博士继续说：“我们革命运动的目的是民生主义。而现在广州的工人和农民的情况非常严重，应予以重视。最后陈廉伯（广州买办阶级的首领）与帝国主义联系密切，反对革命。甚至我军的某些将领也附和陈廉伯。这些将领与陈廉伯签署了停战条件。但我不承认这些条件，因此‘老虎武装’问题对我来说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外国人与商人携手共同反对革命。政府已经收到英国总领事的最后通牒，通牒中说：‘如遇中国政府向城市开火，我们（英国的）驻广州的军队将全力对付政府。’同时廖将军^①与范将军^②对我说，如果政府抢商人的粮食，他们将出来‘维持秩序’。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孙博士在结束发言时再一次详细地解释了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差别，只是为达到目的所走的道路不同。

会议在“沉闷的气氛”中闭幕。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03，第 188—195、218—222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① 即廖行超。
② 指范石生。

125

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

1924年9月7日于上海

秘密

亲爱的维经斯基同志：

想必您已收到我的第一封信^①。也许日内我将收到您的回信。张太雷、彼得罗夫^②等人早就到了上海，而中央执行委员会派到莫斯科去学习的40名学生，自己支付了费用，将分几批起程。很有意义的是，党派遣许多工人到莫斯科去学习，有20多名工人已被录取。在被录取的工人当中，有10人已辞去工作，在上海等候起程。您曾答应为他们筹集旅费，如已弄到，请马上把钱寄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已经闭幕^③，这次会议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孙中山等人的态度在口头上保持中立。他们不能同我们的同志争吵，也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动派，但实际上，他们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和他们的反共宣传来压制我们，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行为。可是鲍罗廷同志不是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④，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中国共产党中

① 指陈独秀1924年7月13日给维经斯基的信（见第119号文件）。

② 即彭述之。

③ 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见第124号文件）。

④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在鲍罗廷的报告中称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成立于1924年7月11日，其成员有：孙逸仙（主席）、汪精卫、廖仲恺、瞿秋白、伍朝枢和邵元冲。鲍罗廷被聘为该机构顾问。

央执行委员会绝对不同意这个建议，并指出，鲍罗廷同志上了孙中山等人的圈套。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鲍罗廷发去电报^①，说明了孙中山等人的这个阴谋，以及这个建议和我们党绝对不承认任何这类决定将带来的不良后果。但遗憾的是，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作出了这种决定。

在远东的工作中，中国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像我们这样年轻的党，很难把工作做好。我们始终需要共产国际的好的建议和指示。请建议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同志，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他还会上圈套，还要提醒他始终要同我们党进行协商。

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7、8、9、10月份的钱来。

既然我们的同志对我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②的决议都很了解，而在实践中没有很好贯彻执行，所以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将提前举行。我们期望经过不长时间能从您那里得到一千多元钱来支付会议开支。我们迫切需要共产国际给代表大会发来电报。最好，您能再来一次。

致同志般的敬礼

陈独秀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79，第 10—11 页。

英文打字稿，副本。

^① 电报没有找到。

^② 指 1924 年 5 月 10 至 15 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

126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22 号记录 （摘 录）

1924 年 9 月 11 日于莫斯科

出席：

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洛托夫、加里宁、捷尔任斯基同志。

俄共中央委员：卡冈诺维奇、曼努伊尔斯基、拉舍维奇同志。

中央候补委员：斯米尔加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古比雪夫、雅罗斯拉夫斯基、扬松同志。

听取：

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出的问题：

[2] 关于中国问题（1924 年 9 月 4 日政治局会议第 21 号记录，决定：1— [2]）。

（1）关于张作霖问题。（报告人：契切林、温施利赫特同志）。

决定：

1— [2]（1）责成加拉罕同志与张作霖签署已拟定的协议^①。

听取：

^① 指 1924 年 9 月 20 日在奉天（沈阳）签署的关于中东铁路的补充协定。

(2) 关于孙逸仙问题。(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

(2) 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建议^①。

听取：

(3) 关于在中国的武装干涉问题。(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

(3) 责成契切林同志就中国发生的事件发表谈话，并与拉狄克就其在群众大会上的发言交换意见^②。

听取：

(4) 关于同中国的贸易问题。(报告人：契切林、阿瓦涅索夫^③同志)。

决定：

(4) 决议——“特别文件”。

听取：

(5) 关于对中国的援助问题(政治局9月4日会议第21号记录，决定：1—[2])。(报告人：契切林、加里宁同志)。

决定：

(5) 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建议，援助中国2.5万卢布，其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供1万卢布，其余的1.5万卢布由外交人民委员部按预算提供，全部援助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提供。

中央委员会书记 莫洛托夫

全宗17，目录3，卷宗462，第23页。

①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建议内容不详。

② 契切林就中国发生的事件发表的谈话没有找到。1924年9月5日《真理报》发表米哈伊尔·沙罗诺夫(契切林的笔名)的文章，标题为《世界对抗的新阶段》，文中谴责英国对孙逸仙政府的政策。

③ B·A·阿瓦涅索夫，苏联外贸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译者。

铅印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27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就瞿秋白同志关于广东政治路线的 报告作出的决议^①

不晚于1924年10月8日于上海^②

听取了瞿秋白同志的口头报告，并注意到他以前的几次书面报告，我们觉得，共产国际代表^③和瞿秋白同志在广州在如何在国民党内做工作的问题上犯了一些错误。

1.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期间^④，国民党中央根本没有打算同我们闹分裂，而只是想利用右派来威胁我们，使我们屈从于它，不对他们拟定的干涉共产党事务的计划提出异议。出席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的鲍罗廷同志和中国同志，未看清这个实际情况，也未反击右派，抵制他们试图把共产党置于他们控制之下的做法，而相反，错误地认为，我们应该帮助中派哄骗右派。他们放弃了我们对于右派和中派必须采取的立场，走上了向中派让步的道路。这样一来，同中派达成了妥协，采取了防御立场，因此落入了中派设置的圈套，结果我

① 不是中共中央全会，而是一次会议作出的决议。

② 日期是根据瞿秋白1924年10月8日给鲍罗廷的信注明的。参见《瞿秋白选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648—649页。

③ 指鲍罗廷。

④ 指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参见第124号文件）。

们遭到两大失败：(1) 我们对反动派镇压措施的决议案，在会议开始时没有提出，为的是不造成紧张的示威气氛，结果我们落到被告席上而未占有反右斗士的地位。因此，中派得以不声不响地回避对右派镇压措施的问题，很顺利地对我们发起攻势，并向会议提出预先准备好的干涉中共事务的决议案；(2) 《国民党内之共产党问题》决议案的第四条说：“因本党之外存在着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内之共产主义者有从事支部活动之嫌，故中央政治局下设国际联络委员会，其任务之一是尽力弄清共产党对国民党之态度，以达到相互了解，清除误会之目的。”^① 在国民党内成立干涉共产党事务的机构，是国民党中派很早的想法，是由孙逸仙博士在会前直接提出来的，现在采取了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形式。成立这个机构的原因和目的（即解决两党关系问题，包括消除似乎在国民党内正在建立共产党支部的怀疑），是国民党代表（汪精卫）、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同志）和中共非正式代表（瞿秋白同志）之间谈论的话题，并且已经同共产国际代表达成了协议。鲍罗廷同志和瞿秋白同志在国民党政治局会议上默认了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党问题的决议案的第四条，并让它通过了。中共（中央）执委会认为，这等于共产国际和中共承认国民党有权成立调查共产党活动的机构，这一条将被国民党用来作为干涉共产党活动的依据。

2. 共产国际代表未弄清楚国民党的人员构成，以后也未意识到，除了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没有另一个左派。国民党中央被称为左派的那一部分，实际上不仅不是左派，而且也未必能认为是中派，因为他们的主要观点和行动（如试图利用反动军阀来进行战争，回避捍卫工农利益等）与右派的活动完全一致，他们始终同右派实行妥协来镇压左派（共产党人）。共产国际代表在军事政策上对国民党的帮助，实际上扩大了右派的反对势力。在中派拒

^① 见第124号文件附录一。

绝接受鲍罗廷同志关于镇压反动派的建议和反对进行北伐来援助张作霖和卢永祥之后，鲍罗廷同志在关于不镇压反动派，停止反英斗争，停止反对孙以进行北伐为借口离开广州等问题上同孙逸仙妥协了。他还犯了另一个错误，促使孙博士发表一个宣言，宣布对广东的管理权归广东人，广州市长实行民选^①。因此，中派得以使局势更加恶化，把承认国民党对商人采取了错误行为的说法写进宣言，进而同商人志愿者达成妥协，将广州警察力量交给商团领袖调遣，并组建由国民党中央派和叛变的商人阶级组成的联合政府。

根据上述情况，执委会认为，鲍罗廷同志犯了许多错误，他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中央派的作用并同它达成了妥协，还有在实行自上而下对国民党的改造政策时犯的错误。特别大的错误是他支持国民党的军事行动。问题在于，目前不仅国民党中的许多右派分子是反动的，而且不少中派分子虽然具有模糊的革命愿望，但在他们的头脑中国民党的老政策根深蒂固，很难使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由于目前国民党中有许多反动的右派分子，而中派摇摆不定，又由于在国民党军队中是清一色来自反动右派的指挥员，没有可靠的革命力量，缺乏足够数量的革命分子在军队中做宣传工作和对它施加影响，所以国民党根本不能采取革命的军事行动。如果在这个时期我们支援国民党的军事行动，那么客观地说，这就会加强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削弱对国民革命的宣传。

中共（中央）执委会非常不满的是，鲍罗廷同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同党的执委会联系很少，也不同它讨论决议和对国民党的态度的改变，而是单独行事。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犯什么错误，那么这种状况也会破坏统一，破坏工作制度，这对国民革命运动来说是有害的。

^① 参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1986年版第34—36页。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0，第 96—99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128

中共中央给鲍罗廷的信

不晚于 1924 年 10 月 10 日^① 于上海

鲍罗廷同志：

自从汪精卫和胡汉民去广州之后，只有叶楚傖一人作为中央委员和书记留在上海。这次，当我们坚决要求开除两名在中国革命纪念日的“民众”大会上组织人殴打左派的右派时，叶楚傖递交了辞呈，请求辞去《民国日报》总编辑的职务，同时停止他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上海局的工作。因此现在上海无一负责的中央委员。而我们的同志（瞿秋白、沈定一、毛泽东）都是候补委员，不能任负责人。因此在上海已完全没有国民党的组织（局）。关于这一情况已由瞿、沈、毛向广州国民党中央作出报告，请中央发电命令在上海的叶楚傖、戴季陶和于右任重新开始工作，或派其他中央委员到上海这里来。但实际上，戴季陶和于右任不可能工作，而叶楚傖不可能回来工作，只要我们还持强硬路线。

务必尽快派汪精卫来上海。如果汪来此地，也许戴和于会同意予以协助，或者让某一候补委员（瞿、沈、毛）转为中央正式

^① 日期是根据陈独秀 1924 年 10 月 10 日的信注明的（见第 129 号文件）。

委员（最好是沈定一），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局才能继续工作，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在我们手中。

叶楚伧在报上发表声明，说他已经提出辞职，很快将去广州。但实际上他仍在上海。请您说服孙逸仙：1. 派汪精卫来上海。2. 召叶楚伧去广州（可以在政府中给他一荣誉职位）。3. 尽快让他们通过《民国日报》的新编辑人员名单（即邵力子、戴季陶、蔡和森、沈定一、刘仁静）。关于这件事我们已几次电告您，不知是否收到？

不要向香港的报纸（《中国新闻报》）提供资金。广州区委反对资助这家报纸，我们党中央赞成他们的意见。

高尚德同志去广州带给您的国民革命运动预算是否已批准？这笔资金对于上海、吉林、湖南、浙江都很急需。如果最近没有资金，那么这些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很快就会停止。特别是湖南和浙江的国民党党部已欠债，每个地区 3000 美元，这两地的负责人（我们的同志）已被追究债务责任（作为“民事案件”）。我们的意见是需要清还这笔债务，或由您负担，或列入新的预算，即从您那里以预付的形式得到这笔款子，以便在以后几个月里逐步还清债务。这个问题需要马上解决。不然我们就无法把同志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无法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工作。

还有一件事。军校^① 在用自己的经费为蒋介石征召兵员，并将这笔资金投放给上海的商业企业。

请特别注意。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瞿秋白译）

又及：根据我们的同志金佛庄的报告（此同志在黄埔军校工作），黄埔军校有很大的缺点：（1）右派军官千方百计阻挠工作

^① 指黄埔岛上的军官学校。

(政治工作)，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派去的政委^①实际上没有把工作开展起来，而蒋介石校长参加的国民党支部什么事都不能做。(2) 在学校里无政府主义者占上风，新改编的模范团也落到他们手中。(3) 你们的资金不知他们用到何处去了。因此，除了我们的同志以外，受他们（右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影响的学员很容易涣散。俄国的血汗（你们的资金），或许还有世界无产阶级的血汗花在这种学校上，我们认为很不值得，因为这个军校与其它任何一个军阀的军校没有什么区别。

请注意。

详细情况你们可以经常问我们的金佛庄同志（他在黄埔）。

中央委员会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5，第 19—21 页。

打字稿，副本。

129

陈独秀给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信

1924 年 10 月 10 日于上海

绝密

致共产国际远东部书记

亲爱的同志们：

直隶集团与反直隶集团之间进行的内战，在中国目前的政治

^① 指廖仲恺。

中掀起了一场风暴。目前战争的性质和我们对它的态度，我们在关于政治局势的第三个宣言^①中作了说明，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目前，作战双方，即江苏与浙江，直隶与奉天，哪一方都没有取得胜利，各方都在采取适当方式加固自己的阵地。不过哪一方都不会取得决定性胜利，因为他们势均力敌，每一方都得到一个国家的帮助，所以结果会是这样：在列强进行干涉的压力下，将成立由各列强集团同国内彼此达成妥协的军阀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

在国民党内，我们支持这样的看法：我们应当反对这种战争，尤其要反对列强对中国事务的干涉。然而国民党仍然坚持老政策：同张作霖和卢永祥联合，在战争期间，不做任何有利于人民的宣传。

共产党决定10月10日以党的名义散发传单，我们要向民众说明，国内军阀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下进行的这场可怕的战争，将会给农民、工人和所有阶级带来很多痛苦和灾难，对人民没有好处。

关于广东商团问题，孙中山和中派（只有共产党人代表国民党中的左派）一开始决定用武力来镇压以这些商人和帝国主义者为代表的反动派，但后来，当商团同滇军和国民党右派联合（特别是外交使团）向他和中派施加压力时，一方面他们知道，他们无力镇压反动势力，另一方面由于直隶与江苏开战，他们改变了最初计划，决定开始进行北伐，并任命孙为总司令。现在孙已去韶关。所有这些情况导致放弃了对商团的镇压计划。

更有甚者，中派首领胡汉民竟向商团作出让步，把广州的警察力量交给其首领李朗如，而把市政厅交给了与这些军队有联系的军阀李福林，旨在以这种方式来驱逐孙科（孙中山之子，原广

^① 指1924年9月10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国内形势的声明》（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87—296页）。

州市长)和吴铁城(广州警察局长)。

中派想通过这种途径使右派同这些部队断绝联系,而实际上胡汉民想利用与他有联系的这些军阀和部分商团部队来打倒孙科及其一伙,以便自己掌权。他想在中派和商人阶级之间建立联系,也就是要造成更反动的局面。

国民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在8月结束^①。三项决议案,即关于反帝运动计划、工人运动原则和对右派反动行为的惩罚的决议,没有提交讨论,而交给了临时书记处。临时书记处通过了这些决议案,但没有公布,也没有执行,原因是:

1. 我们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对中派作出的让步太多,对自己的观点捍卫太差。

2. 关于这件事的细节和广州的政治局势,中共根据瞿秋白同志的报告已作出决议,因此没有必要再重复^②。

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应当采取联合行动的策略,而共产国际代表同中共也应当对国民党采取共同行动。然而鲍罗廷同志从不同我们党协商,好像在中国不存在共产党。结果,对国民党没有采取联合行动。按照党的意见,国民党必须停止北伐,必须放弃广东政府,但鲍罗廷同志坚持另一种意见,他为孙中山的军事行动制订了计划并支持这样的观点:占领广东省无论对于对内政策还是对于对外政策都具有很大意义。在如此重要的政治问题上的这种意见分歧给广东同志造成了混乱,他们遵循的是两种不同的意见,无法对国民党施加影响。我们在国民党内的的工作也面临很大威胁,所以我们希望共产国际给他提出警告。

在财务方面,鲍罗廷已经改变了他原先的计划,停止资助国民党各省党部。我们给他去信,要求把原定给国民党省党部的这笔钱转给我们中共的省委,用来资助那些在我们控制之下并对国

① 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

② 见第124号文件。

民运动的实际工作提供很大帮助的省党部。

中国共产党书记 陈独秀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79，第 12—13 页。

打字稿，副本。

第五部分

冯玉祥政变与俄共(布)和共产
国际对华政策新重点

20年代中期，国际革命运动中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局面。资本主义世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后果中恢复过来。欧洲战后的革命高潮已经结束，共产国际不得不宣布世界革命缓慢发展阶段的到来。在苏联，新经济政策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但也引起了许多矛盾和混乱。在列宁患病期间特别是他逝世以后，俄共（布）最高领导层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白热化，党内就对内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国际的政策在五大前夕和五大期间（1924年6—7月）出现明显的左倾。对于欧洲来说，工人统一战线的策略开始被说成仅仅是一种宣传手段，而过渡的工农政府口号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词。社会民主主义被贴上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标签。代表大会起草的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被斯大林废弃，因为它没有包括“粉碎”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方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1925年3月21日—4月6日）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向东方共产党人提出了建立“人民革命党”、“人民党”、“工农党”的任务，共产党人应当从内部把这些党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①。

共产国际的上述总方针不能不在有关中国问题的理论研究中反映出来。主要问题仍然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与相互关系，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则是国民革命的性质和结局。在理论上，维经斯基1925年3—4月在《共产国际》和《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很有价值。维经斯基的看法是：中国资产阶级正在脱离革命，力求建立自己的有国民党右派参加的党；国民党正在变成“人民大众的党”；无产阶级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国

^① 见A·B·列兹尼科夫：《论共产国际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战略和策略——共产国际与东方。为民族解放运动中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而斗争》，莫斯科1969年版第139、142页；《共产国际史纲》，莫斯科1969年版第215—245页。

国民党在争取革命领导权,中共应在国民党内起主导作用^①。斯大林在1925年5月18日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发表讲话时对于这一点讲得更为坦率,他提出了把“由两部分组成的”国民党变成“工农”党的任务^②。中共四大决议(1925年1月)确定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方针,中共的《向导》周报在1925年全年积极宣传了这一方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在1926年3月2日通过的秘密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中正式确认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方针^③。但问题在于这一方针的可行性,在于找到实施这一方针的最佳策略方法。而(在上述方针范围内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的现实政治进程决定的。

1924年底和1925年,中国发生了重大事件,明显改变了该国军政力量的配置和总的政治气氛。1924年秋又一次爆发了直奉战争。由于冯玉祥将军叛变转到张作霖一边,这次战争以吴佩孚的失败而告终。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国家政变:逮捕了总统曹锟,驱散了国会。北京的最高权力落到了取胜的军阀联盟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手中,张作霖作为胜利者中最强的一员在这个联盟中起着主导作用。胜利者似乎是为了讨论中国未来的国家体制决定在北京召开全国会议。为了使会议表面上具有某种合法性,他们邀请孙逸仙这位中国最有影响的政治领导人出席会议。为了赢得北京舆论的同情,他们削弱了惩罚制度,释放了政治犯,取消了对出版和结社自由的某些限制。冯玉祥将参加首都政变的部队改编成为国民军(苏联当时的文献和报刊称国民军为“人民军”)。这些军队中有国民党的支持者(苏联的许多文献称国民军将领为“国民党将领”),虽然冯玉祥本人并没有表现

① 详见В·И·格卢宁:《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共产国际与东方。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列宁主义战略和策略而斗争,第283—286、288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7卷,莫斯科1947年版第147页。

③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67—83页。

出积极同孙逸仙的党接近的意向^①。国民军成了中国军事政治斗争中新的独立因素。1925年初,它们请求苏联提供武器援助和派遣顾问。

冯玉祥的政变、国民军的建立和孙逸仙的北上,以及伴随这次北上广泛开展的在民主和反帝口号下的宣传运动,惊动了中国舆论界,动摇了军阀制度。政治上很活跃的那部分城市居民的普遍骚动在1925年夏天汇成了一股自发的全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洪流,统称为“五卅运动”。上海反帝总罢工成了运动的中心。紧接着上海罢工之后爆发了持续一年多的省港大罢工,得到了广州政府各个方面的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

直系军阀的失败解除了北方对广州的威胁,全民反帝运动高涨的局面使国民党可以着手采取坚决行动来加强广州政府的地位。7月1日,广州政府宣布自己是中华民国政府。汪精卫取代胡汉民被任命为政府首脑。新政府着手实施在财政、军事和行政管理上将权力集中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手中的计划。军事集中化是按首席军事顾问布留赫尔(加伦)制定的计划实行的^②。形形色色的军阀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六个军,其骨干力量是蒋介石指挥的“党军”的三个师(第一军)。军队中采用了国民党的政治委员制度。到1925年底,广东清除了敌视广州的军队,国民党政权得以在全省确立。

中国1925年的事件急剧加强了苏联对中国事务的干预,特别是在“五卅运动”之后。收入本部分的一组文件是研究人员过去接触不到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特藏文件”,这些文件可以使人看到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新重点。首先引人注

① 详见《中国现代史:1917—1927》,第184—192页;J·F·谢里登:《中国军阀冯玉祥的生平》,斯坦福1966年英文版第97—163页。

② 见A·И·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年》(第9、10号文件),莫斯科1979年版第183—203页。

目的仍然是：对广州政府的援助，使国民党的进一步激进化，把它的政治影响扩大到全国，调解国民党与中共之间的矛盾，以及开展工农运动和增强中共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同时，以冯玉祥的国民军为代表的北部军政因素开始被提到首位。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令和其他文件的分析表明，从1925年起，苏联领导人越来越坚持下述看法：中国国民革命的决定因素是军事力量，而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群众运动则起辅助作用。政治局批准用来帮助上海罢工工人和用来向国民军及广州提供武器的经费的比例关系就证明了这一点：根据现有资料，1925年6—8月(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名义)从国库寄给上海的经费是20万卢布(第154、155、160号文件)，而从4月至10月提供武器的经费是460万卢布(第146、153、177、183、187、194号文件)。在1925—1926财政年度中安排的军事供应拨款达1100万卢布(第192号文件)。同这些数额相比，从共产国际系统拨给中共的款项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军事器材凭支付期为两年的票据作为贷款拨给国民军和广州。这些票据未必已经支付。

与冯玉祥政变有关的第一个重大政治行动是以孙逸仙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北上。这一部分的文件进一步说明了作出北上决定的过程和北上的目的。在这方面鲍罗廷1925年1月24日《关于国民党》的书面报告(第134号文件)很有价值。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北上的发起人是加拉罕和鲍罗廷。但仍不清楚的是，他们是否得到了莫斯科的批准。但无论如何，根据现有文献判断，没有发现来自莫斯科的反对意见。孙逸仙北上首先是作为宣传鼓动措施来考虑的，目的是扩大国民党对全国的政治影响，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震动中国舆论界”并把工人和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同时，北上的具体目的之一是国民党同冯玉祥建立直接联系(第130、131、134号文件)。

加拉罕和鲍罗廷的倡议得到维经斯基的支持，起初遭到中共中央执委会的严厉抨击，但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压力下，中共改变了自己的态度，积极参与了国民党在北方的宣传运动。

在北上过程中，孙逸仙始终坚持他在1924年11月的宣言中所表明立场，没有向在北京夺取政权的军阀们妥协。他坚决拒绝了张作霖和段祺瑞的反苏反共的“忠告”，还违背鲍罗廷和加拉罕的意见抵制了取胜军阀的“和平”会议（第134号文件）。^①

1925年3月12日孙逸仙的逝世改变了国民党内的形势。俄共(布)领导人把国民党领袖之死看成是最重大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事件，也是使国民党政策具有更激进性质的缘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5年3月13日确定了一系列相应措施的决议（第138号文件）和1925年3月14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呼吁书证明了这一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25年3—9月这个时期关于筹建中山大学的一系列决议（第141、143、150、161、170、174号文件）是因孙逸仙之死而采取的政治措施的直接发展。显然，孙逸仙的名字只是同中国“劳动者”相联系，而且最初设想把这所学校称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第141号文件）。的确，被派遣去这所大学学习的主要名额是中共党员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团员（第196、202号文件）。

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国民党和中共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作用的的问题。本部分的一大批新文件是专门谈这个问题的。在这方面维经斯基1925年4月12日关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全会期间同斯大林的谈话内容的通报特别有价值。当时在斯大林观念中，“共产党人已溶化在国

^① 详见《孙中山选集》，第669—743页；《中国现代史：1917—1927》，第192—206页；C·M·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英文版第264—282页；J·多梅斯《延缓了的革命，中国国民党的政策：1923—1937年》，德文版第108—116页。

民党内”，在他看来，“目前这是历史的必然的”（第147号文件）。在就中共的实际作用作了相应说明之后，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斯大林在1925年5月18日的讲话中阐述了完全不同的观点。

1925年1月，在维经斯基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共四大，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与国民党及其某些派别的相互关系。会前在中共中央执委会的辩论中，陈独秀认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并在他们的监督下成立“新党”是最佳方案。但由于共产国际坚决反对这样做，陈独秀提出再次“彻底改组国民党”和组建“新的国民党”，尽管他怀疑能否将现时国民党中的“优秀分子”拉入新的国民党^①。中共中央执委会的立场作过某些修正后得到了党的四大的赞同（第135号文件）。

在组建“新国民党”的过程中，中共对国民党某些派别的策略是这样确定的：揭露和孤立反革命的右派，批评并克服“由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革命分子组成的”数量很少但却是领导核心的动摇，千方百计加强由共产党人以及他们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拥护者所代表的左派^②。陈独秀在1925年3月20日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第142号文件）以及维经斯基在1925年2月15日写给中共中央执委会和鲍罗廷的信中重申了这一策略，虽然维经斯基警告说，由于右派的活跃，他们可能“迫使我们同右派分道扬镳。应当对此做好准备”（第137号文件）。由拉斯科尔尼科夫和维经斯基签署的东方部1925年5月16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报告也指出，“国民党看来在走向正式分裂”，这更增强了中共在革命中的作用（第151号文件）。但维经斯基与鲍罗廷不同，他原则上反对国民党分裂，认为最好是将最坏的“个别”国民党右派开除出党。维经斯基认为鲍罗廷的加速国民党分裂的方针是“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第147号文件）。

^① В·И·格卢宁：《国民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第1部第178页。

^②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338—341页。

维经斯基认为国民党右派是强大而危险的敌人，他们不仅同资产阶级而且还同中国其他反革命阶层有着分支联系，而鲍罗廷认为右派不可能采取任何重大的具体行动，因此无论是对国民党还是对整个革命都不具有特殊的危险。鲍罗廷在1925年2月14日关于国民党内形势的报告中写道，由于孙逸仙临近病故，“党的未来”问题成了国民党的主要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着“非常激烈的大辩论”，因此“未必能够避免国民党内的分裂”。鲍罗廷坚持认为，“不应特别害怕同右派分裂，因为党只会从这种分裂中得到好处”（第136号文件）。在其他报告中也证明了鲍罗廷的这种观点（第145、149号文件）。

在就国民党右派的潜力问题同鲍罗廷所进行的争论中，维经斯基的观点显得更现实一些。

至于中共中央执委会与鲍罗廷之间的意见分歧，维经斯基受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委托（第132号文件），曾试图消除他们之间的“误会”，哪怕是在表面上消除。作为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维经斯基有责任阻止中共同国民党关系破裂的趋势，但他认为“改变我们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是可能的，这应当表现在，第一，“更多地深入工农群众”，第二，“更公开地反对国民党右派”（第130、133号文件）。1925年2月15日维经斯基向中共中央执委会发出一封专函（副本给了鲍罗廷），他在信中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中共中央执委会与鲍罗廷之间以前存在的“许多误会”已经消除，“现在我已经找不出在中央的方针与鲍罗廷同志之间原则性分歧”（第137号文件）。但是，中共中央执委会与体现莫斯科的“国民党”路线的鲍罗廷之间的不融洽关系在维经斯基的和解使命之后却仍然存在（第113号文件）。分歧的根源是，同国民党的党内联盟从一开始就是中共根本不能接受的（其实国民党对中共也有同样的体验）。

1925年秋天，右派挑起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分裂（西山会议、在

上海成立平行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等)。中派中的右翼分子在广州联合起来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右派行动的思想依据实际上是戴季陶的旨在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政治著作和哲学著作。

因此，国民党与中共的相互关系问题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在1925年下半年仍在继续讨论。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系列信件(1925年8月19日、9月28日、11月11日)中提出了关于国民党与中共“另一种形式”的相互关系问题(第164号文件)。维经斯基建议立即采取“同国民党的关系由联盟转向联合的方针”，即由党内合作转向党际合作(第181、199号文件)。维经斯基的这种设想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内遭到强烈的反对，特别是瓦西里耶夫的反对(第176、182、185、186、190号文件)。

胡汉民1925年11月12日、12月7日和12日在莫斯科同拉菲斯的谈话内容基本上可归结为国民党与中共的相互关系问题。胡汉民谈话的基本意思是要证明国民党与中共之间不存在原则性的差别(第205号文件)。“胡汉民在莫斯科的广泛工作计划”中也包含了同样的思想(第203、204号文件)。胡汉民的激进言词后面，十分清楚地透露了没有说出的意思，即中国共产党没有必要与“无产阶级的”国民党同时存在(虽然它们暂时可以共处)，或者至少希望磨去它们之间的任何界限，特别是希望中共及其策略和组织要向国民党完全“敞开”(正如右派在1924年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八月全会上所要求的)。

据现有文件判断，共产国际与“五卅运动”爆发毫无关系，该运动对它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事件。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需要一定的时间来了解业已形成的局面，并作出相应的决定：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6月25日决定立即派维经斯基去中国，并采纳了斯大林提议作出的指示(第156号文件)。指示建议“务必推

进，不要害怕加剧”以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形式进行的中国革命运动。同时建议中共提醒运动的所有参加者不要采取可能引起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的行动，而建议所有苏联工作人员言行要格外小心谨慎，不要显出苏联参与中国事件。至于反动营垒，指示中称张作霖是“帝国主义者手中的主要工具”，建议对他发动“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千方百计地分化瓦解他的军队并使之革命化”。对于现时的中国政府制定了严厉施压的政策，直至把它“驱散”并且建立“有国民党人参加、依靠冯玉祥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的新政府”（第156号文件）。9月24日，政治局授权加拉罕采取措施，让冯玉祥公开表示支持上海工会（第178号文件）。当弄清中国的罢工运动正走向低潮时，莫斯科便下令停止罢工。“制止”上海罢工的具体计划是由维经斯基和加拉罕制订的（第158、159、164、181号文件）。如果说“务必推进”反帝罢工运动的指示很快就被撤销，那么以武力“驱散”北京政府的方针却仍然有效，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加速给国民军和广州的大规模武器供应。在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下，推翻靠张作霖军队支撑的北京政府只能由国民军来实现。

我们所知道的冯玉祥同加拉罕的首次谨慎的接触是在1923年12月。当时加拉罕对这种试探表示怀疑（第103号文件）。在北京政变和国民军成立后，如何对待冯玉祥的问题就提到了实际层面上。据现有文件判断，国民军同国民党和同苏联的相互关系问题，在加拉罕、鲍罗廷、维经斯基及国民党领导人参加的情况下不止一次地在北京进行过讨论（第130、134、136号文件）。如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局1925年2月14日的会议就是“完全”用来研究如何援助胡景翼的国民军第二军的，包括用苏联武器、弹药和顾问以及用苏联“同冯玉祥如接近”来进行援助（第140号文件）。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也向莫斯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1925年3月13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研究了加拉罕关于给国民军提

供援助的建议。认为“用我们的经费”在洛阳和张家口建立两所军事学校是“适宜的”(为此一年拨出了100万卢布),向“同情国民党的中国军队”有偿提供苏式武器也是“可行的”。“立即”有偿或无偿地拨出了若干外国的武器弹药交加拉罕支配(第139号文件)。如果说过去武器装备只供应广州,那么现在就要根据广州和三个国民军的行为以及迅速变化的中国军事政治形势在它们之间进行分配,这使协调苏联许多部门行动的工作大为复杂化了。因此,1925年3月1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权威的专门委员会“统管”援助国民党和支持它的军事集团的日常措施。于是就出现了直到不久前还鲜为人知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本文件集收入了政治局关于该委员会人员组成和权力的一系列决议(第141、144、148、191号文件)^①。有关该委员会1925年4月17日至10月26日工作情况的具体资料包含在本文件集收入的头14份会议记录中。

其中有中国委员会向政治局提交的“驱散”北京政府的军事政治计划(第166、189号文件)。1925年10月29日,政治局“基本上”采纳了伏龙芝的相应建议,“作为政治指示下达给加拉罕同志”(第189、197、198号文件)。政治局的另一一些决议规定给孙传芳弹药援助的条件是“在他管辖的地区的工人运动合法化”(第194、195号文件)。1925年12月3日,政治局又通过了一项由斯大林提出的关于中国政治军事形势的指示。在对外政策方面采取了在日本与英美两国之间“打入楔子”,尽量不损害同日本的关系并在“容忍中国的现状对日本有利”这一意义上同它进行谈判的方针。这种方针应当是对张作霖的打击,因为张作霖一直在玩弄手腕,加剧日本与苏联的关系。在对内政策方面只提出

^① 见А·И·卡尔图诺娃和К·В·舍维廖夫在《俄罗斯军事档案》杂志上发表的为委员会的头10份记录所写的前言,莫斯科1993年第1期第309—311页。

两个问题：关于北京新政府的性质和关于广州的北伐。建立“纯国民党的”政府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因此指责了“我们在北京的朋友们的“过左的”路线。政治局认为，北京新政府“应当是有冯玉祥、国民党人及其他或多或少的温和派参加的联合政府”。在北京新政府的构成问题上实际上重申了1925年10月29日的指示。斯大林的指示认为拟议中的广州人的北伐在当时是“不能容许的”。建议广州人“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内部的巩固上”（第200、201号文件）。指示的基本论点在拉斯科尔尼科夫12月4日给维经斯基的信中作了阐述（第202号文件）。中国委员会关于在中国开设14个“主要是追求情报侦察目的”的领事馆的建议是耐人寻味的（第193号文件）。

政治局所赞同的利用北方军政因素的计划没有一项是以胜利而告终的。在1925年11月发动的军事行动中，国民军在开始时给予张作霖部队一些打击，但到1926年春遭到严重失败，撤退到西北地区。

苏联领导和共产国际考虑到军事因素增长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中共军事干部的培训。这些干部不仅在黄埔军校和中国国民党的其他军校学习，而且也到苏联列宁国际军事学校的为期三个月的军事专修班学习（第168、169、173、175号文件）。组织中共军事工作的总原则，在瓦西里耶夫1925年7月21日给中共中央执委会的信中，根据俄国国内战争的经验作了叙述。信中建议成立党的军事领导机关，组建在党的严密控制下的工农武装部队（第157号文件）。1925年8月向中共发出了关于“组建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正式指示，详尽而明确地说明了瓦西里耶夫7月21日信件中提出的基本论点（第165号文件）。这些文件的基本论点在8月21日得到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国委员会的赞同（第166号文件）。为了执行这些指示，在维经斯基主持下于1925年9月28日至10月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全会作出了关于成

立中共中央执委会军事部的决定，随后在广州、北京、河南等地成立了中共军事委员会。军事部由张国焘（部长）、王若飞和任弼时组成。但该部的工作实际上由顾问赫梅廖夫领导。^①这一时期苏联给中共的军事援助与给国民党和国民军的不同，基本上只限于提出上述建议和培训干部。

1926年初的事件（国民军在北方的失败）促使莫斯科对其中国政策作出修正：面向国民党及其在华南的力量的方针又上升到首位。

^① 见В·И·格卢宁：《国民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第1部第277页。

130

维经斯基给季诺维也夫的电报

1924年11月底于上海^①

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

了解了当地的情况后,我认为,孙逸仙参加天津战胜者会议^②是在政治上迈出了正确的一步。自中国革命以来,现在第一次出现了孙逸仙不仅仅在一个广东省可以起政治作用的局面。

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美日在远东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国民运动日益高涨的反映。直隶集团的失败意味着美国试图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计划遭到了破产,使中国新兴的民族军事力量得到了解脱,这些力量暂时可以不受帝国主义压力的左右而独立行动。

目前国民党通过巧妙的随机应变可能成为吸引这些力量的政治中心。

孙逸仙在为自己的活动赢得了扩大的政治舞台之后,应该利用这个舞台使中国广大民众看到,目前他在为国家的统一,为反对外国的压迫而斗争,而不是在争夺总统职位,不是在为国民党

① 编辑加的标题和电报日期是根据文件右上角的如下说明确定的:维经斯基给季诺维也夫的电报,1924年11月底。

② 指1924年11月10至15日在天津举行的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战胜直隶集团的军阀的会议。孙逸仙应邀参加了“维护和平者”会议。孙逸仙北上的思想得到了加拉罕、鲍罗廷和维经斯基的积极支持。

一党争夺政权。对后者民众会不理解，因为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在全国的影响还不很大。

在业已形成的局面中，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应当是揭露战败和战胜的军阀，要求召开全国国民会议，剥夺军阀集团的代表资格。共产党将要求废除奴役性条约，废除殖民主义者的关税制度，使国家民主化，提供集会、结社等自由，使政党合法化，实行劳工法，减轻农民赋税负担。

共产党要围绕这些口号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间开展广泛的宣传运动。同时努力从组织上促成民族高涨形势，渗透到工人群众中去，秘密组织工会。在共产党人当中，现在出现一股同国民党决裂的潮流，因为现在国民党很容易由于它在政治上参加重新形成的夺权集团而被瓦解。孙逸仙北上为掀起决裂运动开了先例。“左派”同志认为这一方面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直接帮助，而另一方面是对覬覦政权和覬覦实际军阀政权中政府职位的国民党右派的明显加强。这些同志认为中国目前的形势同1922年的形势一样，那时，直隶集团夺权，美日之间在远东的力量对比对美不利，而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实际上不存在。

他们错误地评估了战胜直隶集团的意义，没有看到新的形势为深入开展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创造的条件。

但是这股潮流现在尚未构成很大的威胁，因为事态发展迫使他们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必然把他们推上上述道路。我认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护召开国民会议和上面提出的其他口号，并不认为孙逸仙北上问题有特别的意义。以后的情况下次再谈。

全宗514，目录1，卷宗123，第54—55页。

打字稿，副本。

131

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

1924年12月7日于上海

亲爱的列夫·米哈伊洛维奇：

正好到上海一周后给您写信，在这一周里，我了解了扬子江这一头的政治局势。我认为，现在中国政治局势的基本特点是军阀集团正在瓦解，不仅在被打败的直隶集团那里是这样，而且在战胜者那里也是这样。这种发展进程毫无例外地席卷了中国各个省份。它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各省督军与督吏之间的争权斗争，另一方面是社会团体同督军制度作斗争的积极性日益高涨。因此在全中国为开展国家民主化运动创造了很大的可能性。我们的《向导》周报和《民国日报》收到了各个社团、商会、行会、学生组织和工人组织寄来的上百个决议，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小伙子们说，由于缺少版面，许多决议刊登不了。这种形势需要积极加以利用。

以后我将把我们为加强和开展宣传运动而制订的基本提纲寄给您。

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利用目前的过渡时期来最大限度地震动中国舆论界，我认为，共产党理解这项任务并有力量完成这项任务。

我们决定：加强派到北京工作的局^①，调给它一位很好的工作人员托波廷斯基^②，还要扩大这个局的职能。您从电报中可以知道，怎样扩大和为什么这样做^③。

现在我对您有一个具体的建议：请从国民党经费中拨给我们一定的数额用来为实现国共两党提出的口号开展强大的宣传运动。

您知道，列夫·米哈伊洛维奇，我通常都提具体而有道理的建议，我觉得并且更知道，现在可以加大我们的工作范围。如果现在我坚持正式的观点（即我始终捍卫和通常坚持的观点）并主张党在预算范围内进行工作，那会是个大的错误。现在必须从国民党那里给党拨出一定的数额。我们能具体地做些什么呢？把《向导》周报的印数增加一到二倍，据说，甚至局外人也说，这个刊物最近赢得了很大声誉。它最近的印数已经增加了一倍，每周出版 8000 份。但现在它很容易发售 20000 份。必须增加《民国日报》的印数，还要增加刊物和《民国日报》的版面。必须出版几万几十万的呼吁书、传单和通俗小册子。

必须协助各地正在成立的国民会议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必须利用国内政治运动来把不仅仅是北京和上海的工人、学生和教师组织起来。

我请求为了整个这项工作给我拨 1 万卢布，由我负全责报帐。

我认为，我们以后不会对此感到惋惜。我们要开展大规模的运动，在这里，沿扬子江流域和在北方。

当然，如果您不拨给我们钱，我们的工作劲头也不会比平时

① 鉴于冯玉祥于 1924 年 10 月 23 日在北京发动政变和直隶集团在 1924 年 12 月初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遭到失败之后，北方政治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了由五人组成的北方局，这五人是：张国焘、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赵世炎（据另外的材料说由七人组成，见第 133 号文件）。北方局负责根据北方事态的发展来领导党在那里的工

② 原文如此，可能是谭平山。

③ 电报没有找到。

小，比现在的形势所要求的小，但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利用现在在中国的政治条件下存在的一切可能性。

请尽快就经费问题给我答复，如果您同意提供经费，请电告维尔德。

您可以分期拨出，而且可以从1万中拿出一定数额留给北方局用来做这项工作。

一句话，列夫·米哈伊洛维奇，请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并予以答复。

下一封信再见。

您的格里高里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49，第 48—52 页。
手稿。

132

拉斯科尔尼科夫和 穆辛给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4 年 12 月 16 日于莫斯科

致季诺维也夫同志

敬爱的同志：

为了让您了解情况，现附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决议对鲍罗廷同志的活动表示不满^①)和陈独秀同志关于国民党政策的文章^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认为,这些问题现在不提交讨论为宜,因为维^③同志现在在中国,他会消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鲍罗廷同志之间的误会,并纠正工作路线。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东方部主任 彼得罗夫^④

顾 问 穆 辛

全宗 495, 目录 18, 卷宗 325, 第 70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133

维经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 (摘 录)

1924 年 12 月 19 日于上海^⑤

亲爱的彼得罗夫^⑥同志:

自到上海以来,我给您发了几份详细的电报,从中您可以判断出中国现时政治局势的最明显的特点。现在这里的事态发展速

① 可能是指瞿秋白报告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参见第 127 号文件)。

② 陈独秀的文章没有。

③ 即维经斯基。

④ 即拉斯科尔尼科夫,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

⑤ 在文件右上角有手迹:1925 年 2 月 10 日副本已送契切林、季诺维也夫、皮亚特尼茨基、斯大林、库西宁、格列尔。

⑥ 即拉斯科尔尼科夫。

度是如此之快，以致从这里给莫斯科寄去报告或文章，特别是在中国目前的交通状况下，恐怕都是没有意义的。我认为，我们从上海发出的俄罗斯通讯社的电报，多少也占据了本可以由这里发出的简短通报所占有的位置。

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向您通报党的事情，因为召开党代会的时间临近^①，我们已审定了一多半基本材料、提纲等。

在一周时间内，我们这里举行了中央全会^②。南方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几乎所有报告都作了速记记录，我将把速记稿带回莫斯科^③。从这些报告中可以看出，自今年5月的中央扩大全会以来，我们的中国同志确实比以前工作得更起劲。足以说明问题的是，在上海一地，党已在纺织工人、机械工人和烟草工人中间成立了地下工人组织，并且都设有由工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这些工人组织现在共有成员2000多名，75%成员缴纳会员费。在上海，我们中央为这项工作出版了专门的刊物《上海工人》周刊。此外，还出版月刊《中国工人》。自今年7月以来，我们建立了8所工人学校，这些学校是我们进行合法宣传的中心。

中央的正式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从5月起增加印数50%，也就是说每周不是出版4000份而是6000份。刊物的声誉确实在提高，编辑部还处于地下，但最近刊物已公开发行。它利用一家报纸的地址，可以收到读者的来信，多半是激进知识分子的来信，根据这些信件，很容易判断这个刊物影响扩大的程度，这个刊物不仅反映工人的愿望，而且也反映国内一般革命分子的愿望。

上一周，当局开始对传播和阅读这个刊物的人进行镇压。对一些学生，主要是我们的同志，进行了搜查，目的是发现他们同

① 指1925年1月11至12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② 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情况不详。很可能这里指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工作会议。

③ 报告没有找到。

刊物编辑部的联系。英国巡捕和中国警察袭击了上海大学，无论是新的还是图书馆过去保存的各期《向导》周报全被没收，而且校长、著名的国民党人^①，在混合法庭上被追究了传播这个刊物的责任。但是这些镇压行动，不仅没有制止住对这个刊物的传播，而且相反，我们在这一周出版了9000份。我直接参加了编辑部工作，并为每期写稿。日内，我们的《新青年》月刊将重新开始出版，这是陈独秀同志主办的老刊物。它将每月出版一期，是我们党的理论刊物^②。为纪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一周年，我们将出版专号《列宁与东方》。

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北方和满洲开展工作，两周前我们成立了党中央北方局，有7名负责同志参加该局工作，其中有张国焘、谭平山和瞿秋白同志。局址设在北京，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归来的同志几乎都担任负责工作，工作完成得很不错。

在广州，党的地方委员会得到了加强，充实了几个从上海派来的同志。据报告，那里的工作比以前进行得好得多，组织农会的工作是春天我们在广州的时候才开始的，现在发展很快。我们的同志说，已有20万农民参加了这个运动。这些组织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号成立的，但我们的同志是实际领导人。最近英国报界就华南佃农运动问题掀起了一片恐慌。

现在谈谈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党渗透到城市工人群众中去的问题，也就是从在小组中做宣传工作过渡到在工厂中做鼓动工作的问题，向工人们说明现在中国政治斗争的基本因素。同时，代表大会应该找到把群众集中和组织起来的各种方式。近两三个月的经验表明，我们从组织街道小手工业者行会同外国人作斗争开始，现在转到成立召开国民会议的

① 可能指副校长邵力子，当时他暂时代理从1923年底到1925年夏不在上海的
常任校长于右任。

② 指《新青年》杂志，其主编是瞿秋白。该杂志未能正常出版。

促进委员会，这个经验在代表大会上应给予注意并加深理解。虽然国共两党关系不能说尽如人意，但我们在会上还是不全面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还应该帮助国民党，以便尽可能广泛地掀起反帝运动浪潮。这场运动同时也是反对督军制度和反对对国家实行封建政治管理方式的运动。

不过我们应该在彻底打败直隶军事集团之后，改变我们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这首先应该表现为，更多地深入工农群众，更彻底地揭露国民党人同军阀的妥协趋向和更公开地反对国民党右派，因为近来右派代表人物觉得有取得国家职位的可能性，公开站到帝国主义者一边，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

这就是代表大会将研究的基本问题。

此外，我们将在会上提出青年问题和妇女问题。顺便应当指出，青年团中央在学生工作方面犯了几个不大的错误，它夸大了自己对学生的实际影响，从组织上过于暴露了领导学生会的意图，这损害了青年团在学生中的实际影响。不过我认为，我们能够纠正这些错误，何况中国共青团的领导干部都是一些很好的同志，当需要对方针做些改变的时候，他们准备齐心协力地做好工作……①

您的格里高里

又及：请让季诺维也夫、皮亚特尼茨基了解此信内容，我不再给他们寄副本。

又及：为什么穆辛同志的事未定下来？

如果加拉罕不想在北京设俄罗斯通讯社分社，那我就坚持向契切林提出比如在外交人民委员部驻汉口机构使用穆辛的问题。他在那里对于我们同中国同志的工作很有好处。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使用了解中国的同志来做实际工作②。

① 以下删去关于日本的部分。

② 在1925年初，И·М·穆辛是塔斯社驻北京记者。

格里高里

全宗 495, 目录 154, 卷宗 249, 第 53—58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第二个又及是手稿。

134

鲍罗廷《关于国民党》的书面报告

1925 年 1 月 24 日^① 于北京

关于国民党

10 月 15 日, 以“老虎队”闻名的商团部队被打败, 大部分被缴械^②。这使广州转危为安, 不再受香港和陈炯明的毁灭性威胁。

但是, 广州仍然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 因为吴佩孚在准备进攻南方。然而, 10 月 23 日北京发生政变^③, 吴佩孚战败, 他的全部军队, 无论在华中, 还是在南方都瓦解, 当然, 也就谈不上进攻广州了。相反, 孙逸仙为防止吴佩孚进攻广州以及为参加反直战争而准备进行的北伐, 却在加紧准备进军江西、湖南, 目标是进军华中, 特别是汉口。

政变的结果是, 10 月 23 日北京政权落入所谓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的人民军手中。冯玉祥发出关于发动了政变和在北

① 日期是根据鲍罗廷 1925 年 2 月 14 日报告注明的 (见第 136 号文件)。

② 指 1924 年 10 月 10 日在广州镇压的商团反对孙逸仙政府的叛乱。

③ 指 1924 年 10 月 23 日发生的国家政变, 冯玉祥将军的军队占领北京。中国总统曹锟被罢免并被逮捕。

京召集会议，以解决新的国家建设问题的通电。

孙逸仙博士不仅收到了冯玉祥的这个电报，而且还收到了国民党北方组织以及一些国民党要人的电报，他们都请孙逸仙立即赴京。

现在摆在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局面前的问题是，对10月23日事件作何反应：是只限于发表一般的声明，说北京发生的仅仅是一些军阀取代另一些军阀的政权更迭，还是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

关于这个问题出现了下列几种看法：

(1) 中共中央反对孙逸仙北上，赞成发表关于北京事件的宣言，但不采取积极参与事件的态度。中共中央阐明了自己建议的理由，认为在北京除了美国决定把吴佩孚撤掉，代之以冯玉祥外，实质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人民不会由此而变得轻松些，国家的解放事业也不会有丝毫前进。

(2)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内同样出现了反对孙逸仙北上的意见。很明显的是，特别强烈维护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中派。当然，中派反对孙逸仙北上的原因与中共中央提出反对孙逸仙北上的原因是不同的。中派害怕孙逸仙北上。他们知道，在北方他们必须公开捍卫在直隶派和安福派之间战争期间国民党所发表的一切宣言，即国民党就地方、国家和国际问题提出非常明确纲领的宣言。中派面临两难的选择：或者捍卫这些宣言，那样就不可能同10月23日政变的胜利者合作，因为后者当然不会同意国民党的激进纲领；或者抛弃所有这些宣言，与北方可能的盟友进行谈判以组织政权等。第二种情况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分裂，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重复国民党过去犯过的老错误，例如，临时大总统孙逸仙把政权让给袁世凯^①，也就是使革命运动为军阀服务。中派没有从

^① 指孙逸仙1912年4月1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

这种两难的选择中找到出路，因此采取了抵制策略。这种策略在当时情况下，简单地说，就是消极观望所发生的事件。

我们（加拉罕同志和我）持另一种态度。我们说，10月23日的政变及其后发生的事件给国民党提供了一个登上国民革命斗争大舞台并成为大政党的极好机会。如不利用这一机会，不仅从策略上看是错误的，而且在一个长时期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削弱国民党。对我们来说整个问题在于如何积极利用这些事件。我们说：首先应该发表宣言，重申国民党在各个问题上的立场，提出符合时局要求的口号，但这还不够。以孙逸仙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应该北上，在各地公开捍卫自己的立场和口号。吴佩孚军队的垮台导致由国民党的拥护者和还未完全下决心的冯玉祥组成了所谓的人民军。我们所持的观点是，这个人民军要支持国民党代表团采取旨在把中国所有民族力量团结起来的实际措施。当然，我们也清楚意识到，国民党代表团在北方，在安福派、直隶派以及外国干涉者等的包围之中工作是有危险的。但是我们可以冒这个险的，因为我们坚信这个包围不会比在广州工作的那种形势更危险，何况他们未必能指责我们说国民党是因为这种形势而被消灭或削弱的。这一切都取决于对形势的应变能力，在这方面我们不只是指望自己对国民党的帮助，而主要是指望孙逸仙，当时孙逸仙在中国面前，乃至在全世界面前已经很清楚地暴露了自己的面目，他未必会被北方的形势弄糊涂。

我们的观点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中占了上风，于是孙逸仙开始准备北上。

在国民党代表团从广州出发之前，即11月13日，国民党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宣言^①，重申了国民党在所有重大问题上的立场，

^① 文件是1924年11月10日孙逸仙签发的（参见：《孙中山选集》，第699—703页）。看来，这里和下面鲍罗廷所依据的是1924年11月13日在《广州日报》上发表的文件的英译稿。

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为筹备和召开国民会议，宣言提议召开一个预备会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久改变了自己的决定，因为以孙逸仙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已经启程，再坚持自己过去的决定已毫无意义。中央决定参加在上海迎接孙逸仙的工作。至于11月13日宣言中提出的口号，中央同意召开国民会议，但无论如何不同意召开预备会议。后来中央委员会又接受了预备会议。

11月17日孙逸仙抵达上海，国民党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在到达上海的第一天，孙逸仙就说，他不打算改变自己对于帝国主义的立场。在同记者谈话时，谈到帝国主义者，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谈得更尖锐。外国人要把孙逸仙赶出上海，对此孙逸仙声明说，他登上了中国领土，在这里外国人是客人，如果他们不做有礼貌的客人，那他们就对他们采取措施^①。我们在上海的几天都用来与邻近几个省的国民党员开会、为召开国民会议和预备会议组织活动，开展报刊宣传，以及为此目的在上海成立各种组织的协会，等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国民党代表团到达上海后，坚持让孙逸仙留在上海，但这次与上次留在广州的决定会是一样的后果，甚至更糟，因为现在是住在外国的租界里，从这里领导国民革命运动，这实在可笑。

孙逸仙北上取道日本的问题是国民党代表团途中的第一个暗礁。有些同志认为，我们支持孙逸仙积极参与北方事件的整个策略会被这个暗礁撞得粉碎。但这些同志没有完全考虑到孙逸仙在日本能够指靠什么。应该说，如果我和加拉罕同志特别坚持不让

^① 1924年11月19日在上海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孙逸仙发表演说，对这次事件作了以下说明：“我在吴淞登岸的时候，有一位日本新闻记者见我说：‘英国想抵制先生在上海登岸。’我说：‘上海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是这个领土的主人，他们都是客人。主人行使职权，在这个领土之内，想要怎么样便可以怎么样。我登岸之后，住在租界之内，只要不犯租界中的普通条例，无论什么政治运动我都可以做。’”（参见《孙中山选集》1981年中文版第962页）。

孙逸仙去日本，我们也许会达到目的。但我们认为我方的这种坚持完全是多余的。相反，在孙逸仙的脑子里对日本的幻想根深蒂固，他早就有建立中、日、苏俄联盟的思想。为此他经常说，必须使日本同英国疏远，日本与美国已经决裂，现在只剩下英国了。现在时局向他提供了访日的机会，要阻拦他走这一步是非常不明智的。除了他从日本之行中获得的亲身感受，没有什么能作为消除他对日本的幻想的有力的论据。此次赴日只会使他变得聪明一些。后来可能真是如此。自从他由日本归来后，他很不愿意谈这个话题，只讲日本过5年后将发生革命，那时可能与日本更好谈判。

12月3日，孙逸仙从日本回到天津，在这里像在上海一样组织了欢迎游行，也像上海一样与租界当局发生了冲突。法国人禁止召开有孙逸仙发表演讲的会议，警察驱散了在将要举行群众集会的大楼附近的示威游行，撕毁了旗帜，等等。但是如果孙逸仙未出席会议，那就是因为当天他的肝病发作。从所附的福尔特^①医生开具的诊断书可以看出，孙的病情如何之严重。

孙逸仙在病倒之前曾经与张作霖举行过一小时的会谈，会谈是在张作霖的官邸进行的。在会谈中张作霖向孙抱怨苏维埃俄国，说俄国在中国奉行的是帝国主义政策。尽管俄国说要完全相信他们的友谊等等，但他们不归还中东铁路和蒙古。孙逸仙亲自对我讲了这次会谈的情况，他说：“我过去不了解张作霖，这次我很有兴趣地听了他对各个问题的看法。我并不想让与我们站在绝然不同立场上的人相信什么。”汪精卫参加了这次会谈，他说，孙逸仙在听张作霖讲话时，不住地摇头。

孙逸仙到天津后第一件使他失望的事是段祺瑞离津赴京出任政府首脑，虽然段祺瑞曾不止一次地电告孙，在孙没有到达北方

^① 原文如此。诊断书的签字是E·福尔图纳扎夫医生，没有公布。

并亲自与其会谈之前，他是不会这样做的。如果说孙逸仙在北上前，还曾希望同段祺瑞进行某种接触，那么这件事使他立即明白了，这种希望是枉然的。在我同他的一次交谈中，当时他已生病卧床，他向我说明了为什么段祺瑞没有等到他就赴京上任的原因。孙说，这是日本和张作霖的过错，是他们催促段祺瑞快去北京掌握政权。此外，段祺瑞周围的安福派只关心个人利益，为此目的，即使执政 24 小时也够了。他们还怂恿段祺瑞尽快赴京。优柔寡断的段祺瑞自然抵挡不住这些力量，于是他违背了自己对孙作出的等待他到来的许诺。

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作用。孙逸仙本应 11 月 6 日而不是 14 日从广州出发。他应该乘英国的轮船由香港启程。由于最近他在广州与英国人进行了斗争，他不愿意这样做。9 日从香港有一艘美国轮船开出，孙本来可以乘坐这艘轮船去上海。但是驻广州的日本人热情地建议孙乘 14 日的日本轮船。孙逸仙早有访问日本的想法，上面已指出，为的是试探一下对他的建立中、日、俄联盟思想等的反应。现在日本人建议他乘日本轮船去上海，他认为这是日本在等待他的迹象。因此他高兴地接受了驻广州日本人的建议。我当时还提醒他注意日本人突然表现出这种殷勤可能有什么与北方局势有关的目的。我问他：“您是否认为，他们在尽力拖延您此行的时间。即使拖延几天也有很大意义，因为您不在北方，日本较容易利用北京的政变。”孙觉得这不可信：他的目光注视着日本，也正是着眼这一点他接受了广州日本人的殷勤。

在上海，为了让孙逸仙取道日本北上，日本人也作了不少工作。我认为，他们在这里也是为了同一目的：尽量使孙逸仙远离北方。

与此同时，日本人催促段祺瑞赴京。后来才知道，当孙逸仙已抵达天津并病倒时，日本人为了不让段祺瑞与孙逸仙有任何接触，在北京通过自己的医生散布谣言，说孙逸仙活不了 8 天，得

了多种可怕的病。

因此在上面提到的我与孙逸仙的交谈时，他说，日本人催促段祺瑞尽快赴京，揭穿日本人安排孙逸仙北上的阴谋是很容易的。因此孙逸仙相当失望。

然而，段祺瑞和张作霖是通过中央委员汪精卫、孙科等人同孙逸仙保持联系的。这种联系没有什么实际内容，至少是因为这涉及孙逸仙。段祺瑞竭力想利用孙中山的威望，以便召开自己的委任会议^①。与此同时，张作霖竭力要孙逸仙断绝与我们的联系，并答应他只要这样做，他就可以得到帝国主义者的各种支持。看来，张作霖曾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他能使孙逸仙改变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并断绝与我们的一切联系，那么最好是利用他而不是段祺瑞。正因为如此，张作霖使用各种手段来达到此目的。他邀请汪精卫和孙科，与他们谈未来国家体制问题，以及他们如何同孙逸仙一起为中国的解放而斗争，但为此孙必须结束共产主义并与苏维埃俄国决裂。不过，当孙逸仙拒绝支持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坚持要按照11月13日宣言召开会议时，段祺瑞就不再派自己的亲信到孙逸仙那里去了，并置孙逸仙于不顾，还是发布了关于召开自己的善后会议的命令。至于张作霖，在孙逸仙通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报上发表声明说他的党不是共产党，他不准备使中国布尔什维克化，但他不能牺牲与苏维埃俄国的友谊之后^②，也放弃了自已的打算。

这样，孙逸仙在天津，即使在张作霖、段祺瑞以及日本人策划的阴谋包围之中，在病榻上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

孙逸仙的病变成了慢性的，天津缺乏较好的医疗条件，居住条件也很差，一方面需要把孙逸仙转移到条件好一些的地方，而

^① 即不通过选举的会议。

^② 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精卫、邵元冲和孙科的声明《孙逸仙博士对苏维埃俄国的立场》，1924年12月14日在天津发表。

只有在北京能为他创造这种条件。另一方面，国内会对他滞留天津而不去北京的原因产生猜疑，因为他本来打算去北京，提出召开真正的国民会议的要求。把生病作为原因是不能让中国人信服的。所有人都采用这种办法。根据国民党11月13日的宣言，召开国民会议的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上海、北京向全国各地派出100多名宣传员，他们要领导这次运动。因此必须把孙逸仙转移到北京，12月31日孙逸仙抱病入京。

孙逸仙到京后我们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一个问题是国民党是否参加段祺瑞的会议。另一个问题是人民军实际上是个什么军队，能否指望得到它的全力支持。总的说来，当时在全国我们的主张是最响亮的。由于10月23日的政变，在全国出现了一片混乱局面，只有一个党——国民党在一片混乱中站出来，对使中国不安的问题作出了比较明确的回答。只有国民党真正知道应该做什么，它第一个提出召开国民会议问题，第一个提出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的想法，并且只有它拥有在全国范围内工作的机构。无怪乎孙逸仙入京后，所有外国报纸和买办报纸都猛烈抨击国民党和孙逸仙，指责他试图搞布尔什维克政变，说他是中国的主要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是否参加段祺瑞的会议问题，我们（加拉罕同志和我）准备建议国民党作出肯定的决定。当然，为此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条件，这样就可以把参加善后会议变成宣传国民党行动纲领的最好方式。遗憾的是孙的病情严重，不好在他面前坚持说明国民党以一定的条件参加段祺瑞善后会议的好处，而在知识分子占优势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我们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他们反对参加段祺瑞善后会议的理由纯属道义上的。如一位中央委员说：“我们怎么能参与所谓段祺瑞‘善后会议’这种卑鄙的勾当呢！”

没有办法，他们不理解我们反抵制策略的绝妙之处，他们觉得抵制更符合道德，用现行策略毕竟更容易一些。我们没有再坚

持自己的策略，何况卧床的病老头孙坚持这样一点：最好是抵制，以后会更清楚。

这样一来，对段祺瑞邀请参加善后会议的答复是否定的。但是，由于国民党中央认为直接拒绝参加会议会对它不利，所以想出了下面这个拒绝的说法：如果让国民党11月13日宣言中所提到的那些阶级和民众团体的代表参加会议，国民党就参加。

中央决定向全国发表新的宣言，对这种答复作出解释。

至于第二个问题——人民军的问题，我在书面报告的第一部分中已说明了我们的部分想法。关于孙逸仙和中央委员会与人民军的相互关系将专门写报告，下次寄去。

鲍罗廷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45，第 29—39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135

瞿秋白给鲍罗廷的信

1925年1月26日于上海

鲍罗廷同志：

我于1月15日来到上海，正赶上代表大会开幕^①。不过还是在等我和谭平山，并把国民革命问题推迟到16日讨论。这里的情

^① 文件上有鲍罗廷的手迹：瞿秋白同志关于中共代表大会的信。这里说的是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况有些变化，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整个“反对军事行动”，“反对孙中山参加段祺瑞会议”等等的立场被推翻，最后得出结论，政策应该是积极的，“左”派幼稚病和“消极性”似乎已被铲除。大会赞成（老）中央的决议，即国民党应有条件地参加段祺瑞会议，条件是要有所有“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的团体”^①的人民代表参加。在讨论国民革命问题时，几乎毫无争议地通过了陈独秀同志的提纲。在这个提纲中，左派的立场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只有几个与群众和党的生活没有联系的同志反对陈独秀同志的提纲。他们作出某种类似“不断革命”的暗示，但这种暗示很快就消失了。总的来说，大会正确地评价了过去一年来同国民党工作的意义，并意识到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进程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实行积极的政策和在工农大众中开展强有力的工作，才能取得领导权和将革命进行到底。

当然，不能说“左”的倾向已经完全消除，但群众对积极利用目前形势的现实要求毕竟迫使党采取更现实的政策（党员已有900多名，其中40%是工人）。

我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根据中央的决定，我要长期在上海工作。要给您派去另一个翻译。中央要求您为我解脱您这里的工作。在上海好像已经不追捕我了，我将暂时完全转入地下，为我们党的机关做工作。

您的瞿秋白

全宗514，目录1，卷宗144，第50—51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指召开国民会议促进会。

136

鲍罗廷的书面报告

1925年2月14日于北京

孙逸仙病危。据医生说，除非他有非常健康的体质或定时注射吗啡，他才能再维持一周。国民党员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现在大家关心的问题是党的未来。无论在党的机关，还是在一些会议上大家都在热烈争论这一问题。已经可以隐约察觉到，随着孙逸仙的逝世党内将形成派别。首先，值得庆幸的是，最积极的一派将继续完成孙逸仙在最后一年的想做的工作。这里不只是指所谓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而主要是指他最后一年在我们的协助下制定的斗争方法。党内这些初见端倪的派别主要不是按照三民主义，即孙逸仙的斗争方法行事的。第二个派别可以称做联邦派。这一派认为，国民党在孙逸仙领导下，力求把国民革命运动集中起来，并根据集中原则统一中国，同时主张地方自治。而联邦派主张像前林肯时期的美国那样建立中华合众国。实际上联邦派搞的不是省的联邦，而主要是在南方统治着某些省份的军阀的联邦。第三派是要删去党纲中的那些为反民族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设置了一定的障碍并要求不仅承认三民主义，而且要积极参加运动的条款。

这一派的拥护者要求党向所有民主主义者敞开大门，但同时希望对共产党人关上大门。实质上，他们要求恢复改组前那个时期的党，即1924年初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的党，当时没有

任何对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作出规定的纲领。相反，孙逸仙的忠实拥护者则坚持这样一条组织原则：宁可少些，但要好些。近13年的经验向他们表明：党不是只表示愿意把自己称作国民党员的人凑合在一起的乌合之众。他们从痛苦的教训中认识到，这样的乌合之众将使他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一事无成。相反，最近18个月的经验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国民运动也需要一个团结的、有组织的党来领导。孙逸仙注意到了这个经验，在临终前教导自己的拥护者说：没有一个团结的党，没有一个不仅在三民主义而且在其实现方法基础上团结起来的党，国民运动就不可能达到目的。假如孙逸仙在一年半前去世，他的拥护者只能继承他的主义，而现在他们还能继承他的斗争方法，这些斗争方法不仅在广州范围内，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的检验。

以前我们曾把国民党分为左派、中派和右派。现在初步形成的派别完全符合这种划分。左派主要由共产党员组成，完全支持孙逸仙的思想遗产和组织遗产，把它们看作是国民运动的指导原则。中派是这一遗产公开的代表者，但是他们还抱有幻想，认为他们可以把右派分子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只要他们懂得孙逸仙的主义和方法究竟是什么。

右派实际上是非常了解这些主义和方法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竭力要修正它。如果说孙逸仙在世时他们不敢公开攻击这些主义和方法，而把矛头主要指向共产党员的话，那么现在，孙逸仙就要死去，不能用自己的权威去压制他们，他们就开始公开地跳出来，以自己的联邦制来对抗孙逸仙的集中制，几乎要求解散党组织，即把党溶化在民主分子之中，并攻击共产党员。

上面谈到的辩论是非常激烈的，它表明国民党很可能会分裂。假如只讲向联邦派作让步的话，那倒不一定会促进分裂。我们的意见是在当前的中国国民运动时期，各省自治会给这一运动带来很大的好处。各省的人民群众赞成自治。因为连绵不断的内战，其

它省军阀入侵后的破坏,本省军阀为了远征他省而过份的征税,所有这些不能不引起人民群众渴望闭关自守,反对邻省军阀入侵本省的愿望。“省自治”的口号无疑在中国是受欢迎的口号之一,坚持这一口号未必对右派有利。在国民党的纲领中有这个口号,但不够具体,不够明确。需要重新作出表述,让所有人更明了,国民党并不打算立刻让所有的省都服从中央政权,服从一个地方民众非常憎恨的政权。

但是,剥夺联邦派所使用的省自治这个受欢迎的口号是一回事,而在组织问题向它作出让步则是另一回事。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就意味着取消国民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有组织的领导。这正是右派所期望的。如果他们能破坏党的组织性,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对他们来说就完全不可怕了。这里我们无法回避分裂。我们甚至准备在共产党员问题上向他们让步。例如,如果共产党员在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内使右派感到厌烦,我们准备召回他们。在中央机构中没有共产党员我们也可以做好工作。但是在保持党作为国民革命运动的有组织的、团结的领导的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也不应该让步。

不应特别害怕同右派分裂,因为党只会从这种分裂中得到好处。一切都取决于在同右派的这场斗争中国民党中央派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团结在孙文主义的周围。这又取决于我们在这场斗争中灵活处理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要把那些对党毫无用处的分子分化出去,又不因此而触及那些对党来说还可以挽救的人。迄今为止我们的这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反对派的势力越来越小,而那些不可救药的人不得不采取防卫立场。我们最关心的,是用最具体、最明确的事例使中派核心团结起来,能把孙逸仙的工作继续下去。

目前国民党的实际工作是:在广东,我们正在向陈炯明发动进攻。在粉碎英帝国主义在华南的走狗即商团“老虎队”以后,党首次以新的方式与自己的敌人进行战争。我们新建立的军队首次

参加了这场战争，破天荒地在所到之处受到了农民的欢迎，因为军队配有政治工作人员，他们在各地与农民打成一片。进攻进展顺利，这次有希望打败陈炯明。由于我们有装备良好的装甲车队等等，所以能够在广州—石龙全线肃清敌人。

其次，在全国各地根据国民党 11 月 13 日的宣言大力开展了召集国民会议的宣传鼓动工作，其结果是建立了许多由各阶级和阶层组成的国民会议促进委员会。

第三，全面抵制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是什么因素导致国民党抵制此会议呢？我于 1 月 24 日写的、25 日由信使寄去的报告^①中已说明。

第四，在郑州举行的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刚刚结束。郑州是处在胡景翼将军的管区内，胡统帅着一支所谓的人民军。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恢复了被吴佩孚破坏的铁路总工会^②。大会还通过了反对段祺瑞善后会议，赞成根据“国民党 11 月 13 日宣言”召开国民会议的决议。

不久将在北京召开所有为召开国民会议而斗争的社会团体的代表会议^③。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都在加紧准备这次会议，打算把这次会议变成反对段祺瑞善后会议、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右派、争取召开国民会议的斗争武器。

也在加紧筹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会。鉴于与北京政府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此次会议可能在广州召开^④。现在国民党内进行的辩论将会在全会上见分晓。届时国民党可能发生分裂。四个月以后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可能也在广州召开^⑤。

① 参见第 134 号文件。

② 指 1925 年 2 月 7 至 10 日在郑州举行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

③ 指 1925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16 日在北京举行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

④ 1925 年 5 月 18 至 25 日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

⑤ 1926 年 1 月 1 至 19 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目前在北京有 7 位政治局委员在领导全部工作。还有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也在北京,他们与政治局委员经常举行联席会议。此外,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以及特邀的最著名的国民党员也在频繁地举行联合会议。我作为顾问出席了所有会议。

鲍罗廷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144, 第 64—69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137

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的信

1925 年 2 月 15 日于上海

秘密

致中共中央。送鲍罗廷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我在上海了解到你们在代表大会之前的中央几次会议上向我提出的问题,主要是你们同鲍罗廷同志,同国民党中央和其地方组织的关系问题,现在我可以向你们答复如下:

1. 像以前一样,你们必须同鲍罗廷同志协调自己的工作。我认为,过去的许多误解都已过去,主要是因为鲍罗廷同志没有实际可能同你们保持接触,而在过去的半年间中国的复杂局势要求保持这种接触。

现在在中央的方针与鲍罗廷同志之间我已找不到原则性分歧。造成你们与鲍罗廷之间产生误解的两个主要的组织上和策略

上的原因，现在已经消除。

(1) 在广州成立的由国民党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组成的监察委员会^①，不具有国际性质，也就是说它不直接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不（在亚太范围内）进行国际性工作，而将渐渐成为调解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人之间某些冲突或误解的机构。

(2) 你们给各地国民党工作提出的预算，将提交专门成立的有共产党人和鲍罗廷同志参加的预算委员会研究，这样，基层工作的问题就会被提出来。

2. 为防备孙去世，你们需要起草一个宣言，不仅是给一般群众的宣言，而且也是给国民党中央的宣言，号召在国民党一大通过的行动纲领基础上团结起来。

我们现在需要坚持加强国民党左派（中派）的方针，因为右派正在加紧组织起来，并把国民党以外的反民族分子网罗在自己周围。即将举行的国民党全会可能迫使我们同右派分道扬镳，应当对此做好准备，要掌握表明右派背叛的各种材料，说明他们背离了国民党一大通过的而后来又孙逸仙近半年发表的宣言中作了阐述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3. 党必须竭尽全力尽快为召开促进委员会的代表大会开展选举运动^②，因为我们现在在积极抵制段祺瑞会议，而这种抵制的最好表示就是引起全国公众瞩目的促进委员会代表会议同段祺瑞会议的实际对抗。

4. 山东、上海最近的罢工行动，以及对这里、对北方和对华中工人状况的了解告诉我，我们代表大会^③关于组织问题的提纲

① 指1924年8月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上成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见第124号文件）。

② 指召开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

③ 指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和关于工会运动问题的提纲确实至关重要，党必须面向工人，既是为了增加党员人数也是为了组织工会，为了推动现在国民党和促进委员会所面临的民族革命运动总任务的实现。北京在这方面的组织工作很落后，我担心整个直隶省也是这样。必须争取在有我们的组织的地方贯彻大会的提纲。现在在北京的穆辛（马克西莫夫）同志将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之命同北京的省委一起工作，当然是遵照大会提纲和中共中央给北京委员会的指示进行工作，同时在工作中要听从鲍罗廷同志的指导。

5. 华南的农民运动仍在为整个中国的农民工作提供很多的经验。我们必须根据这些经验，在我们有组织的地方努力开展对农民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在我们的各种（反对段祺瑞会议，争取召开国民会议）运动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农民的利益。

我希望你们在党代表大会以后更加努力地着手解决拟定的任务。

你们的维经斯基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23，第 7—9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138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52 号记录 （摘 录）

1925 年 3 月 13 日于莫斯科

出席：

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姆斯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捷尔任斯基、莫洛托夫、伏龙芝同志。

俄共中央委员：布勃诺夫、瞿鲁巴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谢夫、古比雪夫、索尔茨、什基里亚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2〕—关于孙逸仙逝世的问题。

决定：〔2〕—（1）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致电北京政府，吊唁孙逸仙逝世^①。

（2）以俄共中央委员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名义向孙逸仙灵柩献花圈。

（3）以俄共中央委员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②致函

① 苏联人民委员会致北京政府的唁电没有找到。

② 参见《苏中关系（1917至1957）》（文件集），第102—103页。

国民党，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致全中国人民书^①。

(4) 责成维经斯基照料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群众大会的组织工作。请共产国际执委会下达指示在整个欧洲组织相应的群众大会。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492，第 1、6 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139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52 号记录 (摘 录)

1925 年 3 月 13 日于莫斯科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52 号(特字第 39 号)记录

听取：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

I. 加拉罕同志的建议^②。(李维诺夫、伏龙芝、斯大林同志)。

决定：〔1〕通过伏龙芝同志的以下建议：

(1) 认为用我们的经费在中国(洛阳和张家口)由我们建立

^① 参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 48—49 页。

^② 加拉罕的建议没有找到。

两所军事学校是适宜的。

责成伏龙芝同志在最短时间内为此组织两个军事教官团，每团 30—40 人。

通过伏龙芝同志在一年内拨出一百万卢布用于建立学校和支付教官的生活费用。

(2) 认为用我国的主要型号武器装备同情国民党的中国军队是可行的。装备应是有偿的。

责成伏龙芝同志在最短时间内解决与此事有关的所有技术问题。

责成加拉罕同志查明对方支付武器费用的能力，或用货币支付，或用我们所需要的原料和产品（棉花、茶叶等）支付。

(3) 认为可以根据对方的支付能力立即拨给加拉罕同志一定数量的外国武器弹药。如需无偿拨给则要恢复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的贷款，数额为所拨武器的价值金额。

(4) 认为有必要对派往中国的东方民族大学的学生进行最起码的军事训练。

责成伏龙芝同志与共产国际东方部协商具体解决这个问题，拨给他解决此问题所需要的款项。

〔2〕责成中央书记处根据在中国建立两所新的军事教官中心的需要，提出两名政治领导人的候选人。

〔3〕由伏龙芝同志全面照料和领导教官学校的工作。

〔4〕注意到伏龙芝同志的如下报告：特种订货委员会正在就吸收外资建立一个生产 3—X 型线型子弹的新机枪弹药厂问题进行谈判。建议委员会一个月后向政治局报告谈判进程。

抄送：

伏龙芝同志——全部；

李维诺夫同志——〔1〕；

卡冈诺维奇同志——〔2〕；

书记处——〔2〕。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2，第 85，86，88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40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书面报告

1925 年 3 月 14 日^① 于北京

加拉罕同志：

本月 14 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对胡景翼军队的紧急援助问题。

从对该问题的讨论中弄清了以下情况：

1. 胡景翼的部队占据着四分之三的河南省，拥有人口达 2000 万。河南省西部，大致从洛阳起属憨玉崑管辖，此人为刘镇华在陕西东南部的将领之一。

几乎所有穿过河南的铁路，如北京—汉口、锦州—洛阳、开封—苏州都掌握在胡景翼的手中^②。

2. 胡景翼军队的战略地位对其非常不利。他的北边驻扎着与其有着良好关系的孙岳和冯玉祥的军队，但在这两个人之间有直

^① 收到的日期。

^② 根据 3 月初在郑州召开的全国铁路工人代表会议（指 1925 年 2 月 7 至 10 日在郑州举行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译者）上代表们的报告，在郑州有近 5000 纺丝工人，在开封有几千纺丝工人（鲍罗廷注）。

隶省督办李景林将军。张作霖千方百计要把孙岳从保定府赶走，以此来加大胡景翼与冯玉祥之间的空隙。

冯玉祥对待所谓人民军的态度确实非常难以确定。一方面，他似乎曾保证，当人民军确实受到威胁时一定支持它，另一方面，据其他报道称，他对胡景翼的军队持怀疑态度，说胡景翼的军队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土匪部队。政治局会议上相当坦率地谈到冯玉祥和张作霖可能暂时联合起来。意思是，当冯玉祥遇到有利时机时，他会从背后打击张作霖，就像他在去年10月23日对吴佩孚采取的行动一样。

不管怎样，胡景翼在北边的后方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完全有保障的。

3. 湖北省以南是萧耀南管辖的地区，胡景翼试图与他达成谅解，但眼下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我们知道，萧耀南一边讨好张宗昌，一边讨好国民党，从监狱里释放了国民党员。另外，他还同吴佩孚保持着联系。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了西南各省建立联邦的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南方国民党员甚至说，可以吸收萧耀南到联邦中来。由此可见，只要萧耀南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最终定位或者在胡景翼在其它战线上，如在西线或东线还没有陷入困境之前，他们两者之间的军事“现状”还会继续下去。

现在讲胡景翼向汉口推进，看来为时尚早，尽管他很有必要向长江中游地区进军^①，并通过这个地区出海。但这是不可能的，主要是因为有敌人在威胁着胡景翼的右翼和左翼。他们是：

4. 在西边，即胡景翼的右翼，四分之一河南省和陕西的东南部处于刘镇华的管辖之下，而且最近由于洛阳的归属还发生了一些冲突。据胡景翼的参谋长刘守中将军的报告，曾打算加强驻扎在陕北的力量，并将它们调到陕南去对付刘镇华，这样就使胡景

^① 指长江中游地带的出海口。

翼有可能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湖北省。但是，由于缺乏加强陕北力量的资金，这一计划无法实现。正是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胡景翼的代表经库伦来到榆林（在陕北的主要驻扎地）向我们寻求帮助。

我再说一遍，目前这个计划已经放弃。胡景翼自己只好把大部分力量放在西线，这就是最近在西线发生一些小规模武装冲突的原因。

5. 胡景翼的东边面对的是张作霖的部下张宗昌。张宗昌逐步把军队调到苏州，这样对胡景翼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政治局意识到各方对胡景翼构成的威胁，认为国民党必须立即帮助胡景翼。胡景翼在北京的代表、政治局委员于右任主要谈了关于物资援助和武器弹药等援助问题，这些援助只能经过蒙古从俄国得到。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即使大量物资援助的问题能在俄国得到积极的解决，但在现时的危急时刻，由于路途遥远、缺乏运输工具，而冯玉祥是否能让车辆自由通过张家口，也没有把握，这种援助无法实现。待援助条件具备，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国民党和苏维埃俄国能够提供其他什么援助呢？

国民党对胡景翼军队的援助

会议得出结论：这种援助可体现为加强胡景翼在整个河南省及其各条战线上的政治地位。

1. 胡景翼的军队缺乏纪律性，在其军队中有许多革命分子和国民党员，但没有正确的政治工作。必须召开军队中的革命分子会议，商讨如何在军队中进行政治工作。

2. 至于工人，这方面我们已做了许多工作，如：在郑州召开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大会期间还成立了纺丝工人工会。所有这些激发了河南劳动群众的高涨情绪，河南是除广东以外唯一给工

人以言论自由、组织自由的地方。必须使铁路工人以及其它工人参加援助胡景翼军队的工作，要守住河南，甚至扩大它的势力范围。

3. 会议决定加强对河南省农民的工作。这里应该利用广东省组织农民协会的经验。汪精卫认为，这项工作 in 河南比较容易开展，因为河南农民没有像广东农民那样受到豪绅的影响和压力。农民协会可以得到相当数量的武器，据悉，他们有 15 万支步枪。

4. 决定吸收大学生参加工作。在胡景翼的军队中有 500 名大学生志愿者的武装队伍。

为了有计划地进行上述工作，应该立即在郑州或开封集中一百名国民党员积极分子，对他们进行 1—2 周培训，教他们在军队、农民以及工人中进行工作。还决定为军队出一份篇幅不大的日报，为农民也出版一份同样的小报。

我们对胡景翼军队的援助

至于我们对胡景翼的援助，现在可以说有以下几点：

1. 派一名顾问去指导胡景翼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和对农民的组织工作等。

2. 派军事专家建立装甲车队，用他们自己的经验帮助进行国内战争。

3. 在帮助胡景翼解决他所面临的非常复杂的战略任务时，我们的军事专家应该很好地熟悉整个情况，向胡景翼提出解决这一战略任务的方案。表面上对胡景翼处情况的了解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首先胡景翼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西部战线上，以保证自己的陕西—绥远出口。但这需要预先征求军事专家的权威意见。

4. 在加强北方战线方面，我们对他的援助就是接近冯玉祥。

从这个角度看，召开国民党代表和人民革命党^①代表的会议是有很大好处的。

5. 最后，我们的援助还应该表现在瓦解涅恰耶夫分子上^②，因为他们能够在东部战线上起到决定胡景翼以后命运的作用。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44，第 31—36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14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53 号记录 （摘 录）

1925 年 3 月 19 日于莫斯科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53 号（特字第 40 号）记录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

〔1〕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1. —〔1〕（1）关于授予我国驻奉天总领事为外交代表称号一事暂缓。

（2）认为扩大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分部或建立新的

① 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② 涅恰耶夫部队是由白卫军组成，曾参加张宗昌将军军队的作战行动。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适宜的，并责成布罗伊多^①和维经斯基同志就此问题拟定一份报告交政治局。

(3) 成立由伏龙芝、契切林、莫洛托夫和彼得罗夫(后由维经斯基取代)同志组成的委员会，监督日常援助国民党和同情它的团体的措施的执行情况。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
布罗伊多同志——(2)；
维经斯基同志——(2)；
伏龙芝同志——全部；
莫洛托夫同志——(3)；
彼得罗夫同志——(3)。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2，第 89、90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42

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第 2 号报告

1925 年 3 月 20 日于上海

第 2 号报告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① Г·И·布罗伊多，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译者。

本月 12 日孙中山去世，他的逝世产生了如下影响：

1. 段祺瑞政府对国民党的态度是：联合它的右派，攻击它的左派，特别是攻击在国民党内的我们的同志；段祺瑞的追随者公然说，孙中山死了，如果共产党被镇压下去，那么国民党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可怕。

2. 在国民党内，部分右派分子看到孙中山去世，竭力要同段祺瑞妥协，其余多数，包括较进步的右派分子，提出了“争取团结一致”的口号。现在分歧还不明显。

3. 在整个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和进步的小商人，都对孙中山逝世表示了深切的悲痛。

4. 我们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1) 捍卫对革命纲领（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的继续执行和党的团结一致；(2) 利用各地悼念孙中山的会议，在广大群众中掀起国民革命运动，吸引革命分子加入国民党，以增强左派力量；(3) 准备迎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使右派在会上没有影响。

中国北方的政治形势是这样：在张作霖的奉军和冯玉祥的人民军之间，当然有隐蔽的斗争，不过段祺瑞的追随者同人民军也有冲突，目前在河南省进行的战争，是段祺瑞的追随者秘密号召山西、陕西军阀进攻人民军领袖之一胡景翼所致；现在胡景翼将军取得了胜利，因此张作霖更憎恨人民军，但从另一方面说，鉴于安福系派垄断着政府权力，张作霖也不能泰然处之，他开始公开宣扬“支持黎元洪，赶走段祺瑞”的口号，以恐吓段祺瑞。所谓“善后会议”^①，也就是由段祺瑞召开的改组会议，由于各军阀集团的阻挠，连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现在甚至都无法召开。同时张作霖对政府政策也不满意，所以段祺瑞迫不得已提出改组临

^① 指 1925 年 2 月 13 日至 4 月 21 日断续在北京举行的所谓“善后会议”。段祺瑞试图借助于“恢复国家统一”的会议巩固安福系和奉系军阀对直系军阀的胜利。

时政府的新计划，开放中央政权，吸收一些代表人物参加实力强大的军阀的军阀统治，以延缓政治危机的到来。

吴佩孚的力量没有被完全消灭。他现在在湖南省，在秘密领导湖北、湖南、四川和贵州四省的军阀和军队首领，期待着北方政局的变化。

在广州，陈炯明虽然已遭到失败，但林虎将军还有两万人的军队，准备反攻。滇军大部分开赴广西抵挡唐继尧的进攻。抵抗陈炯明和林虎的政府军东方战线，虽然有三万多人，但其真正能作战的和不会引起农民憎恨的军队数量很少，只有两千学生军^①。因此，广州的军事形势还不是很有利。如果陈炯明和林虎再次遭到失败，国民党军队占领广东省整个东部，那么在东江流域的10多个县就可以建立起20多万农民的组织。

陈炯明失败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学生军善于作战，另一方面是由我们的同志组织起来的武装农民起来反对他。此外，其余的军队，有的掠夺农民，有的没有作战能力。学生军一边作战，一边宣传国民革命思想和农民与士兵联合的必要性。陈炯明军队害怕学生军，说学生军是俄国红军。陈炯明派许多人到东线居民中宣传：“共产党来了，马上就要实行共产了……。”因此我们在承认东莞战争的重要性的同时，已经两次给加拉罕同志打电报，请求为东莞农民提供军事援助^②。

关于上海纺织工人罢工情况，我们已给你们发了三次电报，可能你们都收到了^③。罢工是一种无组织的造反。由于这次工人没有取得胜利，他们还不很信任工会。日本工厂主竭力阻止工人参加工会，因此现在参加工会的工人不过一万，但大部分工人领袖都

① 指黄埔军校学员。

② 中共中央给加拉罕的电报没有找到。

③ 关于罢工的电报没有找到。这里讲的是1925年2月上海22家日本纱厂4万多工人举行的罢工，要求满足经济要求和承认纺织工会。

已加入工会。工会虽然还没有得到当局的正式承认，但实际上它们是合法存在的。罢工工人当中有 50 多人加入了我们党（其中有 3 名妇女），并成立了两个支部。在 65 名^① 被捕工人当中，已有五六人获释，其余 9 人还没有判决。蔡志华同志（不久前从莫斯科归来）虽获释出狱，但英国巡捕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暴打他一顿，他受了重伤，现在还处于危险状态。

另一方面，山东的铁路工人罢工和汉口的人力车夫罢工都取得了胜利。但单山（音译）纺织工人的罢工彻底遭到了失败^②。在郑州召开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之后，各铁路线上的工会渐渐合法或半合法地恢复了。

从去年北京发生政变^③时起，中国的工会运动渐渐活跃起来。我们决定：按照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中华海员总工会和广东工人代表会四个组织的倡议，五一时在广州召开全国工会代表会议。这次我们争取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④。我们已给红色工会国际发去电报，让它派代表参加领导工作和提供物质援助^⑤。此外，我们还希望共产国际也派一些同志来进行指导。

现在，由于我们党做工作，职工运动和国民运动在日益发展，因此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也在不断发展。但由于工作人员和物质力量不足，我们失去了许多有利的发展机会，所以我们对共产国际有两个要求：1. 尽量多派些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同志回国工作；2. 为我们追加资助以下事宜的款项。

1. 《向导》周报 200 元
2. 小册子和传单 200 元

① 原文如此，从上下文看似应为 15 名——译者。

② 可能是指日本“大康”公司在青岛的纱厂。

③ 指 1923 年 10 月 23 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的政变。

④ 指 1925 年 5 月 1 日至 7 日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批准了它的章程并作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加入红色工会国际的决定。

⑤ 中共中央的电报没有找到。

3. 在地方巡视的中央视察代表 (2 人) 240 元
 4. 天津党组织 150 元
 5. 郑州党组织 70 元
 6. 安源党组织 30 元
 7. 长沙党组织 30 元
 8. 汉口党组织 60 元
 9. 上海党组织 60 元
 10. 山东党组织 60 元
 11. 河南宣传专员 (2 人) 60 元
 12. 西昌^① 宣传专员 (2 人) 60 元
 13. 南京宣传专员 (1 人) 30 元
 14. 广西宣传专员 (2 人) 60 元
 15. 无锡宣传专员 (1 人) 30 元
 16. 大连宣传专员 (1 人) 30 元
 17. 通州^②宣传专员 (1 人) 30 元
- 共计 1400 元

把预算增加到这个数字是必要的，请核准。我们希望从 4 月起，连同以前批准的预算，你们每月按时给我们寄来共计 3650 元（中国元）。

再有，按以前批准的 2250 元预算，我们在 1、2、3 三个月应收到 6750 元，而你们给我们寄来 3423 美元，仅相当于 5887 中国元，因此还差 863 元。这个数字我们还要求补上。以后请给我们寄金卢布或有追加的美元。

中共中央总书记 陈独秀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21，第 6—8 页。

打字稿，副本。

①② 按音估译——译者。

14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5号记录
(摘 录)

1925年4月2日于莫斯科

出席：

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捷尔任斯基、加里宁、莫洛托夫、鲁祖塔克、索柯里尼柯夫、伏龙芝同志。

俄共中央委员：安德烈耶夫、安季波夫、布勃诺夫、伏罗希洛夫、多加多夫、卡冈诺维奇、皮达可夫、乌格拉诺夫、瞿鲁巴同志。

中央候补委员：瓦雷基斯、马尔科夫、斯克雷普尼克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谢夫、古比雪夫、索尔茨、什基里亚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

6. 一关于建立中山大学的问题(1925年3月19日政治局会议第53号记录，决定：1. — [1])。

(报告人布罗伊多、维经斯基、李维诺夫同志)。

决定：

6. — (1) 认为在西伯利亚专为中国学生建立500人的中山大学是适宜的。

(2) 为说明建立大学、选择地址、确定其组成人员的措施，成立由布罗伊多、拉狄克和维经斯基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会议由布罗伊多同志召集。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495，第 1、3、9 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144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55 号记录 （摘 录）

1925 年 4 月 2 日于莫斯科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55 号 （特字第 42 号）记录

听取：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

〔1〕加拉罕同志的建议^①（报告人李维诺夫、伏龙芝同志）。

决定：1. — 〔1〕（1）原则上不拒绝加拉罕同志的建议，责成他开始同张作霖谈判。

（2）建议加拉罕同志弄清楚张作霖希望购买苏联武器的动机，并说明自己对这种买卖是否会影响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的看法。

^① 加拉罕的建议没有找到。

(3)认为只有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给予实际补偿才能出售武器。

抄送：

契切林同志；

李维诺夫同志；

伏龙芝同志。

听取：38. ——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会议第53号记录，决定1—〔1〕）。

决定：38. ——委托伏龙芝同志召集监督援助国民党和同情它的团体的措施执行情况的委员会会议。

抄送：

伏龙芝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2，第99、102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45

鲍罗廷的书面报告《孙逸仙之死与国民党》

1925年4月6日^①于北京

孙逸仙之死与国民党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把孙逸仙送进坟墓，实际上在我们同国民党直接接触的整个时期已经不可避免的分裂就开始了，而且是国民党右派率先挑起的。他们的行动带有不是同所谓的孙逸仙主义，而是同被他们诬蔑为卖身投靠布尔什维克的红党的左派作斗争的性质。他们不仅不反对孙逸仙教给中国人的一切，相反，还想用孙逸仙这面旗帜来掩饰自己。

在孙逸仙去世前几天，当大家都已清楚，他没有康复的希望时，国民党右派就采取了分裂党的第一个步骤。他们未经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允许举行集会，成立了俱乐部，实际上是一个新党^②。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俱乐部章程同党章没有什么不同，差别只在于其成员资格仅限定为四类国民党员，即只有1911年革命前加入革命同盟或同盟会的党员、民国元年的党员、民国三年以后的党员和民国九年以后的党员方可成为俱乐部成员。这就是说，新党不允许最年轻、最革命分子，而首先是共产党员加入其队伍。

^① 收到的日期。

^② 指的是1925年3月8日在北京成立的有冯自由、马素及党内其他右翼代表组成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1925年3月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把以冯自由为首的俱乐部组织者开除出党。

新党由国民党的“老近卫军”组成，它在中国是最保守、最落后和最反对革命的，其组成成分是很不协调的，未必可以称之为近卫军，倒不如称之为老破烂。这里有买办、军阀的继承人、银行式基督教徒、反对农民的豪绅权利维护者，也有一些反对在中国搞阶级斗争的教授以及顽固死守农村自然经济及其落后生活方式的人，这里还有一些谁给的钱多就准备为谁效劳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人都曾支持过中国人民反对满清皇朝的斗争，但此后不久他们就脱离了革命运动，认为革命已经结束，民国已经成立，现在应当自己生活也让别人生活。由农民、工人阶级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部分推向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表层的一批新人逐步将运动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深入到党的从下到上的一切组织，甚至渗透到军队，把新的革命精神带进军队，甚至组建了新型的军队，尽管人数很少，却战胜了由旧国民党人领导的人数众多的军队，例如不久前在同陈炯明的战争中就是这样，在这次战争中，青年国民党人的一个军校击溃并消灭了他们的正规军，这批人开始痛恨国民党内的一切反革命分子，迫使他们脱离出去。

自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即左派取胜以来，国民党右派在党内开展了反对左派的运动，他们希望孙逸仙仍然忠实于同他们的老关系，帮助他们把不合他们心意的人驱逐出党。但是，孙逸仙自己反而越来越左倾，特别是当他确信，只有同左派在一起才能有所作为的时候，因此，国民党右派除了离去，别无出路。

国民党右派的离去只应当加以欢迎。他们像重锤似的挂在国民党头上，不让它以中国整个客观形势所要求的速度前进。早在党的一大时，我就已经清楚，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同国民党右派共处是不可能的，必须将他们开除出党。但以孙逸仙为首的左派不相信这一点。孙逸仙仍然认为，根据我们的建议对党进行的改组，会把新的革命精神注入党内，而这种精神将会毫无例外地对所有党员产生影响。在当时当着他的面坚持把右派开除出党，那

是不合适的过激的转变，甚至在优秀的国民党人中谁也不能这样做。应当使国民党左派真正确信，不可能同国民党右派进行国民革命运动。在最近两年内，当国民党采取许多革命步骤，如：支持沙面反帝罢工、试图占领广州海关、同法西斯买办进行无情的斗争、站出来反对北方军阀和实行以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告终的激烈的反帝路线时，国民党左派才完全相信，同右派一起工作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采取的每个步骤都可耻背叛了革命运动。现在，孙逸仙已寿终正寝，国民党右派在北京建立了自己的俱乐部，并且孙逸仙去世后刚过几天，他们就公开谈论分裂问题，所以左派不能不同意我们的意见，认为我们一直强调必须同右派作无情的斗争是正确的。

不能由以上所述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分裂是按着明显把左派和右派分开的一条线发生的。当我们谈论左派时，必须注意到，实际上他们至少是由两种人组成的，一方面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另一方面是国民党的中派分子。不能说中派分子已经完全转到我们方面反对整个右派。不，他们仍然希望同右派中的那些他们认为不是自己的思想敌人，而是不理解孙逸仙的真正主义的人和解，对这些人应当加以教育。中派的这种看法是有某种依据的。因为在右派营垒中有反对新的资产阶级类型的阶级斗争的人，能否把他们引上国民革命运动的轨道，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众所周知，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它不可能不支持国民党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和首先消除外国对海关的控制的斗争，因为海关在帝国主义手中是遏制中国工业发展的工具。年轻的中国工业需要关税保护，而这只有在海关处于它的影响之下才能做到。这就是中派不顾年轻的资产阶级是不是支持阶级斗争，而还指望得到它的支持的原因。是否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可能这个资产阶级觉得帝国主义对它的利益的危害比工人日益增长的阶级斗争的危害要小？这个问题对于

中派来说还没有得到解决。我个人以为，中国资产阶级通过同外国资本的合作已经腐化堕落，与其说它可能成为中国民族解放的工具，倒不如说它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具。中国资产阶级起源于买办，现在它还没有摆脱这种性质。正因为如此，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始终反对我们的反帝路线，反对工人的阶级斗争。

由此产生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否应当对中国资产阶级也采取斗争（这里说的是国民党的斗争，而不是共产党的斗争，对于共产党来说，问题当然已经得到解决）的方针，即我们是否应当打破中派希望得到中国资产阶级对国民革命运动的支持的幻想。

当分裂真的发生时，国民党内的力量对比会是怎样的呢？对这个问题只能有一种回答：将对我们有利。国民党在农民中开展的全部工作都是在我们领导下进行的。同右派的分裂在这里不会有任何意义。工人中的工作完全是在我们的领导下进行的，右派试图召开工人代表会议，这将是有名无实之举，很快就会烟消云散。学生中的工作，表现为抵制外货、进行反基督教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分子，主要也是在我们领导下进行的。广东根据地现在和特别是当该省清除陈炯明的将领和其他将领之后会使我们有可能在广东省4000万农民群众中开展非常广泛的工作，并使我们能够同邻近省份的农民进行密切的接触；因为在广东组建了新型的军队，因为在这些部队中开展了政治工作，而这项工作也主要是在我们的领导下进行的。拟在洛阳和张家口建立的基地也将主要处在我们的控制之下，那里将成立新的政治学校和军事学校，并从那里做农民工作。从中国各省汇集到北京出席召开国民会议促进会的代表有153名，其中100名是左派，其余的或是纯粹的无党派人士，或是立场不明确的国民党人。因此，可以大胆地说，国民革命运动整个战线的实际工作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掌握在左

派手中。根据在国民党内的将近两年的工作经验，我已确信，右派根本不能搞任何有组织的活动。他们之间的矛盾很大，以致任何创举都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最后以争吵和对骂告终。不用担心他们退党后会联合起来进行什么工作，哪怕是反对我们的工作。他们最好也不过是像我们来到中国以前，即国民党改组以前那样工作。这种工作就是，他们自称是国民党人，偶尔集会、争论，整年整年地根本不参加党的活动，对国内任何现实生活表现都不作反应。

现在令我不安的不是可能出现彻底分裂的局面，而是可能暂时延缓这种分裂。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中央传出了以下看法：“某些党员”成立俱乐部不会带来任何损害，让他们开会好了。什么在国民党的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党员组成俱乐部的情况。这样说来，重新成立的俱乐部，虽然清楚表明产生了一个新党的章程，也无非是老国民党人的某个协会。这种观点是极端危险的，我们将同它进行斗争。

现在我们面临的基本任务如下：1. 把国民党的一切地方组织都掌握在我们手中。右派的不尽心尽职是十分严重的，因此这项工作对我们来说不是很大的困难。2. 在北方建立两所培养左派的党的工作者的学校。3. 为召开国民党例行代表大会作适当准备。4. 通过在胡景翼、孙岳和冯玉祥的人民军中积极做工作和在我方对他们的大力帮助下，把他们吸引到国民党左派方面来。5. 广泛开展反对打着孙的旗号用反革命的胡言乱语偷换三民主义的运动。6. 不仅在南方，而且也在北方加强对农民的工作。对工人的工作也是一样。7. 同实际上属于右派营垒的联邦主义者作斗争。这种斗争不应当反对联邦制原则本身，实际上联邦制意味着中国所必需的各省的广泛自治，至少在当前的过渡时期，我们自己应当推广各省广泛自治的主张，而要宣布联邦主义者是反革命。

完成上述任务需要全体合适的工作人员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

力，但这样的人手不够。必须紧急把所有适于我们在中国这里工作的中国人派给我们。由于这样做也还不够，所以现在就需要着手培养新的中国人。

鲍罗廷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45，第 164—171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146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中国委员会会议第 1 号记录 （摘 录）

1925 年 4 月 17 日于莫斯科

中国委员会会议第 1 号记录

出席：温施利赫特、契切林、维经斯基、彼得罗夫、隆格瓦、梅利尼科夫、博尔特诺夫斯基和别尔津^①。

听取：

决定：

^① И·С·温施利赫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主席；Р·В·隆格瓦，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书记；В·Н·梅利尼科夫，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司司长；В·В·博尔特诺夫斯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书记；Я·К·别尔津，工农红军总部侦察管理局局长——译者。

1. 关于中国形势的通报(报告人:隆格瓦)
 1. 注意到通报,认为中国的局势正在恶化,事态的发展要求我们加强援助。不要加剧事态,要仔细斟酌在每个情况下提供援助是否适宜。
2. 转交援助物资的技术。
 2. 紧急向科西奇同志^①询问有关运输的组织、条件、供货日期和运费情况。
3. 与张作霖联系问题
 3. 关于出售武器问题,要等加拉罕同志的答复。
4. 关于内蒙古的问题。
 4. 认为必须加强革命工作,但应从中国(北京)内部着手。
5. 对冯玉祥和其他将领的态度。
 5. [1]认为在下列条件下可以向冯玉祥提供援助:(1)提供的援助应当是有偿的,或全部用货币偿还,或部分用货币、部分用原料偿还。支付的方式和条件根据主要的政治协议确定。运费在任何情况下都应立即算清。(2)在冯玉祥、外蒙古和我们之间订立三方友好互助口头协议,冯玉祥作出关于接受我们对蒙古的计划和关于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向外国人提供任何租界的单方面书面保证。
[2]认为冯玉祥关于为利用库伦和张家口^②之间的运输线组建混合运输公司的建议原则上是可以接受的。从国营汽车运输和工商股份公司代表那里得到消息后具体问题。

① Л·И·科西奇,蒙古人民军参谋长——译者。

② 张家口是连接俄罗斯和中国的老运输线张家口至恰克图的起点。冯玉祥将军的大本营就设在这里。

- [3] 坚决反对用财政援助取代武器援助。
- [4] 向其他将军提出同样的条件(决定[1])。
- [5] 只有在加拉罕同志得到有关租界的答复后才继续发送武器。
6. 关于给加拉罕同志发送一定数量的武器用于无偿地援助将军们的问题。
6. 温施利赫特同志通知,2000支日本步枪和2000支德国步枪以及相应数量的子弹已经发送。
7. 关于补偿军事部门准备发出的武器的771万卢布的价值问题。
7. 支持向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申请补偿。
8. 关于在北京组建领导中心问题。
8. 为了领导中国的整个军事工作,在北京成立由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同志(主席)、军事领导者格克尔同志和军政工作领导者沃罗宁同志(成员)组成的中心。
9. 分化涅恰耶夫的部队
9. 征询加拉罕同志对于分化涅恰耶夫部队的可能性、合理性和方法的意见。
10. 关于执行这次会议决定。
10. 认为除决定:8需提交政治局批准外所有决定都是最后的必须执行的。

本人签字 主席(温施利赫特)

147

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

1925年4月22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列夫·米哈伊洛维奇：

近三周因忙于全会的工作没有给您写信^①。现在全会结束了，可以向您通报您最关心的那部分会议结果，即有关殖民地国家的会议结果。首先，谈谈全会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它与以前提法的不同在于，东方没有被笼统化和抽象化。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不只是再次强调和评估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斗争同西方无产阶级的斗争结合起来的必要性，但我们试图根据东方国家的具体条件和各个国家正在进行斗争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对这个共同的任务加以区分。

自然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们没有事先准备也没有作出关于整个东方的总的决议。此外，我们也没有一定要针对东方各个国家作出单独的决议，而只是针对那些迫切需要就阶级斗争问题和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给共产党作出指示的国家通过了单独的决议。

全会殖民地委员会没有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而仅限于我提出一个供参考的报告^②。这是因为，根据我的建议，大家认为对我们的总的策略方针作出某种改变是不合时宜的，总的来说，这

① 指1925年3月21日至4月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

② 在维经斯基的报告中，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共四大的成果上。

个方针被认为是正确的，现在也没有任何必要加以重申。在上一期《共产国际》杂志上，我对这个方针作了说明^①。

人概是根据同样的想法，没有作出关于土耳其和波斯问题的决议，但作了关于这两个国家的报告。

全会殖民地委员会的主要注意力放在下述国家上：印度、埃及、爪哇和美国的殖民地。全会根据可以理解的原因，即美国在远东和美洲大陆的扩张政策，第一次注意到美国的殖民地及其中美洲附属国（菲律宾群岛、西印度和拉丁美洲国家）。我们没有触及关于黑人这个大的种族问题，但是我们准备了这个问题，以便到今年夏天在芝加哥举行黑人代表大会时，我们的美国同志能够贯彻我们制订的行动纲领。

您从关于印度问题的决议中可以看出，继关于成立共产党的首要问题之后，主要注意力放到了共产主义运动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上。您还可以看出，我们没有试图把我们中国在上述问题上的经验抽象地照搬到印度。在前几天出版的第4期《共产国际》杂志上，我在《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的殖民地问题》一文中，详细地谈了这一点。

在爪哇，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为民族革命党提出符合广大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群众利益和愿望的行动纲领。我们的爪哇同志（不是在全会上，而是在爪哇）采取了极端立场。他们宣扬没有过渡口号的苏维埃政权，为这种政策提出的理由是，在爪哇没有民族资产阶级。结果使爪哇共产党人未能利用一切可能来开展国内的反帝运动，而另一方面又有使共产党本身变得平庸无能的危险。

关于埃及问题的决议是旨在纠正我们的同志在关于同札格鲁尔党组成反帝联盟问题上的某种虚无主义。

以上简要地谈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作出的关于殖民地问题

^① 见维经斯基《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趋势与国民党》，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25年第3期第153—159页。

决议的基本内容。

现在来谈谈中国问题。应当承认，鲍罗廷最近的通报并未使我们感到满意。第一，根据这些通报判断，很难想象在中国存在着在这个国家的解放运动中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共产党。俄罗斯通讯社的报道未谈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您在自己的报告中也不认为有必要谈这一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鲍罗廷的通报中却应该给予共产党的实际作用以相应的注意和位置。您当然明白，这里讲的不是权限、自负等等，而是让俄共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了解中国解放运动中的真实力量对比。我认为正是现在需要谈这一点，因为中国的局势越来越复杂，所以准确地通报国共两党的关系和它们在这个国家的作用是绝对必要的。其实前几天，在同斯大林同志的一次长时间交谈中就了解到，在他的印象中共产党人已溶化在国民党内，没有自己的独立组织，一般都受到国民党的“虐待”。斯大林同志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寄人篱下的处境表示遗憾，认为也许在中国现在的这种处境是历史的必然。当向他说明共产党有自己的组织，比国民党更团结，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享有批评权，国民党本身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同志做的等等情况时，他感到很惊讶。为证实自己对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处境的印象，斯大林援引了报纸上的报道和我们发自中国的通报。确实，可以认为，对于未到过中国，不了解那里情况的人来说，鲍罗廷的通报正是会造成这种印象。将来需要我们纠正发自北京的通报内容，突出共产党在共同的解放运动中的作用^①（无论如何要突出它的内部工作，比如说，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中央的一些关系，以及中共中央作出的策略性决议等）。至于共产党的一般活动，在鲍罗廷的通报中没有必要作介绍，中共中央会向共产国际提供这方面的情况，有关同志会从共产国际那里得到所需要

^① 原文如此。

的材料。

第二，鲍罗廷最近的通报应该谈什么呢？应该谈国民党即将发生的分裂。我认为，这里反映了鲍罗廷在看法上的某种不一致，在现实政策中，这种不一致有可能给我们造成很不好的后果。这种不一致在于：一方面鲍罗廷指出了国民党右派的极大积极性，指出了他们打着孙逸仙的名义来掩饰分裂国民党的企图、他们同部分军阀搞的阴谋勾当，以及他们同唐继尧的串通。另一方面，他在谈论国民党右派时声称：“他们之间的矛盾很大，以致任何倡议都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最后以争吵和对骂告终。不用担心他们退党后会联合起来进行什么工作，哪怕是反对我们的工作。他们最好也不过是像我们来到中国以前，即国民党改组以前那样工作。这种工作就是，他们自称是国民党人，偶尔集会、争吵，整年整年地根本不参加党的活动，对国内任何现实生活表现都不作反应”^①。

国民党人在5年前或3年前所做的事情，不能作为我们说明这些人在今天的政策和策略中毫无用处的证据。不应忘记，现在中国在国内政治斗争方面根本不像几年前那个样子。中国资产阶级需要并且已经着手组建自己的党，对此鲍罗廷表示赞同。我认为，组建这个党要通过国民党右翼，再加上像从英美归来的学生这样的社会团体，以及买办中最开明最有文化的部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鲍罗廷对国民党右派的评价，至少（对我们来说）是乐观的，而对敌人力量的估计不足会把我们引向何处是不言而喻的。顺便说一句，不应忘记，去年夏天，还在广州商人暴动之前，右派就掌握了国民党的报纸，而左派却没有任何报纸。这也是右派“阶级觉悟”的标志。现在国民党右派试图把工人组织起来，与

^① 见第145号文件。

阿姆斯特丹建立联系^①，与我们相抗衡。李大钊在其最后一封信中谈到了这一点^②。据李的这封信说，甚至在北京创办的国民党机关刊物^③，也是一些国民党右派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

这些情况加在一起说明，右派正在聚集自己的力量，对这些情况不应视而不见，而要从中得出相应的结论。

鲍罗廷同志的结论大概是这样：国民党右派留在党内对我们有害，但在党外不代表任何力量，因此，需要加速国民党不可避免的分裂。

我担心这个结论是机械的而不是战略性的。

我认为，我们应该作出这样的结论：现在右派在国民党内外同我们作斗争更坚决了。必须加强我们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和在国家政治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工作，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提出开除部分国民党员的问题，而不是党的分裂问题。共产党人应该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站在运动的最前列。

在代表大会之前^④，还需要做大量宣传鼓动工作，需要揭露右派，何况所谓的国民党左派还远不理解右派的全部叛变行为。

我这样提出问题，是想请您，列夫·米哈伊洛维奇不仅同鲍罗廷而且直接同中共中央，特别是同李同志讨论对右派的态度问题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我们。

已决定在西伯利亚建立500人规模的孙中山大学。被责成研究这个问题的（拉狄克、布罗伊多、维经斯基）三人委员会认为，把这所大学设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是顺利实现这个想法的必要条件。

① 指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国际工会联合会），1919年由社会民主党工会建立，1945年解散。

② 李大钊的信没有找到。

③ 可能指1925年3月5至17日在北京出版的《北京民国日报》。

④ 指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前几天,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举行了会议^①,讨论了与您的建议有关的一些问题。我认为,您会收到直接来自你们部的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报告,所以我就不讲委员会的决定了。

请将这封信也抄送鲍罗廷同志,因技术原因我无法给他寄出。

(维)

全宗 495, 目录 154, 卷宗 252, 第 29—33 页。

打字稿, 原件, 最后一句和签字为亲笔签字。

148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62 号记录 (摘录)

1925 年 5 月 7 日于莫斯科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62 号(特字第 45 号)记录

1925 年 5 月 5 日征询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听取:

34. ——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 34. ——接受伏龙芝同志的建议(见附录)。

^① 指 1925 年 4 月 17 日举行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见第 146 号文件)。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第 62 号记录 决定：34 附录

就加拉罕同志提出的与广州局势有关的要求问题，我建议：

1. 认为在广州组建新的可靠部队是必要的。责成伏龙芝同志为此目的向广州派遣 200 人的教官团。

2. 为组建部队拨出必要的资金，责成伏龙芝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最后确定为此拨出的补充资金的数额（约 50 万卢布）。

3. 为同样目的拨出 2 万支步枪、100 挺配备子弹的机枪、一定数量的掷弹炮和手榴弹。由作为军队固定器材的红军机动储备品中提供的那部分装备，必须通过向军工部门提供相应数额的补充订货立即加以恢复。款数由伏龙芝同志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协商后确定。

4. 把拨出的器材和资金作为给中国政府的贷款提供。

5. 人员的派遣以及装备的发送，要绝对保密。利用“沃罗夫斯基”号通信船运送人员和装备是不适宜的。责成中国委员会为此寻找其他途径（国营轮船、私人船、外国船等）。

6. 让布勃诺夫同志参加中国委员会。

温施利赫特同志当伏龙芝同志的副手。

已核对无误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2，第 115—117 页。

打字稿，记录为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附件为经过核对的副本，签字字迹不清。

149

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

(摘 录)

1925年5月13日于上海

绝密

致维经斯基同志

亲爱的同志：

1. 我4月20日在北京时偶尔得知，您的公文袋起初滞留在天津，由于铁路交通中断，信使不能从那里继续前行，公文袋就北京搁置了约一个月时间。经强烈抗议后才无条件地向我许诺，一有信使就带去，此事我已从北京电告您。

2. 上周，鲍罗廷同志在前往广州的途中在这里停留几天。他同中央委员会开了几次会议。会议进程、交换意见情况和相互关系都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感觉到互相不信任、不真诚、耍外交手腕。现转达鲍罗廷同志给加拉罕同志的电报内容：

“鉴于积极的党务工作者为数不多和没有说明紧急任务的重要性，不能像事先设想的那样动员所需要的党务工作者。中央委员会能召集约40人，其中10人派往北方（冯玉祥的部队），5人前往广州，其余的也去北方。此外，80人将被派到北方党校去学习1、2、3个月。中央委员会建议：（1）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招来40人，从法国招来50人，为此，中央委员会以王一飞的名义向莫斯科发了电报。调动经费由你们自己确定。

“（2）中央落后于对时局的领导，落后于在南北方的紧急任

务，这就提出了成立由两名中央委员和两名其他积极工作者组成的委员会来直接领导重点地区工作的必要性问题。中央委员会也是不很愿意这样做的。该委员会应当立即从事吸引工农群众参加保卫广州政府的斗争的工作。广东局势一稳定，委员会就转到北方去。

“（3）已同中央委员会一起得出结论，应当把胡汉民政府看作是向较为革命的政府过渡形式，因此，现在不必同它作斗争。主要任务是为将来同过渡形式不可避免要进行的斗争准备军事政治力量。在当地一切都会看得更清楚些。

“（4）国民党代表大会^①议事日程已排定，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初步名单已拟定，代表大会筹备活动计划也已制定。我们将制定决议案和宣言，并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对右派的态度依然如故，这决定了代表大会上的力量对比。关于在将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人数问题曾一度发生争执，中央提出7人，我表示反对，为的是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一致同意最低限额——4人，其余的根据代表大会期间中国整个局势而定。

“（5）中央要收集有关国民党地方工作的详细材料，以便‘对实际情况有所感受’。中央相信，自孙逸仙去世以来国民党有发展。报告起草好时，我们要看一下。湖南报告说，基督教徒决定加入国民党，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很有意思的问题。帝国主义者可能采用这种办法从内部搞垮国民党，或者这可能意味着希望同帝国主义者划清界限的中国基督教徒的情绪发生了转变。由此产生了中国教会在反帝路线方面发生分裂是否适时的问题。请将您的看法告诉广州。

“（6）一致得出结论，如果段祺瑞的国民会议在这种政治

^① 指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局势和这种力量对比情况下召开的话，要积极加以抵制。在广州提出某种建议之前，我将等待您的意见。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拟定的宣言^①中不会直接攻击右派。

“（7）我们把预算分为紧急和非紧急两类。广东、河南、直隶和内蒙古属于第一类。浙江、江西、湖南、湖北、上海、安徽、山东和江苏属于第二类。根据上述理由委托中央委员会办理紧急预算是没有意义的。最好由我们自己在中央委员会紧急工作委员会和国民党左派的协助下制定。涉及工人、农民、学生的项目和周刊将根据预算在维尔德的参与下由我们中央委员会从非紧急预算中给以资助，维尔德将关注制订预算和报表是否正确。各非重点省这些项目的总金额每月不超过6000中国元，并且在国民党代表大会结束前一直有效。紧急预算将取决于您能筹集到的数额和能从同军方进行的出售武器及运输交易中得到的数额。当然，关于这笔预算的数额我同谁也没有说过，因为它将完全由我们掌握。在北方它将由您批准，在南方待我制订后提交您批准。派人工作和上学^②的预算将由维尔德提交给您。我已把《民国日报》从3000份减少到1000份，而且是在刊载国民党左派的材料情况下。如果广州改变编辑部的组成，我将把增加预算的意见告诉您。如果您认为在国民党代表大会前不应减少《民国日报》，请告诉维尔德。

“（8）中央委员会并没有给我留下一个紧密团结、有朝气的机关的印象，罢工之类的地方事件临时把它抛到面上，否则它就会呆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里，事后从那里发指示。中央委员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将从广州向您详细谈这个问题，今天我就前往广州。 鲍罗廷”

中央委员会与鲍罗廷同志的观点的主要差别在于后者确信，

① 可能是指1925年5月24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赞同的《关于国民党执行孙中山遗嘱的宣言》。

② 从上下文看不出所说的是什么学校。

中央委员会现在就应当把全部力量投向广州(尽管会损害其他工作),而中央委员会则认为,它在这方面已经尽了最大的可能(张太雷、蔡和森、罗亦农以及其他许多负责人已被派往广州从事经常性工作。此外,还向那里的农民学校派去了70人)。如果考虑到紧急派35名积极的工作人员到冯玉祥的军队,又派70人去河南军校,以及全中国罢工运动的浪潮,那么应当肯定中央委员会确实尽了一切可能……^①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维尔德

全宗514,目录1,卷宗123,第62—65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15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3号记录 (摘录)

1925年5月15日于莫斯科

出席:

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加里宁、莫洛托夫、索柯里尼柯夫、伏龙

^① 以下删去有关日本情况的部分。

芝同志。

俄共中央委员：奥尔忠尼启泽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比雪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1925年5月12日征询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听取：

9. —关于中山大学。

决定：

9. —(1)同意政治局委员会关于在莫斯科建立该大学的建议。

(2)其他方面的问题交中央组织局审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503，第 1—2、4 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151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给共产 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报告 (摘 录)

1925年5月16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东方部的报告

不久前结束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①强调指出了近来几乎在东方所有国家、在非洲殖民地和在太平洋诸岛兴起的解放运动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在中国、埃及、摩洛哥和小亚细亚正在发展的事态以及不久前在土耳其东部省份和波斯南部被平息的封建主反革命发动，证明东方朝着旨在反对英、法、日、美等国帝国主义政府的解放运动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在东方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年轻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小组，无论是在领导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还是在被压迫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中都起着日益强大的作用。

这些客观条件在以迄今从未有过的速度深入发展，并使东方

^①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

国家的解放运动与那里的阶级斗争同时具有了非常巨大的规模，这就要求共产国际及其东方部增加十倍的知识和精力，以便不落落后于事态发展，不致成为业已发生的事件的登记机关，而是真正领导这些事件，并通过东方各国共产党的领导日益掌握自发的进程。

自第五次代表大会^①以来，共产国际东方部大大接近了东方国家并更好地了解了这些国家的阶级斗争和解放运动的性质，因此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今年的扩大全会上首次提出了东方国家的问题，不是把整个东方抽象化，而是谈每个东方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运动情况，主要是考虑和寻找每一个国家的特点，寻找领导东方国家正在兴起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最佳途径和方法。

为了吸引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共产国际各支部，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支部对东方工作的最大的注意力，为了制定东方部旨在加强该部工作并使之接近于各东方国家的今后的活动计划，东方部认为有必要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出自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总结报告，并提出为其今后卓有成效的工作所必须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东方部的报告

自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东方部对远东、近东和中东国家和对非洲殖民地的工作表现如下：

中国。自去年夏天以来，中国总的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是在北方军阀吴佩孚和张作霖之间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在中国南方拥有根据地的国民党同所有军阀的斗争。无论是北方军阀之间的斗争，还是国民党同这些军阀的斗争，都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帝国主义者争夺中国势力范围的竞争，另一方面直接反映了中国

^① 指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主义的斗争。

在国内反帝运动普遍高涨的情况下，作为中国军阀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干涉的结果，中国的局势自去年以来一直孕育着人民时而在这个大国的这一地区，时而在另一地区发起暴动的危险。

由于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列强在该国的利益是交织在一起的，又由于苏联在中国正式承认^①后成了该国的重大政治因素，中国局势变得极为复杂，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肩负了一个强大的、人数众多的、经受过战斗考验的共产党才能肩负的任务。

考虑到中国局势的复杂性并了解到共产党所具有的力量和政治分量程度，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去年召开了中国党中央全会（实际上是党代表会议）^②，几乎中国各重要省份的中共负责人都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为了进行这项工作，东方部派负责人^③到中国。在这次全会上无论为在国民党内的的工作，还是为在工会运动中和在中国南方农民中的工作，都制定了党的决议和指示。

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问题以及我方支持以孙逸仙为首的左派的必要性问题，在全会工作中占据突出位置。不过对于聚集和组织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问题以及在农民和军队中做工作的问题的具体提法也给予了同样的注意。

后来中国事态发展的进程完全证明中共中央全会在东方部指导下所通过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全会后不到三个月，在中国南方的广州爆发了得到英国帝国主义者（当时的麦克唐纳政府）的帮助、大体上反映了国民党左派与右派之间斗争的商界反革命行动^④。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主要是由于国民党内共产党员根据通过的决议所做的工作（即使国民党接近工人群众，接近同土地

① 1924年5月31日。

② 指中共中央执委会第三次扩大全会。

③ 指维经斯基。

④ 指1924年10月的商团叛乱。

所有者、官吏、某些军阀匪帮作斗争的贫苦农民)，反革命才没有得逞，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地广东省才仍然掌握在孙逸仙手中。此外，只是由于在中国南方劳动群众的支持下镇压了商团的叛乱，中国的解放运动才能在这一年冬天取得如此巨大的规模。

中共中央全会后两周，根据共产国际东方部和红色工会国际的倡议，首次在广州召开了太平洋运输工人代表大会^①。由于各殖民地特别艰难的经济条件，不是所有被邀请的代表都能出席这次大会，而只有中国北部、中部和南部的代表以及菲律宾群岛和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出席。由于举行这次代表大会，在这些国家的工人之间建立了一定的联系，成立了由来自中国南部、菲律宾和日本的三名书记组成的太平洋运输工人书记处。书记处用英语和本地语言出版每月通讯^②，并着手在马尼拉、香港、新加坡和爪哇组建运输局。为了在该书记处中做工作，东方部在前几个月派去一名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掌握几种欧洲语言的中国同志^③。

今年1月中旬，东方部再次派负责人^④去出席中共四大，此人自去年秋天以来在中国工作了几个月，同中共中央一起开展了反帝运动、参与筹备了对上海等地纺织工人罢工的领导工作……^⑤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局和书记处中的东方问题。自共产国际五大以来，有关东方国家的问题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局和书记处会议上讨论过75次，其中中国和埃及问题有5次提上议事日程，巴勒斯坦问题也有5次，朝鲜和黑人问题各7次，爪哇问题

① 指的是1924年6月17至23日在广州举行的东方运输工人代表会议。

② 通讯名称和出版时间不详。

③ 何人不详。

④ 指维经斯基。

⑤ 以下删去关于蒙古、日本、朝鲜、近东各国、印度以及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殖民局工作的部分。

4次，最后，波斯、土耳其、日本和蒙古问题各2次。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近期的任务

从东方部在自共产国际五大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四月全会期间的工作总结中可以得出以下任务：

1. 从中国南部地区（广州或上海）建立对日本、朝鲜、中国、印尼、菲律宾群岛和印度工作的经常性领导关系。为此目的，首先必须在今年秋到1926年初冬期间在中国南部地区召开中共代表大会^①、日本共产党代表会议、爪哇党代表大会和太平洋国家工会组织代表大会，并尽可能召开印度共产党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和召开日本代表会议的问题实际上早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前就由我们的整个工作进程决定了。近来中国和日本的事态发展更加说明有这个必要。

在中国，国民党看来在走向正式的分裂，共产党在解放运动中的作用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都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以近两三个月的罢工浪潮为标志的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要求加强共产党在工会中的工作和巩固我们在其中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应当在这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指导方针……^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具体建议

为了执行上述各项任务，我们认为必须：

(1) 通过吸收 P^③ 同志参加东方部的经常工作来加强该部的领导，从而建立由三人组成的东方部领导委员会。

(2) 通过东方部的定期报告和建议建立东方同共产国际执委

① 中共五大只是到1927年才举行。

② 以下删去有关日本、朝鲜、爪哇岛、近东国家、法国殖民地和印度的部分。

③ 可能指 M·H·罗易或 M·Γ·拉菲斯。

会主席团、书记处和组织局的最佳联系。东方部的建议由委员会同红色工会国际、青年共产国际、农民国际和妇女书记处的代表一起研究制定。

(3)建立东方部同西方国家共产党殖民地委员会的组织联系,以便从政治上领导它们的活动。

(4)用一些熟练的宣传鼓动工作人员和组织工作人员来加强东方部的工作人员队伍。

(5)在莫斯科组建附属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东方出版社,以便为东方国家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在近东组建阿拉伯出版社。

(6)由东方部从英、美、法、荷兰和比利时共产党的同志中为殖民地和为研究宗主国的殖民地问题培训工作人员。

(7)在中国组建由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组成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以便领导远东国家和太平洋地区的工作。由该局建立一家出版社,为这些国家出版指导性月刊。

(8)与上述任务相适应增加东方部的预算。

彼得罗夫^①

维经斯基

全宗 495, 目录 154, 卷宗 138, 第 8—11、22、24—25 页。
打字稿, 副本。

^① 即 Ф·Ф·拉斯科尔尼科夫。

152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中国委员会会议第2号记录

1925年5月29日于莫斯科

中国委员会会议第2号记录

出席：伏龙芝、温施利赫特、契切林、索柯里尼柯夫、莫洛托夫、布勃诺夫、彼得罗夫、维经斯基、梅利尼科夫、博尔特诺夫斯基、隆格瓦同志。

主持：伏龙芝同志

听取：

决定：

1. 军事政治形势。 1. 备案待查。

隆格瓦同志通报。契切林、温施利赫特、维经斯基、伏龙芝同志发言。

2. 组织措施。

2. (1) 中国的一切军政工作和经费的发放统一集中于中国委员会。

关于业已进行的工作和存在的问题——隆格瓦同志通报。

(2) 将发放经费援助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转告共产国际。

关于军事小组：契切林同志说，有 200 万卢布由外交人民委员部支配，这笔钱用于支持广州小组、黄埔军校、政训班，资助组建一个新的师团，援助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目前这笔经费已经花光。

关于在黄埔军校组建新的部队。

关于北方的学校。

关于莫斯科的中国训练班。

军事小组设在南方广东一个，北方冯玉祥和岳维峻处两个。

(3) 将广州组的经费纳入中国军政工作的总预算。

(4) 三个小组和北京中心的教官总数定为 128 人。

(5) 以 3 (195 美元) 作为一名教官在中国的生活费的平均系数。

(6) 不发放留下的教官家属的生活费，需要时从基本工资中扣除。

(7) 一个小组的经费连同业务费用每月不得超过 20 万卢布；业务费用每个组每月不超过 5 万卢布。

(8) 资助在南方组建两个新的师团和黄埔军校。

(9) 拨出 45 万卢布用于组建两个新师团，维持一个老师团以及黄埔军校。指示加伦同志^①，上述款项为 9 个月，即到 1926 年 1 月 1 日的费用。

(10) 认为在冯玉祥和岳维峻处各建一所黄埔式的军政学校是适宜的。学校由我们的教官管理。只有在此项费用不超出所拨出的 100 万卢布的条件下才帮助维持这两所学校。

(11) 将维持莫斯科中国训练班的经费纳入中国军政工作总的开支预算。

^① 即 B·K·布留赫尔。

关于秘密开支。

(12) 从1925年4月1日至9月1日拨出3万美元加强侦察工作，每月平均6000美元。

将上述款项纳入中国军政工作总的支出预算。

关于翻译。

(13) 责成梅利尼科夫和隆格瓦同志就这个问题制定具体计划。

关于外交信使联系。

(14) 认为有必要每月派信使去北京两次。财政人民委员部根据有关条款每月给外交人民委员部增加经费2000卢布。

3. 物质援助。隆格瓦同志通报。加拉罕和沃罗宁同志提出发货问题：给广州——配备子弹的步枪9000支、机枪100挺、手榴弹1万枚、一些掷弹炮、飞机6架和无烟火药。给冯玉祥和岳维峻：配备子弹的步枪5万支、配备子弹和子弹带等的机枪300挺、配备炮弹的炮200门、制造枪弹的机床、化学制剂、功率强大的无线电台、飞机、坦克和用我们的资金组建冯玉祥的骑兵队——全部

3. (1) 按预定数量发运军事器材。

(2) 凭票据赊销给国民党将军和广州的军事器材两年后付款。

(3) 由我们负责运抵广州和张家口，运费记入票据担保的款项。

(4) 预定发运的9000支步枪和900万发子弹以及以后运送的物资，如果用骆驼运送，则取道库伦运到张家口。

(5) 所运物资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由蒙古人民军护送，在内蒙古境内及以后由冯玉祥的部队护送。

(6) 支付与发运军事器材(修理、包装、装卸、护送和运输)有关的费用，但要求补充拨给经费来补偿。

(7) 冯玉祥所要的军刀1000把和矛500支现发货。

无偿。我们预定发运：给广州：9000支步枪（已在途中）、950万发子弹、1万枚手榴弹、100挺带子弹带、弹盒和小型机器的机枪、10支1000发的掷弹炮。

给冯玉祥：4000支步枪和400万发子弹（已在途中）。预定从上乌丁斯克向张家口运送步枪9000支、子弹900万发。在适当情况下我们可以拨出带炮弹的炮12门、带子弹、子弹带等的机枪40挺。准备给冯玉祥运去1000部机器^①和5000支矛。

4. 运输公司。

鉴于军事部门没有储备军刀，建议伏龙芝同志向兹拉托乌斯托夫斯克工厂订货，从该厂扣除给冯玉祥的军刀。

(8) 由于大功率无线电台太昂贵(53.9万卢布)，拒绝向冯玉祥发货。

(9) 鉴于不可能拨出现有制弹机床，责成梅利尼科夫同志弄清楚从格旦斯克购买机床的问题，那里有货供应。

(10) 认为拨给冯玉祥2—3辆小型坦克是合适的。

(11) 按拨给国民党将领和广州的军事器材价值金额，在本预算年度中恢复给军事部门的贷款。

4. 鉴于拨出10万卢布组建混合运输公司来为库伦—张家口路段服务，责成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弄清楚实际组建方式，并同有关机构协商后作出拨款10万卢布的安排。

^① 根据意思是指军刀。

5. 契切林同志说，加拉罕同志从原沙皇驻北京代表处获得 20 万卢布。

6. 关于专门委员会。

5. 从原沙皇代表处得到的 20 万卢布款项列入用于中国工作的总预算。

6. 为了系统编制中国军政工作的开支预算，由隆格瓦、德本科和里德曼三同志组成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要准确确定为维持我们在中国的军政工作人员的生活，资助北方的军校，支付修理、包装、装卸、护送、运输军事器材的费用，为已发送的军事器材恢复贷款等所必需的款项，以及为指挥机关的决议没有预见到的额外开支追加的经费数额。

原件签字：主席（伏龙芝）

秘书（隆格瓦）

《俄罗斯军事档案》莫斯科 1993 年第 1 期第 313—315 页。

15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中国委员会会议第3号记录

1925年6月5日于莫斯科

中国委员会会议第3号记录

出席：伏龙芝、契切林、索柯里尼柯夫、温施利赫特、隆格瓦同志。

主持：伏龙芝同志。

秘书：隆格瓦同志。

听取：

决定：

1. 1925年4月1日至10月1日军政工作开支预算案。

1. (1) 到1925年10月1日中国军政工作开支预算确定为：765734卢布(柒拾陆萬伍仟柒佰叁拾肆卢布)和231226美元(貳拾叁萬壹仟貳佰貳拾陆美元)——换算成苏联货币1196019卢布54戈比(壹佰壹拾玖萬陆仟零壹拾玖卢布伍拾肆戈比)。

该预算的各个项目为：

派遣人员的费用—105826 卢布和
14550 美元。

国外工作人员的生活费用—118170
卢布。

业务开支—32000 卢布。

秘密开支—30000 卢布。

资助中国两所军校—21180 卢布。

莫斯科训练班的费用—24000 卢
布。

文献和电影胶卷费用—7800 卢布。

邮电开支—2400 卢布。

组建新部队的经费—250000 卢布。

为组建部队运送器材的费用—
27000 卢布。

运输公司费用—100000 卢布。

没有预见到的开支—20000 美元。

(2) 除上述(1)条的预算外,在
两个月内另给加伦^①拨款 10 万卢布资
助黄埔军校和一个老的师团。同时要求
送上维持学校的详细开支预算。

(3) 指示北京和加伦,我们资助的
45 万卢布只用于组建部队的开支。师团
建成以后的费用应当完全由中国人承
担。

^① 即 B·K·布留赫尔。

(4) 在本预算年度按所提供的相当于转交的军事器材的重购价值即金额为3044076卢布20戈比的物资预算恢复给军事部门的贷款。

(5) 根据所提供的运输预算承担270039卢布的运输费用并发放贷款。

(6) 到1925年10月1日止的总支出为4179849卢布20戈比(肆佰壹拾柒萬玖仟捌佰肆拾玖卢布贰拾戈比)和281226美元(贰拾捌萬壹仟贰佰贰拾陆美元), 三项预算换算成苏联货币为4610134卢布74戈比(肆佰陆拾壹萬零壹佰叁拾肆卢布柒拾肆戈比)。

2. 关于组建国际部队。

2. (1) 接受伏龙芝同志关于在蒙古境内组建国际部队以便支援冯玉祥的建议。

该部队总的构成：一个骑兵团，包括四个马刀队、一个机枪骑兵连、一个马力牵引炮排和一支由三辆装甲汽车组成的队伍。

为该部队提供汽车。马匹从蒙古购买。部队组建期限——2—3个月。

在北高加索军区和从解散的游击队以及红军的志愿人员中为该部队招募人员。

(2) 该部队作为中国军队的组成部分存在和活动。

(3) 该部队的组建及其军事器材和马匹的供给由我们负担费用。

从建成的时刻起，部队应转为由冯玉祥负担费用。

(4) 靠远东革命委员会现有的鸦片基金组建部队。委托远东局兑现基金，伏龙芝同志同远东局商定基金兑现的程序和形式。

(5) 组建该部队的费用为 150 万卢布。

立即预支 25 万卢布交伏龙芝同志支配。

由伏龙芝同志同索柯里尼柯夫协商进一步拨给必要的款项。

3. 伏龙芝同志关于批准委员会决议的建议。 3. 将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提交指挥机关核准。

原件签名：主席（伏龙芝）

秘书（隆格瓦）

154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6号记录 (摘录)

1925年6月11日于莫斯科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66号(特字第49号)记录

听取：

20. 一伏龙芝同志的报告。

决定：20. 一接受中国委员会的建议(见附录)。

抄送：伏龙芝同志；索柯里尼柯夫同志。

1925年6月11日征询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听取：29. 一关于中国问题(1925年6月4日政治局会议第65号记录，决定：41)。

决定：29. 一(1)从苏联人民委员会储备基金中拨款5万卢布交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处理(立即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名义电汇上海)。

(2)在集会上通过关于开始为中国工人募捐的决议。

(3)由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采取措施，活跃“不许干涉中国”的社会活动。

抄送：

戈尔布诺夫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括号内的文字不抄)

送)；

托姆斯基同志——全部；

乌格拉诺夫同志——(2)、(3)；

瑟尔佐夫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附录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5年6月11日核准]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建议

1. 为执行政治局今年第52、62、64号指示，中国委员会在今年5月29日和6月5日的两次会议^①上决定：

(1) 到1925年10月1日止拨款719019卢布54戈比用作军政人员的生活费用、学校经费和秘密开支。

(2) 到1925年10月1日止拨款477000卢布用于在广州组建两个新的师团和为其运送武器。

(3) 一次性拨款10万卢布用于组建混合运输公司，为库伦—张家口路段服务。

(4) 到1925年10月1日止拨款270039卢布用于运送给国民党将领的器材。

(5) 按相当于转交给国民党将领的军事器材的重购价值，即总额3044076卢布20戈比，恢复给军事部门的贷款。

(6) 到1925年10月1日止总的开支额确定为4610134卢布74戈比。

^① 参见第152、153号文件。

(7) 除上述支出外,为派遣外交信使每月去北京两次,根据有关条款每月给外交人民委员部增加预算 2600 卢布。

(8) 凭票据赊销给国民党将领和广州的军事器材两年后付款。

2. 鉴于加拉罕同志新的申请^①,认为除已经拨给的之外,还可以向国民党将领补充提供带子弹的步枪 5000 支、带炮弹的炮 12 门、带子弹和附属用具的机枪 50 挺和技术器材若干。

按相当于上述器材的重购价值恢复给军事部门的贷款。
为运送上述器材补充拨出贷款。

核对无误

全宗 17, 目录 162, 卷宗 2, 第 124—128 页。

打字稿,记录为原件,斯大林的签字为真迹复制,附录是经过核对的副本,签字字迹不清。

^① 加拉罕的申请没有找到。

155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7号记录 (摘 录)

1925年6月18日于莫斯科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67号(特字第50号)记录

1925年6月13日 [电话征询]

听取：18. 一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18. 一除1925年6月11日决定拨给的(立即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名义电汇上海的)款项以外，从苏联人民委员会储备基金中补充拨款5万卢布交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处理。

抄送：

托姆斯基同志——全部；

戈尔布诺夫同志——括号内的文字不抄送；

斯莫利亚尼诺夫同志——括号内的文字不抄送。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2，第129—130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56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8号记录 (摘 录)

1925年6月25日于莫斯科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68号(特字第51号)记录

1925年6月22日征询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听取：17. 一加拉罕同志的电报^①。

决定：17. 一接受加拉罕同志关于立即派遣维经斯基同志去中国的建议。

抄送：

契切林同志；维经斯基同志；哈塔耶维奇同志；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1925年6月25日

听取：23. 一关于中国问题。

(报告人斯大林同志)

决定：23. 一(1) 务必推进以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而特别是铁路总罢工的形式进行的革命运动，不要害怕危机加剧；

(2) 一定要防止发生杀害和殴打外国人事件，防止出现诸如悬挂“英国人、日本人和狗不得进入中国公共场所”标语之类的

^① 加拉罕的电报没有找到。

粗野民族主义举动，尤其不要搞大洗劫行动，要公开警告工人、小店主和知识分子，不要给外国人中的挑衅分子提供说运动具有义和团性质^①的口实，以使帝国主义者不便进行尖锐的武装干涉；这种警告首先应由中国共产党提出；

(3) 发动声势浩大的反对张作霖的宣传攻势，千方百计地分化瓦解他的军队并使之革命化，要知道，张作霖是帝国主义者手中的主要工具；

(4) 采取措施，使现时的中国政府对运动保持善意的中立态度，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让政府分裂和瘫痪，以使帝国主义者无法用中国政府来掩盖其反革命行径；

(5) 倘若上一点所述措施不能成功，那就依靠冯玉祥军队和国民党军队驱散现政府，成立有国民党人参加的新政府；

(6) 再次提醒有必要全面地有组织地巩固和建立基层组织和据点；

(7) 建议加拉罕同志作出自己的结论，提出中国政府建议苏联政府在中国政府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进行调解的口号是否合适；

(8) 建议俄共中央委员和其他负责同志在口头上和在报刊上发表言论时一定不要夸耀共产国际执委会、苏联和俄共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

(9) 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和俄国在华一般工作人员都应非常谨慎地行事。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用密码）。

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人民委员：斯克沃

^① 指 1899 至 1901 年义和团起义期间反对外国人的行动。

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多列茨基、乌里扬诺娃——8。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2，第 134、138—140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57

瓦西里耶夫给中共中央的信

1925 年 7 月 21 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认为有必要单独写一封信同你们谈谈我们对组织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看法。

现在运动的减弱必然孕育着在将来同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的更顽强的武装斗争，因此，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武装力量方面要有特别认真的态度和坚持不懈地做工作。当革命运动高涨，吸引越来越多的群众时，当这些群众走上街头，以未经官方许可的方式争取实现自己的要求时，组织革命武装力量的任务就大大简单化了。革命组织选出动员的中心，动员的中心再进行挑选，随后组成志愿队伍。战斗队夺取武器库，将武器分配给重新组建的队伍，而当情况不允许进行这种有组织的分配时，那就将武器就地在最可靠的群众组织成员中间和在更坚定地支持革命事业的企业工人中间分发。应当避免把武器交给不期而遇的人，以防这些武器在以后被用来反对人民。最好是把它

们交给无产阶级组织。如果事情发生在农村，那就应当武装贫农和雇农，首先还是要武装革命组织的成员。

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在较为困难的（半公开或完全秘密的）条件下开展武装民族解放运动的工作。党应当表现出最大限度的谨慎和耐心，同时有条不紊地坚持做工作，不在巨大困难、不可避免的失败等情况面前止步。其他国家的有关实践表明，在这一工作中，党必须考虑到下列情况：

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可以吸收学生、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参加。中国共产党通常应避免组织单独的学生武装部队。

应当估计到，在各个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内部常常发生社会分化，某些学生队伍转到街垒的另一边。一定要让学生武装小队和一些学生志愿者加入工人部队和工人纠察队，以使他们在那里是绝对的少数。

工人部队是革命军队最可靠的核心，是它的基本干部来源，革命军队的军政干部都将从工人队伍中选拔。最好按企业组织工人部队，以便使每个企业都拥有独立完整的战斗单位。在城区和市内，应当把部队联合成更大的由秘密信号、动员计划等联系起来的战斗单位。

工人纠察队和工人部队应当设在怎样的组织内呢？应当设在所有可靠的民族革命组织内。这些组织的可靠程度应当由党（相应的党委）对它们的影响的大小来决定。极其重要的是，要使每支部队都有坚强的共产党核心。部队的指挥人员应当从特别可靠的人中，当然最好是从共产党员中挑选，或者从承认（由相应的党委所代表的）党的威信的非党人员中挑选。组建非党的工人部队的这些原则——在不可能以另一种样子建立的情况下——在基层单位也可以作一些让步和松动，但在建立所有较大的军事联合单位（大区和整个城市的部队，尤其是几个城市、村镇等的联队）时，毫无疑问应当遵守这些原则。

至于由共产党员组成的隶属党委的部队，则不应推荐这种做法，以免削弱共产党在非党部队中的影响。为了完成某些特殊任务，(不小于市或大的独立区的)党委可以组建由特别可靠的、熟悉秘密工作的同志组成的小型纠察队。

中国共产党应当特别重视农民的军事组织。中国革命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中国农民在当前的武装搏斗中站在哪一边。欧洲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的一切努力都旨在保持自己对农民群众和首先对作为他们队伍中的士兵的农民的影响。另一方面，建立农民革命军，为广大农村劳动群众所欢迎和理解的要求而斗争，将是革命农民同中国军阀作斗争的最可靠的手段，这不仅是因为这样的军队将成为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而且还因为军阀将领的军队基本上也是农民部队，不会去反对农民革命军，相反这些部队将同它结为友军，并转入它的队伍。

中国共产党应当尽可能广泛地利用广东农民代表大会^①关于通过组建隶属农民协会地方委员会的武装部队的途径建立农民军的决议。建立这样的军队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在组织革命武装力量方面的最重要的任务。在组建农民军部队时，比组建工人部队更需要考虑到，这些部队将处于非党农民组织的管辖下，因此，在千方百计促进这类部队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时，必须：(1) 非常慎重地对待每一支部队的组建，只能在那些可以**确保党的强有力影响**，并让完全可靠的领导**统帅部队**的农民协会地方委员会组建这样的部队；(2) 从其技术准备、政治坚定性、党的影响角度经常仔细地检查每支部队的活动。不能满足这些要求中的任何一条者必须紧急改编。部队的政治方向特别重要，它们应当无条件地坚决服从农民协会的相应委员会(党在这些委员会的工作中要有决定性影响)。同时，再重复一遍，应当千方百计争取使党的领导

^① 指 1925 年 5 月 1 日在广州举行的广东省第一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

机构同农民部队的指挥和政工人员建立密切的个人联系。部队的内部组织、其动员、训练和作战计划应当由党委仔细研究制定。

部队自然不可能是很臃肿的。每支部队的人数及其内部组织应当适合于现有武器的数量和准确估计的秘密工作条件。每支部队应当是尽可能完备的战斗单位（有起码的辎重、卫生服务部门等）。同时，每支部队都应当拥有可以用于补充和扩大部队的预备队。为达到这些目的，运用俄国农民游击战的经验是非常有益的。每一个有自己部队的村镇（和可以充实这些部队的邻近村镇），除了完全不依附于它的部队指挥部以外，还需要组建隶属协会委员会的动员管理机构，负责登记所有能参加部队的公民。这些管理机构应当组建由这样一些公民组成的民警辅助队，这些公民不适合行军生活，但在武器装备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一旦部队进行动员时，他们能够维持乡村的内部秩序。

部队应当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军事训练。同时应当特别介绍邻村部队的军事训练情况，这种训练除了能日益增强掌握武器的信心以外，还能使友邻部队相互了解，学会协调联合行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内部隔绝的国家来说，这后一种情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组织农民军最困难的问题是将地方部队联合成较大的军事单位。主要障碍是警察条件。在任何情况下，考虑到警察条件时，无论如何都应当安排军队指挥和政工人员的定期会议，以便交流经验、分析研究下一阶段的工作等。应当拟定（当然是非常秘密地）动员计划，其中包括组建大单位和任命高级指挥和政工人员的方案。

在所有情况下，每支部队都一定要与邻村部队规定联络暗号。邻近城市的村镇的部队应同某些工人部队或同区的和全市的工人纠察队司令部保持联系。

除了组建隶属农民协会委员会的独立武装部队外，中国共产

党还应当把在中国军阀部队中以及人民军^①中组建农民协会基层组织(所有党员和共青团员一定要加入)作为自己的任务,这种组织应当起政治粘合剂的作用,而在军阀的部队中则应是分化瓦解的因素,用各种办法瓦解中国人民的敌人的军事意图。

最后,在组织民族解放运动武装力量时,不要忘记好好组织侦察工作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应当把组织民族解放运动武装力量的全部工作与共青团紧密联系起来。

瓦西里耶夫^②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121, 第 45—50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158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中国委员会会议第 4 号记录

1925 年 7 月 28 日于莫斯科

中国委员会会议第 4 号记录

出席: 伏龙芝、莫洛托夫、契切林、温施利赫特、亚戈达、彼

^① 指中国北方冯玉祥指挥的国民军(在苏联 20 年代的文献中称人民军)。

^② 瓦·А·瓦西里耶夫在 1925 至 1926 年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政治书记, 自 1926 年起任东方部副主任——译者。

得罗夫、梅利尼科夫、隆格瓦同志。

听取：1. ——关于政治形势的通报。隆格瓦、彼得罗夫、契切林同志通报。参加讨论：莫洛托夫、伏龙芝、契切林、彼得罗夫、梅利尼科夫同志。

决定：1. ——认为无论如何要把罢工斗争^①与召开中国社会团体全国会议联系在一起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只有在近期即8月初召开全国会议的情况下，才能把罢工拖延到会议召开前结束。

注意到根据来自中国的报告以及共产国际的意见，运动正在走向低潮，必须采取措施，保证有组织地脱离罢工斗争，最大限度地巩固业已取得的成果。要提出据以可能更有利地结束罢工的具体要求。

把结束罢工同准备进一步的斗争联系起来。

在其他问题上，以前的指示仍然有效。

听取：2. ——组建部队。

决定：2. ——对于由白卫分子组成的部队，必须弄清可以用来组建部队的人员。

关于红色部队的问题眼下仍不作决定，将来不放弃加以实现。

为了详细研究组织地下军事部队的总计划，成立由彼得罗夫、特里利谢尔、别尔津、韦诺夫、隆格瓦等同志组成的专门委员会。

委员会会议由隆格瓦同志召集。

认为在延吉^②组织广泛的朝鲜游击运动在政治上是不合时宜的。只限于向那里派遣一些最可靠的工作人员。

听取：3. ——关于中国和朝鲜训练班。

报告人彼得罗夫和隆格瓦同志。

① 指1925年5月30日国际租界警察向游行队伍开枪后于1925年6月1日爆发的上海反帝总罢工。

② 满洲朝鲜人聚居区。

决定：3. ——让中国学员在8月1日前毕业。

从共产国际预算中给每人发放限额为100卢布的制装费。

从8月1日起从最可靠的同志中接收30名朝鲜人进训练班。

由隆格瓦和彼得罗夫同志商定训练班的大纲和拨款。

听取：4. ——关于隆格瓦同志的预算。

决定：4. ——同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协商补充拨给的器材及其交付费用的预算方案。如果没有异议就算批准。

听取：5. ——关于混合运输公司的问题。

决定：5. ——责成契切林同志彻底弄清问题并关照汇款10万卢布。

听取：6. ——关于在莫斯科的中国阴谋问题。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撤销该问题。

听取：7. ——关于让亚戈达和伏龙芝同志参加委员会的问题。

决定：通过。

主席 伏龙芝

秘书 隆格瓦

《俄罗斯军事档案》莫斯科1993年第1期第317—318页。

159

维经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

1925年8月4日于北京

亲爱的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①：

从北京给您写信，我昨天来到这里，要同列夫·米哈伊洛维奇^②一起制订上海和香港以后的罢工策略^③。动身前一天，我收到中国委员会从莫斯科发来的一份电报，提出了根据工会的倡议适时停止罢工，以便有秩序地撤退以保存组织的总体意见^④。从我抵达这里时起，我们不止一次地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每次我们都不想采取这个方针，因为目前的运动一旦得到中国其他城市的响应，其前景确实很可观，所以想把上海的罢工运动尽可能地拖下去，以期出现进一步扩大和高涨的局面。从我发给我们莫斯科机关的电报中^⑤，您可以看出，我们正是所谓全力以赴地要把北方发动起来。但是收到的效果比我们预计的要差得多。中国是个大国，工人中心不多，彼此相距很远，交通联系相当差。这当然是上海和后来香港为什么没有得到及时支援的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力量薄弱。整个党和它的部分组织没有打算对上海爆发的运动的意义迅速作出评价，同样也没有准备做群众性

① 即 Ф·Ф·拉斯科尔尼科夫——译者。

② 即加拉罕。

③ 指1925年夏的上海、香港和广州的反帝罢工。

④ 见第158号文件。

⑤ 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没有找到。

的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当然我们的同志在这个时期很快进行了学习，但是他们在这么短的期限内还是没有来得及提高到能够控制和领导这次大规模自发运动并在斗争过程中把它组织起来的高度。总的来说，在这种场合下往往是这样：党由宣传小组状态转入做群众性工作时，它的种种不足总是非常突出地表现出来。只是现在，党的主要不足表现得如此明显，不仅中央委员和积极分子已经看到，而且多少搞清了策略、组织和宣传方面问题的同志也已经看到。但是纠正这些不足是以后的事。现在党虽然受到事态发展进程的推动，然而仍在按照老的办法工作，同时它也在探索新的工作方式。但是我们党在领导运动方面，特别是在对群众进行宣传鼓动方面的最主要障碍是其人数不多。现在，据中央委员们说，我们党共有 2500 人，比半年前增加了 1.5 倍，比上海总罢工爆发前增加了 0.5 倍。可是党员分散在许多省，仅在上海和广州集中了较多的党员，有 500—700 人，这个数字当然比所需要的数字少得多，即使到上海和省港罢工工人中间做工作也是很不够的。

关于党和关于负责党员在上海和香港运动中的工作的更详细情况，明天去莫斯科的格列尔同志会^①对您讲。

今天我们制订了一个行动纲领，根据这个纲领我们将对上海和香港的罢工运动“刹车”。基本意思是工人继续罢工，不用全国性口号，而用经济性和地方民族性口号。在我们今天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您可以看到具体要求是什么^②。在制订这个行动纲领和拟订贯彻这个纲领的办法以后，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主要困难将是实际贯彻执行。我们在这里拥有群众，他们第一次以这样的数量和在这样的条件下出动。至于说领袖，他们虽然也是共产党员，但都是第一次开始取得群众工作的经验，而主要是第一次不得不

① Л. Н. 格列尔，时任红色工会国际东方部主任——译者。

② 电报没有找到。

认真调动大量群众来对付强大而老练的敌人。

具体地说，我们是这样设想以后的策略的。先提出经济要求和地方民族性要求，为同外国企业主的交涉打下基础，然后，我们声明，工人不得不退让的主要原因，是张作霖实行反民族的反动政策，他为完成帝国主义者交给的任务，对民族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采取镇压手段。工人们宣布自己的最低要求，一旦得到满足他们就返回工作岗位，同时通过工会理事会宣布，他们将支持北方政府，因为它将继续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为满足争取独立的联合委员会^①提出的其他要求而斗争。工人们将要求政府为更顺利地建立民族战线同南方国民党政府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者斗争，因为上海和香港的罢工斗争只有在南北政府共同采取行动的情况下才会以有利于民族运动的结果而告结束。总的说来，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也就是在不受张作霖影响的军政集团联合的问题上，迄今为止罢工斗争已起了很大作用，将来还能起这种作用。

如果我们能够捍卫现在在上海等城市中存在的工会组织，那么就不能怀疑在下一次军阀角逐时，我们能在解放斗争事业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召开全国国民会议的口号和反击帝国主义者的全民武装口号，自然还是现在的宣传鼓动口号。

我现在不得不结束这封信，因为去上海的火车快开了。我来到这里总共只有一天半时间。现在一天也不能离开上海。下一封信我将写得更详细些。

我们确定8月25日在北京举行共产党中央扩大全会^②，而9月15日将在广州举行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③。

① 指1925年6月7日在上海成立的工人、商人和学生联合委员会，这是当地的反帝统一战线机构。

② 指1925年9月28日至10月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四届二中全会。

③ 指1926年1月1日至19日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祝万事如意!

您的维经斯基

全宗 495, 目录 154, 卷宗 294, 第 71 页。
手稿。

16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中国委员会会议第 5 号记录

1925 年 8 月 5—7 日于莫斯科

中国委员会会议第 5 号记录

通过电话对建议进行表决。

听取：彼得罗夫同志的建议。

关于由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为中国罢工者拨款 10 万卢布。

莫洛托夫——有保留地支持；伏龙芝和契切林同志应当商议以何种方式汇款。

决定：建议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紧急汇款 10 万卢布交由上海、香港和中国其他城市的罢工者支配。

委员会秘书 (隆格瓦)

16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5号记录 (摘 录)

1925年8月13日于莫斯科

出席：

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洛托夫、鲁祖塔克、伏龙芝同志。

俄共中央委员：安德烈耶夫、多加多夫、克维林、拉舍维奇、施瓦茨同志。

中央候补委员：瓦列伊基斯和戈洛谢金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丘茨卡耶夫、什基里亚托夫、扬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契切林同志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契切林和托洛茨基同志）。

决定：[1] ——决议——特别文件。

听取：[6] ——关于中国劳动者大学问题。（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6] ——（1）责成组织局再次研究中国劳动者大学的组织形式问题，注意不宜让它公开具有国立性质（如隶属苏联教育人民委员部）。

（2）批准拉狄克同志为中国劳动者大学校长。

俄共中央书记 莫洛托夫

全宗 17, 目录 3, 卷宗 515, 第 2—3、8 页。

铅印稿, 签字为真迹复制。

162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75 号记录 (摘 录)

1925 年 8 月 13 日于莫斯科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75 号(特字第 58 号)记录

听取: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

[1]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契切林和托洛茨基同志)。

决定: [1] —— (1) 问题暂不解决。

(2) 责成中国委员会对现有一切材料作出综合报告, 必要时同莫洛托夫同志协商后可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

(3) 鉴于用于组建部队的资金减少, 使组建工作无法进行, 责成中国委员会全面研究这个问题。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

伏龙芝同志——全部;

莫洛托夫同志——全部。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 目录 162, 卷宗 2, 第 166、168 页。

打字稿, 原件, 签字为真迹复制。

16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中国委员会会议第 6 号记录

1925 年 8 月 18 日于莫斯科

中国委员会会议第 6 号记录

通过电话征询伏龙芝、莫洛托夫、契切林、温施利赫特、亚戈达和彼得罗夫同志的意见。

听取：有三人签名的建议^①。

决定：不反对提出的计划，它基本上是按 006 号指示^②中的建议拟定的。不发详细指示，因为这在当地看得更清楚。对岳维峻要认真加以研究。给工农红军司令部侦察局下达指示。

委员会秘书 (隆格瓦)

《俄罗斯军事档案》莫斯科 1993 年第 1 期第 3 页。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指示没有找到。

164

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

1925年8月19日于上海

亲爱的同志们：

在发生了10个星期的上海反帝工人运动^①、7个星期的广州、香港运动和汉口、南京、青岛、天津等地的一系列突发事件之后，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国的人民运动正方兴未艾，在不久的将来必然进一步扩大和深入。

如果说在运动一开始，只知道它的倡导者是大港口城市的产业工人，而学生和人数众多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只是无产阶级的中介和助手，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工人群众争取独立的斗争具有全国的性质，那么现在则越来越显露出工人群众和工人运动作为国内独立社会政治力量的日益集中、形成和从组织上巩固下来的发展趋势。

但是，中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军阀的民族斗争中的联盟，第一次不仅具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且具有组织上的联盟的形式（联合委员会）。几个月前实际上已经表明，这种联盟能为解放运动带来什么，其中隐含着哪些不可克服的矛盾，而现在这种联盟已开始成为今后反帝斗争策略中的一个越来越复杂的问题。

^① 指1925年上海五卅反帝运动。

在转到中国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在近期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之前，有必要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自有名的上海事件以来所走过的道路。

您知道，上海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运动的中心，两周前，我们在这里不得不把带有民族政治斗争性质的总罢工从提出全国性要求的高度降到主要提出经济要求，从而通过这种做法创造同外国企业主开始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和缩小罢工规模，同时也使这次罢工的前途变得更加明确。

迫使我们采取这一步骤的原因，我在前一封信中已经说了^①。现在更清楚，没有别的出路，因为北方工人发动得很晚，上海不可能坚持很久来同天津、青岛、南京等城市联合行动。另一方面，两周前我们在上海提出的经济要求，不仅更加振奋了罢工工人的情绪，而且开始在上海等地引起一些新的经济罢工。我们觉得是找到了摆脱暂时出现的死胡同的正确出路，这条死胡同可能会给目前发展阶段带来危险的后果。毫无疑问，对于广州来说，上海的罢工斗争以经济要求为基础的继续进行，也会缓解局势。帝国主义者正确地把省港罢工和（广州）沙面罢工同上海总罢工直接联系起来看待，现在他们不能说，工人运动会马上导致同外国人的武装斗争。了解了外国企业（特别是英国企业）在中国蒙受了多么巨大的损失，就会认为，即使在香港，英国帝国主义者也会寻求同工人进行谈判的基础。

由于上海提出了经济上、法律上和部分民族方面的要求，英日帝国主义者之间在对待罢工问题上的矛盾越来越多地暴露了出来。日本企业主现在同意承认工会，同意三个月后提高工资（暂时由中国政府支付）和补偿罢工工人罢工期间的三分之一工资。而英国企业主不能这样迅速表示同意，因为关于混合法庭和市政厅

^① 见第159号文件。

的问题主要触及英国人的利益^①。我们当然不会为这些要求继续进行罢工，但把这些要求列为我们的最低要求，为的是同中国资产阶级建立联系，也是为了打破英日企业主战线。

通过把罢工开始时提出的全国性要求（为上海枪杀事件提供赔偿，废除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等）转移到成立北南政府联合委员会上，我们还在争取政府机构和那些能够在这种条件下同民族运动一起前进的中国政治团体的联合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忽视我们在上海采取的工人同资产阶级在全国运动中结成联盟的策略所造成的消极后果，那是很大的错误。罢工越是带有经济性质，资产阶级对民族斗争自然越是冷淡。应该知道，上海的总罢工和其他地方的部分罢工有9/10的经费是靠资产阶级提供的。不过，资产阶级脱离过程很复杂，由于民族企业主与外国企业主之间存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也由于现在的经济罢工还不能不带有民族斗争的因素，所以不能认为这种脱离是最终的脱离，或者会立即对下一阶段解放斗争具有决定性意义。

我们同上海商会和街道小资产阶级同业工会打交道的经验表明，中国工商资产阶级的正派人物，为了参加全国解放运动战线，还是很革命的。

需要把中国工人阶级今后斗争的前途以及整个民族运动的前途，同国内日益发展和临近的民族军事力量与反民族军事力量之间的冲突直接联系起来。前一阶段的解放运动越来越说明民族能量的进一步迸发只能是这种冲突的产物。如果说，去年反对直隶集团和战胜直隶集团，在一年之后引发了现在的事件，那么可以认为，反对奉天人并战胜他们，确实会引发全民族的高涨形势，直

^① 在上海工人、商人和学生联合委员会1925年6月7日提出的要求中，规定将中外混合法庭交给中国人，并对上海国际租界市政厅的其他权力和特权作出实质性限制。

接导致国家统一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建立。

我们今后的整个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策略应该来自于这种前景。所以我们在此认为，在继续提出全国国民会议、人民军队等口号作为宣传鼓动和动员口号的同时，我们现在还是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把工会和一切工人组织集中起来并从组织上加以固定的工作上，而不是放在联合委员会及其代表大会上^①。我们现在主要和首先从事的工作是在华中华北扩大罢工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必将出现越来越多的工会组织。我们今天的口号是把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组织起来。在上海，现在我们在从事工人组织的成立和巩固工作，这里的主要劳动部门在罢工过程中都组织起来了。现在按生产特点组织工会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争取做到：第一，使基层工会的管理委员会（实际上是罢工委员会）变成工厂委员会；第二，使工会理事会成为上海无产阶级更集中的战斗的执行机关。此外，现在必须为工会和工会理事会准备地下机构，以防奉天人在上海和其他城市的政治反应加强。现在我们也在着手组织工人武装自卫队。

我们还给自己提出了一项直接任务：立即通过派出教官和组织者的办法把上海的经验传播到其他大城市。当然，我们在各工会管理委员会、工会联合会管理委员会和工会理事会执行委员会中都设有共产党党团，并注意日益加强他们的影响和领导作用。

在党的工作方面，现在我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依靠革命工人扩大党的队伍上。早些时候在这里，对于知识分子对现阶段工人运动的作用和意义有一种不正确的看法，很不愿意让革命知识分子入党。现在党在纠正这个错误。当然对共青团来说也是这样。最近一个月，我们希望上海和北方几个地方的党员数量能增加一倍。在广州，党的工作传统上就薄弱，现在也薄弱。那里是一切为了

^① 指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工人、商人和学生联合委员会。委员会代表大会没有举行。

国民党,当然不是在狭义上为了国民党,而是到工农中做工作。本可以成立的共产主义组织,我们还没有成立。而这里蕴含着很大的危险性,如果考虑到今天的全国工人运动高涨形势过去之后,国共两党关系有可能采取与迄今为止不同的形式,那就更是这样。国共两党关系如何将主要取决于我们在工业无产阶级中的组织巩固程度,现在已向广州委员会下达了立即着手在广东省做党建工作的相应指示。

在华中华南一些省份,或更确切地说,在这些省的一些县,我们同正在兴起的反对掮客、地主以及地方官吏的农民运动建立了联系。在广东省我们的同志在14个县组建了农民协会。设在广州的省农民协会理事会还在陈炯明地区的农民中间做了工作。在湖南省,我们在4个县建立了协会。在湖北省也在4个县建立了协会。在其他地方也有联系。中央现在成立了一个为农民的要求起草纲领的委员会,这个纲领将在一本通俗小册子中加以阐明,并在农民当中散发^①。

针对近两个月来带有罢课性质的学生运动,我们决定让学生在学期开始前夕返回学校,为高校自治和外国学校转由中国管理进行斗争^②。还要在大学自治的口号下,要求给予工人听众在大学里集会和听课的权利。

维经斯基

全宗 495, 目录 154, 卷宗 249, 第 72—74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中共中央在农民问题上的立场在中共四届二中全会(1925年8月28日至9月2日)通过的《给农民的一封信》中作了说明(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509—517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学生运动的决议没有找到。

165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关于 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草案

早于 1925 年 8 月 21 日^① 于莫斯科

组建中国革命武装力量

现在国民革命运动的某种减弱孕育着将来同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革命军阀的更加激烈的武装斗争，因此，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中国革命武装力量和使人民群众作好战斗准备方面要十分细心地对待和坚持不懈地做工作。

首先，这里应当排除任何原始工作方式和自作主张的习气。中央委员会和大的地方委员会应当组建以这些委员会执行机构中最有威望的成员为首的特别**军事部**。军事部的工作应当在党的经常不断的和非常警惕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委员会应当把**军事部**的任何摆脱其监督的倾向哪怕在很小程度上的这种倾向制止在萌芽之中。

军事部的工作，无论是对外部世界还是在党内和军事部机关内，都应当坚持极严格的秘密活动原则。党委军事部的工作应当分为两个重要部分：积蓄、组织自己力量的工作和分化、利用敌对力量的工作。

^① 日期是根据第 166 号文件注明的。

积蓄自己力量的工作

近期应当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组建国民党军队和人民军部队上。应当把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那些社会阶层的全部注意力吸引到组建这些军队的问题上来。应当为加强这些组织并使之民主化，显示其明确的政治路线开展最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和大量的组织工作。

考虑到国民党的社会和政治性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应当（坚定地、但又必须非常谨慎地）争取做到，使共产党（中央、地区、省和地方的）军事部的领导人一定成为相应的国民党军事部的首脑，只有在因局势不可能这样做的情况下才把不是来自军事部工作人员中的可靠共产党员或者在政治上经受过特别严峻的考验并在国民党左派的工作中同我们有联系的人推荐为国民党军事部的首脑。

为了秘密工作和避免同国民党不必要的摩擦，共产党的所有军事工作人员在形式上一般都应按国民党的组织系统调动（在个别情况下隐瞒自己的共产党身份）。共产党军事部的工作同国民党有关部的协调应当通过国民党军事部机关党的工作人员来实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般军事工作问题的协调一般应当通过两党的日常联系和相互关系进行。

在革命党^①内部必须广泛运用俄国的全部经验，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做巩固工作。在中国的条件下，我党必然不可能像在苏联那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政治工作。最好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基本上像我们红军所做的那样在中国革命军队中进行政治工作，小心谨慎地但又坚定不移地争取使实际领导权一定掌握在我们党的手

① 原文如此。应该是军队。

里。

为了确保我们党在军队中的强大影响，应当在国民党的基层军事单位内建立我们的党支部，支部应当作为国民党的党团进行活动（而且通常应该秘密地进行工作）。

政治委员和其他共产党员以及共产党员政工人员，除了保持自己按国民党政治部和军事部系统的正式军事联系外，还应同我们党的有关委员会的军事部保持密切联系。

我们党在从事组建革命军队工作的同时，决不应该忽视建立游击队和战斗队的工作。

在这方面应当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根据广东农民代表大会^①决议）组建隶属于地方农民协会委员会的武装队伍上。这些队伍如果得到武器供应，组织良好、彼此联系在一起，需要时就可以迅速发展成为威严的起义军。在这样的队伍中，最好不要以国民党的名义，而是以农民协会的名义设立政治组织（政治委员、政工人员、支部等）。

农民协会的军事部应当像国民党的军事部一样在组织上同我们的军事部联系起来。

应当非常仔细地注意使农民协会部队无条件地从属于相应的农民组织。任何摆脱这种从属关系的企图都应当从根本上坚决加以制止。

至于城市中的部队和战斗队，应当对它们作出下列重要指示：第一，一定要把工人核心作为每支纠察队和部队的基础。无论如何不应组建单独由学生、大学生等组成的队伍。城市战斗队应按**企业组建或附属于工会**。同时应当选择能确保党的强有力影响的非党无产阶级组织。党的委员会可以只组建一些由久经考验的同志组成的小部队，使这些部队成员同时加入其他非党部队。对待

^① 指 1925 年 5 月广东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城市部队，也像对待农民部队一样，应当非常细心，务必使它们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相应组织的从属关系，使相应的党委能确保对拥有战斗部队的组织实行特别认真的精心的领导。

应当很好记住各国纠察队和部队的经验，在各个国家，“战斗队伍”哪怕稍许摆脱党委的直接有力领导，它们就会很快堕落成为无政府匪帮。

党的委员会应当特别细心地对待国民党、工会、工厂等非共产党组织，在组建隶属于这类组织的部队时争取使这些部队的直接领导权掌握在我们的负责工作人员或党的军事部的工作人员手里。

近来可以看到国民党人企图把共产党员排除在军事领导岗位之外，这种情况应当引起党特别的警惕。应当坚决抵制这种企图，但另一方面，在进行抵制时，不能给国民党人以口实，说在决定选择军队指挥人员和政工干部等问题时国民党组织受到排斥。但是应当再说一遍，在任何情况下组建中国革命武装力量时，都应当十分谨慎和十分坚定地争取，使主动权和领导作用属于完全忠实可靠的人，使党的委员会成为整个军事工作的实际领导者。

瓦解敌对力量

这项工作同时也是（并且应当是）聚集革命武装力量的工作。被瓦解的部队和其中的某些建制可充实革命队伍。

在瓦解民族解放运动敌对军事力量方面的最重要工作（通常是中共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是瓦解张作霖的军队。还应该利用一切机会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特别是有色人种的军队和水兵进行接触。

(1) 瓦解工作应当采用党力所能及的一切手段。其中最有力的手段是让忠于我们的指挥人员和从事军事部专门指令性工作的

普通工作人员打入敌人的军队。

(2) 为军队出版专门刊物、传单和小册子。在政治条件许可的地方,要组织工会和农民组织的代表团探望敌对部队的士兵。还要全力以赴地在敌对部队士兵出身的地区和社会阶层的居民中开展工作。

(3) 党应当对游击运动 and 红胡子运动给予极大的注意,这些运动通常是在农民经济由于军阀内战,以及反动当局和地主的剥削与专横而遭到破坏后发展起来的。在这方面,党应当开展广泛的报刊和口头宣传,选派专门的组织者,并尽可能组织各种其他援助。首先务必把游击队和红胡子的打击集中到张作霖的后方。

(4) 为了节省力量,首先应当把分化瓦解工作集中在最重要的据点上,而就政治条件和战略意图而言,在这些据点里特别重要的是争取从军事上瓦解敌人。

分化瓦解敌视民族解放运动的武装部队的工作也同组织革命武装力量的工作一样,应当不只是通过清一色的共产党人的力量来进行。共产党应当善于把国民党、农民组织和工会吸引到这项工作中来,务必把青年组织和国内其他一切革命组织吸引到这项工作中来。同时各地都应确保我们党对这一工作的经常性的实的领导。

党的军事工作

一、军事部的组织结构

1. 为了具体领导和实现党所承担的军事任务,党成立隶属于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大的地方委员会的军事部。

2. 党的军事部承担两项基本任务:(1) 积蓄和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的工作,(2) 瓦解和利用敌对力量的工作。

3. 军事部的组织结构应当与这些任务相适应,而军事部的技

术人员应当作相应的挑选。

4. 为了组建中央军事部(隶属于党中央),党中央将任命三名党内同志(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即得到党的充分信任并尽可能熟悉军事工作的优秀组织者和优秀地下工作者。其中一位必须是党中央委员。

5. 中央军事三人小组的工作做这样的分工:其中一名成员领导和负责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的工作,另一名成员领导和负责瓦解和利用敌对力量的工作。

6. 三人小组工作的协调通过三人小组中的中央委员统管全部工作来实现,这名中央委员是军事部主任、工作的总领导人、中央有关军事问题的直接报告人,他从中央获得必要的指令。他为整个三人小组的工作负责。

7. 三人小组的另两名成员应当特别注意隐蔽。在工作中他们只同严格限定的几位同志接触。

8. 为了在地方实行直接领导和执行军事任务,党的地方委员会下设地方军事部(地方军事三人小组)。

9. 地方军事部的组织结构和地方三人小组的职责分工与中央三人小组一样,只有一点不同:地方军事部主任不仅要对地方党委,而且还要对党的上一级机关的军事部负责报告工作。

10. 地方三人小组的组成人员由上级党委执行机关批准。

11. 当党的地方委员会没有适当的工作人员组成军事部时,党中央将派遣必要的同志去主持该委员会的工作。

12. 为了直接进行工作,地方党委指派必要的工作人员去主持地方军事部的工作。

13. 这些工作人员按军事部主任的指令行事,根据他们的才能和军事部的任务进行分工,而且他们只应当知道自己的直接领导人,不应了解整个军事组织系统。

14. 一般应避免召开军事部工作人员会议,只有在绝对必要

时在非常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方可举行尽可能小范围的会议。

15. 党的军事部应当遵守最严格的秘密活动原则，尽可能广泛地利用党的机关，特别是党同工农群众的联系开展自己的工作。

军事部还应当非常严格地根据党所执行的总的政治路线进行工作，并经常注意不要脱离党的总的工作。

二、军事部的职能

1. 实际领导和实施党在组织自己的力量和分化瓦解敌人的力量这两方面的各种军事任务，应严格根据党的领导机关的指示行事。

2. 在组织自己力量的工作中：

(1) 加强一切反帝军事团体和集团。

(2) 扩大和巩固自己在各军事团体和集团中，特别是在革命军事团体和集团（首先是人民军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

(3) 支持组建新型的革命的国民党军事部队。

(4) 在国家最重要的工业中心组建和训练党和工人的部队。

(5) 组建隶属于农民协会的农民部队。

(6) 给部队提供必要的物资和武器。

(7) 组建军事教官学校，为党的部队、工人的部队和农民的部队培训组织人员和指挥人员。

(8) 为了民族解放运动利用游击运动和红胡子运动。

(9) 为了同样的目的利用秘密的民众社团。

3. 在分化瓦解敌对力量的工作中：

(1) 分化瓦解反革命的军阀集团和派别，首先是张作霖的军队。

(2) 分化瓦解地主的队伍。

(3) 分化瓦解法西斯队伍（“纸老虎”^①等）。

^① 商团军在广州被称为“纸老虎”。

(4) 分化瓦解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领土上的武装部队。

全宗 495, 目录 154, 卷宗 247, 第 19—28 页。

打字稿, 无签字。

166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中国委员会会议第 7 号记录

1925 年 8 月 21 日于莫斯科

中国委员会会议第 7 号记录

出席：伏龙芝、莫洛托夫、契切林、温施利赫特、彼得罗夫、格列尔和隆格瓦同志。

主持：伏龙芝同志。

听取：总的形势。

决定：1. 坚决贯彻执行 468—470 号电报^①提出的和我们的指示赞同的路线。

2. 鉴于张作霖和人民军(即国民军, 下同——译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应在未来的冲突地区作好政治上的准备。

3. 考虑到将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应同直隶集团建立联系, 并要特别注意湖北和湖南。

^① 电报没有找到。

4. 认为对政府和人民军将领施加压力,以便对张作霖实行更为积极的政策是适宜的。

5. 提请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注意在中国中部、湖北、湖南以及在甘肃、四川两省从政治上巩固自己的地位的必要性;中共应加强在汉口、天津等工人中心以及在铁路员工中的工作。

6. 指示中共必须继续执行以前对待国民党的方针,避免加剧关系。彼得罗夫同志必须就这个问题起草好报告。

听取:物质援助。

决定:1. 认为在目前形势下不能满足北京提出的关于提供物质援助,以便在广州组建2—3万人的武装部队的申请。

2. 批准暂时停止给冯玉祥运送武器的命令。

3. 不接受用我们的物资为冯玉祥组建一个旅(师团)的方案。

听取:部队的组建。红色部队。

决定:1. 认为在蒙古境内为冯玉祥建立一支国际部队是适宜的。

关于组建部队的拨款问题要上级机关提出建议。

听取:关于党的军事工作。

决定:1. 开展军事工作,为此建立党的军事机构。

2. 这项工作应当按分化瓦解敌对部队、情报工作、后方工作、建立工农武装队伍等方面进行。

3. 不专门建立学生队伍,尽量在工农队伍和其他工作中利用学生。

4. 中国共产党进行军事工作决不应意味着把国民党排除在这一工作之外。中共应当通过自己的同志来保持和争取参加并领导国民党的军事工作。

5. 认为对红胡子运动开展更为有力的工作是适宜的。

听取:关于蒙古问题。

决定:鉴于雷斯库洛夫所报告的有关瓦西里耶夫同志的行为

的消息^①，将此事上报中央监察委员会。

委员会主席 (伏龙芝)

秘书 (隆格瓦)

《俄罗斯军事档案》莫斯科 1993 年第 1 期第 319—320 页。

167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76 号记录 (摘 录)

1925 年 8 月 22 日于莫斯科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非常会议 第 76 号(特字第 59 号)记录

1925 年 8 月 18 日征询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听取：9. 关于中国问题。(1925 年 8 月 13 日政治局会议第 75 号记录，决定：1—〔1〕)。

(报告人伏龙芝同志)

决定：9. 接受中国委员会的建议：“不反对提出的计划，它基本上是按 006 号指示中的建议拟定的。不发详细指示，因为这在当地看得更清楚。对岳维峻要认真加以研究。给工农红军司令部

^① 雷斯库洛夫的报告没有找到。T·P·雷斯库洛夫，共产国际执委会驻蒙古代表；A·H·瓦西里耶夫，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译者。

侦察局下达指示。”^①

抄送：

伏龙芝同志——全部。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2，第 167、168 页。

打印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68

拉斯科尔尼科夫给伏龙芝的信^②

1925 年 8 月 22 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伏龙芝同志。抄送契切林。

敬爱的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

考虑到向中国革命军队提供政治上可靠的指挥人员的极端重要性，我们认为目前有必要在列宁格勒国际军事学校开设中国部。

我们考虑，该部的宗旨应当是在 2—3 年期间培养出当然是具有相应政治素养的军事专家。

该部学员可以从物理、数学系、学院以及法国和德国的其他高等院校的中国学生中招收。符合该部宗旨的挑选工作可以在追

① 参见第 163 号文件。

② 文件上部有两行手记：

1. 隆格瓦同志：伏龙芝同志未阅。1925 年 8 月 26 日。

2. 隆格瓦同志：伏龙芝同志原则上同意。亚基尔同志和您应对问题作详细研究。1925 年 8 月 27 日（签字字迹不清）。

随革命潮流、具有社会积极性的共产党、国民党和无党派的中国学生中进行。优先招收那些除具有一般的文化修养和起码的政治常识外还有工龄的大学生。这样的学生在法国可以找到很多，因为在那里中国学生不得不在工厂勤工俭学。

该部学员数量初期不超过 20—30 人。教学问题将因学员懂法语或德语，至少可以挑选懂其中一种语言的学生而变得容易解决。

夏天举办的三个月军训班的经验使人认为，附属于列宁格勒国际军事学校的中国部将是很有生命力的，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产生十分有益的结果。

候复

彼得罗夫^①

全宗 495，目录 18，卷宗 401，第 4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169

拉斯科尔尼科夫给伏龙芝的信

1925 年 8 月 24 日于莫斯科

秘密

致伏龙芝同志。

敬爱的同志：

谨请求您讨论一下关于为 25—30 名中国共产党员组织类似今年夏天举办的那种短期军训班的问题。

^① 即 Ф·Ф·拉斯科尔尼科夫。

有 60 名中共党员适合进行短期军训，他们是在今年 7 月被驱逐出法国的，现在住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马拉霍夫卡别墅，在那里接受短期政治培训。从他们当中可以随意招收 25—30 名符合训练班宗旨和任务的人选。他们当中也有几个人进过军事学校。

训练班可以安排在 10 月 1 日开始，此前可以组织这些同志在现在居住的别墅进行野外课程。

候复

彼得罗夫^①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53，第 115 页。

打字稿，副本，亲笔签字。

17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77 号记录 （摘 录）

1925 年 8 月 27 日于莫斯科

出席：

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洛托夫同志。

俄共中央委员：安德烈耶夫、克维林、苏利莫夫同志。

候补中央委员：瓦列伊基斯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古比雪夫、扬松、雅罗斯拉夫

^① П.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斯基同志。

契切林同志。

听取：32. ——关于中国劳动者大学。(组织局 1925 年 8 月 21 日会议第 103 号记录，决定：13.)

决定：32. —— (1) 同意成立组建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促进会。

(2) 批准组建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促进会创立人由以下人员组成：①拉狄克、②布哈林、③托姆斯基、④列普谢、⑤洛佐夫斯基、⑥越飞、⑦欣丘克、⑧帕夫洛维奇、⑨安采洛维奇、⑩萨哈罗夫、⑪卢金、⑫梁赞诺夫、⑬西比里亚科夫、⑭布罗伊多、⑮萨法罗夫、⑯斯捷潘诺夫-斯克沃尔佐夫、⑰霍多罗夫。

从教授中增补 2—3 名非党汉学家代表。

俄共中央书记 莫洛托夫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517，第 1、10 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17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中国委员会会议第8号记录

1925年8月29日于莫斯科

中国委员会会议第8号记录

通过电话征询莫洛托夫、温施利赫特、亚戈达、契切林等同志的意见进行表决。

听取：伏龙芝同志关于给冯玉祥运送全部器材的建议。

决定：根据加拉罕同志最近关于冯玉祥正在开展政治工作、组建由700名大学生组成的黄埔式的学校并同意按我们的意见任命参谋长的通报，看不到彻底履行器材供应有什么障碍。

加拉罕同志抵达以前为了不停止运送器材，从库伦现有储备中发送3000枝带子弹的步枪。

委员会代主席 温施利赫特

秘书 隆格瓦

《俄罗斯军事档案》莫斯科1993年第1期第320—321页。

172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中国委员会会议第9号记录

1925年9月5日于莫斯科

中国委员会会议第9号记录

通过电话征询伏龙芝、温施利赫特、莫洛托夫、亚戈达、彼得罗夫等同志的意见进行表决。

听取：瓦西里耶夫同志关于由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拨款15000墨西哥元支援天津在8月11—18日事件^①期间受难的团体的建议。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为提供紧急援助是必要的。

决定：建议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紧急拨款15000墨西哥元支援天津的团体。

主席 温施利赫特

秘书 博尔特诺夫斯基

《俄罗斯军事档案》莫斯科1993年第1期第321页。

① 指当局对该市总工会、海员工会和其他革命组织的镇压。

17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中国委员会会议第10号记录

1925年9月16日于莫斯科

中国委员会会议第10号记录

出席：温施利赫特、契切林、加拉罕、莫洛托夫、布勃诺夫、亚戈达、博尔特诺夫斯基、别尔津、瓦西里耶夫同志。

听取：加拉罕同志的情况报告。

决定：报告已查照，备案待查。

听取：2. 关于进一步向冯玉祥、岳维峻、广州、孙岳和张之江提供武器装备援助的建议。

决定：2. (1) 将建议移至下次会议讨论解决，责成革命军事委员会同加拉罕同志一起估计所有订货的价值和完成的可能性，仔细研究这个问题并提出具体建议。

(2) 为完成张之江的订货，开始从库伦的储备中给他发运所许诺的武器。

(3) 从伊尔库茨克充实上乌金斯克仓库，以便以后运到库伦。

听取：3. 关于超出规定的标准派遣教官的问题。

决定：3. 将问题移至下次会议讨论解决，委托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其政治部和加拉罕同志一起考虑实际需要以及从红军人员中派出教官的可能性。

听取：4. 关于创建红色部队和白色部队的问题。

决定：4. (1) 加拉罕同志关于白色部队的组建已经开始、部队已有约 100 人的报告已查照，备案待查。

(2) 向库比亚克同志询问鸦片基金的状况；据此向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提出以借贷方式拨出组建部队资金的问题。

听取：5. 关于补充拨款问题。

决定：5. 向政治局申请：

(1) 关于每月补充拨款 1 万卢布用作外交人民委员部系统的秘密开支（支援铁路员工、出版、内蒙古、河南农民运动）。

(2) 关于拨款 1.5 万卢布用来为从巴黎来的 33 名中国人组织短期训练班。

(3) 关于拨款 5.2 万卢布用于超标准派遣 25^① 名教官和支付他们今年 10 月 1 日以前的薪金。

主席 (温施利赫特)

秘书 (博尔特诺夫斯基)

《俄罗斯军事档案》莫斯科 1993 年第 1 期第 321—322 页。

① 还有可能是 35，原文字迹不清。

174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摘 录)

1925年9月17日于莫斯科

出席：

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加里宁、莫洛托夫、索柯里尼柯夫同志。

俄共中央委员：布勃诺夫、泽连斯基、克维林、克拉辛、皮达可夫、乌格拉诺夫同志。

中央候补委员：瓦列伊基斯、格伊、瑟尔佐夫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扬松同志。

听取：38. 关于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组织局1925年9月11日会议第107号记录，决定：11)

决定：38. 批准该大学总额为55万卢布的预算。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3，卷宗519，第1、8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175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 (摘录)

1925年9月17日于莫斯科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79号(特字第62号)记录

听取：1.——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3〕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加拉罕同志)。

决定：1.——〔3〕(1) 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专门拨款问题的建议^①。

(2) 认为中国人谋害日本大使案件的诉讼程序安排仅限于驱逐他们是不合适的。

(3) 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中国问题的总报告在政治局下次会议上提出。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

李维诺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亚戈达同志——(2)；

^① 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建议没有找到。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1)。

1925年9月17日 [用电话征询意见]。

听取：29。——关于组织军政训练班（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同志）。

决定：29。——补充拨款1.5万卢布为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军政训练班。

抄送：温施利赫特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2，第172、173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76

瓦西里耶夫给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5年9月21日于莫斯科

敬爱的季诺维也夫同志：

我想同您谈点事：

从加拉罕同志（给中国委员会）的报告^①和维经斯基同志最近的信^②（副本已送给您）中，我以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① 指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1925年9月16日会议（见第173号文件）。加拉罕的情况报告没有找到。

② 可能是指维经斯基1925年8月19日的报告（见第164号文件）。

(1) 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正在形成(部分已经形成)一种不正常的和孕育着极其危险后果的相互关系。

(2) 这种相互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中共在这一运动中的作用和中共的当前任务缺乏明确的认识所致,有产生左倾的危险,而且我们的军事人员尤其会患这种病症。

(3) 此外,有这样一种印象:我们的中国领导同志十分用心研究军事和外交问题,以致因此在吸引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工作中蒙受了重大损失。自然可以得出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应当用这种情况来说明,为什么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迄今为止仍局限于中国南部和部分中部的大的政治中心,而没有向各省扩展,没有席卷北部。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成长速度比它本来可以有的速度更缓慢。这是更重要的一点。我认为,鉴于以上所述各点,应当在最近的一次主席团会议上提出关于中国事态的通报(报告?),以便(在会上直接或成立预备委员会)批准就上述问题给我们中国同志的一系列指令,或许眼下可以不在主席团提出这些问题,而只限于提交维经斯基同志的信。^①在哪一种情况下都需要您给以指示。

我建议:

1. 中共中央应赶紧重新审查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的性质。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非常谨慎地进行。党团无论如何不应发号施令。共产党不应当要求一定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一切领导职位,相反,它应当竭力广泛吸引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员参加负责工作。

2. 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委员会应当在这方面细心地接受指导。

3. 我们的军事人员应当专门在这方面接受指导。

^① 这封信可能是1925年10月2日B. A. 瓦西里耶夫给Г. H. 维经斯基的信(见第186号文件)。

4. 中共中央应当从尽量加强省的工作的角度重新考虑自己的组织和策略意图。在我看来，现在特别重要的是采取深入到农村群众中去，然后才是（我们也有可能）夺取满洲的时候。必须加强共产党数量的增长。

5. 成立国民党中央北满局及中国共产党的相应代表机构。

6. 最后，我认为，如果您作一个公开的报告，就我所涉及的问题总结一下中国的事态，特别详细地谈谈正在经历争取民族解放斗争阶段的国家的共产党的任务（即共产党人在东方的任务），那就太好了。我很想鼓动您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作这样的报告，那里正好新学年开始，您的报告定会一举多得。我们将把您的报告速记记录作为指示文件寄给我们的中国同志。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瓦西里耶夫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53，第 215—216 页。

亲笔签字。

177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中国委员会会议第11号记录

1925年9月23日于莫斯科

绝密

中国委员会会议第11号记录^①

出席：温施利赫特、加拉罕、布勃诺夫、亚戈达、别尔津和博尔特诺夫斯基同志^②。

听取：1. 关于对人民军和广州的武器援助问题。

决定：1. (1) 基本上通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同加拉罕同志一起制定的供应计划。

(2) 责成革命军事委员会再一次研究通过建立一支不超过3000名骑兵的队伍来加强冯^③的骑兵问题。这支队伍在武器、装备和训练方面所需的费用提交下次会议审议。

(3) 弄清在广州是否可以建立骑兵。

(4) 责成革命军事委员会再一次研究加强冯和广州的空军问题。把我们空军可以拨给的航空器材清单和相应的支出预算提交下次会议审议。

① 文件上有注：凭亲笔收条交给加拉罕同志。

② A·C·布勃诺夫，俄共(布)中央书记、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Г·Г·亚戈达，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译者。

③ 即冯玉祥。

(5) 责成革命军事委员会研究向冯提供化学作战武器或在他那里建立化工厂的可能性问题。相应的预算和清单提交下次会议审议。

(6) 责成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研究吸收远东等地的原游击队员，特别是炮兵和骑兵到中国工作的问题。

(7) 再次请求政治局在 1924 至 1925 财政预算年度预算外补偿军事部门用于恢复拨给中国的炮兵器材的费用。

听取：2. 关于 1925 至 1926 财政预算年度上半年用于军事机关给养和支持在中国的军事政治工作的预算问题。

决定：2. 通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的总额为 1374896 卢布 28 戈比的预算案，并提交最高领导机关批准。

听取：3. 关于亚历山大罗夫同志^① 去中国出差问题。

决定：3. 认为亚历山大罗夫同志在目前出差是不合时宜的。

听取：4. 关于派遣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家属去中国问题。

决定：4. 认为在当地试用工作满四个月后可以派遣家属去中国，但每次派遣工作都要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协商。上述期限，根据北京中心的特别请求并取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批准，也可以缩短。

听取：5. 关于拨款组建国际部队问题。

决定：5. 再次请求最高领导机关拨款 140 万卢布。

听取：6. 关于中国为拨给的器材承担债务问题。

决定：6. 要求冯和其他将军为拨给的器材承担一定的借债义务，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寻求最可行的方式。

下次会议定在星期一，9 月 28 日 16 时举行。

主席 (温施利赫特)

副本核对无误。

^① 此人职务不详。

全宗 17, 目录 84, 卷宗 1074, 第 3、4 页。
打字稿, 经过核对的副本。

178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80 号记录 (摘 录)

1925 年 9 月 24 日于莫斯科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80 号(特字第 63 号)记录

听取: 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5〕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5 年 9 月 17 日会议第 79 号记录, 决定 1. —〔3〕)(报告人加拉罕同志)。

决定: 1. ——〔5〕(1) 责成加拉罕同志采取他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 对段祺瑞施加影响, 以便尽快颁布使工会合法化的法律, 并使冯玉祥表示支持上海工会。

(2) 责成委员会仔细研究确保同广州的联系问题。

(3) 对整个问题的讨论移到下次政治局会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 目录 162, 卷宗 2, 第 174、175 页。
打字稿, 原件, 签字为真迹复制。

179

斯莫连采夫给加拉罕的便函

1925年9月25日于莫斯科

绝密

紧急

亲启

加拉罕同志：

现送上中国委员会今年9月23日会议第11号记录^①，并告知，为实施该记录今天将下列事项呈报政治局批准：

(1) 上半年军政工作预算和为资助军政学校与新建部队的补充拨款，总额为1374896卢布28戈比。

(来往函件第031326号)。

(2) 关于给部队拨款140万卢布。

(来往函件第031324号)。

(3) 关于为超标准派遣教官和支付1925年10月1日以前的生活费(第10号记录)拨款5.2万元。

(来往函件第031325号)。

附录：中国委员会会议第11号记录两页。

奉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命。

(签名：斯莫连采夫^②)

① 见第177号文件。

② П·И·斯莫连采夫在1923至1924年间曾任驻华军事顾问，1925至1928年间在工农红军总部侦察管理局工作。

全宗 17, 目录 84, 卷宗 1074, 第 2 页。
打字稿, 已经核对的副本。

18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中国委员会会议第 12 号记录

1925 年 9 月 28 日于莫斯科

绝密

中国委员会会议第 12 号记录

出席：温施利赫特、加拉罕、瓦西里耶夫、布勃诺夫、别尔津、博尔特诺夫斯基、雅克、多列茨基和巴拉诺夫同志^①。

听取：1. 关于开辟莫斯科—海参崴空中航线及伊尔库茨克—北京支线的报告（报告人：雅克、博尔特诺夫斯基同志）。

决定：1. 认为开辟伊尔库茨克—北京空中联系是很适宜和很有必要的。责成全苏志愿航空公司在最短期限内提出开辟这条航线的详细开支预算。认为引进德国资金是不可行的。

听取：2. 关于拨给广州、冯和岳维峻^②飞机和飞行员的报告（报告人：博尔特诺夫斯基和巴拉诺夫同志）。

决定：2. (1) 满足为广州、冯玉祥和岳维峻提供 35 架飞机

① В·А·瓦西里耶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政治书记；Я·Г·多列茨基，俄罗斯通讯社负责人；В·И·巴拉诺夫，工农红军空军局长；雅克为何人，不详——译者。

② 岳维峻时任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译者。

的申请。责成工农红军空军局尽快准备派遣 12 架飞机，给广州 6 架，给冯玉祥 6 架。为飞机配备必要的飞行员，使每个机组在派出时自成一个完整的飞行中队。

(2) 需要修理的两架 P₂ 型飞机，不要给冯，要转给西伯利亚军区使用。停在海参崴的两架 IOB 型飞机，派到广州去。

(3) 责成空军司令紧急同航空队商量补订 35 架飞机事宜。

(4) 向相应机关紧急提出拨款问题，补上工农红军空军局的贷款，数额为 35 架飞机和必要备件的价值。为此，空军司令要在最短期内提出具体数字。

听取：3. 关于在中国成立国家电讯社和建立无线电联系的报告（报告人：多列茨基同志）。

决定：3. (1) 认为有必要吸收我们的资金在中国成立国家电讯社。责成多列茨基同志会同财政人民委员部制定组建这个企业的开支预算，并提交委员会审议，以便向最高领导机关报告。

(2) 交给工农红军总部军事技术局一项任务：紧急提出关于在华北建立无线电联系的设想。

(3) 要求弱电流托拉斯就能否向中国出口我们制造的无线电器材去占领当地市场问题提出意见。

听取：4. 关于我们部队在库伦继续逗留问题。

决定：4. 向坎格里拉里同志^① 询问一下部队的状况和作战能力，以及今年秋季部队复转人员的比例。

听取：5. 关于从（唐努图瓦^② 共和国的）乌里扬海撤出部队问题。

决定：5. 认为撤回部队是必要的。

听取：6. 关于广州局势的通报（通报人：加拉罕同志）。

决定：6. 备案待查。

^① B·A·坎格里拉里，蒙古人民军参谋长——译者。

^② 即乌梁海。

听取：7. 关于援助广州、冯玉祥等的武器装备问题。

决定：7. (1) 通过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的计划，在1925年财政预算年度拨款之外追加为冯建立3000人骑兵队的费用，总额为12777157卢布。

(2) 请求政治局在预算外紧急拨出这笔款项，恢复军事部门的贷款。

(3) 通过我们的教官紧急弄清是否可以通过建立流动的技术装备精良的部队（摩托部队、机枪部队、装甲部队等）来提高广州军队的作战能力。

听取：8. 坎格拉里同志关于给冯提供10门火炮的要求。

决定：8. 同意提供火炮。

听取：9. 广州关于提供武器和火炮的要求。

决定：9. 把海参崴的储备发往广州，并尽可能按通过的计划用小技术器材补充储备。

听取：10. 岳维峻的武器援助要求。

决定：10. 在弄清当地形势之前将该问题作为悬案。

听取：11. 关于替换一些驻华工作人员和确定国外教官工作期限问题。

决定：11. 为全面研究这个问题，成立由博尔特诺夫斯基、别尔津、格里鲍夫组成的专门委员会。

听取：12. 关于分化瓦解张作霖军队和这项工作所需经费问题。

决定：12. 为全面研究这个问题，成立一个由博尔特诺夫斯基、特里利塞尔^①和彼得罗夫组成的专门委员会。

委员会的召集人是博尔特诺夫斯基。

委员会的工作期限为两周。

^① M·A·特里利塞尔，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外国处处长——译者。

主席 (温施利赫特)

核对无误

全宗 17, 目录 84, 卷宗 1074, 第 7—9 页。

打字稿, 经过核对的副本。

181

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

1925 年 9 月 28 日于北京

亲爱的同志们:

近两周, 因往返于上海, 未能写信。

自我寄出最近一封信以来, 政治形势有些变化, 或更确切地说, 在以下意义上更明朗化了: 政治罢工时期结束, 仅在几个大的中心城市(上海、汉口、开封和唐山煤矿)举行的工人经济罢工斗争也停止。虽然在一些地方, 工人有组织地登上了政治经济斗争舞台, 同时, 也发生一些多半提出了民族革命要求的自发性行动, 但是相当多的工业无产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群众, 还没有直接参加近 4 个月的中国民众革命斗争。

工人群众的活跃时期和他们对政治生活的醒悟过程, 依然是现时运动最突出的特点。

近两周军阀开始实行公开镇压, 中央政府显然同意这样做, 这是工人罢工由反帝斗争向主要在中国企业中进行的经济斗争过渡的直接结果。在关于这个问题的电报中, 我指出了开始进行镇压

的主要原因和开始镇压时的直接政治形势^①。

上海无论在全国斗争高涨时期还是在工人群众的一般经济斗争加强时期，始终是整个运动的中心。因此，对工人组织和整个工人运动的镇压行动从上海开始后，自然很快就其他工人中心得到了反映，尽管各省的政治局势并不相同。毫无疑问，即便是在人民军驻扎的地方，近期也会因为对工人运动的总的进攻形势而发生对工人组织的一系列排挤行动。帝国主义驻华官方机构完全公开地表露出它们对已开始的镇压行动幸灾乐祸，它们还不无道理地把这种行动看作是奉系军阀和中央政府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要求的答复，它们要求中国政府证明它准备并能够在开始举行关税会议^②和解决帝国主义与中国当局之间的原则性矛盾之前使国家“平静下来”。

实际上帝国主义并不是很害怕整个人民革命运动，而是害怕飞速发展的工人组织，因为这些组织在很短期限内就变成了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集中的群众性机构，并对一般居民中的民主阶层有很大影响。如英文半官方报纸《京津泰晤士报》^③说，上海工会理事会联合20多万人，它在这个巨大的港口城市是与官方政权并行的权力机构^④。

对于可能发生经中央政府正式批准的军阀的镇压行动，我们用许多周时间做了准备。天津和唐山的工人发动失败后，可以明显看出，北方的工人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没有完全投入人民革命斗争，因此，经济战线上的发动使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直接面对张作霖的军队。

此后很清楚，张作霖准备在从天津到上海的整个沿海地带采

① 电报没有找到。

② 指西方列强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答应召开的专门关税问题会议，该会议于1925年10月26日至1926年7月3日在北京举行。

③ 《京津泰晤士报》自1894年在天津用英文出版。

④ 报纸上的相应文章没有找到。

取军事行动，急于在其军队驻扎的各个地区，而首先是在上海着手镇压工人运动，因为上海在作战期间将会起突出的作用。然而如果说上海工会理事会和其他工人组织以前没有被摧毁，那么这只能说是因为段祺瑞政府摇摆不定。虽然段祺瑞在工会被查封几天之后，试图通过半官方人士同上海军事当局的行动划清界限，但过去几个月的经验和张作霖在上海等地安插的人的腔调，以及他们直接援引的政府的话，表明段祺瑞摆向了何方。当然不排除还有这样的可能性，段稍许摆向他在6、7月采取的立场。但是，第一，这种情况只有在民主主义组织和资产阶级组织的强大压力下才会发生。第二，这种情况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在颁布工会法以前出现。这个法律尽管有其局限性，会使工会受到政府官员闻所未闻的控制，并会大大缩小职工联合会的基础，但它的颁布现在还是会给完全在我们控制下的那些自发组织的存在提供正式的依据。

虽然我们对已开始的镇压行动做了准备，建立了工会的地下机构，通过我们的党团加强了对工会的领导，建立了党团与党的地方和地区委员会之间的密切联系，但是党的积极分子和领导同志在心理上对由一种斗争方式向另一种斗争方式的转变还是准备不够。可以说，准备工作实际上只是组织方面的，而不是广泛政治上的。过去，党领导和调动群众只是在高涨时期，而在受到大规模镇压的低落时期，党学会领导和调动群众只是最近的事。应当承认，汲取教训很难。特别是现在，即在上海工会理事会和所有参加理事会的行业工会和产业工会被摧毁之后就更难。诚然，党通过预先准备的地下和半地下工会机构同工人完全保持了联系。工会组织被摧毁后，党立即着手举行多次工人代表会议，在工会中组织一系列抗议大会，但它未能组织广大群众对军阀镇压行动进行必要和可能的抗议，未能使居民中的民主阶层和革命知识分子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来。这个时候党未能走上街头表示抗议，未

能把全体劳工大众和民主舆论吸引到同军阀的斗争中来。然而，国内形势无疑从与军阀和外国资本家的斗争角度说还是革命的形势。对工人组织的镇压引起了学生、商人组织和小资产阶级街道联盟的抗议和请愿。

我们党没有进一步发动这种形式的抗议运动，也没有领导这种运动，只满足于举行地下群众大会和在有组织的工人中间举行代表会议。在工会理事会被查封之后，我们立即提出了在上海、开封、郑州和尽可能在其他地方举行工人一日总罢工的问题。准备工作在继续进行，但速度不是很符合整个革命形势，党的积极分子由于对群众的革命性信心不足而产生的迟缓、摇摆和担心，现在构成了这样一种危险，即军阀和外国企业当局可能孤立和一网打尽工人积极分子，在一段时间里摧毁群众的抵抗意志。当然，我们在采取各种措施，克服这些障碍，以便在党内而首先在领导人当中建立相应的心理状态。

我们认为，最近一周在党的积极分子的心理转变方面一定会取得必要的进展，转到采取更坚决的政治行动上来，以争取保持所争得的阵地和从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影响，即党在工人群众和革命学生中间的影响。

在几天以后即将举行的中共中央扩大全会上^①，我们将在中共组织问题提纲及其任务中总结过去的经验，指出今后革命运动的发展前景并拟定我们的具体工作方式^②。

关于中共中央全会

中共中央全会是继今年1月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的第一次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将来自一些省委的代表，只缺广州的代

^① 指中共四届二中全会。

^②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459—477页。

表，因为现在即便短时间也不能从那里召来党委书记^①和那里的中共委员^②。

全会的中心议题是：1. 对目前形势的估计。目前的形势仍然是革命的和革命化的形势，尽管（而有时也多亏）存在着局部的反动和镇压。由此得出了我们党的主要任务。2. 我们党的群众性问题和从组织上巩固我们在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和农民中的影响问题。3. 关于吸引农民参加革命运动的问题和关于农民运动的要求和形式问题。4. 关于全党从基层支部到省委、地委和中央的组织设置和积极性问题。5. 关于我们党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6. 关于把工人群众集中和组织到工会中去的问题以及党在工会中有组织的影响问题。最后，7. 关于大量吸收革命知识分子，主要是学生参加革命解放运动的问题。

这里附上关于目前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草案^③，在这个提纲中提出了上述议题。此外，还按每个议题起草了单独提纲，我将给你们寄去或带去。

在这里我谈谈所附提纲中的几个问题。

1. 关于对农民作用的估计和吸引他们参加革命运动的问题。我应该说，我们（东方部，其中也包括我）确实在就低估了农民对于中国现阶段革命运动的作用^④。中共领导人也有同样的感觉。现在我们收集了华中、华南一些省份的材料，说明了农村社会的构成状况，以及开始兴起的农民运动的性质和形式。在全会上设有农民委员会，我们将设中共农民问题常设委员会。初看这个材料以及在农民中做工作的地方同志的报告就清楚，在所附提纲中列举的我们的过渡性要求，有助于农民的革命化，促使他们

① 可能指陈延年。

② 可能指谭平山。

③ 关于目前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草案没有找到。

④ 在书面报告的页边不知何人注明：只是不是东方部，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

参加政治斗争，但是，如果我们不提出直至没收土地的更激进的要求，就不能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关于土地规划和土地利用问题，也就是土地国有化或别的形式问题，我们现在还不清楚，而且现在也不具有实际意义。至于没收土地，当然这里需要规定出没收的范围。我们打算在土地委员会上大致确定这项工作。我们将吸收熟悉中国农村情况和农民情绪的人参加。

2. 关于国民党的问题。在这些提纲中只提出了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国共之间产生摩擦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党没有在政治舞台上充分显示自己的面目，在一些地方没有明确建立自己的组织，因而造成了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之间关系的不明确，引起了左派的怀疑，使右派得以大肆叫嚷共产党人想占有国民党。不言而喻，在近4个月的革命运动背景下，右派所代表的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越来越多地成立了组织，并积极地开展了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活动。而正是为了支持左派，揭露右派，我们需要有明确的政治方针和准确设置的组织机构。我们的同志，特别是在南方，犯了一些双重性质的错误，一方面，他们没有在广州建立革命时期的客观形势允许建立的党组织；另一方面，他们过于突出他们要占有国民党机关的意图。此外，我们在广州和在其他一些地方的同志，没有自己的固定组织，没有在党员中做工作，没有把他们作为党组织的成员来加以教育，在国民党会议上以共产党名义提出决议案。

在由陈独秀同志起草的关于国共关系的专门提纲中（尚未翻译）^①，将提出一些协调这种关系的实际措施。其中的主要措施是：1. 不一定要进入领导机构，而要更多地做群众工作，当然仍留在工农部和军队的政治部；2. 不让所有新入党的党员，特别是工人党员加入国民党；3. 在国民党群众中做广泛解释工作，说明国共

^①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487—491页。

结成联盟和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可以说，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中，要从联盟转向联合。我们现在不打算通过发表某种声明或作出正式决定来完成这种过渡。但是现在就需要采取这种过渡方针。

不言而喻，这里会有很大的困难和危险，但我认为，资产阶级的分化过程和正在发展的革命运动，正是要求这样提出问题。当然，还需要对我们的同志，特别是对共青团员做很多解释工作，需要抑制某些组织的活动，说明我们有被孤立而国民党右派会加强的危险，不过我想，这些困难终归是可以克服的。而一旦越过这些障碍，我们就能摆脱某些影响党和共青团发展的条件，为同国民党左派的真诚联合创造最好条件。

这里所附的提纲只是草案，明天要在党委会上讨论。我想，不会有大的改动^①。

全会结束后一周或10天后，我可以更多地谈谈我们的工作，那时也可以回答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提出的一些问题，如关于党的状况、党员人数、个别组织情况等问题。

全会上还要花很大注意力研究群众鼓动和党内宣传问题。

除中国问题外，我在这里还同朝鲜同志一起做了一定的工作，直接与汉城建立了联系。我们从上海为朝鲜同志安排了出版社。最近一个月，我们印了几本小册子，并寄到朝鲜去了。这里每种我附上一册。去过汉城的梅里尼科夫同志对我说，我们的组织虽然不大，但工作得很好。从由那里寄给此间朝鲜同志的信中可以看出，朝鲜共产党人同城市里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很重要的是，他们已渗透到农村，组织了农民协会。工作人员问题很突出。当然需要派遣经过认真审查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毕业生。

^① 需要把对暂时的政治反动的评价加进提纲，这次反动首先是对工人阶级的一个打击。指望最近一周事态会有所发展——维经斯基注。

7月初,我从蒙古来中国时,已经写了同内蒙代表团的会见情况和在那里组建人民革命党的可能性。这以后,精通蒙古语的奥希罗夫同志^①被派到内蒙去了。他对一些地区做了很好的调查,带来相当多的材料,因为他同我一块路过蒙古时同代表团建立了联系,所以这两个月他顺利地筹备了内蒙人民革命党成立大会,10月初要在张家口举行。

除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这个地区(内蒙)还存在由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的工农兵联盟,主要由中国人组成。我们打算建立这两个组织的联合会,其执行机关有中共代表参加,也可能有国民党代表参加。这项工作将在东方部代表领导下进行。

日本问题下次再谈。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维经斯基

全宗 495, 目录 154, 卷宗 249, 第 97—106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182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

1925年9月28日于莫斯科

建议中国共产党遵循下列原则立即审查同国民党的相互关

^① 奥希罗夫, 共产国际驻内蒙古代表——译者。

系：

[1] (1) 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进行。

(2) 党团不应发号施令。

(3) 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

(4) 相反，共产党应当竭力广泛吸引（未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党员而首先是左派分子参加本国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领导工作。

(5) 同时中共中央应当经常仔细地研究国民党所依靠的社会阶层中发生的各种进程和军阀中的社会重新组合。

2. 共产党的地方委员会应当在这方面细心接受指导。

3. 俄国工作人员尤其应在这方面接受指导。

4. 中央要发表告全中国人民书，根据以前就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作出的全部指示，提出以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和中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为基础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和国民党在这一运动中的作用。有人企图把最近的广州事件说成是共产党竭力破坏民族统一战线，对于这种行为要特别加以批判。

5. 大力加强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吸引新的中国民主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特别要加强省的工作。加强对农村的渗透。为了加强省的工作专门派出巡回宣传指导员和组织工作人员。加强适于吸引各省工人和农民参加运动的报刊宣传工作。要吸引工会并通过工会吸引非党工人，并为吸引各省工人和农民参加运动进行工作。

6. 还务必加强在北京的工作。

7. 采取措施安排好满洲的工作。建立国民党中央满洲局（中共中央派适当的代表参加）。

8. 隐蔽党的机关和工作人员的最重要部分。

9. 同朝鲜共产党中央一起建立共同的政治和军事中心，领导

延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

10. 加强依靠工农分子扩大党的队伍的工作，还要提出加强党内教育工作的问題。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53，第 272—274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183

温施利赫特和博尔特诺夫斯基 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①

1925 年 9 月 30 日于莫斯科

绝密

送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致斯大林同志

中国委员会在今年 9 月 23 日和 28 日的会议上(第 11、12 号记录)^② 通过了以下支援人民军和广州武器装备的计划：

关于支援人民军和广州武器装备问题：

(1) 为了将军队扩充到 10 万人，将骑兵扩充到 3000 人，给冯玉祥的第一人民军拨出总额为 3486596 卢布的炮兵器材。

(2) 给岳维峻拨出总额为 701879 卢布的武器装备，只是为了加强我们的影响。

(3) 根据张之江的订货，他也许会用现金支付一部分，给他

^① 在文件上有 П·И·斯莫连采夫的说明：加拉罕同志亲启。

^② 参阅第 177、180 号文件。

拨出总额为 **975635 卢布** 的武器装备。

(4) 为了加强黄埔军队，给广州调拨总额为 **3988242 卢布** 的武器装备。

(5) 调拨金额为 **741000 卢布** 的毒气弹，根据需要在各军之间分配。

(6) 还认为必须拥有数额为 **3082795 卢布** 的储备以备支援第三人民军和预料不到的补充调拨之需。

(7) 为了加强空军，根据所收到的订单拨给：

(a) 冯玉祥——飞机 10 架

(b) 岳维峻——飞机 10 架

(c) 广州——飞机 15 架

总额为 858000 卢布。

根据航空队的组建规模为飞行人员费用和技术装备提出补充预算。

此项费用可能由人民军和广州清偿并根据收款情况注销。

建议总共给人民军和广州调拨总额为 18834147 卢布 的炮兵器材和飞机，而这些器材的运输和装卸费用为 **1722989 卢布 12 戈比**，总共 **20557136 卢布 12 戈比**。

在上述数额中，1924—1925 年度发运了金额为 6056990 卢布的炮兵器材，花费运费 445273 卢布 12 戈比。

因此，建议在 1925—1926 预算年度调拨金额为 **12777157 卢布** 的器材，其运费为 **1277716 卢布**，总共 **14054873 卢布**。

请求：

(1) 批准上述总金额为 20557136 卢布 12 戈比的供应计划。

(2) 在 1925—1926 年度预算外补偿军事部门在 1924—1925 年度调拨的器材的价值，以及按劳动国防委员会最后核准的重购价格调拨的器材的价值。

(3) 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确定最后价格之前，以预付形式拨出

4836751 卢布 20 戈比，这笔金额相当于按 1924—1925 年度同财政人民委员部商定的老的重购价格拨出的器材的价值。

(4) 为运输、装卸 1924—1925 年度调拨的器材拨款 445273 卢布 12 戈比，为建议调拨的器材拨款 1277716 卢布，总共 1722989 卢布 12 戈比。

(5) 责成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军事工业总局接受恢复所有调拨器材的订货，并允许空军总管理局通过国外订货补上必要数量的所拨出的航空器材（发动机）。

附：两张图表，图 1、图 2。

委员会主席 温施利赫特

秘书 博尔特诺夫斯基

1925 年 9 月 30 日

核对无误： 斯莫连采夫

打印 4 份：

- 第 1 份送斯大林同志，
- 第 2 份送温施利赫特同志，
- 第 3 份送加拉罕同志，
- 第 4 份归委员会存档。

图表 1：

根据基本计划通过的 1924—1925 年度
调拨的和应当调拨的炮兵器材^①

① 炮兵器材价格根据 1924 至 1925 年度最后的重购价格确定。1924 至 1925 年度调拨的炮兵器材以及 1925 至 1926 年度应当调拨的炮兵器材必须按劳动国防委员会最后核准的重购价格补偿军事部门。

名 称	按基本 供应计划		1924-1925 年度调拨		决定在 1925-1926 年度调拨	
	数量	价值	数量	价值	数量	价值
步 枪	67500	总 共 价 值 18834147 卢 布	30000	总 共 价 值 6056990 卢 布	37500	总 金 额 12777157 卢 布 ， 运 输 装 卸 费 1277716 卢 布
步枪子弹	84100000		32000		52100000	
带附属器具的机枪	382		242		140	
轻便双马敞篷车	24		242		24	
带附属器具的 3 英 寸炮	102		36		66	
3 英寸炮弹	92000		20400		71600	
6 英寸炮，榴弹炮	4				4	
榴弹炮弹	4000				4000	
手榴弹	20000		10000		10000	
骑兵军刀	4000		10000		3000	
矛	2000		500		1500	
掷弹炮	128		28		100	
掷弹炮弹	12800		1000		11800	
无烟火药	2000		1000		1000	
毒气弹	20000				20000	
左轮手枪			500			
飞 机	35		85			
马	3000		3000			
马 鞍	3000		3000			

核对无误：斯莫连采夫

图表 2:军事部门在 1924—1925 年度调拨和预定于 1925—1926 年度调拨的炮兵器材的分配

物件名称	冯玉祥		岳维峻		张之江		广州		储备		总数	总价值	注释
	数量	价值	数量	价值	数量	价值	数量	价值	数量	价值			
1. 步枪	30000		4500		8000		15000		15000		67500		
2. 步枪子弹	38600		5000000		3000000		20000000		17500000		84100000		
3. 带附件的机枪	172		10		50		100		50		382		
4. 轻便双马敞蓬车	24										24		
5. 带瞄准器的 3 英寸炮	54				12		24		12102				
6. 3 英寸炮弹	44000				12000		24000		12000		92000		
7. 6 英寸炮,带瞄准器的榴弹炮	4										4		* 飞机价值
8. 榴弹炮弹	4000										4000		858000 卢布,而爆破
9. 手榴弹	10000	848559 卢布		701879 卢布		975635 卢布	10000	398824 卢布		308279 卢布	20000	1883414 卢布	和电话器材列入
10. 骑兵军刀	4000										4000		只列入武器装备
11. 矛	2000										2000		总价值中
12. 掷弹炮	10				18		50		50		128		
13. 掷弹炮弹	1000				18000		5000		5000		12800		
14. 坦克							3				3		
15. 无烟火药							1000		1000		2000		
16. 毒气弹									20000		20000		
17. 飞机*	10		10				15				35		
18. 马	3000										3000		
19. 马鞍	3000										3000		

核对无误:斯莫连采夫

打印 4 份：

第 1 份送斯大林同志

第 2 份送温施利赫特同志

第 3 份送加拉罕同志

第 4 份归中国委员会存档。

全宗 17，目录 84，卷宗 1074，第 10—14 页。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

184

斯莫连采夫给加拉罕的信

1925 年 9 月 30 日于莫斯科

绝密

由本人签收

致外交人民委员部加拉罕同志

敬爱的同志：

现送上 9 月 28 日〔中国〕委员会记录、给政治局报告副本及有关武器装备的两张图表和一张标明省界的中国新地图（遗憾的是未能用布将它裱起来）^①。

从中国收到的邮件（您可能收到了副本）中有拉宾关于我们在华工作的损失的长篇原则性报告^②。如果您未收到此件，想了解

① 参见第 180、183 号文件。中国地图没有找到。

② 指 А·Я·拉宾的书面报告《对我们在所谓中国国民军中工作的基本方针的评估》。拉宾是驻华北的苏联军事顾问——译者。

或作出反应的话，请来电话。有关对它的评论的电报已经发出。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签字)

副本核对无误

全宗 17，目录 84，卷宗 1074，第 5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185

博尔特诺夫斯基给瓦西里耶夫的信

1925 年 10 月 1 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瓦西里耶夫同志

本人奉温施利赫特同志之命就您第 626 号文件^①通知如下：他对您发来的指示的基本原则没有异议。温施利赫特同志只指出，希望从不断变化的形势（反动派进攻、驱散工会等）中得出更具体的指示。

关于把发来的指示提交中国委员会讨论的问题应当征得委员会其他成员的同意，请告知您的意见。

中国委员会秘书 博尔特诺夫斯基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47，第 34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参见第 182 号文件。

186

瓦西里耶夫给维经斯基的信

1925年10月2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同志：

最近从您那遥远的地区传到各方的消息引出许多大问题和同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的疑问,怀疑一切是否在正常运转。出现了互不理解的直接危险。我们俄国管委会的最近一次会议^①没有给我们提供机会,为这份邮件起草一个经各有关单位同意的正式指示。这是很令人懊丧的,但毫无办法。我们在哪几点上产生了问题和疑问呢?

第一,关于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

您8月19日的来信^②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无产阶级是领导者,农民、知识分子、中小资产阶级是基础,是中介。应当怎样理解这一点呢?这难道不是同我们的观点直接相悖,明显重复了中国同志的左倾观点吗?根据您同一封信的另一处,当然是与其余文字无关的一处判断,似乎不是。您写道,中国工商资产阶级的一个相当大的阶层还完全保持着在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中的革命积极性。如果这是对的,那就不能说农民、知识分子等是无产阶级组织革命行动的中介。如果说这是对的,那么我们以前对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指示就应当仍然有效:党团不应发号施令,也不应争取只由共产党人来占据国家和军队的一切负责

^① 看来,说的是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

^② 参见第164号文件。

职位,相反,应当吸收国民党的非共产党人士(首先是非党左派)等参加民族解放斗争方面的负责工作。

倘若这一切都不对,那为什么我们直到现在还完全没有接到通知,尽管这里说的是整个方针的根本改变?您在信中提出了改变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认为,我们这里不预先提出这个问题,中国同志就不可能改变方针,更不可能使自己渐渐地、不知不觉地迷恋于这一新的方针。这可能有很大的危险。我们觉得,广州就走在这条道路上,它在不停地拆毁连结共产党先锋队与民主群众的各种桥梁,要完全孤立中国共产党,并带来由此而产生的各种致命的后果。例如,胡汉民事件^①以及随后强行撤销国民党活动家的职务,解除许崇智的武装等都是我们绝对无法理解的。我们根据主席^②的建议电告^③您,要您务必亲自前往广州,或派一位完全可靠的人去那里。但没有得到答复。我们收到鲍罗廷发来的每一条新消息,都得到了新的证据,证明广州因左倾而在陷入孤立和毁灭,尽管鲍罗廷用当时不可避免的情况来解释每天的局势。我们绝对需要尽快得到有关广州的最详细的通报。我们再一次建议您(或派一位完全可靠的人)去广州,再说一遍,请您赶紧告诉我们您对以前作出的关于民族解放统一战线的指示的态度,您对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具体想法等等。

我们所有这些问题的意义由于反动派开始进攻而加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提出了哪些对付反动派进攻的措施呢?我们的同志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工人经济斗争任务上,从而使工人群众和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其他民主阶层离开了坚决反击反动派的任务,并使这些任务本身显得黯然失色、退居到辅助性宣传手

① 指胡汉民的苏联之行。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

③ 给维经斯基的电报没有找到。

段的次要地位，这没有危险吗？我们认为，现在应当把同反动派的斗争任务摆在首位，应当围绕这些任务来大力动员国内的一切革命和民主力量。广州应当站在反对反动派、反对张作霖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前列。

现在谈谈关于扩大运动的第二类问题。重视工会是很好的。开展经济斗争，作为对组织工作的刺激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能把上海罢工问题作为经常起作用的革命刺激剂提出来。这是让人无法理解的提法。另一方面，占人口 9/10 的农民到哪里去了呢？不知为什么从中国寄给我们的所有文件中完全没有考虑到农民这一运动中的决定性社会力量，没有制定中国农村工作的任何方针。运动仍然只局限于最大的无产阶级中心城市。应当占领各省。应当尽可能广泛地占领农村。为此应当派出常驻的工作人员。应当通过工会利用非党工人，就像 1917 年彼得堡工厂委员会所作的那样，派成千上万非党工人把苏维埃政权的思想传遍到穷乡僻壤。在中国，正是这些工人会去传播消灭张作霖、民族解放、民主改革等思想的。无论如何应当加强北方的工作。不知怎么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建立国民党中央满洲局(中共中央也有相应的代表机构)的想法。延吉问题也是这样摆着，这个问题我们将单独来谈。

我们对您筹办农民小册子以及农民口号等的事情非常感兴趣。请赶紧寄给我们。哪怕手稿也行。

还有第三个大问题——关于太平洋工人会议的问题。现在我们较为确切地知道，这件事表面上是操在国际联盟劳工局的手中，铃鹿^①拥有该系统的委任状。这一情况便于我们进行对抗运动。仔细想想，应当尽快开始进行这一运动。等待您就此紧急作出具体通报，因为这个问题的具体提出一定要征得上级机关的同意。

^① 铃鹿文三 (1885—1946)，日本工会运动活动家。

第四，朝鲜和日本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一无所知。工人党的情况怎么样？为落实总部^①的决定，有哪些具体指示是协商一致的？务必填补这个情报空白，您从自己方面来说也应当尽快通报情况。关于这个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从您那里获得只言片语。关于朝鲜也一样：我们一直在等待、等待再等待。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山大学需要懂俄语的领导人，不少于15人。否则，简直开不了张。需要尽快解决。我们已经通知您，我们管委会的例行会议定于11月最后几天召开，我们仍坚持您必须参加。

又有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训练班的5名法国人离去。

瓦西里耶夫

全宗514，目录1，卷宗123，第115—118页。

打字稿，亲笔改过的原件，亲笔签字。

^①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

187

斯莫连采夫对向人民军和广州 提供物质支援计划的说明^①

1925年10月7日于莫斯科

绝密

对向人民军和广州提供 物质支援计划的说明^②

1. 支援人民军集团和特别是冯玉祥集团武器装备的基本计划是考虑到下列基本情况制定的：张作霖同人民军之间的冲突仍然不可避免，但这种冲突可能发生的时间会拖延到明年春天。

2. 河南省最近的事件，即第二人民军（指国民军第二军——译者）的将领樊钟秀、张之江等人在国民党人（原顾问胡景翼、于右任和刘郁芬）的思想指导下，试图占领山西省，然后抛弃岳维峻的事件表明：冲突可能因直接内部纠葛和人民军本身的主动挑起而加速发生。

3. 张作霖和人民军集团目前的力量对比，正如图表1^③所示，远远不利于人民军。

由于自己的兵工厂生产率低下，从邻近省份的兵工厂（湖北

① П·И·斯莫连采夫1925年10月7日在给加拉罕寄这个说明时写道，这个文件是为И·С·温施利赫特起草的，目的是将计划提交上级机关时有所依据（全宗17，目录84，卷宗1074，第15页）。

② 在文件上注明：由特别信使凭亲笔签字收条交加拉罕同志。

③ 图表没有找到。

汉阳兵工厂)运进的可靠性不大,并且同沿海联系隔绝,供应武器弹药的条件也不利于人民军。唯一可靠的供给线是库伦至张家口的交通线。

在组织方面,张作霖的军队要略高一筹,但是我们的教官所进行的工作,特别是在冯玉祥那里进展顺利,人民军的这个不足将会得到克服。在军队的战术训练、人员和指挥人员的素质方面,敌对双方的力量几乎处在同一条件下。

4. 同张作霖比较,人民军的主要不足是武器装备差;需要大量步枪、子弹、机枪、炮、炮弹、飞机、骑兵和化学武器。

5. 中国委员会通过的支援人民军的计划,考虑到了人民军对武器装备的最大订货数额和我们的可能性。预定给人民军调拨的武器数量是:带子弹的步枪 52500 支、带附件和子弹的机枪 270 挺、带炮弹和附件的炮 78 门、飞机 20 架、毒气弹 2 万枚(广州不在该统计数之内,下面还将谈到)。尽管没有完全满足人民军的需要,但这些武器足以使人民军强大到在同张作霖的斗争中有取胜的可能。

人民军与张作霖的力量对比在这种情况下如图表 2 所示。

6. 考虑到同张作霖作斗争的主要压力落在冯玉祥肩上,冯玉祥与其他人民军的协同行动存在着问题,计划规定要大力加强冯玉祥,即:使其部队人数达到 10 万,组成 15 个师团(每个师团 6500 人),组建一支 5000 人的骑兵部队,加强其空军和化学作战手段。国际部队也要为同一目的即加强冯玉祥服务。

这就要求我们提供下列数量的武器支援:3 万支带子弹的步枪、160 挺带子弹和附件的机枪(每支步枪配子弹 1000 发,每挺机枪配子弹 5 万发)、带炮弹(每门 1000 发)和附件的炮 54 门、掷弹炮 54 门、毒气弹 15000 枚、飞机 10 架。

张作霖和冯玉祥的力量对比如图表 3 和 4 所示。

7. 在第一和第三人民军(指国民军第一、第三军,下同——

译者)的对比关系中,计划首先考虑了张之江的3000支带子弹的步枪、50挺带子弹和附件的机枪、12门带炮弹的炮和18门掷弹炮的订货(已正在完成订货)。

当前对岳维峻的必要支援确定为步枪4500支、机枪10挺、子弹500万发、飞机10架,这种援助具有较大的政治性质,旨在给我们教官的工作创造有利的局面。现在什么也不给孙岳调拨,因为同他没有固定联系。

计划规定储备步枪15000支、机枪50挺、子弹1750万发、带炮弹的炮12门、带炮弹的掷弹炮50门。这些储备将被用来迅速加强第二和第三人民军,一旦这样做对我们有利的話。

8. 至于广州,计划规定必须建立新的黄埔军队,使黄埔军队的人数达到25000人,加强空军和技术作战手段。打算给广州调拨步枪15000支、机枪100挺、子弹2000万发、带炮弹的炮24门、带炮弹的掷弹炮50门、飞机15架。

现时黄埔军队的人数约为6000人。

广州面临的任务是:(1)彻底消灭该省境内的一切敌对军阀集团;(2)使全省统一起来,财政掌握在政府手中;(3)确保自己不受北方的攻击。

要使黄埔军队的人数达到25000人,组成改组后的政府军的坚强核心,不仅能完全胜任上述任务,而且能扩大自己对邻近省份的影响。将财政集中在政府手中,广州政府则能够偿还我们的债务。

附录:4个图表(图表1、2、3、4)。

打印3份:

第1份送温施利赫特同志

第2份送加拉罕同志

第3份归委员会存档。

全宗 17, 目录 84, 卷宗 1074, 第 16—18 页。
打字稿, 原件, 无签字。

188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 调整驻华教官工作条件专门 委员会会议记录

1925 年 10 月 9 日于莫斯科

绝密

调整驻华教官工作条件专门委员会会议记录^①

出席：别尔津、格里博夫、博尔特诺夫斯基同志。

听取：1. 关于在中国任职的期限。

决定：1. 认为在中国任职一年半（不算路途）为正常期限。

听取：2. 关于休假。

决定：2. 给予在中国的每个工作人员在中国境内逗留一年休假一个月的权利。

返回俄罗斯后给予 6 周时间的休假。

①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书记博尔特诺夫斯基于 1925 年 10 月 12 日给加拉罕的附信中写道：“温施利赫特同志对第 4 条后半部分关于发给工作人员家庭每个成员（但不得多于两名成员）半数薪金的条款表示反对，这个问题可依据总的职工工资问题的解决来解决。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请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系统内下达指示，征集有关我们工作人员在中国各地的生活条件的材料。记录将提交中国委员会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批准。”（全宗 17, 目录 84, 卷宗 1074, 第 19 页）。

听取：3. 关于在中国工作期间的任职和职务升迁的手续。

决定：3. (1) 在中国每任职一年算正常任职两年。

(2) 返回后职务的升迁不取决于在中国担任的职务。

(3) 返回后的任命由鉴定委员会根据组长、中心领导人和政治机关的评语作出相应结论后进行。无论如何，任命不应低于前往中国以前所担任的职务，红军法规规定应受指责的情况除外。

听取：4. 关于改善物质状况。

决定：4. 在收到有关生活条件的详细材料和同外交人民委员会协商这个问题之前，工作人员薪金保持原有数额。

认为除了薪金以外发给有家眷的工作人员每个不工作和带在身边的家庭成员半数工薪是合适的，但不得超过一份，即两名家庭成员的工薪。

听取：5. 关于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外出时的货币补偿。

决定：5. (1) 工作人员外出根据现有结算办法进行货币补偿。

(2) 不超过两名家庭成员的家属外出费用从国库支付，在本国境内支付三等车船费，在中国境内支付二等车船费。

(3) 在中国境内乘车船出差，按现有规章发给车船费和差旅费。

(4) 工作人员从中国返回时，补助相当于一个月工薪的安家费。

听取：6. 关于医疗费用。

决定：6. 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在中国期间的医疗费用由国库负担。

听取：7. 关于留在俄国的家属的补贴问题。

决定：7. 由于这个问题原则上由领导机关来决定，委员会不认为有改变的可能。

主席 博尔特诺夫斯基
核对无误：斯莫连采夫

全宗 17, 目录 84, 卷宗 1074, 第 20、21 页。
打字稿, 经过核对的副本。

189

伏龙芝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提出的关于中国军事政治形势的报告

1925 年 10 月 13 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中国军事政治集团的现状、国民革命军而首先是冯玉祥军队的逐步加强、张作霖势力在日本人帮助下的不断巩固和吴佩孚政治积极性的高涨, 必然导致武装冲突。

我们估计, 发生冲突的时间大约在 1926 年春, 也可能由于出乎意料的内部麻烦或帝国主义的影响, 这个时间会更临近。在前一种情况下, 这场冲突将由国民革命军的发展意识或者张作霖对这种发展的恐惧而引起的。上个月, 第二人民军打算占领山西省, 差一点导致总冲突, 这就是例子。在第二种情况下, 可能是英美帝国主义者鉴于行将举行关税会议, 试图重演伴随华盛顿会议发生的事件, 也就是试图通过国内的武装斗争削弱日本的影响。最近来自中国的报道, 恰恰形成了这种看法。报道谈到吴佩孚的活跃和他建议冯玉祥共同反对段祺瑞和张作霖。

冯玉祥军队的目前状况不能保证他一旦同张作霖发生冲突能够取胜。我们在第二、第三人民军中影响的扩大和他们同冯玉祥

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向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援助。广州力量的进一步加强可以保证一旦发生冲突时南方各省保持中立，也可能有助于巩固广州政府在南方一些省份的影响。

中国委员会 1925 年 9 月 30 日向政治局提出的对人民军的第 031334/C 号^①物质支援计划，我来后已看过，这个计划正是根据对形势的这种估计和实际需要提出的，满足这些实际需要可以加大人民军在进行将来的冲突中取胜的可能性。

我同意中国委员会的这些建议，完全支持这些建议，请政治局尽快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伏龙芝

核对无误：特殊使命执行人（琴布罗夫斯基）

全宗 17，目录 84，卷宗 1074，第 22、23 页。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

190

瓦西里耶夫给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5 年 10 月 14 日于莫斯科

绝密

敬爱的季诺维也夫同志：

所附维经斯基同志的信表明，我们对错误的政治方针的担心是合乎实际的^②。维经斯基同志现在看到了所有这些危险，因此，

^① 见第 183 号文件。

^② 见第 181 号文件。

可以不那么担心了，但是很显然，党内和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有一种倾向，应当与之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我认为，这里需要我们采取强硬的路线。

维经斯基同志指责东方部忘记了农民，我不能接受。我在7月份写的第一个共产国际文件就是给维经斯基同志的信，其中谈了农民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和中国共产党在农民中的工作任务^①。从7月开始，我们一个月内两次敦促维经斯基，争取共产党最终开始做农民工作。

关于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问题仍然不清楚。我们在等待更详细的材料。

瓦西里耶夫

又及：提纲^② 将于明天寄出（作为对维经斯基同志的信的补充）。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54，第 57 页。

打字稿，原件，又及和签字为亲笔字。

① 瓦西里耶夫给维经斯基的信没有找到。关于农民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问题在 1925 年 7 月 6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就提出来了（参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俄文版第 53—57 页）。

② 提纲没有找到。

19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3号记录 (摘 录)

1925年10月15日于莫斯科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3号 (特字第65号)记录

听取：2.——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关于中国和中国委员会的问题。(政治局1925年10月1日会议第81号记录，决定：1——〔1〕)(报告人加拉罕、温施利赫特、李维诺夫同志)。

决定：2.——〔1〕(1)基本上赞同中国委员会的建议^①。

(2)责成中国委员会：①再次研究支出预算，②将国际部队的拨款从预算中排除，③探讨利用车臣、印古什和奥塞梯没收的部分步枪转交中国的可能性，④在研究枪支分配问题时要考虑由冯玉祥转给广州较大部分的必要性。

(3)让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参加中国委员会。

(4)委员会意见一致时，其决定就算是最后决定。

(5)责成加拉罕同志以书面形式提出关于中国的总报告。

抄送：

^① 参见第180、182号文件。

加拉罕同志——全部；
 温施利赫特同志——全部；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3)。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2，第 179、180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92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中国委员会会议第 13 号记录

1925 年 10 月 19 日于莫斯科

绝密

中国委员会会议第 13 号记录

出席：温施利赫特、加拉罕、布勃诺夫、彼得罗夫、瓦西里耶夫、隆格瓦、别尔津、梅利尼科夫、博尔特诺夫斯基和 B 同志^①。

听取：1. 关于在海参崴为广州修船问题（报告人：隆格瓦同志）。

决定：1. 原则上同意，责成隆格瓦同志弄清细节和费用。

听取：2. 关于派军舰去广州问题。

决定：2. 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军舰护送下方能向广州

① B 系何人不详。

运送武器。请求政治局允许以护送名义使用军舰。

听取：3. 关于高等院校补充接收 6 名中国人问题。

决定：3. 接收 3 名中国人到军事院校，3 名到地方院校。认为在本学年不经事先特别协商，不能再接收新的学生。

听取：4. 温施利赫特同志关于给冯玉祥运送武器的通报。

决定：4. 备案待查。

听取：5. 关于中国局势的通报（报告人：加拉罕、隆格瓦同志）。

决定：5. 备案待查。

听取：6. 关于援助冯玉祥等人武器弹药和开支预算的报告。

决定：6. (1) 减少 1925 年 9 月 23 日会议上（会议第 11 号记录^①）拟定的给冯玉祥的武器弹药数量。步枪减至 2.5 万支，机枪减至 140 挺，火炮减至 42 门，子弹和炮弹数量与步枪、机枪和火炮数量相适应。军刀 5000 把、飞机 6 架。其余器材数量不变。

(2) 给岳维峻的武器弹药，将步枪数量减至 3500 支，子弹数量也相应减少，机枪数量仍为 10 挺。

(3) 为张之江^② 的订货拨款 70 万卢布。

(4) 鉴于目前无法提供武器，派往广州的飞机数量减至 12 架。拒绝拨给坦克和装甲车的请求。

(5) 保留价值为 200 万卢布的武器弹药作为储备。

这样一来，总额为 20557136 卢布 12 戈比的武器支援总预算减为 5115551 卢布 54 戈比。

(6) 请求政治局批准由财政人民委员部预算外补偿总额为 15441584 卢布 54 戈比的拟拨武器价值，因为军事部门把这笔费用纳入自己的预算，会给红军造成很大损失。

(7) 认为中国的事态发展要求立即起运拟定提供的武器。

^① 见第 177 号文件。

^② 时任察哈尔军司令——译者。

听取：7. 关于拨款 5.2 万卢布用于补派工作人员和 137.4 万卢布用于设立教官机构和坚持这半年的军事政治工作的报告。

决定：7. 再次确认这些款项是上述项目的实际费用，请政治局紧急提供相应贷款。

听取：8. 关于拨款 140 万卢布组建中国部队问题。

决定：8. 既然组建中国部队问题已不存在，撤销上述拨款请求。

听取：9. 关于拨款 7000 卢布用于派遣 23 名朝鲜人问题。

决定：9. 从中国意外开支的款项中拨 7000 卢布。

听取：10. 关于尽快向冯玉祥发送 6 架飞机问题。

决定：10. 原预定给广州的由 6 架飞机组成的第一中队，鉴于近期不可能向那里发送，改派给冯玉祥。责成空军总司令加紧发送。

听取：11. 关于派遣有作战经验的骑兵加强冯玉祥骑兵队的问题。

决定：11. 给冯玉祥骑兵队补充 5 名有长期作战经验的骑兵，派遣费用从中国款项中拨出。

听取：12. 关于给冯玉祥拨出一定金额^①的防毒面具等器材的报告。

决定：12. 用储备金拨出。

听取：13. 关于扩大驻华领事团和加强情报工作措施问题。

决定：13. 责成由梅利尼科夫、隆格瓦和别尔津组成的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并向下次会议提出报告。

14. 其余问题从议程上撤消。

主席

秘书

^① 具体数额未说明。

本记录印发 5 份。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 会议第 13 号记录附录

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

1. 孙传芳的出动和同占据沪宁地区的张作霖军队交战的开始，大大加剧了紧张局势，甚至在最近几周很容易引发以直隶人和人民军为一方向以张作霖为另一方的总冲突。

2. 孙传芳的出动是否是同人民军达成协议和制定共同计划的结果，我们不清楚。至少这次行动是有准备的，之前同第一和第二人民军进行了谈判。而且直隶人是促使发生冲突的一方，他们认为，总的形势为战胜张作霖提供了机会。包括岳维峻的顾问刘郁芬和于右任在内的国民党人，对形势也作出了这种估计。冯玉祥不止一次地提出这样的看法：一旦发生冲突，孙传芳将站在他一边。岳维峻现在指望同湖北联合。

3. 在人民军和直隶人一起出动的情况下，力量对比会发生有利于反奉集团的急剧变化。虽然张作霖在武器和技术装备方面保持着一定的优势，但军队数量基本相同，而在政治上，所有优势都在张的敌人方面。张的战略地位也大大恶化了。沿京津沪铁路线集结和驻守江苏、安徽、山东等省，可能带来一些危险，也就是张陷入南方战役后，可能会有遭到冯的打击，失去同满洲交通联系的危险。

张作霖军队的内部状况是：士兵开小差，多次哗变，将领之间意见不一致，张宗昌和李景林想独立，奉天人所占省份的部队不可靠，这些情况使张作霖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很难同冯玉祥速战速决，因为后者可以回避冲突，边战边向西撤。

4. 反奉力量的状况,虽说有一些有利因素,但也有一系列消极方面,对于人民军来说尤其是这样。它们没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物质基础和共同的政治纲领。如果说有协议,也不是很牢固的。例如,不排除孙传芳在一定条件下满足于占据江苏。总的来说,难以说明直隶人的力量和近期任务。迄今为止还不清楚,他们是否积极参与湖南、江西和福建三省的冲突和这种参与将表现在什么方面。

在第二人民军中正在进行一场争权斗争,虽然是悄悄进行的,但一直持续不断。第三人民军的物质条件很艰苦。在物资保障方面,三个人民军都很糟糕。张作霖即使失去不可靠的部队和省份,他也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对手。

5. 沪宁地区冲突对张作霖是不利的。如果可以把放弃上海看作是战略手腕,那么南京附近的战斗、江苏省几个师转到孙传芳方面还不是军事上的严重失败,而是政治上的严重失败。

结 论

在正在扩大的事态中,人民军的任务应当是:

不急于参与冲突,但要加紧作好准备;

敦促直隶人采取行动,以迫使张作霖把大量兵力投放在南方;通过派遣代表同直隶人司令部建立联系;加强对张作霖军队的瓦解工作,派自己的人到直隶人军队中做政治工作;加强在张作霖后方及其交通线上的活动;

想办法同张宗昌、李景林和其他将领建立联系,使他们离开张作霖;

在我们提供援助方面,要加强和加快提供这方面的援助,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提供机枪、火炮和空中支援上;

我们教官的工作应当是更强有力的,不过要渐渐转到建立黄埔类型的学校和部队上;

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事政治工作。

广 州

广州的局势可以认为是稳定的。陈炯明对汕头的占领、熊克武的进犯和邓本殷在南方的行动，虽然构成了威胁，但在现有形势下，力量对比有利于广州政府。

广州不可能参与总的冲突。

对于广州来说，相当大的威胁可能是政治上的孤立。这是由最近的一些事件，特别是逮捕行动引起的，就是在人民军中也在谈论“红色布尔什维克的威胁”。

广州的近期任务是：在本省内做内部巩固工作，击溃陈炯明，改组军队。

必须利用直隶军与人民军之间建立的联系，对福建省施加影响，争取福建放弃对陈炯明的支持。

按中国委员会拟定的规模向广州提供援助。

隆格瓦

全宗 17，目录 84，卷宗 1074，第 27—32 页。

打字稿，原件，无委员会主席签字，隆格瓦的签字为亲笔签字。

19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关于在中国开设 新领事馆的建议

不早于1925年10月19日^①于莫斯科

专门委员会关于在 中国开设新领事馆问题的建议

专门委员会在研究关于在中国开设新领事馆的问题后，考虑到中国派别集团极为分散和在这些派别中进行工作的必要性，提出在中国设立新领事馆的下列方案：

1. 山西省——太原市
2. 陕西省——西安市
3. 河南省——开封市
4. 山东省——济南市
5. 四川省——成都市和重庆市
6. 浙江省——杭州市
7. 江西省——南昌市
8. 湖南省——长沙市

^① 日期根据第192号文件确定。

9. 贵州省——贵阳市
10. 云南省——昆明市^①
11. 广西省——桂林市
12. 福建省——福州市
13. 广东省——汕头市和高州市^②
14. 吉林省——吉林市和长春市

必须在今后6个月内开设这些领事馆,而且可能分两期开设:第一期前3个月在开封、济南、杭州、福州、汕头、成都、奥南^③、长沙、桂林等市设立9个领事馆,第二期再在其他各点开设。

这些领事馆因为主要是追求情报侦察目的,可能以领事、秘书和翻译三人的起码编制为限。

根据外交人民委员部现在的经验,每个这样的领事馆一年要花费12200—16000美元。

大致预算

在中国,一个三人(领事、秘书、翻译)编制的领事馆的经费。

工资:(领事——3个工资系数、秘书——1.75个、翻译——1.25个,最低限度65美元)。

总共5460美元

社会保险——164美元

办公用品——460美元

取暖——300美元

照明——350美元

安置费——1500—3000美元

① 原文如此。
② 可能是潮州市——译者。
③ 原文如此。

交通费——	250 美元
邮电开支——	600—1200 美元
其他总务费用（雇用女仆、购买用具、维修、清扫等）——	
3000—3500 美元	
代表费用——	600—1200 美元
特别费用——	600—1200 美元

共计：12194—15994 美元

全宗 17，目录 84，卷宗 1074，第 24—26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194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84 号记录 （摘 录）

1925 年 10 月 22 日于莫斯科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84 号 （特字第 66 号）记录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加拉罕、温施利赫特和李维诺夫同志）。

决定：1. —〔1〕（1）采纳中国委员会关于为中国拨款 15441584 卢布 58 戈比的建议：①根据技术能力，按照中国委员会预先的考

虑，在最短期内向中国提供武器；②由军事部门通过向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军事工业管理总局重新订货和动用裁军后在北高加索保存的完好步枪储备补上拨出的武器。由军事部门支付给军事工业管理总局新的订货费用，支付日期由加拉罕、温施利赫特和雷因格尔特具体商定。③批准拨款 5.2 万卢布用于增派工作人员。

(2) 关于拨款 137.4 万卢布用于支付教官机构生活费用和坚持军事政治工作的问题，交回中国委员会审议。

(3) 批准叶戈罗夫同志为驻华武官，召回沃罗宁同志。

(4) 责成组织局提出武官叶戈罗夫同志助手的人选，以取代沃罗宁同志，提出派给冯玉祥的财政、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顾问人选。

(5) 拨给孙传芳德国型号子弹 100 万发，条件是在他管辖的地区工人运动合法化，运送子弹严格保守秘密，排除发生任何非难苏联政府事件的可能性。

抄送：

加拉罕同志——全部；

温施利赫特同志——全部；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1)；②③；

科兹洛夫同志——(3)(4)；

组织局——(3)(4)；

叶戈罗夫同志——(3)；

加拉罕同志——(5)；

温施利赫特同志——(5)；

修改后的决定(4)抄送：

加拉罕同志；

温施利赫特同志；

组织局；

科兹洛夫同志。

6. IV 决定：1—〔1〕—(1) ①②抄送：

阿万涅索夫和布留哈诺夫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2，第 181、182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95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中国委员会会议第 14 号记录

1925 年 10 月 26 日于莫斯科

绝密

中国委员会会议第 14 号记录

出席：温施利赫特、加拉罕、索柯里尼柯夫、莫洛托夫、彼得罗夫、梅利尼科夫、叶戈罗夫、隆格瓦、博尔特诺夫斯基。

听取：1. 加拉罕和隆格瓦的情况通报。

决定：1. 备案待查。

听取：2. 关于派军舰去广州的问题。

决定：2. 〔1〕询问广州派军舰是否合适。

〔2〕弄清中国舰队是否会阻拦。

听取：3. 关于派遣在军政训练班结业朝鲜人问题。

决定：3. 〔1〕认真审查政治上的可靠程度。

(2) 把所有人交由北京中心调用,说明在冯玉祥军队中使用(炮兵、骑兵等)专家的必要性,其余人员视情况而定。

(3) 派出期限与加拉罕同志协商。

听取: 4. 专门委员会关于调整教官工作条件的报告。

决定: 4. 批准专门委员会的建议,并作如下修改:

(1) 第1条,在华正常工作期限为两年。

(2) 第4条,薪金数额不变,不同意专门委员会关于在薪金之外给家属发一半补贴的建议。

(3) 第5条,家属旅费、安家费以及在中国出差问题,由专门委员会在财政人民委员部参加的情况下,与军事政治工作经费预算一起研究。

听取: 5. 关于军事政治工作经费预算问题。

决定: 5. 责成由隆格瓦、雷因格尔德^①和普特纳^②同志审查预算,协商后提交委员会批准。

向财政人民委员部预支30万卢布预算款。

责成该专门委员会审查用于确定订货执行期限和定货费用的物资预算。

听取: 6. 关于翻译学校问题。

决定: 6. 认为需要在莫斯科建立一所100人的翻译学校,其预算由按前项指定的专门委员会同财政人民委员部协商。

听取: 7. 关于拨给孙传芳200万发步枪子弹问题。

决定: 7. 紧急向海参崴仓库调拨200万发德国子弹。转交时要执行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要求。

听取: 8. 关于委员会原有决定的执行问题。

决定: 8. 要求相应机关提出并向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提交以下问题的有关材料: (1) 关于在中国建立电讯社问题; (2) 关于

① И·И·雷因格尔德,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司长——译者。

② В·К·普特纳职务不详。

空中航线问题；(3) 关于蒙古运输公司问题。

主席

秘书(签字)

副本核对无误。

全宗 17, 目录 84, 卷宗 1074, 第 34、35 页。

打字稿, 经过核对的副本。

196

陈独秀给中共莫斯科区委的信

1925 年 10 月 28 日于上海

绝密

中共莫斯科区委：

派去 24 名中国共产党党员，67 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和 12 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兼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共计 103 人到中山大学学习。他们到达莫斯科后应加入区委。

旅行期间，中央指定以下同志为领导人：俞秀松同志（临时委员会书记）、胡彦彬同志、刘铭勋同志、朱务善同志和张琴秋同志。

这些同志将在中山大学学习，同你们编在一个区委。中山大学要成立支部。

我们指定下列同志为中山大学学生中的领导人：

俞秀松、张琴秋、朱务善、刘铭勋、陶淮、董亦湘、李沛泽、郑子瑜共计 8 人。你们还要指定两人，所以共计 10 人，他们将领

导学生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 陈(独秀)

(雅诺夫斯基^①译)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155, 第 3 页。

打字稿, 原件, 雅诺夫斯基亲笔签字。

197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86 号记录

(摘 录)

1925 年 10 月 29 日于莫斯科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86 号(特字^②)记录

听取: 8.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

[3]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加拉罕、李维诺夫同志)。

决定: [3] (1) 建议加拉罕同志尽快去北京。

(2) 基本上采纳伏龙芝同志的建议, 作为政治指示下达给加拉罕同志(见附录二)。

(3) 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问题暂缓解决。

① 即袁庆云。

② 原文未标号数。

(4) 鉴于需要加强中国的总的政治工作，责成组织局提出向中国派遣政工人员的候选人。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政治局会议第 86 号记录，决定：8—〔3〕 附录二

伏龙芝的信摘录：

最近来自中国的所有材料都使我确信，我们驻华工作人员，对于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没有坚定而明确的方针。同加拉罕的两次谈话（后一次是在昨天进行的）表明，他也没有固定的方针。然而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要地位。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像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人民军以及冯玉祥的作用和意义在渐渐消失。人民军、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等有必要同吴佩孚建立固定的关系，这是整个形势决定的。在中国现时政府方面也一样。在这方面继续迟缓、动摇和犹豫不决，会日益削弱那些同情我们的团体的地位。我所说的指示，应当明确这些问题，并提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计划。我个人认为这个指示的基本点如下：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主要敌人依然是张作霖。现阶段国内战争的任务，应该是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彻底打垮张作霖。吴佩孚的行动能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须加以利用^①。人民军应当采取行动，但要通过相应的政治工作做好准备。政治工作范围要大，其任务是强调作为民族解放思想最彻底最可靠的捍卫者的国民党和人民军的作用，并将其提到首要地位。人民军的军事行动要安排在能够保证给予张作霖以决定性打击和能够保证冯玉祥及其他国民党军阀实际控制最重要地理位置的时候。这种地理位置，我认为首先是包括天津在内的直隶全省，然后是热河和北满（黑龙江省）。

^① 可能指任命吴佩孚为反对张作霖的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吴佩孚关于有 18 个省支持他的声明。

此外，将来取得成功的时候，要采取果断措施，让国民党追随者占领可以保证北方同广州（以及四川、贵州、广西等省）的联系的交通线。直隶作为中心省的意义是很清楚的。至于热河和黑龙江，为了巩固我们在中东铁路上的地位和加强同中国的经济政治联系，需要国民党追随者固守在这里。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在新政府的人员构成上，要有直隶人，北方国民党人（冯玉祥）和华南（广州政府）的代表。因为这种联合不可能有什么牢固性可言，所以在进行现阶段的战争和成立新政府的时候，必须从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必然要继续进行战争的思想出发。不过这时已经是同吴佩孚及其追随者的战争。战胜张作霖之后的“分赃”和政治工作方针，都不应忽视这一点。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上海，在那里必须坚决把工人武装起来，作为确保在上海建立革命人民政权的一种手段。我认为，提出把上海和一定地区从江苏省分离出来建立自由城的思想是适当的。这样才会有很大把握使上海变成中国真正的革命运动中心。

关于深入开展广州的工作、扩大国民党对整个中国的影响范围，扩大和深入开展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等的原有指示，依然有效，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核对无误：切丘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2，第 184、185、188—190 页。

打字稿，记录原件，斯大林的签字为真迹复制，附录是经过核对的副本。

198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8号记录 (摘 录)

1925年11月5日于莫斯科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88号(特字第68号)记录

听取：〔6〕，库比亚克同志的通报(报告人李维诺夫、加拉罕、温施利赫特同志)。

决定：〔6〕(1)给库比亚克同志发以下电报：

“政治局建议，您在接到莫斯科的指示之前，在招募中国人方面不要给吴佩孚的将领们以任何帮助。正在澄清有关国民党将军的问题。结果将通报给您。”

(2)通知索洛维约夫和维经斯基同志，他们的电报^①不能令政治局满意，因为不明确，建议他们紧急通报冯玉祥的真实立场。

抄送：

加拉罕同志——全部；

库比亚克同志——用密码告知(1)。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① 该电报没有找到。

全宗 17, 目录 162, 卷宗 2, 第 191 页。

打字稿, 原件, 签字为真迹复制。

199

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 (摘 录)

1925 年 11 月 11 日于北京

亲爱的同志们:

在今天的电报中,我向你们报告了张家口军政会议的结果,这次会议是根据冯玉祥的提议召开的^①。人民军的两名将军代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三名代表和我们两人^②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一方面是最近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对冯及其周围的人的影响增大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完全是由人民军与奉天人之间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的军事形势决定的。

冯第一次召开这种会议,看来,大家都认为这次会议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无论徐谦(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北方委员兼冯玉祥政治顾问),还是刘骥(第一人民军参谋长)都提出了具体而迫切的政治军事问题,没有玩弄特别的外交手腕,提出了所有急待解决的问题和矛盾。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冯对我的邀请是把我作为我们机关的代表正式向我提出的。当然,会议是绝对保密的,除冯和政治委员会之外,谁也不知道这次会议。

^① 电报没有找到。

^② 除维经斯基外,苏联驻华北军事顾问团领导人 H·M·沃罗宁参加了会议。

在军事问题上，我们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参谋长阐述的作战计划得到了委员会的赞同。在这里我不谈这个作战计划。沃罗宁同志今天用电报发去了计划的大纲，而详细内容，可能将在报告中说明^①。

至于政治问题，我们已经作出一些决定，总的来说，同两周前我们通过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提出的那些原则相一致，你们可以根据我的电报了解这些决定^②。

在这里我简要地列述如下：

1. 人民军在其活动区域内外进行政治工作，说明目前斗争的意义。

2. 人民军始终要从政治上来实现它们同直隶盟军的军事联系，在孙传芳和肖耀南需要人民军援助时，坚持要求直隶盟军向社会团体和工人组织作出让步。

3. 无论是为了结束同奉天人的斗争，还是为了召开全国国民会议，人民军领袖们都应该主张建立临时联合政府或执政内阁。

4. 人民军应建立庞大宣传鼓动机构，以便在前线，在人民军后方和在敌后广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

主要决定大致就是这些。当然，这些决定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很难说，因为一切都取决于国民党人和我们对冯的影响程度。不过，至少人民军领袖们作出这些决定的明确思路，在最近几周肯定是可以实现的，我们将在士兵群众和社会各界中宣传这些原则。

在军政委员会中，就上面列数的每一点都充分交换了意见。国民党人理解政治工作对于人民军的意义，但将军们不很理解，需要反复解释，举例说明，等等。第一点还是在没有任何实质性反对意见的情况下通过的，是由国民党代表周密制定的。

^① 沃罗宁的电报和报告没有找到。

^② 电报没有找到。

第二点，又提出了人民军与直隶人联合的政治意义问题。首先，人民军代表宣称，冯断然反对同吴佩孚进行任何接触，冯仍把吴看作是敌人，在打败张作霖之后，要立即同他作战，但不能把直隶集团看作是一个整体，或者哪怕是一个联合体。因此冯认为，同孙传芳和肖耀南可以建立军事联系，但不能同吴建立这种联系。我们同意对问题的这种提法，但补充说，现在对吴佩孚采取任何行动，都可能是一个在策略上错误的和对反奉斗争事业有害的步骤。委员会在讨论对吴佩孚的态度问题时，附带还讨论了冯玉祥对段祺瑞的政策。承认现在推翻段及其政府是适时的。但问题是，在段祺瑞未签发讨伐孙传芳的命令，因而也就未公开站到奉天一边之前，不能由人民军，也就是冯来承担驱逐段祺瑞的主动行动。而一旦段祺瑞拒绝签署讨伐令，很可能他被张作霖推翻或者自己离开。这样一来，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冯都不会受到企图夺权的指控。

就第三点，委员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对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以前的建议作出如下修改：根据战争结局，或在国民党和人民军联合基础上组成政府，或在人民军、广州政府和直隶盟军联合基础上组成政府，但作为基本方案还是采用第二方案。

在讨论第三点时，无论国民党人还是军队代表都表现出没有很认真地对待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即如何从政治上实现盟军和人民军为彻底战胜奉天人所达成的各种协议的问题。所有代表都把工作重心转到讨论什么样的人应进入将来的政府问题上。他们认为如何选择候选人是中心问题。结果，如何战胜奉天人的问题，委员们……^①。

^① 文件中缺一页。

党的工作和国民党的工作

开完党中央全会后^①，我几乎所有时间都得坐守北京。你们知道，我们党的中央在上海。虽然我同上海的联系密切：每周几次用电报给中央发指示和北方的政治情报，同时收到大致相同数字的复电，但不能说，我在北京全面地领导了工作。由此产生了以下不正常现象：1. 在有些问题上同中央协商不够，因为通过电报来领导我们的中央，而且是在目前的这种形势下，是不行的。2. 在这里，不可避免地要替中央或通过中央来实行领导，这当然是有害的，对于年轻的党来说尤其如此。我试图把这些矛盾减少到最低程度。迄今为止在我们这里并没有出现什么大的意见分歧。加拉罕回来后，我马上去上海。

党在全会后的状况，可以概述如下：1. 党和共青团在不断发展。在上海，前两周入党的新党员有100名，入团的约200人。在北京，我们这里过去基本上没有工人，近两周有50多人加入。我没有关于开封、郑州和汉口情况的准确材料，但在这些地方党确实在发展。

从政治活跃的意义上说，我们党和共青团无疑作出了很大成绩。最近我们在南方和北方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政治游行和群众大会。虽然在上海，工会半合法存在，但我们并没有丧失对工会的领导权。而在北方，我们一直在发展工会运动和加强我们的影响。

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及其对群众的影响效果确实在扩大。我们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尽管受到当局的追究，但现在印数已达3万份，并在许多地方翻印。例如在北京，党的地区委员会每周翻印《向导》3000份。

^① 指中共四届二中全会（1925年9月28日至10月2日）。

第二位的机关刊物是党的北方委员会在北京出版的《政治生活》^①，在北方激进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中间赢得了声誉。这个刊物每周发行 5000 份。

在开封、汉口、山东以及最近在天津也出版了党的周报，是省委机关报，面向激进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

除了这些刊物，我们还在上海出版几种工人周报和一种工人月刊。

此外，为配合关税会议的宣传运动，针对战争、革命运动的团结以及为纪念义和团起义周年日、1911 年革命周年日和我国十月革命周年日，我们还出版许多小册子、抨击性作品和呼吁书。

党的教育工作在全会后也比以前安排得更好了，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了某些成绩。过两周，我们将有 40 多名学生从北京的党校毕业^②，有直隶省的积极工作者在这里学习了两个月。此后我们打算在华中设立同样的学校。我们将借助于我们的军事专家培训毕业于北京学校的 10 名学生，做中央军事部全权代表工作。

最近我们的农村工作取得了某些成绩，尽可能地贯彻了全会的决议。在直隶省和山东省，我们暂时只从事宣传鼓动工作和还很薄弱的组织工作。在宣传鼓动方面我们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顺便说一句，最近一个月，我们在农村中散发了大量在北京印刷的反帝和反奉的标语。

在河南省和湖北省，我们在农民中进行了相当顺利的组织工作。由广州派到北方农校的一些同志来到北方后，我们就能在这里更顺利地开展工作。

附上甘同志的一份学生工作报告^③。根据这个报告，你们可以判断学生团结的情况。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同国民党左派的统一战

① 指 1924 至 1926 年间在北京出版的《政治生活》周报。

② 北京的党校成立于 1925 年 9 月。

③ 报告没有找到。

线有很大意义。这些情况我已及时电告^①。

全会关于同国民党左派建立密切联系的决定^②，现在(过去几周之后)表明，我们正确地估计了在目前的内战和解放运动条件下同国民党真诚联合的意义。可以有把握地说，只有在这种联合条件下，国民党才能对国民军施加影响。我们在北方各大中心城市相当顺利地开展了为广州的运动，这场运动之所以能够进行，也是由于正确地对待了国民党。最近几周，北方反帝运动的普遍活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我们根据全会决议开展了争取革命战线团结一致的运动。

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帮助国民党左派从组织上巩固自己的影响，并在即将举行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之前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击败右派……^③

暂时写到这里。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Г·В·)④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54，第 146—151，153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电报没有找到。

② 指中共四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决议案》。

③ 下面删去关于日本情况的部分。

④ 即维经斯基。

20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3号记录 (摘 录)

1925年12月3日于莫斯科

出席：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捷尔任斯基、加里宁、莫洛托夫、鲁祖塔克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

俄共中央委员：伏洛希罗夫、克拉辛、克维林、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皮达可夫、瞿鲁巴同志。

候补中央委员：西尔佐夫和施密特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谢夫、古比雪夫、索尔茨和扬松同志。

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同志。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 中国委员会问题(见政治局1925年10月15日会议第83号记录，决定：2—[1])。(温施利赫特、李维诺夫、彼得罗夫^①、阿拉洛夫^②同志)。

决定：1— [1] 决定—特别文件。

① 彼得罗夫即Ф·Ф·拉斯科尔尼科夫，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译者。

② С·И·阿拉洛夫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委委员——译者。

听取：29. 给报界和塔斯社的指示（政治局 1925 年 12 月 3 日会议第 93 号记录，决定：1— [1]）。

决定：采纳布哈林同志提出的草案（见附录一）。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政治局会议第 93 号记录，决定：29

附录一：给报界和塔斯社的指示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5 年 12 月 3 日通过）

鉴于有必要使日本帝国主义保持中立和不愿把中国的斗争重心从英美身上转到日本身上，又鉴于有必要不给资本主义列强多余的王牌，来大谈东方和我们在中国的作用，建议报界遵循以下原则：

1. 不突出对日本的攻击。

2. 指出容忍中国新的局面对日本是有利的，有可能也有必要保持以日本为一方同以中国和苏联为另一方的睦邻关系。

3. 不鼓吹东方对西欧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威胁。

4. 尽量少写苏联在东方事件中的积极作用。

核对无误：切丘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533，第 1、6 页。

会议记录是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附录是经过核对的副本。

20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3号记录 (摘 录)

1925年12月3日于莫斯科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3号 (特字第72号)记录

听取：1.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 中国委员会问题。(政治局1925年10月15日会议第83号记录，决定：2——〔1〕)(报告人：温施利赫特、李维诺夫、彼得罗夫、阿拉洛夫同志)。

决定：1. ——〔1〕(1)接受中国委员会关于在中国建立电讯社问题的建议：

①批准委员会9月28日关于有必要在中国建立国家电讯社的决议。

②通过能够保证我们所需要的政治方针、我们的资本投入和工作安排的人员参加领导机构来确保我们对该社的影响。

③用于这项事业的拨款最多20万卢布。

④由塔斯社社长^①多列茨基同志负责实施这一措施。

⑤责成多列茨基同志与外交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一

① 正确地说是塔斯社负责人。

起制定组建该社的方案和预算，并将其提交中国委员会批准。

(2) 关于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问题，接受斯大林同志提出的以下指示：

①实行旨在在日本和英美之间打入楔子的方针，尽量不损害同日本的关系并在容忍中国的现状对日本有利这一意义上同它进行谈判。无论如何不应把这种政策同势力范围政策混淆起来。

②让加拉罕同志向报界发表消息，张作霖之所以衰败是因为他一直在加剧苏联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在满洲只有遵循苏日接近的政策才能保住指挥权。

③我们认为目前不可能有清一色的国民党政府。我们以为，我们在北京的朋友们采取了过左的方针。在我们看来，北京政府应当是有冯玉祥、国民党人和其他或多或少温和派参加的联合政府。

④认为广州人拟议中的北伐在目前时刻是不能容许的。建议广州人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内部的巩固上。

⑤要求加拉罕同志定期提供消息。责成布哈林同志根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和交换的意见拟定关于中国和日本政策问题的指示，以便通知报刊编辑部和塔斯社①。

⑥认为有必要派遣一名重要负责人去中国，委托组织局提出候选人交政治局批准。

抄送：

温施利赫特同志——(2) ⑥以前的全部；

李维诺夫同志——同上；

阿拉洛夫同志——同上；

莫洛托夫同志——(2) ⑥；

组织局——(2) ⑥。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① 参见第200号文件。

全宗 17, 目录 162, 卷宗 2, 第 202、203、205 页。

打字稿, 原件, 签字为真迹复制。

202

拉斯科尔尼科夫给维经斯基的信

(摘 录)

1925 年 12 月 4 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同志:

1. 当您收到我们这封信时, 您已经知道了用电报转去的最高领导机关的指示^①。我们认为, 稍稍说明一下这些指示的内部情况, 即所谓内情是有益的。

在拟定指示时, 无论我们这里, 还是最高机关委员会^② 和最高领导机关本身, 也都是完全一致的。所作的修正是旨在加强指示的总的性质, 即修正您的计划^③ 在总体上和细节上都考虑欠周的地方。在委员会里, 也有人试图把计划同您个人联系起来。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做法, 同时指出, 从您的报告中根本得不出委员会所谴责的、我们也起劲一致谴责的行动纲领。所以曾加强了对北伐的谴责。从颠覆计划等得出的总的一致的印象是您是否太左了, 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and 影响, 而过低估计了帝国主义者

① 见第 201 号文件。

② 指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委员会的有关记录没有找到。

③ 看来是指维经斯基 1925 年 11 月 11 日的报告(见第 199 号文件)。

和国民党以外势力的力量和作用在最高领导机关，主席^①在作总结时大体是这样提出任务的：尽量避免触及阿斯拉尼迪^②的利益，政府只能是有直隶参加的联合政府，不急于搞政变，要千方百计加强在群众中的工作，巩固广州。提出了向阿斯拉尼迪作如下暗示的建议：北方发生的事情是张作霖加剧阿斯拉尼迪与苏联的关系和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结果。所附根据最高领导机关的决定撰写的《真理报》社论^③更详细地转达了这一建议。如果他们呆在自己的领地上，便可以指望，无论南方还是西方都不会触动他们。

2. 现在谈谈我们的补充意见。这确实令人惊奇，怎么能搞出这样的计划呢？为什么鲍罗廷迄今为止一直把自己装扮成拿破仑，为什么不顾冯玉祥立场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将他推举为坚强的核心？当你拿起近两周的电报并加以比较时，对形势评估的明显印象主义引人注目，从一个极端急剧地摆到另一个极端。颠覆事件特别典型。起初一切都准备就绪，只是时间问题，但到第二天却鉴于情况不明就把问题取消了。

3.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特别想见到您。遗憾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提出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您自然是不能来的：不会允许您来。

4. 来的代表团使我们有点困惑不解。它未作任何准备，也未带任何材料就来了^④。从中央方面来说这简直是不可饶恕的。我们不管怎样都在等待着代表团给我们带来材料。特别是如果您不能来，就请您采取切实措施，使我们能在全会以前得到有关党内生活的材料。特别是，有关党的财务状况的材料是非常需要的。代表们提出了增加补助金的问题。但他们根本没有作任何计算。我

① 看来是指斯大林发表的意见（参见第201号文件）。

② 对日本的秘密称呼。

③ 指《真理报》1925年12月4日的编辑部文章《为中国的政权而斗争》。

④ 指由蔡和森、李立山、向警予组成的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的中共代表团。

们拟定每月 6000 卢布，够吗？请快点寄来开支报告，否则，连一个戈比也不会给我们。

5. 代表们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与国民党的相互关系问题，如何实施统一战线策略问题，胡汉民立即返回问题。他们似乎是受中央委托提出后一个问题的，因为据他们说，胡汉民返回会给民族解放运动带来巨大(?)好处。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们都需要您的最紧急最详细的情报。

6. 关于胡汉民和关于其他几起事件，我们怀疑我们的朋友亚诺夫斯基^①，近来他根本不听使唤。他既是共产党的莫斯科区委，又是国民党的莫斯科区委。我们请求按中共组织系统立即确认，不需要任何莫斯科委员会。我们认为必须立即停止这些机关的工作，它们掌握在亚诺夫斯基手里现在成了十分危险的工具。鉴于所有这些，自然提出亚诺夫斯基本人的问题。把他派到您那里更为适宜(他最好是去做军事和侦察工作，无论如何不适合做党的工作)。但我们只有在得到合格的翻译时才能这样做。

7. 翻译的问题糟糕透了。没有我们所需要的(和您所许诺的)翻译。因无法开课中山大学提出了关闭的问题。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几乎也处于同样的境地。怎么回事呢？请提供翻译。请电告。

8. 中山大学还需要广州人，不能多于 25—30 人。再多它接收不了。实际上本应停止接收，但还没有一个广州人，而我们获悉，那里有很多人愿意来。我们还能接收 25—30 人，一定要广州人。让他们快点动身。

9. 再有，还请赶快寄回开支报告和寄给您用于派遣中山大学学生的那 3 万卢布的开支余额。

10. 可惜的是，没有一个广州人被选派参加全会。也许还会来

^① 即袁庆云。

人(由中国共产党选派)。很希望有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到来。我们也从外蒙和唐努图瓦找过人。我们会组织所有这些同志的专门会议……^①

彼得罗夫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123, 第 213—216 页。

打字稿, 副本, 亲笔签字。

203

拉斯科尔尼科夫给加米涅娃的信

1925 年 12 月 11 日于莫斯科

绝密

送全苏对外文化协会

致加米涅娃同志^②

敬爱的奥莉加·达维多夫娜:

在莫斯科逗留的广州政府成员胡汉民将军, 在两封密信中^③对于很少给他提供机会利用在这里的逗留了解俄国革命的经验表示不满。他很想知道革命运动的发展阶段、俄罗斯共产党的历史和机构以及苏维埃政权的结构。

我们希望, 对这些问题的说明是最全面最准确的, 同时又不是出自我们之口。

① 以下删去有关日本、朝鲜和印度尼西亚的部分。

② O·Д·加米涅娃, 全苏对外文化协会主席——译者。

③ 胡汉民的信件没有找到。

因此，请您负责安排胡汉民同我们的负责工作人员，同那些能够向他阐明党的历史和苏联建设中的最重要问题的党史学家、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军事工作人员进行一系列交谈。

而且，这些会见很容易举行，因为胡汉民的一个秘书^①能说流利的德语。

我们想跟将要同胡汉民交谈的同志事先谈一谈。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

金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54，第 185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204

胡汉民在莫斯科的工作计划

(摘自亚诺夫斯基同志的讲话)

不晚于 1925 年 12 月 11 日^② 于莫斯科

国民党派遣自己的代表到俄国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因此他所肩负的决不是外交任务和旅游任务，而是提出了以下具体目标：

1. 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
2. 考察（了解）苏联建设的经验。
3. 讨论国民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

^① 指朱和忠。

^② 日期根据第 203 号文件确定的。

4. 编制国民党纲领草案。
5. 寻求军事援助。
6. 其他事项。

工作计划的细节如下：

一、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

列宁同志指出，阶级斗争的第一步是组建坚强的政党。他给我们明确指出了党在革命运动中作为革命动力的作用。中国国民党的斗争历史共几十年。它产生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因此，国民党没有在群众面前公开活动。此外，国民党处于特殊条件下，始终进行着武装斗争。它同群众没有密切联系。近两年来，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因此，国民党有较为合适的机会来联系群众，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因此，国民党的使命是非常重大的。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在其发展过程中没有根除许多缺点，因此它还不能成为领导运动的坚强政党。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来苏联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研究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俄国共产党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我们还想研究俄共把这场革命不断引向前进的方法。我们只有在苏联才能得到这种东西，这也是被压迫民族在十月革命中的主要收获所在。

为了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我们划分三个基本时期：

(一) 战前俄共发展的基本问题

1.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农民的影响。
2. 工人运动的发展及其形式。
3. 俄共的诞生和它的组织原则。
4. 俄共中的农民问题。
5. 俄共与其他政党的相互关系。
6. 布尔什维主义与孟什维主义在组织斗争中的差异。
7. 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策略的区别。

8. 1905 年的特点。
9. 1905 年策略和口号。
10. 1905 年革命的教训。
11. 孟什维克在 1905 年的主要错误。
12. 1905 年以后工人运动状况与组织问题。

(二) 十月革命前俄共的发展与策略

1. 俄共对战争的态度。
2. 战争对农村和城市经济的影响。
3. 二月革命后俄共的策略基础。
4. 资产阶级在二月革命中的作用。
5. 克伦斯基政府的垮台与苏维埃的建设。
- 5a. 布列斯特和约 (亚诺夫斯基加的)

(三) 十月革命后俄共的建设

1. 战时共产主义的意义。
2.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
3. 俄共新纲领的内容。
4. 公开条件下组织建设的基础。
5. 战时共产主义的结果。
6.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
7. 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对农民的政策。
8. 新经济政策条件下调节私人资本的发展。
9. 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工资政策。
10. 缩小“剪刀差”的经济政策。
11. 货币改革的意义和方法。
- 11a. 工会在苏维埃建设中的作用 (亚诺夫斯基加的)
12. 党内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
13. 列宁去世后俄共的发展。
14. 党对国家的领导。

15. 党在农村工作的经验。

二、考察苏联的建设

苏维埃政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因此，这种国家的原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则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想研究某种东西的建设与发展，那我们必须先研究其原则，然后才能着手研究实践，否则就难以理解实际生活。因此，我们划分下列几点：

(一) 政治方面

1. 苏联宪法的原则。
2. 苏联选举法。
3. 国家机关的组织原则。
4.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存在的必要性以及该联盟的特殊性质。
5. 地方与中央的相互关系。
6. 怎样选举苏维埃。

(二) 经济方面

1. 目前的经济政策。
2. 国内贸易的主要问题。
3. 对外贸易的主要问题。
4. 电气化。
5. 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的相互关系。
6. 组建农业公社的情况。
7. 组建城市和农村合作社的情况。
8. 帝国主义者的财政政策与财政攻势。
9. 农民借债的结果。

(三) 军事方面

1. 红军的组织结构。

2. 军人的义务。
3. 红军的组织原则。
4. 军队的政治工作。
5. 军队的军事技术状况。
6. 军队的行政管理工作。

(四) 教育与文化工作方面

1. 教育的目的与计划。
2. 学校的组织结构与教学大纲的内容。
3. 提高劳动者文化水平的方法。

三、讨论国民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

国民党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唯一政党和领导党，因此它的任务是领导运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在斗争中加强自己的组织。我们将这些问题分为两个方面：

(一) 现时的策略原则

1. 国民党策略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国民党在广大革命群众中的基础。因此，“争取群众”的问题对国民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2. 我们说群众，应当指农民和工人。在象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条件下，本地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是暂时革命的群体。因此，我们应当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国民革命运动的战线上，并且要特别重视下面两个问题。

(1) 在存在反帝战线的情况下，为了使小资产阶级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积极战士，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策略应当是什么样呢？

(2) 为了不损害工农的利益，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策略又该是怎样呢？

3. 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是统一中国，把政权交给中国

人民。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怎样、以何种形式（如国民会议）和在什么样的具体口号下进行斗争以唤起群众的积极性呢？

4. 人民军是从中国军阀制度中产生的。目前，这些军队宣称自己参加民族斗争，但实际上，它们单独行动。我们应当怎样评价它们，对人民军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

5. 广州政权境内的经济改造应当是怎样的呢？

6. 在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国民党应当开展国际宣传，建立国际联系。这方面需要做些什么工作？

（二）国民党内的组织问题

1. 国民党右派现已脱离革命运动。我们对他们的策略应当是怎样的呢？

2. 应当怎样建立工人和农民组织？

3. 应当怎样在没有广州政府当局的地区建立国民党组织？

四、制订纲领草案

每个党都有一个明确的纲领。国民党在斗争时期，只有一些总的倾向。现在生活要求制定科学的理论纲领。

1. 国民党是有积极作用的党，因此必须制定明确的纲领，以便能够在每个既定时刻确定这样或那样的策略步骤。

2. 一部分群众和党员不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们是纯粹从沙文主义角度来理解它的。这是因为国民党过去没有明确的理论原则，因此需要制定规定中国革命基本路线的纲领。

3. 党必须采取坚决的行动。为此需要有觉悟的革命的组成成员。现在国民党内有很多不想参加革命的右派和中派分子。他们对于党的工作是一种障碍。国民党的纲领将规定每个党员都应执行的明确的行动，一旦拒绝执行，就应该退党。

4. 纲领应向中国被压迫的全体民众表明国民党的任务和策略，以便聚集一切真正革命的力量，加强革命阵线。

附注：就此我建议同俄国和外国同志一起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拟定纲领草案，提交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审议，并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讨论。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67，第 4—9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205

拉菲斯同胡汉民的谈话记录

1925 年 11 月 12 日、12 月 7 日和 12 日于莫斯科

同胡汉民的第一次谈话

胡汉民：我的基本任务是同有经验的党务工作者弄清目前国民党所面临的问题，即：

(1) 怎样看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学说。

(2) 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这些主义以及①

(3) 阐明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

我们党内许多人认为，这三个主义中最重要的是民权主义，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三民主义中最重要的是民生主义。因此，我们党内对中国革命没有统一的看法，全体党员的倾向是极

① 原文如此。

不相同的，因此不可能确立统一的策略。因此同党的同志（俄共中的——多比索夫注^①）弄清应当怎样看待中国革命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三民主义学说的存在问题，应当说没有理论就没有革命，但没有行动也不可能有革命。国民党必须第一，弄清中国革命的原则基础，第二，弄清进行这一革命的方法。

我们党内存在着右倾，右倾分子认为，三民主义把革命理解成纯民权主义和特殊民族主义的革命。因此，他们离革命非常遥远，可以预料，过些时候他们就会成为公开的反革命。一部分右派了解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但他们绝不打算实现它。因此我们认为，对国民党来说，确立它迄今还没有的纲领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党没有纲领就不能行动。此外，党要求在自己的队伍中有格外坚定的革命者。因此需要清党。当然，要谨慎从事。清党将在我们公布革命纲领之后进行，这个纲领将迫使不革命的分子离开党的队伍。

必须设法改组国民党。国民党需要以世界革命原则为基础的理论。我们党的优秀分子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却不了解这一点。党的主要任务是把革命力量聚集在国民党的旗帜周围。为此需要明确的、切合实际的、能够把国内一切革命分子吸引到党内来的革命纲领。

拉菲斯同志^②简略回答如下：“胡汉民提出的关于制定纲领的论点是正确的。三民主义学说恰当地结合可以作为该纲领的基础。纲领不会导致机械的清洗，而是政治上的筛选。国民党是一个联合党，因此，对三民主义学说的理解必然是不一样的。”接着，拉菲斯同志说明了怎样正确理解三民主义的含义，并指出，存在三民主义并正确理解三民主义，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盟才有可

① M·多比索夫，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人员——译者。

② M·Γ·拉菲斯，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鼓动部工作人员——译者。

能存在。他还阐明了国民党对中国革命的各现有力量的态度问题，并说，只有当党学会利用不太反动的势力或潜在的反革命势力来反对公开的反革命势力和正在反对中国革命并支持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势力的时候，党的策略才是正确的。

胡汉民说，国民党不是把党内的右派分子看作在孙中山旗帜下进行斗争的同盟者，相反，是把他们作为叛徒看待，因此国民党左派主张开除他们。

拉菲斯同志向胡汉民说明了他的“左倾”，重复了自己的看法，即在一定时期内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他们。

胡汉民表示，他原则上同意拉菲斯同志所说的一切，但他还是应当作如下说明：国民党不能将孙中山的这三个主义分割开来。中国需要民族主义口号，因为这符合同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要求。这第一个主义要通过第二个主义——民权主义的胜利，即通过吸引全体中国人民参加中国的解放事业来实现。第三个主义——民生主义是专门维护中国劳动者阶层即农民和无产者利益的主义。因此，所有这三个主义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国民党不能将它们割裂开来。

不可能把整个中国（按亚诺夫斯基^①的解释，更确切些说是中国的各个阶级——多比索夫注）聚集到这些主义的周围。吴佩孚也许完全支持民族主义的口号，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他支持孙中山的学说。

我们不能不把资产阶级看成是反革命势力。事实证明了它的反革命性质。因此，我们不能同中国资产阶级搞联合，因为它是**反革命的**。

因此，我们可以从今天的交谈中得出以下结论：党是革命的领导者，它依靠群众进行领导，它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但在策略

^① 即袁庆云。

任务方面它可以依靠别的力量，但不能允许这些力量进入党内。

同胡汉民的第二次谈话

出席：胡汉民和他的两位做记录的秘书^①，然后是拉菲斯、多比索夫和福京^②三同志。

拉菲斯：我们看了您拟出的问题单（见附录）^③。最重要的一点是关于国民党的社会基础的第“2”点。我们这样理解我们的谈话，是为了便于你们独立自主地制定国民党的纲领和策略。因此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让您准确地说明您是怎样考虑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界限划分的。您认为，这两个党在目标方面和在各自打算联合在自己周围的群众方面存在着某种差别吗？

胡汉民：我认为，说明两党——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我们制定国民党纲领草案工作中的最主要一点。我知道，国民党是历史性的党，也就是说，它无时不在前进，同整个中国的发展一起发展。国民党始终在适应中国的条件。国民党在中国有必要存在，恰恰是因为现在不应超出民族解放运动的范围，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还不能太广泛地给自己提出任务。我承认，中国共产党应当在中国存在。两党应当这样进行工作，通过共同努力把中国革命推向前进。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彼此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尽量避免冲突和摩擦。两党将继续本着这样的精神开展工作。我也要请问您，国民党面临的哪些任务与中共面临的任务不同？中共的任务与国民党的任务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

拉菲斯：我不拒绝说明我是怎样理解国民党的任务的。但是，

① 指李文范和朱和忠。朱和忠在1928年发表了《与胡汉民先生游俄国八个月之回想》的文章（参见：《中国现代史丛刊》第3册第375—392页，台北1961年中文版）。

② H·A·福京，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工作人员——译者。

③ 文件没有找到。

在您的谈话中，关于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社会界限这个基本问题还是不清楚。

胡汉民：在广州，我们并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做分工，但情况是令人满意的。

拉菲斯：目前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有着不同的关系。您大概知道，中共中央最近的一次会议^①决定，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组织区分，也就是中共建立组织的工作，将在上海和在整个中国北方进行，也要在广州进行，当然也是为使中共党员继续加入国民党。我是否应当这样来理解您的意思：您认为广州的目前关系不应改变？

胡汉民：都是一样的。在广州，工人由国民党领导，而在上海，则由中共领导，因为那里国民党组织比较弱。

拉菲斯：倘若有两个团体并列存在，一个与另一个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从解放斗争的角度来看这是极其有害的力量浪费。于是两者必居其一：或者中共是多余的（我们不这样认为），或者国民党是多余的。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十分明确，否则就不可能解决所有其他问题。

胡汉民：必须使国民党最终并入中国共产党。也许在目前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这只是时间问题。

拉菲斯：您认为，是哪些情况使国民党现在难以加入共产党？

胡汉民：目前国民党的任务是解决与民族解放运动有关的任务。因此，在过渡时期国民党是必要的。

拉菲斯：这就是说，两党应当单独存在？并且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的工作，而国民党却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胡汉民：在同志们中间，我应当坦率地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现时存在的关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共产党人——国民

^① 指中共中央执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党员的策略对国民党中央是不公开的，但应当使国民党中央了解中共中央的策略。我向鲍罗廷谈过这一点，他同意我的意见。但中国共产党人反对让中共公开活动。

拉菲斯：我们坚持让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结成最紧密的革命联盟的观点。但在这里我们遵循列宁同志原来的策略公式：“为了联合，先必须划清界限”，即准确地说明联合双方中每一方的目标和任务。

胡汉民：这是对的。但是，我们首先需要说明国民党的具体任务。

拉菲斯：为了阐明自己关于国民党在中国的使命的看法，我举一个例子。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成立了一个以“劳动派”为名的广泛的党。它联合了城市激进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群众，在农民群众中有巨大影响，还没有脱离农民的广大城市小资产阶级也跟它走。劳动派没有作同工人阶级建立组织联系的任何尝试，认为这个阶级正在跟着和应当跟着自己阶级的党走，跟着布尔什维克走。列宁同志把劳动派看作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当然，不能完全拿1905年俄国革命时的劳动派同中国国民党作比较，因为中国整个国民革命运动的锋芒是对着外国帝国主义的。但有某种相似之处。中国国民党的任务是为建立统一的独立的拥有革命民主政权的中国而奋斗，这个政权将承担起满足亿万农民和工业无产阶级的最低社会要求的责任。在制定纲领时必须考虑到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是革命的知识分子、某些农民阶层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是阶级的政党，它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联合无产者完成其历史使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最终的政治任务是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中共当然力争把广大农民阶层联合在自己的周围。它的近期的政治任务是争取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胜利。在这里中共和国民党的任务是接近的，这是共同斗争和联合的基础。但是，中国共产党依然是无产阶级的阶

级政党。它的社会基础比国民党的社会基础要窄一些，但它的最终目的比国民党的最终目的更远大。

胡汉民：在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之间，我看不出有任何共同之处。您想把国民党变成俄国劳动派那样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不能把国民党同劳动派相提并论。国民党的最终目的是民生主义，而不只是民权主义。我们认为自己接近共产国际。

拉菲斯：我并不坚持认为劳动派与国民党完全一样，但有些相似。至于向往社会主义，那么劳动派的宣言也谈到了这一点。我们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本身和对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理解跟劳动派的理解是不同的。

胡汉民：我坚决不同意您的说法。西欧国家的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在中国，无产阶级不只是城市工人，而且还有农民。中国真正的无产阶级很少，很难对它作特殊的划分。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仅应当联合工人，而且还应当联合农民。

拉菲斯：我们还是有很大的疑团。我们又是有两个拥有完全一样的任务和一样的社会基础的党并存。如果象您那样表述中共的任务，否定它独立自主的基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存在本身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就是有害的，最好将它解散。

胡汉民：如果您从我的谈话中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我们就很难继续进行我们的谈话。我认为，中共应当继续存在，完全没有必要解散它。而国民党从自己方面来说应当力求加入共产国际。

拉菲斯：我明确提出我的看法是为了彼此更好地了解。同时，我丝毫不打算把自己的提法强加于人。我们已经商定，国民党的纲领由国民党人自己制定。如果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对共产国际表示友好的决议，把它当作自己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的盟友，那末共产国际将欢迎这样的决议，并且力求同国民党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存在的那种兄弟关系。不过，难道您以为，中

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可以同共产国际处于同样的关系吗？

胡汉民：我们提出制定纲领的问题，恰恰是因为我们希望拟定国民党的发展道路。我们认为，我们是革命的参加者。如果我们看看德国和土耳其的经验，那就会明白，土耳其人民党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政党，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是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者。因此，我们应当特别提防国民党走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或者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老路。

拉菲斯：我觉得，援引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大合适，因为这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社会政治条件。不错，现在土耳其人民党成了真正的资产阶级政党，但您不会否认，这个党曾经在某个时期起过、现在在某种程度上还在起着革命的作用。的确，我们不应当在中国仿效凯末尔主义者。中国的条件不一样。

胡汉民：党纲是党发展的基本路线。党的策略则是临时的进程。我们可以同小资产阶级打交道，不是在原则纲领方面，而是在策略上。我们可以同它结成联盟，但不应认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的保护人。

拉菲斯：您的错误在于，您只注意了广州的一些条件，那里的内战以及革命政府的存在已经造成了社会力量的某种划分。而在中国的北部和中部，情况却是另一个样子。我们赞成这样的看法：大资产阶级越来越脱离民族解放运动。国民党内部和学生内部出现了某种分化。现在斗争是争取小资产阶级。在国民党的右边迟早会组成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政党与它并列，这个党将力求脱离国民党，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还在跟着国民党走的那些农民阶层争取到自己一边。当国民党制定纲领时，它应当注意的正是这些阶层。这里所说的不是要使胡汉民同志一个人和左倾情绪很重的一整批国民党员满意的问题。这里所说的是不把小资产阶级推向反动派的怀抱，而要把它牢牢控制住，让它跟着自己走的问题。

胡汉民：我原则上同意本着这样的精神来制定纲领。在革命

高涨时策略和纲领差别不大。在广州，主要口号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当我们反对英国人、抵制英国货时，为了使抵制英国货取得成功，我们就不得不让美国货和日本货进入广州。对小资产阶级也是一样。我们应当利用小资产阶级，但我们不应把维护它的利益作为自己原则的基础，应当本着这样的精神来制定纲领。那些曾经是右派的国民党分子离开了国民党，对他们无需加以考虑。现在我们看到新右派的苗头还十分弱小，同他们也可以不去计较。应当考虑的只是国民党左派。因此我们在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制定纲领时应将中国的一切革命分子吸引到自己一边。资产阶级是反革命阶层。也许，我们不会公开谈论社会主义。但在革命过程中我们不能否定矛盾的存在。当我们组建工会时，我们对工人们说，我们成立组织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小资产阶级当然不希望组建这样的工会，因而在此基础上便会产生矛盾。对于贫困农民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

拉菲斯：我们没有掌握丰富的材料，可以提供依据证实矛盾已经如此深刻。如果国民党坚决放弃组织和领导工人斗争的工作，把这件事完全留给中共来做，这种矛盾是可以得到某种缓解的。国民党应当坚持自己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我在上次谈话时已经指出，我们是怎样理解这三个主义的（注：当时所作的表述大体是这样：民族主义是争取独立反对帝国主义；民权主义不是形式上的“民主”，而是争取人民的权力；民生主义是满足农民和工人群众的基本的近期的社会要求）。在您的谈话中有使三民主义的其他两个主义服从于民生主义的意图。这对共产党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但对于国民党来说则是不对的。这样的说法会使小资产阶级反感。

在您的问题单中有一点是讲人民军的作用。现在我不想全面地谈论这个问题，而只是就今天已经涉及到的问题谈一谈。

胡汉民：今天我们所谈的并未涉及到原则性问题。在这些问

题上我们没有分歧。我们将本着什么样的精神来起草纲领——这个问题我们再作决定。

记录 多比索夫

同胡汉民的第三次谈话

出席：胡汉民和他的两位秘书、拉菲斯和多比索夫同志，翻译亚诺夫斯基。

胡汉民：上次我同您谈了国民党纲领的问题。我曾想阐述国民党革命理论的基本观点。您当时说，应当避免可能导致革命联盟解体的表述方式。但是另一方面，需要奠定国民党的基础，以便使它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从修订1924年1月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策略纲领开始。

(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行动纲领主要规定：国民党在今后的斗争中应当依靠广大劳动群众，放弃进行军阀式的单枪匹马的行动，开展广泛的政治斗争，把劳动群众吸引到自己一边，并进行组织建设，建立一个真正广泛的政党。——多比索夫注)。

拉菲斯：为了消除任何误解，我应当作如下说明：我把事情设想成这样，国民党会在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基础上发展下去。上次我绝对不是建议抛弃第三个主义，即民生主义，而只是强调，这个主义不应使主要的两个主义——民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从属于自己，而应当同它们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多比索夫：建议继续会谈。

拉菲斯：上次谈话中涉及到的问题是清楚的，因为胡汉民同志已经同意，国民党应当联合小资产阶级阶层、民主主义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和某些农民阶层，并要这样提出自己的政策和策略，以便不要吓跑小资产阶级人士。

胡汉民：我具体建议如下：今天我们应当确立国民党革命理论的基本点，使某些国民党员无法把国民党变成机会主义的党。现在必须明确确立这些理论的基本点。第二，我们应当规定，在现时条件下国民党应当坚持什么样的策略。

拉菲斯：我要以我个人名义讲话。我认为，国民党的纲领大体上是应当这样来制定。首先必须指出，外国帝国主义在历史上始终是阻止和妨碍中国人民的发展的。在这一部分中需要对外国帝国主义开始入侵中国时以来的中国历史作出历史的分析。这里将分析对中国的各次进犯，同时也要分析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以及我们在太平天国、义和团等起义中所看到的试图摆脱外国桎梏的历史。在这一部分中要向群众指出，中国的发展始终遭到外国帝国主义的疯狂阻挠。这种历史分析同时要指出，国民党是同这种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党。

其次，根据国民党吸引社会被压迫阶层，而不是地主、大官僚等加入自己队伍的性质，需要对中国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作出说明。这里应当展现亿万中国人民群众的极度贫困和重负。这里还需要指出，这些群众是怎样反对压迫者的。这将使人有可能得出结论，国民党是同劳动者风雨同舟的。

然后应当说明，国民党打算怎样进行斗争。这还是需要从历史方面来说。这里应当对以前争取民族解放的一切尝试作出评论，并要指出，国民党将为了人民并通过人民来进行这种斗争，因为我不是从表面上把孙逸仙的民权主义口号理解为实行资产阶级议会制，而是从它的真实意义，即从群众参与革命斗争和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的意义上来理解的。

我以为，接下去纲领应当对中国的经济生活作出评估。这里纲领应当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国民党是希望中国历史倒退还是希望沿着西欧的进步道路前进。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西欧闯进了中国，使许多中国居民阶层生活没有保障。因此，“打倒帝国主义

分子!”的口号可能被破产的手工业群众反动地解释为断绝同世界经济的一切联系、消除引入中国的西欧技术因素的口号，解释为使中国经济发展倒退的要求。国民党应当强调指出，它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发展中国的生产力，是在自己的政权、自己的经营管理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可以从中国的发展中大发横财的外国资本统治的基础上来发展。

接着应当对现时中国的各个阶级作出评价。这里胡汉民同志会说，国民党不承认它的革命作用^①。这里需要谈谈中国无产阶级。在国民党如何对待中国无产阶级独立自主斗争的问题上，国民党右派与左派之间可能要发生分裂。纲领应当宣布，工人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国民党将紧密联合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实现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而斗争。此外，纲领还应宣布，谁反对中国无产阶级，谁就因此走上反革命的道路。我上次说过，我们不应当把小资产阶级从自己身边吓跑。但是，在纲领中宣布同中国无产阶级结盟的主张不会吓跑小资产阶级，而只会在国民党与富裕的资产阶级阶层之间划一条界限。纲领的目的应当是这样。

纲领应当涉及的下一个问题是中国人民的斗争同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关系问题。中国人民首先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而斗争。因为中国人民首先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而斗争，所以进行这种斗争的所有人都是中国人民的同盟者和朋友。中国人民是英国帝国主义的敌人，但却是英国工人的朋友，英国工人也在自己国内进行着同样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印度人、黑人等等也都是中国人民的同盟者，因为他们也处在同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行列中。当然，纲领不应谈论共产国际，但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每次都可以指出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所建立的功勋。将有关共产国际或红色工会国

^① 原文如此，看来是指资产阶级。

际的某种论点写入纲领都是不妥当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就应当或者声明拥护共产国际，或者相反同它展开论战。前者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声明拥护共产国际就可能把小资产阶级从国民党身边吓跑，而后者则不符合国民党左翼的真实意图。

这里将适当地谈一谈苏联。只需说苏联是不对中国抱有帝国主义欲望的唯一国家，因为苏联铲除了那些可能抱有这种欲望并为其提供依据的阶级。苏联是自愿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并且宣布国内外各民族平等的唯一国家。中国人民的政策应当是旨在同苏联结成联盟——平等民族的联盟。纲领不应涉及苏联的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问题。这个问题应当回避。

这样，纲领的基本原则和总的部分我都说了，当然，上述问题的排列秩序绝对不一定要像我所讲的一样。我只想指出，纲领中应当提到的问题主要应做什么样的分析，仅此而已。现在我也想向胡汉民同志提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您和国民党是怎么设想中国的国家制度的？目前我们在世界上有三种基本的国体形式。第一是君主制，第二是资产阶级议会共和制，第三是苏维埃制。国民党推翻了君主制，应当找到一种适合四亿五千万中国农民，而不是只吸收很小的阶层即人民的上层参与国家管理的资产阶级议会共和制的国体形式。另一方面，苏维埃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苏维埃国家尽管是少数，但它依靠农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意志及其阶级意向的表现。无产阶级专政也不适合中国现阶段的斗争，因此我才提出国民党认为哪一种国体形式对中国最合适的问题。

胡汉民：您说得对，您所指出的第一种（君主制）和第二种（议会共和制）国体形式都不适合中国。第三种形式（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也谈不上，但我们将讲人民专政，讲人民民主。

拉菲斯：很好，但这种人民专政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

胡汉民：我们可以像在广州试图做的那样来组织政权形式。我

们认为，将从工人、农民、士兵、小手工业者、学生中选出代表，这些代表将拥有最高权力。这种政权组织形式有点像苏维埃，但它所包容的阶层比苏联的苏维埃所包容的要多一些。我们需要考虑在这些苏维埃中的数量比例问题。

拉菲斯：依我看来，中央集权制和封建制^①的问题将在国家制度中起很大作用。这个问题部分地会涉及加入中国版图的某些民族的民族独立问题。为了胜利结束自己的斗争，国民革命应当拥有绝对集中的政权，它有统一的武装力量和统一的对外政策作后盾。但中国按其构成不是单一的。地区偏见将在革命时期消失，但民族问题在革命时期不会消失。在这个问题上需要特别小心对待，这里国民党应当借鉴十月革命的原则和列宁主义策略。中国应当通过宣布各民族的自由与独立，通过联合各民族的反帝革命力量，通过统一的军队建成统一的独立的_不受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宣布现时中国各民族独立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解体。但必须记住另一点。

在革命过程中，民族问题应当具体地结合当时的政治条件加以解决。例如，英国帝国主义可能在革命发展过程中宣布西藏独立。这样宣布独立就意味着英国侵占西藏。这当然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所承认，因此重要的是谁来宣布独立。另一方面，现在我们已经有_{一个}依靠有组织的人民群众组成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这方面我们同广州很接近，尽管蒙古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显然，国民党应当尽一切努力，以便同蒙古建立正常的相互关系，蒙古应当参与决定中国未来的问题。如果这会加强中国革命，那我们将是一种回答，而如果有利于帝国主义，回答将是另一种样子。

还有许多问题我不在这里谈了。应当宣布各种自由，包括工人罢工的自由——在中国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条件下，这些将起

^① 原文如此，看来是指联邦制。

巨大的作用。然后是需要仔细研究的农民问题以及其他许多复杂的、但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应当指出，我所说的并不是我的所有同志们已经很严谨的最后意见。很有可能，我的同事们在某些问题上不同意我的看法，也并不是我所提出的所有论点都能得到我的同志们的支持。这一点胡汉民同志务必考虑到。

胡汉民：我基本上同意您关于国民党纲领中的民族问题的观点：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已经决定，中国的每个民族都享有充分的自决权。现在谈一谈关于中国的阶级关系。我们在一大策略纲领中已经谈到，国民党应当帮助工人。今天，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全体会议^①在广州开幕，我已向全会发出电报，建议全会解决两个问题：（1）规定对工人阶级应有哪些具体的帮助和保护；（2）我建议全会明确确定我们的对外政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以前满足于从孙中山的主义中得到的一些说法。

我还有一个问题仍不清楚。这就是关于国民党经济纲领的问题。我们当然应该发展中国的工业，但究竟应在什么样的经济形式下发展，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在一大上我们曾认为，这种发展应当沿着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进行。

拉菲斯：关于经济纲领的问题很复杂。我们将回过头来谈这个问题。胡汉民同志是怎样看待国家资本主义的？西欧也存在国营企业。国家资本主义是不是要禁止私人工厂存在呢？

胡汉民：我们不会没收小工厂，中国没有大工厂。但是，国家应当把铁路、银行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其他重要因素操在自己手里，国家资本主义对外国企业将具有重大作用，因为借助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才有可能把中国存在的一切外国企业和银行掌握在自己手里。

^① 指 1925 年 12 月 11 至 12 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拉菲斯：这个问题很重要又很复杂，还需要仔细考虑。倘若中国自己建了铁路，那当然很好。每个国民政府都力求使国家经济生活的主要命脉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中国政府能在何种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它将从哪里弄到这笔资金？这应当仔细考虑。作为原则，国民党可以宣布，国家经济生活的主要命脉应当掌握在人民政府手里，但这在何种程度上会成为现时的准则，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国民党应当致力于发展中国的生产力。这里会出现一些大的矛盾。这个问题还需要考虑一下。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67，第 1—3、10—26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页数=768

SS号=10096649

出版日期=1997年01月第1版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目录前言

绪论

第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寻求盟友1．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1920年6月）

2．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1920年8月17日）

3．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1920年9月1日）

4．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摘录）（1920年9月1日）

5．斯托扬诺维奇给某人的信（1920年9月29日）

6．刘江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1920年10月5日）

7．波达波夫给契切林的报告（1920年12月12日）

8．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摘录）（1920年12月21日）

9．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年4月21日）

10．共产国际执委会执行局会议记录（摘录）（1921年8月26日）

11．契切林给扬松的电报（摘录）（1921年10月31日）

12．契切林给列宁的信（1921年11月6日）

13．列宁给契切林的便函（1921年11月7日）

14．杜霍夫斯基与舒米亚茨基直接通话记录（摘录）（1921年12月2日）

15. 契切林给派克斯的电报（1921年12月7日）
16.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讨论远东会议问题会议记录（1921年12月26日）
17.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9号记录（摘录）（1922年1月12日）
18.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列宁的信（1922年3月15日）
19.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列宁的信附录“督军”（摘录）（1922年3月15日）
20.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拉狄克的信（1922年4月6日）
21. 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摘录）（1922年5月20日）
22. 扬松给加拉罕的电报（1922年7月10日）
23. 派克斯给加拉罕的电报（摘录）（1922年8月4日）
24. 越飞给吴佩孚将军的信（1922年8月19日）
25. 越飞给孙逸仙的信（1922年8月22日）
26. 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1922年8月25日）
27. 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年8月27日）
28. 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1922年8月30日）
29. 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1922年8月30日）
3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4号记录（摘录）（1922年8月31日）
31. 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摘录）（1922年8月31日）
32. 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的信（1922年8月）
33. 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摘录）（1922年9月1日）
34. 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1922年9月4日）
35.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5号记录（摘录）（1922年9月7日）
36. 越飞给孙逸仙的信（1922年9月15日）

37. 越飞给马林的信（1922年9月18日）
 38. 越飞给吴佩孚将军的信（不晚于1922年9月18日）
 39. 马林为格克尔同孙逸仙的谈话所作的记录（1922年9月26日）
 40. 吴佩孚给越飞的信（1922年10月12日）
 41. 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摘录）（1922年10月17日）
 42. 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摘录）（1922年11月1日）
 43. 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年11月2日）
 44. 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摘录）（1922年11月7和8日）
 45. 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摘录）（1922年11月9日）
 46. 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摘录）（1922年11月10和13日）
 47. 越飞给吴佩孚将军的信（1922年11月18日）
 48. 吴佩孚给越飞的信（1922年11月20日）
 49.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晚于1922年12月5日）
 50. 孙逸仙给列宁的信（1922年12月6日）
 51. 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年12月20日）
- 第二部分：面向孙逸仙
52.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讨论中国问题会议记录（摘录）（1922年12月29日）
 53.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摘录）（1922年12月29日）
 54. 中国共产党1923年支出预算（1922年12月）
 55.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2号记录（摘录）（1923年1月4日）
 56. 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速记记录（摘录）（1923年1月6日）

57. 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1923年1月13日）
58. 托洛茨基给越飞的信（1923年1月20日）
59. 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1923年1月25日）
60. 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1923年1月26日）
61. 越飞对同孙逸仙合作的前景和可能产生的后果的看法（1923年1月26日）
62. 托洛茨基给加米涅夫的信（1923年2月6日）
63. 维经斯基就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局的工作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的报告（摘录）（1923年2月22日）
64.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3号记录（摘录）（1923年3月8日）
65. 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的信（摘录）（1923年3月8日）
66. 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3月11日）
67. 托洛茨基给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的信（1923年3月13日）
68. 维经斯基就中国形势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报告（摘录）（1923年3月24日）
69.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7号记录（摘录）（1923年3月26日）
70. 维经斯基给萨法罗夫的电报（1923年3月27日）
71. 东方部就1923年第一季度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报告（摘录）（1923年4月4日）
72. 萨法罗夫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23年4月4日）
73. 维尔德给某人的信（1923年5月22日）
74.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给其出席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的指示草案（1923年5月23日）

75. 布哈林给维经斯基的便函（不晚于1923年5月24日）

76. 布哈林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草案的修正案（不晚于1923年5月24日）

77. 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信（1923年5月31日）

78. 陈独秀给萨法罗夫的信（1923年7月1日）

79. 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7月26日）

8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1号记录（摘录）（1923年8月2日）

81. 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8月25日）

第三部分：国民党代表团访问莫斯科82.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鲁祖塔克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7日）

83.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10日）

84. 杜霍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情况的札记（不晚于1923年9月10日）

85. 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问第144步兵团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17日）

86. 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3年10月6日）

87. 国民党代表团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不晚于1923年10月18日）

88. 维经斯基给张国焘的信（1923年10月24日）

89.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问“红罗莎”工厂的书面报告（1923年10月27日）

90. 契切林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3年11月1日）

91. 托洛茨基给契切林和斯大林的信（1923年11月2日）

92.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1月13日）

93. 季诺维也夫就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的决议草案给契切林和布哈林的附函（1923年11月23日）

94. 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11月25日）

9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1923年11月26日）

96. 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1月26日）

97.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访托洛茨基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1月27日）

9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923年11月28日）

99.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苏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2月5日）

100. 契切林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3年12月5日）

第四部分：国民党改组及其初步成果
101. 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1923年12月10日）

102. 鲍罗廷同瞿秋白的谈话记录（1923年12月16日）

103. 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3年12月27日）

104. 鲍罗廷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1月4日）

10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摘录）（1924年1月15日）

106.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4号记录（摘录）（1924年1月24日）

107.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4年1月25日）

108. 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2月8日）

109. 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

110. 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4年2月13日）

111. 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摘录）（不早于1924年2月16日）
112.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0号记录（摘录）（1924年3月20日）
11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1号记录（摘录）（1924年3月27日）
114.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东方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1924年2月25日）
115. 维经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1924年4月21日）
116. 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书面报告（1924年6月2日）
117.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0次会议情况通报（1924年7月3日）
118. 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4年7月12日）
119. 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7月13日）
120. 中共广东组织就鲍罗廷的报告作出的决议（1924年7月15日）
121. 鲍罗廷给瞿秋白的信（1924年7月18日）
122.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号记录（摘录）（1924年7月24日）
123. 就中国农民问题与孙逸仙和廖仲恺的谈话（1924年8月10日）
124.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讨论与共产党人关系问题情况通报（不早于1924年8月30日）
125. 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
126.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2号记录（摘录）（1924年9月11日）
127.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就瞿秋白同志关于广东政治路线的报告作出的决议（不晚于1924年10月8日）
128. 中共中央给鲍罗廷的信（不晚于1924年10月10日）

129. 陈独秀给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信（1924年10月10日）

第五部分：冯玉祥政变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新重点
130. 维经斯基给季诺维也夫的电报（1924年11月底）

131. 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1924年12月7日）

132. 拉斯科尔尼科夫和穆辛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4年12月16日）

133. 维经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摘录）（1924年12月19日）

134. 鲍罗廷《关于国民党》的书面报告（1925年1月24日）

135. 瞿秋白给鲍罗廷的信（1925年1月26日）

136. 鲍罗廷的书面报告（1925年2月14日）

137. 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的信（1925年2月15日）

138.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2号记录（摘录）（1925年3月13日）

139.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2号记录（摘录）（1925年3月13日）

140.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书面报告（1925年3月14日）

14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3号记录（摘录）（1925年3月19日）

142. 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第2号报告（1925年3月20日）

14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5号记录（摘录）（1925年4月2日）

144.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5号记录（摘录）（1925年4月2日）

145. 鲍罗廷的书面报告《孙逸仙之死与国民党》（1925年4月6日）

146.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1号记

- 录（摘录）（1925年4月17日）
- 147．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1925年4月22日）
- 148．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2号记录（摘录）（1925年5月7日）
- 149．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摘录）（1925年5月13日）
- 150．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3号记录（摘录）（1925年5月15日）
- 151．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报告（摘录）（1925年5月16日）
- 152．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2号记录（1925年5月29日）
- 153．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3号记录（1925年6月5日）
- 154．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6号记录（摘录）（1925年6月11日）
- 155．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7号记录（摘录）（1925年6月18日）
- 156．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8号记录（摘录）（1925年6月25日）
- 157．瓦西里耶夫给中共中央的信（1925年7月21日）
- 158．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4号记录（1925年7月28日）
- 159．维经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1925年8月4日）
- 160．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5号记录（1925年8月5—7日）
- 161．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5号记录（摘录）（1925年8月13日）
- 162．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5号记录（摘录）（1925年8月13日）
- 163．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6号记

- 录（1925年8月18日）
- 164．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年8月19日）
- 165．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草案（早于1925年8月21日）
- 166．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7号记录（1925年8月21日）
- 167．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6号记录（摘录）（1925年8月22日）
- 168．拉斯科尔尼科夫给伏龙芝的信（1925年8月22日）
- 169．拉斯科尔尼科夫给伏龙芝的信（1925年8月24日）
- 170．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7号记录（摘录）（1925年8月27日）
- 171．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8号记录（1925年8月29日）
- 172．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9号记录（1925年9月5日）
- 173．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
号记录（1925年9月16日）
- 174．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摘录）（1925年9月17日）
- 175．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摘录）（1925年9月17日）
- 176．瓦西里耶夫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5年9月21日）
- 177．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
号记录（1925年9月23日）
- 178．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0号记录（摘录）（1925年9月24日）
- 179．斯莫连采夫给加拉罕的便函（1925年9月25日）
- 180．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

- 号记录（1925年9月28日）
- 181．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年9月28日）
- 182．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1925年9月28日）
- 183．温施利赫特和博尔特诺夫斯基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1925年9月30日）
- 184．斯莫连采夫给加拉罕的信（1925年9月30日）
- 185．博尔特诺夫斯基给瓦西里耶夫的信（1925年10月1日）
- 186．瓦西里耶夫给维经斯基的信（1925年10月2日）
- 187．斯莫连采夫对向人民军和广州提供物质支援计划的说明（1925年10月7日）
- 188．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调整驻华教官工作条件专门委员会会议记录（1925年10月9日）
- 189．伏龙芝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中国军事政治形势的报告（1925年10月13日）
- 190．瓦西里耶夫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5年10月14日）
- 191．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3号记录（摘录）（1925年10月15日）
- 192．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号记录（1925年10月19日）
- 193．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关于在中国开设新领事馆的建议（不早于1925年10月19日）
- 194．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4号记录（摘录）（1925年10月22日）
- 195．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号记录（1925年10月26日）
- 196．陈独秀给中共莫斯科区委的信（1925年10月28日）
- 197．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6号记录（摘录）

-) (1925年10月29日)
198.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8号记录(摘录)
-) (1925年11月5日)
199. 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摘录)(1925年11月11日)
20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3号记录(摘录)
) (1925年12月3日)
20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3号记录(摘录)
) (1925年12月3日)
202. 拉斯科尔尼科夫给维经斯基的信(摘录)(1925年12月4日)
203. 拉斯科尔尼科夫给加米涅娃的信(1925年12月11日)
204. 胡汉民在莫斯科的工作计划(不晚于1925年12月11日)
205. 拉菲斯同胡汉民的谈话记录(1925年11月12日, 12月7日和12日)